

国外中共党史
中国革命史
研究译文集
(第一集)

GUO WAI
ZHONG GONG
DANG SHI
ZHONG GUO
GE MING SHI
YAN JIU
YI WEN JI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科研局编译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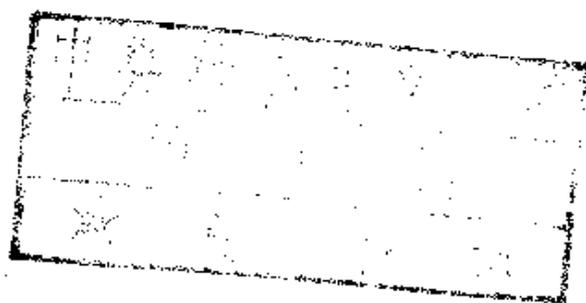


D23-53/2

7881R

国外中共党史 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 (第一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北京

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1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昌平东沙屯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17.75印张 470千字

1991年7月北京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000册

ISBN 7-80023-296-4/D·39

定 价：9.70元

0429/10

出版说明

60年代以来，国外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进展很快，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和资料，为了便于国内学者了解国外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状况，我们特编辑一套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丛书，将陆续出版。

这套丛书包括：《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时期）》、《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点摘编（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等。

《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1辑）主要收录了近几年国外发表的有参考价值的论著和资料（其中包括个别台湾学者用外文发表的文章），从内容上看，涉及对党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如党的创立、第一次大革命、遵义会议等）的评价，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论述和对我国史学界还研究得很不够的一些课题的探讨，如台湾共产党政治史、吴佩孚与苏联、中共及孙中山的关系、中国革命时期第三势力的形成和发展等。还有一些文章综述了国外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状况。国外学者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有其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常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其中不乏客观分析，当然也不都是正确的，甚至有一些偏见，望读者注意鉴别。

本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海副译审帮助选编，我室王洪模教授审阅了部分译稿，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

1990年12月

目 录

- 深入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
.....〔苏〕П·Г·巴比琴科 马贵凡译(1)
- 共产国际的活动经验
...〔苏〕Ф·И·菲尔索夫、К·К·希里尼亚 马贵凡译(20)
- 满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联系
.....〔日〕铎木昌之 张惠才译(36)
- 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几个问题
.....〔苏〕А·Б·列兹尼科夫 马贵凡译(62)
-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于共产国际1926年的
《十二月提纲》.....〔日〕松元幸子 韩凤琴译(75)
- 西安事变考——关于莫斯科与中共的关系
.....〔日〕石川忠雄 张惠才译(104)
-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问题
(1917—1921)
...〔苏〕А·И·卡尔图诺娃、Е·Ф·科瓦廖夫 马贵凡译(120)
- 论中国1925—1927年民族革命的历史地位
.....〔苏〕А·Б·梅利克谢托夫 马贵凡译(139)
- 台湾共产党政治史(1928—1931)
.....〔美〕弗朗克·肖、劳伦斯·萨利文 王应一译(152)
- 吴佩孚与苏联、中共及孙中山的关系
.....〔美〕吴英铤 唐秀兰译(177)

-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梁敬铨 唐秀兰译(223)
- 鲍罗廷回国以后……〔美〕丹·N·雅各布 唐秀兰译(244)
- 中国革命时期第三势力的成立与展开
 ……………〔日〕菊池贵晴 张惠才 韩凤琴译(263)
- 1931年中国的分裂在日军战略中的地位
 ……………〔美〕唐纳德·A·乔丹 韩 红译(309)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日中战争
 ……………〔日〕藤原彰 解莉莉译 张惠才校(336)
- 现代中国对陈独秀的研究
 ……………〔日〕横山宏章 韩凤琴 张惠才译(349)
- 一位广西共产党人的忧患生涯及其身后遭遇
 ——关于李明瑞和1949年以前广西共产党活动的几点
 札记……〔英〕格雷厄姆·哈钦斯 张晓翔译(371)
-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澳〕尼克·奈特 王应一译(383)
- 河山肇与中国革命……〔日〕小野信尔 张惠才译(391)

文 献 资 料

-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
 ……………马贵凡译 宋洪训校(395)

动 态

- 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现状……〔日〕国分良成 王应一译(444)
- 日本中国革命史研究现状……〔日〕天儿慧 韩凤琴译(457)
- 日本对抗日根据地问题的研究
 ……………〔日〕井上久士 韩凤琴译(466)

日本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若干问题研究情况简介	
.....	[日]藤田正典 张惠才译(484)
各国对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	
.....	[日]铎木昌之 张惠才译(492)
苏联学者对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研究	
.....	[苏]B·H·尼基福罗夫 马贵凡译(505)
苏联学者对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研究的新阶段	
.....	[苏]A·B·梅利克谢托夫 马贵凡译(523)
西德现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简介	
.....	[日]中嶋岭雄 韩凤琴译(540)
中国近年来在毛泽东研究上的成就与问题	
.....	[日]村田忠禧 韩凤琴译(545)

深入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 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

[苏] П·Г·巴比琴科
马贵凡译

译者按：本文原载《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87年第10期。作者П·Г·巴比琴科系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历史学副博士。文章报道了这一年7月8日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的共产国际史研讨会情况，反映了苏联共产国际史研究现状和苏联学者对如何评价共产国际的活动问题提出的新见解，以及对共产国际史研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的反思。

今年7月8日，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讨论了共产国际历史方面的一些研究得很不够和一直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来自莫斯科许多学术研究机构的学者就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状况和迫切任务，就克服停滞倾向、根除根深蒂固的教条和过时的模式发表了看法。在研讨会上发言的有：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历史学博士Г·М·阿季别科夫、Ф·И·菲尔索夫和К·К·希里尼亚；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学博士А·А·加尔金和С·И·谢苗诺夫；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科学院历史学博士、教授И·М·克利沃古兹；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历史学博士И·Н·温达瑟诺夫和З·Н·雅希莫维奇；苏联科学院各民族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Я·С·德拉布金；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历史学博士А·М·格里戈里耶夫；苏联

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历史学副博士И·Я·加比昂斯基。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哲学博士М·П·姆切德洛夫教授致开幕词，他号召研究国际共运史的专家们集中力量研究共产国际历史中那些至今还研究得很不够的问题，以及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他强调说，在今天，苏共二十七大决议和苏共中央一月和六月（1987年）全会决议已经为我国社会的变革创造了有利条件，广泛进行科学探索的许多障碍已经清除，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学者，包括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共产国际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已经有实际可能记取真正的教训，完全按照历史主义原则开展研究工作，重新考虑以前对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的活动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个别队伍所作的一系列评价。

共产国际就许多问题（如工人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问题、结盟问题、对待中间阶层的态度问题、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问题等）所进行的大量理论探索，对于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现在则需要对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社会改良派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共产国际的诸多方面活动，采取新的态度和进行认真的思考。我国对共产国际问题的史料研究显然是很不够的。

姆切德洛夫指出，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和我国其他学术研究机构在研究共产国际活动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成果，如出版许多重要著作，公布许多文件，等等。他强调，必须尽量借鉴已经积累起来的正面经验，因为以前的研究成果以及对这些成果所作的详细分析和批判性评价，有助于我们在今天把对共产国际理论遗产的创造性研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希里尼西指出，我国积极研究与共产国际活动有关的问题始于50年代末，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这期间，马列主义研究院制定了具体的研究计划。陶里亚蒂发表的纪念这个国际共产主

义组织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对加强这项工作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在过去的年代里，苏联历史科学认真地研究了列宁在建立共产国际和在制定其战略和策略方面所起的作用，揭示了列宁向一些共产党提供的巨大帮助。在对共产国际第一至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阐明了这些文件对于发展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在《共产国际史纲》(莫斯科1969年版)这部专著中分析了这个组织活动的主要战略阶段，着重研究了工人统一战线问题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问题以及人民民主革命理论的产生问题。在研究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战略和策略方面，以及在揭示季米特洛夫在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希里尼亚指出，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既有困难，也有严重的错误。在编写上面提到的《史纲》过程中，曾收到这个组织原工作人员的一些看法。如帕姆·达特指出，这部书第一次把评价共产国际活动的积极方面同十分坦率地承认它的消极方面结合起来了。确实，作者集体曾试图阐明共产国际的多样性经验，不仅要看到它的成就和功绩，而且要指出它的错误和不足，但是，这样做曾遭到马列主义研究院某些研究人员的强烈反对。最后定稿时，在更高一级层次上围绕该书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作者不得不从书中删掉许多说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共产国际的活动产生影响的论点，不过基本上还是保留了对问题的总的处理方法。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参加编写多卷本的国际工人运动史，也是对共产国际史作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

加尔金和德拉布金在发言中谈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共产国际史研究室集体在研究国际共运史学术问题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加尔金指出，B·M·莱布索恩和K·K·希里尼亚的著作^①问世是一个新的前进阶段，它促进了对共产国际历史问题的广泛深

入研究。克利沃古兹认为，60—70年代是对共产国际历史问题的研究达到较高水平的时期，这个时期形成了关于共产国际历史经验的总的概念。

但是，他们指出，那时所做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适应现在的要求，需要采取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彻底地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来分析复杂的历史进程。现在迫切需要这样做。

克服科研工作中的烦琐哲学和教条主义，

抛弃过时的模式

烦琐哲学、教条主义和过时的模式是在共产国际史研究中更为突出存在的问题，其表现是：讳言许多事实，回避尖锐问题或试图冲淡这种问题，力图从今天的立场出发来评价共产国际活动的某些方面，用泛泛的议论代替具体的结论，使共产国际的历史失去个性。所有这一切造成的后果是这一科学领域的全面停滞。

克利沃古兹强调指出，必须摆脱使用史料的倾向性，抛弃“历史就是面向过去的政治”的公式。虚伪地理解党性原则和见风使舵会给客观的研究工作带来损害。只有克服所有这些问题，对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中许多问题的研究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雅希莫维奇认为，苏联的历史著作对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其中存在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成分，其表现是简单地阐述革命进程，形式主义地运用关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及其衰落和灭亡的理论原则。例如，20年代的美国帝国主义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它的面貌已经发生变化，它已开始运用新的手段来加强自己的地位。但是共产国际却一味固执地认为存在着似乎可以导致资

本主义迅速崩溃和灭亡的趋势。许多有助于资本主义稳定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当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弱点和革命进程的不够发展造成的。

温达瑟诺夫指出，在我们的著作中实际上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国际制定的工人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常常用于削弱社会民主党。其实大家都知道，共产国际实际上拒绝同社会民主党组成战略联盟。拉狄克曾主张继续执行同社会民主党结盟的政策，但是遭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反对。直到法西斯在许多国家上台掌权的悲惨教训发生后，共产国际才不得不回到同社会民主党结盟的政策上来。

温达瑟诺夫认为，共产国际在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过程中产生一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摆脱它在20世纪所陷入的结构危机的途径缺乏明确的认识。在资本主义日益得到发展的新的条件下，存在着三种摆脱危机的途径：革命的途径、改良的途径和所谓反革命的途径。后两种途径的结合占居主导地位。但是共产国际只认为有通过革命摆脱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它不可能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不可能对社会民主党采取正确的态度。而且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时通过革命摆脱危机的途径是行不通的。结果第二半国际同第二国际合并，而左派社会党人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但是应当注意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一直在呼吁工人运动中的各个派别团结起来。

温达瑟诺夫赞同对共产国际史研究中取得的成果作出的许多肯定的评价，但是他认为，《共产国际史纲》一书对共产国际活动的分析很肤浅。这部书的观点是，共产国际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只是偶尔出现过失误或做得不够及时。马列主义研究院共产国际史研究室后来撰写的著作则深刻得多。温达瑟诺夫认为，现在学者们正处在研究共产国际历史问题的起点上，他们还受到一些与今天的社会科学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观念的沉重压抑。

在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公式化的表现是，只承认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口号的积极意义。据И·З·马努伊尔斯基证实，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推行“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有50个共产党的领导人被撤换。

德拉布金指出，192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中出现了“卢森堡主义”这个提法，造成了不良影响。人们试图以“卢森堡主义”来掩盖当时共产党人所犯的几乎所有理论上的错误，试图证明“卢森堡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相近似。人们首先和主要强调的是杰出的女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森堡的思想遗产中的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蔡特金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人曾坚决反对谴责卢森堡，不同意当时出现的这样一种看法：象卢森堡这样的活动家，越是接近共产主义运动，她的影响就越有害。攻击卢森堡的下一个步骤是斯大林（1931年）给《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这封信已把卢森堡说成是不断革命理论的炮制者。德拉布金强调说，苏联历史学家需要深入研究卢森堡的创造性遗产，清除过去年代的积垢。

克利沃古兹对所谓学者们充分地研究了“列宁与共产国际”的问题的说法提出疑义。他认为，对这个问题还必须从这样一个角度作出分析，即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怎样全面贯彻列宁的思想？并且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列宁是否始终都能贯彻自己的思想？要知道，有时列宁在共产国际里处于少数地位，因此在共产国际里曾为确立列宁的观点进行过斗争，同时，列宁的观点也得到了发展。对待这个问题需要采取新的更加认真的态度。

雅希莫维奇强调指出，共产国际历史中的列宁时期，是在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理论问题方面最富有成果的时期。这个时期，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左派”曾从所谓“进攻理论”的立场出发反对列宁的一系列思想，尤其反对统一战线思想。按照这个“理

论”，不管客观条件如何，共产党都要始终执行进攻策略。共产国际第五、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当然以及1937年和晚些时候，都曾发生过背离列宁主义原则的情况，其集中表现是解散波兰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历史中存在着一些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棘手问题是有关联的。对这些问题必须进行认真的、全面的、权威性的研究和思考。

加尔金指出，回避态度在政治上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很大损害。共产国际历史上的“空白点”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此在许多场合，我们在思想敌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例如，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破坏民主原则的事实和干涉一些共产党事务的恶劣做法，都需要作批判性分析。但是这里并非全是一种涵义。要考虑到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性组织，这一点不仅决定了它的积极因素，而且也决定了它的消极因素。比如说，共产国际往往把联共（布）的建党原则机械地搬到其他党内，而在我们的著作中，实际上只字未提共产国际的机构及其对各国党的影响。然而关于这个问题在国外却有很多著述论及。现在不仅需要更广泛地揭示共产国际对培养干部和共产党成立过程的积极影响，而且需要批判性地分析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不正当干涉造成的后果。

谢苗诺夫接着谈到研究共产国际执委会机构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的必要性，他注意到一直未作研究，实际上至今仍是研究禁区的共产国际各地区局、各区域性书记处和其他机构的活动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的地方，给资产阶级思想家、修正主义分子歪曲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乘之机。现在很有必要阐明比如共产国际执委会巴尔干局和南美局的活动和联系问题。同时应该看到，共产国际这个世界性组织的工作人员经常在各个国家进行活动，他们创造性地运用和传播了积累起来的革命经验，鲍罗廷在研究了墨西哥的革命经验之后，曾试图将

其运用于中国。米涅夫曾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地区局的活动作出很大贡献。在研究各地区共产党活动的同时，应当注意到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革命经验产生的影响。

菲尔索夫也谈到共产国际与它的各个支部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从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彻底性角度对这种关系作了分析。他指出，我们还没有具体的研究著作谈到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时犯错误和歪曲这一原则的原因。大家知道，共产国际常常给各国党下达无法接受的决定，在干部问题上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们。其明显例子是第五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波兰问题的决定。波兰同志在对《共产国际史纲》一书所作的一则评论中委婉地指出，该书绕过了这个问题。

现在需要更清晰、更详尽地揭示斯大林对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斯大林对制定这个组织的战略和策略的粗暴干涉，常常给各国党造成不良后果。对于在斯大林的压力下通过的文件，也应当作出适当的评价。但是不能仅满足于明确错误，因为诸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之类决定，是在政治上对斯大林镇压政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掩饰。

菲尔索夫接着说，最近20年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如果其他国家对共产国际活动的某些方面提出的批评，在苏联的著作中找不到类似的反映，而其评价与我们又不一致，那么这种批评就会遭到驳斥或被置之不理。例如，路易吉·隆哥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与西班牙的战争》（他的回忆录的第二卷）一书遇到的情况就是如此。没有这部书，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1983年在南斯拉夫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菲尔索夫认为，Д·列夫科维奇教授对共产国际的作用所作的评价是很准确的。列夫科维奇报告中的许多重要论点与苏联历史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或者说很接近。但是，南斯拉夫学者也提出另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无疑受到了斯大林与铁托之间冲突的

影响。当然，应当批判那些站在敌对立场上撰写的、明目张胆歪曲历史的著作。但是必须放弃对外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著作的一孔之见，不要摒弃那些与我们不同的观点。

雅希莫维奇赞同这种看法。他指出，直到不久以前，对于那些研究国外论述共产国际历史的著作的学者来说，甚至在专门的通报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都是很困难的。这不仅涉及否定的评价和结论，而且也涉及肯定的评价和结论。这种情况不能说是正常的。苏联读者应当了解国外如何阐述共产国际的历史。而且从对这些问题的史料研究过渡到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是比较容易的。

格里戈里耶夫提请与会者注意国外史学界，特别是中国史学界近年来研究工作的活跃。在中国，最关心的是“共产国际中民族因素与国际因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等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历史学家就这些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如果说过去他们主要是进行反苏、反共产国际的攻击的话，那么最近他们对共产国际活动的评价已经比较客观了。

在前几年举行的苏中学者会晤中，中国学者确实接受了以下结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许多共产党经验的总结。共产国际事先并不知道发生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中国学者承认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和在1924—1925年，直至1927年的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但是要把共产国际的政策说成更有远见和比实际水平更高，则会引起中国学者的强烈反对。中国历史学家认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政策中的首要任务，在当时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的。格里戈里耶夫强调说，摆在苏联史学界面前的任务是，既要说明共产国际东方政策中的成就，又要指出其中的失误，要填补这一政策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着的“空白点”。

与会者认为，必须认真研究联共（布）在共产国际中的领导作用，对这个问题要采取新的态度。如希里尼亚指出，在这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弄清楚和重新作出批判性的认识。实质上，我们对我们党在共产国际中所做的有益工作还了解得很少。例如，1925年夏，以布哈林为首的俄共（布）代表团曾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同德国共产党领导中的极“左”派集团，即P·费舍、A·马斯洛夫等人进行了谈判。后来，布哈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汇报了谈判情况。他批评德共领导不顾俄共（布）代表团的忠告和会谈时达成的协议，收缩工会中的工作，不让温和派代表进入德共中央（这些人在1923年曾是德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在党内实行个人专制。俄共（布）代表团警告说，如果德共领导在党内建立强硬的个人专制关系，那么它必然会按照同样模式建立它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这样就会使德共失掉同群众的联系。因此，布哈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出了用能够执行列宁的密切联系群众政策的人来替换德共极“左”领导人的问题。希里尼亚指出，我们党向其他国家共产党提供建设性帮助的事例还很多。在揭露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时，不应忘记这些积极方面。必须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全部辩证的矛盾性。

谈到这个问题，菲尔索夫强调说，虽然我们党在共产国际中的主导作用尽人皆知，但是学者们还没有根据具体事实对这种作用作出彻底的研究。例如，1921年1月，德共中央向德国其他工人组织发出公开信，这封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拉狄克的要求起草的，拉狄克也是该信的一个起草人。我们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尽管在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拉狄克在当时是反对统一战线政策的。

阿季别科夫谈到一些学者喜欢对一些问题采取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态度，谈到他们跳出陈旧观点框框的胆怯心理。在分析与“共产国际和劳动者群众性革命组织”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

研究情况时，他指出，对于这些问题，在著作中有许多地方讳莫如深、言之未尽和留下了“空白点”。那么在20—30年代是否有必要建立这些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进行活动的组织？阿季别科夫认为，象工会国际、青年共产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这样的组织有存在的权利，但是对建立农民国际和体育运动国际是有争议的。它们的活动带有宗派主义性质，然而在著作中对此却避而不谈。象国际工人救济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这样的组织，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它们有时做工作互相重复，结果使国际团结运动复杂化了，因而削弱了这个运动。

马列主义研究院撰写的一些著作对群众组织作出了评价，然而这些评价并非始终都全面、准确。研究院的共产国际史研究室打算继续研究共产国际和群众组织的活动，特别是它们在第五、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的活动。现在形势对认真分析这个时期的整个一系列问题很有利。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总的概念。对于那些在著作中尚未得到充分论述的问题，我们正在制定处理办法。应当看到，在共产国际活动中存在的错误在工会国际中也存在。如对资本主义评价的公式化，对革命前途估计的冒进，对无产阶级组织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以及常常把工人领袖同群众混为一谈等。还存在着轻视局部要求，对其置之不理的现象。在将来的学术著作中，应当更尖锐地批判“工会是资本主义的学校”，“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的温和派”之类左的口号。

阿季别科夫还说，共产国际把群众性革命组织当作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辅助手段，破坏它们在组织上的自主性，要求它们绝对服从共产党，这种情况给共产主义运动和群众组织带来很大损害，然而并没有随时从失败和反面经验中吸取教训。

阿季别科夫最后说，现在迫切需要重新研究共产国际对待群众组织的全部政策，一切都要从头做起。这对于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它的结盟政策，对于弄清共产党群众基础狭窄的原

因和弄清社会民主党对群众的影响比共产党大的原因，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与会者特别注意到未解决和研究得不够的问题，同时批判性地分析了对共产国际活动的研究成果。他们一致认为，没有理由从总体上怀疑共产党人的这个国际组织的正面经验和怀疑苏联史学界对共产国际主要活动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讨论共产国际历史中的具体问题时，与会者始终认为，史料来源狭窄是妨碍撰写新的更加深入的研究著作的重要原因。所有发言人都无一例外地强调，迫切需要向学者敞开档案资料大门。

例如，希里尼亚指出，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保存有很丰富的档案资料，但是还研究得很不够。正是在这些资料中可以找到本次讨论会谈到的许多复杂问题的答案，进而可以确保出版更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著作。菲尔索夫在谈到专家们因接触档案资料的限制而遇到的困难时，建议出版迄今尚未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一系列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稿。在这方面，苏联的历史科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例如，南斯拉夫已出版12卷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稿，而在我们这里，很遗憾，存在着删节、不全文发表文献的做法，例如，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包括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报告就是这样发表的。只发表文件的全文，这应当成为一项不可违反的规定。格里戈里耶夫也谈到文件发表时被歪曲的情况。作为正面例子，他提到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最近发表的文献资料②。

加尔金指出，看不到共产国际文件，会对培养这个科学领域的青年学者产生不良影响，专家会越来越，课题威信会日益下降。史料来源的狭窄使我们不得不去求助于国外史料，但是这样做往往孕育着犯错误的可能性。雅希莫维奇也谈到这一点。他指出，在国外，由于相当广泛地公布了有关共产国际历史的档案文

件，学者们可以积累史实材料。苏联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处境不妙。中国历史学家打算出版300卷有关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文件。我们连30卷都没有。国外研究者都认为看不到共产国际档案文件是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一个障碍。谢苗诺夫赞成关于我们国家要更广泛地公布档案文件的建议。他指出，拉美国家在日益重视共产国际问题。最近几年，它们出版了西班牙文第一至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稿，公布了许多档案文件，其中包括洪别尔——德罗档案、拉丁美洲共产党第一次会议（1929年）速记记录稿。遗憾的是，后来的这类会议在《共产国际》杂志上报道得很不充分。而对1934年举行的那次会议的材料，在我们的史学著作中，包括在《共产国际史纲》一书中，都没有作出正确的说明。

与会者强调，用新的态度对待一系列问题，克服烦琐哲学和教条主义，扩大史料来源，这些应为集中力量研究共产国际历史中的主要方面和消除其中的“空白点”创造有利的条件。

集中力量研究共产国际历史中的主要方面， 消除其中的“空白点”

希里尼亚说，共产国际历史中的许多基本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其原因是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不完全实事求是。对于一些事件还没有从其相互的紧密联系上作出全面的阐述。没有反映出所有的困难和错误。他认为，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其发展前景的估价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有不容置疑的功绩，但同时也有严重的理论上的错误。它把对革命高涨时期的某些估价机械地搬到了1923年以后时期，忘记了列宁关于两种制度可能长期进行斗争的结论，忘记了列宁关于欧洲革命决战失败后无产阶级的阶级发动具有防御性质的结论。共产国际常常把资本主义即将崩溃作为考虑问题

的出发点，因为它认为资本主义已没有足够的潜力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自己，所以对资本主义崩溃过程多半作出了乐观、公式化的估价，并且极力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解体因素，而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稳定因素作出公式化分析。可能是布哈林第一个提出了以下看法：资本主义还有潜力，资本主义能够实行可以增加其利润和提高部分工人工资的国有化，从而可以暂时缓解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蔡特金、葛兰西、瓦尔加也都谈到资本主义的潜力，谈到资本主义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的实力消耗殆尽。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布哈林曾指出资本主义的稳定性有所提高，他建议对“资本主义崩溃过程作出更加谨慎的表述”。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反对把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再生产已达到顶点的论点写进共产国际纲领。瓦尔加虽然也指出过对资本主义的估价不准确，但是他本人常常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作出左的预测。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列梅勒等人把资本主义的稳定过程说成是“腐朽的、更加摇摇欲坠的过程”。因此，希里尼亚指出，研究资本主义在共产国际活动时期的发展情况是研究人员的首要任务之一。

希里尼亚接着说，分析共产国际提出的世界革命构想也很有现实意义。这个构想的缺点是公式化，对一般民主发展进程的意义估计不足，急躁冒进，但是不能否认共产国际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革命方向基本正确。

在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史学界，有时也在共产党人中间，存在着利用共产国际提出的革命构想中的问题进行投机的行为。意大利共产党员阿古斯蒂写道，共产国际的主要错误和问题在于它没有看出资本主义结构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他建议要从当代“欧洲共产党人”那里吸取这个教训。这样的投机行为也象1983年在南斯拉夫举行的共产国际问题讨论会上一些与会者提出的观点一样，必须予以批驳。在南斯拉夫的那次讨论会上，有些人

对共产国际的经验，特别是列宁去世之后时期的经验只作否定的评价。

共产国际在对革命前途的估计上犯错误和出现失误的根源在于，它的领导人常常把世界革命事件的发展同俄国1917—1921年发生的情况相类比，往往把俄国的阶级力量格局当作衡量其他国家将来革命的尺度和标准。俄国那个时候的事态发展很快，共产国际机械地把这种发展速度搬到新的时期，搬到社会经济结构完全不同的国家。在共产国际内部，好象很害怕丧失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目标，而同时又脱离现实，对实际情况分析不够，未能始终看到和估计到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源泉在不断变化。

克利沃古兹同意希里尼亚的意见，也认为研究共产国际提出的世界革命构想应当是当代史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他强调说，这个构想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形成的。十月革命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进行的，但是它的经验却被搬到其他国家，搬到共产国际的全部活动中。俄国的经验被公式化了，它的影响造成了左的压力。这就是当年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左”倾的根源所在。克利沃古兹认为，为了认真研究世界革命构想，必须引用新的史料和新的统计资料，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借助这种方法可以对历史事件作出另一种更为准确的说明）。

加尔金谈到共产国际过高估计世界革命形势的问题。这种过高估计的原因，在于革命的急躁情绪，在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公式化理解。共产国际的这方面问题是与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有关联的。共产国际的问题至今仍有影响，它给共产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以及共产党内部的关系蒙上了阴影。

在就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前景的估计问题继续交换看法时，德拉布金指出，如果说1917—1921年寄希望于世界革命是有根据的，那么后来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共产国际不但对革命形势作出了过高的估计，而且它的结论作出的也太迟。因此德拉布金强调，

研究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关系问题很重要。同时应当看到，在共产国际文件中常常毫无根据地强调革命与改良的对立性。

谢苗诺夫谈到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进行路线的选择问题。那个时期，人们常常认为，如果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出现稳定局面，那么就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到东方和拉丁美洲。共产国际恰恰是把这些地方看作薄弱环节，并期待着在这里实现革命的突破。当时提出了“跟我们学，象在俄国那样干”的口号。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都曾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共产国际好象发现了拉丁美洲。因此，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特别是在秘鲁和哥斯达黎加出版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存在着明显的投机行为。在这些著作中含有对共产国际的指责，“指控”共产国际试图输出革命，同时这些著作的作者还试图证明，在今天，人们仍在实行推动拉美国家共产党进行革命的“方针”。谢苗诺夫指出了研究美洲大陆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掌握列宁的思想遗产的过程和研究共产国际旨在根据这些国家的特点运用这一遗产所进行的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对共产国际对殖民地附属国家革命性质作出的评价采取新的态度的必要性。

与会者一致认为，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评价问题和它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研究方面。

希里尼亚指出，共产国际并不了解社会民主党所特有的全部矛盾性。1921年在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列宁曾谈到需要给予群众体验各种途径的机会，以使他们能够真正确信通过社会改良途径来消灭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列宁认为，在工人运动中，必须使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具有竞赛性质。但是共产国际把列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时期的社会民主党的评价（也就是极其消极的评价）机械地搬到了20—30年代，即由于法西斯的进攻，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年代。虽然在共产国

际里有些人主张对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批评应带有解释性质（就象列宁教导的那样），但是认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左”翼，甚至是“社会法西斯”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

菲尔索夫说，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评价与它制定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有直接关系。由于共产国际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日益尖锐，制定统一战线策略的过程也变得复杂化了。列宁逝世以后，这场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季诺维也夫在对待社会民主党和对待统一战线问题的态度上表现出宗派主义，歪曲了列宁的方针，他把斗争任务仅仅归结为“揭露”社会民主党，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相提并论，而把统一战线策略仅仅理解为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在解决统一战线问题时，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了。应当认真地全面地研究这个重要问题。

雅希莫维奇在谈到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时，论证了提出和研究共产国际对这一政策的执行情况问题的必要性。工人统一战线政策在任何地方都未得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也需要研究。那么为什么共产国际不止一次地重新研究同一些问题呢？雅希莫维奇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决议具有宣言性质。这一点从它的文件中可以看出。

与会者指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时期也同样存在着“空白点”和研究得不够的问题。在这个时期，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特别严重，出现了执法机关干预共产国际活动和共产党生活的现象。研究共产国际1939—1940年间的立场，也需要采取新的态度。加尔金强调说，不要泛泛地议论，而要开诚布公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爆发的。在这方面，共产国际毫无理论上的准备。战争爆发前夕没有分析力量对比情况。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季米特洛夫不得不讲些和写些与他在前几年所捍卫的观点截然相反的东西。

在分析对这个时期还研究得不够的问题时，菲尔索夫提到“共

产国际与苏联外交政策”问题。资产阶级的历史著作把共产国际说成是“莫斯科的工具”，我们否认这种说法，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警告说，在苏联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之间不应划等号。然而也必须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甚至连“法西斯”这个词也从共产国际的公开刊物上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在给一些共产党的指示中，例如在给被德军占领的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共产党的指示中，仍坚持说它们的主要敌人是英、法帝国主义。

加比昂斯基谈到，在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发挥作用”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发生变化。在某些党内，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实际上已被封锁。至于巴尔干地区的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共产国际在为这些党制定共同立场方面所起的中心机构作用甚至有所加强，其表现是正确地判断了形势，明确了共产党的具体任务。这个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欧洲共产党的许多联系都是通过南斯拉夫进行的。加比昂斯基指出了对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活动史研究的薄弱，他提到战后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国际的残存机构——的工作。情报局成立不久就开始像共产国际机构那样进行活动，因为在情报局里工作的还是那些人。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的著作中，都把情报局的活动同共产国际直接联系在一起。

希里尼亚对克利沃古兹提出的1943年共产国际停止活动的原因和他对共产国际机构在战争条件下是否起作用提出的怀疑发表了不同看法，希里尼亚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实质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方式的变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这个运动已经低落，相反是出现了高潮形势。除了德国和西班牙之外，欧洲各国共产党都加强了活动，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展了党的队伍，扩大了党的影响。然而，在战争条件下，共产国际同各个

支部很难保持联系，因此它们的作用降低了。但是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粉碎法西斯军队之后，党的积极性又得到了提高。所以希里尼亚认为，更正确的说法是：以前的相互关系形式已不适用，在战争情况下，这种形式影响了动员反法西斯力量。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低落。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史研究室主任、历史学博士И·М·米纳耶夫教授作了会议总结。他说，这次讨论会的主要成果是认识到必须大力加强对共产国际历史中的一些重要方面的研究。

尔后，米纳耶夫谈了他认为在共产国际活动中存在的一些僵化模式，即试图加快革命进程，把愿望当作现实；存在着资产阶级是一个经常犯错误的阶级而无产阶级总是正确的概念；共产国际把宣传鼓动当作理论，或者相反；明显过高地估计了群众的革命成熟程度。因此，必须以批判的态度评价以前的研究成果，排除一切干扰，用崭新的辩证态度和新的方法来分析20—40年代的革命进程，并利用对共产国际多方面经验的研究来全面研究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

注释：

①Б·М·莱布索恩、К·К·希里尼亚著《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莫斯科1965年版。

②指《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莫斯科1986年版。

共产国际的活动经验

〔苏〕Ф·И·菲尔索夫 К·К·希里尼亚

马贵凡译

译者按：本文原载《共产党人》杂志1988年第10期。作者Ф·И·菲尔索夫系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室主任、历史学博士；К·К·希里尼亚系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顾问、历史学博士。文章对共产国际的活动作出了新的评价，就共产国际活动中一些引起争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世界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与共产国际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共产国际是存在于20世纪两个最重大的事件，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覆灭之间时期的国际性组织。

建立共产国际的倡导者是列宁，但是共产国际在1919年3月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这不仅记载了俄国人、俄罗斯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而且记载了德国、奥国、匈牙利、芬兰、瑞士的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一句话，这记载了国际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53页）共产国际在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定这一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以及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加强这一运动的队伍和把列宁主义同国际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等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

苏联历史学家撰写许多著作，分析了共产国际在解决规模空前宏大和无比复杂的任务时所取得的正面经验，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失误和错误。但是在今天这些著作既不能满足研究人员的要

求，也不能满足对共产主义运动史感兴趣的读者的需要。因为迄今对共产国际这个国际性组织发挥作用的方法、它的领导机构与各个支部〔特别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俄共（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共产国际内部的政治思想斗争、斯大林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精神状态、理论观点、政治决议和实际步骤的影响等等，几乎都未作研究。而研究这些问题则需要摆脱固定的模式，需要为科研工作开放大量档案文件，首先是难以看到或根本看不到的档案文件。这些文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产，看来，应当通过各兄弟党之间的协商来确定使用这些文件的规则。并且还不能忘记，以前曾尝试过对共产国际历史中的某些方面作出批判性的评价，但是这样做被认为是离开了党的立场，因而导致产生了片面的总结和结论，以至在著作中出现了“讳言事实的现象”。

要深入分析共产国际的历史道路和经验，就需要考察这个组织的各种真正复杂的和全球性的活动，需要将阶级斗争进程同其在共产国际政策中的反映作个比较（共产国际的政策对阶级斗争进程也有影响）。这项工作要求全面揭示共产国际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研究共产国际的经验不仅从汲取教训的角度来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这也是探讨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更加深入的认识，弄清其规律性和各种倾向交互作用的复杂性所需要的。谈历史上的全部真实情况，这意味着从真正科学的立场出发来考察历史，分析那些在不久前还没有被披露或被毫无根据地宣布为不大重要的史实。我们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不能忘记共产国际的巨大功绩和那些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工作、将自己的知识、力量、精力，有时甚至是生命贡献给共同事业的人们。

现在摆在苏联研究人员面前的任务是：恢复共产国际活动的全面真实情况，写出它的真实而全面的历史。在历史著作中详尽地阐述共产国际的成就和它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本文作者

给自己提出的另一个任务是，阐明共产国际发展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以及一系列不良倾向对它的影响，并就现在引起争论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我们认为，彻底恢复列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构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实现工人阶级主要战略目标的斗争途径观，是分析共产国际历史经验问题的出发点。列宁的构想首先包含对各种社会发展趋向和具体历史情势的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斗争前景和任务的确定。列宁曾试图使共产国际具有这个特点。当然，在列宁直接参与共产国际工作的时候，在各国共产党中远非所有干部都具有列宁对革命运动问题的认识水平，因此曾为确立列宁的观点进行过斗争，但遭到了机会主义分子、宗派教条主义分子和半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抵制。

最初在1919至1920年间，共产国际和一些共产党提出了在一些国家直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新的政权机构——苏维埃的任务，列宁及其拥护者全力以赴地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8月）文件记录了共产国际的基本政治思想观点，反映了这个方针。共产国际认为，自己的重要职责是毫不迟疑地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许多共产党员认为，运动发展异常迅猛，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在欧洲结束资本主义制度。阶级对抗的尖锐程度和尽快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愿望对那个时期的许多政治方针都产生了影响。

但是指望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在近期取得胜利的思想未能得以实现，因为在1920与1921年的交替时期已经出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低落和资产阶级转入进攻的趋势。头脑清醒、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列宁，第一个指出必须对共产主义运动方针作出大的改变，使之适应于新的情况。这个时候的主要任务不是直接向资本主义发起冲锋，而是有步骤地对它的堡垒实行包围。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7月）上，列宁对

那些拥护“进攻理论”的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为这些人认为，共产党应当发动群众起来进行革命的战斗，而不管客观形势如何。“进攻理论”实际上是号召人们扑向阶级敌人的暗剑。列宁警告说，干“左的蠢事”和兜售“进攻理论”，就等于使共产主义运动必定遭到灭亡。在业已形成的条件下，重要的不是挥舞小红旗，不是提出超革命口号，而是巩固工人阶级的阵地，巩固它在保卫自己根本利益斗争中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列宁提请各国共产党要特别重视把大多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的任务。

在同“左”倾分子所进行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中，蔡特金、库西宁、柯拉罗夫、什麦拉里等共产党人积极地支持了列宁的新政治方针。共产国际在1921年完成的政策转变和苏俄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同时发生的。这种转变显然是全世界形势变化所致。蔡特金后来说：“列宁从未做过自己的公式的俘虏，也从未让自己以前的提法束缚自己的行动。在理论和实践的实际发展过程中，他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结论，从未让创造生活的力量受一纸空文的左右。”因此，对于共产国际活动中的列宁阶段来说，突出的特点是，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即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主席团，力求在准确了解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业已形成的局势和广大群众的社会心理变化所造成的各种可能性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列宁及其拥护者大胆地提出了一些新的决议案，无所畏惧地批驳了一些过时的方针，揭示了新的斗争途径和吸引群众参加这一斗争的方法。

列宁对党群关系的理解在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得到了反映。这项政策是共产国际于1921年底至1922年间制定的，并在它的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12月）上作了认真的分析。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革命进程的新构想的萌芽（即通过解决过渡阶段的任务和通过开展全民反击资本家、反动派和法西斯进攻的斗

争来开辟可以把群众动员起来的前进道路)是争取统一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和其组织的行动的基本方针。共产国际曾提出用工人政府和工农政府取代资产阶级政府的口号,其目的在于进一步促进革命力量的发展。

在列宁的概念中,以统一的思想理论观点为基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也是形形色色的、不断得到发展的并在每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的特征和自己民族特点的运动。所以共产国际也被看作是辩证的统一体,它既是一个各种政党的联盟,又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党。共产国际的活动、它的执委会和其他机构的活动都是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需要决定的,而它的突出特点也是由它发挥作用的方法、它的内外联系方式和领导的集中程度决定的。

在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所有共产党都参加对形势的集体分析和对长远任务及现时任务的集体讨论。它们共同为所通过的决议负责。在共产国际的列宁时期,这种讨论具有以下特点:有民主气氛,可以自由捍卫自己的立场,共同努力寻求回答众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并且能考虑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以及民族的特点和传统。在共产国际中,有争议的问题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决定,即在讨论结束后由多数票决定,同时通常都要争取取得相互间的充分谅解,寻求能够使主张采用各种解决办法的人都满意的决议,而一旦策略上的分歧无法克服,就以意见一致的条款为基础通过妥协性协议。作出这种妥协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工作期间,在列宁的参与下,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多数派同少数派签订协议。

当然,在共产国际的许多方针中,都可以看到过份“一般性的内容”,但是这并不是对各国工人阶级的具体的特殊的斗争条件的有意忽视。这里总还是更多地反映了各国共产党的不够成熟。那个时候它们还没有掌握独立寻找最符合本国国情的解决办法的艺术。列宁很关心共产国际作出决议的民主程序,很注意尊重每

个党的意见和每个党为共同事业作出的贡献，因而创造了一种很有利的气氛，使得国际主义方针始终能够同注意到特殊性的政治结论结合起来。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的历史科学作进一步的研究，因为这些问题是列宁的共产主义政策之所以能够体现出灵活性和有效性的一个“秘密”所在。

列宁善于把所有最积极和最有才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首领团结统一到解决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上来。对于那些由列宁的中央派到共产国际工作的俄共（布）活动家来说也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在制定和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方针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尽管在许多问题上，他们同列宁有意见分歧，但是这并未成为那个时期制定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俄共（布）作为共产国际最有经验和最成熟的党，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这一点为各国共产党所公认。

在后来的历史阶段，共产国际强调忠实于列宁的思想和传统，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去世，对于共产国际也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认为，后来，列宁学说中的许多重要论点被教条化和被歪曲了，因而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改造力量。如果把国际形势的第一次急剧转变（这次转变与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有关系）同共产国际在其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7月）上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分析作个比较，就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政治估价同现实情况已有一定的距离。当时代表大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世界上新的革命发动时期正在日益成熟。但实际生活证明，这是个错误。

1925年，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作出相对稳定的估价，并且作出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加深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总危机的重要结论。虽然我们对共产国际那个时期的政策问题研究得还不够，但是很明显，这些结论过于简单。资本主义衰落时期被认为

是这种制度的发展潜力（其中也包括生产力）基本上已经耗尽的时期。例如，1926年以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以及斯大林都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稳定局面是在腐朽、不稳固的基础上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同时也是向革命的靠近。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复杂辩证法实际上被归结为一种原理性的论断，即资本主义的任何进步都是向死亡的靠近。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每一次阶级搏斗都是按照这个公式予以评价的。

托洛茨基则采取一种极端的立场。他声称，资本主义没有能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而出现的经济高涨形势，在他看来是生产力发展上下摇摆的不景气现象。在20年代下半期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当中，布哈林对形势和发展趋势作出了较为现实的评价。但是在他的分析中也能感觉到他对资本主义生命力及其对新的条件的适应能力的某种低估。

因此，人们过高地估计了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潜力。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中，当时主要有这样一种概念：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彻底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在反帝斗争中它不可能起积极作用。斯大林特别积极地推行了这个方针。他不执行列宁的反帝统一战线口号，而是要求集中力量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和提出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是摆脱帝国主义的基本条件的口号。这个方针后来写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7—9月）决议。它不仅大大缩小了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政策范围，而且对未来作出了错误的展望，因此给各国共产党提出了过高的战略目标。

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样一种倾向：把纯粹共产党的纲领视为群众可以立即接受的路线，试图同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工人实行合作，条件是他們要转变到彻底革命的方针上来，并同他们以前所属的组织决裂。这样的尝试通常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如果把事情说成这样，即宗派教条主义错误始

终是从“上面”，从共产国际领导方面强加给各国共产党的，那是不对的。事情要复杂得多。在“下面”，在各国共产党中和在革命工人运动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宗派主义情绪。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很多，如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影响、革命浪漫主义思想的存在、对阶级斗争途径的简单化认识等等。共产国际执委会常常处在来自“下面”的宗派主义情绪的强大压力之下，并且不得不对这种压力作出让步。甚至在作出谴责“左”的倾向的政治决议时，共产国际自己也常常“向‘左’的方面”使劲。

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和一些共产党“左派”的影响下，对国际发展前景作出了片面的估计，认为新一轮革命和战争正在临近。在我们看来，这里表现出一种急切期待新的革命浪潮到来的情绪。历史学家还需要研究共产国际的内部生活和那几年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内形成的精神状态。尤其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国际为加强共产主义先锋队和为克服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宗派冒险主义的观点和情绪所造成的影响而进行的顽强斗争，不光使共产党的干部在政治思想方面受到了锻炼，而且导致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出现了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对事态发展作出较冷静和较现实的考察反而遭到反对，甚至被指责为机会主义倾向和对革命前景的背弃。

这个时期在工人统一战线问题上和在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上，宗派教条主义方针表现得很明显。众所周知，列宁对社会民主党在1919—1920年革命高涨时期的作用作出了简单粗暴的评价。共产国际诞生本身也与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革命派同社会改良主义划清界限的过程有关。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和中派首领实际上打着“纯民主”旗号同资产阶级共同筑起了防御行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堤坝。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随着共产国际向统一战线政策的过渡，共产党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已受到许

多新的因素的左右。共产党人未停止同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斗争。他们需要遵循列宁的遗教，寻找接近具有社会民主思想的工人的途径，以便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

在这方面，1921年12月4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所引用的列宁在制定统一战线策略时提出的论点很有意思，也很重要：“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可能现在是第一次参与政治生活（这样的阶层总是会有的），只是现在由于总的情况所致才参与政治……它们应当根除改良主义幻想。它们应当自己凭借自己的经验去试验，改良派给它们提出的那些途径和那些（对于它们来说）新的途径。”可见，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或多或少都需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去试验社会改良派提出的途径。那么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对待这种机会呢？对这个问题，列宁也作了回答。他在1922年写到：“作为资本主义向新制度和平演化的不多的机会之一，我们共产党人对此是不大相信的，但是我们同意帮助试验一下这种机会。”（《列宁文稿》中文版第4卷第233—234页）列宁的这种态度批驳了那种在反对资产阶级进攻斗争中人为地加剧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对抗的做法。此外，从列宁的话中还可以看出，他认为对群众进行联合行动的思想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实行统一战线的任务变得更加重要。遗憾的是，列宁提出的发展统一战线的思想因种种原因（如主张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政策的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的抵制，以及共产党人在执行这种策略时所犯的宗派主义错误）而未能实现。在1923年底至1924年初，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受到许多共产党内出现的“左”倾宗派主义情绪的影响，提出一种说法，实际上把统一战线的全部内容仅仅归结为一种旨在揭露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认为主要应当打击社会民主党。不久又发展了这种观点，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资产阶级第三党”，是法西斯的孪生兄

弟、法西斯的一翼。“社会法西斯”的说法成了争取统一工人阶级行动的一大障碍，给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抵制统一战线提供了方便。

“阶级同阶级对抗”的口号是作为联合整个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由共产国际和一些共产党提出来的。实际上这个口号含有宗派主义内容，因而导致加重了对社会民主党的打击并组织了没有社会民主党和改良工会参加的工人行动。把统一战线理解为仅仅是旨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下层工人统一战线。认为社会民主党左派是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的最危险的敌人。

在这个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一些共产党的政策中，还可以看到另一些缺点和错误，如公式化地确定不同类型国家发展革命的途径，否认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存在过渡阶段，轻视一般民主任务、近期局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担心这些要求和任务有可能使无产阶级离开争取阶级利益的斗争）等等。所犯的这些错误当然不能不对共产党政策效力产生影响。

我们还想提请注意，我们对共产国际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历史研究得还很不够，在这段历史中，所谓从共产国际队伍中“清除”当时称之为“右派”和“调和派”的分子和集团的行动占有特殊地位。我们认为，对这次“清洗”行动的内容和结果需要在认真研究文件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作出评价。这个时候斯大林还发动了反对布哈林追随者的运动。

我们在思考共产国际活动中出现消极现象的原因时，应当考虑到当时的阶级斗争条件、苏联同帝国主义势力的对抗和在许多共产党中比较广泛提出的，通过直接的、最激进的和当时人们认为最快的途径奔向目标的要求。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据当时的共产党人认为，资本主义未必能摆脱这种危机），在阶级斗争日益加剧情况下，“左”倾宗派主义观点得到了新的推动力。在这种形势下，要把共产国际改变为高度集中的组织，改变

为能够机动灵活地领导处于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各个支部的机构的意向有所加强。因此，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集中制与民主原则之间的对比关系开始朝着过于集中的方面转变，结果限制了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灵活性，妨碍它们对瞬息万变的形势及时作出反应，而且有时造成了消极等待中心机构指示的现象。

发展进程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增强了，团结、友爱和互助精神，以及特别是对那些从事地下活动遭到阶级敌人打击的党的干部的支持有所加强。各国共产党人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苏联在全球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另一方面，列宁确立的共产国际讨论政治思想问题的方法开始遭到破坏。1928—1929年间，特别是在解除布哈林在共产国际里的工作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争论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把不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这样或那样的论点的人清除出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式加以解决。据文件证明，只有得到斯大林的认可，共产国际领导才能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步骤。从前的那种广泛性的讨论变成了范围较狭窄、有局限性，并常常要按照预先确定的方式进行的讨论。一般政治方针公式化了。几乎资产阶级阵营和社会改良运动中发生的一切复杂进程都被一概说成是法西斯化。这种情况影响到确定具体的反法西斯斗争目标。而且当时把反法西斯斗争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混为一谈，这就妨碍了集中力量反对急于夺取政权的法西斯。每一起比较大的阶级斗争事件都被认为是革命危机成熟的征兆，而对共产党遇到的挫折，通常都试图以它们落后于群众中急剧高涨的革命情绪这样一种原因作解释。斯大林在1931年写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起了消极作用，信中把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绝对化了，实际上是把这种经验同其他革命政党的经验对立起来了。所有这一切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严重背离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构想。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为了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加强自己的队伍做了大量紧张的工作，通过共同的努力彻底粉碎了有可能把共产主义运动推上冒险主义道路的托洛茨基主义，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保卫中国革命、援救萨科、樊塞蒂等人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运动，同时共产国际曾发动群众起来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反对战争威胁，支援苏联。

在阶级搏斗中和在群众运动中，共产党积累了斗争经验，并把这种经验同解决每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的广泛国际主义方式结合起来了；同时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他们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共产国际的活动使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在全世界保持了高度的战斗精神，在群众当中开展了宣传工作，在一系列重大战斗中夺得了新的阵地。总的说来，这个时期为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条件，由于宗派教条主义错误，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和充分加以利用。

30年代上半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法西斯的进攻，以及战争危险的增长，在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反法西斯任务和一般民主任务提到了首位。然而这个时期，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力量未能联合起来共同阻止法西斯的行动。共产国际未制定可以用来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纲领，而是采取了先于法西斯进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只是很晚才意识到需要改变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一些共产党（特别是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和以国会纵火案英雄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都提出了改变政策的动议。

现实生活要求制定新的策略战略方针，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季米特洛夫在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多列士、陶里亚蒂、皮克、哥特瓦尔德、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等人的支持下，制定了新的处理问题方法。他的建议也得到了俄共（布）中央政治

局的赞同，政治局授权俄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帮助实行旨在使各国共产党能够在共产国际的总方针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和策略问题的路线，以便使日常领导中心逐步转移到本地。

苏联出版的书籍详细分析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8月）在制定工人统一战线和广泛人民战线政策方面，以及在制定推翻法西斯专政建立人民阵线政权或类似的反法西斯民主政权的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政策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以及一切革命民主力量的合作和联合行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共产国际政策的中心是提出了维护和平，抗击法西斯，争取社会进步等一般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目标。

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虽然是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的情况下通过的，但是实际上这些决议摒弃了（虽然没有进行公开批判）他的许多宗派主义教条，恢复和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观点，标志着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为政治实践开辟了新的广阔天地。这些决议证明，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理论方面有很大的潜力，证明它在日益成熟。

对反战力量实行符合具体历史情况的反法西斯团结统一政策，意味着共产党作为新型政党的形成过程已经基本结束。虽然教条主义模式使各国共产党遭到损害，但是它们在共产国际范围内借助它的帮助在政治思想上还是达到了很高的成熟程度。

在战争威胁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支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国际知道，正是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主要支柱，整个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命运及和平进步事业都是同苏联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苏联与共产国际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苏维埃国家的阶级利益同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根本阶级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在那种历史条件下，新的战略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彻底

实行。阶级敌人的反抗、继续推行反共政策的右翼社会主义首领的对抗、群众本身政治经验的缺乏、由于未能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影响而犯的一些错误、斯大林的做法对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生活的消极影响，等等，都起了作用。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给各国共产党更多政治独立性的决议在搞个人崇拜情况下也无法执行。此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机构内，党内民主仍很有限，斯大林的话被认为是不容辩驳的最高真理。在战争威胁日益严重的复杂形势下，制造怀疑气氛，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的命运和生命本身都决定于斯大林的评价和好恶。30年代末苏联对党的列宁式的干部展开的恐怖活动也直接波及到共产国际（其中包括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许多在苏联避难的共产党政治侨民遭到了斯大林——叶若夫——贝利亚专制牺牲品的厄运。

大家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曾在许多场合为那些他确信无辜的同志说话，有时这种干预起了作用，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共产国际不能保护他们免遭斯大林的恐怖。所有这一切也反映在共产国际的政策上和它对待其他政治力量的态度上。继逮捕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曾根据所谓挑拨者“制造混乱”的虚假消息解散了波兰共产党。这不仅粗暴地破坏了共产国际的章程，而且实质上意味着在政治上赞同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在波兰正面临着希特勒侵略威胁的时候，这个决定给波兰工人运动造成了严重损失。

共产国际历史中的这些悲惨事件，我们没有权利避而不谈。这些事件是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发展趋向，即统一一切革命民主力量（包括支援西班牙共和国运动中的和反法西斯、反战争威胁斗争中的革命民主力量），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的。

我们认为，斯大林的专制所造成的后果削弱了共产国际执委

会的作用，因此它不可能随着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表现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众所周知，苏联迫不得已作出这个外交步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引起了极大混乱。这个步骤本身根本不要求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削弱反法西斯斗争。但是策略上的考虑——不给希特勒破坏1939年条约提供任何借口——在共产国际紧跟苏联外交行动的情况下给共产党的反法西斯政策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对希特勒德国使用的“法西斯”这个词，从那个时期发表的共产国际文件中消失了。宣传中的攻击矛头指向了笼统的帝国主义，并强调英法帝国主义的特殊威胁。直至法国覆灭和希特勒德国进攻南斯拉夫之后，共产国际才开始纠正这个错误。

共产国际认为，从交战双方来看，刚刚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只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这种评价对法西斯集团的特殊威胁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同时也没有注意到这场战争中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趋向，然而恰恰是这种趋向随着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的开始，渐渐变成了决定性因素。

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之后，共产国际全力动员共产党员、一切反法西斯分子参加粉碎法西斯奴役者，争取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共产党走在解放斗争的最前列，表现出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它们起到了抵抗运动的团结指导力量的作用。共产国际制定的反法西斯团结一致政策成了正在战斗中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情况下，为所有共产党制定基本政治方针的统一的世界中心，开展活动越来越困难。在这以前，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发展中就已经超越了共产国际的组织范围。到30年代末，这个范围益愈变成了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表现出灵活性和积极性的障碍。然而这个时候需要给各国共产党以更大的独立性。这就使人得出结论：这种组织形式已经完全过时。因此1943年夏，共产国际被解散。

第三国际所特有的组织形式已成为历史，但是共产国际的经验，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经验，并未变成时代的灰烬。其主要特点需要作深入的分析。这些特点就是在今天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也并非无关紧要。相反，了解这些经验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构想，因而有助于复兴和加强这一运动。在这里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共产国际历史中的这样一些方面，这些方面全面展现了共产党不断扩大活动范围的趋势，即从争取无产阶级利益的搏斗到有机地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争取民主，反对战争，争取一般人道主义理想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我们看来，这种经验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在今天，同所有其他任务相比，头等重要的任务是拯救人类，使之免遭热核武器的毁灭性威胁；在今天，善于制定一种政策把反对战争的人们联合起来和善于为此目的而把广大群众、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团结起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满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联系

〔日〕铎木昌之

张惠才译

一、前 言

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下同——译者)爆发后,满洲(中国东北,以下称“满洲”)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国际性联系开展起来了。

这是中国的抗日运动,同时也具有作为朝鲜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金日成和崔庸健等许多朝鲜共产主义者,都作为中共党员参加了这一运动。他们认为满洲抗日战争的胜利直接关系到朝鲜的解放。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了北朝鲜的政权建设,而且现在依然占据着政权的中枢位置。

另外,苏联把日本占领下的满洲视为进攻苏联的基地。因此,30年代后半期以来,在日苏关系紧张的形势下,苏联远东军(后来改称特别远东军、远东方面军,但以下仍简称“苏联远东军”)领导和支援了满洲党和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抗日联军”)。

在这篇论文中,我想通过对30年代中期以来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考察,研究与苏联、中国和朝鲜有关的侧面。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研究满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问题。

第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苏联远东军等上级领导机关和满洲党的关系。

第二,围绕中共代表团的指示,党内产生的路线对立和领导权的确立。

第三，抗日联军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的战略战术和抗日联军的改编情况。

还有，满洲党和抗日联军为了躲避日满军队警察的追捕进入苏联后重新组建的情况和它的政治路线。

二、上级领导机关和满洲党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满洲党与上级领导机关的关系比较复杂。当初，上海的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着满洲省委，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1931年满洲事变爆发后，满洲的重要地位提高了。因此，从1933年初开始，满洲省委除了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之外，还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共产国际通过1929年设在海参崴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海参崴派遣机关和直属于工会国际的海参崴太平洋职工秘书处，领导满洲省委。1933年海参崴派遣机关在中苏边境上的格罗迪克沃和波库拉（音译）新设立了交通站，确保与满洲省委的联系。又于同年春，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在哈尔滨成立了满洲总工会筹备处。表面上它隶属于上海的中华全国工会联合会，但实际上由海参崴太平洋职工秘书处领导^①。

然而，这两个上级机关的领导时间不长。由于与满洲省委有联系的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又开始了长征，这样在1934年末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就已经完全断绝了^②。

几乎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康生等中共代表团开始正式领导满洲党。1934年下半年，中共代表团派遣杨松去吉东与满洲省委联系，同时让他组织吉东特委^③。此后，中共代表团通过吉东特委的杨松，领导满洲党和它的抗日工作。

中共代表团在1935年初，把满洲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当作间谍嫌疑上报莫斯科，对他们进行了审查^④，王明和康生在6月3日发出《致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件》（以下简称“王康指示信”），指

示执行扩大和加强上层和基层的统一战线，保存实力准备长期作战等抗日战争中的具体路线^⑤。中共代表团又在1936年1月派遣韩守魁、魏拯民等人解散并改组满洲省委^⑥，中共代表团在撤换满洲党领导人的同时，改组了党组织，改编了抗日部队，还提出了新的斗争方针。

韩守魁叙述了中共代表团准备直接领导满洲党的理由^⑦：由于日满警察的彻底监视和逮捕，使得与中共中央重建交通联系的工作十分困难；由于中共中央没有正确地把握满洲形势，向满洲党发出了错误的指示；正确地认识形势的中共代表团，从满洲的重要性考虑有效地给与了正确的指示；而且，从苏联那里进行交通联系，比起中国关内更为容易。

在这些理由中，存在着苏联把满洲视为日本进攻苏联的基地，从苏联国家安全考虑应予以重视这一背景。苏联判断，比起对满洲形势不太了解的中共中央，让容易反映苏联意图的中共代表团领导满洲党更为有利。

然而，并非只有中共代表团支援满洲党和抗日联军。在满洲的苏联领事馆、内务人民委员会管辖下的国境警备队，还有苏联远东军也都援助他们。根据警方提供的材料，这些来自苏联的支援是1936年以后开始的，苏联共产党远东委员会领导着这些机关^⑧。苏联援助的理由是，日本关东军从日满共同防务的立场出发逐渐将部队布署在国境地带，而且边境冲突频繁发生。1935年中东铁路让给“满洲国”之前，苏联共产党北满委员会支援了满洲党，后来由于中东铁路的转让，不能再支持了等等^⑨。但是，这些机关的援助限于为共产国际联络员过境提供方便，对活跃在国境地带的抗日联军提供武器弹药支援，保护其伤病员，并对抗日联军的部队实行政治军事训练等。这些都限制在不会刺激日本那种“不致造成问题的限度”^⑩。苏联考虑到对日关系，因此把对满洲党和抗日联军的实际领导委托给了共产国际。

然而，在中共代表团开始行使对满洲党的领导之后，中共代表团与满洲党之间的联络工作并不顺利。在1936年1月韩守魁被派到哈尔滨以后到1937年4月他被捕这段时间里，他每月向中共代表团报告，可他只能从中共代表团那里得到三次指示，而且在1936年由于吉东特委遭破坏，中共代表团驻满代表撤回苏联^①。还有，1937年4月15日韩守魁被拘捕后，一位负责与中共代表团联系的国际交通局的领导人也被捕了，因此各地的交通遭破坏，中共代表团与满洲党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了^②。另外，在日中战争爆发前，王明和康生等中共代表团从莫斯科返回中国，因此共产国际方面对满洲党的领导也随之中断^③。

在满洲党内部也对中共代表团这种不稳定的领导抱有不滿。就连对中共代表团的路线最为忠实的吉东省委，也在1937年3月召开的吉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反驳了中共代表团直接干预抗日联军第五军事务的问题，反驳了中共代表团不了解满洲的情况在遥远的莫斯科直接领导满洲党。另外，吉东省委委员周保中在组织领导问题上批评了中共代表团，并写信要求直接与中共中央联系^④。

1937年7月7日，日中战争爆发。周保中为了应付新的事态并解决满洲党内部的路线对立问题，盼望得到中共代表团的指示，认为与其联系迫在眉睫。1938年1月，周保中渡过乌苏里江，去苏联的比金。周保中在那里与中共代表团远东代表杨春山取得了联系^⑤。杨春山向周保中传达了下述意见：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代表团从1937年秋开始停止了对满洲党的领导，今后满洲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因此应该与中共中央、特别是八路军取得联系。周保中为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带着电台和报务员回到满洲^⑥。

当时，周保中在比金还会见了苏联远东军等，他向苏联远东军提出请求：向满洲党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文件，在可能的范围内支援满洲的抗日斗争，于是两者确立了联系^⑦。这以

后，苏联远东军代替了中共代表团或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满洲党和抗日联军的领导和支援。这是因为日中战争爆发后苏联把战略上的考虑放在优先的地位，苏联远东军与日本关东军相比，拥有三倍以上的军事优势，而且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满洲党并与其联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④。

苏联远东军对抗日联军的指导方针，从日方破译的苏联远东军司令部致哈尔滨总领事馆的密码电报中看得十分清楚^⑤。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批评了哈尔滨领事馆的那种抗日联军和中共军为了在满洲和华北减少牺牲、保存实力，应避免与日军直接战斗，而要采取分散战术的意见。苏联远东军在得到国防人民委员会的批准之后命令：为了牵制日军向中国关内进攻，应加强抗日联军的活动。满洲处于战争状态，抗日联军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这与中共代表团驻满代表杨松在1937年9月10日刊登在《救国时报》上的文章《全面抗战和东北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部分观点一致^⑥。杨松在文章中要求抗日联军扩大游击战，袭扰日军的后方，以便支援中国关内的抗日战争。周保中进而提出在日苏开战时，与苏联军队呼应袭扰日军后方。

还有，苏联远东军为了在冬季训练抗日联军，于是让他们进入苏联境内。进入苏联后，抗日联军的干部在伯力或海参崴接受游击战术和侦察等政治和军事训练，其他人员被收容到曼佐夫卡附近的收容所里，他们得到苏联的供给。此外，苏联远东军还为抗日联军治疗伤病员，提供资金、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等等。苏联远东军为抗日提供了区域^⑦。

尽管苏联远东军的支援比日中战争前积极，但有一定的限度。在这种限度内，即使日本把苏联的支援当作问题也可以通过外交谈判求得解决，而不致于发展成日苏战争^⑧。因而，支援的目的在于通过袭扰满洲，牵制日军进攻中国关内；同时迫使日本消耗军力。并把部分抗日联军部队当作侦察员来培养，收集满洲的

政治军事情报，在日苏开战时成为袭扰日军后方的部队。关于政治路线，执行王明和康生的路线等，这带有极强的军事色彩。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苏联远东军非常重视远东地区的安全问题，于是加强了对抗日联军的领导^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远东军代表“王新林”和“海路”再三邀请满洲党和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周保中、赵尚志和冯仲云三人去伯力。周保中等应邀于11月末到达伯力，交叉与苏联远东军代表举行会谈。最后，决定在苏联远东军和抗日联军之间确立“固定的联系”。正如以下所述，决定在改编抗日联军的同时，开展以群众工作为重点的游击战方针。这意味着苏联远东军已从以前的重视不惜牺牲、袭扰后方的游击战术，向重视保存实力、加强群众工作的战术转变。

同时，周保中等人请求苏联远东军代表，通过共产国际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周保中等人强烈要求恢复由中共中央来领导。因为他们无法接受那种意见，认为不通过共产国际或中共中央，而通过苏联远东军来领导是正常的考虑。

然而，苏联远东军没有答应周保中等人的请求。事实上，苏联远东军一定认为，比起无法领导满洲党的中共中央来，自己对满洲形势有较深了解，且担负着局势正在加剧紧张的远东地区的安全保障，更适合领导满洲党。但是，周保中等人的不满日益强烈。

三、满洲党的改组和路线对立

由于复杂的领导关系，满洲党组织内部也出现了问题。1936年1月，接到中共代表团的指示后，韩守魁等人回到满洲。他们的任务是向满洲党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上通过的扩大和加强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撤销满洲省委和共产青年团，重新组建哈尔滨特别委员会、南满省委、东满省委、吉东省委和哈

东省委。但是，在这次改组中由于上级领导机关的不稳定，带来了满洲党内部丧失统一的危险^④。

韩守魁于1月9日撤销了满洲省委，同时组建哈尔滨特委，自己任书记。然而，哈尔滨特委于1937年4月15日因遭逮捕而被破坏，其后也未能重建。另外，南满于1936年7月在金川县阿里山寨召开南满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南满省委。其后，东满和南满党、抗日联军第一、二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在该地召开。中共代表团派来的魏拯民在会上传达了莫斯科的指示，由于东满特委遭破坏，东满省委成立有困难，因此决定将东满和南满的党组织合并组成南满省委。书记由魏拯民担任，组织部长是李东日。其后到1940年，南满省委一直未能与中共代表团和苏联远东军取得联系，独立地开展活动^⑤。

1936年2月在镜泊湖南湖头召开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军党委员会联席会议。魏拯民传达了中共代表团的指示。据此，3月饶河中心县委被撤销，成立下江特委。7月吉东特委又被撤销，以中东铁路为界线成立了道南和道北特委。1937年3月10日在依兰县四道河子召开吉东省委成立扩大会议，又以这三个特委为基础成立吉东省委。书记为宋一夫，委员有周保中和王光宇。吉东党把中苏边境地带作为活动的地区，因此中共代表团重视其作用，而且海参崴的远东局派遣机关直接领导它，还通过吉东特委，领导其他满洲党的活动^⑥。所以可以说吉东党更忠实于共产国际的路线。

另一方面，在抗日联军第三军长赵尚志的领导下，北满党加强了独立开展工作的倾向。正如赵后来记述的那样，当时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他就任总司令。可是，哈尔滨特委的韩守魁等人不同意成立。

另外，赵尚志怀疑围绕间谍问题而形成对立的满洲省委和吉东特委。赵尚志接到吉东特委的书信，内容是：因为满洲省委内

有间谍嫌疑问题，故应断绝与满洲省委的联系。另一方面，赵尚志又收到满洲省委代理书记的报告，说吉东特委内有间谍，而且说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珠河中心县委和第三军可以独立地开展工作^②。由于赵尚志不明白间谍问题的真相，所以越发加强了独立的倾向。

这种独立倾向在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县汤汪河上游的山寨召开汤原珠河中心县委联席会议时变得更加明显。同时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组成北满临时省委，赵尚志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冯仲云任书记。赵尚志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的政治形势分析和我党的新策略》的政治报告，赵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游击战问题和对满洲国军队的评价三个问题上批判了王明和康生等中共代表团的路线^③。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二者在围绕如何处理下述部队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对立。这支部队虽属于统一战线范围内，但不属于党指挥下的部队，它企图投降日满军队。王明和康生在1935年6月3日的信中，要求向有投降意思的部队做宣传和说服工作，跟他们讲“解除武装，就等于去送死”，让他们回心转意。对那些已投降又参加扫荡的部队则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使其动摇和叛变^④。

但是，赵尚志谴责这个指示没有明确区分抗日与投降，而且只强调统一战线，轻视了斗争。他主张应把企图投降的部队领导人的意图暴露给群众，动员他们起来阻止投降。如果这样还行不通，就应解除武装，处理领导人，以便巩固部队。他还主张对已投降的部队与其采取宣传、说服教育或利用民族主义让他们回心转意的方法，倒不如解除其武装，使其隶属于党的指挥下开展抗日斗争。

在赵尚志的主张背后存在着北满抗日斗争的现实。1934年3月，珠河中心县委以珠河游击队为中心，和东北义勇军、山林

队一起组建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翌年三月，赵尚志指挥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和谢文东、李华堂指挥下的抗日部队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总指挥部。到1935年夏扩大了统一战线，这样做的目的是想“通过上层的统一战线确立下层的统一战线”。然而，从秋天起，由于加强了扫荡，统一战线出现了分裂，一部分部队开始投降。因此，赵尚志向各部队发出警告：投降者一律当作卖国贼处以极刑。另外，在第三军和东北义勇军之间不断出现对立，1935年10月第三军解除了王德林指挥下的隶属于东北义勇军的亚东洋部队的武装。理由是他们破坏统一战线、压制反日地区群众和策动投降。因为北满的统一战线不是以上层为中心，是由下层士兵群众结合起来的，所以赵尚志等人为了维持统一战线，不得不解除动摇部队的武装^⑩。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游击战问题。王明和康生预料到未来的战争，重视保存和充实反日势力和游击队的实力。因而，当日满军队和警察包围游击队根据地时，为保存其实力，要求游击队随时撤离根据地。还指示对日满方面的集体村落政策，也要说服群众，让他们加入其中，让抗日分子担任保甲长。

赵尚志自然没有接受这个指示。这是因为赵判断：按照王明和康生的指示撤离根据地，就会断绝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而且即使不攻击集体村落，党员潜伏其中也会被警察和自卫队逮捕。最后，游击队孤立无援，不得不进入密林深处活动了。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对满洲国军的评价问题。中共代表团把满洲国军看作是同盟军，指示把“反满抗日”这一口号中的“反满”二字去掉^⑪，其理由是：满洲国军的士兵处于日本军官和中国军官的双重压迫下；大部分满洲国军是由张学良军队组成的，包括过去的抗日部队；抗日运动的发展得到了中国士兵和部分军官的支持。

可是赵尚志认为满洲国军是日本统治的工具。因此，反满和

抗日是不可分的。主张暴露其反人民行为，并解除其武装。

因而，赵尚志非难王明和康生的路线在军事上是倒退战略，是犯了右倾错误，强调应开展符合北满实际情况的党的工作。

会议之后，赵尚志派朱新阳去莫斯科汇报会议情况，可是王明和康生听了朱新阳的汇报后，谴责赵尚志陷入了“左”倾关门主义，犯了反党错误^②。由于中共代表团与满洲党之间的联系中断了，所以这种对立不仅仅限于中共代表团和北满临时省委之间的对立，而且已经发展为北满临时省委和基本上支持中共代表团的周保中等吉东省委之间的路线对立。满洲党内部的路线对立，同时也是赵尚志和周保中围绕满洲党和抗日联军领导权问题上的对立。

1937年1月，召开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周保中也参加了，并同赵尚志交换了意见。6月，又召开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赵尚志、张寿箴、冯仲云等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人和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出席了会议。赵尚志与周保中在会上展开了路线争论。冯仲云曾想调解两个人的意见对立^③，但这种对立在满洲党内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如前所述，周保中于1938年1月赴苏。赵尚志也应苏联远东军之邀于1月赴苏，但他被苏联方面监禁起来^④。赵尚志被看作是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反党分子。结果，周保中掌握了吉东和北满党的领导权。日中战争爆发，确立满洲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成了当务之急。

1938年3月，周保中回满洲后便开始着手吉东省委和北满临时省委的一元化领导的工作。而且他认为重建因1938年3月15日的逮捕而受到破坏的北满党组织也是必要的。为此，必须谋求北满和吉东的路线统一。4月，召开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务委员会^⑤。会上批判赵尚志执行了“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在组织上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于是，解除赵尚志的第三军军长职务，并开除党籍。会议还决定遵循王明和康生的路线，执行重视抗日统一战线

的路线。1939年4月，召开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将北满临时省委改名为北满省委，金策任书记，张寿箴任组织部长，冯仲云任宣传部长^⑧。在北满建立了党组织和领导机关。而且，周保中致函金策等人，要求统一北满和吉东的党组织。

然而，随着赵尚志的回国，北满党内部再次出现对立。1939年6月，苏联解除了对赵尚志的监禁。7月，赵尚志率部队回国。当赵尚志得知北满党内开展了反赵尚志的斗争，第三军军长职务被罢免，而且被开除党籍的事实后，便对党的书记金策起了反感。另一方面，金策、张寿箴等人也怀疑回国后的赵尚志的行动^⑨。

为解决这种对立，再次需要上级机关的指导。如前所述，1939年末，苏联远东军代表邀请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三人。他们为解决吉东省委和北满临时省委的争论，讨论并拟定了《关于东北抗日游击斗争的新提纲》。他们在加强满洲党和抗日联军的统一团结问题上意见一致。这大概也是苏联远东军的要求吧。

但是，南满省委代表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实现满洲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和统一领导的任务，依然没有完成。

四、抗日联军的编成和战略战术

1935年至1936年，以前被称作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的满洲党指挥下的部队，统一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改编成11个军^⑩。这次改编是在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下，与改组满洲省委同时进行的。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认识到需要成立一个能统一指挥抗日联军的总司令部。王明和康生在1935年6月3日的信中指示，组建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在其领导下加强反日武装团体的统一和团结。1936年2月10日，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决议草案》。

中共代表团在这个草案中提议：将满洲的抗日力量统一团结在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下。为此要求首先以满洲党指挥下的部队和友军部队为基础编成三个方面军，即：在抗日联军第一军和第二军之一部活动的南满编成第一方面军；在第二军之一部和第五军活动的东满和吉东编成第二方面军；在第三、第四军活动的北满编成第三方面军，并设立各方面军指挥部。其后，再设立总司令部。中共代表团让改组后的各省委领导三个方面军，同时自己直接领导总司令部，企图统辖满洲的抗日力量。因而，“从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说，建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是头等中心工作”^③。在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上，决定由第一军和第二军编成第一路军，杨靖宇就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王德泰就任副司令兼第二军长。并决定第一军和第二军之一部进攻热河方面，其余部队在南满开展游击战。

在吉东省委的领导下，从1937年春开始组建第二路军。10月周保中设立了第二路军筹备委员会。在12月30日召开的吉东省委下江特委扩大会议上，周报告了第二路军已筹备就绪，决定成立。进而，在1938年3月周从苏联回国后，正式成立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周保中就任总指挥，谢文东就任副指挥，宋一夫就任政治主任。第二路军是以抗日联军第五军为主，此外还有第四、第七、第八军，王荫武指挥下的皇极普化救世军也参加进来了^④。

第三路军的组建工作不顺利。这是因为赵尚志企图成立全满洲抗日部队总司令部。赵尚志于1936年1月26日在汤原县内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长李延禄、东北反日民众军领导人谢文东、自卫军领导人李华堂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根据1935年6月3日的王明和康生的信和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决定组建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和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任司令，李华堂任副司令，张寿篈任总政治主任^⑤。

然而赵尚志等人设立总司令部，显然与中共代表团的设立总司令部的草案背道而驰。中共代表团派到哈尔滨的韩守魁，在赵尚志等开会之前就根据汤原中心县委的报告得知了此消息。他批评说，设立临时政府和总司令部是犯了把军、党混为一谈的错误，赵尚志当司令是独断专行。韩守魁还指出，第一、二、五军不知道设立总司令部之事，也未参加，在这个总司令部里是不可能把不在党指挥下的许多抗日部队团结起来的，不同意设立该总司令部。韩守魁于1936年2月为下令解散临时政府及总司令部，组建哈东省委，特派张德去汤原。然而，赵尚志以间谍嫌疑为由把张德监禁起来。进而在5月，驻满洲省委代表向中共代表团报告说，赵尚志等人在没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设立总司令部，应予取消^④。

后来，赵尚志也承认总司令部不代表整个满洲，于是改名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变成领导北满各部队的司令部。不过，这也不是中共代表团设想的第三路军。结果，第三路军直到赵尚志被苏联监禁后一直没有成立。在1938年5月的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务委员会上，决定成立第三路军，从8月1日起开始作为第三路军行动。翌年4月，在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正式决定由抗日联军第三、六、九、十一军编成第三路军。张寿篈任总指挥，许亨植任参谋长。然而第三路军编成后，统一指挥这三路军的总司令部还没有设立。因此设立总司令部的问题作为重要任务提了出来。

可是，东北军的抵抗日趋镇静，而满洲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却很活跃，日满方面把这看作是治安上的重大问题。因此，关东军拟定了自1936年4月开始实施的《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据此，满洲国制定了《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纲要》。该纲要注意到抗日联军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为切断这种关系，规定由担任扫荡作战和归顺工作的军队和警察实施治标工作，由行政机关同

时实施集体村落的建设、道路和通信网的整顿、保甲制的执行等治本工作。具体地讲，第一，把抗日联军赶到政治上和经济上不重要的地带。第二，完全切断和封锁通往那个地带的交通运输。第三，在扫荡完成地区采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对策。第四，在封锁地区整顿交通和通信网，为参加扫荡的大部队转移提供方便等^④。成为治安肃正工作对象的地区是周保中指挥下的第二路军和赵尚志指挥下的第三军活动的三江省，还有杨靖宇指挥下的第一路军活动的东边道。

另一方面，抗日联军的基本战略正如王、康指示信中所说的那样，设想了未来的战争，而且以长期作战为基础保存并充实力量。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基本上遵照执行了，但是赵尚志领导的第三路军，被警察视为“全满共匪最凶恶部分”，它袭击警备薄弱的县城和集体村落，解除森林警备队的武装等，开展了激烈的游击战。

1937年7月，日中战争爆发使这一长期作战方针不得不做改变。共产国际和苏联远东军指示：为使关内的抗日作战顺利进行，在满洲应通过加强破坏交通、运输、通信网等及游击战搅乱日军后方，牵制其向关内的进攻；乘日军间隙开辟新游击区；同八路军取得联系。遵此，1938年初，周保中领导的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突破日满军警的包围圈，开辟新游击区，以同热河地方的八路军及南满的第一路军取得联系为目的，把第五军作为核心南下并向西远征^⑤。然而，这支部队被包围歼灭了，第四军长李延平等阵亡，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等投降，损失许多干部。这次远征除恢复了同第一路军的联系外，均告失败。而且，留在下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周保中部下的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也被日满军警严密包围。在这种形势下，周保中于1939年春主持召开吉东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分散兵力突围。他们虽然成功地突破了包围圈，但牺牲太大。从此以后，除利用小股部队在乌苏里沿江等地

开展游击活动外，已无法开展活动。

另一方面，赵尚志在日中战争爆发后的8月，召开了北满临时省委与第三军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为支援关内的抗战，抗日联军各部队应积极地出击，袭击日军的交通和部队，搅乱后方，同时动员群众起义。9月18日，赵尚志发布《关于中日战争的紧急通令》，指示破坏交通和通信设施并发动群众起义^④。与其说这是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远东军的指示，莫如说是积极执行以往赵尚志的路线。

然而，由于赵尚志被苏联监禁和肃正工作的强化，第三军在三江省的活动变得困难起来。北满临时省委批判了赵尚志的路线，转成执行王明和康生的路线。1938年5月，在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会议上决定，为开拓新游击区，将第三军等主力部队转移到小兴安岭一带。1939年初，第三军等在张寿箴的领导下转移到北安省。据推测，在1937年的当时，三江省的抗日联军包括周保中指挥下的第二路军和赵尚志指挥下的第三军等加在一起约有1万至1万5千人，但转移到北安省后只剩下200人左右^⑤。因此需要改编部队和变换战术。1939年1月在北满临时省委第九次常务委员会上决定设立西北指挥部，在其指挥下设立龙北、龙南指挥部。还决定把抗日联军第三、六、九、十一军改编为四个支队。进而决定开展群众工作，并在北安省和兴安东省扩大游击区^⑥。

但是，杨靖宇指挥下的第一路军在东边道北部的肃正工作中遭到包围，与他军联系中断，孤军开展游击战。1938年5月，为与第一路军取得联系，受周保中派遣的第二军独立旅到了杨靖宇的根据地辑安县老岭山区。杨靖宇和魏拯民召开第一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为与八路军取得联系，让一部分部队向西方远征，为坚持长期作战，应保存实力。在那之后，由于了解第一路军内情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被捕，7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止远征计划；把第一、第二军改编成三个方面军；撤离老岭

山根据地，向蒙江县、桦甸县方面转移。他们在这次转移途中受到日满军队和警察的包围与跟踪，无奈逃入密林地带^④。

正当各地的抗日联军陷入困难状况的时刻，1939年末召开了伯力会议。周保中等人确立的方针是，为了应付这种事态，应改变战术，注重保存实力和开展群众工作，减少抗日联军。即，抗日联军尽可能避免同日满军队和警察接触，继续采取运动战术，在难于发现的山林地带建立可以自给自足的根据地，还规定与游击部队没有关系的地下党负责群众工作。这已经不是以群众为基础的游击战。进而又决定把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分别缩编为三个支队、三个支队和四个支队^⑤。

在这次会议后，周保中回到宝清地区，试图改编第二路军，但只是把第七军缩编为第二支队。冯仲云和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篈一起改编第三路军。进而在1940年1月的北满省委第十次常务委员会上，决定第三路军在龙北、三肇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企图离开山林地带，进入粮食和物资丰富的黑嫩平原，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由于开展了平原游击战，第三路军才得以在满洲把游击活动开展到1943年，但因为日军在三肇地区实施了肃正工作，于是他们便逐渐转为开展群众工作了。

第一路军在1939年末约有3000人，由于日军野副部队在东边道实施了肃正工作，翌年10月减少到一半。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第一方面军军长曹亚范等许多领导人被杀或投降。在第二路军中，李文彬，王汝起，在第三路军中，冯志刚，张兰生等许多干部战死。1941年初，抗日联军总数由前一年的约3000人减少到约1000人^⑥。实际上，抗日联军已丧失了群众基础，再继续以前的游击战是困难的。

五、东北党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1940年末，苏联远东军代表“王新林”，为在伯力召开抗日联

军各部队领导干部会议，邀请有关领导人参加。同时，苏联远东军发出的通知说，中共中央代表为解决满洲抗日游击战中的各种问题也将参加这次会议。因此，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金日成、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篪等领导人率部队前往伯力。

苏联远东军召集他们的意图，在会议上明白了。苏联远东军代表“王新林”说明中共代表不参加会议了。同时提议解散满洲党和抗日联军，将其配属苏联远东各军区。苏联远东军判断，由于抗日联军丧失了同群众的联系，无法开展游击战。把它解散，让它作为苏联远东军侦察部队配属于各军区。大概苏联远东军认为这样做无论是在对日作战方面，还是在指挥方面都是有效的。一部分抗日联军的领导人赞成这项提案。

但是，周保中强烈反对这项提案。周保中虽然承认抗日游击斗争遇到了挫折，可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抗日斗争的基本条件和群众基础尚未完全丧失。他主张保留满洲党和抗日联军，继续开展长期的抗日作战。另外，在没有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特殊条件下，他承认苏联远东军领导抗日联军的意义，同时他指出，这种领导应该依据中共中央的路线，更要符合满洲游击斗争的利益，不能只考虑苏联远东军的利益。周保中进而反驳说，由于苏联远东军违反了共产国际的不准干涉他国党的组织问题的原则，因此不能同意解散满洲党和抗日联军。金日成等大部分领导人支持周保中的主张，要求恢复共产国际的领导^⑤。他们虽然承认与群众失去了联系，并认为没有苏联远东军的支持难于维持其力量，可是依然要保持自己的组织，确保主体性。

周保中认为苏联远东军的提案是不合适的，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写信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斯大林同意周保中的主张，否定了苏联远东军的提案，认为这项提案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同意周保中的主张，否定了苏联远东军的见解。总之，满洲党和抗日联军继续存在得到了承认。在继续召开的抗日联军领导干部会议上，再次确认上次伯力会议上制定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决定改变成保存和训练主力和干部，以小部队开展游击战的战术。另外，以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为中心编成第一支队，以第二路军五军编成第五支队，分别由金日成和柴世荣任支队长。二人率小部队暂时回到满洲^②。

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承认了满洲党和抗日联军继续存在，但其领导关系依然不明确，在满洲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而且，需要重建被破坏了的满洲党组织。根据警察方面的材料反映，共产国际远东代表机关于1941年7月，把《对满工作提纲》和《关于满洲党当前任务的提纲》发给了苏联共产党远东部和满洲党^③。

《对满工作提纲》指出，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远东地方的安全来说，发展满洲和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务之急。所以苏联和满洲党的关系是不可分的。又指出，在当前日苏力量在满洲面临直接冲突的紧迫形势下，应该把满洲党置于苏联共产党远东部的直接领导下。另外，《关于满洲党当前任务的提纲》指示满洲党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东满、南满、北满各个地区建立省县等党组织。进而指示满洲党把群众工作放在优先地位，并训练党员。共产国际判断，在德苏战争爆发和关东军实施特别演习等紧迫形势下，对日作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把对与苏联的安全有密切联系的满洲党的领导，委托给苏联共产党远东部。人们认为这是苏联共产党远东部，实际上是苏联远东军领导了满洲党和抗日联军，因为其后的事态发展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满洲党的继续存在得到了保证，同时由于采取了共产国际指示的形式，所以周保中等满洲党内部的反感情绪也可以缓和了。另外，指示建立满洲党委员会，这也是满洲党的任务，即实现党组织的统一和建立统一的指挥部。

可是，除了在嫩江平原上开展游击战的第三路军之外，抗日联军各部队均被收容到伯力近郊、双城子、欧克杨斯卡（音译）等中苏边境地带实行野营。其后，合并成双城子和伯力两处野营，并分别建立了野营党组织。野营期间，在苏联远东军的指导下，实施政治、跳伞和无线电等军事训练。周保中等人着手重建满洲党和抗日联军，1941年2月，由双城子临时野营党委员会组成三人小组，决定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隶属于吉东省委领导。1942年初，周保中和张寿篈开始研究满洲党的组织和领导的问题^④。

1942年7月，决定将两个野营部队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经共产国际批准，并接到苏联远东军司令部的命令，8月1日组成教导旅（国际红军特别88旅）。教导旅由两个直属教导连和四个教导营编成，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篈任副旅长，崔庸健任参谋长，金日成、王效明、许亨植、柴世荣任各营营长。其总数定为1000人。作为满洲党统一的组织，成立了东北党组织特别委员会（东北党委员会），崔庸健任书记，周保中、张寿篈等任委员。

设立教导旅的目的是，在对日作战不可避免这种判断基础上，保存抗日联军主力，实施对日作战训练和培养干部；在日苏开战时，把教导旅各部队送到满洲和朝鲜等地的日军后方，通过游击战和群众起义进行袭扰^⑤。

与主力部队的训练不同，周保中、张寿篈、金日成挑选中级干部，编成小部队，把他们派到满洲和朝鲜各地。其任务是侦察边境地带和要塞等处的日军设施及政治状况；准备在情况有变时确保大规模的游击部队可以依靠的地区；秘密地同群众联系，开展地下党工作；在可能的情况下秘密地武装群众^⑥。这支小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满洲和朝鲜收集苏联远东军所需要的军事与政治情报，为在对日作战时开展游击战和群众起义做准备。

周保中等正式着手对日作战的准备，是在1945年5月柏林失陷后。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积极援助周等人的准备工作。

作。周与苏联远东军讨论了对日作战时的行动计划，如：因为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应按照中共中央的路线行动；重建党组织和抗日联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满洲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一起开展地下党的工作^⑦。周保中企图在对日作战时一边在苏联远东军的领导下行动，一边与中共中央联系，与此同时，通过统一战线扩大党和抗日联军。另外，他们在加强小部队侦察活动的同时，开始准备了空降到日满军队后方的游击部队。7月，东北党委改组为东北临时委员会，周保中任书记，张寿篈、崔庸健、金策等任委员。

8月9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与此同时，抗日联军的一部分军队也在苏联远东军的指挥下进攻满洲和朝鲜北部。但在日本投降之前，斯大林打电报指出，周保中等人的任务在于建设战后的满洲，于是他们被迫停止了对日作战。斯大林的意图是为了战后的工作，保存抗日联军的实力。人们认为这对于金日成等朝鲜共产主义者来说也是一样。

8月20日，周保中等在野营中再次确立建设战后满洲的方针^⑧。其内容是：协助苏联军队占领满洲，同时利用有利条件建设党和军队，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起到苏联军队和八路军的中间媒介作用，迎接八路军；在国民党占领满洲，八路军尚未进入的情况下开展长期的游击战，反对国民党。他们企图利用苏联军队占领这一有利条件，与八路军合作建立政权基础，或者当国民党占领满洲时单独抵抗之，确保政权基础。另外，他们还把战后的国共内战放在了心上。

8月20日，金日成也在野营中提出了建设战后朝鲜的方针^⑨。其内容是：重建党，把工人和农民大众团结在它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结成民主民族统一战线，以它为基础掌握人民政权；建设正规的革命军队。朝鲜共产主义者也企图利用苏联军队占领朝鲜这一有利条件，建设党和军队，动员群众，掌握战后在朝鲜树立

的政权。

从以前的领导关系来看，不难想象，对满洲和朝鲜的这些方针是斯大林、苏联共产党远东部或苏联远东军承认了的。苏联企图通过周保中和金日成在满洲和朝鲜建立一定的权力基础来确保自己的影响。

六、结 束 语

满洲党和抗日联军在对日作战时期，自30年代中期以后，面临着一些难题：上级领导机关不断变换，缺乏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存在着深刻的路线对立，未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和抗日联军的衰落。

领导满洲党的上级机关，有中共中央、中共代表团和苏联远东军。这是因为苏联把日本占领下的满洲视为日本进攻苏联的基地，判断满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动向与苏联的安全利益有直接联系。因而，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苏联远东军便直接参与了领导，给抗日联军的编成和战略战术以很大影响。苏联远东军的意图是，当抗日联军不能开展具有群众基础的游击战时，就解散它，使其成为苏联远东军的侦察部队。然而，满洲党和抗日联军领导人强烈反对这种意见，固执地维持他们的组织和主体性。

由于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指示改组了满洲省委，所以满洲党失去了党的领导机关，丧失了党组织的统一。而警察的逮捕，又加速了这种变化。在这中间出现的北满临时省委赵尚志等人对王明和康生路线的批判，不仅是北满党与中共代表团的对立，而且发展成北满党与吉东党的路线对立。在失去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满洲党内已无法理解这种对立时，就需要远东军干预了。

另外，中共代表团还要求满洲党编成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和成立总司令部。但是，因为赵尚志成立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所以第三路军的成立推迟了。又由于日满军队和警察强化了

肃正工作，因而他们已没有余力去设立总司令部。

抗日联军的游击战术，从初期的在长期斗争方针指导下重视保存实力的游击战，转为日中战争爆发后以袭扰后方为目的的游击战和重视保存实力及群众工作的游击战。上级机关的领导和1939年以后日本的肃正工作，使游击战术发生了转变。肃正工作使开展游击战的群众基础崩溃了，把抗日联军逼进密林，赶入苏联。

其后，在苏联境内成立了东北党委员会，并编成抗日联军教导旅。这意味着形成了党的领导机关，恢复了党组织的统一，并建立了总司令部。同时，也确立了周保中的领导权。在其领导下，他们判断对日作战不可避免，并加紧准备着。他们的部分兵力参加了对日作战，但由于斯大林的劝告，其大部分没有参加，以求应付战后满洲和朝鲜的事态发展。他们采取的立场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苏联军队占领满洲和北朝鲜这一条件。周保中等人把同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放在心上，同时怀着与中共中央恢复关系的期望回到满洲。金日成等人也依靠自己重建的党来领导过去一直受满洲党领导的朝鲜革命运动，并且带着掌握朝鲜政府的设想奔赴朝鲜。苏联也希望他们在满洲和朝鲜确保权力基础。

在满洲的抗日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朝鲜、满洲和苏联之间的联系，后来也未中断^①。他们在满洲的国共内战以及朝鲜战争中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注释：

①参照《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员会和国际共产党的关系》（载《外事警察报》14号，1934年11月）第40—42页，以及外务省东亚局第三科《支那及满洲的共产主义运动资料》（1934年）第145—149页。另据李鸿文《试述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被撤消》（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0期）第14—16页反映，30年代初是杨春山在太平洋职工秘书处工作，1932年中共代表团派杨松担任此项工作。

②参照《试述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被撤消》第14页。

③据李延禄记述的《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回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93—294页：杨松在1934年8月末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名义到达密山游击区。另外，在井本台吉《关于最近的满洲国共产主义运动》（载《思想形势视察报告集〔之八〕》，1940年）第10页中，记述的是12月进入满洲。据《试述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被撤消》第16—17页及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5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5页：杨松于秋天进入满洲，1935年2月在牡丹江正式成立吉东特委。

④参照《北满共产党之概况》（或《外事警察报》181号，1937年8月）第43页，以及《试述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被撤消》第17页。

⑤参照军政部军事部调查部编《满洲共产匪之研究》第1辑（康德4年）附录第47—57页。

⑥参照《北满共产党之概况》第43页。

⑦参照《北满共产党之概况》第43—45页，以及吉弘基彦、高桥敏合著《最近的满洲共产主义运动之形势》（载《思想形势视察报告集〔之四〕——满洲的共产主义运动》，1938年）第184—185页。

⑧参照《满洲共产匪之研究》第290—291页。

⑨参照林三郎著《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芙蓉书房，1974年）第100页，及《北满的苏联共产党和1932年的恐怖事件》载《外事警察报》第121号，1932年8月）第53页。

⑩《满洲共产匪之研究》第808—809页。

⑪参照李毓卿、李斌华：《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周保中同志（下）》（《求是学刊》1981年第3期）第25页，《关于最近满洲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0—11页，及《北满共产党之概况》第51页。

⑫柴田孔三：《以北满为中心的对苏“交通工作”形势》（《思想形势视察报告集〔之四〕——满洲的共产主义运动》1938年）中有详尽的记述，另参照《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周保中同志（下）》第25页。

⑬参照《满洲共产主义之现状（中）》（《特务汇报》第2号、康德6年6月）第14—15页。

⑭参照刘文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3—94页，《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周保中同志（下）》第25页，及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0页。

⑮参照《关于最近满洲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2—13页，《在东北抗日战场上周保中同志（下）》第25页，及《试述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被撤消》第15页。

⑮参照《关于最近满洲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2—13页。

⑯参照《东北抗日战场上的周保中同志（下）》第25页，及《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第190页。

⑰参照《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第96页。关于中共中央的对满工作，请参照《中共对满策动状况》（《外事警察报》245号，1943年6月）

⑱参照《关于最近满洲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40页。

⑳《救国时报》1937年9月18日。

㉑参照《关于最近满洲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5页、第42—45页，及李鸿文等著《近代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0页。

㉒参照外务省东亚局第三课：《支那及满洲共产并思想运动概况》（1940年）第73页。

㉓参照《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0卷第262—263页，及《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周保中同志（下）》第28—29页。

㉔参照《试述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被撤消》第18页，及《北满共产党之概况》第43—45页。

㉕参照陈瑞云等：《杨靖宇将军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8—109页，及《最近满洲共产主义运动之形势》第156—157页。

㉖参照《关于最近满洲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0—11页，《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92—93页，及《试述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被撤消》第18页。

㉗参照《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0卷第218—220页，及《试述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被撤消》第18页。

㉘参照《最近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第157—158页，《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0卷第220—221页，及东北烈士纪念馆等编《东北抗日烈士传》第2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2—114页。

㉙参照《满洲共产匪之研究》附录第51页。

㉚参照《满洲共产匪之研究》第684—685页及第690—694页。

㉛参照《北满共产党之概况》第51页，及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会编《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第8卷（劲草书房，1974年）第113—114页。

㉜参照《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0卷第220页，及《东北抗日烈士传》第2卷，第113—114页。

㉝参照外务省东亚局第二课《支那及满洲共产运动概况》（1938年）第97—98页，《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0卷第221—222页。

㉞参照《支那并满洲共产并思想运动概况》第75—76页，《东北抗日烈士传》第

2卷,第116—117页,及《东北抗日烈士传》第2卷,第116—117页。

⑳参照《关于最近满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8—21页,及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满洲国警察史》上卷(康德9年)第540页。

㉑参照《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第225页。

㉒参照《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0卷第231页,及《东北抗日烈士传》第2卷第116—117页。

㉓在西村成雄著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法律文化社,1984年)第290—297页上,对改编情况有详尽的论述。

㉔参照李惠《关于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党史研究》1986年第三期)第62页,及李鸿文《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组成决定的考订》(《党史研究》1982年第6期)第74页。

㉕参照《关于最近满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第33—34页;及《关于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第65页。

㉖参照《满洲共产匪之研究》第773—774页,及《过去的年代》第356页。

㉗参照《北满共产党之概况》第45—46页,及《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组成决定的考订》第72—73页。

㉘参照《满洲国警察史》上卷第299—300页,及治安部参谏司调查课《第三篇国内匪贼和治安对策》(康德5年)第122—123页。

㉙参照《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118—119页,及《关于最近满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2—13页。

㉚参照《1938年下半年中共满洲党的运动概况》(《外事警察报》第197号,1938年12月)第8页,《满洲国警察史》上卷第540页,及《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0卷226页。

㉛参照满洲国军刊行委员会编《满洲国军》(兰星会,1970年)第383—384页。另,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第231页上记述为500名。

㉜参照《满洲国警察史》上卷,第540—541页。

㉝参照《杨靖宇传》第125—126页。

㉞参照周保中遗著《战斗在白山黑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38页。

㉟参照《新京高等检查厅管辖内思想形势》(《思想月报》第77号,1940年11月)第136—137页,外务省东亚局第三课《支那及满洲之治安状况(1940年度)》(1941年)第25—26页。另,在《周保中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5页上记述有2500名,1942年末为1000名以上。

㊱参照《近代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史》第159页,《周保中文选》第158页,《中共党

史人物传》第11卷第199—200页,《最近满洲党及抗联匪团之概况》(《特务汇报》第4号,康德10年5月)第22—26页,及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解放军将领传2》(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241—242页。

⑤参照《最近满洲党及抗联匪团之概况》第25—26页,及《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159页。

⑥参照《满洲国共产主义运动之概况》(《特高月报》,1942年4月)第166—168页。

⑦参照《伯力野营学校状况》(《外事月报》1942年11月)第85—86页,《最近满洲党及抗联匪团之概况》第27—28页,及赵素芳、于振武整理的《周保中‘抗联日记’摘抄》(《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第225—226页。

⑧参照《周保中‘抗联日记’摘抄》第226页,及《周保中文选》第148页。

⑨参照《周保中文选》第53—54页及137页。关于派往朝鲜问题,参照《苏联武装朝鲜人间谍潜入朝鲜状况》(《特高月报》1943年9月)第109—113页。

⑩《周保中文选》第128页,及《周保中‘抗联日记’摘抄》第227页。

⑪参照《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周保中同志(下)》第31页,《周保中文选》第129页,及《解放军将领传2》第245—246页。

⑫参照《金日成著作集》第1卷(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79年)第250—268页。

⑬平松茂雄著《朝鲜战争的开战和中国》(《国际问题》1977年8月)中有详尽的记述,请参照。

(译自日本《亚洲研究》杂志1987年3、4月号)

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几个问题

〔苏〕A·B·列兹尼科夫

马贵凡译

译者按：本文摘译自苏联历史学家A·B·列兹尼科夫所著《论共产国际的东方政策》一文（载《共产国际与东方，对批判的反批判》一书，莫斯科1978年版，第24—94页）。这是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在这里作者谈到西方史学界经常提到的涉及中国革命问题的两个论点，即1.国民党曾作为“同情党”被接纳为共产国际成员。2.中国大革命失败。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相信，国民党是一个工农的党，或者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党。1925年底，国民党代表胡汉民来到莫斯科。他会见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并同他们进行多次交谈。胡汉民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介绍情况时说，他代表国民党左翼。他和蒋介石都认为，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右翼很快就会转到反革命立场上去。胡汉民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帮助“国民党革命的一翼”制定纲领和创立一种以“世界革命原则”为基础的理论。胡汉民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出现，无疑他是受命要把这个党说成比实际上更接近共产党的一种政治力量。

采取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民党人知道，共产国际有强大的后盾，即共产党执政的苏联。这个时期国民党还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它找到共产国际是指望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它期待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支持中国革命力量是很自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自己这方面来看，也有理由把从事民族革命的国民党寻求援助和指导的行动看作是自己所实行的旨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带来的结果。当时国民党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武装力量，在它的领导下，中国掀起了一场广泛的反帝运动。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民族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加下必将取得胜利，这次胜利定能大大改变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力量对比。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还认为，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仅仅是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结束，这次胜利越彻底，就越能为向下一个革命阶段的过渡创造更多的条件（下一个革命阶段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人民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国家）。共产国际执委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作为一支革命力量，还不是工农的党，而是一个以地主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政治大杂烩。在该党内右派势力和中间势力很强大，总的说来它还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但它最终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则取决于各派斗争的结局。

胡汉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谈话中提出这样一些看法：国民党认为资产阶级是反革命力量，因此它不想同它联合；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国民党的任务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有可能将来国民党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目前中国还在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个过渡时期国民党还是不可缺少的；既然在中国不仅工人是无产者，而且农民也是无产者，那么国民党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党”；国民党很想加入共产国际。胡汉民耍的花招并不高明。他竭力给国民党“涂上”共产主义色彩，试图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实质上是多余的。左的词句原来就是要掩饰反对中共独立和取消中共的阴谋诡计（按：本文所说胡汉民说的话完全是捏造，详情请参看《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7期所载译文：《从胡汉民访苏看共产国际如何重视国民党》——译者）。

共产国际执委会看清了这个意图，它对胡汉民说，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得出：两个党中有一个党，或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是多余的。当时共产国际坚持列宁的策略，主张国共结成革命的联盟，但是它认为，必须划清界限，明确各方的目标和任务。国民党主张建立拥有革命民主政权的独立的国家，而这个政权要满足几亿工农的最低要求。至于中国共产党，它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最终目标是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它的直接政治任务是在争取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胜利。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国民党的任务是接近的，这也就是结成联盟的基础所在。但是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的政党。换句话说，共产国际执委会是运用了列宁关于在必须保持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政治上独立的情况下同东方民主派结成联盟的两位一体公式。

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部的代表在同胡汉民的交谈中讨论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民族革命取得胜利后将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要建立的当然不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也不可能满足起来闹革命

的群众的要求。当时虽然没有使用一个相应的术语，但毫无疑问，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指的是过渡性质的民族革命政权，即反帝革命力量的联合政权。

因此，国民党想通过谈判把共产党溶入民族革命组织的企图未能得逞。

1925至1926年，国民党领导人多次提出他们的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国民党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26年2月，是由还逗留在莫斯科的胡汉民提出的，理由是，国民党接受世界无产阶级同被压迫人民结成联盟的思想。3月，国民党代表得到正式答复。答复说，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准备在第六次全会上研究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即国民党遭到了婉言拒绝（当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主席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会造谣中伤，指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说它们希望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1926年9月，国民党的另一名代表邵力子来到莫斯科。他向共产国际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提出，作为他蒋介石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领导者的交换条件，共产国际应该承认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国民党（蒋介石自然是指以他为首的国民党军政领导集团）。在此基础上，国民党准备把共产国际看作是自己的领导机关。当然蒋介石是把共产国际的“领导”理解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对国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援助。他的代表谈到在中国实际上“不需要”共产党的这种看法，但当时蒋介石最关心的是争取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因为这个时候国民革命军已经开始北伐，蒋介石特别需要苏联的支持，同时他也想麻痹对手——中国共产党。

这一次，共产国际也识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只有反对派中的政客才会断言，共产国际执委会同蒋介石谈判是对其意图抱有幻想。就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也根本没有什么好感；不但如此，而且他还是它们的潜在敌人。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很清楚它在跟谁打交道。邵力子同前些时候的胡汉民是一丘之貉。他在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建议时，也坚持要把共产党溶入国民党，理由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民族革命。邵力子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互派代表。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了国民党向共产国际派驻代表问题。当时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由“小委员会”处理。几天后“小委员会”决定函询在华的鲍罗廷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维经斯基的意见以及中共领导的态度，打算在收到他们的答复之后再作研究。但是一直没有从中国得到回音，而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自然也就终止了同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谈判。

总之，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的立场是：断然拒绝，以避免蒋介石利用这一点来反对中国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以任何形式加入共产国际，即使是以“同情党”身份。

所谓共产国际“接收国民党参加了它的队伍”，这是仇视共产国际的历史学界最爱利用的一个论点，但在这个问题上的实际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这样。

现在来谈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的一些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中所采取的策略有关的基本的起主导作用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至12月）作出决议的过程，是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战略与策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全会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最终使命是把中国人民从外国压迫下解放出来，统一国家、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解决土地国有和没收外资财产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当时中国革命还处在全民族阶段，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刚刚开始，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

民阶级、中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大资产阶级。他们正在结成广泛的反帝联盟^①。全会决议提出了现时的过渡性土地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地租；废除苛捐杂税；没收反革命地主的土地。决议中的这个部分重申了中共中央七月会议提出的口号，同时作为长远目标还提出了土地国有化要求。

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问题制定策略路线时，找到了正确处理那些首次需要共产主义运动立即着手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方法。上面已经指出，共产国际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把国民党看作是一般的政党，而认为它是一个政治集团，一个广泛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各个阶级的政治力量在明争暗斗。共产国际强调1925至1927年中国革命开始阶段的全民族性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很大贡献。

全会在估计中国革命的总前途时指出，中国革命的结果“并不一定会造成使国家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国家不会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它“将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专政国家”。全会工作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支柱——军阀部队的作战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全会断定，帝国主义正在加强对华的武装干涉，中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因此，中国民主革命“同上一世纪西欧各国旧资产阶级革命和1905年的俄国革命有本质上的不同”。全会指出，参加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各种社会力量正在迅速地重新进行组合，大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不可避免地要转到反革命方面；全会认为土地问题是“当前局势中的中心问题”；全会拟定了旨在“把工人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巩固该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并把农民争取到革命方面来的具体要求大纲，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重大民主任务；全会特别强调共产党人既要坚持不懈地同企图把国民党变成地主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右翼作坚决的斗争，又要同国民党左翼进行合作的意

义。

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事件，暴露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反共面目。这次事件之后，共产国际预料到蒋介石迟早要打击中国革命力量。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断定，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深入，大资产阶级必将得出反帝斗争威胁其利益的结论，尔后它将脱离革命并竭力扼杀革命。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争取必要的时间，进一步开展革命运动，加强共产党力量，准备回击反革命势力正在酝酿的进攻。

全会的决议无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件。确切地说，是为党提出了一条复杂的行动路线。一方面它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强调必须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和同军队的联盟（在军官组成中地主分子占有很大势力）；另一方面它指出，必须积极开展农民争取土地的运动，以准备应付同地主资产阶级势力必将发生的正面冲突。而要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要在每一个具体时刻采取切实的解决方法，克服正在形成的实际困难，采取灵活的政策，把同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冲突推迟到力量对比对共产党更为有利的时候，这便是共产国际为中共领导指出的方向。中共领导同共产国际驻华同志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因为自1926年底，蒋介石一面在继续对反动军阀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一面在着手准备打击共产党。他的这个意图越来越明显。

共产国际选择了一条虽然很复杂然而却是唯一可行的路。如果共产国际象资产阶级史学家和改良主义史学家后来所“建议”的那样，指示中共在日益发展的革命进程中放弃争取领导权的斗争，那实际上就等于把中国共产党溶入国民党，就等于取消共产党；如果共产国际采取破坏统一战线和托派求之不得的同蒋介石对着干的方针，那么它就会为蒋介石立即动手消灭共产党创造条件。所以说，处在极其复杂情势下的共产国际，长期以来成功地解决了这个两位一体的问题，即在不受别人挑拨，同蒋介石

保持联盟的同时，发展共产党的力量，提高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威信，巩固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地位（后者慑于蒋介石建立军事独裁的威胁日益增长，渴望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提出了实行民主改革的纲领）。解决这个问题靠抽象的推论是不行的；“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领导权，还是蒋介石独裁”，这个问题要由现实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这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总方针。

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受到沉重打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军事政变得逞，其主要原因是客观因素——力量对比对中共不利。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如果实行非辩证的、片面的政策，即要么只执行同蒋介石联合的方针，要么只执行在中共领导下进行土地革命的方针，那就会使共产党这个现实力量更早地失去作用。这就意味着革命将半途而废。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曾处心积虑地利用这样一个情况，即1926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发给中共的一份文件指出，现阶段强调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村上层人物的斗争为时尚早，而且极其有害。文件说，这样做会使资产阶级、商人和农村上层人物投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怀抱。只要来自帝国主义和军阀方面的威胁还存在，只要将来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国民党就应尽量保留自己的所有同盟者和同路人。共产国际表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解决土地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没有农民的支持，就谈不上取得胜利。共产国际同时指出，同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若马上在农村发动内战，那就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

对这个文件的研究，无论如何也不应脱离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一整套政策和那里业已形成的局面。首先，在1926年10月，共产国际有充分理由认为，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领导还没有脱离革命，统一战线还没有瓦解。其次，10月26日的指示是在国民革命

军处境十分困难时下达的。10月，国民革命军的主要（江西）一路蒙受巨大损失，光是指挥人员就损失过半。这时，共产国际收到它驻上海代表提出的建议：指示中共到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同地主展开坚决的斗争。可是，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大部分指挥员是出身于那些开展斗争省份的地主家庭。因此，提出农村内战的口号势必瓦解国民革命军，更何况是在军事上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所以1926年10月26日的文件即是对上述建议作出的一个有根有据的否定答复。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考虑到蒋介石的政策含有破坏统一战线的意向。因此在这次会议之后，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出现了另一些提法。如1927年3月的指示提到武装工农的必要性问题（指公开地和非公开地武装工农队伍）。

四月政变之后，中共怕武汉国民党政府步蒋介石后尘反对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了抑制态度。这时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许多建议，指示中共依靠由“革命工农”组成的军队尽一切可能激发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共产国际开始向中共作出这种指示还是在5月的上半月。鉴于4月的经验，即意料之中的打击突然变成了毁灭性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准备在武汉国民党进攻共产党时（由于蒋介石和武汉政府领导层的阶级利益及其军队派系利益的一致性，这种进攻是不可避免的）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把参加运动的人组织和武装起来（同时还要与武汉政府一些领导人保持联系，以保留对于群众来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

共产国际的5月、6月指示谈到，必须有步骤地在“农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口号下开展土地革命；必须在那些为势不可挡的土地运动所席卷，而反动军阀拚命对这种运动实行镇压的省份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如湖南、广东）；现

在最重要的是在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下真的由农民去没收土地；共产国际主张“自下”真正夺取土地；如果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就会成为军阀手中的玩物。指示说，鉴于（武汉）国民党左翼的某些首领惶恐不安，动摇和妥协，建议“武汉国民党”领导机关尽量更多地吸收工农领袖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强调指出，必须清除“武汉国民党”对军阀的依赖性，必须动员共产党人，动员湖南、湖北的革命工人和农民，从中组织几个新的军团和一支还可以派上用场的革命军。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动都是犯罪行为。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界所津津乐道的反对派观点，硬说共产国际反对在中国进行土地革命，这纯粹是捏造。相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张开展农民革命，但同时力求不“跳越”尚未完成的运动阶段，不希望在对人民群众不利的情况下过早地引起同蒋介石的冲突。

那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7年5月才开始指示中共进行土地革命，这是否为时已晚呢？这样提问题是不公正的。事情是这样，若是在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之前就采取全力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那就会马上引起对共产党的打击，而且这次打击会同4月打击有两个重要差别：一是来得要更早；二是实施打击的将是国民党的联合力量。那时候就会有人说，共产党搞早了（指土地革命——译者）。因此，蒋介石在上海得手的原因不应该是共产国际要求开展土地革命“为时已晚”，而应该是共产党没有国民党及其武装力量那样强大。正因为如此，中共在武汉也遭到了失败。至于在农村发动内战的方针的提出，那是鉴于武汉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反土豪劣绅的群众运动已经开展起来；地方军阀准备同蒋介石联合，因而同地方军阀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而且已获悉，军阀正在策划给共产党以毁灭性的，而不是“节制性的”打击；蒋介石政变后，统一战线失去了现实的政治基础，其

解体已成定局；换句话说，这个方针的提出是适时的。这个方针并未破坏统一战线（如果在四月政变之前提出，反倒破坏了统一战线），因为国民党军队公开反对中共之后，事实上中国的统一战线已不复存在，而武汉国民党政府同中共的联盟仅仅是局部地区原有统一战线的残余，并且军事独裁的建立已使武汉政府变成了昙花一现的机构。不过在国民党力量占有极大优势的情况下就是最适时、最正确的方针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关于上海失败后革命转入新的更高阶段的论断，关于蒋介石集团同武汉政府之间存在着阶级对抗的论断（按：这正是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论断——译者），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问题不在表述方法上。事实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从1927年5月上半月起就指示中共领导发动人民群众反对“武汉国民党”首领同反动军阀搞妥协。问题是，中共在4月份受到蒋介石打击之后，是应该放弃斗争，还是相反，应该利用武汉国民党左翼政府所控制的地区的形势终归还为中共保留有一定行动自由的这种情况，去努力收集一切剩余力量以应付新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共产国际选择了后一条路。它对武汉集团不抱任何幻想，它指示中共去从事一些实际上是为同武汉政府的冲突作准备的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实际上把四月政变不仅仅看作是军阀蒋介石的一次行动，而且看作是国共统一战线不可挽回的破裂。因而除了设法利用由于蒋介石同武汉政府的矛盾而造成的有利条件之外，别无他策。

1927年5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分析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中国出现的新形势，全会指出，如果武汉国民党左翼政府坚决采取依靠群众的方针，它就有可能起革命作用。因此，当共产党在其代表参加国民党左翼政府工作情况下有可能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促使该政府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不能排除事态向这方面转变的可能性。但是，共产

国际执委会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这种可能性，它认为，革命群众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也可能引起新的冲突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的实质是依靠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团结中国一切反帝力量。这条路线曾不断地遭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猛烈攻击。中国革命问题成了反对派攻击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总路线的借口。后来，反对派为同样目的又试图利用中国革命的失败。

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的观点可归纳如下：他们把共产国际关于必须支持具有革命性质的民族运动的论断曲解为同非共产主义反帝力量断绝联系的方针；他们认为，根据阶级力量的分布及其性质来判断，中国革命基本上无异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他们宣称，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直接的前景；他们不认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是前进了一步，是使劳苦大众具有更高形式的思想意识——共产国际持这种观点——而认为它基本上是反动的思想意识；他们认为建立代表阶级联盟利益的政府的想法是“荒谬”的，是“取消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国民党说成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认为它从未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只不过是“装扮成”革命组织而已。反对派不考虑革命发展的过渡阶段，而要求在中国立即建立苏维埃，而且首先要建立作为政权机构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换句话说，反对派无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现行阶段，要求立即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③。

若是贯彻执行反对派的纲领，不仅会使中共在革命的早期就被消灭，而且会使由于共产党人长期以先锋队姿态参加统一战线而开创的革命规模急剧缩小，因为中国革命就不会再有群众运动阶段。

由此可见，对上面已经作出的结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和“左”倾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在评论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时，总是以各种方式重复托洛茨基的话，而他们之中可能

有一些令人十分尊敬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重复谁的话”)。可以再补充一点：要注重事实，要实事求是地叙述事实。

注释：

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668—680页。

②自然，共产国际不能宣扬可能导致同“武汉国民党”发生冲突的方针。

③见《共产国际简明史纲》，莫斯科1969年版第270页。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关于共产国际1926年的《十二月提纲》

[日] 松元幸子

韩凤琴译

一、序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1935年）是一次唤起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从根据季米特洛夫报告而形成的大会决议《共产国际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反对法西斯主义实现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中的任务》^①中，我们可以简略地看出40年代东欧各国人民民主革命历史经验的理论体系，即，由于它赋予了人民战线（不单是工人的统一战线，在这个战线内还包括一切反法西斯的广泛阶层）以对抗法西斯主义这一帝国主义反动政权的概念，还由于工人（及其同盟者农民）掌握了它的领导权，因此似乎可以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就包含有超越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形态（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和转化）的理论。然而，以上述决议和季米特洛夫报告中的统一战线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府的设想本身，并不属于社会主义政权范畴，只有用“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才能补救。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认为，统一战线及其政府是与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没有内在联系的、暂时的、短期的、策略性的概念。与这一点有关，山崎功指出，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在当时的共产国际内部并没有完全统一的见解，特别是在季米特洛夫与陶里亚蒂之间，对统一战线理论存在着相当深刻的分歧^②。

可以推断，第七次大会决议是从策略角度去理解欧洲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府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该决议的“殖民地各国的反帝人民战线”一项中特别指出，“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扩大与红军战斗力的加强，必须与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人民反帝运动相结合”，“这个运动一定要在反帝必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仆从们这一民族革命斗争的口号下进行”^②。这里阐明了反帝人民战线与苏维埃之间的联系和民族革命中的武装斗争问题。从这个时期的历史沿革看，反帝人民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独有的，在内容上它与欧洲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同。众所周知，这里提出的轮廓，尽管后来经历了曲折，但是实践充实了新的理论，一直发展到新中国的诞生。

本文将3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这种统一战线与苏维埃的结合作为现实的问题提出，试图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的角度来考察20年代后半期中国革命的各种理论问题。这就是一贯追求的在20年代后半期中国革命的历史的即具体的（国内、国际的）条件中基本上得到规定的民族课题与阶级课题的结合及其相互关系这一观点。我们想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以下称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至12月召开——上通过的决议《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以下称《十二月提纲》）作为研究中心。因为《十二月提纲》揭示了共产国际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全部政策，同时它又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一统一战线的崩溃到建立苏维埃时期提出的。

二、《十二月提纲》面临的课题

《十二月提纲》是192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针对当时高涨的中国国民革命而通过的决议，它已成为中国所遵循的理论政策的主要支柱。这个时期，在欧洲各国，继俄国革命之后兴起的被认为是成功的欧洲一系列国家的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在准备迎接新

的矛盾的同时，暂时保持着相对的即不稳定的均衡状态。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各种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中国国内的各阶级之间等各种矛盾——的激化，构成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的基本形势。因此可以说，中国已变成冲破这种相对稳定状态的“易燃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刚一退出中国市场，日本便乘机耀武扬威地进入中国，从而加深了它与中国人民之间更深的民族对立，与各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勾结的中国国内军阀之间的战争也接连不断。也就是说，以20年代前半期为中心爆发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新四国借款团的成立、华盛顿会议与九国公约、直奉（二次）战争、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等各种事件，和后来发生的各种事件一样，象征着上述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在一起^④。20年代后半期，尤其是1924年的国共合作、孙文的北上宣言、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北伐的开始和反帝运动的激化，必然将国内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引向作为社会基础的土地革命，即向反帝反封建斗争方向发展。可以看出，这时帝国主义不仅将其在中国国内的统治基础放在旧军阀身上，而且还在民族解放战线内部寻求更有效的基础，并开始策动其分裂。由于五卅运动、冯玉祥及郭松龄政变、“三·一八”惨案等的发生，可以说更使当时的帝国主义加深了这种信念。其具体表现就是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十二月提纲》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一方面以国民政府自广东转到武汉从而看出北伐的进展为背景；另一方面是在中山舰事件至“四·一二”政变期间提出来的。

关于在上述形势下提出的该提纲的内容^⑤，因篇幅有限，不能详细介绍，只抽出构成该提纲的各个命题，在论述中展开讨论其要点。

笔者认为，构成本提纲的各个命题，原则上继承了1920年的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⑥）的各个命题，即，反帝民族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环；包括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暂时同盟问题在内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战略与策略；与帝国主义关系中的从属国的民族课题与阶级课题的结合及其相互关系；重视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包括贫农、中农的武装）；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及劳动同盟；民族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形态等等。然而这些命题实际上还面临着在1920年提纲中规定的另一个命题，它构成了围绕着《十二月提纲》问题的本文的论点，即，关于各落后国家采用苏维埃体制和据此向含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内的社会主义转化形态的命题。对于《十二月提纲》中未包含的这个命题与上述各命题的关系应如何考虑，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的即具体的条件下已经提了出来。

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将1920年提纲中的本命题作一简单的回顾。

列宁认为，“苏维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赋予苏维埃的这个概念并非只能在俄国革命的名词里才能找到，苏维埃“不仅适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适用于农民的、封建的以及半封建的关系”。这一命题已经在1920年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中提了出来。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指出^⑦，俄国共产党人在以前属于沙皇的殖民地里进行的实际工作，向我们提出了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运用共产主义的策略和政策问题。这个命题在“小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中又提出了关于后进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命题，即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新加在M·N·罗易的《补充提纲草案》里的内容。而且，在1920年，还只是停留在承认和强调这个重要命题的“确立与建立理论基础”的必要性上。当

然，需要采取什么手段还依赖于以后的实际经验。因而，这个命题与其他各个命题，尤其是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联盟的命题具有怎样具体的内在的即论理上的联系，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还不清楚。那末，《十二月提纲》是在何种意义上面临着这个课题呢？

姬田光义在《中华苏维埃研究绪论》^⑧中，作为建立中国的苏维埃权力的各种前提条件，举出了国民革命时期的各种权力，即以国民会议提出的建立民族的与民主的政权问题为中心，将已产生的各种权力（或萌芽权力）分为工商学联合、广州与武汉国民政府、上海革命市政府、“一切权力归农会”等各种类型。并在它们历史的展开及相互关系上，详细分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权力分立向工农民主专政权力的转化过程”。姬田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湖南的‘一切权力归农会’（乡民会议权力）和上海市民政府，是国民革命时期的两种新型人民政权的典型”，同时指出了与《十二月提纲》有关的下述问题：这两种政权，前者是农民政权，后者是工人政权，二者在成立过程、构成内容以及政策上完全不同，但是它们都是把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作为政权的课题，旨在建立民族民主的政权，在这点上它们是一致的，二者都意识到应该作为早已存在的民族民主政权——武汉政权的一部分来建立其基层政权。据说，由于武汉政权是作为真正的民族民主政权，所以一方面需要武汉政府本身革命化，另一方面需要在这个政府权力所及的地区唤起多数民众，建立这个政权的基层组织。这是《十二月提纲》及1927年的5月决议案的基本设想^⑨。这里指出的内容在《十二月提纲》里有明确记载。即，提出了“根本的土地政策”，在其最高纲领里，一方面包含土地国有化，另一方面企图将以此为基轴的国民党改造成“人民政党”，使国民政府转化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专政政府，并提出了作为国民政府的基层政权的“农民委员会”。所以，在《十二月提纲》中，“农民委员会”所表现的意义与

内容,和以革命化为前提的国民政府的意义与内容并不矛盾。因而在该提纲中规定,“担心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会削弱反帝统一战线,这是没有根据的。”在《十二月提纲》中,我们可以从这个关系上来了解苏维埃的问题。这是以后在与“农民委员会”的密切关系中所要研究的重要之点。

《十二月提纲》中关于坚持国民政府和实行土地革命的命题,是在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下达了关于国共合作的正式指示的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⑩(1923年1月)之后提出的。而且,在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的广东政府对农民采取的具体政策当中,尤其是象设置农民部及农民运动委员会、派出特派员、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农民自卫军以及澎湃的活动等等,若是没有国共合作,那是很难想象的^⑪。从这个角度看,正如《十二月提纲》所讲的,“民族革命政府的机构赋予了接近农民的极现实的方法”。特别是“在湖南,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各界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军阀统一战线高度发展,它已经采取了与农民运动相互支援的形式”^⑫。而且,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在下述形势影响下取得了进展,即“集中了中国大部分工业的上海、汉口、长沙等城市的工人与湖南、湖北的广大农民,自五卅运动以来,在与帝国主义、军阀的残酷斗争中,已经为革命做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他们面对着奉系、直系军阀,一心等待着革命军的到来”,“那里条件已经成熟,只要与这些军阀斗争,即便是靠不住的军队,也可作为革命发展的一个契机加以利用。”^⑬同时,以北伐为中心的1925年至1926年的形势,也是将两个焦点收缩到反帝统一战线内的过程,即一方面是以北伐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为代表的阵营,他在3月份制造了中山舰事件^⑭。又以该事件为契机实行了“整理党务案”;另一方面是以五卅为契机的以工农为中心的阵营。

就农民运动而言,1925年至1926年间,广东省海陆丰从要求

二五减租到四〇减租，进而提出了土地的要求，“一切权力归农会”也开始作为口号提出^⑤。在湖南，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提到的第二期（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即“革命的时期”，正是《十二月提纲》发表之时，和海陆丰一样，已经开始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⑥。另一方面，《十二月提纲》尽管在最高纲领里标榜实现土地国有化^⑦，即实行“彻底的土地政策”，但是土地的没收及其分配这个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却只能限定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这种情况就连国民政府管辖区内的土地政策也是如此。这种现象可以与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进行军事侵略的30年代，特别是1937年以后的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共土地政策主要放在减租减息上相比。然而，30年代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已经立足于处在胚胎状态的工农革命基础之上的统一战线，当时的国共合作形式也与这个时期的不同，那时的政策是在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日趋明显的形势下展开的。

1925年至1926年以后的这个《十二月提纲》所面临的课题正在于这一点，即在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激化的过程中，在与这些全民族的课题密切联系中，工农的革命基础是如何建立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十二月提纲》是把重点放在土地革命和“人民政府与人民军队的基地”（农民委员会）上，强调当前的土地政策应该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而且，《十二月提纲》在使国民政府转化为工农民主专政政府的观点上，想自上与这种自下形成的工农的革命基础相结合，并加强这一革命基础。其特点还在于认为那是可能的。实际上，国民党中央各省级联席会议（1926年10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1927年3月）的各项决议等^⑧，似乎将那种展望变成了可能。

下面我们研究一下可以称为《十二月提纲》的论点的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以及与此有关的苏维埃问题。

这里需要了解一下有关的这几点，尤其是有关作为“目前形

势的中心问题”的土地与农民问题的该提纲的若干梗概。《十二月提纲》写道：

“在目前革命发展的过渡阶段中，土地问题尖锐起来”，“这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个基本问题持坚决态度并能给予彻底回答的那个阶级，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在目前的中国形势下，彻底的土地政策“是胜利结束反帝斗争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前提”，“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唯一的阶级”。因而，“应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提为无产阶级土地纲领的基本要求”。然而，“现在必须根据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特点分别制定土地革命的策略”。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管辖区内，土地革命纲领必须有具体形式。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应当立即实现下列措施：（1）最大限度地减少地租；（2）取消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捐税，代之以唯一的农业累进税；（3）最大限度地调整和减低基本农民群众的捐税负担；（4）把属于反动军阀、属于同国民党国民政府进行内战的买办、地主和土豪的寺庙与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5）保证佃农有永远耕种所租土地的权利，并由农民协会和革命政府的代表共同确定地租的最高额；（6）广州政府应全力维护农民利益，特别应保护农民不受地主、土豪和高利贷者的压榨和迫害；（7）解散民团及其他各种地主武装；（8）武装贫农和中农，农村一切武装力量归革命政权机关管辖；（9）政府应最大限度地支持包括农民协会在内的农民组织；（10）发放低息的国家贷款，坚决打击高利贷，支持有关的农民互助组织；（11）政府资助合作社和互助组织。以上措施是向土地革命更高阶段过渡的手段，“将通过建立共产党员领导下的农民委员会的途径来实现”。农民委员会不仅要实现上述要求，而且将在革命发展的进程中“提出更彻底的要求加强斗争”，“农民委员会必将成为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在农业区的基地”。

从以上看，提纲中对于现有的农民协会与提纲提到的“农民

委员会”之间的关系讲得不明确，况且连苏维埃或苏维埃与“农民委员会”的关系也未涉及。然而，与此有关的对于《十二月提纲》所作的一些解释，恰恰最清楚地说明了该提纲的内容。

首先是关于农民协会问题。农民协会是“共产党领导的，以贫雇农为骨干、以农民为主体，进而团结农村中的其他各革命阶层（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分子等）的群众性革命组织，同时也是当时农村中的革命人民掌握革命领导权的一种组织形式”^⑩。并且，农民协会还设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⑪。以农民协会为中心开展的运动即“一切权力归农会”，也在这个时期开展了起来。这个组织在农民提出乡民会议这一乡村自治制的过程中被赋予了如下地位：为“建立完善的乡村自治机关”，“首先召开乡民会议”，“当前，农民协会要召集其他革命群众团体，组织乡村自治筹备机关”。这些内容依据于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乡村自治问题决议》^⑫（1926年12月）。按照决议的说法，“乡民会议是乡村自治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使命在于“集中乡村各种民众势力，确立民主革命的真正基础，实现乡民的要求，发展农村经济”。从组织上看，“乡民会议的组织，在最下级的自治区域内是乡民全体大会；在上级的自治区域内是由下级自治区域的乡民全体大会中选出的代表组成”。这样一来，以农民协会为核心的乡民会议被一步一步地推到了县、省级。在省级，“建立了以工会和省农民协会为组织母体的‘农工商学联’这样的群众组织，可以召开省民会议和成立省人民政府”^⑬。在这种状况下，据说在一省之内出现了下述情况：由国民政府任命的“省政府的支配权，仅能行使到省政府所辖的各机关，而且各机关无权执行政务。必须由省政府委托工会和农民协会通告下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方可生效”^⑭。这就表明：“一省之内形成了两种互相对峙的支配权”^⑮。按照《十二月提纲》的要求，象湖南这种“双重政权”应该通过国民政府的改造形成一个牢固的政权。然而，实际上，正如广东等省所

出现的情况那样，国民“革命军压迫农民，国民党县长镇压农民运动的事情……时有发生”^⑤。就是在湖南，在后来农民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湖南国民革命军唐生智（北伐时任第八军军长）的部下许克祥（长沙守备团长）也对农民协会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逮捕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临着造成致命伤的长沙（马日）事变。

总之，《十二月提纲》里提到的日期，正是以农民协会为杠杆，以它为基层政权的中心，自下开展政权运动的时期。与这种情况相并行，《十二月提纲》还提到了“农民委员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与农民协会是什么关系？我们引用“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本提纲拟定工作”^⑥的斯大林的演说^⑦，便可看出这些问题的轮廓。

“农民委员会”在《十二月提纲》中被称之为“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在农业区的基地”。斯大林在演说中把该委员会作为当前革命的三大支柱（除农民委员会外，还有革命政府、革命军队）之一。显然，这是根据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这三个支柱，在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一文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口号里业已载明。列宁在1905年俄国革命时所作的关于该委员会的论述，这里暂且不谈^⑧，斯大林关于“农民委员会”的问题是这样讲的：这里提到的“农民委员会是指由农民中选举出来的，这种农民委员会能够规定农民的基本要求，并将采取一切办法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些要求。”当时有人提出：“那么，农民协会呢？”斯大林将“农民委员会”与农民协会的关系作了如下说明：“我认为农民协会将聚集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或者把农民协会变成农民委员会，使它具有为实现农民的要求所必需的某种权力。”

实际上，仅仅依据上述这些说明，仍旧很难判明二者的关系。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可以推测该委员会是农民协会的上级机

关。如果是那样，可以说农民委员会相当于在湖南看到的乡民会议，但是二者决不相同，否则就不会提出农民委员会了。最重要的是，乡民会议已经作为未来的革命政府的基层权力机关行使职能，而该委员会正如斯大林自己在别处讲到的那样，它和农民协会都是作为与工会委员会、罢工委员会等相并列的群众组织而存在的^⑨。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的说明是把当时的“农民委员会”的任务与在工农民主专政条件下提出的任务混为一谈了。而且，“农民委员会”提出的本身就表明是继承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即，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1905年至1917年2月）是“联合全体农民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奋斗”^⑩（斯大林的說法），按照列宁的说法，那就是“每个县的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选出代理人，成立自由的农民委员会”^⑪。农民委员会是“一种灵活的机构”^⑫。同时，它与铁路委员会、士兵代表苏维埃一样，都与工人代表苏维埃相并列，作为与“它们相类似的机关”^⑬而存在。再详细一点说，斯大林在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1917年2月至10月）提出，要“联合贫苦农民、反对资本政权、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⑭。另一方面，以乡民会议为母体的农民协会，已经“以贫雇农为骨干”，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贫农大众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⑮。从组织上看，乡民会议具有独立性，它是以“农民协会召集其他革命民众团体”^⑯这一更广泛的阶层为其基础的，这一点后来形成了支撑中国苏维埃组织的基层政权形式。应该看到，这与俄国的情况不同^⑰。如果考虑这二者的差异，那么似乎可以说，该提纲中说的“农民委员会”与农民协会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明确，即“农民委员会”并不是在把实际开展的乡民会议等运动从理论上总结提高的基础上提出的，估计那是将1905年的俄国革命的经验生搬硬套在中国的现实中。

然而，不管怎样，《十二月提纲》与使武汉政府改造为工农

民主专政政府这一命题相结合，从理论上将“农民委员会”作为主要支柱之一，这一点是很明确的^⑧。下面谈一下应该如何看待该委员会与苏维埃的关系，怎样认识苏维埃本身的问题。

共产国际内部围绕中国革命时期建立苏维埃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论战，是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之后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1927年5月18日至30日）上。那是由于以托洛茨基^⑨为中心的共产国际反对派拥护建立苏维埃的理论，充当了批判《十二月提纲》基本设想的急先锋之故。对于这个问题，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即使在“四·一二”以后的第八次全会上也没有改变《十二月提纲》的基本内容。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的决议^⑩作了如下表述：“‘四·一二’完全证实了第七次扩大全会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转向反革命方面的论断”，“革命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然而，中国共产党不应该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在当前形势下，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欠妥当的”。因而我们想在国共分裂（1927年7月）以前（包括这段时期）的时间范围内来研究《十二月提纲》中的苏维埃问题。

首先，《十二月提纲》里的“苏维埃”这个概念包括两种含义：一方面是1905年俄国革命时的权力形态的投影（从另一个角度说，苏维埃革命也包括在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是在反帝这一意义上评价武汉政府（在这点上它与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同）。斯大林在关于“中国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演说中暗示，尽管中国革命的政权形态很突出，具有反帝的性质，但是它“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1905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⑪。在苏维埃的问题上，它与1905年革命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对当时的武汉政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评价问题。这从斯大林所讲的“假如1905年在俄国存在着类似现在中国左派国民党这样的广大革命组织，那末可能

当时在俄国就不会有苏维埃了”^④这句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的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为了使武汉政府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机关，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使武汉政府成为竭力支持中国农民土地革命的政府。第二，必须使国民党以工农出身的土地运动的新领袖补充其上层领导集团，并且扩大其下层组织，把农民协会、工会委员会和城乡其他革命组织都包括进去。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国民党才有可能变成那样的机关^④。“当时有这种可能，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认为没有这种可能”^④。因而，“在今天中国的南部，例如在革命的国民党正掌握政权、运动正在‘全部政权归革命的国民党’这个口号下向前发展的武汉政府地区，号召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号召在这个地区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号召起义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这“显然是不适当的”^④。也就是说，“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合作反映出国民党外渐渐形成的工农联盟，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④“革命的国民党的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展开工农革命运动和巩固工农群众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会以及其他作为将来苏维埃的准备要素的群众革命组织，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是千百万劳动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增长，而对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则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④。这里对“农民委员会”与苏维埃的关系讲得比较清楚。也就是说，那尽管包含着在将来苏维埃被提出并被付诸实践时，“农民委员会”有可能转化为农村的权力机关，但是现在依然作为“将来苏维埃的准备要素的群众团体”之一。给“农民委员会”赋予这样的地位还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国民党左派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④这一独特的形势分析相对应。

然而，如果进一步从理论上研究这一点的话，可以指出，

正如根据引文可以作出推测那样，“农民委员会”以后将要变成苏维埃的那个“苏维埃”与1905年的苏维埃不同（当时俄国还没有农民苏维埃），这应当从它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上进行考虑。关于这一点，如果很细心地追忆一下斯大林见解的轨迹，就会发现，即使在早期，在1927年7月那个阶段，他已将“苏维埃”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了。换言之，“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说法已成为他的概念（第一点）。因而，认为“苏维埃”适用于民族民主革命这一重新附加在《补充提纲》里的列宁的命题——尽管面临着如何确定当时的武汉政府的意义和内容这一具体困难——被斯大林理解为是与列宁的意图不相同的（第二点）。

关于第一点，斯大林有几处说明比较明确^④，这在第八次扩大全会决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里讲得比较清楚。如：“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意味着直接在中国建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政权。”“当革命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开始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候，才必须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⑤，这时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才成为党的中心口号。”^⑥

下面谈谈第二点。当有人联系到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提纲》和《补充提纲》提出苏维埃的问题时，斯大林作了如下回答：“……因此，不能把列宁的演说和提纲与罗易的《补充提纲》混淆起来，同样不可忘记：谈到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时，必须注意到要成立的是工人和农民苏维埃，而不仅是农民苏维埃”^⑦。强调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里“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时，应该成立工农苏维埃”^⑧。然而，附加在《补充提纲》里的“苏维埃”适用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它与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同一意思。

这样看来，“苏维埃”仅仅是作为与无产阶级革命有密切联系的概念而提出的，这本身已经带有浓厚的1917年俄国革命经验的色彩。从同一理由出发，斯大林又举出了农民苏维埃起义机关性

质的俄国的经验^⑤。关于后者，斯大林认为，在中国，撇开工业中心，在农村建立苏维埃等等，“是完全办不到的”^⑥。不能不说这种观点是妨碍正确认识当时的乡民会议机构的值得注意之点。关于前者，可以在后面提到的对广东公社的评价里看到其残影。

与《十二月提纲》里提出的苏维埃相关联的共产国际的思想，是从当时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出发，明确地展望了苏维埃必然会与工农武装相结合而存在。然而，这终究是“未来的展望”，不是“当前口号”^⑦。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当时的武汉政府所具有的独特性的评价有关；另一方面，“苏维埃”本身是先进的，这个概念与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密切相联。

下面，我想从研究共产国际自这时起至第六次代表大会为止这段时间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方面来考察上述问题。

三、提出成立“苏维埃”及其内容

为了贯彻执行《十二月提纲》而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是该提纲的作者之一——罗易^⑧。据R·C·诺斯讲，罗易踏上赴华征途，于1927年2月初到达广东，4月1日到达长沙^⑨。5月4日罗易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4月27日至5月6日于汉口）上就该提纲的内容作了简要报告。在罗易到达中国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一方面发生了上海政变，另一方面是上海的工人运动和以湖南为中心的各地农民运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四·一二”以后，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在维持与左派武汉政府合作的同时，将重点放在通过土地革命的进一步展开使左派武汉政府转变成工农民主专政机关上。因此，罗易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演说中最强调的一点是“革命的深化”，即土地革命。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官的土地也不在没收之列（《土地问题议决案》）^⑩，决议没有改变《十二月提纲》规定的内容。尽管最终还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在这次大

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在陈独秀、谭平山等人和毛泽东、彭湃、罗绮园等人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对立。卫藤濬吉暗示，产生这种对立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十二月提纲》可以作多种解释^⑧。

关于将来的苏维埃组织问题，在《十二月提纲》中谈到的农业区的“人民政府与人民军队”的内容已继续写明在这个《决议》中。然而，文中尚未使用“农民委员会”这个用语，而是比较实际地提出了“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对农村各被压迫阶级所组织的乡民会议负责”，以及“组织农民自卫军”，保卫自治政府^⑨。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汪精卫对于是否认为小资产阶级能够跟从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特别表示怀疑^⑩，他以6月份从罗易处见到共产国际发来的紧急训令(发给罗易的密电)为借口，叛离了统一战线，至此中国第一次国民革命彻底失败。面对这种事态，共产国际判断：“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了”，7月份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公开退出武汉政府”(七月决议)^⑪。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退出国民党，也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成立苏维埃的问题。也就是说，决议并没有放弃自下改组国民党的方针，它要求将国民党内的上层领导机关与下层群众区别开来，要与后者紧密结合，通过他们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关于这一点，布哈林作了如下说明，即，在由工农组成的国民党地方机关里，共产党员发挥着领导作用，最关键的问题是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如果退出国民党，共产党就必然会立即变成非合法组织，即使共产党希望成为真正的革命党，群众准备与敌人进行彻底的斗争，但是如果现在全中国都被敌人的战线包围，那么党也就只能结成非合法组织。考虑到这种情况，要是在整个战线上都与国民党的组织全部决裂，那是极端错误的，不合道理的^⑫。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个

意见，于7月13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并付诸实践。然而，7、8月间，汪精卫借“清党”名义开始镇压共产党，8月5日下达命令取缔共产党，9日下达对谭平山、林祖涵、向忠发等人的逮捕令。进而在反共这一共同点上企图使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靠近（汉宁合作）。

随着事态的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20年代制定的统一战线策略突然“暗转”（虽带有若干比喻之意，但这确实是一种“暗转”，从30年代的形势要求看，这不意味着是统一战线本身的结束），而且，以同国民党保持内部合作为基础和内容的《十二月提纲》中规定的自上变革的可能性，此时已断绝；从“苏维埃”的观点看，自下变革的课题应如何掌握，还是个问题。

此时召开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1927年7月29日至8月9日），会议集中宣传了苏维埃的思想，指出，如果革命高涨，有必要将“苏维埃”作为直接斗争的口号，并着手组织工农及手工业者的苏维埃^⑤。也就是说，这种看法是以高涨的革命形势作为成立苏维埃的必要前提。因而，当毛泽东为组织秋收起义被派往长沙时，在他提出的五项要求中有一条是关于成立苏维埃的问题，据说以不具备必要条件为由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反对^⑥。

共产国际明确提出成立苏维埃的问题，是在9月以后。在与这次联席会议同期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7月28日）中，斯大林作了令人瞩目的演讲，即“因为当前发展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土地革命，中国的革命的统一，从帝国主义羁绊下得到解放）还待解决。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当然在中国也谈不上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因为只有在革命高涨的环境中苏维埃才能成立和兴盛起来”^⑦。话虽然说得婉转，但暗示出，如果出现革命高涨的形势，象这里列举的中国当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就可以通过苏维埃来完成。斯大林进而又讲道，中国革命的失

败，就其程度说来，可能类似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遭到的失败。因此，现在，在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当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即使与俄国在进行这种宣传的两个月之后便出现了高涨的革命形势不能相比——松元）。如果半年或一年后新的革命高涨成为事实，那末，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的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⑧。

国共分裂之后提出的苏维埃，如上所述，处于“宣传阶段”。要将它付诸实施，还有待革命形势出现新的高涨。在这点上，八一南昌起义和一系列的秋收起义被看作是通过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将其变为可能的革命形势高涨的契机。9月30日的《真理报》社论（转载于《国际新闻通讯》）谈到了共产国际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文中指出了以下几点^⑨：

南昌起义标志着革命高涨形势的到来。现在的领导力量是革命委员会，这是工农和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等）的革命的人民政权的最初组织。这种形式不是抽象的理论和主观的臆造，而是在斗争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它与当时的革命任务相适应（第一）。与国民党保持内部合作的时代已经过去，苏维埃的口号必然由宣传的口号发展为行动的口号（第二）。随着革命向工业中心区发展，在那里产生了建立工人、士兵、手工业者代表苏维埃的可能性，中国内部的新革命政府（各种分散的政府）在成立苏维埃时，开始可能也是以这些工业中心区为基础。在农村，农民协会发挥了革命组织的真正作用，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和委员会定会转化为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新政权的任务，是反帝革命民主专政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不是该政权当前的任务。“关于革命的任务：如果仅从社会主义的导师和领袖们的其他的或者关于以往革命的优秀著作中

加以理解，自然那是十分危险的。”（第四）

如上所述，以斯大林反复强调的形势即“新的革命高潮”为契机，共产国际明确提出了建立苏维埃口号。而且，从上述各要点可以明显看出苏维埃适用于中国革命的方面及其内容。第一，与以往的其他革命不同，苏维埃适用于中国当前的民族的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不单纯是摆脱了教条式地应用俄国革命的“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而且可以说，它虽然受到了共产国际对于“革命委员会”这一在斗争过程中产生的机关的过高评价的影响，但是也是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客观形势，特别是以农民协会为中心的旨在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运动所要求的。可以说，那正是列宁所讲的“在各个点上正确地变化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使它正确地顺应和适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异”^②。第二，利用俄国革命的经验，设想以工业中心区为主建立苏维埃。这一点与广州公社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全会上所强调的城市与农村遥相呼应的关系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与这点有关，不能断言在这个时期不存在着让城市的苏维埃运动符合“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的倾向。大概可以说，这与当初对不具有基层政权的广州苏维埃的过高评价有关^③。

斯大林暗示“苏维埃”适用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在7月末那个阶段，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提到。下面我们再来稍微详细地看一下斯大林对这一点的看法。

他首先指出，中国的土地革命这一“事业完成”后过渡到苏维埃阶段如同在俄国过渡到十月革命阶段一样，不是不可思议的，“这只能有利于中国将来的苏维埃革命。”^④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判断出两个内容：一是中国革命由工农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之际，就是向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革命转变之时；二是在工农专政时期采用苏维埃形式完成土地

革命的事业，对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革命时期来说，可以避免俄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所面临的复杂事态^②。

共产国际的方针发生转变，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③（9月19日）里。在决议中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一次提出了成立苏维埃的口号，而且在该决议中规定，八七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群众认为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同时又规定，在农村中最近期间“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仍完全有效。关于后者的背景，在该决议中包含有下述内容，即“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当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当这些中心地点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可以说，这一点正是前面提到的共产国际在第九次扩大全会之前的成立以工业中心区为主的苏维埃的反映。

比较一下当时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态度，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有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但是毛泽东和朱德等农民领袖在南昌暴动后退到农村，10月在江西省西部的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一运动及其逐渐的发展^④使共产国际联想到广东公社失败的原因，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应用“苏维埃”，不仅在理论上成立，而且在实践上也适用。这样讲并不过分。

此后，11月在广东省的陆海丰各县相继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21日至1928年2月29日）。同期（1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提出了在广州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于是，在12月11日以张太雷为主席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然而，众所周知，仅在两天之后，广州苏维埃政府便遭到了李福林和薛岳等部的攻击，被一举摧毁。尽管广州公社已在实际上崩溃了，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对此给予热烈支援。共产国际认为，

“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不朽功勋的城市广州，工人和农民掌握了政权，苏维埃的旗帜、革命的红旗飘扬在华南的首都。广州工人所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英雄主义是最伟大的事件，是在世界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事件”^⑥。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广州公社的期待是如何之大。

正好在这个时期，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五次会议（1927年12月2日至19日）。大会对与H·纽曼（当时留在中国）一起领导当时一系列起义的B·罗米纳兹的归国表示欢迎，并听取了他的报告。罗米纳兹报告说，在广州发生的各种事件，意味着“中国革命新高涨的开始”，共产国际的政策应该是为了打倒反动的国民党而采取直接武装起义的政策^⑦。然而，能够预料到的是，围绕着不久得知的广州苏维埃失败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特别是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阶级性质问题，P·米夫对罗米纳兹进行了激烈的驳斥。斯大林是什么观点呢？R·C·桑顿指出，从这个时期起，至少到1929年6月（共产国际就反富农斗争问题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止的这段期间内，对于斯大林的政策，应该从与反托洛茨基的布哈林实行联合的政策（事实上，这次大会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彻底失败的大会）这种观点来考虑，斯大林的看法并没有直接讲出，而是通过米夫来表达的^⑧。无疑，斯大林把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点上他与罗米纳兹、纽曼等人认为中国革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看法不同。桑顿进一步指出，斯大林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富农问题上的妥协（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底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中看出），也应当从与布哈林的这种关系上去考虑^⑨。

这次大会之后召开的第九次扩大全会（1928年2月9日至25日）开辟了共产国际对中国政策的重要时期。一是大会正式决定成立早已在国共分裂后的9月阶段明确了的苏维埃组织，从《十二月提纲》和《五月决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转变；二是从广州苏维

埃失败的原因和现实的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在农村）中总结出了苏维埃适用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内容。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个革命无论从经济上看（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关系），或是从反帝民族斗争上看（统一中国和民族独立），或是从政权的阶级本质上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都还没有完成。（2）波澜壮阔的工农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但是，有许多征兆表明，工农革命正在酝酿这种新高潮。可以说明这点的，首先是在许多省份里农民运动的发展（广东省许多县的苏维埃运动和该省革命运动的扩大，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满洲以及北方各省革命运动的发展）（为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有必要在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现全中国的统一，摆脱帝国主义压迫，推翻现政权，建立工农专政和成立苏维埃的基础上组织和发动群众武装起义）。中国革命在城乡发展极不平衡，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在许多省份，农民运动在向前发展，而在许多工业中心，工人运动遭到了非常大的打击，正处于相当低落阶段。（3）必须坚决反对工人阶级某些阶层中的盲动主义，反对农村中零星分散的游击战争。有必要在农村和相邻各省的城市里同时组织遥相呼应的大规模行动。（4）在农民苏维埃政权地区进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队伍。（5）广州起义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起义的领导工作有许多缺点：在工人、农民当中以及在敌军中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对参加黄色工会的工人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党组织本身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对起义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党中央完全不了解广州事件的情况；在政治上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很差（没有开展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通过选举产生起义机关——广州苏维埃）。

如上所述，特别是前面提到的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全会决议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二点，可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广州苏维埃失败的原因和结果。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缺乏自下对基层政权的支持。作为结果，可以看出城市的工人运动处于停滞状态；依据于土地革命和基层政权的农村苏维埃却在发展（1928年1月23日在井冈山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以后又扩大至各省）。其着眼点在于力戒城市与农村的盲动主义，需要在城市和农村同时组织遥相呼应的大规模行动。关于这一点，池田诚的下述看法很重要。他认为，“广东公社型”苏维埃本质上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的政权机关，同它相比，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前者后来以李立三的“长沙苏维埃”^⑧（1930年7月28日至8月5日）形式再次出现^⑨。

第九次扩大全会决议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的各项决议中得到了继承。特以前一节提到的“农民委员会”为例，在这次大会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的决议》中，已经取消了这个早已没有实际意义的用语^⑩，而清楚地写道，农民协会应该成为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的临时政府机关）的基础。而且，第九次扩大全会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又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1928年10月17日至9月1日）中得到了继承。从这个意义上看，桑顿指出，“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全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各项决议——后被修饰和渲染——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掌握政权以前所信奉的‘解放战争’的策略基础”^⑪，这种看法是妥当的。

然而，同时应该指出，这个时期的斯大林是把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置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维埃革命阶段，这个思想还必然要经过1929年以后以经济危机为背景的“革命新高涨”和引起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观点阶段，本文开头提到的苏维埃

和人民战线相结合的思想，只有在与30年代新的客观形势密切结合的过程中才能提出。

四、结 束 语

以上我们研究了可以称为集中反映共产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的《十二月提纲》的内容，考察了成立苏维埃与《十二月提纲》的内在联系，以及当时的共产国际的思想。这里还遗留着许多问题，尤其表现在下述两点：一是在论述上，在谈到日趋形成苏维埃的工农运动时，仅仅限于农民问题（或土地革命）^⑤，没有涉及到工人运动问题；二是矛盾相互交错的共产国际的政策。主要表现在：实践共产国际政策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围绕着共产国际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内所产生的意见对立；指导执行政策的共产国际代表间在分析形势方面的对立（不可否认这来源于共产国际政策本身，来源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代表所获取的情报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之，在及时反映瞬变的革命形势方面，共产国际离得太远，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加以论述。本文为避免论点的分散，舍去了这几点。因而，遗留下的这些课题乃是笔者今后的课题。

注释：

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记录》（1976年版，第984—997页）。日译本《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大月书店，1967年）。

②P·陶里亚蒂著、山崎功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大月书店，1975年）。

③在1931—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里，还没有统一战线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产生是在进入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以后。

④参照菊地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构造》（大安，1965年）；姬田光义：《中国国民革命的展开》（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西村成雄：《第一次大战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民族解放运动理论的形成》（《历史评论》，第257期）等。

⑤在第七次扩大全会记录里，尚未记载《提纲》之事。因而《提纲》的内容依据如下：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记录（1926年11—12月）》，载《国际新闻通讯》（巴黎）1926年12月9日第6卷第131期至1927年2月20日第7卷第25期。

该提纲的起草人，据说是斯大林、布哈林、布勃诺夫、罗易。另外，在1927年4月张作霖的警察搜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时所查获的文件中，除有提纲公开发表的那部分内容外，还有进一步强调国民（革命）军作用的内容（R·C·诺斯与X·J·尤丁合著的《罗易赴华使命》，1963年）。

⑥望参照本人写的《共产国际早期的民族解放理论的形成》（《历史学研究》第355期）。

⑦《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共产国际出版，汉堡，1921年，第140页）。

⑧姬田光义：《中华苏维埃的研究 绪论——国民革命时期的政权理论的形成过程》（《国际研究》第2期，1970年）。

⑨同⑧。

⑩《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第1卷。

⑪吉泽南：《二十年代广东省的农村社会与农民运动的发展（中）》（《历史评论》第247期）。

⑫同⑩，关于这个期间的展开情况，在这篇论文中讲得比较详细。

⑬小岛晋治：《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历史与民众》，1955年度历史学研究会大会报告）。

⑭毛里和子的观点是，“中山舰事件是决定国民革命后来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指出，对于这个事件的不同评价正是中国与苏联的研究家们在对待国民革命时期的问题上所出现的意见分歧（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著，毛里和子与本庄比佐子合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

⑮卫藤藩吉：《东亚政治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

吉泽南：《二十年代广东省的农村社会与农民运动的发展（下）》。

⑯《毛泽东选集》第1卷（三一书房，1966年）。

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土地政策里，并没有规定国有化问题，土地国有化政策是在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中才规定的（古岛和雄著《中国的土地革命与农民解放的实况》，山田盛太郎编《变革时期的地租分类》，岩波书店，1956年）。列宁指出，在与农奴制作斗争的民主主义运动中，要求国有化反而会减削斗争目标（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902年）。应该说，这里的规定不是当前的政策，而是作为最高纲领提出的。

⑱波多野乾一编的《中国共产党史》第1卷（时事通信社，1961年）。

⑲张希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几个基本问题

题》(《政法研究》第2期)。这个时期,即1926年11月,在湖南成立农民协会的县有50余个,县农民协会(包括筹建的)有48个,区农会有462个,乡农会有6867个,会员共达1,367,000人(福岛正夫:《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

⑳同㉑。

㉒《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第2卷。

㉓同㉑。

㉔直笏:《湖南农民革命的追述》。

㉕同㉑。

㉖吉泽南:《二十年代广东省的农村社会与农民运动的发展(下)》。

㉗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9卷)。

㉘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未载于议事记录和速记录中,因而根据如下: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12月23日)、《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第2卷、《斯大林全集》第8卷。

㉙“农民委员会”这一用语是列宁提出的,主要是为了对抗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贵族委员会的。

㉚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9卷)。

㉛斯大林:《论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基本口号》(《斯大林全集》第9卷)。

㉜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列宁全集》第6卷)。

㉝列宁:《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案的报告》(我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列宁全集》第8卷)。

㉞列宁:《国会的解散与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列宁全集》第11卷)。

㉟与㊱同。

㊲《毛泽东选集》第1卷。

㊳《乡村自治问题决议》。

㊴福岛正夫:《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

㊵斯大林在1927年3月写了《论工农政府问题》(《斯大林全集》第9卷)。这表明斯大林对于列宁在1917年9月以后将苏维埃政权称为“工农政府”这一观念的充分理解。即,斯大林在这里要求把政权与政府区别开来,他认为,列宁将具有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苏维埃政权称为工农政府,并非用“工农”政府这一表现形式去表现它的阶级性质的内容,而似乎是要表现俄国这样的农业国通过工农联盟(工人掌握领导权)的形式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阶级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因而,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必须改变其政策。可以说,这种议论显然是要求武汉政府作为农民委员会(工农专政)实现的方法、手段而存在,并且想使武汉政府根据工农的要求实行政

编。

③托洛茨基的论调，在第八次扩大全会时及其以后有若干微妙差异，还不能说他把革命的主要任务始终放在关税自主权斗争或是土地革命（它们相互间的逻辑关系不太明确）上。但是他已经把中国革命当作无产阶级专政来看待。尽管有必要研究共产国际反对派的见解，但因篇幅有限，这里就不能充分展开了。

④《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年6月16日）。

⑤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⑥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9卷）。

⑦《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同上）。

⑧《时事问题简评》（同上）。

⑨《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同上）。

⑩《中国革命问题》（同上）。

⑪同⑩。

⑫《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同上）。

⑬《中国革命问题》（同上）、《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同上）。

⑭斯大林说，组织苏维埃首先意味着脱离国民党，而且意味着当时已转变为象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左派所结成的那种外部合作。

⑮《中国问题决议案》。

⑯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答马尔秋林同志）（《斯大林全集》第9卷）。

⑰《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同上）。

⑱在俄国，县和郡成立农民代表苏维埃是在1917年5月以后（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然而它们所代表的是处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影响下的农村资产阶级，列宁强烈主张成立与此有别的贫雇农苏维埃（它是指革命后的1918年6月的“贫农委员会”）。也就是说，在俄国，农民代表苏维埃在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协助下，按照全国一县一郡一乡一村等行政单位的自上而下的系列组成（乡、村一级是在革命后），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大崎平八郎：《苏维埃土地政策史》，有斐阁，1960年）。

⑲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⑳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

㉑罗易在这个时期的著作有：《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我在中国的经历》。供研究的书籍有R·C·诺斯与X·J·尤丁合著的《罗易赴华使命》，拙著《〈十二月提纲〉与M·N·罗易》（研究参考书）（《一桥论丛》65—5）。

㉒R·C·诺斯与X·J·尤丁合著《罗易赴华使命》（此处有误，应为1926年）。

⑤⑨《土地问题议决》、R·C·诺斯与X·J·尤丁合著《罗易赴华使命》、《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第3卷。

⑥⑩同⑤。

⑥⑪R·C·诺斯与X·J·尤丁：《罗易赴华使命》。

⑥⑫同上。

⑥⑬N·布哈林：《中国革命的急剧转变》，载《国际新闻通讯》第7卷第44期（1927年7月28日）。

⑥⑭N·布哈林：《中国革命的急剧转变》，载《国际新闻通讯》第7卷第41期（1927年7月14日）。

⑥⑮福岛正夫：《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另，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的演说被收入《斯大林全集》第10卷内。

⑥⑯斯诺著、宇佐美诚次郎译：《西行漫记》（筑摩书房，1952年）。

⑥⑰《斯大林全集》第9卷。

⑥⑱同上。

⑥⑲参照《中国革命的任务》（1927年10月6日）。另外，关于南昌起义，望参照姬田光义的《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考察》（《史潮》101）。

⑥⑳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

⑦①这里必须考虑到共产国际代表基于主观分析得出的情报，以及（桑顿在论述李立三路线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共产国际在中国事件发生之后的三至六个月已得知那个事实。R·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1928—1931年》（华盛顿大学，1969年）。

⑦②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

⑦③如注所述，在俄国，十月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必须同时解决土地问题，因此造成了不得不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权力称为工农政府的复杂事态。由此可以推断，在工农专政时期采用苏维埃形式，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会对“中国将来的苏维埃革命有利”。

⑦④《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第3卷。

⑦⑤大约到1930年为止，已有11个省成立了这种农村革命根据地。池田诚：《中国现代政治史》（法律文化社，1962年）。

⑦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广州事件的呼吁》，载《国际新闻通讯》第7卷第72页（1927年12月22日）。

⑦⑦R·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

⑳R·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

㉑同上。

㉒《中国问题决议案》（1928年3月15日），起草人为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立三。

㉓关于李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1928年以后，后者是将斗争的中心放在农村，而前者是将重点放在城市暴动，前者脱离了后者的政策。把二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进行详细记述的，是前面提到的桑顿著作，该书又从同一观点研究了“长沙苏维埃”问题。

㉔池田诚：《中国现代政治史》。

㉕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仍然使用了这个用语。这可以看作是共产国际文件继承了过去的用语，而且它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支柱的一般代名词而使用的。

㉖R·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

㉗在这种场合，不仅要求运动论，也要求立足于分析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观点。

（译自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8月20日出版的
《中国近现代史讲座》第5卷）

西安事变考

——关于莫斯科与中共的关系

[日] 石川 忠雄

张惠才译

一、问题之所在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西安监禁了蒋介石，这就是所谓的西安事变。这一事变促使蒋介石改变了以往那种在“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指导下、以“剿共”为抗日前提的对中共的态度，导致1937年8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它成为历史性转折点的重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本来，西安事变，是以由于日本的侵入，中国抗日运动发展和绥远事件的发生为背景，与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国共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产生共鸣的东北军和西北军针对蒋介石搞的一次“兵谏”。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和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之间已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和西北军有极大的影响，这都是不容否认的。

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制定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政策时，苏联或共产国际与此有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是基本上不提与莫斯科的关系，认为这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决定的。波多野乾一著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史》、中西功、西里龙夫合著的《中国共产党与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中国和西欧的文献就是这个观点，确实持这种看法的人相当

多。与此相反，还有一种见解，如《对华白皮书》上写道：“蒋介石被监禁之后，中国共产党接到派代表去西安的邀请，起初赞成杀掉委员长，后来显然又按照莫斯科的指令改为执行救命政策了，中国共产党根据莫斯科的指令，试图促进与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结成统一战线。”由此可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基本政策是由于莫斯科的干预才决定的。草野文男著的《支那事变史研究》，戴维·达林著的《苏俄与远东》和程天放著的《中俄关系史》等书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不过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多。这个问题至今依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应该说无论对理解作为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的西安事变的性质，还是对搞清中国共产党当时与莫斯科的关系，这个问题都是值得提出的重要问题。当然，有关这一问题的史料并不充分，问题本身也相当复杂，要搞得清清楚楚实属不易。本文只是以现有史料为基础，对莫斯科在西安事变中对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所起的作用做一番探讨。

二、莫斯科对中共和平解决政策影响一说的论据

首先，应该研究一下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是受莫斯科的影响而确定的这种见解的内容及其论据。

从总体上看，西安事变对苏联来说，也同对中国共产党一样，是极其重大的事件。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由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和日本在亚洲的侵入，苏联认为这对他们的存在是一种威胁。因此，为了对付这种局面，1935年7月至8月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结成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方针。可是，日本和德国又于1936年11月在柏林签署了“日德防共协定”，“斯大林非常担心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久会用来粉碎苏联”（程天放：《中俄关系史》）。为了避开这种危险，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停止内战，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而在实现这种全中

国的统一方面，蒋介石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对蒋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此，他们认为如果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杀，中国势必再度陷入混乱，而且有可能把一致抗日的中国引向内战的深渊。这显然与苏联的亚洲政策背道而驰。

所以，苏联对西安事变极为关注是很自然的，向中国共产党阐明他们对处理西安事变的见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过，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材料非常少。在认为莫斯科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见解中，我想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首先是达林的看法。他认为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支持西安的叛乱行动。当时没有时间与莫斯科商量。”莫斯科断定，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引向内战的一个阴谋，并在12月14日的《消息报》上谴责张学良，文中写道：“无论在是什么样的口号和纲领下发动的西安叛乱这一行动……不仅对南京政府，而且对全中国都是危险的。虽然张学良举的是反日旗帜，但是他的行动显然只能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我们认为只要南京政府采取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政策，那么抗日人民统一战线就意味着由全体加盟者组成，它不是反对南京的战线，而是与南京一起战斗的战线。”显然，这种见解是在暗示应该释放蒋介石。达林认为，“由于莫斯科的这种立场，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改变其方针，……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莫斯科的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恐怕算是救了蒋介石一命。”（戴维·达林：《苏俄与远东》）另外，程天放也记述道：“同外部世界一样，政变的消息也使共产党震惊。最初他们从中看到了报仇的机会，为了杀掉蒋介石，保安广播电台要求由人民审判。然而，莫斯科不久便出来干预，中共不得不完全改变态度。”作为“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只是让中国共产党说服张学良释放委员长”的论据，除了举出达林提出的《消息报》上的报道之外，还引用了《对华白皮书》上记载的一节赫尔利将军同莫洛托夫会谈记录，即“由于苏

联政府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援助，蒋介石得到允许恢复其政府的地位。”韦文起还举出了埃德加·斯诺的见解：“苏俄的态度给西安事变的迅速解决带来了影响，莫斯科对使蒋介石恢复政权地位的和平解决方式十分满意，这是勿容置疑的。”（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同时，他也引用了《对华白皮书》中的上述那段话，以此说明苏联干预了西安事变（韦文起：《中国与苏俄》）。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作为莫斯科在西安事变中对中共影响一说的论据有以下三条：（一）《消息报》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道；（二）莫洛托夫对赫尔利将军的谈话；（三）事变发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想杀掉蒋介石的说法。在我看来，第一个论据（与《消息报》的同一天，《真理报》也发表了同样见解）只能表明莫斯科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向，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莫斯科在中国共产党决定西安事变的基本政策时起了决定性作用。当然，草野文男先生曾引用一位“通晓此事的中国人”的话说，

“当时在中共中央，也有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应该把活捉到的蒋介石杀掉，坚决抗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也基本上支持这种做法，但那时突然从莫斯科发来塔斯社的新闻稿，是以新闻形式拍发给中国的，电报暗示中国共产党应该送蒋介石回南京，把时局引导到以蒋为中心的全面抗战中去，这才是上策。因为那时莫斯科与延安之间还未建立联系，……所以是以新闻形式把共产国际的意向反映给延安的。……中共中央立刻领会了新闻稿的意思，于是便转向拥蒋抗日的路线。”草野文男先生认为，莫斯科通过新闻传递，间接对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起了重大影响。不过，我看这份材料有不少疑点。这是因为（一）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来到陕西苏区时，“共产党同中国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天津等处，都有无线电的交通。”（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张国焘也证实，“在西安事变中，斯大林曾打来电报表明了他的见解。”（三）埃德加·

斯诺在其另外一本书中也提到斯大林在西安事变期间直接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这一事实。因而，如果这种见解——莫斯科与中共直接接触说——是正确的话，那么第一个论据就不能作为莫斯科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基本政策时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一见解的证据了。

关于第二个论据，即莫洛托夫谈话中的“由于苏联政府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援助(due to the political and moral support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这一表达方式，显然意味着“让蒋介石恢复其政府的地位”是因为莫斯科努力的结果。这表明在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做工作时，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政策尚未确定下来，或者其政策与莫斯科的和平解决方针完全相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在那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已经确定。而且确定的政策与莫斯科的见解一致的话，那就不能使用“由于(due to)苏联政府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援助”这种表达方式了。可是，如上所述，不能认为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完全没有确定，或者没有讨论，应该认为中共的见解与莫斯科的立场相反，换言之，是杀掉蒋介石的说法或者近似的立场。因而，为要了解莫洛托夫的谈话是否能作为莫斯科对中共影响一说的论据，就需要搞清楚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初，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是否持不同的见解。自然，这个问题应该归到第三个论据的研究上。

第三个论据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初采取杀掉蒋介石的说法。如果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莫斯科接触后改变了方向，那确实可以成为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一见解的重要论据。张国焘1950年在香港同罗伯特·C·诺斯等人会见时说：“在西安事变期间，斯大林没有特别的劝告或命令，只发来了不过是表明他的意见的普通电报。……党中央非常认真地讨论了斯大林的电报，认为必须据此做出同样的决定。”他强调电报是从莫斯科直接打来的，而且，中国共产

党是把它当作非常重要的指示对待的。”张国焘在1939年发表的《告国人书》中讲道：“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的中共领导人虽然提出了动感情的带有煽动性的主张，……但是后来确立了和平方针……。”由此判断，他依然站在第三个论据的立场上，即由于莫斯科的直接干预，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政策。

然而，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共产党在同莫斯科直接接触之前，作为一个党果真采取杀掉蒋介石或者与此近似的立场了吗？如果不是那样，即使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政策与莫斯科的见解一致，在中共内部也曾讨论过莫斯科的见解，那也不意味着莫斯科在中国共产党决定政策时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同莫斯科接触之前，对西安事变持什么样的见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与对蒋态度的变化

西安事变发生不久，即在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之前，党中央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采取了什么样的处理方针？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况有许多不明之处，现有的一些资料往往又互相矛盾，想找到准确的史料实在困难。因而，要弄清楚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态度，最基本的方法首先应该弄清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前，作为党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对蒋介石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因为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是在共产国际的世界政策发生转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最根本性课题，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特别是对成为这个问题核心的对待蒋介石的方针，会给他们对西安事变的处理带来重大影响。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采取。一是根据党的宣言和其他文献，研究“八一”宣言发表后到西安事变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

政策上的变化，其中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对蒋态度为中心；二是根据事实证明统一战线政策的变化，弄清楚西安事变发生时共产党对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态度。下面我准备从这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从苏维埃革命时期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政策上转变的起点是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把“八一”宣言看作是完全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似乎还有些问题。这里暂且按照一般的说法，对“八一”宣言和党的主要文件做一番研究。

“八一”宣言首先阐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近年来我国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接着又指出：“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并号召集结一切抗日势力，成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八一”宣言号召中国的一切抗日势力，甚至包括正在交战的国民党军队，结成统一战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向作为党的国民党——不是国民党军队——和蒋介石呼吁结成统一战线。就是说，这个宣言对国民党仅仅是号召“国民党及蓝衣社中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其对象仅限于国民党中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而不是号召全体国民党共同抗日。而且，

在宣言中还把蒋介石，也包括阎锡山和张学良称为“卖国贼”，进而号召一切抗日势力“同时奋起，摆脱日寇及蒋贼的残酷压迫……”这就表明：“八一”宣言并没有把蒋介石当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成因素，相反看成是敌对因素。换言之，这里提出的统一战线是“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

同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即“十二月决议”，也贯穿着“八一”宣言的立场。这个决议确定了在当时的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关于统一战线的阶级成分问题，决议中写道：“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在他们对于反口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进而又号召把这些势力集中起来，成立国防政府，使它成为“全中国反日反卖国贼联合战线的政权组织，还要成立抗日联军，使它成为“反日反卖国贼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机关”。同时决议中还表明了如下的意思：将“工农苏维埃”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其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作部分修改，以适应抗日运动的发展。可是，在这个决议中，作为党的国民党，被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对蒋介石依然采取强硬的敌对态度。决议写道，“党的策略方针是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当时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联合起来，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要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下层和上层的），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确，如李致工所说，“当时中央虽然主张停战抗日，但

是却把反蒋和反日并列地提出来，认为蒋委员长的在位是抗日的障碍。”（李致工：《中国共产党史略》）。对蒋介石这种敌对态度也明显地表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于12月27日在同一个瓦窑堡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毛泽东所做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讲道，在日本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危机时刻和民族工商业面临破产或半破产的威胁下，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或采取中立态度，“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虽然同意让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但是蒋介石不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说，“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个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这种态度，在1936年5月5日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开始变化了。关于这份通电，何干之在《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一书中写道：“向南京政府进言，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三省停止内战，双方派遣代表，共同磋商救亡的具体办法，并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出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和监视这个主张的完全实现。”表明党一方面争取蒋介石集团，让他们加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和行动，采取了所谓逼蒋抗日的政策。换言之，可以说已从原来的反蒋抗日转变成把蒋介石当作构成因素的统一战线政策。作为这一政策的转变理由，何干之和《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都写道：“在此以前，蒋介石正继续出卖东北和华北，因此，党中央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但是由于日本在华北的进攻和英美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同英美利益有密切关系的蒋介石集

团，可能在美英政府的指使下改变它的对日态度，因此党中央这个通电采取了逼迫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这样看来，在5月5日的通电中，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态度变化一事以及上述提到的理由，现在已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承认。此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政策转变的背景，正如陈绍禹所指出的那样，“八一”宣言以后，抗日运动迅猛发展，抗日团体相继成立。尽管如此，统一战线的“主要弱点是大部分国民党军队还未吸引到全民斗争中来，时至今日，还处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影响下……，虽然国民党内存在对立，但是这种对立还不至于使国民党造成分裂。”（波多野乾一：《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年史》）因而，要想加强统一战线，无论如何也必须把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吸收到统一战线中来。然而，从1936年6月西南事件的处理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越来越巩固。“如果不削弱国民党和中央军的力量，把他们拉到抗日一边来，或者说为了避免国民党内顽固反共分子的扰乱，使国民党及其军队和平地转向抗日和革命一边，这就需要把握住蒋介石。”（中西功、西里龙夫：《中国共产党与民族统一战线》）恐怕这一事实也是不能否认的。

5月5日通电中表明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态度变化，清楚地反映在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这封信一方面痛斥国民党还在继续采取同共产党打内战的政策，还认为“最近外交的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另一方面又针对蒋介石，指出：“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进而要求遵照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实践抗日事业。信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地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第一次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

日救国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已把国民党和蒋介石考虑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成因素，强烈要求他们参加统一战线。在这封信里，蒋介石已不是“卖国贼”或“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的大头子”了，而被郑重地称为“蒋委员长”，可以说这也是共产党改变对蒋态度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表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9月17日，发表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进一步明确地解释了信中的宗旨，这里我想再引用一段对国民党的决议，可能就更加充分了。“然而由于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还不够广泛，它的力量还不够雄伟，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有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时还仅在开始的阶段，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及其领导与影响下的军队还没有参加这个战线，国民党的政策还没有基本的转变，因之，民族革命战争还没有能够发动，……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1936年5月以后，放弃了反蒋抗日的方针，认为蒋介石及国民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缺少的因素，采取的立场是通过让他们参加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不仅承认缺少国民党及国民党军队参加的统一战线是脆弱的，不把蒋介石争取过来，只让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参加统一战线是极为困难的，而且认识到在缺少蒋介石的国民党内部有很大可能引起混乱。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变化。

四、证明对蒋态度变化的历史事实

下面应该弄清楚的问题是，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和蒋

介石的关系上发生政策变化的事实是否存在。

与这一点有关，首先一个问题是促使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变化的直接契机。现在有两种说法。一是根据日本外务省丸田翻译的调查，他写道：“中共党……在1935年8月1日的所谓“八一”宣言乃至接着发出的反蒋抗日的指示中，以反蒋抗日为主要口号来煽动抗日……该政策在抗日运动问题上，刺激了国民党乃至官吏们，有可能妨碍抗日战线的结成，同时也与人民战线的理论相矛盾。中共党认为，这对最终实现国共合作的目标不利。于是，1936年夏，一改原政策为“逼蒋抗日”政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北方局承认了上述矛盾，向中央呈报了变化之策，中央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政策变化……”由此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从“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是在1936年夏根据北方局的启发实现的。北方局的这种见解是“受以北平方面为中心的学生联合会乃至教授团或文化救国会方面的意见所左右的。”（波多野乾一：《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史》）

另一种说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变化是由于张学良的说服工作比较有力的缘故，这是赵廷华和苗剑秋等人的看法。在这两个人提供的材料中，多少有一些不一致之处。赵廷华在《十年来中国的红军》一书中写道：“民国二十五年夏，张学良在肤施正式同周恩来会见，并讨论了张提出的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蒋委员长与抗日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采用法西斯主义方法谋求中国的统一，……当时共产党的抗日依然是‘反蒋抗日’……认为不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便无法抗日……。张的见解是，要抗日就必须‘拥蒋’……张把他知道的关于蒋委员长的苦心计划和准备情况告诉了周，这给周以很大影响……中央政治局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引起了很大争论，最后参考了张学良提供的新情况，在对国内外的总形势进行分析研究之后，认为需要由‘联蒋’发展到‘拥蒋’。”苗剑秋在《世界周报》第35卷第25号上发表的《周恩来其

《人与外交》一文中写道：“8月10日前后，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张先生前往延安附近的肤施，同周恩来秘密会见。……迎接张先生的的是周恩来、彭德怀和秦邦宪。……张向周发问：‘真想抗日吗？’周回答：‘当然真的喽’。张又问：‘打算采取倒蒋抗日的方式吗？’周回答说：‘是的’。于是张立刻说：‘那么，是放我还是杀我，就请便吧’。周急忙反问道：‘为什么？’张说：‘你们的抗日也好，蒋委员长的攘外（抗日）也好，都是以倒蒋啦，安内（剿匪）为附加条件，那我就没有真心实意的伙伴了。因为日本军部是不会坐等倒蒋和剿匪的……’说完，由于张对民族的悲惨命运十分悲痛，竟大哭起来。周先生也感动得落了泪，他问张先生：‘你看怎么办好啊？’张先生答道：‘只有在拥蒋抗日路线上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场的中共大人物们显露出不快和怀疑的表情，并为之一笑。只有周恩来温和地说：‘拥蒋，那在感情上通不过哟。’于是，张立刻说：‘那么，用联蒋总可以吧？’周没有请示毛泽东就答道：‘好。’这样，张肩负着‘联蒋’的重任返回西安。”这两份材料的共同点是，都讲张学良在肤施会见了周恩来，而且张学良的见解给了周恩来以影响，共产党放弃了“反蒋抗日”方针。二者的不同点是，赵讲：“认为有必要从联蒋发展到拥蒋”，与此相反，苗说：“不是‘拥蒋’而是‘联蒋’”。在会见时间上也有不同，赵只讲在夏天，而苗说在8月10日前后。对于“联蒋”和“拥蒋”的不同，从上述党的文件判断，恐怕“联蒋”一说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在这次会见中放弃了“反蒋抗日”方针，把蒋介石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因素，只是对张周二人会见的时问遗留了些问题。究竟张学良与周恩来是什么时候直接接触的，众说纷纭，很难确定。如贝特兰说是1936年6月；小竹文夫和草野文男两位先生认为是1936年春；蒋介石说：“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大致采取6月说法。另外，埃德加·斯诺对具体时间没有明讲，但从文

章中判断似乎在1936年初。这些未必与赵廷华和苗剑秋两位先生的见解一致；究竟哪个是正确的，现在还没有资料可以证明。但如果把埃德加·斯诺和小竹、草野两先生的看法除外的话，很明显，其他人都认为是1936年6月以后。如果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蒋态度的转变是在6月以后的话，那么，这一事实与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抗日”口号的1936年5月5日“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对这一点深表怀疑，而且解释不清楚这段时间的情况。另一方面，对于赵廷华的经历，不大清楚，但是苗剑秋作为张学良的智囊团成员，起着政治顾问的作用，是一位与西安事变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不能说他的材料全是假的。因而，可以认为苗和赵的这种说法至少在西安事变的当时，是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争取蒋介石结成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牢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主张的证据。

关于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写道：“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收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潘汉年乃即来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一、遵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他们终于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作最后之核示。”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前已经准备接受国民党方面的条件，在国共间结成统一战线。不言而喻，这种统一战线将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承认，而且在统一战线里包括有蒋介石。1936年10月，正当国共间还在进行谈判之时，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目前正在进行谈判。虽然共产党对于劝说南京抗日并不

存多大希望，但是可能性还是有的。只要有可能性，共产党就愿意在一切必要措施方面合作。如果蒋介石要想继续打内战，‘红军也奉陪到底。’（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这应该是属实的。

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时，已经想通过争取蒋介石来结成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了。

五、结 束 语

西安事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这种突发性事态的出现，给中国共产党员带来很大冲击，这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他们经历了多年的内战，在感情上憎恶蒋介石，要使全体党员彻底理解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对蒋态度的转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初，在他们中间，甚至在党中央里出现杀掉蒋介石的说法或近似的见解，当然是不足为怪的。不过，由此便笼统地断言作为党的方针，中共中央采取了杀掉蒋介石的立场，我认为这恐怕是危险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就认识到如不把蒋介石争取过来就很难让国民党参加统一战线，同时他们不仅把结成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基本方针，而且如前所述，国共间建立统一战线的协议已经完成，这个协定就等着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后签署了。换言之，共产党主张的统一战线正处于即将完成的阶段。如果党中央在这种形势和对蒋态度发生变化这种条件下，考虑处置蒋介石的话，那就很难想象会决定杀掉蒋介石。当然，如果他们是在清算以往的路线之后考虑处置蒋介石的话，作为党中央的方针倒有可能采取杀掉蒋的办法。然而，这意味着把长期准备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引到十分危险的境地。因此，我认为石友李所说的“事变当夜，张学良和杨虎城发急电给中国共产党，请求援助。党中央复电说明，务必保护蒋介石的性命”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另外，莫斯科对西安事变的发展极为关注，他们给中国共产党打电报希望和平解决事变，这也是事实。正如张国焘在回忆中讲的，不能认为当时莫斯科已经失去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特别是心理上的影响。可以认为，作为莫斯科的这种意志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西安事变对策时受到了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种完全无视莫斯科影响的见解，恐怕是错误的。然而，如前所述，如果共产党中央是沿着从前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路线来处理蒋介石问题的，那就很难想像他们在事变发生的当初打算杀掉蒋介石。假如这种见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在西安事变期间，莫斯科所起的作用是给了中共中央在事变处理方针上以更大的信心，而不是象《对华白皮书》上所说的“显然又按照莫斯科的指令改为执行救命政策”那样，起了决定性作用。

（节译自石川忠雄著《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庆应通信，1984年版）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 工人运动的结合问题

(1917—1921)

〔苏〕A·И·卡尔图诺娃、E·Φ·科瓦廖夫

马 贵 凡 译

译者按：70年代以来，苏联史学界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问题展开了讨论，结果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只是“在中国为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居少数。本文即是这种意见的代表作。文章原载《苏共历史问题》1974年第8期。作者A·И·卡尔图诺娃系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历史学博士，E·Φ·科瓦廖夫系苏联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博士。文章论述了1917至1921年间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文章认为“中共一大证明‘党的成立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为便于我国史学工作者了解苏联学者如何论证这一问题，兹将此文译载于后。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地反映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唯一理论，从它宣告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变革中起决定性作用之时起，它的核心即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就开始遭到资产阶级和小资

产阶级思想家以及修正主义者的猛烈攻击。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是这个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机会主义者也极力要推翻这一在列宁的著作中得到充分论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

资产阶级史学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政治危机中受到鼓舞，他们在坚持所谓中国发展道路特殊，中国的发展离开了一般历史发展规律的这种观点的同时，一再试图以中国现代史为例，推翻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作为证明中国不存在这种结合过程的主要论据之一，他们制造了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工人阶级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极其落后，因此它在思想上不可能达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思想的高度。

资产阶级史学界夸大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在组织上的松散性，认为它仅仅是名称上和形式上的共产主义运动，而不是实质上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标志。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尊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和发展这个事实，于是他们宣称共产主义运动是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国的。而且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推断，“强加”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很大矛盾，因此它不适合中国国情。他们认为，作为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反应，在中国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的共产主义”，其表现形式即是似乎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思想”。

在西方，有不少著作持这种观点，而且有的著作说，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是同工人运动而是同农民运动结合了。R·加罗德就坚持这种看法^①。H·C·登克斯和S·R·施拉姆则试图证明毛主义正确，试图为毛泽东的观点找出“马克思主义的根据”^②。他们曲解列宁对苏尔坦-扎杰论东方社会革命前景的报告（1920年7月）所作的评论，声称在理论上，毛的“农民共产主

义”是以列宁的评论为依据的，列宁的评论开辟了“最终必将导致产生毛泽东的农民共产主义”的方向。

可是列宁对苏尔坦-扎杰报告的评论并没有给登克斯和施拉姆作出这种论断提供任何根据。列宁强调说，在东方各国，大部分居民是“受中世纪式剥削的农民”，而在这些国家的工业部门是小手工业者。据此他得出结论说，问题的实质在于必须“使苏维埃机关和共产党（它的组成和它的特殊任务）适合于殖民地东方各农业国家水平”^③。从列宁的评论的实质含意中，即从必须使政治组织和共产党适合于殖民地东方各农业国家水平的要求中，怎么能够得出这种论断呢？实际上根本得不出这些国家必然要按照“毛泽东的农民共产主义”道路发展的结论。相反，十月革命后的历史经验证实了列宁关于“东方最终要走上西方的道路”和殖民地国家有可能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道路发展的思想。资产阶级史学界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经济特征绝对化了，片面地迎合毛派说法，认为中国现代革命是纯粹的农民革命，贬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承认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

至于毛派史学界，他们则试图否认和抹煞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客观结合过程。在一种场合，他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取而代之（不是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在另一种场合，他们承认中共是“工人运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的产物”，但武断地把这种结合仅仅归结到毛泽东的活动上，断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质上只是由于毛泽东走上中共领导岗位的1935年，似乎从这时起党的路线才是正确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971年7月1日刊登的一篇纪念中共成立五十周年的文章中说，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结合的产物”，但未指出，这种运动是什么性质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民族解放性质的，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

可见，毛派史学界和资产阶级史学界在客观上一致否认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

谈到苏联历史著作，应该指出，近年来是增加一些关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研究性著作和文献资料，也就是说，是充实一些与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过程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性著作，但是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专门论述。

本文仅试图对1917至1921年间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作一探讨。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的客观有规律结合过程的出现，要求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要有“物质因素”，即一开始进行“处于自觉性萌芽状态”的自发性群众斗争的工人阶级；第二，要有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无产阶级中间去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④。

19世纪40年代，继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外国列强开始在中国建造第一批工厂。从这时起，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开始形成。自19世纪6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渐渐得到发展，同时出现了中国第一批工业无产阶级队伍，但这时的无产阶级还是“自在的阶级”。

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约有250万工业无产阶级，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5%多一点，这时在中国城市手工业企业里做工的工人已不少于1200万，而整个雇佣劳动大军约有5000万人，其中有不少于3000万人从事农业^⑤。这些数字说明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一定的发展，同时也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对立面——工人阶级在成长。但总的说来，中国还是一个工业水平很低、半封建残余在其社会经济结构中占居统治地位的半殖民地国家。

中国的殖民地工业主要集中在几个沿海大城市，为少数外国

资本家所垄断。中国殖民地工业的发展使中国无产阶级高度集中在一些大企业里，这对提高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自我意识和加强其组织性很有利。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集中的最大中心是上海。这里有工人50万，加上几个工业有一定发展的郊区，则约有工人100万。中国东北三省约有工人60万，武汉约有40万，天津约有30万，香港约有25万，广州约有10万^⑥。

1914至1920年间，在拥有500名工人以上的599个企业里做工的工人就占工人总数的85%，20年代上半期，上海英国浦东烟厂有工人1万多名，英国人开的老怡和纱厂有工人7500名。20年代初，中国大工业企业之一，萍乡安源煤矿有矿工1.2万名，而在由唐山、赵各庄、临西、马家沟和唐家庄五个煤矿组成的开滦露天煤矿已有矿工约5万名^⑦。

工人阶级的部门结构是说明其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20年代初，纺织、卷烟、食品等轻工业工人在数量上居首位，其人数从95万人到105万人，约占工人总数的49%。人数最多的工人阶级队伍是纺织工人，约有70万人。采矿工人、冶金工人和运输工人的比重也很大，采矿工人和冶金工人占工人总数的35%，运输工人占10-12%。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业工人约占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总数的2%^⑧。

基于“世袭”工人的比重很小，特别是在不需要很高专业技术的轻工业部门。这里的工人队伍主要是靠合同工、农村妇女和童工来充实。其中许多人在合同期满后回到农村。

封建领工制、工人合同制和其他制度的存在，使工人阶级受到难以忍受的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工人们每日工作10至18个小时，而且没有假日，他们得到的工资却是世界上最低的。他们几乎全都是文盲，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在外国人企业里备受歧视，得不到劳动法保护。

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致使工人采取了行动，但是工人的大多数行动都未超越要求提高工资和抗议残酷虐待的范围。列宁深刻地揭示了自发性运动的弱点和不足，以及它们所造成的危害，并向共产党人指出把自发性运动提高到自觉性运动的必要性。列宁十分重视群众革命斗争自发性高涨的种种细微迹象，他认为，“运动的自发性是运动深入群众、运动根深蒂固、运动不可避免的标志”。是革命有根基的标志^⑨。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到1911年，中国发生105次自发性罢工。这以后八年，即从1912到1919年，发生196次自发性罢工。1918至1922年间的罢工情况列表如下：

年份	罢工总次数	知道参加人数的罢工次数	参加罢工的总人数	参加每次罢工的平均人数	知道罢工的次数	罢工天数	每次罢工的平均天数
1918	26	12	6455	538	15	124	8.27
1919	66	26	91520	3520	52	294	5.65
1920	46	19	46140	2428	22	157	7.14
1921	49	22	108025	4910	21	155	7.38
1922	91	30	139050	4635	54	452	8.37

此表说明1918至1922年间的中国罢工运动具有群众性，如1919年，每次罢工的平均参加人数是3520人，1921年是4910人。1921年6月14至17日在广州发生的机工罢工，参加人数竟达1万多人，而且罢工时，粤汉、广九、广三三条铁路上的机工行动一致^⑩。

在罢工斗争中，纺织工人罢工次数居首，采矿工人、冶金工人、铁路工人和城市公用事业工人先后都举行过罢工。

中国工人集中在大工业中心和港口，基本上都是在外国人开办的企业里做工，他们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应很强烈，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时期（1919年5月4日至6月28日），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导致五四运动的外因，是巴黎和会决议，该决议损伤了中国国家主权。）在这次运动中，城市中小资产阶级通过其来自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思想家扮演了领导角色，但是不坚决，不彻底，这次运动的主要特点，是上海、无锡、芜湖、镇江、松江、杭州、济南、威海卫、宁波、厦门和中国其他城市的工人都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反帝（主要是反日）爱国罢工运动^①。连国民党右翼分子戴季陶1919年6月22日在上海同孙中山谈判时都承认：“工人直接参加社会政治运动的时代已经开始。”走在罢工队伍前头的是上海无产阶级。罢工倡导者多数不是来自学生当中的积极分子，而是来自工人当中的积极分子^②。中国工人阶级支持学生和商人提出的反帝爱国口号，同时它表现出自己是一支比运动的其他参加者更为坚决和更为彻底的革命力量。如上海《申报》1919年6月10日报道说，沪宁、沪杭铁路举行罢工，回击外国管理人员作出禁止罢工的规定，铁路工人声明说：“我们工人也是民族的一部分，这次罢工是我们民族的名誉和良心问题。我们支持学生和商人提出的关于惩办掌管铁路大权的卖国贼曹汝霖的要求。不完全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绝不复工。”就是在经过长时间谈判答应给罢工工人支付三个月工资之后，机车司机也未同意复工，而且还中止了谈判。

工人们参加五四运动，学到很多东西。在1920年，他们的顽强斗争精神就已经证明，过去的一年对他们来说没有白过，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上海、苏州、芜湖、杭州、镇江、南昌、唐山、汉阳、九江、松江及中国其他城市工人举行罢工的原因是生活费用上升，参加罢工人数约5万人。

1920年以前，中国没有阶级工会，尽管有专门技能的工人曾

试图建立这种组织。如1913年，汉阳成立了翻砂工人联合会，1918年，长沙成立了印刷工人联合会。1918至1919年，在华南，主要是在广州，曾按英国工联模式建立一些工会，其中最大的是广州中国冶金工会。该工会在中国许多城市设有分会，会员约有15.6万人。1920至1921年5月，该组织在广州先后领导三次罢工行动，使工人工资提高32.5%，并为部分机械工人争取到8至9小时工作制。广州、香港和汕头的海员工会组织得较好，有会员1.2万人，总部设在香港。此外，还存在一些基尔特式的联合会，到1920年有会员约2000万人，但是这些组织同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的工会组织有很大距离。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集中程度、结构、社会经济状况和自发性罢工运动等因素，对于其形成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都还不能说明脱离国际形势、以阶级为基础的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原因。这种说明只能从这样一句话中找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⑤。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新的国际形势下，在中国与苏俄直接接壤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这种性质不能不使自己感觉到有一种特殊的力量。俄共（布）认为，扩大和加强苏俄劳动人民同外国劳动人民之间的国际联系和对侨居在苏俄领土上的外国劳动人民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具有巨大意义，因此它在旅居俄国的华侨当中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旅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全俄华工联合会的活动、中国劳动者参加苏维埃共和国抵抗武装干涉者和白匪的斗争行动、中东铁路线上俄中两国工人的联合斗争，等等，对中国工人也产生了革命的影响，而且为苏俄战斗过的中国劳动者返回中国，带去了关于苏俄工人阶级历史功绩的生动语言。

所有这一切都为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发

展规律。其表现形式可以因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它的实质和总的性质不会改变。列宁根据俄国经验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过程的总的规律性，同时他指出，社会民主主义意识是从外部由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传播到工人中间的，这是这种结合过程的一个基本特征^④。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点滴消息，早在1902年就已开始传入中国，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仅仅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并且是在十月革命思想影响之下开始的。在其第一阶段，大致是在1920年夏天以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基本上未传到工人阶级中间。部分最先进的具有革命精神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代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宣传了十月革命及其思想的历史意义。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他第一个在中国正确地理解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他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着重指出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他写道：如果说法国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即一国利益口号下进行的，那么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在同年秋天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李大钊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而取得这次胜利的武器，他认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布尔什维克党。李大钊深信不疑地说：“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李大钊在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的辩论中，以俄国革命宣传者姿态出现，捍卫俄国革命原则，他代表了在中国出现的那些宣传十月革命历史意义并号召中国人民以新俄国为榜样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1919年的群众性爱国反帝运动是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

直接结果。在这场运动中，虽然中国无产阶级的民族、政治自我意识有所提高，但是它仍然是个“自在的阶级”，并没有着手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因而也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政治利益所在。

五四运动促使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更加积极地为创造条件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阶段的过渡作出了努力，在这个新的阶段，知识分子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到了中国工人阶级中间。

在中国，过渡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阶段的主要条件之一，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其他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由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杜威、罗素等）及其同盟者（胡适、梁启超、张东荪等）强加给中国社会的种种思潮所进行的思想理论斗争。这场斗争是以对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展开辩论的形式进行的，从1919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21年初，斗争很复杂很艰苦。应当估计到，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的理论水平还不高。

在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作的斗争中，最著名的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李大钊作出很大贡献。《新青年》杂志1919年5月号 and 11月号刊载了他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不仅是作者公开承认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证明，而且它在宣传无产阶级思想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李大钊在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质的同时，宣称“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接着李大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他强调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919年夏天，李大钊已把阶级斗争理解为历史的动力，并且他引证俄国劳动人民斗争史加强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他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

一文,其中心思想是“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积极兜售其老师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观点,恶毒抨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他反对进行阶级斗争,建议群众走妥协互让、阶级合作和改革之路。为诱使人民群众离开革命斗争,他号召研究“具体问题”以取代对理论问题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1919年8月,李大钊针锋相对地回敬胡适一篇檄文,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在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以“问题与主义”论战形式进行的第一轮思想理论斗争奠定了基础。

1920年12月,陈独秀发表文章批评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陈独秀的文章掀起了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以“社会主义讨论”形式进行的第二轮思想理论斗争。张东荪追随杜威和罗素,以国家落后为由,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点。张东荪的论点得到梁启超的支持。张、梁都以社会主义辞藻作掩饰宣称中国特别落后,发展不了资本主义。没有资本家,也就没有工人与资本家,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就不需要传播马克思主义,不需要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他们认为,中国唯一需要的,是走逐步进行社会经济改革之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回击了假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在《评论之评论》1921年3月号上,李大钊表示坚信,“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他说:“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还同那些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广泛传播的,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总平均分配物质利益和

“不要国家”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斗争。这些思想都是从当时风靡中国的普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有关著作中借用来的，是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背道而驰的。

对于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假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是对其思想政治成熟程度的一个严峻考验。这场斗争为过渡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创造了条件。在这个新的阶段，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工人中间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铺平了道路。

五四运动期间及其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工人阶级的联系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在他们影响之下的学生，走到工厂，同工人们交谈，考察他们的境况，然后在报刊上发表他们收集到的材料和有关罢工运动的情况，以引起社会舆论界对中国工人问题的关注。但是这是消极的联系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未能确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渗透到工人群众中间去及其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当时需要来一个急转弯，广泛开展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

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必要为寻求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工人阶级中间和使其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方式方法而重走漫长而艰苦的探索道路，因为在那个时期他们已经可以借鉴俄共（布）的经验并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共产国际和俄共（布）遵循列宁的指示，十分重视东方被压迫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它们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向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援助。实质上，这里谈到的是如何加强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问题和如何使科学社会主义同东方各国（其中包括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问题。

在进行国内战争和在苏俄广阔领土上抵抗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很难从中央来建立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同东方各民族

革命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因此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地区局和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委托，为同国外民族解放运动和业已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初步联系及了解这些运动的情况做了大量工作。

1920年4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征得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向中国派出一个以维经斯基为首的俄共党员小组，其目的是了解中国政治形势，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联系及向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提供有关情报和建议。维经斯基小组在结识聚集在李大钊周围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了解中国工人运动水平之后，把很大注意力用到引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做无产阶级群众工作方面，目的在于通过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唤起其阶级意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这时共产国际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象我们的思想敌人所说的是“输出”革命，而是加速无产阶级对行将到来的阶级搏斗的准备工作。

但是为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首先需要在中国主要工业政治中心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单独努力联合成马克思主义小组。

1920年5月，在维经斯基小组帮助下，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的建立和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初北京、武汉、广州、济南、天津、长沙等类似小组的建立，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工人阶级中间，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打下了基础。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制定东方被压迫国家刚刚诞生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与策略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发言。

列宁认为，中国人民是强大的革命后备军，他要求把这个后备军作为解放斗争中的首要因素给予认真考虑，要求帮助正在斗争中的各国人民，向他们传授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经验。俄共（布）中央华籍党员中央组织局从其存在初期（1920年7月）起，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联系。该局曾试图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为此它于1920年向中国派遣约十名华籍党员。共产国际二大前夕，华籍党员中央组织局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准许它的代表参加二大工作，这一要求后来得到满足，该局有两名代表（刘泽荣和安恩海）参加了大会工作并享有发言权。刘泽荣代表还参加了大会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工作，并于1920年7月28日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刘泽荣说：“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不仅对中国本身，而且对整个世界革命运动，都具有意义。”^⑥大会结束四天后，即1920年8月11日，列宁接见了刘泽荣，并且给当时的俄共（布）中央书记H·H·克列京斯基写一便条，请他接待刘泽荣。

为贯彻执行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加强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兄弟般援助，帮助他们从组织上作出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使这种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由五人（其中包括李大钊）组成的中央革命局。到1920年秋，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了革命局。上海革命局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情报鼓动部和组织部^⑦。出版部在上海有自己的印刷厂，在北京则依靠某些进步教授的帮助，利用了北京大学的印刷厂。

上海、北京和广州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出版工作是旨在提高革命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并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到1920年8月，中国已出版不下16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作，其中包括上海出版的、由陈望道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以及《共产党人是些什么人》、《十月革

命带来了什么》、《工会的概念》、《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等小册子。上海还以《科学社会主义》书名翻译出版了恩格斯所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第二部分。1921年广州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所著《雇佣劳动与资本》，从1920年7月1日到1921年6月1日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列宁的著作，其中有《国家与革命》、《中央委员会向俄共（布）九大作的报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经济和政治》、《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等。自1920年秋，《新青年》杂志摆脱右翼编辑部，成为上海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而自同年11月起，上海小组还开始秘密出版另一种取名《共产党》的杂志^⑦。

在此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工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组织阶级工会，开展了切实完成使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任务的工作。

1920年夏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出版工人报纸。这是发展他们同工人阶级联系的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一种形式。

到1921年年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为工人出版十多种期刊，并吸收工人参加出版工作。

上海马克思主义小组出版的《劳动界》周刊是第一个定期工人刊物。除了上海，它还发行到北京、武汉、长沙、长辛店等地。它的第一期是在1920年8月15日问世的。

《劳动界》周刊向工人们通俗地阐述了诸如劳动、资本、工资、剩余价值、剥削等范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同时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质、工人的主要日常任务、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等。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者还没有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精髓，他们还不清楚如何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劳动界》周刊还刊载一些关于罢工运动的报道和文章，以及关于中国各地组织工会的消息。绝大多数文章的作者是上海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和工人通讯员，有时也有其他思想派别的代表。

《劳动界》在宣传阶级斗争思想时，还没有提出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问题，没有把阶级斗争思想同无产阶级争取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联系起来。但是这个刊物促进了它所深入的那部分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自我意识和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加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它发动中国无产阶级去同压迫者作斗争，并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中国工人。

从1920年秋天起，北京和广州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仿效上海小组做法，开始出版工人周刊：北京出版了《劳动音》，广州出版了《劳动者》。

为使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所建立的工人夜校和阶级工会中进行了口头宣传，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外，还有革命学生。

第一批工人夜校是在拥有2000名铁路工人的长辛店（这是京汉铁路上一个枢纽站，距北京约20公里，邓中夏和张国焘在这里做了工作）、小沙渡（即上海西郊的一个工人区，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李启汉在这里举办了工人夜校）和广州创办的。这些学校从工人中培养了阶级工会运动的宣传组织干部。北京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在长辛店工人夜校的讲演很受欢迎。张国焘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听课的人总是很多，我们只好撤开长凳，让人们紧挨着站着。”他还谈到，由于共产党人的工作，无产阶级对工人报纸的需求量越来越多，报纸的印数不得不从1千份增加到4千份^⑧。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在给共产国际三大

准备的报告中指出，第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曾努力扩大自己对广大工农群众施加影响的基础”，“加速把它（无产阶级）的分散力量联合成强大的阶级组织”。这就是说，他们曾努力建立并且建立了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联系。

1921年，有1000多名长辛店铁路工人参加的五一群众大会，曾作出决定，以“工人俱乐部”形式建立工会组织。工会组织的影响传播到京汉铁路其他各站，各站都开始建立类似组织。

在上海，共产党人帮助建立的第一批工会组织，是1920年11月和12月组建的机械工会和印刷工会。最初参加机械工会的约有370人，参加印刷工会的有1600多人。印刷工会为工人出版了《友世画报》。在武汉，共产党人也开展了建立工会的工作。

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任务不仅在于组织工人阶级，而且在于在工人阶级当中建立一支受过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大众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大众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一种目标一致、组织统一的联合斗争，它只能是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政治斗争。

M·A·苏斯洛夫在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发展列宁的观点说：“党是马克思主义同群众性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作为一个阶段是以共产党的成立而告结束，但这一过程至此并未终止。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意识教育，这是始终摆在各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任务，只是迫切程度和教育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列宁曾强调指出：“提高群众的觉悟，现在也同任何时候一样，仍然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内容。”^⑥

1921年7至8月举行的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因此这次会议证明，党的成立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这次会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总过程中的一个历史分界

线。这以前也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这次会议不仅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完成了这一过程的一定阶段。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不过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很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这个过程的水平还不高，活力还不大。因此为了在中共一大以后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做思想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初期，组织上还不够巩固，理论上还很薄弱，它刚刚着手培养把党发展成为群众性政党所需要的干部，刚刚开始积累领导无产阶级群众性行动的经验。中共患有“左派”幼稚病，这在其一大决议中就有体现，决议规定共产党同其他政党合作，并且过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方针。这些都是发展中的不足，并不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特有的，在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形成时期，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其他民族主义队伍之中。列宁在1921年8月14日写给德国工人的信中指出：“在全世界，我们现在有一支共产党人大军。这支军队还训练得不好，组织得不好。”但是列宁坚信这些不足将会得到克服。列宁以这种信念鼓舞了世界共产党大军，并使那些故意夸大共产主义运动缺点，预言这种运动在中国尤其没有前途的人无法争辩。

综上所述，中国没有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这个具有客观规律的过程……早在中国现代史开始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就在这个国家扎下了根……（下略）

注释：

①见R·加罗德所著《中国问题》，巴黎1967年法文版。

②见H·C·登克斯和S·R·施拉姆所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伦敦1969年版。

③《列宁全集》第41卷第457页。

④《列宁全集》第5卷第363—364页；第6卷第29—31页。

⑤见王亚南所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莫斯科1959年版第283页。

⑥参见丁守和、殷叙彝和张伯昭所著《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莫斯科1959年版第25页。

⑦见邓中夏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莫斯科1952年版第100页。

⑧参见M·И·格拉西莫娃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的形成》，莫斯科1966年版第6—7页。

⑨《列宁全集》第34卷第217页。

⑩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9—30页。

⑪⑫参见《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文献资料汇编），莫斯科1969年版第199—296页。

⑬《列宁全集》第12卷第86页。

⑭《列宁全集》第6卷第30—31页。

⑮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34年版第621页。

⑯见《远东问题》杂志1973年第1期。上海工会组织有10名代表参加了革命局工作。为了把这些工会组织改组成为阶级工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组织中进行了工作。

⑰见丁守和、殷叙彝和张伯昭所著《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第93页。

⑱见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

⑲《列宁全集》第13卷第376页。

论中国1925—1927年 民族革命的历史地位

〔苏〕A·B·梅利克谢托夫

马贵凡译

译者按：本文原载《中国的社会与国家》论文集（莫斯科1981年版）。文章就如何评价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作为民族解放革命并没有遭到失败”。作者梅利克谢托夫为历史学博士，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了中国1925至1927年民族革命的巨大历史意义和这次革命与其前后狂风暴雨般的政治事件之间的密切联系。我认为，要正确评价中国1925至1927年民族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必须把握住从19世纪中叶“发现”中国时开始进行的、只是到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年之后才完成^①的、整个长时期的、客观上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前后联系。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仅仅象征着这次变革中的前一个“浪潮”的结束，而1949年人民革命的胜利则象征着后一个“浪潮”的结束。在中国历史中，1911和1949这两个伟大的年份标志着在结束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基本传统历史和进而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政治范围。

辛亥革命以后的年代的标志是发生一些重大社会政治变革。这是辛亥革命时开始进行的变革的继续和深入。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这个半殖民地附属国同整个帝国主义压迫制度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辛亥革命时，同外族君主专制政权清朝的尖锐矛盾掩盖了这种矛盾。辛亥革命推翻了令人憎恶的满清奴役制度，摧毁了君主专制帝国，进而把以前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中国半殖民地地位问题提到了首位。世界大战、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日本、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国内政的直接厚颜无耻的干涉，以及外国资本对中国国内市场渗透的日益扩大，极其迅速地，甚至是飞跃式地揭示了中国受压迫受屈辱的附属地位。对此，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发生危机之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根本性转变也起了促进作用。

同时辛亥革命以后的年代也是共和制幻想彻底破灭的年代。共和制幻想寄希望于在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能够迅速成为大国的平等伙伴，能够克服已经明显暴露出来的中国的落后状态，但是议会制的产生、军阀的嚣张和半殖民地附属地位的加强，使这些希望变成了泡影。

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最先进的部分已经把明显暴露出来的中国半殖民地地位和共和议会制的彻底破产看作是民族的危机，并且他们意识到不能容忍业已形成的这种地位的继续存在，有必要而且有可能通过民族解放斗争改变这种地位。这就是中国民众民族自我意识提高的证明。在思想领域，这时在社会思想生活中居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思想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民族主义变成了群众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主义思想在社会心理方面的作用有所加强，这证明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出现了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首先是军阀割据的盛行。这就使这个国家无法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思想则具有特殊性质，它首先表现在这样

一个口号上：统一国家，重建一个能够提出和解决恢复中华民族尊严问题^②的真正全国性的国家体制。这种明显暴露出来的并已被认识到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种种特殊的“中国形式”的殖民地压迫制度（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议等）之间的矛盾，即是中国广泛展开的民族解放革命的基础^③。

民族解放革命的先兆，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这个事件震撼了整个中国社会，第一次把斗争矛盾指向了中国半殖民地压迫制度本身。就在这次不同质的社会高涨达到顶峰时，基本上形成了两支能够领导民族革命的新兴政治力量。这就是20年代初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和1921年成立的共产党。国民党的改组和共产党的成立，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从政治上和物资上给予有效支援情况下进行的。共产国际和苏联认为，国共合作是建立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革命领导力量的保证。

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对列宁的统一战线战略的具体执行，是顺利发展1925至1927年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社会各种社会力量的社会政治联合组织，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客观前提，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形成（或更确切地说是阶级改组）过程尚未完结及首先是资产阶级和尚未由“自在阶级”转为“自为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软弱。现代的第一个十年十分清楚地表明，无论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没有能力充当它们所参加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者。国家不断发展的命运、民族解放革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形成一个能够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政治联盟。孙中山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时期已经被证明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最合适的组织形式和思想外壳。革命以前和革命时期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国民

党不光扮演了一个阶级的政党或阶级联盟角色，而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将所有民族解放斗争参加者联合起来的“全阶级”、“全民族”类型的社会政治联盟^④。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使用波兰学者E·克列尔的著名说法，则可以把国民党看作是“阶级的代替者”^⑤。实际上，正是国民党充当了民族解放革命的社会政治领导者，而革命领导权的这种性质，对革命的整个进程及其结果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国民党的形成和巩固，是一个建立和发展最初只是以不同的军阀政权形式出现的新的国家体制的过程。但是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同所有其他与业已崩溃的共和制有联系的政治力量的日益对立，广东地方军阀政权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崭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斗争本身日益具有了建立新的全国性国民党国家体制的性质。而这场必胜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可以看得到的实际成果，是全国在国民党政权领导下的日益联合。由此可见，国民党作为民族解放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正在解决全国的主要任务：国家的政治联合和全国国家体制的恢复。

新的国家体制的发展，伴随着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在保持党的最高层的领导作用的同时，党和国家机关的实际联合，因为按照孙中山的“政治监督”理论，国民党及其最高领导机关是正在奋起的民族的意志的体现者。

国民党的国家体制是在国民党和国民党（民族）政府在统一中国和振兴民族的口号下同所有不服从它们领导的军阀政权所进行的革命民族解放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在这场战争中，很自然，民族解放革命的主要突击力量——国民革命军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国民革命军在起这种作用的同时，它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新的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缺乏民主传统而民主程序又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在自上而下改革整个政治结构的情况下和在广

大人民群众基本上只是参加了传统的社会政治组织而在政治上抱消极态度的情况下，国民革命军起到了现代政治组织的作用。它能够统一最广大的新制度拥护者阶层，并能够使这些阶层在这个新的组织的范围内在政治上与传统类型的组织和军阀政权相对抗。

国民党军队在其存在初期的政治化，是与苏联军事专家的作用和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以及共产党人和左翼国民党人积极参加建设新的武装力量的行动有关系。这些因素使国民革命军不仅变成了一支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变成了发展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因素。但是随着北伐作战行动取得节节胜利，国民革命军靠“吞食”投靠国民党旗帜之下的军阀军队得到迅速扩大^⑥，结果国民革命军骨干力量（它的军官团）的政治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条件下，国民革命军虽未丧失其巨大政治作用，但实质上它已经是一个新的国民革命军了。它已经由国民党左派革命力量的支柱变成了右派保守思想的代表，已经成为聚集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周围的右翼民族主义人物的主要政治支柱。这支军队之所以还能起重要的政治作用，仍然是因为它还是统一国家的重要工具和民族团结的象征，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党和国家机关的联合首先体现为国民党领导和军事领导的日益联合。国民党相当迅速地向右转的政治进程，一般称之为国民党的“堕落”，实质上这首先是扩大新国民革命军政治作用的过程，而具体地说，是扩大国民党保守派政治影响的过程^⑦。

在军事革命斗争方式完全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所有其他斗争方式和方法，虽在中国得到了空前发展，但还是被放到了第二位。这里所说的，首先是采用特殊阶级斗争方式和方法的工农运动。

工人运动在发展民族解放斗争中起了突出作用。没有工人运动就谈不上1925至1927年民族革命的发起和这次革命所取得的重

大成就。工人阶级是最彻底的反帝行动的发动者和先锋队。工人运动如何提出和解决民族解放任务，它就如何在民族解放革命任务范围内起作用。工人运动是发展和加强革命进程的强大促进因素。但是在1925至1927年民族革命进程中，跳越这种很有限的民族解放革命任务范围的种种尝试，均未取得成功，这一方面是因为民族解放革命本身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有客观上的弱点。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人口总数中的比重很小，中国没有全国性的阶级组织，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自我意识薄弱。这些因素就使中国无产阶级没有可能在当时去实际争取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

农民运动在中国现代史的整个前十年时期，特别是在民族革命时期，无论从时间上看还是从空间上看，发展的都很不平衡。这个时期，农民群众主要是针对军阀的横征暴敛提出了减轻捐税负担和调整土地关系的传统要求。他们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军阀政权的抵抗能力，促进了北伐的胜利发展。但是在那些从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处于国民政府管辖之下的地区，农民运动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因为在这些地区，传统的减税口号实际上是针对新政权的，而新政权又没有实际可能大幅度地减少征税。共产党人曾试图给农民运动提出土地口号，但实际上却使农民运动同国民党政府直接对立起来了，同时加剧了统一战线内部的社会阶级矛盾^⑧。

民族革命的成果十分清楚地反映了辛亥革命以来所发生的社会阶级变革。1928年国民政府（即国民党政府）的成立（该政府控制了中国的一个重要地区，试图继续进行北伐，以实现国家的统一）表明，一个成分很复杂的社会政治联盟开始执政（这个联盟的内部力量格局在其存在期间一直在变化）。国民党作为一个纯地区性的（广州、广东地区），在全国赢得一定支持的反帝民族主义力量联合组织出现以后，随着革命的发展，渐渐变成了越来越具

有社会广泛性、群众性，而其内部越来越充满矛盾的联合体^⑨。民族解放革命参加者的成分和人数的大量增加势头一直持续到这次革命取得最有政治意义的一次胜利——1927年春的上海解放，这以后，统一战线内部（即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至引起一系列公开的军事冲突，结果改变了这个联合组织的结构。

这里所说的军事政治冲突是发生在1927年春夏秋三个季节。在这些冲突中实际上解决了广泛反帝社会联盟中的哪些成分将在其中占居统治地位和将决定已经成立起来的政权的社会性质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阀和大资产阶级（首先是上海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他们把国民党看作是确立其统治的最合适的政治工具，看作是他们能够赖以在他们所希望的范围内将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到底的社会联盟。

国民党军阀在很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他们的人员组成方面）继承了以前的军阀制度，但在某些方面又与之有很大的不同。新的国民党军阀试图统一和集中过去被分割了的中国，他们是民族主义向心倾向的代表，并在这方面表达了全民族的愿望。不过新军阀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涂上了三民主义色彩，这对他们的代表人物的许多政治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逐渐形成的军阀资产阶级联盟中，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扮演了小政治伙伴的角色。辛亥革命后的发展经验表明，中国资产阶级不具有什么重要政治地位，实际上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阶级，它在寻找政治支柱，甚至在寻找能够实现其阶级要求的政治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支持孙中山国民党的一般民族民主纲领，它有理由认为实现这个纲领可以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新的途径，可以争取对“自己的”中国市场实行经济统治。当社会阶级力量在民族革命进程中发生两极分化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会感觉到来自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方面的威胁。中国资产阶级未能把国民党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因此它把赌注下在国民党内部的右

派军阀势力身上，指望在共同的政治斗争中把他们“资产阶级化”。

日益形成的军阀资产阶级联盟，竭力要巩固和加强国民党，指望通过国民党施加其政治影响，力求使国民党成为确立其政权的主要工具。这一切对民族革命结束阶段的思想政治斗争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不能不指出，国民党的右翼民族主义军阀资产阶级核心，竭力要保持国民党的广泛社会政治联盟性质，试图将广大人民群众置于它的影响之下，为此它加强了自己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民族主义成份。

军阀资产阶级联盟是通过国民党实现其对政权的要求的，但国民党有许多不可动摇的革命传统，有三民主义这个正式的思想体系，这就把新政权的成立纳入到孙中山国民党的传统思想政治框框之中，从而保留了革命民族主义传统和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对军阀资产阶级联盟政府的一定的影响。

但是社会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在1927年导致了国民党的右翼民族主义军阀资产阶级核心同国民党左派的分道扬镳，并使共产党人陷入了特别困难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没有签订跨党的正式合作协议，但是只要它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政治纪律，只要它服从国民党领导的决定，它就可以在国民党内，在实际上业已形成的统一战线范围内进行活动。

国民党的右翼民族主义军阀资产阶级核心明显表露出来的实行政治垄断的意图，使共产党人不得不作出十分困难的抉择：要么以民族解放革命的框框（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完成北伐）限制自己的政治意图，要么尝试同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领导权和它的社会政治方针问题上搞公开的政治冲突。

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第二条路^⑩。中国共产党过高地估计了国内阶级分化的程度、工人阶级的成熟程度和人民群众采取行动的自主性，但最主要的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实力。中国共产党

认为统一战线政策是一种策略，因此它曾试图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这实际上是试图消除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在国民党内的影响^①。决定作出这种尝试的基础，是错误地估计了国内阶级政治力量的对比。这种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革命的急躁情绪造成的，而革命急躁情绪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很稳固的特点。

中共搞公开冲突的尝试遭到了彻底失败，共产党人被赶出了国民党，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中所有拥护中共政策的最革命分子，都遭到了国民党的镇压。共产党最后想扭转这种对它来说是很悲惨的事态发展，它曾组织民族革命撤退战，但这种战斗只是加剧了国内的社会政治分化，使它脱离了民族主义力量联盟，实际上它变成了非法组织。

中共旨在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政治方针的失败，给中共队伍和所有真正的革命力量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是总的来说，经过1925至1927年的民族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有本质上的加强，并在其数量和质量发展方面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共从狭隘的实际上是小组形式的组织发展成一支能够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向国民党提出挑战的群众性全国性力量。即使在遭到残酷镇压之后，中共也能保存其拥有许多支部的党的全国性机构，而且该机构能够相当迅速地恢复党的组织和重新任命军事干部（这些干部构成了党的武装力量的核心），能够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后来成了中共取得重大军事政治成就的主要条件^②。

共产党人的被驱逐（即实际上已经存在的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国共之间武装斗争的开始和作为致力于解决民族解放任务的民族主义联盟政权国民党国家体制的确立，标志着1925至1927年民族解放革命作为民族解放革命或从更广义上讲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浪潮”的结束^③。

1925至1927年民族革命的主要成果是：恢复了全国国家体制，这是完成民族解放革命的最重要的工具。国民党国家体制虽然极其软弱，内部充满矛盾，但是它毕竟能够解决民族解放任务。1925至1927年，中国在摆脱半殖民地附属地位方面迈出了最初的然而是最艰苦最重要的几步，并首次成功地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1925至1927年民族革命的真正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1925至1927年民族革命的重要成就是：中共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时它已经是一支唯一能够向中国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提出政治挑战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时期的严酷政治搏斗中，它奠定了能够把广大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建立党的群众性军队和建立解放区的前提条件。

所有这一切，促使我们不能把1925至1927年政治搏斗的结局看作是革命的失败。在我们看来，1925至1927年的革命，作为民族解放革命并没有遭到失败，当然也没有取得全面胜利，但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来的解放运动的性质。

对民族革命结局的这种评价，不能用这个时期结束时民族解放运动的分裂事实加以否定。诚然，国民党从革命民族主义组织转变为保守的，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右派、改良派，甚至反动派有吸引力的民族主义组织。但是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最革命最激进的分子后来却逐渐聚集到中共周围，革命民族主义的旗帜逐渐转到共产党人手中^④。正如后来的历史事件所证明，这次分裂未能阻挡住民族解放的进程。

注释：

④这里是根据列宁对“完成”这个词的解释，指“资产阶级革命在广义上的完成”。下面我们引证列宁关于如何解释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概念的整个思想：“如果把它（‘完成’）用在广义上，那就是指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任务的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也就是能够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基础本身的消灭，资产阶级革命的

整个周期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1871年才算完成（它是在1789年开始的）。如果把这个词用在狭义上，那就是指单个的革命，指几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次革命，或者说几个‘浪潮’中的一个‘浪潮’，它冲击旧制度，但不能把它冲垮，不能消除产生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1848年的革命，是在1850年或在50年代‘完成’的，但60年代革命高涨的基础丝毫没有因此而消失。法国1789年的革命，可以说是在1794年‘完成’的，但1830年、1848年革命的基础丝毫没有因此而消失。”（见列宁：《政论家的短评》，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97—198页）。

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政治局势可能不能与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俄国局势相论比，但可以同法国的局势相论比。正如列宁强调指出的，“在资产阶级发展道路完全确定的法国，民族问题是统一之类问题，而不是土地问题，但在资产阶级发展道路还有待确定的俄国，民族问题则是土地问题（甚至更狭窄些，是农民问题）”。当年对中俄两国局势的类比，导致了政治战略与策略上的错误，而现在，我认为，造成了史料研究上的错误认识，其实质是错误地把土地问题提到了第一位，是不了解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内容。

③我使用“民族解放革命”这个概念，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于在亚洲附属国家不存在两个革命阶段（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存在三个革命阶段（民族解放革命阶段、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论点。我认为，前两个革命阶段（民族解放革命阶段和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在那些有大量民族解放任务的国家，就其客观任务和条件而言，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变革中的两个阶段。A·И·索博列夫在其著作中有力地论证了这一思想，他写道：“整个民族同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间矛盾的加剧，引起了民族解放革命。这种矛盾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都有表现，几乎触及农民、工人阶级、小生产者、小企业主、民族资产阶级等所有居民阶层。在开展民族解放革命过程中，渐渐形成一个广泛的全民族反帝战线，实际上它可以把大多数社会阶层联合起来，因而具有全民族性质”（见A·И·索博列夫：《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载《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运动》，莫斯科1977年版）。

④我使用这个概念，主要是依据对A·И·列夫科夫斯基的报告（论阶级联盟在东方过渡性社会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辩论材料。列夫科夫斯基谈到阶级联盟时着重指出：“必须注意到，这不是业已形成和认识到自己特殊利益的阶级的联盟，而是其中还在不断发生阶级变换的特殊的社会聚合体。”讨论列夫科夫斯基报告时，大家提出一些看法，加深了对这类联盟特点的认识。如P·Г·兰达认为：“阶级联盟，这是不断变换的并且在新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政治实体。它们在多种成分社会中起着阶级的作用。”B·П·

舍伊尼斯认为,阶级联盟是“某些形成阶级的‘大锅’,在这些锅里,历史会“熬出”各种社会形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中产生一些多少带有现代特点的阶级。这些阶级的产生,虽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有可能,政治斗争推进整个进程),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因于政治斗争”。M·A·切什科夫认为,阶级联盟“不是随着阶级的形成而消亡的那些‘正常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形成‘方式’,也不是别的什么,而恰恰是一些轮廓,即当代资本主义和我们整个过渡时期所特有那些形成阶级的轮廓”。(以上引文均见《现代东方的阶级形成:问题与趋向》莫斯科1978年版)中国后来的阶级形成历史经验,特别是与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历史上的新的阶级类型的共同体的形成有关的经验,使人们可以认为,这种分析国民党性质的方法是很有说服力的。

⑤这个术语是指在阶级关系不很发达的社会行使政治社会职能并起到革命领导者作用的那种社会结构。

⑥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曾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过的苏联军事专家A·B·布拉戈达托夫的观察,他在回忆录中指出:“原各系军阀的杂牌军把国民革命军完全淹没了。”

⑦如果说在国民革命军组建初期,其军官骨干是政治志向相同者(革命民族主义者)的某种联合,那么在所谈的时期,国民革命军却变成了有不同政治信仰的,甚至是敌对分子的不稳定联合体。这就预先决定了它后来的分裂。

⑧这是因为国民革命军中的国民党工作人员、军官团和部分战士出身地主和中国农村特权阶层。因此,任何限制地主占有土地或没收地主土地的企图,都是对国民党中有影响的势力的物质利益的直接打击。A·C·科斯佳耶娃在描述国民革命军对1927年共产党试图发动农民协会夺取土地的行动所作的反应时说,“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甚至部分战士,对农民协会的行动极为不满,有些部队擅自镇压农民协会”。(见A·C·科斯佳耶娃:《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的主要问题》载《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论文集,莫斯科1978年版)在这样的现实社会政治形势中,民族解放斗争口号是加强反帝统一战线团结的因素,而土地口号实际上是分裂统一战线,加剧统一战线内部矛盾,以至导致统一战线破裂,进而在客观上抑制这一革命进程阶段向前发展的因素。

⑨A·C·科斯佳耶娃就此指出:“随着北伐革命进程的发展,这个联合体的组成有扩大趋势,主要是其极端对立的两翼,一方面工农群众被引导参加了革命;另一方面许多地主、绅士和某些军阀也参加了革命。”(见A·C·科斯佳耶娃:《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的主要问题》)

⑩在革命过程中,中共政策曾有过一定的摇摆,如M·Φ·尤里耶夫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曾提出无论如何也要维持同国民党首领联盟的方针,但陈独秀作出了错误结论,认为为维持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和农民必须放弃争取自己阶级利益的‘斗争’。”(见M·Φ·尤里耶夫:《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莫斯科1968年版)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种

倾向说成是走第一种道路的某种尝试,但是在统一战线内部斗争尖锐化的现实情况下,特别是在1927年,由于政治力量分化已经很严重,这种策略未能奏效,然而中共在新形势下维护独立性的愿望促使它作出了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尝试,并使其争夺领导权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

⑩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国史学界认为这个决定是有道理的,甚至是唯一可能的。这种观点在M·Φ·尤里耶夫和B·И·格卢宁的著作中从不同角度作了有力的论证。(见M·Φ·尤里耶夫:《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中国现代史》莫斯科1972年版)但是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对中国革命史采取了稍有不同的概念性分析方法,有些学者对所谈事件作出了某种新的估价。如《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论文集序言作者写道:“在革命过程中,中共领导曾试图将民族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试图展开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这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意味着取消国民党对革命斗争的领导权,把领导权转交给中共,然而实际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具备,预先决定了中共1927年4至5月的失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胜利。”И·И·杰留辛写道:“夸大可能性,试图推进革命进程,加快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化,这些因素导致了悲惨的结局。向左的大跃进使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见И·И·杰留辛:《瞿秋白和彭述之论中国革命问题》,载《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论文集)我的这种分析方法,从几个方面看都是有说服力的。

⑪评价革命结局的这种新的方法是B·И·格卢宁提出来的。格卢宁写道:“至于1927年中华和工农运动遭到的重大损失,在我们看来,这些损失完全可以并且也应该被看作主要不是为失败而付出的代价,而是为取得1925至1927年革命的胜利和成果而付出的很高的,在历史上完全被证实是需要付出的代价。”(见B·И·格卢宁:《关于1925至1927年革命结局的评价问题》,载《中国现代史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莫斯科1976年版)这种创造性的分析方法也促使我对民族革命结局作出了总的重新估价。

⑫意味着狭义上的革命的“完成”(如果仍使用列宁的术语的话,可参见注①)。我认为,民族解放革命阶段任务的基本完成,是在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被彻底打败之后。后来民族解放革命开始转变为民族民主革命,最后导致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⑬如果使用И·А·别列兹内的说法,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分裂则反映了“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即一方面是平民式地要求彻底实现全民族的任务进而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另一方面是试图对问题作出表面上的简单的处理。”(见И·А·别列兹内:《论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中的民主与反民主倾向的斗争》,载《中国的社会与国家》莫斯科1976年版)不过这里应当说明,在20年代中期,实现第一种倾向既没有客观条件,也没有主观条件,而分裂之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对后来直至1949年的整个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台湾共产党政治史

(1928—1931)

[美] 弗朗克·肖 劳伦斯·萨利文

王应一译

译者按：此文译自1983年2月出版的《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2期。作者为弗朗克·肖 (Frank S·T·Hsiao) 和劳伦斯·萨利文 (Lawrence·R·Sullivan)。肖任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利文为阿德尔菲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在文章中论述了台湾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台共对当时台湾政治经济形势及阶级状况的分析，台共同共产国际、日共和中共的关系，以及台共失败的原因。作者认为，台湾共产党1928年建立，1931年即告瓦解，仅仅存在三年，其所以如此，除因受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外，来自日共、中共尤其是共产国际“深刻而常常互相矛盾的影响”也起了“破坏作用”，导致台共党内不断发生宗派斗争，并在政治路线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作者指出，1928年以后共产国际在路线上发生“戏剧性转变”，台共也随之在1931年制定了新的纲领。在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台共认为可以将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进行，而抛弃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将资产阶级分子一概排除在运动之外，从而加重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孤立。作者认为，正是共产国际这次路线上的转变促成了台共的毁灭。

此文引用了不少史料，对研究台湾共产党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译文作了若干删节。

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楼上，9个人举行会议正式成立台湾共产党，作为“日本共产党的民族支部”^①。3年以后，即1931年秋，日本殖民地警务局对台湾共产党人进行大逮捕，破坏了台共及其外围组织。虽然后来一直到1947年还有人时断时续地试图重建党，但共产党立足台湾毕竟为时很短。台共党员同中共党员不同，他们未能在外国殖民统治为自己提供了政治推动力的社会里保住党的组织。中共虽然在当局的镇压下备遭摧残，但还是生存下来了，而台共却完全瓦解。

本文以台共短暂的政治活动期间影响其发展的人物和事件为中心来研究台共的历史和党内政治生活。具体说来，我们要回顾台共分别于1928年和1931年通过的分析台湾社会政治特点并扼要提出革命战略的两个政治纲领；论述日共、中共和共产国际在制定台共的方针和造成其党内分歧方面所起的作用；考察台共在台湾的国际政治地位问题上和台湾摆脱殖民地地位以后同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我们着手编写台共党史，深知在这个控制得很严的岛屿上，组织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运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台共是由曾在日本和中国学习的一小批知识分子所组成，党员大概不超过一百人，1928—1931年始终遭受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迫害，因此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从未成为一个重大因素。但问题是，除日本警察当局外，还有无别的因素促使该党迅速瓦解。台共党内不断发生宗派主义，并在政治路线和革命路线上存在着根本分歧。这部分地反映出该党领导成员的不同政治背景。一派原在日本留学，同日共站在一起。但这一派20年代也因在内部政策上发生矛盾而陷入分裂。另一派是在中国学习，比较倾向于追随中共，拥护中共1927

年8月以后提出的亲农民路线之类的创造性方针^②。更为重要的是，台共动荡不定的发展历程，反映出20年代晚期共产国际的政策对一个新建立的小党的巨大冲击。根据本文引述的文件表明，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在路线上的戏剧性转变使台共深受影响，也许正是这种路线转变促成了台共在1931年的毁灭。

台共的建立和发展

台共的渊源要追溯到曾在日本和中国学习的左翼学生。他们逐渐把共产主义思想介绍到台湾，并终于为台湾农民组合（1926年成立）和台湾文化协会^③的左翼会员所接受。1925年，谢雪红（文化协会成员）和林木顺躲过日本驻台警察的逮捕而逃到上海。他们在该地参加了五卅运动，并会见了瞿秋白。由于在当地受到中国共青团的注意，后来被推荐去莫斯科“革命大学”学习，1926—1927年他们就在那里。1927年11月，林、谢二人回上海，奉共产国际之命在日共指导下发起台湾共产主义运动。12月，林、谢先后应日共中央邀请赴东京。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大纲”草案，就是在东京在日共党员的指导下拟定的^④。日共当时正忙于筹备即将到来的全国选举，遂决定由中共协助进行建党的实际工作（台湾总督府，1939年，第575页；史明，1980年，第576页）。1928年2月，林、谢回上海，在中共台湾籍党员翁泽生、蔡孝乾协助下建立组织和发展党员。最初，翁、蔡反对共产国际置台共于日共（不是中共）领导之下的计划（林、谢支持此计划）。但迫于共产国际的指令，他们勉强地收回了反对台湾党员隶属日本党的意见（大奥都，1970年，第127页）^⑤。

1928年4月15日建党会议上，台共显然没有多少制定自己的革命战略和政治路线的自主权，虽然台湾作为殖民地的政治形势同中共在中国、日共在日本的处境大不相同。林木顺致开幕词之后，中共代表彭荣介绍了中共的革命经验和战略，供台湾革命借

鉴。他又对关于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运动的总结作了几点修正（这些运动的口号原是林起草的），使台共的立场同中共当前的理论相一致。会议最后选举林木顺、蔡孝乾（在台湾）、林日高、庄春火（在台湾）、洪朝宗（在台湾）为中央委员，翁泽生、谢雪红为后补中央委员（《近代》，1971年，第22卷，xx-xxi页，第86—87页，100页，136页）。三天以后（4月18日）新组成的台共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分工如下：

中央常委：林木顺、林日高、蔡孝乾

书记兼组织工作：林木顺

农民运动：洪朝宗

青年工作：庄春火

宣传和鼓动工作：蔡孝乾

去台湾工作的党员：林日高、潘钦信、谢玉叶（音，下同）、林木顺。

东京特别支部兼与日共联络：陈来旺、谢雪红

上海办事处兼与中共联络：翁泽生

（台湾总督府，第592页，第657—658页）

从最后两个机构可以明显地看出，台共力图既同日共也同中共保持组织上的密切联系。

会后，陈来旺和林日高分别回东京和台湾赴任。其余党员几乎随即遭到上海日本警察的镇压。当局一获悉有些台湾人在上海出席朝鲜三一起义庆祝会，即逮捕了谢和其他四人（《近代》，1971年，第22卷，第238页）。由于日本警方已发现党成立，原派赴台湾工作的潘钦信和谢玉叶便躲在上海，蔡孝乾和洪朝宗，迫于随时可能被捕的威胁，也由台湾逃到中国。林日高、林木顺、翁泽生幸未被捕，得以保存了几个最高领导人。然而，在日共看来，“上海读书会事件”（当时这样称呼）清楚地暴露出台共党员的真实性质。据日共一文件称：

党员百分之百是知识分子，因此一遭到白色恐怖袭击，就暴露出其真正的机会主义。台共党员不是就上海事件向〔台湾〕群众作宣传，提高他们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呼吁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参加运动并提供援助，以求得群众拥护党并实现党的合法化……他们却宁愿逃往〔中国和日本〕……这证明一个纯粹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多么脆弱。（《近代》，1971年，第22卷，第272页）

台共刚成立两周，就受到其上级组织日共的谴责，就被打散了。

但到6月间，谢雪红和其他几个被捕党员未受审判而获释，他们随即同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的成员进行联系，于是台共又着手恢复其组织。11月，根据日共中央的指示，谢被提升为台共中央委员，蔡、洪、潘和谢玉叶（翁的妻子）因不去台湾工作而有失职守，被开除出党。当时吸收了杨克培和杨钧松（音）两名新党员。林日高这时在党内最知名，任书记。

与此同时，在台湾工作的台籍中共党员，在台北、台中成立了中共台湾支部，这显然是他们准备转而加入台共的第一个步骤（《近代》1971年，第22卷，第90、92页）^⑥。虽然台共党员起初担心他们能否领导这个同自己不相上下的组织，但台籍中共党员转入台共并未发生什么问题。这样至少消除了一个产生派别冲突的潜在根源。此外，1929年初，台共“东京特别支部”的许多成员（如苏新、萧来福）和王万得等台籍中共党员，也回台湾参加台共的活动^⑦。于是在台共停止活动数月之后，一个明确的领导核心终于又开始在这个岛上形成了。

更重要的是，台共从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吸收新党员的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中央委员会因而于1929年10月在谢雪红的秘密联络点台北国际书店开会，决定改组党的机构，以适应同这两个组织的新关系，并指定了台共在台北、吉隆、高雄三个地区的负责人。但是，尽管党员增加了，党的活动也扩大了，党同日共和中

共的双重关系却仍然引起麻烦。先是因1928年3月至1929年4月日共中央委员大批被捕，台共与其上级组织日共中央完全失去联系。后来台共中央在1929年11月开会，决定通过在上海的联络员翁泽生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联系，随后翁同整个台共中央的关系却紧张起来，因为日共开除了翁的四位中共同志——蔡孝乾、洪朝宗、潘钦信、谢玉叶。1930年4月，林日高被派到上海同中共联系，但没有什么结果。7月末，林回来时，他和他的同事庄春火非常灰心泄气，以致于要求退党。显而易见，台共同其上级组织（日共）及其天然盟友（中共）之间的三角关系，开始造成组织上派别对立的严重困难局面。

但是，尽管党的领导人之间因意见分歧而分裂，新入党的一般党员又对党中央不积极展开活动和政治战略上的保守表示不满，台共还是在1930年10月27日在台北松山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而且据会议报告说，工会工作取得了成就（见附表1—3），然而，1930年晚些时候，共产国际的干预，对台共的整个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翁泽生和潘钦信（这时在上海）向中共和远东局提出一份充满批评的“关于台湾形势的报告”之后，陈德星（音，下同。陈是农民组合成员和中央委员，由谢雪红派往东方局）回到台湾，带来了远东局对党进行全面改组的指令。远东局指示台共制止“关门主义”倾向（这显然是指党为知识分子所统治），并扩大党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的活动，少去注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谢雪红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她相信在策略上有必要同台湾的小资产阶级结成暂时联盟。因此，她认为远东局的指令是不切实际的，是不能接受的（这种立场导致她后来被开除出党）。然而，陈德星和王万得（当时同苏新、萧来福联合）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思，于1931年1月27—28日在台北成立了台共“改革同盟”。此外，他们还计划成立台湾赤色总工会组织准备委员会，作为岛上

工会活动的最高组织，共产党可以通过这个组织向大的工矿和铁路部门渗透。还决定，按照共产国际不久前在政策上的转变（下面还要谈到），农民运动应该集中力量组织贫农，增设分支机构，并尽力建立“农会筹备委员会”。最后，这些人组成了一个“改革同盟临时中央”，选举苏新、王万得、陈德星、萧来福、赵港为临时中央委员。岛上分为五个区，并计划为这个新党将要发动的各种工人、农民和青年运动拟定一个政治提纲。

1931年2月，王万得将改革同盟的工作进展情况直接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近代》，1971年，第22卷第319—321页）。据他报告，“农民组合完全在该同盟影响之下”，但改革同盟在产业工会中的工作相当薄弱。当时文化协会会员发展到500余人，其中的积极分子，除在谢雪红个人控制下的少数几个人之外，据称大多数支持改革同盟。在青年和妇女运动中，改革同盟承认几乎没有影响。

1931年3月20日，即该同盟成立两个月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李钦奇（音）传送了一封远东局《致台湾共产党人书》，其中有党关于党的活动的指示（台湾总督府，第695、820页）。改革同盟于是在5月31日在淡水召开一次“特别会议”^⑧。会议在另一名共产国际使者潘钦信（开除出党后又恢复党籍）的主持下开了3天，再次决定对台共进行全面改组。首先，解散改革同盟，以避免“党内有党”。改革同盟的主要反对派谢雪红、杨克培（音）和杨阁煌（音）被开除出党。其次，通过了由潘钦信根据远东局和上海中共中央的指示而拟订的新的政治纲领，党还一致同意采纳中共中央关于台共内部组织按照斯大林路线实行“布尔什维克化”的“友好建议”。最后，决定台共由当时日共“民族支部”的地位上升为共产国际直属支部，即成为一个独立的共产党。

由于1931年初台共印刷工人（2月）、矿工（3月）、蔗农（7月）发动罢工，台共进行有限的政治活动，尤其是通过文化协会、

农民组合和台湾赤色总工会组织准备委员会进行活动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有材料证明，共产党人曾在矿工、运输工人、印刷工人中间积极地筹建工会。当地农民反对缴纳水费和财产税的运动，进一步为农民组合提供了机会（见附表1）。对台共来说不幸的是，日本警方对劳工骚动忽然增多作出了反应，在5月特别会议后不久就迫使党突然停止活动。2月逮捕了赵港，随后又于6—11月逮捕了谢雪红、林日高、杨克培、潘钦信、王万得和改革同盟其他成员。不过苏新未被捕，在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其他党员协助下，1931年8月—9月，他试图重建党，但未成功。不到6个月，台共大部分党员（包括苏新）被捕入狱，负责同中共联络的翁泽生也在中国被捕（台湾总督府，第737—739页）。

这样，台湾共产党在1931年秋被有效地破坏了，逃往中国的台共党员被吸收入中共。长征开始前，中共曾派一些福建籍中共党员同逃出的台湾人一起去台湾，企图重建台共（郭，1955年，第43—44页）。然而，由于中日关系紧张，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台湾的政治控制，台共无法再进行活动。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共对台湾的政策仍然有点模棱两可：一方面，中共接受1943年开罗宣言正式把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另一方面，因中共尚未执政，它又要求在台湾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以寻求最广泛的政治支持，至少在1947年“二·二八”起义前是如此。在这次起义中，共产党人是起了作用的（大奥督，1970年，第145—146页；肖和萨利文，1979年）。早在1945年10月，中共在延安派蔡孝乾（1928年“上海事件”后一直留在中国）赴台湾去接纳不久前从日本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台共党员。蔡同谢雪红一起力图恢复共产主义运动。谢还在2月起义中，组织了一支学生武装力量在台中同国民党作斗争。后来，蔡留在台湾，领导“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策划另一次起

义，直到他被捕为止。谢去香港，于1947年11月建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郭，1955年，第50页）。最初，她同托马斯·廖（Thomas Liao）一起工作，协助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其宗旨是反对1945年后国民党占领台湾（闾，1962年，第98—99页）。1948年9月1日，他们共同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台湾的地位（大奥督，1970年，第147页；克尔，1965年，第456—459页）。

但是，后来中共在内战中的迅速胜利，很快地改变了廖、谢之间的关系。谢有参加过共产党的背景，遂转向中共，谋求从国民党的统治下“解放台湾”，并在1949年春接受北京邀请在中国领导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她在1949年以后的工作，以及台籍共产党员（例如蔡孝乾和苏新）的所有其他活动，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应说中国大陆——译者），现在都只同中共发生关系。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收复台湾的政策（并有鉴于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当然已不再需要单独成立台湾共产党^⑧。台共现在已成为历史了。

1928年和1931年的政治纲领

台湾共产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1928年《政治纲领》（还有《组织大纲》），系1927年晚期拟出草案，后经日共中央作为决议通过^⑨。《政治纲领》（共有7节）表明台共很重视争取“民族解放”，这一立场是同1928年初期共产国际实行的路线相一致的。纲领一开头就叙述“台湾民族的发展”：“17世纪60年代，郑成功……率领军队来到台湾……我们所谓台湾民族就是由从〔中国〕南部来到台湾的汉人组成。”自19世纪中叶起，台湾同中国、英国、荷兰的商业关系发展起来，“由郑氏家族建立”而又为“清朝派来的封建贵族”所加强的“封建制度”开始崩溃，台湾民族受到这时出现的“特殊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哺育”。换言之，当

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台湾社会时，一个独特的民族统一体出现了，以致当“清朝在中日战争后(1895年)作为赔偿的一部分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时，岛上发出了建立台湾民主国的反响。此举被台共视为台湾“民族革命”的一部分。

革命运动的主力是兼作资本家的中等地主、商人和激进的士兵……它采取全民群众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形式。然而，由于台湾的资产阶级尚未成熟，这次民族革命被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下去了①。

台湾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的内在因素，但按照台共的分析，却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日本人在1895年的胜利，还阻碍台湾“自然地”沿着通向成熟的资本主义道路向前发展，因为岛上经济的“封建”性质在日本统治下又有增强，“日本帝国主义……本身带有许多封建残余，由于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有赖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台湾现在还保留相当多的封建残余。”台共纲领承认，在日本统治下资本主义有发展，但这是带有“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其封建性阻碍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的完全形成②。

纲领的第二、三节，对台共所面临的整个政治经济条件进行了分析，侧重在“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势”。在谈到台湾的经济结构时，这个文件强调指出革命的根源在于经济的两重性：

台湾一方面有高度集中的居支配地位的资本；另一方面，又有欠发展的弱小资本，以及农村中相当多的非资本主义成分。在这两部分经济之间……存在着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重大矛盾。这种矛盾是台湾革命的主要动力。

这种经济的两重性还反映在台湾的阶级结构上。纲领列举部分阶级结构如下：

(1) 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家阶级：少数大银行资本家，拥有台湾整个资本的80%。

(2) 反动资产阶级：已被日本金融资本家所同化的本地资本家和地主。

(3) 自由资产阶级：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有革命倾向。

(4) 中等地主：占有整个土地的28%，占农业人口的8%。

(5) 大地主：最反动的封建寄生阶级。

(6) 独立农民：拥有土地的农民，占农业人口的30%，占有耕地的23%。

(7) 贫农和农业工人：劳动农民，占农业人口的70%。

(8) 无产阶级：约占整个人口的30%。

在政治方面，纲领批评了给人民以有限的参政权的“自治制度”。台共知道，自20年代初期以来，台湾反对殖民主义思潮的主流支持在日本主权范围内实行本地人统治，故台共一心想破除自治制度对自由资产阶级、中等地主和独立农民的吸引力，以谋求他们支持一个比较激进的反帝纲领。

总督府评议会和各州郡协议会均已在岛上建立，但到执行其〔实际上的〕选举法时，这些机构都可由高级官员指定。而且，大都由日本官员和资本家组成，能参加进去的台湾人只限于完全被〔日本人〕同化了的资本家^⑩。

然而，纲领在政治上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乃是评价台共在革命中要加以驾驭的“民族独立运动”的状况。总的说来，台共认为，“台湾民族传统以及国家传统的历史很空虚”。1895年台湾民主国垮台之后，“民族革命运动不断爆发”，尤其是在1912年和1915年举行了起义（见附表4）。“这两次起义表面上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若对这两次革命过程深入分析，就会发现，爆发起义的主要推动力是农民要求民主解决土地问题。”台共的中心思想还是认为，台湾缺少一次成熟的反对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原因是台湾的资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大地主阶级”）同日本资产阶级相比，存在着固有的软弱性——这种见解是同共产国际当

前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依附社会的路线一脉相承的（麦肯齐，1964年，第80～81页）。纲领认为，“台湾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仍然极其软弱。资产阶级在近年才开始形成阶级。”一旦“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力量兴起……资产阶级〔犹如中国的资产阶级〕必然会很快转入反革命阵营。”但在当前，台共可以在统一战线中同台湾资产阶级中的反帝分子合作，同时保持工农运动的革命方向。

纲领最后几节提出，台共的政治使命是，在工人中间建立群众基础，并确立共产党对民族运动的领导权。由于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30%）被视为无产阶级，纲领认为工人阶级是“党的基础”。因为“现在的自由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不久的将来就会脱离革命阵线，所以台湾民族革命的主力……是无产阶级。”然而，“台湾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其同盟军（农民）完成台湾民主革命。”有这两个革命阶级的联盟，民族革命就会“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台湾民族革命是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

至于如何同这个群众基础建立联系，纲领主张通过文化协会“吸收工农业部门的青年和先进分子，同时揭露民众党（1927年7月由退出文化协会的保守分子组成）的欺骗性政纲”。“在一定阶段”，纲领接着说，“文化协会将改组为大众党，成为工会和农民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组织。”这种来自下面的推动“阶级斗争”的力量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没有工农的参加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台湾民族革命就达不到自己的目标。因此，那些反对阶级斗争的人〔台湾资产阶级〕就是反革命。”

在纲领的最后一部分，党对资产阶级的立场略为调和，不过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台共坚持“将资产阶级置于工人阶级的影响之下”。“在殖民地的环境中，不仅是革命的农民，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大多数人（小商人，小企业业主，资产阶级，中农）都

对帝国主义统治有相当的怨言”，因此，“台共必须……采取具体的战略加以利用……共产党应当站在各种革命斗争的最前列，领导一切革命力量。”总之，台共要象朝鲜共产党一样，建立一个包括工农和资产阶级的虽属暂时但是广泛的联盟，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时要进行长期的阶级斗争^④。

3年以后，在1931年3月“特别会议”上，台共（当时由改革同盟的成员所控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通过了第二个纲领（《近代》1971年，第22卷，第339～351页）。第二个纲领保持了第一个纲领的连续性，但台共的政治立场，尤其是在党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方面，有很大改变，并把它作为党的方针。纲领按照共产国际新制定的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即将动摇的“左”倾路线，强调台湾在“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国际帝国主义的东方支柱”）的斗争中的作用。“从地理上看，台湾是日本侵略南太平洋和中国南部的桥梁……这一点增强了台湾革命的世界意义。”

纲领又规定，台湾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类型的工农民主革命”。在这个阶段，如同在1928年一样，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存，是引起革命的爆发点。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台湾人将“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赢得台湾独立……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成分。”然后台共就可以开始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制度”。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台湾仍然需要进行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整个革命过程的第一步。

然而，同前一个纲领相比，1931年的纲领对台共同岛上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采取了一种根本不同的看法。这个纲领按照共产国际在1928～1929年布哈林在政治上失败后所采取的严重宗派主义路线，宣布“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和劳苦大众完成革命任务”。资产阶级受到“工农奋起”的威胁，不会再支持民族独立的目标，即使是暂时的支持。“〔他们〕同民族的利益背道而

驰，公开同帝国主义妥协。台湾资产阶级已经不是革命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1928年纲领中台湾“自由资产阶级”具有“革命倾向”的提法现在被抛弃了。

正确地讲，台湾并无具有民主和革命倾向的资产阶级，即拥有独立民族资本的人，因为在资产阶级中间，虽有左翼和右翼之分，前者的要求高一些，后者的要求低一些，但两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同帝国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妥协。

阶级斗争和民族革命现在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了，资产阶级分子一概被排除在运动之外。而且，从1931年纲领所列口号可以明显地看出，台共所提出的“没收所有帝国主义的企业和银行”之类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受到更大的强调^⑥。由于岛上“资本集中的程度和托拉斯发展的规模”日益增大，台共认为可以将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进行，因而组织和动员工农反对日本和台湾的资产阶级就成为党的首要政治任务。

总之，台共的两个政治纲领在推进台湾革命的途径上有所不同。1928年，在共产国际温和路线的影响下，象谢雪红那样的人物，胸怀强烈的民族主义，明确地诉诸台湾人的民族主义感情，几乎将岛上所有社会阶级都包括在一个潜在的政治联盟之内。但到1931年，谢被清洗，又强加以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就使党更加陷入宗派主义，不愿充分利用当前人们的反殖情绪，而强调阶级斗争。

台共受到的外部影响

1928—1931年，日共和中共，尤其是共产国际，对幼年的台湾共产党产生了深刻而常常是互相矛盾的影响。起初，对台湾人影响最大的是日共，特别是日共的山川派。台共许多党员的政治见解就来自这一派。早在1924年，山川均(yama kuwa Hitoshi)就以他的反帝著作《殖民主义政策支配下的台湾》一书对台湾少

数左翼人士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山川主义”实际上成了台湾左翼人士反殖思想的基调，难怪台共的第一个政治纲领反映了日本这一派的共产主义思潮。

山川主义的实质，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这是日共意识形态中一个重要问题，最早见于1922年《日共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在莫斯科拟定的，它宣称日本具有特殊性，因为“日本资本主义仍带有前一个时代遗留的封建关系痕迹”（贝克曼和大久保，1969年，附录A）。故而“国家机关仍然掌握在由某些工商业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构成的集团手中”，“对抗现行国家政权的力量不仅来自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而且来自所谓自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因此，纲要断言，日共在斗争中必须“利用一切社会力量”。对于日共的主张，山川的贡献在于以自己的“方向转换论”和“单一无产阶级政党论”发展了上述理论（古山，1956年，第25—28页；斯卡拉皮诺，1967年，第20—21页）。关于“方向转换论”，他主张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分两个阶段。首先，“少数先进分子要在思想上弄明白运动的目标和目的”，然后这些“先进分子回到群众中去，尽力发动他们投入运动，但要照顾群众的当前要求，因为他们的阶级意识可能还跟不上。”换言之，在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很浓厚的山川看来，先锋队应集中精力去建立同群众基础的联系，纵然群众带有“落后的”阶级意识，如属必要，也应牺牲自己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关于“单一无产阶级政党论”，山川提出，“先进分子应当是参加工会的工人和参加农会的农民。以他们为中坚，整个无产阶级应当组成一支单一的政治力量，即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不必坚持先进分子提出的党的最高目标和纲领。”这不仅削弱了共产党的“先锋作用”，而且导致山川提出解散日共，以便共产党人专心致志地组织群众运动——1924年制定了这个方针，当时日共实际上陷于解体（古山，1956年，第223—224页）。

在台共1928年纲领中，日共纲要和山川主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日本在政治经济上对这个岛屿的渗透，台共采纳了这样一个思想，即认为台湾出现了带有“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这个思想，如上所述，对该党制定革命战略有重大影响。而且，台共主张成立“大众党”作为一个工人农民的党。显然是追随山川关于建立一个有别于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党的论点（贝克曼和大奥都，1969年，第110—111页）。虽然没有根据证明台湾人打算始终追随日本人而解散台共，但在台共成立初期，山川强调发展群众运动的主张，大概有强大的号召力^⑥。

1926年，福本和夫（Fukumoto Kazuo）在日本的影响超过了山川。福本认为，党的“先进分子”应当通过一场“勇敢的和不停顿的理论斗争”而达到“分离和结合”，然后再去统一群众的思想（古山，1956年，第30页）。换言之，将支持自己的民众组织起来之前，先要形成一个思想上纯洁的知识分子核心，以确保不同群众的“落后”意识作任何妥协。而且，只能有一个政党——共产党。

共产国际在1930年批评台共有“关门主义”，若属实，这表明一些党员接受了福本关于在组织群众以前先进行理论斗争的主张。由于台共领导人多是知识分子，日本人通过保甲制度对台湾控制又很严，无怪福本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克尔，1974年；陈敬之，1975年）。固然，人们难于估量出“山川主义”（或“福本主义”）对台共的全部影响。但迄至1930年，这两种理论的确曾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它们在党的组织和革命战略方面互相矛盾的主张，无疑助长了台共在其短暂的历史上所特有的宗派主义和组织上的混乱。

这种造成党内分歧的外界影响，又由于共产国际既反对福本主义也反对山川主义而加剧。正当台共明显地准备将山川的某些思想吸收进第一个纲领时，共产国际在1927年7月《关于日本问题

的决议》中，指责这两种理论都违背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将共产党溶于左翼工人运动〔山川主义〕是错误的。使〔日共〕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同样是错误的，因为离开群众的革命斗争……理论就毫无意义。”（《近代》，1964年，第14卷第92页）。

台共受到共产国际的这些批评后，至少在口头上不得不执行国际路线而抛弃那两种理论。例如，台共在其1928年《解决农民问题的措施》一文件中，就机械地搬用共产国际关于日共的《决议》中的说法，而且攻击廉文清（音）（山川的门徒），并把他清洗出文化协会。与此相类似。在台共1928年的《组织大纲》中，也在几个方面重申了反福本路线。并且警告说：“组织一个与群众的具体斗争相脱离的〔党〕是无用的”（《近代》，1971年，第22卷，第256页）。总之，台共不仅由于日共内部提出两种大不相同的原则而陷入分裂，而且又为共产国际所迫去批评这两种理论。台共面临如此多种多样而又相互对立的压力，那么，在其发展的道路上出现曲折，领导也不稳定，就不足为奇了。

台共又因其同中共的关系而引起进一步的混乱。例如在台共建党会议上，中国代表彭荣在发言中强调指出，他的党低估中国资产阶级反动性的错误，为台共提供了经验教训：

当中国资产阶级认为无产阶级力量壮大构成对他们的威胁时，他们就力图夺取反帝运动……的领导权，并表现出妥协倾向。这证明，当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就趋于反动。台湾革命应当注意这一点。（《近代》，1971年，第22卷，第247页）

尽管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的政治形势同中国有很大不同，但彭却不怎么关心这个岛屿上对采取不同的革命战略可能起决定作用的独特条件。因为中共同蒋介石和武汉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证明，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他也就劝告台湾人（还有朝鲜人）避免犯类似的错

误。中国的革命，彭论证说，“只有在农民——工人阶级（原文如此——译者）的领导下才能够完成”——他暗示台共也应当执行这种方针。

人们也难于完全弄清这种外界影响对台共的政策立场究竟发生了哪些效力。一方面，彭讲话的基本精神，尤其是他关于资产阶级必然转而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运动的告诫，为台共1928年的政治纲领所采纳，因为它同共产国际的总方针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人们清楚地看到，迄至1930年，台共保持同台湾新兴资产阶级的暂时联盟并没有发生什么困难。虽然中国资产阶级，按彭的分析，被视为一个完全成熟的阶级，并在1927年4月上海政变中向中国无产阶级展开了阶级斗争，但在台湾，资产阶级仍被看作刚开始“形成一个阶级”。尽管中共对台共政策声明和口号的主旨有重大影响，但至少至1930年年中之前，台湾共产党人仍将其革命环境同中国的形势加以区别。然而，因为共产国际的方针已由广泛的统一战线战略改为反对同资产阶级结成暂时联盟，中国在1927—1928年的经验无疑相当有力地说服了大多数台湾共产党人，尤其是诸如潘钦信、翁泽生、王万得等在中国学习过的人，去支持第二个政治纲领所宣布的方针。虽然谢雪红和台共其他党员继续力求同“所有革命阶级”协调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谢确曾指责改革同盟的成员有“幼稚的左倾情绪”），但与该同盟有联系的台共多数党员仍坚持共产国际的新路线。他们头脑里装满了中共的经验，尽管台共并未象中共在1923—1927年那样遭受革命战略上的失败，他们还是抛弃了原来的政治纲领。

在制定组织群众运动的方针时，台共也明显地受到中共的影响。具体地说，1931年初改革同盟之成立，大概是受到中共于1927年8月开始的由城市到农村这一革命战略上的历史性转折的鼓舞。虽然我们无文件可资证明该同盟的领导人试图仿效中共新制定的亲农民路线，但其纲领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使台湾农村

地区组织起来为中心。强调要引导台共在其活动中抛开岛上的资产阶级而转向“工人和农民的联合斗争”，这固然如上所述是共产国际方针的一部分，但改革同盟集中力量搞农民运动，也许是反映了该同盟对中共创造性方针政策的重视。虽然谢雪红想使台共的政策适应殖民地的独特条件，但改革同盟却似乎宁愿把中共面向农村的方针作为台湾的模式而加以奉行。

现在我们来全面考虑一下共产国际在1928—1931年对台湾共产党的影响。同20年代中期到晚期许多新成立的共产党一样，台共的发展也在多方面受到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后来是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尖锐斗争的深远影响。最初，共产国际的路线鼓励台共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是同台共领导人尤其是谢雪红反帝的民族主义愿望相一致的。但是，由于批判日共的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又由于在1930—1931年转到宗派主义立场，单纯强调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共产国际却削弱了谢的地位而加强了改革同盟。

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共产国际要求台共“布尔什维克化”，导致谢及其支持者被清洗。对于一个在敌对的环境中为生存而斗争的党来说，清洗三位主要领导人怎么说也是冒险的。但是，共产国际要求严惩反对派，由于改革同盟的成员对此明确表示赞同，台共也就照办了。当然，由于这次清洗之后不久，日本警方就迅速采取行动围捕台共党员。人们对斯大林分子控制的共产国际在决定台共命运方面的作用可能会有争论，然而，台共在1930—1931年抛弃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不能将新兴的台湾民族主义的旗帜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同岛上人民的反日情绪息息相通，从而加重了该党在政治上的孤立，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路线，在岛上居民尤其是资产阶级中间，究竟会引起多大的反响，倒是难于作出评价。同朝鲜人相比，台湾人对日本占领的反抗毕竟较少，而且他们确实明显地接受了日本在岛上所进行的许多经济和政治改革，并吸收了日本文化（鹤见，1977年，第

196页)。但是在1928—1931年，台湾终究产生了反日的民族主义，尤其在工人中间，劳资纠纷主要发生在日营工厂（见附表3），而台共在1931年却基本上丧失了利用这种民族感情的可能性。

总之，共产国际在台湾共产党极其脆弱的发展时期改变方针，日共和中共党内又有各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外部因素对台共所造成的综合影响，我们就可以明白台共在其短短3年的发展历程中是怎样被削弱的。一个政党少受外界的政治压力，就可以少产生派别，因而也就能够较好地应付其政治环境。一言以蔽之，这里所提到的各种因素，可能同日本警务局一样，对台共最终都起了破坏作用。

结 论

我们主要是根据已经出版的日文党史资料，以史实来阐述台共的3年历史。总的说来，台共是在人民反帝运动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是在一个日本人的控制使得任何公开的政治活动都异常困难的岛屿上，遭到失败的。虽然如此，台共的命运并不仅仅决定于日本殖民当局的统治效能高，也不仅仅决定于人民对台共的纲领支持不够。台共短暂的历史清楚地说明，在外界的影响下，尤其是当受到共产国际改变方针的冲击时，一个小党不能制定出能够贯彻始终的政策。1928年纲领所提出的在新兴的反帝运动中将台湾人民团结起来的政治策略，到1930年却被一种不考虑这个岛屿的殖民地地位所具有的全部政治含义的政策所取代。在中国，1927—1928年的失败和中共自30年代起在中国农村地区同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为党制定一条适合中国社会特殊条件的路线提供了基础。但是在台湾，外部政治力量的巨大影响，却使台共不能制定出这种路线

附表1 工农业纠纷次数(涉及工人或农民人数)

	劳资纠纷 ^a	租佃纠纷	租佃纠纷涉及农民组合人数 ^b
1924	14(415)	5(229)	—
1925	18(539)	4(256)	1(20)
1926	26(1,280)	15(823)	6(505)
1927	69(3,312)	431(2,127)	344(1,469)
1928	107(5,445)	134(3,149)	80(2,745)
1929	49(1,900)	26(701)	5(65)
1930	59(15,706)	11(1,245)	—
1931	52(2,256)	18(1,533)	—
1932	29(3,002)	29(527)	—
1933	22(1,571)	40(706)	—
1934	18(1,294)	46(373)	—

资料来源:《近代》(1971年)第21卷,第424—425、505页。

- a. 自1929年到1930年,纠纷涉及工人数目大增。这反映出世界规模的萧条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也许还能说明台共在组织工作上的成就。1929年发生的纠纷,大都是要求增加工资。因为日本人和台湾人之间的工资差别很大(见附表2),这些纠纷集中发生在日营商号(见附表3)。
- b. 台湾农民组合接受日本农民组合的指导。1928年6月农民组合成为台共的外围组织后,其组织中不再存在“山川主义”(史明,1980年,第634页)。农民组合成员300余人于1929年2月被捕。它存在的时间虽比台共长,但到1932年9月台共残余分子策划的大湖武装起义失败后,也就终于瓦解了(台湾总督府,第799—812页)

附表2 1929年台湾工会规模和工资额^a

企业	工人数目	参加工会人数 (百分比)	男(女)工人日工资(单位日元)	
			日本人	台湾人
工厂	87,351	4,671(5.3)	—	—
公营	8,436	1,325(15.7)	2.20(0.97)	1.09(0.46)
私营	78,915	3,346(4.2)	1.92(0.69)	0.99(0.55)
开矿	19,562	1,532(7.7)	2.55(0.84)	1.08(0.50)
运输	48,957	840(1.7)	—	—
公营	7,908	—	1.85(0.74)	0.97(0.55)
私营	41,049	840(2.0)	77(0.83)	1.15(0.59)
其他	421,978	2,017(0.4)	—	—
合计	577,848	9,060(1.5)	2.10(0.78)	1.06(0.53)

资料来源:《近代》(1971年)第21卷,第488—493页。

- a. 右翼成员于1927年1月退出台湾文化协会后,剩下的左翼分子加强了工会活动,而保守的民众党在1928年3月组织了工人总联合会。

附表3：日本人、台湾人、中国人所属工厂的工人、资本和劳资纠纷(1929年)

	工人数目(百分比) 单位：千人	产业资本(百分比) 单位：百万日元	劳资纠纷次数 (百分比)
日本人工厂	19 (3.3)	239 (76.6)	40 (80.6)
台湾人工厂	542 (94.6)	68 (21.9)	8 (16.3)
中国人工厂	12 (2.1)	—	1(2.1)
其他(朝鲜人和土著)	4 (0.6)	—	—
合计	577	307	49

资料来源：台湾总督府，第7章；转载于裘伦，1972年，第56—58页。

附表4：主要抗日事件(1912—1915年)^a

时 间	事件名称	领导人	领导人称号
1912年3月	林杞埔事件	刘 乾	台湾国王
1912年6月	土库事件	黄 朝	台湾国王
1913年12月	苗栗事件	罗福星	(独立共和国)
1914年5月	六甲事件	罗阿头	台湾皇帝
1915年8月	西来庵事件	余清芳	台湾皇帝

a. 是因中国辛亥革命成功而受到激励后发生的。领导人宣传中国人民和军队会来帮助起义，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帝国或共和国，并可能受到新中国的保护。参见《台湾叛乱简史》，载《近代》第21卷，第27—98页；克尔，1974年，第106—108页，第111—112页。

注释：

①到会的有中共代表彭荣（可能是彭湃的化名），朝鲜共产党员吕运亨（Lu yun hong）；台湾人7名：林木顺、林日高、谢雪红、翁泽生、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台湾总督府，1939年，第590页）。这些台湾人当时多为中共党员。

②曾在中国学习的台湾人一般说来比在日本留学的激进（鹤见，1977年，第200

页)。台共的经历类似朝鲜共产党。朝共也曾受到亲俄亲华两个阵营之间互相冲突的宗派主义的危害，其根源在于朝鲜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伊尔库茨克和上海两个不同的地方（斯卡拉皮诺和李钟锡，1972年，第32页）。

③台湾文化协会原由台湾资本家林献堂于1921年建立，1926年连温卿等左翼人士接管。关于协会情况，参见鹤见，1980年，第4页，第7—9页；陈·爱德华，1972年，第489—495页；肖友三，1946年，第3章。关于29年代的台湾社会政治形势，参见克尔，1974年，第108—150页；矢麓原，1929年。

④参见佐野学夫（Sono Manabu）（日共中央委员）审判前的口供（《近代》1968年，第20卷，第235—236页）。山部健太郎（yamube kenfaro）认为，台共政治纲领主要是日共党员市川正一（Ichikawa Shoichi）写的，后来曾从市川住处抄获原纲领草案。其它材料证明，纲领是在日共党员渡边正之辅（Watanabe Masanosuke）指导下以谢、林提供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纲领草案由翁泽生译成台湾文（原文如此，似为“中文”之误——译者），然后提交建党会议审议。（《近代》1971年，第22卷，X X—X X V 页，第137、256页；1968年，第20卷，第235—236页。）

⑤当时列出了几个建立台共作为日共民族支部而不成为独立政党的理由。按照1928年政治纲领的说法，是“因为台湾没有共产党领导运动的经验……”而且按照共产国际惯例，一个共产主义组织需要有成员100人才能被承认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即独立政党），而台共未达此数（《近代》，1966年，第17卷，第306页）。但台湾共产党显然希望将来能获得独立政党的地位：“台共象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一样，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台共成立大会宣言》，见《近代》，1971年，第22卷，第235页）。佐野在警察局的口供也谈到，台共将“暂时附属于日共”（《近代》，1968年，第20卷，第235页）。

⑥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原则，所有居住在中国的台籍共产党员应加入中共，所有在1928年4月后返回台湾的中共党员应申请加入台共。与此相类似，共产国际在1928年拒绝承认重新建立起来的朝鲜共产党时，中共就在上海和满洲成立中共朝鲜支部，以接纳原朝共党员。参见《近代》，1972年，第29卷《朝鲜》之五第XIII—XIV页，第442、445、572、581页。斯卡拉皮诺和李钟锡，1972年，第190页。

⑦台共“东京特别支部”于1928年9月23日林木顺由上海抵达该地后成立。1929年4月16日日共遭围捕，警察在东京搜查到台共的文件，特别支部随后即解散（台湾总督府，第644、667页；《近代》1971年，第22卷，第93页）。

⑧出席的党员代表包括王万得（改革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萧来福（主管劳工），颜石吉（农运代表）。还有改革同盟北方地区代表苏新、简娥，南方地区代表刘守洪、庄寿（音）。

⑨而且，中共的书刊中贬低甚至抹杀台共的历史作用(李，1955年)。

⑩台共纲领实际上有两个文本。在市川家里发现的原《政治纲领草案》(见注④)这里称之为东京草案。该草案的一部分载在《近代》(1971年)第22卷XXI—XXVI页。台共建党大会上通过的1928年《政治纲领》，如我们在下面所指出，同东京草案有所不同。除另有注明者外，本节所有引文，均摘自1928年《政治纲领》(《近代》，1971年，第22卷，第261—273页)。

⑪本文所引1928年政治纲领对1895年建立民主国的解释与东京草案不同，后者强调指出，“这次革命的力量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中农、地主和小商人。这次革命不是伴随着全民群众运动的那种民族革命(着重号是引者加的)”(《近代》，1971年，第22卷，XXV—XXVI页)。弘尚登(1970年)和兰利(1970年)对台湾民主国有所论述。

⑫这种分析也出现在朝鲜共产党1928年“提纲”中(斯卡拉皮诺和李，1972年，第102页)。

⑬评议会和协议会成立于1921年。总督府评议会最初由居住在台湾的日本人和台湾人各9名组成(弘尚登，1981年，第136页)。两会在台湾成立，与其说是为了应付台湾自治运动，不如说是因朝鲜三一运动(1919年)而作出的反应，因为台湾自治运动在1923年以前并没有多大影响。

⑭此外，台共又提出13个口号，其中有：(1)“打倒总督独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台湾民族独立万岁”；(3)“建立台湾共和国”；(12)“拥护中国革命”。请注意，口号强调台湾独立，相比之下，对中国革命则不怎么注意。

⑮但1931年纲领还是再次提出“台湾民族独立”的口号。其中还提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要求。按照台共的说法，台湾的“少数民族”指土著居民、日本人和中国人，台湾人是多数民族(《近代》，1971年，第22卷，第341、349页)。

⑯虽然台共政治纲领的东京草案写于1927年晚期，当时山川对重新建立的日共已失去控制，但渡边还是明显地将山川主义的某些方面写进了草案，这些内容在建党大会通过的最后文本中也保留了下来(《近代》，1971年，第22卷，第312页)。

参考书目

乔治·贝克曼和大久保原二：《日本共产党(1922—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9年。

陈敬之(音)：《日本在台湾实行的保甲制度(1895—1945)》，载《亚洲研究杂志》1975年第34卷第2期，第391—416页。

陈·爱德华·义德(音)：《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政治运动(1914—1937年)》，载《亚洲研究杂志》1972年第31卷第3期第477—497页。

《近代史史料》(日文)第14—22卷，东京三铃书房1964—1972年出版。

肖·弗朗克(Hsiao Frank S.T)和劳伦斯·萨利文:《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的地位(1928—1943年)》,载《太平洋事务》1979年第53卷第3期第446—467页;《重新统一的策略:北京对台湾采取主动》,载《亚洲概览》1980年第20卷第8期第789—800页。

岡本凱(简文杰)(音):《台湾的独立》(日文),东京书房1962年出版。

乔治·克尔:《被出卖的台湾》,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65年出版;《得到许可的革命与自治运动(1895—1945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

弘尚登(Kō Shōdō):《台湾民主国研究》(日文),东京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台湾总督府》(日文),东京教育社1981年出版。

古山弘毅(Koyama Hirotake):《日本马克思主义史》(日文),东京青木书店1956年版。

郭乾惠(音):《台共叛乱史》,台湾内政部调查局1955年出版。

哈里·兰利:《1895年的台湾抗战:当地中国人对外国的反抗》,收入伦纳德·戈登编纂的《台湾:中国地方志研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

李雅甫:《台湾人民革命斗争小史》,广州华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

克米特·麦肯齐:《共产国际与世界革命(1928—1943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

大奥督(Ō Okut Oko):《台湾:苦闷的历史》(日文),东京弘文堂新社1970年出版。

裘伦(音):《关于20年代台湾工人运动的若干统计资料》,载《台湾时代》1972年第3卷第56—58页。

罗伯特·斯卡拉皮诺:《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1920—196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

斯卡拉皮诺和李钟锡(音):《朝鲜的共产主义》第一卷,加利福尼亚大学1972年出版。

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天国文化协会1980年出版。

肖友三:《台湾解放运动回顾》(日文),台北三民书局1946年出版。

台湾总督府:《台湾社会运动史》(日文)第1卷第2册《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史》,1939年出版。

鹤见·帕特丽夏(Tsurumi E Patricia):《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教育(1895—194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思想控制与反抗:台湾反殖民主义的教训》,载《关心亚洲学者公报》1980年第12卷第2—13页。

若林正健(Wakabayashi Masatake):《台湾革命与共产国际》(日文),载《思想》1975年第610期第573—594页。

矢篷原纠夫(Yanaihara Tadao):《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日文),东京岩波书店1929年出版。

吴佩孚与苏联、中共及 孙中山的关系

〔美〕吴英铨
唐秀兰译

译者按：美国拉特格斯大学历史副教授吴英铨在1978年写了一本《近代中国的军国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这里译出的是其中的一章，主要内容是讲1920—1926年吴佩孚同苏联、中共及孙中山的关系。作者认为，“不弄清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就说不清国共合作问题以及后来发生的许多事件”。同时，他也是为了批驳马林的几个观点而写的。马林的说法是：（1）20年代初，苏联本来是想支持吴佩孚的，但由于他在1922年夏天给拉狄克写了一份报告，就取消了依靠吴佩孚的方针。同时也是由于他的推荐，才使苏联与孙中山联合，由“亲吴”改为“亲孙”。（2）苏联、中共同吴佩孚的关系在1922年中期便结束了。

针对马林的说法，作者提出了几个他认为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在文中作了回答，并批评马林“说的都不是真话，是为了夸大他自己在国共合作中所起的作用，把莫斯科从“亲吴”改为“亲孙”说成是他的功劳”。作者列出材料说明，从1920年一直到1926年，吴同苏联及中共是一直有联系的，并不象马林所说，在1922年就断了关系。

20年代的军阀，不管他多么强大，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

重视任何一个外国的外交态度。自从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崛起以来，他就成为苏俄感兴趣的目标。20年代初，吴佩孚接受了苏俄的外交姿态。苏俄密使到洛阳去拜访他并与之商谈。吴同苏联及中共便建立起了友谊。可是，据说这个友谊是在1922年中期突然结束的。

1935年8月19日，哈罗德·艾萨克斯在阿姆斯特丹访问了马林（即H·斯内夫利特）。他们的谈话后来发表在1971年第45期《中国季刊》上，题为“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中国问题，1920—1923年”^①。马林在这次谈话中向艾萨克斯谈到了他在决定中共同孙中山合作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与这个决定有关的是，他还解释了苏联所以改变政策并停止支持吴佩孚的原因。他对艾萨克斯说，苏联所以突然改变政策是因为1922年夏天他在莫斯科给拉狄克送交了一份报告。他说：“总之，是我的报告制止了赤塔政府要依靠吴佩孚的方针，使他们断了这一念头”^②。

可是，仔细考察一下艾伦·惠廷在《1917—1924年苏联在中国的政策》以及康拉德·布兰特在《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两本书中所提供的材料，都不能证实马林的说法^③。举个例子说，苏联评论家V·维林斯基在1923年“二·七大罢工”过后很久，还继续发表讨好吴的讲话。而且，在1922年夏季时，孙中山也并不是苏联最中意的候选人。莉迪亚·霍勒布尼奇也说，孙中山一直到1923年1月26日孙一越宣言即将签署前才得到共产国际的全力支持。

众所周知，1922年8月时，正是孙中山屡遭挫折，而吴佩孚则正作为一个新的胜利者而处于权力顶峰的时候。那么，苏联为何要抛弃曾经是他们中意的候选人之一的吴，而选择只与孙中山联合的方针呢？是因为孙的革命传统？还是象马林对艾萨克斯所说，是由于他的推荐？在1922年8月的杭州会议上，孙是否就是苏联唯一要挑选的对象？孙中山在与苏联谈判时，为什么会遇到这

么大的困难，并埋怨越飞向北京吴佩孚政府大献殷勤？从1922年8月至1923年1月，吴佩孚同孙中山、苏联以及中共的关系，真实情况究竟如何？苏联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才真正与吴断了关系的？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吴佩孚与中国工人的关系。据说开始时吴与京汉铁路工人的关系很好，只是在1923年2月7日镇压他们以后，才突然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的。那么，我们要问，吴为什么同意中共在他的地盘上发展工人运动？为什么他又突然镇压这个运动？这次大屠杀是否与孙文一越飞宣言有点关系？因为这次镇压毕竟发生在宣言公布后仅12天。再就是，是否象很多历史书上所说的那样，这次大屠杀后就完全结束了他同苏联及中共的关系？

不弄清楚吴佩孚、孙中山、中共及苏联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就说不清国共合作的问题以及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虽然其中的某些问题，要等苏联和中国的档案材料向研究者开放，才能圆满地作出回答，但我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大大提高史学工作者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兴趣。

最初的合作

虽然1919年7月的加拉罕宣言提出了取消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所有条约，但苏联政府一直到1920年才真正把注意力转向东方，特别是转向苏联政府与中国的关系问题。1920年初，高尔察克政权崩溃，结束了对西伯利亚的入侵。同年4月，远东共和国在乌兰乌德（上乌金斯克）成立。1920年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与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20年9月的巴库会议上，为发展东方的民族革命斗争而通过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一策略要求工人阶级与民族的民主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于是，共产国际在1921年1月于伊尔库茨克成立了远东局，它与在赤塔的远东

共和国密切合作。当赤塔在10月成为首都以后，共产国际就不仅派代表到北京去，同时还想找到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作为它在中国的同盟④。

另一方面，中国在1920年夏天出现了新的局势。段祺瑞及其亲日的安福系的倒台为中苏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创造了条件。苏联认为，段是代表日本在满洲、蒙古和苏联西伯利亚扩大日本势力的。安福政府承认沙俄在北京的外交使节N·A·库达舍夫，支持霍尔伐斯将军对中东路的统治，并仍照常交付对俄庚子赔款。段为了同日本合作侵犯西伯利亚，还把西伯利亚地区的中国军队交日本人指挥。在蒙古，段任命其部将徐树铮为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任务是破坏苏联在外蒙的势力，使这一地区在中国的控制下得到巩固。甚至当加拉罕提出要取消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所有条约时，段及其安福国会也全然无视这一宣言⑤。

在曹锟、吴佩孚及张作霖领导下的新北京政府完全改变了这一情况，并提出了对苏俄政权的新政策。1920年8月1日，新政府正式停止交付对俄庚子赔款。9月，宣布不承认沙俄政府在北京的外交使节和领事。1920年6月，北京派了三个外交代表：约翰·弗格森，伦诺克斯·辛普森及乔治·帕杜克斯赴海参崴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弗拉基米尔·维林斯基见面，以此作为与苏俄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个姿态。

就是在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下，伊尔库茨克局以及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才开始要在中国寻找一个民族的民主的资产阶级同盟。那时中国有三个重要人物：张作霖、孙中山及吴佩孚。虽然张是推翻段祺瑞的英雄，可是苏联只把张看作是受日本保护的段的替身，也是同苏联争夺蒙古利益的人。随着徐树铮在直皖战争中丢掉了对蒙古的控制权，在伊尔库茨克局的帮助下，在外蒙成立了一个临时人民革命政府。可是，在1921年5月的一次军事会议后，军阀们推选张作霖为蒙古与新疆的最高军事统帅，旨在使外蒙脱离

苏联势力而归中国控制。由于在蒙古的这一利害冲突，苏联就从未把张看作是一个可能的同盟者。

再说孙中山，共产国际认为他是理想的候选人。孙中山的革命传统使他在苏联革命者中颇有名气。在俄国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初，孙曾给列宁发去贺电。外交人民委员乔治·契切林在给孙的回电中号召孙及中国人民参加布尔什维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那以后，共产国际曾派几个代表到中国访问孙。从1920年3月到1922年5月，与孙接触的俄国代表不少于5人，他们是：波波夫，维经斯基，莱西耶夫，马林和达林^⑥。可是，孙的权力几经盛衰。有时甚至连广东的权力基地都无法控制，而且还有一个对手，他的陆军总长陈炯明，此人也表现出某种社会主义的倾向，因此受维经斯基、维林斯基和霍德洛夫的欣赏。

1920年夏天崛起的吴佩孚，则不仅反对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而且还是一位民主的领导人。他在推翻亲日的北京安福国会中起了关键作用。战争以后，吴号召人民成立国民大会以解决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使南北统一。由此，吴便得到国内及外国评论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之为“民族的救星”。苏联及伊尔库茨克远东局也把吴看作是领导中国工人进行民族革命的最好的候选人。

1920年初时，苏联还比较谨慎，但是从对吴战胜安福系的评价来看，是寄予厚望的。苏联评论员弗拉基米尔·维林斯基在1920年8月23日的《消息报》上说，吴的胜利不仅是“革命的胜利，而且通过这个胜利，使中国社会接近到阶级斗争的时刻”。他说，从此以后，将是“军国主义的北方”和“革命的南方”之间的斗争^⑦。两个月后，即1920年10月，以张施林（译音）为首的一个非官方的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调查情况”时，苏联人把张看作是“吴佩孚青年时代的同学”^⑧。于是，维林斯基就在1920年10月9日的《消息报》上说吴有亲苏倾向，他的新内阁将是有利于苏联的^⑨。

吴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作为和平解决国是的手段，得到当时的知识界，包括共产党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张国焘说，由于吴主张建立人民的组织，“吴佩孚就成了我们不能加以小看的一个人”。他说他本人和罗家伦还有其他人要把支持吴佩孚的一些想法加以宣传。他们与寓居上海的著名人物、吴佩孚的密友孙洪伊曾有过几次交谈^⑧。

吴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为中国工人组织起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按吴的说法，国民大会应包括各界——学、商、法、农、工等民众团体的代表。于是，工会便要求在未来的国民大会中也要有代表，工人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

虽然吴佩孚是在1920年崛起的，用张国焘的说法，是“时代的幸运儿”，但苏联和中共直到1921年末才定出与吴佩孚合作的政策。发表在1921年10月17日《国际新闻通讯》上的一篇文章就标志着这一变化。弗拉基米尔·西比利柯夫在那篇文章中把吴说成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位开明的领导人”^⑨。尽管有这种赞誉，但这时苏联对吴的支持决不是一致的。有一个亲孙中山的作者在1921年9月16日的《消息报》上就谴责吴是英国的盟友，已经与“世界的和中国的反革命”为伍^⑩。

1921年末，有一个苏联代表去洛阳拜访吴。我们没有材料可资证明这人是谁；但可能是从莫斯科来的共产国际密使马林，或是来自伊尔库茨克局的代表^⑪。不管是谁，这个代表对洛阳军阀的印象是，觉得吴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军人，但在政治上则是一个新手。这个代表好象是由李大钊介绍给吴的。1921年底，李通过他的同学、吴的部属政务厅长白坚武的关系，同时还通过吴在上海的熟友孙洪伊，才得以接近吴的。李曾几次去洛阳，就是在这些会晤中，李吴达成了非正式的协议，显然也得到苏联代表的支持，双方同意京汉铁路工人在即将发生的战争中与吴合作，以得到中原洛阳军阀的保护作为交换条件^⑫。

1921年底，在吴准备与东北军阀张作霖展开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能控制京汉铁路，对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时北京铁路局控制在梁士诒和叶恭绰手里，他们都是交通系成员，是张作霖在北京的亲信。他们通过动员工人参加交通部主办的学校和地区性组织来维持他们对工人的控制^⑤。吴为了要消灭交通系在这个地区的努力，便转向李大钊和中共。李对消灭交通系也颇感兴趣，因为这能使中共获得发展工人运动的地盘。在吴李达成的协议中，洛阳军阀答应在“保护劳工”政策下让中共在该地区发展铁路工人俱乐部和职工学校。作为交换条件，中共将在消灭交通系势力的斗争中支持吴佩孚，打起仗来，帮吴运送军队^⑥。那时候，路透社的报道和哈尔滨的一份左派报纸都说：“吴佩孚同情激进分子，如果发生一场政治斗争，吴会与激进党合作夺取北京政权”^⑦。

1922年5月，吴张之间的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和工人实现他们的诺言，积极帮助吴，在京汉铁路线上有效地为吴运送军队。美国记者J·B·鲍威尔认为，吴正是由于得到铁路工人的支持，才能取得对张作战的决定性胜利^⑧。为了表彰铁路工人在战争中的突出贡献，吴甚至把刻着自己肖象的徽章奖给他们。共产党工人组织家邓中夏曾说，工人对佩带这种徽章引为荣耀^⑨。（请见本页下面译者注）

战争结束后，吴也把他许诺的“保护劳工”付诸实践。在他给全国的一个通电中，把“保护劳工”作为他政治纲领的政策之一。他建议国民大会应建立劳动法以保护工人，还应成立劳工局

译注：作者在此断章取义地引用了邓中夏同志的话，邓中夏在其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6页中的原话是这样的：“当时确有不少工人把大帅的徽章佩带起来，引为荣耀。我们怎样办呢，我们向工人宣传，‘吴佩孚也是军阀，工人佩带军阀的肖像，是可耻的’，这样一来，工人就不佩带了。有带者必受同伴的耻笑和摔毁。这可见就在相互利用政策之下，我们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准备和吴佩孚斗争的。”

来改善工人待遇^④。为奖励中共对战争有功，允许中共放手发展工人组织。开始，吴提议中共党员应在高恩洪（吴任命的北京交通总长）领导的交通部去当文书。可是共产党员都宁愿积极组织工人运动和工会，而不愿坐在办公室当文书。于是，他们便借口缺乏当员司的经验而要求到铁路上去工作^⑤。1922年5月，经李大钊的一个老同事蔡元培介绍，高恩洪派了6个共产党员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何孟雄、包惠僧和李震瀛作为京汉、京奉、津浦、京绥、正太和陇海6条铁路的“密查员”。后来改称为育才科视学，于是共产党员便成为在交通部领工资的雇员，并可在这几条线上免费地乘车来往。吴还同意他们在这几条铁路线上组织工会，但不得利用工会进行政治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交通系的活动并直接向交通总长高恩洪汇报^⑥。在机构内部，他们受吴的亲信、李大钊的老同学、育才科科长黄统的保护。陇海铁路育才科视学李震瀛主管开封和洛阳站，与吴佩孚及其部属白坚武在洛阳保持经常的联系^⑦。

政治合作与孙吴联合

吴与中共之间的合作从与京汉铁路工人的合作开始发展到政治上的合作。李大钊、陈独秀及中共北京党部是同情吴的北京政府的。吴与胡适、蔡元培及研究系的一些人关系密切。他们都赞成在北京成立一个合法的有效政府作为把南北统一起来的第一个步骤^⑧。

建立这样一个政府的思想首先出自吴佩孚本人。吴在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后，便于1922年5月14日发了一个通电，建议恢复旧国会作为平息南北之间存在的对法律问题争执的第一步。在6月2日与曹锟的联合通电中，吴要求黎元洪复职，同时要求北京的徐世昌与广州的孙中山同时下野^⑨。成立这种在一个总统领导下的全国统一的立宪政府的思想得到知识界的广泛支持。吴在同

一天发出第一个声明。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王宠惠、罗文干及其他11个著名学者在《努力周报》上联名发表社论：《我们的政治主张》，建议所有能人，不管其党派如何，都一起为建立一个立宪的、全国的、组织严明的政府而努力^⑧。

1922年6月初，李大钊将这一政治运动情况报告给中央。他在一封信中向党员们说，在这样混乱的政治局面中，成立好人政府的政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他还说，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领导人都愿意为这一政治活动出力^⑨。抱着这样一种想法，李大钊便在两个月后，即1922年8月22日在西湖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提出了与吴佩孚建立友好关系的原则。他同意同孙中山及国民党合作，可是他建议这一合作原则还应扩大到吴佩孚。李还在那时对张国焘说，吴及其洛阳系是一些“曾给侵犯中国的日本以沉重打击的爱国军人”，“如果孙中山能与吴佩孚合作，那么中国的政治局势实际上就会沿着更加进步的路线发展”。据邓中夏说，陈独秀也是同意这一观点的^⑩。而且与吴联合的思想也得到苏俄派到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的支持，在他逗留北京期间，早就对吴佩孚与曹锟表示兴趣。越飞认为，孙吴合作是一个“重要的”意见^⑪。

后来在1927年越飞死后不久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越飞说，1922年他被派往北京工作时，当时中国有三大集团：孙中山、吴佩孚和张作霖。他说，苏俄以及他本人的政策，总的来说，是同情全国统一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因此对这些主要领袖人物的态度，既不支持也不冷淡。越飞说，他的政策是与这三方面都保持“积极主动而又友好的关系”^⑫。

可是，中共党员并不都赞成这一亲吴政策。被称为李大钊的“新政策”，由于以张国焘为首的“左派”反对派的抗议而在中共党内引起严重分裂。张及中共上海党部讥讽好人政府，认为这是迷惑人的政治妥协，并对李大钊与胡适、蔡元培的友好关系表示

不满。但是“左派”未能赢得这场争论。中央委员会虽然怀疑这个计划，但认为它值得一试。

吴赞成孙吴联合是有道理的。因为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以来，吴积极想从外国得到重新建设的贷款。他向国际银行团提出了借款的要求。首先是美国，还有英国，对承认吴佩孚是中国的“有力人物”，并帮助中国解决财政困难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⑧。可是，日本在1922年8月坚持说，除非中国已完全统一在一个政府的领导下，否则就不提供借款。日本驻华公使小幡指出，大国如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国谈贷款问题，会被中国人民认为是“对他们国家内部事务的无法容忍的干涉”^⑨。因此，至少是在立宪的原则下与孙中山和解就能使吴对外声称，中国正在走向统一，由此来增加他从国际银行团得到借款的机会。

吴一直是孙的一个主要敌人，孙始终发誓要消灭北方和中原的洛阳军阀和直系。但自从孙在1922年6月因陈炯明政变被逐出广东以后，他的立场有很大改变。8月，孙正在上海找出路。张国焘说，所以，当李大钊提出与吴佩孚合作的可能性时，孙对这一想法没公开表示反对。^⑩可能孙不便于反对共产党的建议，因为当时他正在寻求苏联政府的帮助，也可能是因为他处在失败的情况下，觉得如果要重新执政，孙吴联合对他来说，在政治上是有利的。总之，从1922年8月到12月，共产党和孙中山都竭力要想和吴佩孚联合。

早在1922年5月，孙就看到他的北伐是会失败的，并准备与吴佩孚谈判。美国驻广东领事J·C·休斯敦打电报给北京的舒尔曼说：“外交专员弗兰克·李承认，北伐是没有希望的，他想知道吴佩孚准备拿出什么条件，如果合适的话，他说他能说服孙中山接受”。五月底，弗兰克·李又对休斯敦说：“为了在统一中国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孙博士和吴佩孚没有理由不联合起来。”

孙吴合作的提议披露在1922年6月初他们之间正式的互换电

文中。6月2日，曹锟和吴打电报给孙，要他在南方放弃总统职位。四天后，孙发表声明，认为只有裁兵才是解决中国混乱政治局面的唯一办法。他说，政府可以把士兵作为劳动力雇用，让他们从事铁路建设。6月11日，黎元洪在北京复职那天，吴致电孙中山、外交部长及广东省省长伍廷芳以及江西和云南北伐军司令李烈钧，请他们来北方开会讨论全国统一问题。当孙于8月14日到达上海时，重新复职的黎元洪总统派私人代表到上海欢迎孙。次日，孙又发表一项声明，号召全国统一，废除军人统治制度以及解散军队^④。

孙吴联合的时机成熟了。曹锟与吴佩孚在8月底电孙，作为对孙的8月声明的答复。电文盛赞孙为建立共和国以及为护法斗争所作的努力。他们同意孙所提的意见，认为在当时来说裁兵是恰当的解决办法，并要求孙把他们之间的分歧搁置一边，以便同他们一起来改善国家状况。孙在复电中重申他的政治纲领，并要求曹和吴支持其纲领^⑤。孙在9月初曾公开承认，北方的军阀都倾向于他。孙说，就这些北方军阀来说（指曹和吴），只要他们有诚意并同意他的政治原则，他愿与任何一个军阀合作^⑥。

1922年9月时，孙对于“护法运动”的成功及中国重新统一的前途是相当乐观的。他在9月5日给北京国会议员的一封信中说，“北方军阀看来已完全认识到他们解散（1917年）国会的非法性，最后取消了那个命令……最近我写信给他们，提出了这一问题。”9月7日，在给他的部下蔡钜猷和陈渠珍的信中说，他已经发了一个声明，表示：“我愿意和北方军阀一起努力，使国家统一。我到上海后，已经和他们互通电报讨论这些问题……”。9月18日，他在信中告诉国民党的一些人说：“北方军阀对我们的护法运动表示了应有的尊重……因此，我们便互派了密使。”孙在这时候的机会主义策略用他自己的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1922年9月20日的一封信中，孙说：“在我党今日的政治活动中，为了使国家重新统

一，对各种思想和可能发生的事表示兴趣和同情是没有任何害处的。”^⑧

孙中山在上海曾与大大小小的军阀谈判。他派汪精卫赴奉天，派胡汉民赴福建。他与安福系的王永全以及安福系的另一名成员、浙江督军卢永祥谈判。于此同时，他还竭力使广西的云南军把陈炯明赶出广东。

孙中山和吴佩孚的接触，通过联络人孙洪伊于1922年8月下旬开始。孙洪伊原来是孙中山、李大钊和吴佩孚的朋友，从1916年以来就一直为“护法”奔走。张国焘说，当时有“大孙”与“小孙”之称，大孙指孙中山，小孙指孙洪伊^⑨。8月份，孙中山还派他的密友徐谦到河南洛阳，谋求与吴佩孚达成政治和解。由于有这一次的接触，徐后来就在由吴操纵的北京好人政府中当上了司法总长。

1922年9月19日成立的好人政府标志着孙吴合作的最大成功。新内阁成员主要是吴的亲信，有4个是孙中山的同情者：国民党员、内阁总理王宠惠；国民党员、孙中山的挚友徐谦出任司法总长；内务总长孙丹林，以及财政总长罗文干。谈判是在北京举行的。通过王宠惠和罗文干的说项，孙的两个代表邹鲁和谢持想使吴佩孚接受“三民主义”。^⑩1922年9月下旬，亲孙的内阁成员邓天仪去拜访吴的朋友、内务总长孙丹林。在谈话中，孙丹林对邓说，孙中山和吴佩孚两人性格相似：他们两人都坚决坚持他们的政治原则。孙丹林说，吴对孙中山提出的裁兵政策及反封建的思想完全赞成。但是要吴“抛弃他的权力基地而追随一种主义（意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个要求可能就有过份了。”孙丹林对邓说，孙中山应该下决心了，到底是跟段祺瑞和张作霖呢，还是和吴佩孚合作？他叫邓回上海告诉这位国民党领袖，希望他政治态度明朗。至于同吴佩孚谈判的问题，孙丹林说，他将尽力而为。他还说，吴佩孚曾向他提及，在将来的裁兵计划中，孙中山可以

当委员会的主席，吴自己任副主席。后来，孙丹林曾向一个记者说，好人政府中已经包括徐谦一事就明显表明吴对合作是有兴趣的。孙丹林还以此来证明吴在谈判中是有诚意的^④。

十月初，孙中山又派了两个使者张继和徐谦到洛阳去和吴商谈。吴那时对张说，他和孙都在为裁兵这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如果孙能够抛弃东北的军阀，他就能和孙一起来建设国家，“为今后几百年的建设打下基础”。吴还说，只要孙能实现他的裁兵意见，他的第三师可以由孙处置^⑤。作为回访，吴也派他的部下，济南警备司令孙友去上海与孙会谈^⑥。那时，吴为了确保与孙的友谊，据说曾给他的部将、湖北督军肖耀南发去电报说，孙“在上海十分穷困”，指示他务必在3天内从湖北经费中给孙送10万元去^⑦。

中共从1922年9月开始宣布支持孙吴合作。蔡和森在9月《向导周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评论说，孙中山和一个“比较好的军阀”吴佩孚的合作，应看作是“一种更为进步的现象”。但这种合作是否能取得成果，现在还不能这样说，因为他仍然怀疑，吴不仅是要利用国民党来得到重新统一的借款。可是，蔡把曹锟斥为“颓废的军阀”，催促“更为进步”的吴脱离曹锟，否则，吴也不会比段祺瑞或袁世凯好多少。蔡向读者解释说，孙吴联合是消灭张作霖的手段，是“革命过程中的必要的步骤”。当然，蔡说，吴在消灭满洲军阀后的态度如何，那还要看^⑧。

在邓天仪和孙丹林谈话以后，蔡和森于10月4日又以题为《孙吴合作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孙吴联合只能建立在“反帝和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的基础上”。他批评吴支持“亲美和亲英的北京外交系而让美国资本主义剥削中国”^⑨。蔡说，只有当吴明确表明他在对外关系上的立场以后，并解散“卖国的”外交系，他才能谈得上与孙中山合作。“最近，孙中山已公开声明他与苏联和德国合作的政策^⑩，吴佩孚是否同意这一政策？是否还象仆从似的只顾跟随曹锟，并为了不致使国际

资本主义产生怀疑^④而发表否认与孙中山联合的声明？”^⑤

10月11日，蔡又一次抨击外交系“支持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⑥。一星期以后，10月18日，张国焘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人民只需要由中国人民自己争得的和平统一，这种统一能提高人民的生活，而不是由英美帝国主义和吴佩孚一起为了控制长江流域而搞出来的那种统一^⑦。1922年10月25日，蔡和森重申孙吴合作的中心问题是完全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那就是说，吴首先要接受孙的民族主义，制订出能使中国有民族自决权的对外政策，并同意孙中山同德国和苏联合作的政策。第二，吴应该运用孙的民主原则，给人民以自由并废除治安警察法。第三就是民生原则，吴起码应该做到不让“美帝国主义”的军队来镇压唐山的罢工运动^⑧。

在1922年7月至11月这段时间里，苏联也同样热衷于使吴佩孚与孙中山结成联盟。自从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张作霖以来，苏联就把吴看作是真正拥有实权的人，在支持吴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A·霍特洛夫在1922年7月2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严厉批评孙中山与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联盟是“非神圣联盟”，建议孙应该同掌握着国家煤、铁资源的吴佩孚所在的中原地区联合^⑨。德尔塔与罗斯塔通讯社社长霍德洛夫亲自到洛阳访问吴。据约瑟夫·霍尔说，那时候去洛阳见吴的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不下数百人，但吴对这位苏联代表的兴趣比较大。吴后来对霍尔说，“我告诉你，在所有那些来访者中，我对那个霍特洛夫最感兴趣，他除了恭维我以外，还提出建议和要求。”^⑩

另一个去拜访吴的苏联人是从海参崴来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弗拉基米尔·维林斯基，他是吴的主要辩护士。他在1922年8月12日《消息报》上写的文章中说，吴很赞许红军。据吴的秘书讲，维林斯基在文章中还说，吴大帅会统一中国。“将来，中国、苏联及德国会联合在一起。”^⑪在三天后的《消息报》上，维林

斯基又写文章，说吴就是代表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支持的“中华民国”。^⑤1922年11月1日，维林斯基在《共产国际》再次撰文，称吴为“自由主义者，具有民族主义和反帝思想，得到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他还说，中国共产党也认为，吴是“军阀当中最好的”，并赞扬他为废除武人专制所作的努力^⑥。

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也持同样观点。他在1922年11月16日写道：“中国最近发生的一些大事，如亲日的张作霖的倒台，支持中国民族政策的力量的加强，特别是吴佩孚的支持，这一切都大大不利于日本在中国的地位。”^⑦

1922年秋天，对吴佩孚抱这种赞许态度的，不仅是外交人民委员部，还有共产国际，它也支持吴，并把他看作是中国的革命资产阶级势力。拉狄克在1922年11月23日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也讲了他很多好话。他先向与会者概述了吴与中共最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合作的情况，以及中共的铁路工人后来又如何在华北得到了立足点。然后他说，吴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为争取中国革命前途的斗争”，而吴对工人的支持乃是“对解放运动的支持”。同时，他对与会者说，象吴佩孚这样的资产阶级是摇摆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并最终会背叛劳动人民。可是拉狄克认为，如果要想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那就必不可免地要找象吴这样的坏人^⑧。

孙吴联合的破裂

孙中山从10月中旬以来就感觉到孙吴协作定会破裂。和他原先所抱的乐观态度相反，他现在对北京的政局表示厌恶。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北京这些人都堕于恶习，在此已无正义可言。京畿只成了狐群鼠辈的聚集之处。”他指出，甚至连甘当军阀傀儡的黎元洪对这种局势也表示不满。而且据孙说，吴佩孚完全是孤立的^⑨。

这时中国共产党对好人政府的前途也不抱希望，张国焘及上海的一些人开始就是持反对态度的。大约在10月，张与陈独秀商量后便去北京找李大钊，想说服李及中共北京党部同北京的知识界断绝关系。那时李也因直系分裂为保定派和洛阳派而感到很沮丧。于是李便召集中共北京党部开会，并提出与北京合作问题。一些支持好人政府的人批评陈独秀经常提出一些新问题，但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⑩。

破裂的第一个迹象发生在10月19日，吴佩孚利用武力在他的一个将官的直接指挥下，镇压了中共在唐山开滦煤矿举行的罢工。共产党的一位工人领袖高申德于10月25日痛斥吴对罢工工人的镇压，谴责吴的行动“是军阀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穷苦人民的联合进攻”，一面是吴佩孚这样的军阀“野蛮镇压罢工并威胁解散工人俱乐部”；另一方面则是帝国主义分子如外交团之类，在美国军队支持下威胁工人要接管煤矿，而不是立刻来解决同工人的纠纷。高说，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军阀和外国是抱着加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同一个目的而勾结在一起的^⑪。

接着而来的是曹锟及其保定——天津派打倒了好人政府。好人政府是孙吴协定取得成功的最明显的标志。11月18日，曹的两个亲信，众议院的正副院长吴敬连和张伯烈指控财政总长罗文干受贿。结果，内阁总理辞职导致整个内阁瓦解^⑫。联系到好人政府的垮台，中共对孙吴协定以及他们与北京政府的关系有了较深的认识。蔡和森在12月6日的《向导周报》上著文说，改良主义总是以失败告终的。在武人政治下没有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是可以实现的。蔡对孙吴协定的破裂提出两个原因：（1）好人政府的垮台是黎元洪和曹锟破坏孙吴协定的结果。他说，保定派最近了解到孙吴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协定，其中还涉及到“领导问题”（即谁当总统的问题）。据说让孙当总统，吴当副总统^⑬。曹锟还了解到王宠惠是他们的联络人。结果，好人政府就成了保定派的攻击目

标。(2) 孙吴协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样一种联合不符合外国帝国主义的愿望。帝国主义只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而把孙吴协定看作是“两种进步势力的联合”，一个是表现出极端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另一个是“进步的军阀”吴佩孚，由于他崇拜爱国英雄岳飞而具有爱国的、反日情绪^④。

最后，越飞在北京与吴佩孚政府的谈判也遇到很大挫折。在与北京政府谈判中，他遇到很多困难，可是吴并不帮助他来克服这些困难^⑤。北京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苏联完全归还中东路，并要求苏军从蒙古撤军，然后才能进一步谈判。

中共在10月底谴责吴的对外政策，并指责他对中苏谈判没有诚意。振宇在10月25日的《向导周报》上写道，虽然吴在处理山东问题上有“爱国心”，可是他任用亲英亲美的顾维钧则是一种“靠不住”的行为。他说，“顾成天忙于向国际银行团借款，而不认真参加中苏谈判的会议，而这是能使中国取得独立和平等的会议”。文章在结尾处还指出，“大军阀吴佩孚正在保护一个新的卖国贼”（指顾维钧）^⑥。

越飞眼看北京谈判很难取得进展，十分懊丧地在11月5日公开宣称，在与中国未来的谈判中，苏联将不再受1919年和1920年宣言的约束。不管怎么说，那时政局动荡，也无法谈判。外交部长一职由顾维钧转为王正廷，又从王变为施肇基。11月8日，孙铎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谴责吴同陈炯明合作，孙把陈炯明说成是“卖国贼和英帝国主义的走狗”。^⑦

这时，孙中山在军事方面倒取得了进展。到10月21日，孙的北伐军在许崇智指挥下占领福州，这说明孙很快就会收复广东这个权力基地。到11月底时，孙开始声称与苏联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他在1922年11月21日给蒋介石的信中十分强调权力基地的重要性，认为它是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必要筹码。他说：“吾幸而得彼津果，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

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⑥孙中山在信中还提到，他和苏联人的谈判，“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⑦这些困难可能是由于越飞不同意孙中山的要求而造成的。据张国焘说，孙中山派了张继去见越飞，要求苏联帮助国民党向北方的北京政府开展军事进攻。越飞直截了当地拒绝这一要求，而且说清楚，“现在不具备实现这一计划的起码的可能性。”^⑧孙对苏联与直系的关系一直深感不安，特别是越飞与北京的勾勾搭搭。孙在给越飞的信中，对谣传苏联准备与吴佩孚的北京政府联合一事表示关注。可是，越飞通过张继告诉孙说，苏联在革命后必须与其他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契切林也对孙说，如果苏联和中国能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两国都是有益的^⑨。

直至12月中旬，越飞还希望孙吴协定能够成功。他于12月12日从北京发出的信中写道，希望吴和孙“能共同进行在中国革命的前列”^⑩。但现在就不乐观了，他提醒说，孙吴协定可能不会成功：那又有什么关系，“统治者换来换去，老百姓是不会变的”^⑪。

据吴佩孚的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说，孙中山在12月曾想再作一次尝试争取与吴联合。冈野说，孙于12月初指示他的日本专家陈宗夫到洛阳去同吴会谈。陈于1922年12月1日从东京动身，与他同行的是刚接任吴的顾问职务的冈野增次郎。他们在12月中旬到达北京。他们在北京期间，陈把据说是“孙中山的苏联问题专家”朱济生（音）介绍给冈野增次郎，朱有任务找孙，刚从苏联回来。这三人在吃饭时便谈了起来。

朱首先谈他自己。说他年轻时住在苏联浦桥地区，在那里学的俄文。后来成了朱政的朋友，并和他一起在山东参加了1913年

的二次革命。最近他作为孙中山的密使曾几次去苏联。朱在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就谈到苏联的政治制度是如何适合于中国，想以此来打动冈野，显然是希望他以后能说服吴佩孚接受共产主义。他说，吴认为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就是使国家苏维埃化，是苏联的阴谋，这是错误地理解了共产主义的实质。朱解释说，输入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必要的一步。“中国在过去已经接受过各种政治制度，象‘君主政体’、‘极权统治’以及‘民治’等等，但没有一个成功的。最后使中国成了病夫，而且越来越弱。苏联过去也象中国这样弱，但经过共产主义熔炉的冶炼，它就变强了。”然后朱接着说，他对冈野从日本远道而来为吴佩孚服务深为感动。他对这位日本顾问说，吴具有以“君主政体”来统一中国的大志。他们分手时，朱请冈野带一罐米给他的“山东老乡”吴佩孚，说这个礼物能使吴身体健康^⑭。

冈野和陈宗夫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后，于12月21日前往洛阳，在12月23日来到吴的住地。据冈野说，吴并不热心接见这位客人。但后来还是同意意见他了。在只有吴、陈和冈野参加的秘密会见中，陈宗夫向吴谈了他此行的使命。说孙中山有个建议，希望能在汉口与吴见面，共同拟订一个重新统一国家的意见。可是，吴对这一意见不感兴趣。而且直率地对陈说，孙中山是个无用的空想家，他自称有一个建设铁路的10年计划，但从来就未造出一节铁轨来。就这样，陈无法完成他的使命，次日便匆匆离开了洛阳^⑮。

这时候，苏联与北京的关系也更紧张了，1922年12月底及1923年1月初，直系军阀及内阁阁员公开批评苏联在蒙古扩张势力^⑯。而孙中山与越飞的谈判倒有进展，越飞终于在1923年1月17日到达上海。越飞完全改变了对吴佩孚的态度。他在1月18日写了一篇文章，五星期后即1923年2月22日发表在《消息报》上，他谴责吴的反孙运动和帝国主义是统一中国的两个障碍。他对孙中山则给

予高度评价^⑩。这时候，孙已经收回了他的根据地，能够以实力来和苏联人讨价还价了。就在越飞到达前两天，云南军和广西军夺回了广东，孙又被请回南方。显然，由于孙的胜利，与越飞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1923年1月26日，孙越达成协议，并在报上发表了。那时，孙认为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但同意与苏联合作，并以不要求苏联立刻从外蒙撤军作为妥协条件。

由于手头缺乏第一手材料，因此很难确切了解吴、孙、中共和苏联这四个方面对孙吴合作还说了些什么。也许维林斯基在1月中旬写的文章露出了一点口风。这篇文章载于《国际新闻通讯》，他追溯了1922年5月的第一次直奉之战，然后写道：“孙中山在与吴佩孚的斗争中，看到了吴的有利地位，他不仅身处中国的工业中心，而且还得到国内资产阶级的支持，这些资产阶级能提供使中国从外国奴役下获得解放所需要的财力……他认为，他的部下在南方的胜利更有力地确立了他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和势力，在这样一个时候，他旅居北方会加强他在南方的地位……”他接着写道：“直到现在，吴佩孚对孙中山的态度还很冷淡，虽然他不否认孙无疑是中国最合适的元首。我们觉得，吴的小心谨慎是因为他认为孙是南方的领袖，是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人，所以这个华中地区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便对孙中山持保留态度。我们有充分理由估计，目前在上海的孙中山已经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了非正式的协议，吴也准备迁就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再说，这些思想并没有一点危险性，是非常温和的，并且与建立一个“伟大中国”的民族意识和理想完全一致。只要帝国主义集团及其在中国的反动联盟实现他们的计划，并以孤立相威胁，吴佩孚就会和孙中山达成协议，并承认他是中国的领袖。孙看到了这一点，并把他的行动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因此，收复广东就提高了孙中山在北方的影响。我们收到的许多电报都说，北京政界正非常活跃地与孙中山谈判重新统一中国的问题，这都实有其事。现在，使中

“国南北重新统一起来的关键，掌握在‘中国革命之父’手里，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局面。如果我们刚听到他的部下在南方胜利的消息，紧接着又听到孙中山在吴佩孚军队的支持下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总统，那我们不必感到惊奇。”^⑩

从维林斯基的文章以及蔡和森在12月6日发表在《向导周报》上的文章来看，孙吴谈判中讨论到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领导问题”，即孙应该当总统，吴应该是在幕后控制的副总统。维林斯基在1923年1月27日《消息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反复谈到了这一点，讲了吴为统一中国而让孙当总统的情况^⑪。如果吴真照着这个条件去做的话，那么整个直系就要彻底瓦解。在他上面的曹锟是无法容忍这一意见的人，因为曹本人也正想要当总统。所以曹在知道谈判的条件后，便立刻和他的亲信一起，制止了谈判，并造成内阁危机，使王宠惠内阁随同与孙中山进行政治合作的全部计划一起垮台。

对吴佩孚来说，以联合内阁的形式进行政治合作是一回事，而接受孙的三民主义并与苏联为伍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成立南北的联合内阁可以向西方表示，中国正在走向统一，以此来提高他从国际银行团得到借款的机会。但是，与苏联共命运则会危及他与西方的交易，这显然不是吴所愿意冒险的。因此，尽管中共反复要求，吴还是顽固地拒绝接受孙的三民主义，并声明不同德国和苏联合作。中共和孙中山曾反复对他说，同社会主义思想和解并不“危险”，接受共产主义也并不就是使中国苏维埃化或者是帮苏联实现它的“阴谋”。吴对与苏联合作抱犹豫态度就是维林斯基所说的那句话：“这是华中地区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所持的保留态度”。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

中国共产党的工人和吴佩孚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1923年1

月，这是有充分事实可以证明的。吴在听了李大钊的建议后，便允许共产党职员在各条铁路线上组织工会。工人俱乐部也相继在湖北的金属制造厂、矿山、火药厂、纱厂及烟厂建立起来。工人开始发行他们自己的报纸如《工人周刊》。到1922年底时，交通系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华中了。

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共产党员在武汉地区的工厂和铁路组织罢工。有些罢工使吴在经济上损失很大。例如1922年8月25日京汉路长辛店站的罢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理由是他们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备受艰辛。经过交涉，吴佩孚完全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按共产党工人领袖邓中夏的估算，单就增加的工资一项来说，就要使吴每年多支出约七、八十万元。这就迫使吴用新的措施来控制铁路。他命令所有士兵都学开火车。还派京汉路南段段长冯?霖组织“同人通谊会”以代替共产党领导的“铁路工人俱乐部”^⑧。

吴还用武力镇压了其他地方的罢工，如8月汉阳兵工厂的罢工，9月安源煤矿工人的罢工，以及1922年10月隶属于英国的开滦煤矿的罢工。最严重的是唐山开滦煤矿工人的罢工，遭到吴的直隶警察厅杨以德的镇压。吴的交通总长高恩洪指责共产党煽动工人罢工，命令关闭唐山工程学院作为根除“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手段。尽管共产党痛斥吴佩孚是“大军阀”、“英美帝国主义的同伙”，吴并不希望同工人的关系破裂。他于10月25日发表通电，重申他的“保护劳工政策”以此来安抚工人。他在电文中说：“我强烈要求国民大会制订劳动法以改善工人待遇，并使他们摆脱目前的不安定状态。但眼下工人应该要忍耐，不搞任何煽动和骚乱”^⑨。

劳动组合书记部不管与军阀发生的这些斗争，仍然推行开展全国工会运动的计划。通过了在1923年初于武汉召开大会的决议。邀请京汉路全线16个工人俱乐部的代表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开会成立铁路总工会。并邀请其他铁路及武汉地区的工人组织

参加会议。召开这次大会的消息无疑由吴佩孚的部下向他作了报告。报上也登了消息，并且也正式向路局及当地的军警呈送了通知。据说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曾把2月1日定为正式放假日，并在京汉路为去郑州开会的代表安排了专列^②。所以，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那时有一个去郑州访问的记者说：“工人对吴佩孚将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敌意，相反，在提到他的名字时还多少有点好感。”^③可是，在1923年1月28日，吴突然给郑州警备司令金永炎一个电报，命令他要不惜一切代价禁止大会召开。

要了解吴为什么突然暴跳如雷，大施横虐，就要和他与中共、与孙中山的关系联系起来全面考虑。共产党的工人所以被批准在武汉地区活动，是因为吴佩孚与李大钊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即中共答应帮助吴消灭交通系；作为交换条件，吴批准他们组织工人俱乐部，但不得把这些俱乐部用于政治目的。但到了1923年1月时，吴从部下得到报告，说工人运动已变成国际的激进运动，而且可能是由苏联指挥的。赵继贤在写给吴佩孚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调查材料中，查出武汉地区工人活动的根子是王纯（音）。他写道，王是一个工人领袖，“经常来往于天津和上海之间，而且还去过苏联和日本。王想把中国的工人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联系起来以加强整个运动的力量。”^④1月25日，赵打电报给吴，建议镇压运动并要求吴帮助他阻止工人召开工会大会。赵否认当地官员曾同意工人召开大会。他提醒说，如果不镇压这次运动，“他们就会把这种活动作为一种惯例，而且会发展得比现在还要厉害。最后，群众就会超过法定的限度而不知道他们自己都干了些什么……”^⑤

1月26日公布的孙文一越飞宣言，是使吴终于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驻天津的美国总领事J·C·休斯敦在向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当吴佩孚得到李大钊已经同意国民党的计划这一消息时，李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吴下令逮捕他^⑥。李逃到上海，藏在孙洪伊家^⑦。后来当他向张国焘谈到吴为何作出这一严厉决定时，

孙洪伊说的也是这一原因。孙说，吴是被这一消息触怒的，当他听说工会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之间有关系，当中共公布了与孙中山联合，并以此作为推翻他的手段时，他便勃然大怒了^⑧。

曹锟也认为，工人运动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都是推翻北京政府的同一个阴谋。他在2月下旬提醒政府要防止工人运动蔓延全国的危险。因为它表面上是要求废督裁兵，而实际上是为反对当局而搞的政治阴谋，曹锟以此来证明镇压工运的必要性。他还说，只要详细调查一下就会清楚，这是孙中山的主意，他在要求裁兵的掩饰下，造成工人要在全中国举行总罢工的思想^⑨。

吴怕中共与孙中山的新的联合，又怕武汉地区工人活动的加剧，再加上曹锟要求镇压工人运动的压力，这就促使他在孙越宣言发表后仅两天，便决定禁止工人召开大会。他在1月29日电令郑州警备司令金永炎，湖北督军肖耀南，河南督军张福来以及北京警备司令王怀庆采取必要的军事防卫措施^⑩。

吴对工人采取的突然行动使中共的工人大吃一惊。总工会书记、陇海路开封与洛阳段的育才科视学李震瀛提出去见吴佩孚，问题很易得到解决。因此，李与其他4人于1月30日前往洛阳与吴商谈。吴对他们说，他一直是同情工人的。但这时北京的政局十分不稳定。学生同教育部发生了冲突，还谣传要发生推翻黎元洪总统的政变。吴说由于郑州是军事区，因此要在那里开会是不可能的。可是，吴的态度给他们的印象是：总工会可以成立，但出于军事上的安全考虑，不能召开大会^⑪。

工会领导人在1月31日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按原计划召开大会。但终于遭到镇压。于是工人代表议决发表通电，提出下列要求：撤革京汉路局长及郑州警察局长；送还被军警扣留的匾额礼物，赔偿工会一切损失；要求每星期休息一天，照发工资；阴历年放假一周，也照发工资。最后号召2月4日京汉路举行总罢工。

2月4日，京汉路全线处于瘫痪状态。在江岸、长辛店和郑州

三个大站，双方发生了恐怖与反恐怖的斗争。

在这个时候，直系军阀得到了更多的关于孙中山与工人之间关系的报告，说孙中山的一个工人组织者在北京执行秘密任务。军队便包围了据传他所藏匿的两所房子。还传说这些鼓动者要颠覆北京的军事机构^⑧。2月5日，北京警备司令王怀庆报告说，罢工得到北京大学学生的支持，并说这是一场反对直系军人的斗争。王说，工人学生的罢工“显然是有人煽动的，目的是破坏公共秩序，如不立刻镇压，就会危及当地的安全。”^⑨王还报告说，鉴于情况紧急，他已派了一个营去长辛店。

最后，吴和其他军阀决定用武力来结束罢工。1923年2月7日，军队封闭了三大站的工会机构。江岸的工人在斗争中遭到重大伤亡，死37人，受伤者多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由于拒绝复工被斩首示众。国民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被捕，并在2月15日遭枪决。军队在长辛店的屠杀造成4人死亡，30多人受伤。由国民党员及工人的同情者在汉口主办的《晨报》被封闭，肖耀南还逮捕了报社工作人员。政府当局检查了所有的电报和文件^⑩。

最后，在2月9日，总工会在直系军阀的武力威胁下被迫复工。武汉地区一些由铁路工人和工人组织开展的同情性罢工也遭到了镇压。许多城市都宣布了戒严法。虽然大屠杀遭到内阁议员、商界和学界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但是，吴和其他军阀决定以武力来恢复秩序。在吴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工人俱乐部被封闭了，很多工人领导人被驱入地下，《劳动周刊》也被查封了。

吴佩孚对工会的残酷镇压是不断加剧的形势造成的，到2月份就发展到了顶点。关于吴的动机，我们只能猜测，但看来他作出这种极端的决定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对吴来说，铁路显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光是京汉路南段，每年他就可收入110多万两银子，成了他的军饷来源。单是1922年8月长辛店的罢工就使

他每年损失80万元，这是他与控制着南段的曹锟不得不共同分担的一笔无法小看的数字。由于京汉铁路是北京——武汉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路，铁路工人中的政治骚乱不利于运送军队。他禁止在郑州开会的理由是因为那个城市是军事战略地带。第二，吴最后采取的这一镇压措施是他从1922年8月以来反对一系列示威游行、罢工和谈判的顶点。吴曾用武力镇压了汉阳钢铁厂的8月罢工，安源矿工的9月罢工以及10月开滦煤矿的罢工。2月初又发生了越来越激烈的事件——2月1日在郑州召开的大会，2月4日举行的总罢工，因总工会谈判破裂而造成的冲突——这些显然导致吴诉诸于他惯用的高压手段。由于工会领导人不听吴的命令，触发了一系列事件，最后发展到吴对工人进行屠杀。

第三，由于直系军阀越来越害怕工人的骚乱与孙越宣言有关，所以吴便采取了镇压手段。从吴决定禁止工人在郑州开会的时间以及后来直系几个主要军阀间的来往电报，都可说明直系是怀疑南方插手了整个事件的。还有，吴企图逮捕李大钊以及孙洪伊对张国焘的解释也可以证明这点。孙说，吴对共产党公开发表国民党——中共——苏联的联合作为推翻他的手段这种做法极为恼火。可以说，吴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是对共产党工人的领导与国民党结成新联盟的一种报复。

这次屠杀最后结束了共产党工人原来与吴佩孚保持的良好关系。李大钊以失望和愤怒的情绪写信给他的同学、吴的部下白坚武，谴责他背叛了他们的友谊。同时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一切个人来往^⑤。后来李觉得必须离开他所藏身的孙洪伊家，因为共产党反对孙与吴佩孚的关系^⑥。2月2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向导周报》发表宣言，痛斥吴是一个“以‘保护劳工’为假面具的阴险狠毒的军痞”。为了说明以前和吴一致是必要的，中央委员会解释说，在某些时候，党对于“比较开明和比较进步的势力”必须给以有限度的支持，以便提高工人的福利。这就是以前支持吴

的原因。但是当吴在二·七大屠杀中暴露他的本质以后，党能采取的唯一方针就是号召全国人民“与吴佩孚这个军阀作斗争，他已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且也是所有要求自由的人的敌人”^⑧。

中共后来还解释他们为何要重新处理与吴的关系。这是由一位共产党评论员孙铎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此文发表在1923年5月9日的《向导周报》上。孙铎说，吴佩孚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在思想上也不比其他任何军阀开明。在对外事务中，他不懂得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国际地位；在国内，他不知人民疾苦。他只是一个武人。他的力量来自强大的军队。孙说，象吴这样一个具有军事实力的人，可以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国家。可是由于下列原因，吴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第一，他没有一点革命的思想。由于他无法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因此他不能参加任何国民革命运动。第二，吴思想狭隘，武人主义是他的唯一目标。他不能与人民为友，因为他必须要剥削工人和搜刮人民来满足他军饷的需要。所以他拒绝给工人以集会的权利，并镇压了他们所有的组织。结果，吴只能成为“袁世凯第二”或“军事专制主义者”。所以他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孙铎在文章结尾时说，从现在起，国民革命应致力于消灭吴佩孚，“他正在企图使自己成为专制的帝王”^⑨。

1923年6月，中共谴责吴用武力来统一全国的政策。在宣传上，把“打倒军阀主义！”和“打倒帝国主义！”这两个口号连起来用^⑩。在1923年后半年及1924年全年中，共产党不断地揭露“大军阀”吴佩孚与其他直系军阀向“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帝国主义”商借贷款，并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武器弹药，以此来证明他们用这两个口号的正确。他们还号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推翻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恶魔^⑪。

京汉铁路工人遭到屠杀的消息也使苏联人大为吃惊，他们的

反应是立刻谴责吴破坏罢工的行为。在枪杀工人后的一个月，即192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谴责这次屠杀。赞扬工人的罢工是“反对英国、日本及美国资本的军事工具的英勇斗争”，号召工人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中国同伙的无情斗争”^④。到4月份，才向苏联读者更为详细地报道了“二七”事件。文章说，这次大屠杀是“按吴佩孚的命令，由一群恶狗所干的暴行”，还叙述了施洋被捕经过和在吴的命令下被杀的情况，以及吴下令逮捕中共的周刊编辑11人。还说北京内阁总理宣布李大钊和陈独秀应对骚乱负责，下令捉拿归案，处以死刑等^⑤。苏联《新东方》杂志评论员穆辛，指责吴得到美国的支援，谴责了这次屠杀^⑥。

总的来说，苏联的指责似乎比中国人要温和。除了有两篇文章说吴是外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并谴责他枪杀工人的行为外，苏联报纸对这一事件未作报道，有些报纸干脆对吴暂时保持沉默。实际上，马林曾在一篇文章中埋怨罢工是个祸患，由于在中国以外的报纸上没有报道屠杀事件，只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简单地提到^⑦。

苏联绝没有把镇压“二七”罢工看作是他们与吴佩孚关系的终结。罗易说，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谈判人加拉罕，就是想以得到吴佩孚的支持来开始他的中国之行的^⑧。他在1923年12月一到北京，就立刻径直去洛阳，希望与吴和解^⑨。加拉罕的亲吴方案取得了一些成功。在他到达时，吴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有了变化。英美由于日本的强烈反对而拒绝了吴的借款要求。面对着与张作霖的战争，吴的财政发生了困难，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将使他得以窥视迄今尚未动用的财源——对俄庚子赔款。

中国方面与加拉罕谈判的是王正廷，他是吴佩孚的人。从1923年9月到1924年3月的整个谈判过程中，王都是直接请示吴的，并多次去洛阳以得到大帅的支持^⑩。1923年11月，苏联评论员对他们与洛阳关系的进展表示乐观。吴佩孚的主要吹捧者维林斯基在1923年11月28日《消息报》的一篇文章中主张外交人民委员

部扩大它们在华中的影响。他强调华中是个“战略中心”，“具有最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拥有最多的自然资源”。他断言吴的党是“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权”，“政权将会牢固地掌握在他手里”，并“能把中国各个方面的力量合成一体”。这时维林斯基对吴的看法清楚地反映在他写的《中国的军事家：吴佩孚》一书中，这本书于1925年出版。他否认吴是英国的代理人或受帝国主义影响。他坚持说吴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并说由于他的活动范围在中原，远离沿海地区，所以很少受帝国主义的直接压力。而且，吴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要统一中国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就此来说，他与苏联结盟是有好处的。维林斯基认为吴支持签订中苏条约是反对张作霖的一个战略行动。他说，吴公然反抗外交团的意见而赞成签订条约，实际上就证明了他的民族主义的和反帝的意识。按照维林斯基的说法，吴和孙中山一样，是主张苏联、德国和中国结成三角联盟的。至于吴孙之间的对抗，他解释说，那纯属两人个性上的冲突，孙不愿服从吴或曹锟，吴曹也不肯听孙的。正如维林斯基在书中所说的，问题比较难办，因为中国只能有一个总统^⑩。

1924年1月26日，在苏联大使馆的加拉罕的翻译A·I·伊万诺夫去洛阳与吴商谈^⑪。终于在1924年1月底，王正廷与苏联人达成了协定草案。王立刻派他的秘书鲁汉（音）带着协定到洛阳去请吴签字^⑫。吴和鲁一起审查了这一草案，最后盖了章。王正廷携此草案至加拉罕处，他们于1924年3月14日在这一协议上签了字。可是王遇到了麻烦，北京内阁不批准这一协议，理由是：
（1）苏联没有废除蒙古—苏联条约（2）协议上关于红军从蒙古撤出的问题非常暧昧；（3）确认了要把苏联以前在中国的财产归还苏联政府。

可是，王得到洛阳军阀的大力支持，吴要求立即缔结中苏协定。吴只派他的私人代表到北京去说明他的意见，但从3月18日至26日，他给北京发电函不少于6次，坚持要北京无条件地实现

对加拉罕的诺言。吴在打给国务院的第四封电报中说：“北京政府别装腔作势而失掉了一笔好买卖”。他解释说，苏联已承认外蒙是中华民国的一个主要部分，并同意在以后的会议上研究撤军问题；所以它并不想在中国的国家主权问题上打什么主意。至于说到把以前的苏联财产交给苏联政府的问题，吴说这在国际条例中是有规定的，并举了战后把德国财产归还给战败的德国这一例子^⑩。

中苏协定终于在1924年5月31日由加拉罕与代替王正廷谈判的顾维钧正式签定。7月初，吴发表通电，提出要把大约2亿多元的对俄庚子赔款用于铁路建设与开发中国西北地区的资源。虽然中苏协定上规定，这笔款项应用于教育事业，但吴坚持说，如把这笔钱首先转用于铁路建设，对国家更为有利，以后可以把铁路上的收入再用于促进教育事业。吴甚至叫孙丹林起草一个建设两条通向内蒙的铁路的计划，以及在河南郑州的财政中心建一座银行，想法要利用这笔钱。可是由于教育部和外交部的反对，究竟如何来用这笔钱，就成了需要进一步讨论和决定的悬案^⑪。

吴在武汉重新出山后共产党与吴恢复联系

当吴佩孚在1924年秋天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遭到失败后，他与苏联的关系也就黯然失色了。那时他逃亡在湖北、河南交界处的鸡公山。但到1925年秋天，他又时来运转。那年8月，他在武汉以“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头衔重新出山。又一次统治华中地区。

中国的政治形势在吴失势后发生了很大变化。1925年8月，在总执政段祺瑞主持下的北京政府一点不起作用。满洲军阀张作霖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竞相争夺控制北京。两人都在试探是否有可能与吴结成同盟。冯玉祥在1925年4月已和苏联达成协议，苏联答应为冯提供物质援助和军事顾问。所以吴认为冯玉祥是敌人，不仅在军事上发动政变反对过他，而且也是共产党的代理人。从

1925年8月至12月，吴发表了许多“讨赤”的讲话来反对国民军领导人。吴在1925年10月22日说，他反对共产党和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是“国家的破坏者”。有记者问及，要是冯玉祥想同他和解，他对国民军和国民党抱什么态度时，吴回答说，他是不会让他们存在下去的^⑩。

这时，苏联和中共确实正在努力使吴冯和解。1925年后期，苏联政府授权加拉罕去与吴佩孚达成非正式的协议。要是吴取得了胜利，加拉罕就承认他是直隶省的统治者及北京政府的领袖，中央政府本身则应由冯玉祥的人及支持广东的人来组成^⑪。苏联驻沈阳副领事索洛科夫这时报告说，赛福林对吴佩孚很感兴趣，他对吴和冯玉祥的评价都很高^⑫。1925年12月12日，彼得·乔伊在《中国周刊评论》上说，有几个苏联人经常到汉口吴的司令部去^⑬。根据1301号特工人员的报告，有一个名叫尼波戈尔诺伊的苏联人同吴佩孚及冯玉祥都有联系^⑭。

中共也帮助推动吴冯联合。陈独秀在1925年后期去汉口与吴佩孚、肖耀南商谈，他通过前内阁总理唐绍仪的说项，希望实现吴佩孚—冯玉祥—广东这三方面的联合。在吴这方面，对国民政府表示好感。作为回访，吴派潘赞华带了陈独秀和唐绍仪的两封介绍信去广东会见汪精卫与蒋介石^⑮。

可是，在1926年1月，吴决定弥合与张作霖的不和而不愿同冯玉祥言归于好。吴之所以选择满洲军阀而不愿与冯联合是有原因的。首先，冯曾在第二次直奉之战中发动政变背叛吴，对此，吴是不能宽恕的，而且对他部下所干的这件事总是耿耿于怀。第二，这时吴正积极通过香港政府和汉口的英国领事以及贾丁·马西森公司，谋求得到英国的支持。他利用共产党的威胁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英国政府给他经济援助^⑯。他没有兴趣同苏联支持的冯玉祥交朋友，于是便转向张作霖，在1926年1月5日同他以前的满洲敌人结成了“讨赤统一战线”。

为了挫败“讨赤统一战线”，中共想实行一种政策，就是把直系的人拉出来在北京成立临时政府以反对张作霖^②。但在这一政策付诸实施前，吴就决心开展讨赤战争了，在1月19日进攻国民军在河南的要塞。中共在1月和2月，在《向导周报》和《劳工日刊》两个刊物上对吴展开猛烈的攻击。彭述之于1926年2月3日在《向导周报》撰文，称吴与张的“讨赤统一战线”是“两个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结合”。他要求群众投入一切反吴活动，如组织全国示威游行和帮助国民军保卫河南，抵抗吴的进攻，等等^③。彭还号召铁路工人起来为自己报仇，帮助国民军在与“镇压工人的恶魔”的战争中运送军队。在“二七”罢工纪念日1926年2月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表的宣言中用了这样的口号：“打倒吴张联盟！打倒吴佩孚！打倒张作霖！打倒英、日帝国主义！”京汉铁路总工会、河南省总工会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也联合发出通电，痛斥吴是“狡猾的强盗，他集合了河南的所有盗匪，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④。

吴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来回答这些谴责，并称冯玉祥是一个“犯上的奸细”。他说，由于冯暗中与苏联达成了秘密协定，他就不得不“用武力来压制这个叛徒”。他要求其他军阀抛弃派系斗争，同他一起参加“讨赤”，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看作是当前的主要问题^⑤。在战场上，吴佩孚获得了辉煌的胜利。1月夺回了河南，3月又占了天津，洛阳军阀率领大军准备向首都挺进了。

由于吴的咄咄逼人的胜利，苏联不得不与他重新恢复关系。1926年3月25日，苏共政治局中国问题委员会作出决议，应该与吴妥协，因为他可能会在军事上主宰华北^⑥。加拉罕立即把这一计划付诸实施。为了使国民军免于彻底垮台，他要求吴使直系与国民军结成联盟，以此作为挽救国民军的一个办法。他通过苏联驻汉口的总领事专门送了一封信给吴。信是1926年3月29日写的。加拉罕在信中赞扬吴为“解放中国”所作的努力。他说，不论是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吴一直作为“中国的伟大爱国者”而受到苏联人民的崇敬。苏联人民将永远“以无限敬佩的心情来学习他的大智大勇”。他对吴说，张作霖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最大的野心家”，“是日本的工具”，并又正在“同英国和美国搞阴谋诡计”。他提醒吴说，张作霖今天可以答应给你一切，但一有机会他就会翻脸对付你。接着，他就劝吴与国民军联合。他说：

我是作为你的朋友和一个友好国家的代表向你进行劝说的。苏联的物力财力永远是供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所用的。希望你能相信我们，不要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控制的无耻的政治集团的工具，我们一定支持你。

你是否需要道义上的支持？那你已经得到了。你需要物质援助吗？我们对你是有求必应的。我们两国是邻近的国家，边界很长，我们能够随时火速前去帮助你。

你为什么不和冯玉祥将军合作呢？他也是中国解放运动的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我已经试探他的意见，他表示渴望同你合作。

中国有了你们两个人，就可以永远摆脱资本主义的致命侵略。

加拉罕在信的结尾请求吴接受苏联的帮助，以解放他的“伟大民族”^④。

吴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苏联使者，但答复说，国民军首先必须交出武器并宣布放弃布尔什维主义，然后才谈得上讨论合作问题^⑤。1926年3月31日，国民军的一个代表也曾与吴的陆军司令田维勤会谈，表示愿意同吴和解^⑥。国民军的两个领导人鹿钟麟和张之江公开邀请吴到北京来。可是，由于吴坚持国民军必须解散，而使谈判破裂^⑦。吴在给加拉罕的复信中断然拒绝接受苏联的建议，并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建议是要“在中国造成混乱”。吴说他怀疑加拉罕的职业到底是“外交官”还是“煽动家”，并要求苏联大使“在方便的时候离开我们的国家”^⑧。为了表明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命令部下向北京进攻。到4月15日，国民军不得不从首都撤退到南口设防。国民军参谋长刘集后来对苏联顾问亨克尔

说，要不是存在同吴和解的希望，撤退命令还会下得更快^⑧。

为了最后挽救国民军，加拉罕再次进行干预。1926年4月末，他派汉口领事馆的秘书哈西斯先生带了一份电报去见吴，再次要求吴和国民军领导人握手言好。加拉罕在电报中感谢吴接待他前次派去的使者，并对总领事这次因病未能亲自前去汉口，而派了临时总领事哈西斯先生来递交这封信表示歉意。加拉罕又一次赞扬吴是“爱国者”，并说消灭“红胡子”张作霖是爱国者的责任。然后他接着说：

我给你出的主意是个好主意，如果你接受的活，保证对中国有利，这也是你衷心希望的。因此首先应该同国民军的一些领导人言归于好，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你的热烈崇拜者；而且这样做，对你的朋友曹锟也大有好处，我对曹锟也是十分崇敬的。如果你能在北方达成和平协议，南方就不会对你有敌对行动了，你就能以全力对付你的宿敌张作霖，……我个人急切地等候你的回音。当前由于你所取得的胜利，我们一定很快就能在北方见面^⑨。

美国驻汉口的领事J·C·休斯敦也证实了哈西斯的这次访问。休斯敦在1926年4月29日拜访吴佩孚时曾问及加拉罕的电报是否真有其事。吴承认，他确实接到了这封电报。但他对哈西斯说：“如果认为加拉罕对任何问题的意见都会被人接受，这完全是单方面的想法。”吴说，他告诉这个苏联代表，1924年的中苏条约只允许苏联在中国进行商业和贸易方面的活动，而不许宣传布尔什维主义。他指责他们在中国制造混乱，并说：“苏联为了在中国传播布尔什维主义而给冯玉祥提供金钱和武器弹药是造成中国内乱的直接原因”。最后，吴再三向哈西斯表明，他不能与冯玉祥握手，而且他认为加拉罕的电报不是什么友好的建议，而“实质上是一种威胁”^⑩。

为了向苏联人和西方国家表明他的立场，吴把加拉罕的电报以及他自己的答复都公开登在报上。他说苏联的建议是想干涉中

华民国的内部事务。1926年5月，他命令部下制止一切工人运动，解散所有铁路工会。他说因为这些工人都是受“职业煽动家”的煽动而被迫加入工会的^⑳。

1926年6月6日，国民政府在蒋介石领导下举行了反对吴的北伐。蒋率领国民革命军向湖南省挺进。7月11日，吴在记者访问他时公开谴责共产主义。他把共产主义比作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的部落主义。他说，苏联对中国的友好是为了掩盖它的侵略和扩张它的“红色帝国主义”。他向人们保证说，他要与张作霖合作来消灭中国所有的“赤色分子”^㉑。

苏联和中共立即动员人民来支援蒋的国民革命。他们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支援：（1）收集情报和瓦解吴的军队；（2）在吴的根据地发展红枪会运动^㉒。

1926年6、7月，当吴还在南口与冯玉祥打仗时，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在与吴的一些将领谈判，这些人正在犹豫不定，是不是要支持冯玉祥。8月4日在莫斯科由翁施利希特主持的中国问题委员会最后制订了瓦解敌军的总政策，并通过如下决议：“为了获得喘息的机会，并得到行动自由，以便重新发动反对直隶的斗争，特别是反阎锡山的斗争，决定恢复与沈阳的谈判；同时，还要同吴佩孚集团中一些立场不稳的军官进行谈判……”^㉓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事部也决定通过派遣代表以及在吴军中的各部门建立共产党小组来瓦解敌人^㉔。

向敌军渗透的全面政策归北京的苏联军事中心领导，但在各地的活动则由专门的苏联顾问小组负责。例如，在湖北及河南开展工作的是开封小组，后来在1926年2月由张家口小组代替，重点是争取吴在当地的军官^㉕。他们还另设情报部专门收集情报。在吴的权力基地汉口则设有情报局和分局。秘密特工人员遍布于湖北督军司令部、军队、兵工厂和外交团里，以及象汉阳、武昌、安庆等城市中。在长沙和宜昌也设有类似机构，虽然规模要

小一点。情报局以每月工资40元雇用了12个中国密探在汉口和长沙收集情报，其中一半是中共党员^⑧。

每项计划都有一个代号，吴佩孚的代号是“恩”。关于调查吴的项目，情报局告诉密探要详细调查：（1）吴佩孚与孙传芳的关系；（2）吴的“讨贼联军副司令”金永炎的态度以及他的部下的态度；（3）吴与“资本家及外国”的关系，特别是与英美的关系^⑨。有些特工人员则负有专门任务。例如，储晓丁（音）（第1346号，假名李谋胜（音）和王玉山（音）（第1344号）的任务是在汉阳兵工厂。徐汇之（音）（第1372号）的任务是渗透到吴的部将刘祖龙（音）的十五军中去。这些特工人员收集来的情报交给张建飞（音）（第1363号），他再交给李凤翔（音）（张和李都是北京政法学校学生），最后交到苏联大使馆^⑩。我们从查获的苏联大使馆的文件中发现，关系到直系的或直接与吴佩孚有关的情报共166件^⑪。大多数都是政治、军事情报；其余的是涉及到吴与奉系以及吴与英国关系的材料。

总的来说，苏联与中共关于瓦解吴军的计划，收到了显著成效。1926年9月7日，吴佩孚的第15师正副师长金永炎和李祖龙，倒向了国民革命军。

关于发起红枪会运动来反对吴的问题，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26年7月18日在上海召开的二次扩大全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要组织农民协会来反对军政府。反对河南、山东和直隶盗匪的政策，就是开展宣传以便使当地所有的红枪会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秘密联络网，交换情报和互相支援……在联络网建立以后，第二步便是要使红枪会和黑枪会合成一个组织，并制订一个指导共同行动的政治纲领……”^⑫

中共河南省委员会先在开封小组，后在张家口小组的领导下，着手在农民和红枪会组织中开展工作。他们利用宣传来发动当地人民，并在铁路沿线和农村散发宣传品。有些材料则向学生、

红枪会和农民作口头传达。他们鼓动农民起来反对吴佩孚，因此农民就拒交税款及一切形式的苛捐杂税。红枪会在受到鼓动后便在开封附近骚扰并侵犯吴军的后方。中共还组织并建立了农民特遣队以作自卫。他们在郑州和许昌，对铁路和电线搞些小的破坏活动。他们还尽一切努力来鼓动吴手下的陈应之、李成亚和梁叔凯的部队起义^④。

这样，吴无法抵抗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再加上他的一些部将的背叛，他在湖北的防线就瓦解了。蒋的军队占领了武汉地区。于是吴就撤退到了河南。这时冯玉祥从他在陕西的要塞出动往南向豫西推进。吴无法迎战两路敌人，只能退往四川。1927年6月，河南为南方占领后，吴宣布退出政界。

以上的研究结果说明，从1920年一直到1926年，吴佩孚与苏联及中共是一直有联系的。他同意中共在他的地区开展工人运动是因为他需要中共在京汉铁路一带有效地帮助他运送军队。在1922年中期，他完全致力于建立孙吴联合。这两个计划看来都是得到苏联同意的。1924年时，他积极支持签订中苏条约，因为他脑子里想的是要那笔退回给中国的对俄庚子赔款。从1925年中期一直到北伐即将开始的前夜，他还在同苏联及中共讨论是否可能同冯玉祥和解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证明马林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他在1935年8月对哈罗德·艾萨克斯说，由于他1922年夏天给拉狄克写了一份报告，才使赤塔政府取消了依靠吴佩孚的方针。显然，马林是夸大了他自己在国共合作中的作用，把莫斯科的政策从亲吴改为亲孙说成是他的功劳。事实上，在1922年中期，莫斯科同吴的关系还远未结束。相反，在中共的帮助下，他们正在积极促成孙中山与吴佩孚的联合。就是在决定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那个8月杭州会议上，同时也通过了一个关于孙吴联合的决议。

本文已经指出，一直到1926年5月，苏联还在奉承、讨好吴佩

孚。他们必须同吴和解，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吴除了在1925年一度失权外，一直是华北有权势的军界要人。而且在1922—1924年，他又是北京政府幕后的实权人物。苏联要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并签订一个条约，绝对需要得到吴的支持。再说，1925年末、1926年初，苏联盟友冯玉祥的军事地位又是如此之弱，为了挽救国民军使其免遭彻底失败的唯一道路，就是与吴重新谈判。

至于说到吴在“二七”罢工中枪杀工人的问题，不应看成这是吴的暴虐狂的突然大发作，而这在大多数历史书中都是这样说的。孙越宣言的发表是吴决定禁止召开2月1日大会的一个因素。他对罢工工人的野蛮镇压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局势逐步发展的结果。他想的是铁路的经济和战略因素。他对唐山罢工的镇压早已证明他是随时会用暴力来对付工人的。直隶军人害怕工会运动的发展多少与孙中山或可能还与苏联有关系，这就更造成了有懈可击的局势。但是，“二七”大屠杀只是暂时减少了苏联对吴的热情，它从未使苏联停止要同吴合作所作的努力。

注释：

①哈罗德·艾萨克斯：《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文件》，载《中国季刊》第45期，1971年，第100—105页。

②同上书，第107页。

③艾伦·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1917—1924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8年。康拉德·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

④见上引哈罗德书，第102页。金神保：《1917—1927年之中苏关系》，台北文化基金会，1966年出版。

⑤埃德蒙·克拉布：《中国与苏联》，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71年，第161—174页。

⑥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卷，台北，1966年，第113页。

⑦艾伦：《苏联在中国的政策》，第305页。

⑧尤丁与诺思：《苏联与东方》，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29页。

⑨里沃·帕斯伏斯基：《苏联在东方》，纽约，1922年，第133页。

⑩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1921—1927年》，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1年，

第75—76页。

⑪弗拉基米尔·西比利亚柯夫（即维林斯基）：《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载《国际新闻通讯》第1卷，1921年10月17日，第15页。

⑫艾伦：《苏联在中国的政策》，第305页。

⑬根据布兰特、吴相湘及汤良礼的说法，在1921年底拜访吴佩孚的苏联人是马林。布兰特说，马林是在前往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党代会途中在北京停留时去见吴的。他说，马林答应支持吴佩孚反对张作霖，同意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把铁路工人组织起来保卫铁路线。蔡和森说，对吴佩孚与中共合作一事应负责任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使者（引自布兰特著《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24—26页）。汤良礼说：“马林在中国期间曾秘密地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他回莫斯科后，就向共产国际建议，同孙中山及吴佩孚建立关系。他说，吴佩孚兵力最强，但他对政治一无所知。莫斯科接受了马林的意见，便同时与孙及吴联系，以便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保护。”（见汤良礼著：《中国革命秘史》，伦敦，1930年，第155页。吴相湘文载《中国现代史丛刊》第2卷，正中书局，台北，1961年，第103—104页。可是，根据汪精卫的说法，马林于1921年同孙中山谈判时，苏联还派了一个代表在北方与吴佩孚谈判。汪精卫：“论国共在武汉的分裂”，1927年11月5日，载《革命与反革命》，第593页。沈云龙说，那是维经斯基想出来的办法，让李大钊与白坚武联系。见沈著：《中国共产党之来源》，台北，1959年，第10页。

⑭吴相湘：《民国人和事》，台北，1971年，第150页。栖梧老人：《回忆李大钊同志》，载《中国工人》第9期，1957年，第21页。陈公博与周佛海：《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1967年第145页。

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延安（？）解放社，1943年，第25—26页。

⑯见1922年11月23日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的讲话。引自莉迪亚：《共产国际在中国》，未发表的文件。另见上引邓中夏书，第25—26页。

⑰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国科学院，1963年，第135页。

⑱J·B·鲍威尔：《吴佩孚大帅的‘回报’》，《中国周刊评论》，1926年5月22日，第315页。

⑲上引邓中夏书第27页。

⑳陈达：《中国劳工问题》，上海，1929年，第229页。另见理查德·索脱：《吴佩孚：对一个中国军阀的典型研究》，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59年，第183页。

㉑栖梧老人：《回忆李大钊同志》，载《中国工人》，第9期，1957年，第21页。

㉒栖梧老人：《二七回忆录》，北京，1957年，第21页。

㉓同上书，第22页。

㉔根据张国焘说，陈独秀在一开始就对好人政府的意见感兴趣。见张国焘：《我的

回忆》，《明报月刊》第8期，第76、81—82页。另见莫里斯·梅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220—221页。

⑤这是指1917年6月12日张勋解散的国会，他带领五千人的军队进京想使满族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重登大宝”，黎元洪这时被迫下台。

⑥《努力周报》社论：《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14日，第1页。

⑦张国焘：《我的回忆》，《明报月刊》第8期，第81页。

⑧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7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1921—1927》，第1卷，第265页。蔡和森也说，“有一两个同志对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见《中国问题》第1期，第4页。布兰特著《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一书第25页引用了这句话。

⑨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262—263页。蔡和森说，主张同吴佩孚合作的策略主要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指的是否是马林？除了汤良礼所著《中国革命秘史》中是这样说的外，我找不到任何材料证明马林对这个主张有兴趣。另见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25页所引蔡和森在《中国问题》第1期第4页上所说的话。

⑩越飞：《苏联与东方》，载《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第10—11期，1927年，第25—47页。这个材料是莉迪亚告诉我的。

⑪在1922年5月和10月，吴曾向国际银行团两次要求借款。美国对此不感兴趣。

⑫伍德海特：《中华民国真相》，伦敦，1926年，第249—252页。

⑬张国焘：《中共的兴起》，第266页。

⑭孙中山：《国父全书》，国防研究院，台北，1960年，第3版，第750—752页。关于吴的电报，见张君勱著：《吴佩孚传》，第2卷，第424页。

⑮双方的电报都发表在1922年9月8日《华字日报》，发出的时间可能更早。据说曹锟和吴还给孙发了一个电报，登在1922年9月16日的《华字日报》。曹和吴在电报中同意孙的意见，即联邦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以前存在过专制政府。他们认为应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制订全国都适用的法律。他们还同意孙主张裁兵并让士兵投入生产劳动的意见，这能缓和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而且，他们同意开发国内的财源，但不同意压缩国外借款。《华字日报》编辑说，电报是由曹锟的部下从保定发出的。可是，吴佩孚说对此电报一无所知。《华字日报》1922年9月16日，第2页。《努力周报》1922年9月10日，第1页及1922年9月20日，第1页。

指出下列情况是很有意思的：1922年8月26日孙中山在上海给保尔·莱因希的信中表示“希望能尽早地与莱因希在北京见面，如通过一定努力，是很可能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的”。1922年8月25日的《纽约时报》说：“一直在主持会议的孙中山……希望重新统一国家，现在他想了一个改善中国财政问题的方案，即让美国来代中国

偿还欠欧洲国家的债务，把这笔钱算在欧洲国家欠美国的债务帐上。”看来，至少是在8月，孙中山是支持吴佩孚向国际银行团要求为北京政府借得建设贷款的。保尔·莱因希博士的信收录在威斯康星国家历史协会的莱因希书信文件集中，见《纽约时报》，8月25日，第155页。

⑳胡适说，孙的政治原则是：（1）保护宪法，（2）承认南方1910年的国会，（3）反对联邦主义，（4）取消地方主义及区域自治，作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步骤。他指出，第3和第4条原则和吴佩孚的意见是一致的。见《努力周报》1922年9月3日。

㉑见孙中山1922年9月5日给北京政府一些人的信；9月7日致蔡锷及陈渠珍的信；9月15日给高振霄的信；9月18日给国民党党员的信；以及9月20日给张开儒和朱培德的信。《国父全书》，第802—807页。

㉒张国焘：《中共的兴起》，第73、75页，296—297页。1923年9月3日《努力周报》。1916年李大钊曾在孙洪伊手下做事，当时孙为北京政府内务总长，后来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权力斗争中为徐树铮及安福系所迫而辞职，李大钊便随孙到了上海。见上引李云汉书第1卷，第55页。以后，当孙中山在1923年改组国民党时，孙洪伊便成了国民党的“顾问”之一。

㉓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1卷第144页。文新书店，台北，1962年。见1922年10月23日孙中山致谢持信，《国父全书》第812页。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2卷，第175—18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

㉔孙丹林对孙中山吴佩孚合作的评论首先发表在1922年9月28日《申报》上，蔡和森在1922年10月4日《向导周报》第4期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他的话。

㉕上引文公直一书第1卷，第144页；《努力周报》1922年10月1日。吴对张继和徐谦的说法在10月19日的《申报》上有报道，1922年10月25日的《向导周报》第53页上也有引述。一年后，即1923年10月，孙中山派徐绍楨到洛阳去和吴佩孚商谈。在他们谈话中，徐提到孙曾派三个使者去见吴，他们是汪精卫、张继和陈宗夫（音）。徐说，汪精卫和张继对吴的个性深有印象。徐还说，孙的三个代表皆未完成说服吴同国民党领导人合作的任务。关于陈宗夫（音）的任务到后面再说。不过，除了徐的说法外，对于汪精卫的任务，我没看到什么证明材料。见冈野增次郎著：《吴佩孚》第439—443页。

㉖见上引理查德·索脱一书，第122页。

㉗《中国周刊评论》，1922年9月23日，第136页。

㉘见蔡和森在1922年9月1日发表在《向导周报》上的文章，谈关于重新统一、外国借款与国民党的问题。

㉙蔡指的是顾维钧及其同僚，据说他们帮助吴想从国际银行团借得贷款。

④孙中山与苏联及德国合作的政策引自蔡和森的文章，见1922年10月4日《向导周报》。

⑤这指的是发表在1922年9月16日《华字日报》上的一封电报。见注④。

⑥1922年10月4日《向导周报》，第4期。

⑦同上材料，1922年10月11日，第5期。

⑧张国焘反驳胡适关于由国际控制中国的文章，《向导周报》第6期，1922年10月18日。

⑨蔡和森关于吴佩孚的文章是想谈成一笔有利的交易。《向导周报》，1922年10月25日。关于唐山罢工，到后面再说。

⑩A·霍特洛夫：《张作霖与孙中山的联盟》，见上引艾伦·惠廷所著书，第117页。

⑪霍尔：《新政府的拥护者》，载《亚洲》杂志，1923年8月，第557页。关于霍德洛夫，见《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4月30日，第480页。或见美国国务院文件893.00013/17，第10及其后诸页。

⑫《消息报》第181期（1620），1922年8月13日。见上引惠廷所著书，第120页。

⑬《消息报》，第182期（1621），1922年8月15日。见上引惠廷书，第120页。

⑭维林斯基：《中国的政治集团与党派》，载《共产国际》，1922年11月1日。见上引索脱所著书，第147—148页。惠廷书第118—119页。

⑮乔治·契切林：《契切林同志与远东问题》，《国际新闻通讯》，1922年11月16日，第795页。见上引索脱书第150页。

⑯莉迪亚·霍勒布尼奇：《共产国际在中国》。感谢莉迪亚提供给我关于拉狄克讲话的译文。

⑰见孙中山致景梅九的信，1922年10月11日；致《旭报》信，10月11日；致周震麟信，10月20日；致蔡钜猷信，10月27日；致鲁涤平信，10月27日；《国父全书》，第809—813页。

⑱张国焘：《中共的兴起》第244—245页。张把他到北京的日子弄错了。他说是6月中。但很明显的是，直系在6月中尚未分裂为洛阳派与保定派。曹锟与吴佩孚仍一致努力要使黎元洪出来当总统。一直到10月初，直系才分裂的。

⑲《向导周报》，1922年10月25日，第54—55页。

⑳关于罗文干案件以及直系的分裂见本书第5章。

㉑维林斯基在另外两篇文章中也提到了，请见下面的注释。

㉒蔡和森论“目前政局危机的内幕”，《向导周报》，1922年12月6日，第93—94页。

㉓张国焘：《中共的兴起》，第266页。

㉔振宇：“对那些亲英和亲美分子的活动，难道我们不应该注意吗？”《向导周

报》，1922年10月25日，第54页。

①孙铎：“吴佩孚与陈炯明”，出处同上，1922年11月8日，第71页。

②孙中山致蒋介石信，《国父全书》第817页。

③出处同上。

④张国焘：《中共的兴起》，第267页。

⑤上引李云汉书，第1卷，第144页。张继：《张溥泉先生全集》，第195页。

⑥莉迪亚：《共产国际在中国》。

⑦越飞：“中国的难题”，《消息报》1923年1月5日。另见上引惠廷书，第201页。

⑧冈野增次郎：《吴佩孚》，第370页。

⑨出处同上，第376，1260及1278页。

⑩谴责来自天津和保定派，如曹锟、王怀庆、田綽玉（音）以及另外一些保定派议员。挑起罗文干案件的是吴敬连和詹伯烈。洛阳派军阀中参加的只有肖耀南和张福来，他们都是吴佩孚的部下。吴佩孚本人并未发表任何电报来谴责苏联人，这是很有意思的。见上引王聿均所写书，第424—427页。

⑪上引惠廷书，第202页。

⑫维林斯基：《中国的政局》，《国际新闻通讯》第3卷，1923年3月8日，第134—135页。此文写于陈炯明逃出广东时，大概在1月中旬。

⑬维林斯基文章，《消息报》，1923年1月27日，第3页。见惠廷书，第120—121页。

⑭休斯教给美国国务院关于长辛店罢工的报告，893.504/15，第7—3页。另见上引邓中夏书，第93—94页。

⑮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上海，1929年，第176页。

⑯上引陈达书，第230页。上引邓中夏书，第94页。

⑰《远东时报》，3月5日，休斯教报告中所引。国务院文件893.504/15，第67页。

⑱张德恂给王怀庆的报告中所引赵继贤的电报，《近代史资料》第1期，1958年，第23页。

⑲吴佩孚给靳云鹗的电报中引用了赵的报告，1923年1月29日，《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第55页。

⑳1923年3月1日休斯教关于“二七”罢工的报告，美国国务院文件893.504/15，第43页。

㉑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国共产党之透视》，文献书店，台北，1962年，第54页。

⑧张国焘：《中共之兴起》，第297页。

⑨休斯教的报告：《京汉路罢工的原因》，国务院文件，893.504/15，第66页。

⑩张君勱：《吴佩孚传》，第2卷，第485页。

⑪上引邓中夏书，第95页。栖梧老人书，第95页。

⑫我们不知道孙中山的工人运动组织者的名字。见休斯教的报告，国务院文件893.504/15，第53页。

⑬《近代史资料》，第1期，1958年，第24页。

⑭上引邓中夏书，第100—106页。张国焘书，第270—295页。休斯教的报告，见国务院文件，893.504/15，第52—60页。

⑮莫里斯·梅斯纳：《李大钊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212页。见家之（音）论李大钊的文章，《中国工人》，1957年第8期，第13—15页。

⑯张国焘：《中共的兴起》，第296页。

⑰中国共产党在吴佩孚屠杀京汉铁路工人时向全体工人和人民发出的宣言，《向导周报》，1923年2月27日，第1页。

⑱孙铎：《吴佩孚与国民党》，《向导周报》，1923年5月9日，第177—178页。

⑲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出版社，北京，1951年，第86页。

⑳《向导周报》，1923年2月27日，第159页；1923年7月11日，第232—233页；1924年2月20日，第421页；1924年2月27日，第446页；1924年7月30日，第606页；1924年8月20日，第629页。

㉑《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铁路工人的信》，《国际新闻通讯》，第3卷，第11期，1923年3月22日，第172页。上引惠廷书，第101页。

㉒H·M·香海：“对中国罢工铁路工人大屠杀”，《国际新闻通讯》，第3卷，第34期，1923年4月26日，第16页。

㉓上引惠廷书，第101页。

㉔同上书，第100页。

㉕同上书，第306页。

㉖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国立编译馆，台北，1959，第291页。

㉗冈野增次郎：《吴佩孚》，第412—416页。

㉘虽然没有确切的材料来说明维林斯基是在何时写的，但这本书一定是写于1924年年末。见V·维林斯基：《吴佩孚：中国的军国主义》，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共54页。这一材料是莉迪亚提供的。

㉙吴佩孚：《吴佩孚先生集》，第288页；陶菊隐说，伊万诺夫曾几次去拜访吴。

见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第93页。

⑩ 吴佩孚：《吴佩孚先主集》，第327—329页。

⑪ 《华字日报》1924年3月31日，第9页，1924年4月1日，第9页，1924年4月7日，第9页。另见《俄国事务——亚洲与法国问题选录》，1924年3月，《近代中国》，第5卷，第179页。

⑫ 《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7月17日，第9页，1924年7月31日，第9页。

⑬ 《吴拒绝冯的要求》，《中国周报（附插图）》1925年8月22日，第16页。《吴佩孚在汉口明确表态》，《北华捷报》，1925年10月24日，第139页。《吴延长在汉口的逗留》，《中国周报》（附插图）1925年11月7日；《香港华字日报》，1925年12月24日，第3页。

⑭ 国务院文件893.00B/312。

⑮ 顿斯克奥伊所写关于在沈阳的情报工作的详细报告（真名为索洛科夫，沈阳副领事），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情报部分，顿斯克奥伊的报告，第1页。

⑯ 《中国周刊评论》，1925年12月12日。

⑰ 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目录。1301号秘密特工人员的报告（可能是赛福林），第6卷，第19—20页原件。目录表明，有许多关于与吴接触的报告送交给了苏联大使馆的武官。赛福林在给米哈依洛夫的信中，也提到了关于援助国民军的军事计划。国民军部分，苏联情报，赛福林致米哈依洛夫的信，第27页A。在张家口顾问团负责人林（真名为V·M·普里马科夫）同加拉罕在1925年12月2日的会见中也重新提到了与吴佩孚的联系。国民军部分，《加拉罕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会议记录，1925年12月2日，关于中国国内形势》，第8页A。

⑱ 潘伪称是曹绍仪的代表。他的访问时间很短，而且也未能见到蒋介石，这时蒋因公务外出。《华字日报》，1926年1月7日，第1页，及1926年1月10日，第1页。另见中共中央委员会二次扩大全会报告，威尔伯与豪：《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中国的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纽约，1956年，第271—272页。这个报告说，在1924年10月19日至1925年10月22日这段时间内，“吴佩孚对国民政府表示好感”。

⑲ 从1925年8月一直到1927年1月，吴佩孚利用“布尔什维克威胁”及在中国的反英情绪来迫使英国政府支持他。

⑳ 见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二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见上引威尔伯书，第271—272页。

㉑ 彭述之：《群众应该对吴佩孚奋起而攻之》，《向导周报》，1926年2月3日，第1312—1316页。

㉒ 《向导周报》，1926年2月10日，第1339—1340页。《劳工日刊》1926年1月31日，1926年2月7日，1926年2月9日，以及1926年2月11日。

㉓ 《吴佩孚痛斥国民军领导人：一切人的叛徒》，及《吴佩孚与赤色威胁》，《北

华捷报》，1926年2月13日，第270页。

⑭上引布兰特书，第25页。

⑮《加拉罕最后的错误》，《北华捷报》，1926年5月22日，第334页。

⑯见英国公使馆的中国秘书德奇门（音）先生同吴佩孚的参谋于1926年6月21日在保定的谈话。德奇门的报告收录在麦多利先生给奥斯汀·张伯伦先生的信件中，日期是1926年8月16日。外交部文件371/11658。

⑰上引威尔伯书，第333页。

⑱《关于同吴佩孚谈判问题向郭尔富（音）的报告》，1926年4月11日，俄文原件，第118卷，第242页。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目录。

⑲《加拉罕最后的错误》，《北华捷报》，1926年5月22日，第334页。

⑳见上引威尔伯一书，注91，第521页。

㉑《加拉罕对吴威胁利诱》，《中国周报》（附插图），1926年5月1日，第15页。

㉒休斯敦向J·V·A·麦克默里先生的报告，美国国务院文件，汉口部分，L，第52号，1926年4月30日。

㉓《吴佩孚与工会》，《中国周报》（附插图），1926年5月15日，第13页。

㉔《益世报》记者访问吴佩孚，1926年7月，见日本《现代支那之记录》，1926年7月，第153—154页。

㉕“红枪会”是大约在1920年起源于山东的一种秘密会社。他们在山东、河北、陕西及河南一带十分活跃。因持带有红缨的长矛而得名。他们同清朝时期的许多秘密会社那样，反对政府、军阀和外国人。其中很多的穷苦农民，为战争和当时暴政所迫而成为盗匪的。

㉖M·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天津出版社，1940年，第87页。苏联中国问题委员会会议记录，1926年8月4日，《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第248—253页。

㉗M·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84页。

㉘出处同上，第28页。

㉙《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情报部分，第8B—14A。

㉚出处同上，政治部分，第13页。

㉛出处同上，情报部分，第8B—14A。

㉜这个数字是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的目录中统计出来的。

㉝1926年7月2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红枪会运动的决议。见上引威尔伯一书，第283—313页。

㉞为支援北伐，关于在河南的工作报告，见上引米塔列夫斯基一书，第91—101页。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

梁敬鐔

唐秀兰译

译者按：1976年4月30日—5月2日，在美国由伊利诺埃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纽约圣约翰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一次专题讨论会，专门研究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与会者除美国学者外，还有台湾学者吴相湘、李云汉、梁敬鐔等人。

会上共提出10篇论文，现译出的《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是其中的一篇，作者是台湾国民党科学院教授梁敬鐔（他曾写过《1911年的中国革命》、《史迪威将军在中国：1942—1945年》及《中国与开罗会议》等书）。这篇文章从国民党的立场、观点，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过程，提供了不少原始材料。

文中着重号均为原文所有。

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到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这段时间内，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相当友好的。苏联于1940年霸占唐努山脉（位于外蒙古西北与唐努乌梁海南部之间）后，关系开始变坏。1942年7月，中国政府要求苏联从新疆迪化撤走它的红军第八师时，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①。在这以后，苏联又屡次鼓动哈萨克牧民在中国和外蒙之间制造边境争端，1945年，它在迪化的代理领事又为当地进攻伊犁的地下共产党秘密提供了大

量武器弹药，占领了伊犁并宣布它属于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②，两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坏了。

从1944年开始，日本在太平洋的失败几乎已成定局，苏联对日参战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已占领了河北、山东、山西与河南各省的部分地区。鉴于这样一种形势，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家，包括罗斯福总统和亨利·华莱士^③都认为，为了不使中国发生内战，首先必须改善中苏关系。事实上，蒋总统早在1944年7月就怀着同样的目的指示宋子文院长与斯大林接触^④。于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与苏联缔结一项友好条约，就成了全体中国人最主要和最关心的问题。遗憾的是，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非中国所期望的那种条约，因为其中的许多条款都是由苏、美、英三大国在背着中国和侵犯中国利益的情况下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早就决定后，强加于中国的。

我们都知道，雅尔塔秘密协定是一个绝对秘密的文件。可是根据赫尔利大使所说，中国共产党在此协定签订后的两星期就已经知道了^⑤。而国民党却一直到一个半月以后才知道。情报来源是根据两个报告，一是顾维钧大使的报告，另一个是魏道明的报告。顾的不完全的情报是从总统参谋长、海军上将李海处得到的^⑥；魏的情报则直接来自罗斯福，内容如下：

在访问罗斯福总统时，我问及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关于远东问题的意见。总统回答说：“斯大林提出三条：（1）承认外蒙古的现状；（2）承认中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但必须要有一个托管制度；（3）苏联要在旅顺港南面有一个不冻港，如大连或其附近的港口。”罗斯福的看法是，由于中国仍保留对外蒙的主权，维持现状似乎不会有什么问题。中东铁路主权也仍属中国，但为了提高效率，将分别由从中国、美国和苏联派出的3个代表，作为铁路专家，组织托管制度。至于第三条关于军事港口，这是个新的问题，是以前在大连问题上所提要求以外的问题。总统认为，旅顺

港可以租借给苏联若干年，只要主权仍属于中国。谈到关于苏联在远东参战问题，总统向我保证说，一旦时机合适，它是会参战的。可是，为了不让敌人加强其防御，还必须作为绝对机密来保守。总统还谈到了中共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觉得他对远东的总的态度是相当好的^⑦。

这个报告是1945年3月12日发出的，正好是雅尔塔会议后的一个月。虽然内容简略，但很有价值，因为能清楚地看到罗斯福最早对苏联在外蒙问题、中东铁路问题以及旅顺港问题上所提要求的一些解释。因为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斯大林在罗斯福死后拿出来的雅尔塔协定又完全是另一种说法，所以，这个报告就尤其重要了。

当雅尔塔协定的文本于1945年6月15日正式送交中国政府时^⑧，赫尔利已在5月22日把内容秘密地告诉了蒋^⑨。这就使蒋能在5月22日和23日打电报给宋，指示他与王宠惠和顾维钧一起秘密商讨对策，正好他们都在参加旧金山会议。6月3日，蒋在重庆接见了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在会谈中，蒋催促苏联对日宣战，帮助中国收复满洲领土及行政主权。蒋暗示他已经知道了雅尔塔秘密协定^⑩。

从6月8日到11日，蒋给宋发去了几个电报，告诉他关于旅顺港谈判问题的指导方针：

1. 旅顺港必须由中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四大国共同使用。
2. 必须完全保留中国对它的主权及全部管辖权。
3. 决不能让苏联单独占有或租借旅顺港。

他还指示宋把上列各点转达给杜鲁门总统，然后在6月底前回重庆，准备去莫斯科与苏联谈判签订一个条约^⑪。

宋子文从4月份起就在美国，他的任务是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旧金山会议。在去旧金山前，他曾在华盛顿会晤霍普金斯，并从他那里私下了解到，一些最有影响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

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陆军部的人，上至马歇尔将军，都认为召回史迪威是不公平的，并仍为此感到愤懑。尽管中国最近的军事形势通过魏德迈将军的努力已大有改善，陆军部的人仍非常恨蒋、宋及赫尔利^④。

由于雅尔塔秘密协定关于中国的条款在旧金山会议上逐渐透露出来，莫洛托夫在旧金山会议上对宋的态度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友好^⑤。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力促杜鲁门立即把协定内容告诉中国。可是杜鲁门因为已经派霍普金斯去莫斯科试探斯大林在罗斯福死后对中国的意见，要等收到霍普金斯的报告后才同意斯退丁纽斯的要求。杜鲁门在6月6日确实收到了霍普金斯关于斯大林对蒋抱友好态度的报告，于是便邀宋在6月9日到白宫去见他^⑥。

杜鲁门与宋会晤了两次，第一次是6月9日，第二次是13日^⑦。由于杜鲁门无法讲清雅尔塔协定内容的含意，所以这两次会晤没得到什么结果。但是，6月13日下午，宋与霍普金斯倒是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会晤，霍普金斯刚从莫斯科回到华盛顿。霍普金斯介绍情况说：

我问及斯大林关于美国的这样一种谣传，即“一旦苏军进入满洲，他将利用中共间接地控制这个地区”。斯大林回答说：“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而且苏联无意侵犯中国在新疆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主权。苏联将主动邀请中国代表进驻满洲，与苏军合作组织当地的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认为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与苏联无关。”^⑧

在这同时，杜鲁门总统指示赫尔利大使把雅尔塔秘密协定关于中国问题的内容于6月15日在重庆交给蒋总统，虽然赫尔利感到诧异，为什么要选这个日子交给蒋，但他还是按总统的指示办了。在讨论了一般问题以后，蒋向赫尔利提了三个问题：(1) 美国对共同使用旅顺港有无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中国就向苏联

建议使旅顺港成为中、美、英、苏四国共同使用的军港；(2) 美国是否愿意参加签订条约？使之成为多边条约，而不只是中国和苏联两方签订的条约。他希望美国能同意这样做；(3) 割让千岛群岛及库页岛南部给苏联的问题与中国无关，为什么要把它包括在中苏条约之内，甚至把它作为中苏条约的条款之一来提出？

赫尔利把蒋的意见转达给了华盛顿。可是国务院表示，美国无意共同使用旅顺港，因此把它卷入中苏条约是不合适的。6月18日，杜鲁门总统把这个意见电告赫尔利^⑩。

宋子文在结束了与杜鲁门和霍普金斯的会谈后，于6月16日离开美国，次日抵达重庆。这时，蒋总统在6月12日和16日又与彼得洛夫进行了两次会谈。会谈中，蒋反对出租旅顺港，并讨论了外蒙古问题^⑪。宋在重庆停留的10天中，一直与政府官员讨论中国对苏联的对策。宋在6月27日携蒋总统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乘坐美国借用的飞机赴莫斯科。随员中有外交部次长胡世泽、蒋经国以及农业部长、满洲问题专家沈鸿烈，宋一行怀着沉重的心情于6月30日抵达莫斯科。

从6月30日到7月12日开了6次谈判的会，从8月8日到18日开了4次。中国方面参加头6次会的有宋子文，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蒋经国和胡世泽。苏联方面有：斯大林、莫洛托夫，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外交部副部长罗佐夫斯基，还有一名翻译巴甫洛夫。后4次会中国代表团增加了新任命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苏联方面没有变化。只要一出现僵局，蒋经国就作为无官职的人直接与斯大林磋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整个谈判期间都与宋子文保持联系。

第一次会于1945年6月30日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的3小时举行，只开了15分钟（从下午6时半到6时3刻），只是礼节性地表示欢迎中国代表团和宣布开会^⑫。宋到莫斯科后不久，就听到有关斯大林的真实态度，以及关于“苏联在战后是否会无条件地支

持蒋介石总统”的秘密情报，这是赫尔利向杜鲁门总统报告的情报。他发现斯大林的实际意思是“为了统一中国，与中共妥协是必要的”。斯大林只支持一个统一的中国^②。

在7月2日的第2次会议上（从下午8时到10时半），讨论了一大堆的问题，如外蒙的独立、大连的现状、租借旅顺港问题、铁路和海港的使用、朝鲜的托管以及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关的其他问题。斯大林向赫尔利与霍普金斯所谈关于支持蒋的问题也提到了。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要求共同占有，在中国和苏联组成的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管理。由一名中国人任委员会主席，一名苏联人为行政负责人。关于旅顺港问题，只要苏联海军能和中国人一起使用港口设备，苏联同意把“租借”一词换成别的恰当的词。关于铁路，苏联再次提出中苏共管，苏联管理的年限为40或45年。关于用铁路运送苏军问题，斯大林答应在和平时期不这样做。

苏联还同意朝鲜托管。它提出，只要在这些总的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就可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不管怎么说，斯大林继续坚持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他说：

一些国家将利用外蒙作为基地，试图破坏苏联在远东的地位。苏联如果不把外蒙作为缓冲地带，它将会丧失整个苏联远东部分。即使在日本投降以后，在5到10年内，日本又会东山再起。由于外蒙古人民既不加入中国又不加入苏联，所以应该让它独立。而且，外蒙有些人正用大蒙古共和国的宣传煽动内蒙。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将威胁华北。就中国的利益来说，让外蒙独立对中国更为有利^②。

宋子文宣称，要是中国政府放弃任何一点领土的话，人民是决不会容许有这样的政府的。从孙中山博士的时代起，国民党政府就向中国人民保证，要维护领土完整，这也包括外蒙古。再说，要是让外蒙独立，西藏也就会跟着这样做。如果让英国统治

西藏，对苏联将是不利的。

斯大林似乎赞成这种意见，但他又提出，关于外蒙独立的协议可以秘密签订，并只在日本投降后再公开。他还强调如果外蒙仍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那就不会同意让苏联在那里驻军，这就会使苏联的防线受到破坏。但是宋子文没有从国内得到进一步的指示，是不能代表中国表态同意外蒙独立的。因此，这个问题取决于重庆的态度^②。

在那天晚上的谈话中，斯大林和宋讨论了国民党和中共的关系。

斯大林：中国是否愿意接受一些自由主义者参加政府？

宋子文：去年3月，我们想与中共妥协，那时我们计划组织一个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战时内阁，同时我还从美国大使赫尔利处了解到，阁下认为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一些农业改良主义者。

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只是爱国主义者，至于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那还是相当成问题的。

宋子文：作为行政院长，我曾计划去延安讨论中国统一问题，但中共不欢迎我。我们的希望是中国只有一个军队和一个中央政府。我们不同意自己另有军队的政党存在而使中国分裂。

斯大林：参加政府的自由主义者可以不限于共产党，其他的自由主义分子也可加入政府。中国只能有一个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但这是中国自己的问题，我只是表明我的观点而已。

宋子文：你说得真对，我们也希望国民党能保持领导地位。所以我们不希望组成联合政府，因为如果成立这样的政府，只要一个党退出，这个政府就站不住了。

斯大林：这是国民党的正当要求^③。

今天读这段记录，觉得斯大林在1945年对国民党的态度好象比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更加合情合理，美国那时曾坚持要我们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不过，斯大林在会上的态度很粗鲁，说话无礼而且确实叫人难堪。蒋经国在其所著《负重致远》一书中对

这一场面有一段特写：

我在第一天见到斯大林时，他的态度很客气，可是在正式谈判时，他脸色真难看，粗暴地把一个文件扔到宋院长面前，问他以前是否见到过这个文件，并对宋说，“你可以讨论各项问题，但必须以这个文件为根据（指雅尔塔秘密协定），这是罗斯福签了字的。”^②

在宋子文离重庆赴莫斯科前，中国政府曾指示他如何与苏联谈判。问题集中在这两点：租借与最大利益问题。至于外蒙问题，那不用讨论，因为苏联的要求是维持现状。中国的理解是仍然保留中国的宗主权，这一点是罗斯福确认了的。因此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可是现在外蒙问题却成了一个主要问题。宋于是就打电报给蒋请示下列几点：（1）在条约有效期间，是否同意苏联在外蒙驻军？（2）是否能给外蒙以自治权，是否同意苏联在那里驻军？

（3）是否同意外蒙独立处理其军事和内政，但仍保持中国对这个国家的完整的宗主权^③？

当宋的电报到达重庆时，蒋在西安，无法立即答复宋。由于斯大林的要求不仅超出了雅尔塔协定规定的条款，而且也是违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所以宋就邀请美国大使哈里曼到他住所，告知他与苏联人谈判的经过。他还请求美国国务院作为雅尔塔协定的签字国之一，告诉他协定内容的确切含意，以便他能据此作为与斯大林进一步谈判的根据。

那时，美国国务院正以詹姆斯·贝尔纳斯为新国务卿重新改组了。而且，那时美国的政策是要避免与苏联发生任何冲突。因此，哈里曼从国务院得到的答复是：这个问题纯属苏联和中国之间的问题，因此无意见可奉告。尽管国务院远东司已指出，苏联在中国东满和南满铁路问题上的要求以及对大连的过分要求，是与雅尔塔协定的原来意思不一致的^④。

宋在焦急地等候重庆的新指示时，请蒋经国去拜访斯大林。

作一次私人谈话。斯大林知道中国一定会有自己的理由来拒绝转让外蒙，便固执地保留他关于保卫西伯利亚的观点，拒绝从他的立场后退。更有甚者，他说，由于中国没有能力从自己的国土上把入侵的日军赶出去，不得不依靠苏联，因此对苏联的要求作出让步，对中国来说是合乎道理的。在斯大林与蒋经国的谈话中无意暴露了苏联的真正目的：

斯大林说：“老实对你说吧，从战略观点看，如果有一个军事大国从外蒙进攻苏联并切断贯通西伯利亚的铁路，苏联就完蛋了。……你说日本和中国都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但你不能说就不会有一个第三国有能力这样做呀！”

蒋经国问道：“这是哪个国家？是不是美国？”

斯大林有力地回答说：“当然！”^②

历史的记载清楚表明，在1945年，中国的软弱，斯大林的狡猾，罗斯福的天真，加上杜鲁门的无知，是造成战后远东灾难的主要因素。苏联的要求无疑是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但斯大林的真正目的主要是破坏美国在远东的地位。

由于重庆的新指示未能及时到达，而再要往后拖延又不可能，宋子文必须在第3次会议上提出一条反建议，就是在不放弃中国的宗主权的情况下给外蒙以自治权。

第3次会议在7月7日下午11时到11时3刻举行。宋在这次会上指出，原来的雅尔塔协定只是规定“必须维持外蒙的现状”，并没提要使它独立。斯大林断言，今日的外蒙“实际上是个人民共和国”，维持其现状，意思就是“独立”。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后，宋提出中国愿给外蒙以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允许其处理自己的军事和外交事务，甚至与苏联签订条约，让苏联军队驻在它的领土上以保卫西伯利亚。斯大林还是反对这个意见。最后，斯大林为会议拿出了4个关于中苏关系的文件草案：一份友好同盟条约，一份有关中国东满和南满铁路的协议，一份关于旅顺港和大连的协

议，还有就是关于外蒙独立的宣言。

宋坚持说，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就不能讨论外蒙独立的宣言，而斯大林则说，不宣布外蒙独立，那就不讨论中苏同盟条约。双方争论之激烈，趋于白热化。当时的对话如下：

宋：对于外蒙问题，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现实的建议，

斯大林：你的建议并不现实。

宋：从我国政府的角度来说，它是现实的。

斯大林：但是我们不能同意。

宋：这是我接到的指示。

斯大林：那我们的讨论就到此为止。

宋：阁下不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感到很遗憾。

斯大林：阁下不能理解我们的立场，也很遗憾。讨论到此为止！^⑧

中苏谈判到这时几乎已要收场，可是，从重庆来的新指示已经在路上。

蒋总统在7月5日返回重庆，就在接到宋打来的关于第2次会议（7月3日）报告的电报后两天，他召集了一次高级官员会议，讨论整个局势。当天晚上（7月5日）他把新指示电告宋，要点如下：

（1）外蒙独立问题将在我们国家统一和恢复全部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后；

（2）如果苏联能保证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支持中共的阴谋，不鼓动他们在新疆的暴动，那么，

（3）中国政府将自动建议通过公民投票使外蒙独立，但这必须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实行。

（4）大连将成为一个自由港；旅顺港将成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铁路干线由两国共同使用，但管理权归中国。

电报还指示：

这是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没有具体保证，那我们什么也别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一个合适的时候中断谈判，代表先回国，汇报以后，再去苏联。

这些指示的措词是很坚决的。7月7日又发出了两个内容类似的电报，把这些内容作为赢得持久和平的一种最大努力^②。

这些电报就是在第3次会议出现僵局以后到达莫斯科的。当宋把苏联对旅顺港、大连和铁路问题的意见与三大国雅尔塔协定以及蒋的指示相对照后，立刻就发现它们之间仍存在着很大距离，如：

(1) 关于旅顺和大连，苏联还加了“陆地和邻近海域”这样一些词。

(2) 虽然旅顺港将由中国和苏联共同使用，但苏联想获得行政管辖权。

(3) 虽然大连港口名义上由国际共管，但苏联坚持要使它成为由中国和苏联专用的海军基地。

(4) 大连的城市将由中苏共管，但大连的港口只归苏联管理。

(5) 旅顺：大连周围的地区由中国的民政部门管理，但管理人员的挑选却要由苏联批准。

(6) 恢复中国对东满和南满铁路的所有权，但中国必须同意建立一个为期40年的中苏联合委员会来管理所有的企业。委员会的负责人、经理以及董事会的大多数人都必须是苏联人^③。

所有这些要求在原来的三大国雅尔塔协定中都是没有提到的，因此，谈判的进展十分困难。

与宋保持密切联系的哈里曼大使竭力劝宋让出旅顺港作为苏联的海军基地，但要坚持对大连的管辖权。至于铁路问题，他建议中国只要求所有权。哈里曼根据他个人的经验说，与苏联谈

判，别指望在一个条约内解决所有的问题。再说，如果中苏谈判破裂，苏联就会在满洲和内蒙进攻日本，甚至可能入侵中国。到那时候，没有一项中苏条约，中国的损失会更惨重^⑧。

蒋经国在与苏联一些领导人的非正式接触中了解到，斯大林对他所坚持的外蒙独立的要求绝不让步。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成功的话，苏联将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⑨。宋子文了解到这一点后，便要求斯大林举行第4次会谈。

第4次会谈于7月9日举行。虽然只开了100分钟（从晚上9时至10时40分），但它却是谈判的转折点。宋把他得到的新指示的重要方面加以综合以后，严肃地对斯大林说：

为了保证中苏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在两国之间实现建设性的合作，以符合已故孙中山的意愿，中国政府愿意作出最大的牺牲。中国的最直接的要求是要得到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以及国家的真正统一。我们的希望是苏联能通过给予下列保证，持同情和合作的态度，并帮助中国。

(1) 满洲问题。正如斯大林元帅所保证的，苏联承认满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将尊重其领土完整和管辖权。对这一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为了两国的利益，中国准备同意旅顺的海军基地将作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港口，大连将成为国际自由港。这些措施有效期为20年。两个港口的管理权归中国。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干线由中苏共管，但苏联应承认中国的所有权。应该指出的是，与上述两条铁路无关的所有支线和企业均不包括在共管范围之内。

(2) 新疆问题。中国的中央政府将用政治手段处理最近在新疆发生的暴乱，希望苏联不向叛乱者供应武器，原属新疆的阿尔泰山地区将仍然是新疆的一部分。

(3) 中国共产党问题。中国的中央政府认为，只要中共保留独立的军事和政府组织，要统一中国是不可能的。希望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只支援中国的中央政府。

(4) 外蒙问题。在苏联对上述三条都同意后，中国政府就准备通过蒙古人民的投票表决，同意外蒙独立，但这只在打败日本以后才能进行。外蒙的边界将按原来的中国边界图来划分。

斯大林对上面所提的这几^点回答说，他愿意尊重中国在满洲的宗主权和领土完整。对所称给新疆的叛乱集团供应武器问题，他答应在进一步协商前要作些调查。并说，只要情况需要，他承认中国中央政府有权用武力镇压新疆的叛乱者。他还向中国代表团保证说，他从未向中共支援过武器，并保证，所有苏联对中国的支援，无论是道义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只给中央政府。而且，他还表示，希望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他说把共产党的军队合并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是必要^⑧。

由于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已达成一致意见，其他的问题就留待进一步讨论了。因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极想在出发去参加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前结束谈判，所以第5和第6次会进行得非常快而顺利。

在7月11日举行的第5次会议上（晚上9时至11时半），许多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如：

(1) 斯大林答应，在结束了议事日程上的其他问题的讨论后，要写出一个关于满洲和新疆问题以及只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书面保证。

(2) 斯大林答应，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3个月内从满洲撤出所有苏联军队，将在互换照会后生效。

(3) 中国中央政府答应担负起保护铁路的责任。

(4) 中国答应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满洲与苏联占领军合作，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一点将在互换照会后生效。

(5) 苏联同意对铁路所有权不再提任何问题。保留运输武器装备的权利，但在和平时不运送苏联军队^⑨。

第6次会于7月12日晚上12时至12时3刻进行。双方都同意关于外蒙宣告独立的草案，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

由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计划在7月14日离莫斯科参加预定在7月26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宋提出要利用这个机会与彼得洛夫等人暂时回重庆，向中国政府报告谈判结果，待苏联领导人回国后再返回莫斯科。对这个要求，莫洛托夫有些犹豫，但斯大林同意了。斯大林在7月13日热烈宴请了中国代表团，宴会堪称豪华。次日，宋、蒋经国和彼得洛夫就飞回重庆，胡世泽留在莫斯科与苏联代表继续商讨一些问题^⑤。

宋在谈判的高潮阶段突然返回重庆是有重要原因的。

(1) 宋已完全意识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只有中国大大牺牲在满洲和外蒙的某些权益时才有可能。他不愿签订一个附有这些条件在内的条约。于是他有了主意，在重返莫斯科前，他要请蒋任命一位新的外交部长来代替他^⑥。

(2) 宋已经明白，苏联对外蒙和满洲的要求，大大超出了三大国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的范围。虽然外蒙独立问题与美国无关，可是苏联坚持要垄断满洲的许多权益，显然是违反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政府对此不应忽视。

起草三大国协定时，哈里曼是雅尔塔会议的参加者之一，他也要去参加波茨坦会议。在那里，杜鲁门总统将会见斯大林。宋觉得应给美国政府一个重新考虑形势的机会，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就苏联的过分要求替中国说项，那成功的可能性将比中国单独提出一项对策要大。

根据中美方面的材料，宋于7月15日返抵重庆，蒋总统接见彼得洛夫是7月19日。同日，杜鲁门总统通过中国政府知道了中苏谈判的结果。中国政府还敦请他劝告斯大林不要提出过分的要求^⑦。外交战略确实起作用。哈里曼在到达贝莱斯堡后向国务院提交了3份备忘录（7月18日、28日和31日），敦促美国政府参加

中苏谈判处理大连自由港问题^⑳。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在7月17日和23日之间也提交4个文件给国务卿，请他支持宋，以保持美国在满洲的地位^㉑。

尽管中国方面一再提议邀请宋出席波茨坦会议，但由于在提出这些文件前，杜鲁门和斯大林已于7月17日简略地讨论了大连自由港的问题，所以中国的外交战略遭到了失败^㉒。杜鲁门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拒绝了蒋要参加会议的请求^㉓。新国务卿贝尔纳斯一直到8月5日才发给哈里曼一个电报，指示他支持中国的立场并要求苏联政府保证门户开放政策。贝尔纳斯的这一行动显然是太晚了^㉔。

波茨坦会议于8月2日结束。8月5日，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宋与新任命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蒋经国和熊式辉等人于8月6日离重庆，于次日晚7时半抵莫斯科。^㉕虽然离上次中苏会谈才3个星期，但远东的战争形势急剧变化。中、美、英于7月26日联合给日本发了最后通牒^㉖。次日，日本外务相东乡茂德宣告，御前会议已收到最后通牒^㉗。

就在宋一行到达莫斯科的那天，美国在广岛扔了第一颗原子弹。日本已经在寻求投降的方式，可是苏联却还没有参加对日作战。在中苏之间仍有6个未解决的问题需进一步讨论：(1) 外蒙的边界问题；(2) 大连的管理问题；(3) 划定旅顺港海军基地的范围问题；(4) 旅顺港的管理问题；(5) 满洲铁路的使用问题；(6) 在满洲的军事合作问题。

由于抗日战争的形势迅速发展，中苏会谈也加速进行，第7、8、9次会议分别于8月8日、10日和13日举行。在8月14日举行的第10次会议上作出了最后决议^㉘。友好同盟条约包括8个条款，4份互换照会及1份备忘录，由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共同签署。条约的措词及附件在7月初作了审核，但互换照会的形成则是最困难的任务^㉙。

会议产生的条约有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关于3个声明：

1. 苏联政府同意，只给中国的国民政府以道义的、军事的和
其他物质方面的充分支援。

2. 苏联承认大连、旅顺及中苏共同使用的中国长春铁路是满
洲的组成部分，并承认整个地区的领土完整及中国的行政领导权。

3. 苏联声明，它无意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

二、关于外蒙问题：

中国政府同意，在打败日本后，在外蒙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
是否赞成独立。如投票结果赞成独立，中国将承认外蒙独立。其
边界保持不变。

三、关于中国东满和南满铁路问题。四、关于旅顺港。五、
关于大连。六、关于军事合作问题。

除了这些条款外，还有一份备忘录，重述了斯大林答应的、
在打败日本后的3个月内从满洲撤走一切苏联军队^④。

上面提到的苏联的要求，虽然大大超过了三大国在雅尔塔同
意的规定，但是，中国经过8年抗战，作为一个远比苏联要弱的
国家，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持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由于条
约和互换照会的内容已由中国政府发表^⑤，这里就不细说了。

指出下面这一情况是很有意思的：1945年8月8日，就是中苏
谈判举行第7次会的那天，苏联不等斯大林在雅尔塔迫切要求签
订的中苏条约完成，就突然宣布对日作战。8月10日，举行第8次
会那天，第2颗原子弹轰炸长崎。8月13日，举行第9次会谈那天，
盟军接受了东京提出的以保留天皇体制为条件的“无条件投降”。
这真是一种讽刺，当抗日战争几乎马上就要结束时，在中苏谈判
桌上却还在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

在第9次会议后，蒋介石指示中国代表团停止谈判并坚持要
在下列几点上达到明确的一致意见：(1)外蒙的边界；(2)旅顺

港海军基地成立中苏军事委员会；(3)为大连委派一名中国港务长^④。但中国代表团成员怕的是，如对苏军的行动在条约内不作限制，苏联就会乘机侵犯华北，一旦他们进入满洲，就会引起更多麻烦。于是代表团就反复要求蒋授权他们在当场解决一切遗留问题^⑤。

到最后一天(8月13日)，蒋批准了代表团的要求。于是，宋和王在第10次会谈时与苏联代表就外蒙边界和在旅顺港基地设中苏军事委员会问题达成了妥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在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日于莫斯科签定。条约刚签字，莫洛托夫就提议要使条约立刻生效，但王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而是按中国正规的法定程序来进行，先由最高国防委员会审查，然后由立法院于1945年8月24日通过，最后由中国政府批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当中苏条约最后定下来时，美国在满洲的门户开放政策就失败了。大家还可以记得，当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6月15日要赫尔利大使把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告诉蒋时，蒋的第一个反映就是，美国是否愿意参加中苏谈判并缔结一项多边条约？如美国同意，中国将为这样一次会议作出准备。可是当与杜鲁门联系时，他拒绝了这一建议^⑥。

在谈判休会期间，苏联的意图已经清楚了。它竭力想独占满洲的海港和铁路。蒋于7月14日要求杜鲁门注意这一情况，但杜鲁门没有理会。显然他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⑦。后来在波茨坦会议上，哈里曼曾三次向国务卿指出这点，史汀生部长也曾提醒杜鲁门^⑧。当时在波茨坦的国务院官员也一致要求美国干预，甚至提议邀请宋到德国来讨论这个问题^⑨。

国务卿贝尔纳斯一直到波茨坦会议结束才采取行动，那时斯大林已经回国。贝尔纳斯于8月5日打电报给哈里曼，催促他与苏联谈判保证满洲的门户开放问题^⑩，他的电报建议订立一个四国多边条约，这与蒋原来的计划是一样的，虽然他关心的只是大连

问题。

从8月5日到9月20日，国务院4次要哈里曼向苏联施加压力以保证满洲的门户开放^①。哈里曼曾与斯大林会谈两次^②，与莫洛托夫联系两次，面对面地商谈一次^③。虽然斯大林口头上答应保持满洲的开放政策，但要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个书面文件，那是白费力气。在中苏会谈期间，哈里曼私下告诉宋，美国绝不支持苏联提出的超出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的过分要求。但是当宋要求美国保证在中国对苏联坚持这一立场给予军事支持时，哈里曼不愿承担义务^④。

看来哈里曼完全明白，解决国际争端，更多地要靠军事实力。当他与苏联在门户开放政策上的谈判出现僵局时，他于8月11日秘密打电报给杜鲁门，建议美国军队应进入辽东半岛接受日军在满洲的投降^⑤。这一建议得到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麦克阿瑟将军和海军上将尼米兹，在苏军宣布到达前，立刻派海军陆战队到大连。但由于苏军在这地区的迅速推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立刻取消了这一命令^⑥。这个关键性的命令要是实现的话，那就会完全改变战后远东的整个局势。

注释：

①蒋介石著《苏俄在中国》，纽约，1958年修订版，第76—77页，104—109页。或参见《蒋总统为自由正义与和平而奋斗述略》，第188—202页。

②同上引蒋所著书，第109—110页。另见美国国务院编《1945年美国的外交关系》，华盛顿，1960年，第7卷，第985—1025页。

③赫伯特·菲斯著《中国的纠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150页。另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44—1949》，华盛顿，1949年，第550页。

④同注②，第7卷，第136页。

⑤美国第82届国会，参议院第一次会议：《军事委员会及外交委员会关于远东军事形势听证会议录》，第4部分，第2886页。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1年。

⑥另见上引菲斯书，第279页。

⑦1944年10月，顾维钧大使赴任路经华盛顿时会晤了白宫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

李海。在交谈中，李海告诉他苏联对旅顺不冻港的要求。顾揭穿了这一令人难以容忍的要求，并于10月14日秘密地给蒋打了个电报。在11月9日又打了个电报，并指出，根据他的判断，美国希望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而控制旅顺是它的条件之一。李海的情报可能是试探舆论的行动，看看中国的反映如何。顾给蒋介石的电报见《蒋介石总统的秘密文件，雅尔塔秘密协定中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的问题》，第37与39页（未发表，中文），以下简称《中国雅尔塔文件》。

⑦魏道明的密电见上引书第42—43页。

⑧美国国务院编《1945年的马尔他及雅尔塔会议》，华盛顿，1955年，第897—898页。下称《雅尔塔文件》。

⑨见蒋介石给宋子文的电报，引自《中国雅尔塔文件》，第50—52页。

⑩蒋与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的谈话，见上引文件第53—67页。

⑪蒋给宋子文的四个电报，见上引文件第72、73、74、75、82、84—86页。

⑫《1944年的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136页。

⑬见宋子文1945年4月15日及1月26日给蒋的电报，引自《中国雅尔塔文件》第46—47页。

⑭《1945年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893—894页，第896页。

⑮宋子文与杜鲁门总统的谈话（有中文和英文记录），见《中国雅尔塔文件》第76—78页，104—107页。

⑯宋子文与霍普金斯的谈话，见上引文件第108—113页。

⑰见赫尔利大使给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电报，以及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给赫尔利大使的电报，均引自《1945年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903—904页，906—907页。

⑱《中国雅尔塔文件》，第87—102页，119—129页。

⑲宋子文与斯大林大元帅的初次会谈记录，见上引文件第133—137页。

⑳见宋于1945年7月1日给蒋的电报，出处同上，第141页。

㉑见宋于1945年7月2日给蒋的电报，出处同上，第144—172页。

㉒见上引文件第144—172页，宋与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

㉓出处同上，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

㉔蒋经国著《负重致远》，台北，1960年，第63页。

㉕1945年7月3日宋给蒋的电报，见《中国雅尔塔文件》第175页。

㉖见1945年7月4日国务卿贝尔纳斯给哈里曼大使的电报，以及1945年7月9日哈里曼的答复。引自《1945年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914—915页。

㉗见上引蒋经国书第67页。

㉘《中国雅尔塔文件》第197—208页。1945年7月8日哈里曼给杜鲁门总统的电报，

见《1945年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920—921页。

⑳见蒋给宋的五个电报（7月6日—7日），《中国雅尔塔文件》第181—195页。另见赫尔利给贝尔纳斯的电报（1945年7月6日），《1945年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918—919页。

㉑见宋给蒋的电报（1945年7月9日），《中国雅尔塔文件》，第217—218页。

㉒出处同上，第219—220页。

㉓见蒋经国给蒋介石的电报（1945年8月8日），出处同上，第212页。

㉔见宋给蒋的电报（1945年7月9日），以及宋与斯大林的第四次会谈记录，出处同上，第221—243页。

㉕见宋给蒋的电报（1945年7月11日）及宋与斯大林第五次会谈记录，出处同上，第247—264页。另见哈里曼给杜鲁门总统及国务卿贝尔纳斯的电报（1945年7月12日），《1945年的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932—933页。

㉖见宋给蒋的电报（1945年7月12日）及宋与斯大林第六次会谈记录，《中国雅尔塔文件》第265—274页。

㉗见赫尔利给贝尔纳斯的电报（1945年7月29日），《1945年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952—953页。

㉘关于蒋和彼得洛夫大使的谈话记录见《中国雅尔塔文件》第275—293页。关于蒋给杜鲁门总统的电报（1945年7月19日），见《1945年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948—49页。

㉙见《1945年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945—948页，950—952页，953—954页。

㉚按菲斯所说，在波茨坦的国务院官员多门和文森特曾给国务卿贝尔纳斯提交了四份备忘录，见上引文件，第328—329页，注13。

㉛据贝尔纳斯说，1945年7月17日“杜鲁门总统宣称，美国一定要把大连是否仍作为通商口岸这个问题搞清楚。斯大林回答说，如果大连的控制权归苏联，那么可以使它成为通商口岸。我指出，罗斯福总统是在一致同意大连归中国控制的情况下才参与签订雅尔塔协定的。”见贝尔纳斯著《坦率地说》，纽约，1947年，第205页。

㉜关于杜鲁门总统给蒋的电报，见《中国雅尔塔文件》第294—295页。

㉝关于贝尔纳斯给哈里曼的电报（1945年8月5日），见《1945年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955—956页。另见前引菲斯书第330—331页。

㉞《中国雅尔塔文件》，第307页。

㉟美国国务院编：《日本的占领》，华盛顿，1946年，第53—55页。（另见前引菲斯书第326—327页）

㊱美国国务院编：《国际军事法庭对远东问题的审判》，华盛顿，1948年，第357—

385页。

④《中国雅尔塔文件》第309—310, 315—316, 336—338及341页。

⑤出处同上, 第341—369页。

⑥出处同上。

⑦见中华民国外交部编:《中华民国与外国的条约》,台北,1958年,第505—523页。

⑧蒋给宋与王世杰的三个电报,《中国雅尔塔文件》,第320—325页。

⑨见宋、王及蒋经国给蒋介石的各次电报,出处同上,第329—333页。

⑩见注⑦。

⑪见《中国雅尔塔文件》第294—295页。

⑫关于哈里曼大使给国务卿贝尔纳斯的三个备忘录(1945年7月18、28及31日),见《1945年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944—948页。

⑬见注⑫

⑭见注⑫

⑮国务卿贝尔纳斯给哈里曼大使的四次电报(1945年8月5日、9日、11日及22日),催促他与斯大林谈判,见《1945年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955—956,969—970及979—980页。

⑯哈里曼大使与斯大林元帅的第一次会谈是在1945年8月8日。斯大林答应提出一份书面保证,但又说,大连由苏联控制并不违反门户开放政策。雅尔塔协定并未提到需要苏联拿出书面保证。斯大林顽固地坚持大连不能在军事区以外,以保护旅顺港。

第二次会谈是在1945年8月27日,虽然斯大林又一次答应要给书面保证,但从未拿出来。见《1945年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960—965,及981页。

⑰哈里曼给莫洛托夫的信件(1945年8月9日及12日)。在1945年8月13日的一次面对面谈话中,莫洛托夫说,在中苏条约中规定对国际贸易不加限制;因此,斯大林认为对门户开放政策问题提出书面保证无此必要。见《1945年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963—965页,972页及974页。

⑱见前引菲斯书,第344页。

⑲《1945年美国外交关系》,第7卷,第967页。

⑳见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两个密电(1945年8月11日及8月18日)。在8月11日的密电中,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如果可行的话,一俟日本投降,就要作出占领大连港及朝鲜一个港口的准备,如果这些港口在那时尚未被苏军接管的话。但由于得到了关于俄国人在辽东半岛迅速挺进的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便在8月18日的密电中撤销了这个命令(见参谋长联席会议文电,第48004号。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第3862号,日本问题第三部分)。

鲍罗廷回国以后

〔美〕丹·N·雅各布

唐秀兰译

译者按：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丹·N·雅各布写了一本鲍罗廷的传记：《鲍罗廷：斯大林派驻中国的代表》，1981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雅各布专门研究苏联政治及1917年以来的中苏关系。他的著作有《苏联与二十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与现代政治》等。

这里摘译的是鲍罗廷传记中记述他回国以后的种种情况。

鲍罗廷在回到苏联西部后，除了在1927年10月23日为《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作过一次讲话外，就没见他露过面。他治疗疟疾并休息。从他那时的一张照片看，他极度消瘦。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接受“盘问”和重新学习自他离苏后所发生的一切。至于等待着他的的是什么，他显然已经了解得更具体了。

10月底，鲍罗廷在武汉的那些朋友陆续到达苏联，他们追随莫斯科而抛弃南京。由上海脱险的孙中山夫人于9月9日抵莫斯科。其他还有陈友仁及其两个女儿，美国记者雷纳·普鲁梅。在他们之后到达的不仅有政治人物如鲍的妻子范娅（10月6日到），还有罗易。同时还有一批新闻工作者，包括要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苏联党没有接受她），以及雷纳的爱人文森特·希恩。“武汉派”到苏联来，大部分原因是因为鲍罗廷回苏联了。孙夫人出于对他已故丈夫的忠诚而跟着鲍罗廷，陈与雷

纳，是因为他们的命运受鲍罗廷的支配；斯特朗到苏联，则是因为她正在写一本书。总之，所有人的命运都取决于鲍罗廷。特别是中国人，没有了他，他们就不知所措。在等待鲍罗廷露面的时间里，他们在莫斯科城里闲逛，看电影、歌剧，互相串门，回想过去的生活，等待着给他们指出将来的道路。

武汉流亡者正是在莫斯科发生危机时到达的。那时正进入列宁逝世后权力斗争的最后一幕。结局已经明朗，但反对派还想作最后的努力来推翻已作出的结论。反对派提出的主要根据是斯大林以“背信弃义的”和“反对革命的”手段错误地处理了中国的局势。反对派提出的这一点是很有力的。不管斯大林把他在在中国推行的策略说得多么有理，但仍然有懈可击。因为他禁止武装工农而同资产阶级合作。如果这种政策成功了，那倒也罢了，可惜事实不是如此。因此，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他所派的代表，不仅对斯大林是个麻烦问题，而且在与托洛茨基的摊牌中，也是一种危险。斯大林对中国已感到厌烦了，正象他对整个国际革命运动感到厌烦一样。在斯大林看来，反对派只是一些犹太人和国际主义者——大家熟知的叫法是没有根基的世界主义者——这些人及他们的观点只能给他带来麻烦。对苏联来说，最近将来的革命浪潮不是国际范围的革命，而是国内的革命了。

孙夫人和陈友仁对苏联的幻想很快就被他们的所见所闻扑灭了。他们在莫斯科看了一场芭蕾舞剧《红罂粟》，所有的苏联人都是高大、整洁、英勇；中国人都是些矮小的，披头散发的“形象”，看上去是一些离了苏联人就什么也干不成的人^①。可以理解，孙夫人看完这个剧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个剧还使中国人越来越认识到，莫斯科不是武汉；也不象鲍罗廷那样对中国人有感情。可是，即使鲍罗廷也无法改变这种情况。

在陈友仁到达后数天内，《真理报》批评他“在过去十年的革命中什么也没学到”^②。陈和孙夫人由于风闻下列情况而深感不

安，谣传即将枪决反对派分子；共产国际要改组；决定减少参预中国的事情。更令人不安的是对鲍罗廷的态度，他们听到，作为他们力量支柱的鲍罗廷，受到了各方面的攻击——说他太象个中共分子了；有的则说他做得还不够。他受到奚落和蔑视。甚至有人这样说，如果鲍罗廷不是真正的托派，那么他也是参加过托派集团的。他难道不同时既是犹太人，又是世界主义革命者吗？那他一定是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的③。

可是，孙夫人等人仍然期待着他们的朋友和保护人——鲍罗廷，并仍然信任他。只要他一到，指出方向，事情就能办好了，就象他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但很快就使他们感到极度失望。鲍罗廷在莫斯科重新露面后，开始甚至不愿见他们。当去拜访他时，要么说他正忙于写关于中国的报告，如果他在家，那么也只能跟他们谈几分钟。孙夫人和陈友仁正确地得出了结论：鲍罗廷是在躲开他们。确实如此。那是奉上边的命令这样做的。他的领导对他说，中国的问题已经结束，他必须把这个阶段抛在脑后，也不许他同莫斯科的中共分子太接近。因为在中山大学里就有他们的人。在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时，他们是唯一举起亲托洛茨基旗子的一批人。因此，鲍罗廷最好不要同所有的中国人来往。事实上，鲍罗廷感到，现在莫斯科是如此的混乱，他自己又长期卷入共产国际和世界的革命，现在斯大林又决定反对所有这一切，因此，他还是不要同那些老同事接触为佳。11月底，当武汉分子最后一次集会去参加雷纳葬礼时，就证实了鲍罗廷是决心按这个方针行事了。那是11月24日下午，有100多人去参加，其中有孙夫人，雷纳的爱人文森特·希恩，安娜·斯特朗，陈友仁一家，长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如路易斯·费舍等，还有鲍罗廷的妻子范娅及很多苏联顾问，唯独不见鲍罗廷。

当晚，鲍罗廷到雷纳爱人希恩的住所，向他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参加，同时也是来为希恩送行的，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记者，

就要离开莫斯科了。鲍罗廷说，他照例是不参加葬礼的。他显然很不安，忧虑地对希恩说：“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非常清楚。但现在需要的是要有长期观点。我来就是要告诉你，应有长期观点，对中国，对苏联……多么好的朋友，多么得力的革命工具啊，现在全都失去了。除非我们有个长远的眼光，说什么都没用。记住这点，中国、苏联……”^④说完，鲍罗廷就与希恩握手告别了。

鲍罗廷未去参加葬礼是因为上边有命令，不让他与武汉分子接触。可是由于希恩是一个有名的西方记者，又是武汉时期的朋友，现在要离开苏联了，死者又是他最亲爱的人，也是鲍罗廷在武汉时的亲密同事，如果不去作些解释，就未免太过分了。所以他不顾一切地去看了希恩。

经过雷纳的葬礼，武汉集团的人才认清，莫斯科看不起他们，鲍罗廷的中国时代已告结束。于是他们也就各奔前程了。陈友仁去巴黎，罗易去柏林，大多数苏联顾问恢复原来的研究工作，或担任新的任务。孙夫人在莫斯科呆了一段时间也走了。只有鲍罗廷及其在广州和武汉的几个亲密的苏联同事束手无策地等候着对“1923~1927年中国革命真相”的最后处理。只有时间能够作出判决，鲍罗廷个人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多少责任。

斯大林由于还缺少绝对的权力，再加总是缺乏自信，所以他不能象没有发生过在中国的失败那样来亲近鲍罗廷，但他也不能扔掉鲍罗廷，斯大林在必要时，也是能讲点义气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苏联高级政治圈子里都知道，斯大林和鲍罗廷在中国问题上的关系十分密切。斯大林现在要是使鲍罗廷成为替罪羊，那就会招致对自己不利的舆论。正因如此，鲍罗廷才幸免于死。但他被监禁起来，置于生死未卜的境地。他认识到受骗了，丧失了勇气，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党——即斯大林——早晚会对中国问题表示明确立场，那时就能决定他的命运了。在等待这

个决定的日子里，他除了每天来回踱步，下棋，看书，就再也没别的事可干了。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对待所见到的人，说不定他们是坏人。他也不愿象他曾经说过的那样，要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了——谁知道在他写成时，党的路线又会变成啥样了呢？

斯大林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对中国事件提出正式说法。首先，他必须驳斥一种指责，说他在中国问题上是对革命的。为做到这一点，他指示共产党于1927年12月在广州举行暴动。牺牲了很多中共党员及党的同情者，暴动遭到失败。但这却可以“证明”斯大林是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莫斯科负责编排中国问题这一脚本的是米夫。他在武汉失败后接任被赶走的拉狄克成为中山大学校长。在1927年12月的苏共第15次党代会上成为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发言人。

在1927年底和1928年上半年，米夫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与斯大林“合写”的，这样可以提高文章的权威性，也可使米夫得到理论家的头衔。在一篇登在《布尔什维克》上的文章中，米夫提出了关于中国的路线。米夫说，在1927年4月国民党农民委员会提出要求大规模没收土地的报告以前，中国没发生大的错误^⑤。1927年5月的中共五大作出了有利于没收土地的正确决定。但它犯了一个大错误：它并没有撤销冒险主义者陈独秀的党的总书记职务，他一直反对没收土地。米夫气愤地说：“居然没有一个人举手反对陈独秀”^⑥。大会结束后，陈仍然掌权，他无视大会的指示，而把中共引向灾难之路。

所以，失败的责任在于陈独秀，其次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把责任推给苏联人，共产国际作出了正确的决议并专门给了指示。米夫写道：“只有共产国际的最坏的敌人才会把中共领导人犯错误的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只有那些想利用中国革命的暂时失败来挫败共产国际的人才会那样想，认为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领导人给了孟什维克以及当时中共中央背叛的、机会主义的活动提供了

什么根据。”^①要么接受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解释：要么就冒这个风险：被带上孟什维克或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或者是双料货）。这个结局将是致命性的。

这条路线一经确立，他们便去找鲍罗廷，要他进一步加以证实。鲍罗廷一直想说话，但至今一直被追保持沉默。现在要他说话了，但他却宁可保持沉默，伪造事实，否认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那是一种心理上的痛苦。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他自己岂能胡编乱造？

1928年这一年时间，鲍罗廷大部分都是呆在他的两间一套的住房里，下棋，偶尔也散散步。除范娅外几乎不见任何人。有时同他一起下棋的贝特伦·沃尔夫说，鲍罗廷非常孤独^②。前途是凶多吉少。

只有斯大林点头，鲍罗廷才得以不付出他应付的代价。斯大林的继续容忍，说明了为什么鲍罗廷不仅能继续保持沉默，而且还能在莫斯科住上宽敞的房子，他的房子大于分给那时共产国际任何人的住房。这还说明为什么鲍罗廷那时仍有影响，甚至有时还能帮他老朋友的忙。举例说，1928年罗易从柏林回国，参加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在莫斯科病倒了。罗易发现自己已失宠于莫斯科，担心不准他离开医院或离开苏联。鲍罗廷就帮助罗易，把他的女朋友从柏林找来，带着罗易出了医院，后来离开了苏联。所以，这时鲍罗廷在苏联还是有些影响的，但这种影响还没达到能挽救他自己的程度。

鲍罗廷在192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保持沉默。可是在1928年末及1929年初，当反对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运动发展到包括右派反对派时，要求人人彻底地、公开表示忠于斯大林的气氛日益加强。不允许再沉默了：人们必须公开而热烈地表示效忠斯大林，否则就会面临各种后果，无一例外。

为使鲍罗廷投降，并证实斯大林主义的正确，想出了开学术

讨论会这样一个办法。讨论的题目是“陈独秀主义的历史背景”，安排在1929年1月25日召开。会议先集中在康米纳同志的一份讲话上，然后被邀者对此进行讨论。鲍罗廷也是被邀请者之一。按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康米纳同志先提出党的路线，然后犯错误的人作检查。1月25日的会是康米纳发言，29日的会是犯错误者作检讨。

鲍罗廷在29日发言。他说：“同志们，我不是来参加讨论的，而是为了想听听了解最近时期中国革命和中共情况的同志的发言而来的。但当我来了之后，他们提出要我参加讨论。可以这样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努力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研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想得到在苏联得不到的中国材料。我希望能再准备一两个月，然后我再和你们谈我的看法。”^⑨

鲍罗廷借口他不知道要来参加这个会，所以他没充分时间来准备，他的发言就是这样开的头。接着他就以康米纳报告中的立场谴责“陈独秀主义”（这是斯大林把错误归于陈所定的调子）。说陈独秀“使中国革命受到托洛茨基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干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陈对我们过去的失败是要负责任的。……我强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工人，特别是我本人也犯了严重错误。我对这些错误想得很‘多’，作了研究分析，也得出了一定的结论。我将在适当的时候来谈这些问题，我想很快我就会这样做的。”^⑩他现在提到的他的错误之一是，没有把他同陈独秀的许多分歧“引向斗争”。他说，如果他同陈进行斗争的话，中共就不会被孟什维克掌握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鲍罗廷现在也没有谈他自己的问题。他要与会者先搞清楚，所以他说，从1923年开始，中国有两条不同的路线：陈独秀（即上海）的路线和广东路线。上海路线只搞反帝革命，但广东的那些人认识到，中国要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不然就根本不能取胜。他们一步一步地搬掉了中国革命前进道路上的障

碍。但在上海,《向导》周报却只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根本不谈社会革命。

正当广东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为夺取革命胜利进行斗争时,他们得不到上海陈独秀的支持。相反,陈“故意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并为工农取得领导权设置障碍。鲍罗廷一再强调说,在那些日子里,对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广东领导的路线和上海中央委员会领导的路线(即孟什维克路线)。广东的这一派虽不是一贯正确,但他们是革命的。

鲍罗廷在讲话结束时,对与会的“学者”们说,陈独秀主义是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但也还应该找找别的原因。鲍罗廷在作了“检讨”,并提出了一个看来是修正官方路线的“解释”后便坐下了。接着发言的是长期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维经斯基,他坦白供认了自己的错误。对鲍罗廷的严酷考验并未结束,在维经斯基讲完后,有一个报界人士兼远东问题专家萨法洛夫接着发言。他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被驱逐出党。现刚恢复工作。他拼命攻击鲍罗廷,迫切想显示自己的正确。

萨法洛夫说,鲍罗廷是想悔过的。他承认了错误,承认在中国存在孟什维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也承认反对陈独秀不够有力。但这还不够,他仍然是在夸夸其谈。

下面是萨法洛夫与鲍罗廷发言的一段记录:

萨法洛夫:鲍罗廷并不是真心检讨错误。中国人自己已经改正了错误,所以他们会消灭党内存在的孟什维克倾向。可是,在1925~1927年的事件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鲍罗廷却在用孟什维克老祖宗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说话。他说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只能是社会革命的胜利。这赤裸裸地反映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革命的下一步不是工人农民的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鲍罗廷,这是对的。

萨法洛夫：不仅应该说“这是对的”，还必须说为什么这是对的。鲍罗廷同志经常提出一些错误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新提法，他作的每一个检查都有新的错误。所以，他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检讨，他想把所有的错误都归结为上海路线与广东路线的斗争，这是一派胡言，极大地混淆了历史，是想把什么都说成是“人”的问题。而且，还说他在广东坚持工农领导的思想，这是又一次进行孟什维克的诽谤。无产阶级不管人数多少，都必须是领导阶级。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不是“工人和农民领导”，而是“无产阶级领导”。我们还必须要对削弱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以及孟什维克否定这一思想的倾向进行斗争。

萨法洛夫严厉谴责了鲍罗廷坚持他自己的解释及其对孟什维克原则的肯定后，便坐下了。但他对鲍罗廷的攻击还没完。在这天的会议结束前，他还指责鲍罗廷不仅是孟什维主义，而且还是托洛茨基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⑩。在当时的莫斯科，这些罪名是致命性的。鲍罗廷动摇了。最后他终于要求允许他从正式发言记录上删掉一些他说过的话。

这就是1月29日全天的开会情况。在萨法洛夫结束他对鲍罗廷的攻击，以及鲍罗廷要求删掉他的发言后，会议宣布休会。在8天后又安排了第二次会。会议以再次批判鲍罗廷开始。这次向鲍罗廷进攻的是古达科夫同志，这是另一个表示悔过、最近重新恢复了党的职务的人。他说：“对鲍罗廷在这里发表的奇谈怪论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他没有吸取教训；他改变了说法；他想从历史和地区的角度来谈问题，把自己藏在编造出来的什么上海与广东的分歧这一提法的背后。他提出这种站不住脚的两条路线的论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保护他自己^⑪。古达科夫作了长篇发言，从记录来看，是连篇累牍地批判鲍罗廷。但鲍罗廷不接受古达科夫的批判，进行了反击。尽管双方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的都是批判鲍罗廷的，但从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鲍罗廷对来自各方面的各种指责，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为他自己辩护。他发言的很多

内容都是根据1927年10月23日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上的那次讲话，那时他刚从中国回来，还不知道在否认过去这点上，上面到底要求他走得有多远^④。

在古达科夫的攻击以及鲍罗廷进行反击后，萨法洛夫又开始了进攻。他引用列宁和斯大林的话，指责鲍罗廷忘记了1905年的教训：最恶劣的是不用列宁主义的立场，而是用他自己特有的“广东”模式来看待1925~1927年中国的阶级斗争^⑤。从速记稿上可看到，这只是萨法洛夫所提意见中引起笑声的意见之一。萨法洛夫又把鲍罗廷描绘成是一个容易在思想上受骗的人，甚至是个傻子。萨法洛夫为了得到党的欢心，并为了报答任命他当《中国问题》杂志的主编，所以就残酷无情地批判鲍罗廷。不过他这次没有骂鲍罗廷是孟什维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从记录上看，鲍罗廷这次保持沉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鲍罗廷接到通知说，决定结束辩论。党已经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鲍罗廷应该同党的立场相一致。保护他的人甚至允许他最后表一个态来回答古达科夫。其实，党通过萨法洛夫的发言，已经有了结论。在结论中嘲弄了鲍罗廷。不过，虽然萨法洛夫把鲍罗廷说成是个傻子，但没有说他是反党分子、孟什维克或托洛茨基分子。原因是，鲍罗廷作为一个容易上当的人，就有可能改过自新，从而也就有可能给他恢复名誉并重新起用他。

这时，对鲍罗廷如何处理的决定尚未宣布，他奉命要会见并接受长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路易斯·费舍的采访。这使他十分不安。因为他了解，领导上曾批准费舍去采访许多知名人物，其中大部分是反对派人物。他意识到叫费舍去采访他是对他的考验。他能不能有把握地把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立场说得和党的立场一样呢？

当鲍罗廷第一次见到费舍时，他紧张得几乎不能开口^⑥。他从

不给费舍一个明确的会面时间。他总是说：“星期五晚上给我打电话”。当费舍打电话时，人家又说：“鲍罗廷同志希望你明早9点给他打电话。”次日9点，他在电话中却说：“过20分钟再来电话，现在要我去开会了”。¹在20分钟时间里，他要就是见他，要就取消了会面。费舍认为，鲍罗廷的这种举动是出于他天生的善于保守隐密的性格，这种性格又由于他在芝加哥和中国的经历而加强了，加之他总想“说话和行动都绝对可靠而带指导性”²。但看来更易理解的原因是，他所遭到的政治上的折磨。党将会作出什么决定呢？他本人和他家庭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消息传下来了，说不要象萨法洛夫威胁的那样指责鲍罗廷是追随反对派的。而且说很快就要给他安排工作。费舍注意到，可以经常去访问鲍罗廷了，每次谈话的时间也长了，鲍罗廷也日益“有兴趣讲一些问题了”。并且更多地是从他所持的长远观点来谈的。

到1929年中期，鲍罗廷度过了危机。一旦结束了奉命同费舍的谈话，他再也不公开提中国的事了。也不愿写关于中国问题的书，1927年时他曾说要写的（这是可能的，因为那时他确曾写了一个回忆录草稿³，可是在苏联的任何材料中都未见引用）。甚至已经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外国人问及他这个问题时，他仍不愿意说⁴，因为这太危险了。20年代末，这个问题几乎把他从政治上消灭掉；后来，在斯大林大清洗的30年代，同他一起卷入中国问题的人都被处决了，包括加拉罕、加伦以及大多数苏联军事顾问。所以，谈论死一般的过去，是一点没好处的。

党结束了鲍罗廷的中国革命篇章之后，在1929年给他分配了一个同以前任命给他的完全不同的工作：叫他去彭普隆（音）当纸张和木材公司副经理。因为那时党的注意力已不是国际革命而是国内的工业化和集体化。鲍罗廷对费舍说，他对担任这一工作感到意外。

鲍罗廷最后能从中国失败的危机中摆脱出来，说明在上面有人帮他转危为安。他能在木材行业工作，进一步说明了政治局里有他的保护神。因为彭普隆在苏联的发展计划中具有头等重要地位，当时它处于不稳定状态，迫切需要一位有组织才干的领导。但是，处理彭普隆的事务，并不象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或革命一类问题。鲍极不称职，很快就被撤换了，受到了党的处分。后来给他一个更小的职务，在工业部门的一个工厂当厂长。他的表现仍不能令人满意，又受到一次处分。

鲍罗廷当然十分消沉，难道离开芝加哥就是来管工厂的？他心里始终认为仍然有许多重大的革命工作需要去做。鲍罗廷是一个胆小怕事而又爱发脾气的人，但他不能表示他的愤怒。尽管失败，他又得到了另一个工作，这次是在劳动人民委员部，负责同外国来的技术人员、专家打交道。这不是一件好差使，但考虑到最近的一连串失败，他能得到这一工作算是幸运的了。这些失败要是换了别人，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这一工作显然他是能胜任的，也更适合他的才能。但是到1931年中期，从国外请来的专家人数减少了，鲍罗廷的工作也相应减少，他还只有48岁，他设法另找工作。

1930年10月5日，经上级批准，《莫斯科新闻》开始出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主笔，鲍罗廷为总编辑。斯特朗想把《莫斯科新闻》办成为远离家乡的美国人服务的英文报纸。这家报社不仅为美国人服务，同时也为武汉来的人提供了工作场所。陈友仁的儿子珀西与杰克在报社兼职。鲍罗廷的妻子范娅也在报社工作，她还为创刊号写了贺词。后来，另一个“武汉分子”M·比利·米切尔，成为总编辑，雷纳的丈夫比尔·普鲁梅也被请来参加报社工作。

报社在工作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最麻烦的是关于办报目的，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他们不同意报纸面向讲英语的专家，

说这些专家拿很高的工资，既无能力，又不好好工作，回到美国就为《星期六邮报》写反苏文章。还指责《莫斯科新闻》没有作出努力来改造这些专家，向他们解释党的路线，进行思想教育。现在需要有一份强调党的主义，直接为党的利益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英语报纸。于是，另一份为工人服务的《工人新闻》便诞生了。

有一年时间，《莫斯科新闻》与《工人新闻》互相攻击。后者攻击前者是资产阶级，说它贬低斯大林讲话，不突出党和政府的事务，也不强调苏联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前者则指责后者缺乏文化素养，迟钝，把报办得死气沉沉。这样，斯特朗的工作便经常受到刁难。到1932年初，斯特朗决定回美国，想揭露有关《莫斯科新闻》的一些问题。在这样做之前，她见到了一位“很敏感的”苏联党员（可能是鲍罗廷）。她向他说了她的挫折和想法。他强烈要求她别急于这样做，建议她直接去找斯大林以得到他的支持。斯特朗便给斯大林写了封信。斯大林同意接见她半小时。在那次有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洛希罗夫出席的会上，斯特朗同她的对手面对面地吵起来，为各自的观点辩护。斯大林当着大家的面，命令两份报纸合并为一份新报纸《莫斯科每日新闻》，新任总编辑为鲍罗廷。

在历史的主流中，鲍罗廷虽然是被抛到了一边，但和他同时代的很多同事来比，他还是个胜利者。他没有进监狱，仍然活着。这是在大清洗的年头，无数苏联人被捕，被送往集中营服苦役，然后遭枪决。几乎所有同他一起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都是这个下场。同他一起在《莫斯科每日新闻》工作的3个同事也被逮捕了，而他仍然是自由的。他妻子继续在教英文和德文，他儿子弗雷德在军队里也提升了。诺曼上了大学。

鲍罗廷心里明白，他及其家庭所以能逃脱这种不幸，是斯大林帮了忙。斯大林保护了他，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安排工作，以此

为他“恢复名誉”。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失败的结局，但一些有判断力的人仍然清楚，鲍罗廷是斯大林的人。他继续享有自由是可以证明：斯大林一直是正确的，而且，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鲍罗廷的情况充分说明了斯大林的控制，证明他的控制是超越一切人之上的。

随着《每日新闻》变成周报，鲍罗廷的工作少了，他便在1939年与人合作，编了一本关于苏联电影的书^⑩。没有得到好评，那是他漫不经心草草写成的。他对苏联电影问题确实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怎么生存下来，尽可能地风平浪静。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成为红军上校的弗雷德，在战争开始阶段死于战场，鲍的妻子仍搞语言方面的工作，他自己继续监督《莫斯科每日新闻》，并且还成了苏联情报局的一个官员，负责接待战争期间大批来到莫斯科的外国报界代表，同他们谈话，然后就向苏联保安机关汇报^⑪。那时候，派了很多苏联人去和同盟国来的人打交道，并竭力表示友好。但鲍却相反，他脸无笑容，尽量躲开他们。在谈话时，不透露任何情况^⑫。如果问到他的过去，他什么也不说。他知道说了是要受到责难的。

对这个过去领导过半个中国的革命领导人来说，现在只是当一名告发者，这种贬职实为可悲。但是战争还在进行，他还要活下去。中国几乎已成为南柯一梦。人人都小心谨慎，学着斯大林，连穿衣服，留胡子都学斯大林（人们尚可记得，20年前陈友仁也学鲍罗廷的衣着，留鲍那样的胡子），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贯彻党的路线。都想躲开麻烦，这是能活下来的唯一办法。现在，鲍罗廷自己也面临严峻考验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斯大林就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对苏联的统治。他完全控制了苏联和新的东欧帝国。但是他的恐惧有增无减，因为增加了新的共产党国家，尤其是将要出现一个共产党的中国。尽管这显然是扩大苏联的领导和影响的事，但斯大林却

认为，这是对他和苏联的权威的一种新的威胁。

在南斯拉夫，铁托对斯大林的挑战与日俱增。1948年6月，苏联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的反应就是把南斯拉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

斯大林想用警告那些危险的民族主义者放弃革命的办法来制止民族主义的可怕发展。特别是对武汉失败20年后正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斯大林给他打过招呼。毛泽东从1927年以来就同苏联人关系不好。30年代初，莫斯科认为，毛不是莫斯科训练的，因此不能信任，尽力要把他降到次要地位。斯大林更是不相信毛的农民第一的理论和和其他异端邪说。从毛担任领导时起，斯大林就不支持他。日本投降后，苏联掠夺了满洲，把可以给中国红军的战争物资占为己有，就象它掠夺东欧那样。斯大林一再强烈要求毛放慢步子，并要他同蒋介石合作。因为一个由毛领导的中国会破坏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

1949年，当以色列的第一任驻苏大使戈尔达·迈耶到达莫斯科并受到和她同属一个教派的5万名犹太人的欢迎时，斯大林就越来越不安了。斯大林的排犹主义早为人所知。现在，莫斯科有这样一大部分犹太人，他们迸发出来的感情使斯大林证实了犹太人不忠于苏联的。民族主义是敌人；犹太人是民族主义者，于是犹太人就是敌人。

正是在斯大林决心制止这种民族主义浪潮时，斯特朗在1948年底回到莫斯科。她刚从东欧转了18个月回来。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以及1947年初，她都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在延安拜访了毛。她对毛解决亚洲政治问题的办法深表赞许。尽管年已70，她还象过去那样，热情地想把伟大的革命变革写出来。她写了125,000字的底稿，报道新中国以及关于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科学”的文章。在一些长达1万字的文章中，她只字不提苏联对毛主义发展的贡献，还特别攻击了“那些在国外学习，特别是在苏联学习的”教条主义分子，说“他们由于会大量引用马克思、列宁和

斯大林的词句而名声大噪。但他们对中国实际问题的一无所知把中国引向了灾难”^②。

斯特朗动身到欧洲去谋求出版她的书。在她途经北朝鲜时，可能是苏联的要求，耽搁了3个月才拿到北朝鲜签证。她还以为这是有名的官僚主义的贻误，实际上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最后，她终于到了莫斯科。还象往常一样，去看她的老朋友鲍罗廷。她热情告诉他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现在掌权的他的中共老同事的成就，以及她写的这方面的书在国外如何赢得好评（包括苏联的卫星国）。也谈到了她的失望，因为《真理报》没发表过她一篇文章，以及要在莫斯科出版这些书所遇到的障碍。鲍罗廷在斯特朗到来前已经得到上面指示，应该怎样向她谈这些问题。于是他向斯特朗说，她的“底稿在编辑上存在一些问题”。然后，可能也是事先安排好的，当着她的面打电话给国家出版局，说这本书应该出版。

10年以后，斯特朗回忆说，鲍罗廷当时不同意说原稿有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他是这样为原稿辩护的：“中国人不正在赢得胜利吗？因此，他们的理论不可能都是错的”^③。但是鲍罗廷的说情无效，那是不算数的。斯特朗在莫斯科遭到失败后，就把书带到东欧国家，它们都同意出版；唯一的例外是贝尔格莱德，这颇耐人寻味。斯特朗在莫斯科又作了一次努力，请求批准出版她这本书。其他共产党国家都同意出版，莫斯科为什么反对呢？愁眉不展的鲍罗廷告诉她说：“克里姆林宫不喜欢你写的书”^④。接着就直率地对她说，要想出版的唯一可能就是同意作某些修改，而且在共产党国家出版的所有版本也必须作同样改动。对此，她拒绝接受。

经过几个月的争吵，斯特朗知道再要作进一步的努力，已经无望。她要求给她一个回中国的签证，继续观察和报道中国即将取得的胜利。莫斯科拒绝提供帮助。如果鲍以前还不曾察觉的

话，那么现在开始意识到了：斯特朗已被监禁了。作为她的联系人和说情人，他也会招致同样的不幸。即使如此，他还向“当局”说清了所有他说的和做的事。斯大林畏惧和仇视外国人的偏执狂正达到顶点，在这样一个不妙的时刻怎么能容忍他们的做法呢？怎能允许斯特朗热情赞扬毛的离经叛道的共产主义呢？他们的处境越来越险恶了，因为卫星国居然同意出版斯特朗的书，因为斯特朗拒绝修改底稿，又因为她在最近竟又去了一趟贝尔格莱德，再加上鲍罗廷是犹太人！在1949年，只要在这些原因中占有一条，就都能引起怀疑。于是，他们两人便都处于危险之中了。大约在1月28日到2月4日这段时间里，斯特朗和鲍罗廷，连同《莫斯科每日新闻》的工作人员均遭逮捕，报纸也被勒令停刊^⑤。

斯特朗在卢贝卡呆了5天之后，飞往波兰，被批准返回美国。但是鲍罗廷，同他的报纸一样，就再也见不到了。他被说成是敌人，外国的民族主义。光这两条就够了。

1953年9月3日，《纽约时报》长驻莫斯科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获准报道，鲍罗廷已死去^⑥。他死在亚库茨克附近集中营中条件最恶劣的一个监狱里。死的那天是1951年5月29日，离斯大林逝世将近两年。鲍罗廷时年67。他在监狱和集中营里挣扎着活了两个年头。

鲍罗廷死亡的消息虽是在1953年批准向外透露的，但正式恢复他的名誉则又过了10年，比其他参预中国革命的人在苏联历史上恢复名誉要晚得多。那时恢复他的名誉仅仅因为当时的政权正处于中苏冲突之中，是为了从政治上着眼，想以此证明苏联是长期关心中国革命的。1964年6月30日，鲍罗廷诞生80周年那天，在“宽大的”赫鲁晓夫时代的最后日子里，发表了切列潘诺夫将军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革命的列宁主义者》，旁边还刊印了一张鲍罗廷在中国的照片，发表在《莫斯科真理报》的里页。切列潘诺夫将军是负责编写苏联顾问在中国的历史的。文章列举了有关鲍

罗廷生平的一些情况，结尾有这样一句话：“1949年2月，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米哈依尔·鲍罗廷受到镇压，死于1951年。现在党已经为他恢复了名誉。”^②两年后，在一本为纪念孙中山诞生百周年而出的文集中，鲍罗廷的妻子（在鲍死后又活了20年）对她的第二个儿子、已成为记者的诺曼口述了关于她丈夫的早年生涯以及同孙中山关系的简短回忆^③。

注释：

①文森特·希恩：《莫斯科与中国革命》，《亚洲》，1927年12月，第1008—1009页。

②《真理报》，1927年9月18日。

③路易斯·费舍访问记，1969年3月27日，普林斯顿，新泽西。

④希恩：《个人历史》，第302页。

⑤米夫：《危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莫斯科，1928年，第66及75页。

⑥同上书，第66页。

⑦同上书，第100页。

⑧贝特伦·沃尔夫访问记，1969年4月25日，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⑨“陈独秀主义的历史背景”，《中国问题》，1930年第3期。

⑩同上。

⑪同上，第214—217页。

⑫同上，第217页。

⑬虽然在切列潘诺夫所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第101—103页中有详细摘录，但遗憾的是没有得到这篇讲话的原稿。

⑭《中国问题》，第227—228页。

⑮路易斯·费舍访问记，1969年3月27日，普林斯顿。

⑯路易斯·费舍：《人与政治》，纽约，1941年，第138—139页。

⑰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两年，1925—1927年，回忆录》第373页。

另见琼·谢斯诺与约翰·勒斯特：《中国近代史研究导言》，海牙，1964年，第72页。

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记，1970年8月11日，纽约；乔治·穆拉德：《在中国失去的和平》，纽约，1949年，第206页。

⑲鲍罗廷编：《苏联电影》，莫斯科，1939年。

- ① 路易斯·费舍访问记，1969年3月27日，普林斯顿，新泽西。
- ② 穆拉德：《在中国失去的和平》，第206页。
- ③ 菲利浦·贾菲：《奇怪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案件》，《综览》，1964年53号。
- ④ 艾伦·惠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卷进了毛与斯大林的争吵》，《华盛顿邮报》，1970年4月12日。
- ⑤ 同上。
- ⑥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记，1970年8月11日，纽约。
- ⑦ 《纽约时报》，1953年9月3日。
- ⑧ 《莫斯科真理报》，1964年6月30日。
- ⑨ F·S·鲍罗廷娜：《孙中山的顾问》，收录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论文、回忆录、资料选集》中，莫斯科，1966年。

中国革命时期 第三势力的成立与展开

〔日〕菊池贵晴
张惠才 韩凤琴 译

编者按：本文译自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讲座》第七卷（中国革命的胜利）。作者菊池贵晴，文学博士，国立福岛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中国现代史研究专家。他生于1920年，东京文理科大学毕业。1950年任福岛大学学艺学部副教授，从事“在列强压抑下中国的变革论”的研究。1959年至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的编写工作，1977年以来，在福岛大学教育学部讲授历史学。主要著作有：《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现代中国革命的起源——辛亥革命的意义》等。

一、序

这里所谓的第三势力，是指在国民革命失败时的1927年7月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期间，不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任何一方合作的，基本上采取中立立场的40几个党派^①。

虽然它们大部分是泡沫式的党派，但其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有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战后称民主社会党）、救国会派、乡村建设派和职业教育派这三党三派及其联合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主同盟的活动，特别值得研究。

平心先生曾对第三势力的一般性质和基础作了如下概述：在中国几亿人民中，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等政党有关系的人，只占全体人口的百分之二，其余的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是无党无派，这广大的无党无派民众，便是第三势力发展的社会基础^②。小市民、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中农以上的农民阶层均属于这一类人。中共也有大致同样的见解，他们认为中国是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③。

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党。由于国共分裂，国民党急速地向右转，变成了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官僚买办资本的代理人，如果共产党还是工人和贫农阶级的政党，那么代表中间广大民众的政党则不存在。谁来并如何集中和组织这一阶层的人们，这对于抗战和革命的结局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原来，孙文最为重视的，实际上不正是这些阶层吗？可以说，企图起这种填补作用，就是第三势力主流的基本目标。

这里想把下述问题作为当前的课题进行研究：第一，第三势力的成立(概要)；第二，国共两党与第三势力各党派；第三，第三势力的集结与变迁；第四，民盟的革命化及其经济背景——中间路线的崩溃。

二、第三势力的成立

1. 第三党

笔者认为，第三势力的成立是在1927年6月至7月武汉国民党的反共政变时期。

它是以被国民党开除的邓演达和因反对没收土地的政策而被共产党开除的谭平山为中心联合组织的^④。名称的由来，是根据不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任何一方联合的第三政党这一意思^⑤。

邓演达，当时身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要职，蒋介石上海政变后，依然坚持孙文的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中

心的国共联合战线，并推进国民革命^⑥。但是国民党已变成了封建地主、官僚买办资本、投机政客和反动文人的集团。武汉政府在与旧势力妥协，策动国共分裂方面也没有大的差别。

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国际的相互矛盾的指示和鲍罗廷与罗易间的对立，武汉政府内的共产党被折腾得左右为难，思想上十分混乱^⑦。

在中共干部中，蔡和森和张国焘等人认为，“应该拥护邓演达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公开反对企图出卖革命的汪精卫等人（谭延闿、程潜、孙科、唐生智一派）”^⑧，鲍罗廷也“企图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人形成新左派，阻止汪精卫等人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⑨。

然而，已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丧失信任的邓演达却无动于衷，其意图正如他对施存统（复亮）说的实话那样，在于“……实行国民党第二次改组，解散共产党组织，统一革命的领导权，集结整个革命势力，沿着以非资本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路线前进。”^⑩用蔡和森的话说，这是受了托派顾问的影响^⑪。

碰巧，武汉政府的农民部长谭平山，由于反对共产国际推行的土地革命，宣扬第三党而被中共开除。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他们二人商妥的统一行动。据说随着谭平山被开除而脱党的还有国民党中央执委、海外部长彭泽民，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章伯钧，九江海关监督林祖烈等大约三千人，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在脱党后加入了第三党^⑫。第三党成立的经过大致如此。其后，第三党曾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行动解放委员会和中国农工民主党，但基本路线未变。

从1930年8月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看，其经济政策如下：规定现阶段到社会主义这段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为国家资本主义，当前的目标是：①依靠工人农民为中心的平民大众夺取国家权力，具有垄断性质的大产业和重要企业实现国营化；②暂时

允许中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存在，但限制其发展，向社会化的方向引导；③个人占有的土地超过一定限度时，由国家收买，实行“耕者有其田”⑭。

其政治纲领也很明确，就是继承和发展孙文路线⑮。据说邓演达等第三党党员尊孙文遗孀宋庆龄为盟主，并以国民党左派、真正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居⑯。宋庆龄也称颂邓演达“彻底地理解了总理的教义和政策，其努力目标也在于实现它。同时，他已充分认识到为了三民主义的实现，为了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自由权及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进行的斗争，相互间是不可分离的”⑰。证明了他是孙文主义的真正的理解者和实践者。因此，邓演达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所不容，于1931年8月在上海游说时被捕，后遭杀害⑱。

邓演达死后，第三党党员继承了他的遗志，继续活动。1933年11月，谭平山、章伯钧、黄琪翔等人与社会民主党的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等人一起，建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开展了反蒋抗日运动，便是一例⑲。据说，他们已成为主力，在福建西部进行了短期的土地改革实验，并得到了农民的支持⑳。作为孙文派的土地改革，确是令人感兴趣的。然而由于人民政府本身脆弱，加之中共中央拒绝与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最后还是无所成就而失败了㉑。

2.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在研究第三势力的成立和展开这个问题时，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联”），它的组织是全国规模的，而且对抗日民族战线的统一做出了很大贡献。从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及其领导人的派系和政治纲领等看，笔者将第三党—→救国会派—→民主同盟的发展看作是第三势力的中心。

“全救联”是响应中共的“八一”宣言和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于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成立的。由于1935年

年末日军大量增兵华北和各种日货大量秘密输入，中国的政治经济濒于严重的危机。“全救联”的成立，便是这种形势的反映。以北京的学生为中心，已经开展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给了全国以极大的刺激。

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由于日本秘密运入武器和扰乱市场，不要说工人和一般市民，就是从前对爱国运动抱冷淡态度的民族资本家们也参加了统一战线。例如，由于上海的九三同业组合全都响应学生运动，全国的工商业团体也都起来了^②。中国人除了一小撮汉奸以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反对日本^③。

代表民族资本家上层利益的章乃器等人激烈的言论和行动以及职业教育派的黄炎培、杨卫玉和姚惠泉等人参加救国运动，便意味着这一点。

“全救联”的“宣言”指出：①各党派应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②各党派应尽快派出正式代表，“全救联”作为调停者进行协商，制定共同纲领，以便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另外，在其“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中强调，应遵循1925年至1927年当时的革命精神，恢复孙文的遗嘱和新三民主义以及三大政策。作为基本认识，应按照人民大众的要求，以“抗日第一”为原则，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当作共同的敌人，推进各党派和社会各阶级的彻底合作，并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承认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7月15日，“全救联”发表了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署名的“团结御侮的若干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并提出了结成联合战线的具体方案，它对全国人民的影响极大，这是众所周知的^④。

对此，中共于8月10日以毛泽东“致章乃器等四人的信”这种书面形式，原则上承认了他们的要求^⑤。因此，统一战线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于是，“全救联”根据9月18日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确定了在全国各方面开展工作的重点目标，并开始了活动。其中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全救联”的干部奔赴西安劝说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转移战场一事。波多野乾一指出，第三党的军事理论家黄琪翔于1936年10月前后劝说张学良加入民族统一战线，《新生》杂志的编辑杜重远，指导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2月9日领导了7000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②。

在研究西安事变时，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全救联”的主要领导人是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 and 史良，即所谓的七君子。一般称作救国会派，会的执行委员和合作者中有宋庆龄、何香凝、沈兹九等。在政党方面有第三党、社会民主党、国家主义青年党之一部，而且中共党员也参加了幕后工作。

主力是国民党左派或是接近他们的人。例如，最高领导沈钧儒在加入孙文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之后，参加了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国民革命，一贯地在为民族和民主而战，“四·一二”政变时被捕，其后改任律师^③。接着，于1932年12月加入“宋庆龄先生的自由大同盟（民权保障大同盟），该同盟是国民党左派的组织。后来当救国会成立时，由于年高之故，被推举为领袖”^④。

救国会的上海小组，似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胡愈之等人主持的组织为基础成立的。大学教授兼律师王造时和著名的新闻记者邹韬奋都是自由大同盟的热心会员和执行委员^⑤。量戈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的经营者、民众教育家李公朴和为人权而战的律师沙千里二人均加入过国民党，北伐时他们在上海担任地下工作，十分活跃。国共分裂后，虽然脱党了^⑥，但仍是纯粹的国民党左派人物。

所以，“全救联”第二次大会（1936年10月）是兼追悼鲁迅而召开的；接着第三次大会（同年11月12日）是兼纪念孙文的诞辰

而隆重召开的^⑩。这是有充分理由的。特别是在第二次大会上，宋庆龄和蔡元培发表了演说。在第三次大会上，当沈钧儒捧读孙文的遗嘱之后，李公朴等干部相继对南京政府的投降分子“背叛国父的遗教。拱手向敌人屈辱求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现状，给予了猛烈的攻击^⑪。于是发生了“救国会七君子之狱”事件。宋庆龄和何香凝作为全救联的执行委员，向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声明^⑫，给全国人民以极大影响。

三、国共两党与第三势力各党派

1. 中共与第三势力各党派的民主化要求

中共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企图进一步广泛地动员和组织民众，一有机会便极力主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停止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结成各党派各阶层合作的民主联合政体。因而，国民党于1938年7月组织了国民参政会，并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企图吸收一点民意，在这一背景中，明显地反映了中共的主张^⑬。

特别是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将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明确为实现三民主义，并强调国际上的平等、政治地位的平等和经济生活的平等^⑭。而且后来又多次反复主张实行孙文的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大”宣言和三大政策。可以说，一方面将它作为理论上的武器，迫使国民党进一步民主化；同时也企图以此集结多年来以同一目的坚持战斗的第三势力或全国民众，加强民族统一战线。

上述努力在1939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取得了成果。由于中共和第三势力各党派的通力合作，迫使国民党基本同意停止一党独裁，通过普选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和各抗日党派在政治上的平等。

当然，那时明确地叫它宪政问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第一，对国民党中央集权性的经济政策不满的地方势力和民众，要

求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并进行各种改革；第二，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南京傀儡政府，为了笼络人心，也在宣传实施宪政，重庆政府为了与之对抗，作为掌握民意的手段，需要采取某些措施；第三，特别是以抗战为机会，寻求合法地位和扩展势力的中共和第三势力各党派，强烈地要求推进此项工作。

作为国民党，有三届二中全会的训政六年和1935年开始实施宪政的公约，而且在理论上没有反驳实施宪政要求的根据。因此，尽管政治的民主化明显地对该党的独裁不利，而且显然有可能是在挖掘坟墓，但表面上不得不顺从它。特别如邹韬奋所指出的那样，孙文根本就没有主张过所谓的一党独裁。孙文说：以党治国，非以本党之党员治国，而是以本党之主义治国也。……本党内若无与此相当之人才，当然可借用党外之人才^⑤。

他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以“主义治国”，那么，当时按照抗战建国纲领，三民主义被公认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政纲，因此一党独裁的根据已不复存在。

在上述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各抗日党派提出了要求实施宪政的七项共同提案。关于其详细内容，因篇幅有限，故作省略。孔庚、陈绍禹提案以外的五项是由中青、国社、第三党和救国会派等第三势力方面的参政员提出的^⑥。汇总提出后，与国民党方面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虽然未获通过，但从中可以看出各党派如何认真地期望民主化。

总之，着重点是下述四点，即尽早停止国民党一党独裁和实施宪政；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权利；不分党派使用人才，使其参加抗日救国事业；改革战时的行政机构等。然而，这些能否原原本本地实行，那是另外的问题。因为国民党方面的障碍和怠工已在预料之中。

2. 国民党的对策与新四军事件

不管怎样，国民参政会主席蒋介石已答应将参政员的上述决

议“提交政府，并以诚意实行之”^⑳。

于是，国民党便在表面上大肆宣传实施宪政，并指定29名宪政促进会委员，着手准备工作，又以实施地方自治的名义，于同年9月19日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接着又公布了“县参议会组织暂行条令”“乡镇组织暂行条令”等一系列法令，同时开始训练自治人员^㉑。

根据“纲要”，自1940年3月开始，按年度计划在16省实施新县制，但山西、察哈尔两省及边远的新疆除外。

这是针对中共和第三势力各党派的民主化要求而采取的对策，是以确保地方基础为目的提出来的，因此制定了种种限制条款，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例如，规定当选保长的资格是：①自治训练合格者；②一般考试合格者；③担任委任职务以上的职务者；④师范学校、初中以上的毕业生；⑤在地方公共事业中有特殊贡献者；⑥以前的公职人员或曾在文化教育机关工作过的人^㉒。

由于这种限制，选举出来的民意机关的代表和地方公职人员的素质，无论怎么看，都与以前的封建色彩浓厚的乡绅、地主及其出身者无区别。

而且作为民意机关，县设有参议会，乡镇公所设有乡镇民代表会，保办公所设有保民大会。规定得很明确，一般民众可以行使直接选举权的，仅限于选举最基层的保民大会的代表。此外，采取由选出的代表相互选举的办法，依次决定上级机关的代表。乡镇长和保长也由这些代表选举产生，与一般群众无关。如果是那样，这种新县制度的意义，不外乎是县对乡镇，乡镇对保的上情下达，是一种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执行机构。看得出这与孙文心目中的“地方自治”有着本质的不同，孙文所说的地方自治，对选民和被选举的人无任何限制，人民不仅可以直接选举地方行政机关职员、议员和代表，而且还有罢免权。没有“信奉三民主

义，拥护国民政府，绝对服从最高统帅（蒋介石）”^④等誓约的限制。

按照上述办法选举并任命的新县长，1941年在四川省的135个县中有121个县；在湖南省的75个县中有28个县^④。广西、湖北、陕西、甘肃等省也照此执行了，其首要任务就是以乡绅势力为中心，再次确立保甲制，在征兵、征工、征运上，有组织地并强制性地动员农民。在决定田赋移交中央和征实之后，新县长便兼任田赋管理处长，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统治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甚至波及到内地农村的最基层。

总而言之，既然当时的国民党执政者企图加强一党独裁和中央集权，当然就根本没有推进民主化和实施宪政等想法了，这是非常清楚的。

这从国民党方面对第三势力各党派和中共的合法化要求和实施宪政要求所进行的许多反驳和攻击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范予遂在《宪政统治及抗战》中主张，“在战争的重要阶段要求民主主义，不合时宜，”“实施宪政可以在抗战胜利之后。”^⑤ 茹春浦在《论宪政与自治及宪政促进会》一文中说，“战时无民主主义，”“不容许各党派批评政府，”“应无条件地信赖政府并为之服务。”^⑥ 特别是刘炳黎在《三民主义与革命》和《革命战争与民主》两篇论文中，态度傲慢，观点荒谬。他说，“在革命战争中，权力的集中与独裁是有效的，民主主义的要求是错误的。”“国民党是由全民族中优秀的有觉悟的分子组成的民族政党，代表着全民族的利益。”^⑦因而，“民国不需要国民党以外的其他党存在。”^⑧ 在分发给全体党员的《对共产党问题之研究与吾人应取之方针》（1940年3月）这本小册子中，断然否认共产党的合法存在。

这代表着国民党内部的一般空气，但是，可以推测出独裁者蒋介石的真心。关于这一点，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介绍的

蒋介石的发言可以作为参考。

“现在好多人都主张民主，实际上是个很大的错误。现在主张民主的，全是共产党。共产党要求民主，是企图用民主打击我们。如果发展真正的民主，我们就无法建国了。”^④

蒋介石的真心，不要说对中共，就是对民众的觉悟和民主主义的高涨也是极度恐惧的。

1940年末，日德意三国结成同盟，国际形势反而朝着有利于国民政府的方向发展；在国内，又进行了内地的经济开发，党的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这时〈国民政府〉便突然改变前言，无限期地拖延实施宪政，开始公开攻击中共和第三势力。

对中共的攻击，已表现在湖南的平江事件、河南的确山事件、河北张荫梧军攻击八路军、山东秦启荣军袭击游击队等无数的不祥事件中。其主要原因，按照八路军副司令彭德怀的讲法，是由于执行了《异党活动限制办法》^⑤。1941年1月发生的新四军事件，也是其必然的结果。

之所以这样说，这是因为国民党中央在此次事件之前的苏北事件发生时，曾发出了以大军包围攻击中共，“于本年（1940年）末之前，歼灭其江苏北部部队”的密令^⑥。如果联系起来考虑，不难看出，这完全是精心策划的^⑦。

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七人，为了表示对新四军事件的严重抗议，拒绝出席不久召开的二届一次参政会，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惩办事件负责人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并再次要求废止一党独裁，实行三民主义，组织各党派联合委员会等^⑧。于是，国共对立进一步激化。

与此相关联，国民党已向各省地方党部及公安局等发出指示，严禁那些要求民主化的和对自党不利的宣传小册子、图书及杂志等的出版与发行。其所受之害，与其说主要是中共，莫如说是无防备的第三势力方面的书店及出版物更为严重。

例如，邹韬奋经营的生活书店，最先遭到查封。生活书店在全国14个省及西安、天水、吉安、成都、桂林、昆明等地有55家分店和支店，出版8种杂志，1000类单行本。如将大众读物和抗日宣传小册子包括在内，实际发行量在500万部以上^{⑤1}。其出版物的影响之大，就连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也作为一个问题加以研究。右翼反动派认为它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这是事实^{⑤2}。彻底查封它，是预定的行动。

另外，衡阳的《开明日报》、香港的《国家社会报》、《星岛日报》等等，也以宣传了某种主义，混入了异党分子为由遭到镇压^{⑤3}。国民党辩解说，“现阶段，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无中立的余地，不能承认所谓的民众立场等。你们文化人只要不加入国民党，就如同代替共产党工作一样。”^{⑤4}真是岂有此理。据邹韬奋讲，生活书店曾几次被强行与国民党直接经营的正中书店合并。他由于拒绝合并^{⑤5}，感到处境危险，便逃往香港了。

无数的无名的中小学教员、青年和学生牺牲了，不知有多少人在“赤化”和“异党分子”的借口下流了血^{⑤6}。

四、第三势力的集结与变迁

1. 民主政团同盟的结成

由于国共对立的激化而引起的对民族统一战线崩毁的担心以及对民主势力的法西斯镇压，使得国民党以外的各党派有亡国的危机感，因为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应该在国内出现一个和平团结和民主自由的局面。

为了应付这种危机，各党派的代表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职业教育派的黄炎培，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勱等，在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的斡旋下，经过多次协商，成立了对于国共来说具有第三者性格的政治同盟^{⑤7}。据其机关报《光明报》报道，各党派改变了以前那种只与政府协商的态度，除了协

商之外 还需要与政府抗争。于是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民主政团同盟^⑧。

统一建国同志会，是以梁漱溟等为中心，为促进宪政运动和调整各党派间的协作关系，于1939年11月组织的协议体。在同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决定于翌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为了适应这种情况，谋求协商善后方策，结成了该组织^⑨。

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当政者，无意认真实施宪政。不仅如此，还以新四军事件为契机，转为反共反民主。其象征性的现象，是将视为同情中共的第三党和救国会派的参政员从抗战期间唯一的小民意机关和国民参政会中开除，反把无人不晓、声名狼藉的反共产主义者张国焘和胡秋原选上了，又在新增加的参政会的议席上补充了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出身者，结果加深了反共和反人民的色彩，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性质也起了很大变化^⑩。

加之政府重新改革了抗战财政，又以确保军粮和限制粮食投机为名，将田赋移交中央，并征收实物。这意味着由于新县长的任命，中央政府可直接与各县联系，实现各省的政治及财政中央集权化。同时导致了与地方势力的尖锐的利害冲突和对农民的进一步掠夺。

于是，引起了地方政府，地主商人和一般农民的极大愤懑。

可以说，1941年10月由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民主政团同盟，反映了对国民政府的欺骗和非民主姿态的抗议以及国共两党间的摩擦^⑪或中央与地方的对立矛盾等种种紧迫的国内形势。

参加同盟的政团有中青、国社、第三党、救国会派、职教派、乡村派等，个人加入同盟的有张澜、张一尘、柳亚子等。组织形式采取委员制，但开始，中国青年党的影响力较强。据说，对个人加入同盟的审查工作很慎重^⑫。因此，可以说采取的是关门主义作法。

活动的重点地区是香港、成都、北京、昆明等地。其十大纲领的要点如下：

①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和主权完整，反对中途妥协。

②实践民主主义，停止一党独裁。在实施宪政以前，设置由各党派组成的国事协议机关。

③促使国民党拿出诚意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④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反对一切非法的特别措施。

⑤A、严禁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和文化机关内推行党务。

B、政府机关均应实行任人为贤的原则，严禁一党占有和利用政权吸收党员。

C、不准利用国家收入或地方政府的收入筹措党费。

⑥A、肃清各种行政上妨碍生产的措施，以求解决民众困难，改善民众生活。

B、健全监察机关，纠正各种行政上的弊端^⑧。

以上，显然是对国民党独裁的批判。

纲领中规定的内容，都是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并继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是，国民党不是无视它、就是怠工，不予实行。这对于第三势力来说，是一个有直接关系的严重问题。例如，国民党背叛孙文的遗嘱，继续实行训政，将党权置于国权之上，把全国各地所有的政府机关据为私有。用国费充当党费，而且随意挪用，形成特权阶级^⑨。政府机关故意区别对待异党分子，甚至在大学、中小学校和文化机关建立党组织，监视镇压一般人。宪兵和特务机关把许多爱国分子和批评政府的民主青年投入监狱，实行恐怖手段，甚至不用武力即可致人于死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⑩。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张不是中共的，而是包括国家主义政

党和国社党在内的民主政团联盟的一致控告。显然，蒋介石派和国民党右派以外的人们，都是法西斯暴力和腐败堕落的牺牲品，无例外地反对和谴责蒋介石的独裁。

2. 改组为民主同盟及其背景

后来，民主政团同盟渐渐地增加了盟员，扩大了影响，提高了作为第三势力中枢的地位。由于1942年救国会派的沈钧儒、张申府、史良、邓初民等加入同盟，增设了支部，不用说国内，也引起了东南亚华侨和海外的注意。

昆明是民主同盟的重要基地。由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搬迁到那里，加上当地的云南大学师生，真是热气腾腾。当时，昆明是滇缅、滇越通道的关口，移居的人口自然很多。军队又驻扎在那里，尤其又是美国空军的根据地，所以建设了许多武器弹药工厂和日用百货工厂等。到1943年末，工厂数已达50家^⑧。

然而，由于日军的进攻，两条通道被封锁，物资的流入激减，物价必然地上涨。如以1937年度当作100，则1943年的上涨率为381，1944年的上涨率为1093，1945年实际上涨到4110^⑨。

不用说一般民众，就是从北方流浪过来的联大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生活也非常凄惨^⑩。他们对没有采取任何救济措施的中央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很多人倾向民主同盟和中共，日益走向革命^⑪。

云南省主席龙云是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反中央的人物。据说他同情大学里的穷困状态，每月给学生补助粮食，并为学生建造宿舍等，对他们加以保护^⑫。

他所管辖的地域，气氛确实自由，民主。这也反映了围绕田赋移交中央和征收谷物的实物、粮食库券制度或在国营事业扩大及对物资的统一管理这些财政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地方势力与中央的利害冲突。

1941年6月16日，昆明《国民日报》社论作了如下论述，

“各省地租由中央接收，这在中国财政上是破天荒的革命，需要慎重处理。中国历来以农为主，各地方的主要财源均为地租，将地租交给中央，就等于交出了地方行政的经费命脉……”^①。

据说，田赋大致占各省财政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既然中央政府没有采取特别确实的补偿措施，对于地方省政府来说，这便成了大问题。

因此，理所当然地出现了拖延上缴和反抗现象，蒋介石对各省政府下达的严令，证实了这一点^②。

但是，田赋的实物征收，根据国民党八中全会和同年6月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的决定，将正税和附加税一包在内，改变了从前的现金缴纳制度，一元钱可交纳稻谷（带皮）2市斗^③。又设立粮食库券，从地方的地主和农民那里强制收购收获的一至二成，又规定其七成以库券形式支付，三成以现金形式支付^④。在恶性的通货膨胀状况下，起到了暂时防止通货膨胀和统管粮食的作用，这确实是增加政府收益的绝好对策。

按照这种办法，预计在1941年度征收实物3000万石，购买粮食库券3000万石，合计6000万石。票面额约相当于40亿元。

如稻谷2市斗为1元的话，那么1石大米则为10元，由于当时四川的米价1石已超过200元，因此地主与农民不得不支付20倍以上的税。特别是田赋的征实和粮食库券的征借，绝对不允许减免。

从而，地主如有分配额的话，便寻找各种借口转嫁给佃农。据桂林《大公报》报道，地主、富农与中农贫农几乎按同样的比率负担，这是不公平的。在一些地区，地主已将地租提高到原来的三至六倍，特别是在四川省，甚至提高到十倍。不适应这种做法的佃农被撵走了，又雇用新佃农，这种“退佃加租”的风气开始横行起来^⑤。

据说，县和乡以及地方基层的粮食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又随意解释法令，不断出现过秤时的作弊现象^⑳。

农民难以忍受这种生活。据说1943年上半年，在云南、广东、福建等华南各省，发生了10起因饥饿引起的农民暴动^㉑，成都各报连日来传出，即使在重庆政府所在地的四川，也有很多农民成了匪贼，从而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㉒。

所以，这种做法不能充分地征收所得税和遗产税，特别是战时盈利税。另一方面，又被批判成是将负担转嫁给农民的苛税。特别是拥有专利权的国营官僚买办资本，操纵着一百几十家贸易公司，控制着大后方的商品，使得中小企业和农民及手工业者成了牺牲品。尽管如此，还听任其获取额外利益，因此问题更加严重^㉓。

经济学家马寅初，攻击了战时盈利的贪官污吏，主张制定临时财产税^㉔，因而被解除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职务。他批判的对象正是蒋家族的孔祥熙、宋子文、陈光甫等人^㉕。

地方实力派也反对政府和官僚资本的控制和掠夺，他们在反蒋反中央的活动中是善意的。特别是四川、云南和广西，是政府实现中央集权化的直接目标，所以遭到的打击也大，二者之间的矛盾很尖锐。

张澜参加民盟也不例外，他是从反对四川的政治和经济中央集权化，主张“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这种地方的利害出发的^㉖。因而，对与张澜相呼应的地方人民的民盟给予的支持既广泛又积极。其影响波及哥老会和地方军队，成都、重庆、南充等各城市均成立了支部组织^㉗，日渐兴旺。

云南的民盟支部也是在地方与中央、民主与独裁的矛盾中发展起来的。据说干部罗隆基、潘光旦和潘大逵等人被招聘为省政府的顾问，对地方民众的影响很大^㉘。

于是，随着对国民政府不满的高涨和地方与中央间矛盾的加

剧，以政团加入为原则，不便以个人资格加入同盟的民主政团同盟的做法，已不适应在野人们的要求，显然也与扩大党的势力不相称。李公朴、闻一多和曾昭伦等人提出取消“政团”二字的修改章程的提案，正是出于这种理由。1944年10月的重庆大会批准了这一提案，于是名称便改成“民主同盟”。

李、闻等人的设想是试图发展成一个不受参加民盟的政团主观上的意图所左右的独立政党^⑧。

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点如下：

①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

②迅速筹备实施宪政，立即召集全国宪法会议，制颁宪法。

③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废除特务及劳动营等类组织。

④财政绝对公开；国家之预算、决算，须交民意机关审核通过。

⑤立即停止党化教育^⑨。

张澜（无党无派）被选为主席，曾琦、李璜、左舜生（以上为中青）、张君勱、罗隆基（国社党）、章伯钧（第三党）、沈钧儒、张申府（救国会）、黄炎培（职教派）、周鲸文（东北救亡协会）等13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如上所述，加入民盟的各政团，十分广泛，其政纲和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也是五花八门的。如，中国青年党，其政纲规定“基于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取全民革命的手段。对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的独立与自由；对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国家”^⑩。它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主义政党，否定阶级斗争，本来就是反共集团。国家社会党（战后与民主宪政党合并，改称为民主社会党）主张培养“绝对的爱国主义和渐进的社会主义”，据说在政治上采取英美式的自由民主主义，在经济上采取苏联式的计划

经济，但提倡社会主义的国家民族化，否定阶级观念^⑧，反苏、反共的色彩也很浓厚^⑨。

而第三党则将中国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农工革命，以孙文的科学的三民主义为基调，不反对马列主义，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达到社会主义是其最终目标^⑩。救国会派，同样也重视民族、民主、民生的新三民主义，企图以人民的联合战线，对抗法西斯主义。

因而，在集结这些政团和党派而建立的民主同盟的纲领和主张中，互相矛盾和对立的因素不少。当然，由于不得不采取折衷意见，因此难免一般化和抽象化。在这种意义上讲，不能说它是一个具有严格政纲的郑重的政党。

那么，他们一致结成同盟的背景是什么呢？各党派共同的目的，是反对一党独裁，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化与平等，实施宪政。另一个重要之点是，为了应付国民党的反动攻势和反共高潮，于1939年11月，1941年10月，1944年10月，三次集结、改组和加强，其目的在于对付国共内战和分裂的危机。实际上，对防止民族统一战线崩溃于未然，做出了贡献。

它们在这一阶段，一般具有更为民主的、民族的和爱国的性质。所以，国民党方面责难民盟的干部，说他们大多数人是一些封建官僚、不得势的军人政客和游手好闲的文化人，是政治上的投机集团，是一群梦想升官发财之徒^⑪。显然，这是中伤，未必合适。

确实，工人农民大众参加的很少，党员和盟员也不多。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等，其中可能也混进了不纯分子。但是，这与当时已特权化、腐败堕落的国民党干部和官僚相比较，算不了什么问题。民众在对政府不信任和对国共对立深感不安的时期，可以说对作为批判者和调停者的第三势力的期待是很大的。

民盟的主张，在政团同盟时代，比起一党独裁的国民党，更接近在野党中共的现实路线，他们有着共同的苦恼。因而，国民党从一开始就对民盟感到不舒服，存有戒心。

做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共最为重视的战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贯彻始终。驻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和王若飞等，深知中青和国社系盟员反共，但仍采取比较灵活的姿态，自由地与他们来往。特别是在国共矛盾加剧之后，中共为了对抗国民党，自然加强了与民盟的合作工作。这是因为（中共）认为通过与其背后的无数中间派的民主联合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的阶段^⑧。

特别是中共在解放区试行了各种民主政策，这些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几次反复主张的那样，是基于孙文的新三民主义、孙的遗嘱和中共中央规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实施的。周恩来1944年3月13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中讲道，按照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可以定义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彻底抗战是实行民族主义；依靠民众建设边区，实行三三制是民权主义；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生产节约、爱护人民等，更无一不合乎民生主义的原则。主张继承和发展孙文主义^⑨。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企图将这些实情公开发表和对外宣传。碰巧，同年5月，中外的新闻记者访问了西北，并在延安呆了4、5个月，他们将中共式的民主主义的实质逐一作了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⑩。

《华盛顿明星报》等美国的报刊杂志，赞赏解放区的政治形态，强烈谴责蒋介石政权的利己主义^⑪。

可以说中共根据这些实绩，积极地对1944年10月改组后的民盟做了工作。就是说，通过与在思想上最接近中共的救国会的沈

钧儒和张申府，第三党的章伯钧等人的接触，并同意以个人身份大量地加入同盟，来谋求改善民主同盟的素质^⑧。

“据统计，在民主同盟的盟员中，无党无派人士已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同盟主席仍由无党无派人物（张澜）担任。（以前的）狭隘的党派性，在同盟内已不起很大作用，同盟已真正地成为无党派差别、无阶级差别、无男女差别，集结所有的民主主义者的总部”^⑨，据说无党无派的郭沫若和胡风等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同盟的^⑩。

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反映，在这前后，民盟的邓初民与王若飞、徐冰举行了会谈。据说后来在中共方面与章伯钧、张申府的交涉中，已达成协议，约定双方相互交换情报和资料；不单独与国民党妥协；对于中共的主张，如不违反民盟的原则，民盟将极力支持。据说中共方面暗地里给经费不足的民盟提供了百余万元的巨额资金援助，不知是真是假^⑪。

民主同盟于1945年10月在重庆上清寺的特园，召集全国各地的47名代表，召开了临时大会，决定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纲领^⑫。这次大会，首先就抗战胜利后的时局问题，阐述了以下三点主张：

第一，尽早召集由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政治会议，永久地停止内战；第二，组织联合政府，完成中国的和平、团结和统一；第三，尽早召开国民大会，停止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使其成为制定宪法的机关^⑬。

同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一文，主张成立由各党派组成的临时民主联合政府来处理基本问题，所以这三点主张有与此呼应的意思。实际上客观地看，只有这种办法可以圆满地解决军队的国家化问题，这是阻止内战之路。

这次大会，在与中共的关系上也有重要意义，而且大会又不顾中国青年党的反对，改革了机构，将从前兼任首席代理的秘书。

长职务限定为处理一般事务，缩小了权限。其目的在于严格限制在思想上势不两立的中青代表左舜生（秘书长）的领导权。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在已经革新到这种程度，即“在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中，救国会系的会员占其主要部分。因而，民主同盟主张的政治纲领，与过去救国会的主张没有不一致之处”^⑧。

于是，民盟被看作是全救联的发展形态，其主义和主张是孙文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继续。也可以说，与中共和工农大众合作是其基本方针。

在由政团同盟转变成民主同盟的过程中，对此消极的中国青年党员，陆续脱离了同盟。作为国家主义政党的中青，反共反苏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原来就反对孙文的新三民主义^⑨，在经济政策上，也不赞成“耕者有其田”和二五减租^⑩。所以，与已转变的民主同盟始终未能一致。

异己分子脱离后的民盟的理论与行动，更加明朗，对国共两党的姿态，是把判断是非曲直的基准定在民主与反民主上，变成了一个积极中立的独立政团。

3. 政治协商会议与民盟

根据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会谈（1945年10月11日《会谈纪要》），在国民党停止训政，实施宪政前的暂定期间，为了召集各党派、无党派的代表解决党争，商讨国家大计，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这也反映了全国人民和第三势力各党派长期的强烈要求。所以，政协会议，与其说是国共两党讨论之地，实际上不如说是民主联合战线与反民主阵营的理论斗争的场所更为妥当。

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共38人出席了会议，有国民党的孙科、陈立夫、张群等8名；共产党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7名；中青的曾琦、陈启天等5名；无党无派的郭沫若、王云五等9名；民主同盟的张澜、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张东荪等9名。

民主同盟在会议之前，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公开信《征求民意——对政协会议的提案》^⑤。

信中就立即全面停止内战，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削减和复员军队及其国有化和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提出了用何种方法，按照何种内容及顺序予以处理的质问。同时指出，八年的浴血抗战，取得了胜利，但最大的牺牲者和功臣是人民大众。因而，不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得不到其支持的任何计划都是毫无意义的。各党派的代表，自然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发言和行动^⑥。

在政协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建国纲领、政府的改组、军队的整编、国民大会的召开和宪法草案的协商即所谓的五大议案。会议决定设立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特别是关于政府的改组和军队国有化问题，由于国共两党及各党派之间的直接利害关系互相纠缠，所以不容易解决。

民盟的主张，包括解开难题的办法，基本上如下所述。首先，根据孙文召开国民会议的要领，召集由各党派、工农、商、产业界等推荐出来的德高望重的人物，组成民主联合政府。由这个中立的临时政府公平地统一解决和平建国纲领等上述的各种议案^⑦。可以说，作为第三者，从不偏不倚的立场出发，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以调整国共两党间的矛盾，促使二者宽容与谦让。

这样，政治协商会议再度延长会期，1月31日，根据和平合作原则，确定了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这一基本方针，而且暂时达成了协议。这是民主派中间路线煞费苦心的胜利。《华盛顿邮报》和《纽约先驱报》等报纸认为，孙文的遗愿终于得到了实现，只要尊重政协决议，中国将成为亚洲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强大的指导国家^⑧。《朝日新闻》也指出，这将给中国的未来带来伟大的光明。对于和平的胜利，我们日本人也由衷祝福^⑨，给予了无条件的赞赏。但是，上述的五大议案，显然是妥协的产物，是在野的

中共和民主派再三再四让步的结果。尽管如此，除了和平建国纲领之外，追究起来未审议完的问题依然堆积如山。

政协会议的最大难关，是国共两党生死攸关的军事问题。正如其名称《军队的整编及中共部队合并到国军的方案》所表明的那样，这包括有中共削减军队，将来归还国家的内容。而且现在提出的国共两党军队的比率是五比一，显然，中共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让步。以前，为了促进妥协，民盟起了很大作用。事实上，中共暂时在一定条件下遵守了政协决议，决心放弃“以武力对抗武力”的革命路线。特别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在政治上放弃苏维埃制度，承认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在经济上保护私有财产制，发展资本主义，采用劳资合作，停止没收土地等^⑩。

民盟为了消除中共的不安，提出了手续上的重要提案。即，民盟与中共联合，在国府委员会的定员中占三分之一，在国民大会的席位中有四分之一的否决权^⑪。因为中共担心没有这种保障，会陷入无防备状态，最后不得不向国民政府全面投降，所以未能同意上述提案。而歪曲民盟真意的国民党却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结果提案被忽视了。

总之，第三势力有关各党派，期望各党派共同参加政府，共同负责，也许可以解决五大议案，因此高度评价《政协决议案》^⑫。

另一方面，中国的民众，由于长期受蒋介石政府的欺骗，因此很难相信政府。特别是又有下面的传说，更是理所当然的了，即，政府在政协会议前，决定对于诸议案中与国民党独裁有重大关系的“军事权”“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国民大会的原代表”“党治的法统”“地方政权”等问题，绝对不让步^⑬，而且加强对峙姿态。这样就等于不解决任何问题。

4. 国民政府的反动化与中青、民社的脱离

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民主党派和各界人民在成都、昆

明、上海、北平或解放区等地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会，并举行了庆祝游行。由此可以看出民众对和平与民主的愿望是何等的强烈。的确，政协会议在形式上具有调整党派间矛盾的性质，但协议的各项却明显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主张和要求^⑩。

然而，此期间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开始了撕毁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1946年1月20日，重庆各界政协会议协进会举办的国内和平大会在沧白堂纪念馆召开，许多特务分子、暴力团闯入会场，向听众投石块，破坏桌椅等，干尽了坏事^⑪。接着，2月10日，重庆各界23个团体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的大会，同样遭到数百名武装暴徒的突然袭击，造成了60余人受伤的惨案^⑫。暴徒的首领，是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委员兼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和被雇用的暴力团头子刘野樵。民盟干部李公朴、郭沫若、沈钧儒和“民建”的施复亮等也遭殴打负伤^⑬。随后在11日，混入学生游行队伍中的特务分子又捣毁了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社^⑭。

这一系列的暴行、威胁和令人厌恶的行为，无疑意味着反对和破坏政协决议的贯彻执行。这显然是对和平、团结与民主的挑战。

各界委员会，以主办者23个团体的名义，将这一实情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控告。民盟主席张澜也为遭到迫害的同志和《民主报》社被破坏一事，给蒋介石写了抗议信，同时要求对主谋和罪犯严加惩处。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⑮。据冯玉祥讲，暴力行为是“蒋介石自己害怕民众理解政协的意义，雇用了特务，指使他们捣乱的”^⑯。这真是难以想象，但却是事实。

鉴于上述情况，可以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从一开始就无真心实行政协决议。蒋介石于1946年4月1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讲道：

“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

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够代替约法。结束训政的步骤，只有召集国民大会。……再三宣示此次扩充政府的组织，是在国民政府现有的基础上，要求各党派人士及社会贤达共同参加，来扩大政府的范围，而决不是推翻现在国民政府的基础，另外来组织一个政府”^④。

蒋介石于1945年3月和12月在重庆和北平发表过同样内容的演讲^⑤。可以说没有加以掩饰。其态度自始至终抓住以形式为后盾的训政时代的老约法，将政权据为私物，并以国民党为主，各党派为从。这样，对等的民主联合政府是不可能有的。

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也是同样。政府原封不动地承认了10年前由于一党独裁，在极不民主的情况下选出的原代表，这种选举法，是犯了一个极大的时代错误。另外，按其组织法，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原封不动地具有代表资格（第三条第一项），同时再加上国民政府指定的240名代表（第二条第四项），于是超过了国民大会代表的半数。这样的大会，能真正反映民意吗^⑥？这里丝毫不考虑15年战争中全民性的牺牲和历史的进步与变革，与民盟和中共的认识根本不同。

国民党的这种独裁和利己主义，与过去对庞大军事力量的相信相结合，围绕东北的军事问题，与中共发生对立，以至重新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此期间，民主同盟总部从重庆迁到南京，并一贯地为“反对内战”“政治的民主化和军队的国家化”等政协决议的实现而奋斗。但是国民党的回答是封锁北平、上海、广州、西安、重庆等地的195家民主言论机关；昆明的特务分子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以及发生枪杀西安的杜斌丞等一系列法西斯行为。因而，民盟认为国民党单方面决定召开的国民大会，是玩弄政治阴谋，于是抵制出席^⑦。其主张在“民主同盟二中全会宣言”中有详细表述。

然而，支持国民党，主张强行召开无中共和民盟两大政党参加的国民大会，最后走向反动并全面助长内战的，是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的张君劢一派。主观上似在牵制和抵销国民党，但事与愿违。中青和民社两党决定参加国民大会是在1946年11月15日前后^⑤。

不过，中青和民社中央，自该年夏季以来就与国民政府交涉。据说分配给中青4名国民政府委员，1名行政院阁僚（部长），1名政务委员^⑥。因为民社要求各给2名国府委员和政务委员^⑦，所以一开始便接受了政府的利诱和收买，不得不考虑出席会议。实际上，负责交涉的左舜生就任了政府的农林部长，陈启天就任臭名昭著的中国纺织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是垄断资本背叛民族资本而设立的^⑧。他们之间在权力、名誉和地位以及职务上进行了明争暗斗。中青的周济道等人的分裂闹剧及民社的汤芑铭、孙宝刚等人的猎取官职活动就是如此，这与两党的素质也不是没有关系^⑨。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遭到了张东荪、梁秋水和伍宪子等许多有影响干部的反对，从而引起了分裂。迎合权力被认为是张君劢等人的独断专行^⑩。

左舜生绝望地说，（一）国共妥协无望；（二）从本质上看，不能认为中共是民主主义政党；（三）硬要中共参加国民大会和政府，结果，与国民党的武力冲突未能避免。但是，作为次善之策，决心参加国大和政府^⑪。实际上，这显然是在狡辩。

把当时的国民党解释成是民主的，中共是不民主的，这是片面的，在客观上是不能成立的。最重要的是人民不在场的情况下的秘密交易，是不民主的，是有问题的。所以这只能暴露国家主义青年党本来的右翼反共主义。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素质上，都接近国民党右派，他们的结合是必然的。

当时的反共势力，似乎把中国分裂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中共的存在。这也是慢性内战的心理上的背景。但是，从客观形势分

析，破坏统一、拖延内战并使其扩大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中共的存在，不如说是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这是由于针对国民党当权派凌驾于不民主的政权之上，通过武力和法西斯手段，强行统一全国而引起的反抗造成的。与地方军阀之间相继发生的内战，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蒋介石于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强化权力、确立独裁制的惯用伎俩，是武力镇压、分裂、利诱和同化容让等四种方法。而且，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办法，有时是镇压、暗杀或者利诱，有时是几种方法同时并用^⑥。在其背后的特务机关的暗中活动是众所周知的。

政协会议之后，国民党的政府改组和维持政权的手段，依然是这类方法的沿袭。(一)孤立主要敌人中共，以武力歼灭之；(二)分裂被视为中共同情者的民主同盟，消灭第三势力；(三)收买、容让和同化中青和民社；(四)利用美苏对立，谋求挽回自身衰亡。

收买中青和民社的另一个企图，明显地是作为取得美国的军事物资和财政援助的一种手段。美国厌恶蒋政权的一党独裁，中断了援助。对此，有必要想方设法表示民主联合的姿态。

不过，《纽约时报》明确地批判说，无中共和民盟两大政党参加的政府改组，是违反政协决议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立法院院长孙科甚至将此称作“多党训政”^⑦，公开暴露了其维持独裁的企图。

由于民盟采取了开除脱离者的办法纯洁了民主力量，并加强了与民众团结的方针，引起了普遍共鸣，提高了威信。这样一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企图唆使中青和民社脱离第三势力，抽出民主同盟中的骨干，并使中共造成孤立的阴谋失败了^⑧。

不仅如此，施复亮（存统）、黄炎培、章乃器等还集结了民族资本家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了“民主建国会”（1945年12

月)。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也反对蒋介石一派独裁、腐败堕落和内战政策，谭平山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10月)，马叙伦、李济深等人组织了“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6年)，重新加入第三势力，所以，第三势力在日益扩大，特别是在国民党民主派中，虽然当时还在隐名瞒姓，但已有200多名有影响的赞同者。国民政府孕育着内部崩溃的危险。

五、民盟的革命化及其经济背景 ——中间路线的崩溃

民主同盟于1946年12月至翌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二中全会，发表了政治报告。表示反对单方面的政府改组，主张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政协决议，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同时，民盟确定了扩大组织的方针。以前采取的是个人和团体均可以参加的二元方式，由于接受了中青和民社集体退盟的教训，改为个人单独加入同盟。同时反省了以前对中下阶层工作的不足之处，改组成可以大量地吸收民众的单一的独立政团^⑤。不言而喻，这是企图适应紧迫的事态，把民盟作为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政治势力予以强化，使其发展成为广泛的以民众为主体的进步的战斗集团。

机关报《光明报》报道，“民盟的阶级本质，经过激烈的理论斗争，决定吸收各阶级的民主分子为盟员。从而，不限于工商业界的民族资本家。”^⑥

但是，二中全会之后，民主同盟的主张突然强硬起来，这是由于国民政府破坏政协决议，不断发生凌辱、殴打、暗杀民盟成员等暴力行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大失败。

战后，国民党地区的经济，因束手无策，农村荒废、工商业衰退、财政金融紧迫，已陷入无计可施的混乱状态。

特别是作为财政经济基础的农村，由于八年的抗战已处于毁

灭状态，又加上政府因推行内战而采取的征实、征借和征兵的三征政策，更加贫困不堪。

1946年度征实和征借的预算为8800万担（2200万吨），但是已拿不出东西，在底层挣扎的农民无力应付，到同年11月为止的征购额，在浙江省、甘肃省和宁夏省只占分配额的百分之十，在遭受水灾的广东等地比这还少，只占百分之八^⑭。

但是，以河南为例，据说以征购、公粮代购、暂借、筹购、捻购等繁多的名义强行筹措米谷^⑮，所以在年度内，从农民那里掠夺的粮食数目极大，到底有多少，实在难以估计。

这样，陷入绝境，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在各地起来开展了抢米斗争。

当时报道了几个省的水旱灾情，真是到处充满着饥饿。人民的抢米斗争，席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四川、河北、河南、陕西和绥远等9省的38个大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参加的人数在17万人以上，这些民众为求得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业已深入并有组织地进行着^⑯。

这是民众对推行内战政策和制造饥饿的蒋介石政权极大愤怒的爆发。

另一方面，对于政府滥发法币，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没有止境。1945年9月的纸币发行量为1937年7月的465倍^⑰。

因而，1946年度的年初预算为2兆5000亿元，真可以称作是天文数字。

政府7个月就将预算额用尽了，加上追加支出，实际上达到7兆5000亿元^⑱，是预算额的3倍。当然，这已脱离了常轨。而且支出的大部分，都被用在军费上了。

由于疯狂地推行内战而引起的通货膨胀，造成了物价的飞涨。若以中国经济的中枢上海为例，正如附表1所示。

若以1936年为100，1946年的一般物价上涨率1月份达1914

附表1：上海一般物价的月份指数
(1936年为100)

年 月	指 数
1946年1月	191432
2月	327669
3月	533921
4月	493606
5月	498632
6月	536474
7月	573459
8月	583642
9月	686570
10月	833924

倍；10月份达8339倍。真是高得令人吃惊^④。

因此，不仅是民众，就是中国的工商业也身负濒于死亡的重伤。由于官僚资本操纵市场，紧缩金融、高利息、重税、物价飞涨和各种廉价的美货大量倾销，根底浅的民族企业受到了双重和三重压迫，已处于气息奄奄的状态。这些都是政府和国民党的责任，而不是中共。

民盟机关报对官僚买办资本与美帝国主义联合扼杀民族资本，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和攻击^⑤。指出，为了摆脱危机，必须停止内战，确立全面的和平，成立联合政府。

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期间，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内陆地域，不仅国营工业，就是民营工业也建设很多，而且，这些工业的发展和生产都比较顺利。

据国民党经济部统计处《后方工业概况统计》宣布，大小工厂共计5226家，如将资金总额换算成战前的价格，则为4亿8748万元（参照附表2）。

附表2：1937年至1944年每年建设的工厂数及资金额

年 度	工 厂 数	资 金 额(千元)
1936(以前)	300(概数)	117950
1937	63	22166
1938	209	86583
1939	419	120914
1940	571	59031
1941	866	45718
1942	1138	9896
1943	1049	14486
1944	549	3419
年度不明	102	7317
合 计	5266	487480

1936年以前的西南和西北各省的工厂数为237家，资金为2523万元。因此，工厂数是22.2倍，资金额为19.3倍。特别是在重庆、成都等四川城市，集中了2380多家工厂（参照附表3、4）。

附表3：内地各省工厂分布表（1944年）

省市名	工 厂	资 金 额(千元)	工 人 数 (人)
重庆	1158	153899	90852
四川	864	108671	64773
贵州	210	9361	8232
云南	168	61407	25130
广西	384	39185	19727
湖南	935	33545	57563
其他各省	1180	81412	93386
合 计	5266	487480	359663

附表4：各省民营和国营工厂分布表（1944年）

省市名	民营工厂	资金额（千元）	国营工厂	资金额（千元）
重庆	1461	95368	57	58531
四川	813	88416	51	20252
贵州	183	5621	27	3740
云南	142	20301	26	41106
广西	343	11940	41	27245
湖南	870	22337	65	11208
其他各省	952	54311	235	27102
合计	4764	298297	502	189183

注：附表2、3、4，均据陈真等的《中国近代工业资料》制成。

其中，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和饮食品工业很多。据说，炼钢、发电机、电动机、汽油和酒精的生产量，是战前的几百倍，不是几千倍^④。

国民党管辖地区工业发展的顶点是1942年。据1944年统计的数字，重工业方面的工厂有3195家，轻工业方面的工厂有2070家，大致均衡，已建成独立的工业经济体系^⑤。这也是支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的一个原动力。

但是，战后在四川境内的重庆、梁山、乐山、万县、成都等1200家中小工厂中，濒于破产的占百分之八十。重庆工业协会所属的470家工厂中，百分之六十六处于危险状态，其半数已停产。特别是从沿海转移到四川省的迁川工厂，在390家中，实际上有370家已倒闭^⑥。实在是个悲剧。

它们被迫疏散，克服了原料控制、生产管理和税金掠夺等许多苦难，勉强地走上了发展生产的轨道，并维持着长期抗战能力。可是，马上一转便成为无任何救济办法，甚至落到拍卖和破产的地步。

重庆的三个工业团体，反对政府的控制，强烈恳请向工业通融资金。对此，战时生产局长翁文灏的答复是：“现在，政府无能力，毫无办法，只能听任中小工厂自行停产”^④，态度极其冷淡。

但是，这显然是在欺骗。因为政府与官僚资本作梦都想接收和整顿收复地区的日系资产和大工厂，对民族资本的政策，完全是敷衍了事的。

另外，即使在收复地区上海等地也不例外。由于上述理由，上海于1946年上半年在3419家民营工厂中，已有百分之七十五，即2597家倒闭^⑤。据说，毛织品、针织品、制药和化学工业等的危机相当严重^⑥。特别是11月至12月期间，由于官僚资本垄断市场和因内战而引起的交通限制，增加了原料商品的运输困难等，造成了亏本，于是陷入破产、停业的状态，资金额稍多一点的工厂和商社也包含在内。在纤维方面，有英达染织、中国、泰记、勤益、华安、华丰、美琪、中兴等针织品工厂，还有著名的大纶毛织和新大、源通、惠丰等丝织工厂，阜丰、福新、华丰、裕丰等面粉工厂以及信大造纸、一商制药、中国商轮等，真是不胜枚举^⑦。

某工厂的负责人，由于负债累累，倾家荡产，全家自杀^⑧。在武汉、天津、昆明、桂林、广州、无锡等地也有同样情况。于是，便出现几十万工人失业。

重复地讲，问题就在于蒋介石政权的经济政策。在国内，官僚资本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权，垄断和操纵市场；在国际上，加强对美从属，热中于买卖贸易，推行“民死主义”。即，官僚资本在国营的名义下，不仅垄断了邮政、电信、军事、造币、铁路、航运、矿山等所有公共事业和重工业，而且占有从满洲至上海的广大地域上1000多家日系大工厂，随意盗卖机械、原料和制成品，同时，各种特定人物加快了私有化^⑨。

官僚资本甚至将手伸到了轻工业部门，与民间争利。原来，

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按照“战后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轻工业委托给民间经营。但在抗战结束后，宋子文系的官僚资本立即设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茶叶公司等，并以国营名义，彻底加以垄断^⑧。于是，仅宋子文一个家族就控制了7家银行，12家商业贸易公司，22家大工厂，1个运输公司，共计42个企业^⑨。特别是纺织和生丝、茶叶，历来是中国的三大骨干产业，与民间资本的利害冲突很大。以此为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垄断着全国百分之八十的纺织机械，并随意提高棉纱价格，压迫民营棉织业^⑩。从而，中小民族资本家对政府和官僚资本的谎言和垄断所表示的愤怒和憎恶，是难以想象的强烈。

不仅如此，政府和官僚资本还充当美国资本的买办角色，为其打入中国市场服务。众所周知，1946年5月以来，签订了成都—重庆间及广东—汉口间的铁路借款协定，8月签订了中美航空协定，11月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美方唯命是从，一个接一个地将主权让了出去。

而且，大量进口廉价的美货，沉重地打击了民族产业与工人、农民。全国民众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孔祥熙和宋子文等官僚买办资本，这是理所当然的^⑪。

因此，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言人知识分子和第三势力有关政党，已忍无可忍。

在他们中间，不断地发出这样的谴责：国民政府究竟是谁的代表？如果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就应该实行经济的民主化。只是拥护部分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不能不说是非民主的垄断经济。因此，这不等于政府把“经济内战”强加给全国人民吗？于是，得出结论：没有政治民主，便没有经济民主；只有取得了政治上的民主，民族产业的前途才有希望^⑫。

可以说，这些风潮也反映了第三势力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施复亮大肆宣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资本主义的经济以及通过与

工人和贫农的合作来对抗官僚买办资本和大地主，并主张采取独立的中间的改良主义路线^⑧，就是如此。

这也是1945年12月间，以施复亮为首，胡厥文、黄炎培、盛丕华、李烛尘、章乃器等工业和金融方面的民族资本上层及其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宗旨。详细内容，在其政纲中有明确的阐述^⑨。

但是，施复亮，当时任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自己经营有很大的印刷工厂^⑩。胡厥文，以前创建和经营上海新民机器厂，长城砖瓦厂和浦东电灯厂，战争期间任疏散到四川的“迁川工厂”联合会的理事长^⑪，如前所述，当四川的疏散工厂遭到极大打击时，他作出了与政府针锋相对的姿态。其次，盛丕华，是上元公司的负责人，宁波财阀的有力的领导人^⑫。李烛尘，是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和永利化学工业天津分公司处长^⑬。还有章乃器，原是救国会干部，战争期间脱离救国会，接近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个受过不少批判的人物，但据说他创立了上川实业公司，经营过机械、电机、酒精和农牧业^⑭。

他们在抗战后期之后，抗拒政府由于日趋反动而采取的轻视和压迫民族资本的政策，企图组织一个“不偏右也不袒左的”第三资产阶级政党。

对于“民建”的中间路线，马叙伦等人在1946年11月国民党践踏政协会议决议之后，批判说，“只有民主与反民主两个阵营”，第三条路线灭亡了，号召放弃过去暧昧的中间势力称呼，结成新的民主联合战线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⑮。

民盟也出于同一考虑，集结了主张全国和平与民主的人物和团体，显示出建立新的第三势力的动向^⑯，令人感兴趣的是其背景。

按照民盟中央执委沈志远与千家驹的评论，民盟不仅代表着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利益，而且还代表着中小企业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下述各点：战时，在四川省的中小企业家内部，有罗叔章、徐崇林、田钟璠和李学民等一伙进步的工商业者，组织了中小工厂联合会，在确保原料和贩卖产品问题上，与军需局和棉丝布管理局持续地进行了斗争。据说由于宋子文和翁文灏等政府和官僚资本的压力，解散了组织，但包括本地资本在内有2000余个企业与其同一步调。实际上，其领导人罗叔章是第一药品生产合作社的创业者和经营者，战前是救国会的有影响的干部，战后是民盟上海支部的负责人^⑩。

众所周知，工业合作社在战时对物资的增产和救济许多难民与失业工人方面作出了贡献，作为抗战经济结构的新潮流，引起了世人的注目。本来，将生产者作为社员予以组织是它的原则^⑪，但实质上，似乎小工厂主借款开工的私人企业也不少^⑫。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盟还代表着这些中下层生产者和民族资本家的利益。因而，在第三势力内部明显地存在着民建与民盟，民族资本家上层势力与中下层势力和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系统和两条不同路线。

民建的发起者和赞同者有134人，除黄炎培等部分人外，都对民主同盟不满，可以说这些人不喜欢参加民盟和其他党派^⑬。

但是，当时为什么依然残存着中间的改良主义的幻想呢？这就是下面要谈的问题。民族资本家的上层势力和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希望蒋介石一伙反动政权的继续存在，但又恐惧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势力的发展。所谓六分反蒋，四分反共，就是他们的实情^⑭。这说明他们的反共意识相当根深蒂固。据民盟副秘书长周鲸文讲，张澜和黄炎培等人并没有完全断绝与国民党的来往，仍继续保持着接触^⑮。

他们认为“国民党决不可能灭亡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消灭国民党”。超越国共两党的中间阶级的新势力出现，希望能决定一切^⑯。他们企图通过结成新的资产阶级政党，坐收渔翁之利。

特别是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分裂第三势力和民主同盟的阴谋，问题比较复杂。美国对蒋政权的反动化和腐败感到绝望，计划扶植新势力。他们企图让中间派的知识分子脱离中共，与国民党革新派的张群、吴铁城和孙立人等人联合，培育和利用另一个第三势力^④。当然，在第三势力内部也有不少人希望这样。例如，1947年7月，杜鲁门总统派遣的魏德迈调查团来华时，民盟干部张东荪曾屡次与其接触，一方面说明民盟成立的目的和经过，另一方面要求美国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⑤，而且，正在美国访问的冯玉祥也强烈请求停止对政府的援助，支援中间势力^⑥。

然而，与蒋介石一伙争夺美帝国主义的宠爱，不仅与民主派本来的主义和主张相矛盾，而且很有可能妨碍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所谓的第三条路线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

他们明显地向左转，是在遭受蒋介石的镇压之后。

1947年10月22日，南京政府派出军警包围了民盟总部，27日国民党中央社在全国的报纸上发表了“民盟参加叛乱的真相”，硬把民盟定为非法团体^⑦。

不言而喻，列举的罪状都是国民党一手捏造出来的。

感到有人身危险的沈钧儒、章伯钧和周新民等高级干部，先后逃往香港，不久与住在香港的中央执委周鲸文、邓初民和沈志远等人联合，重新建立了总部。

接着，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民主建国会的章乃器等人也去香港避难。这样，香港便成了第三势力的根据地。特别是民盟与“民促”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二者在活动范围、宣传和防卫上相互援助^⑧。接着，李济深和蔡廷锴等人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于民盟和“民革”的会员相互重叠，所以民主联合战线的结成便是很自然的了。

民盟于1948年1月召开了三中全会，发表了紧急声明，否认南京政府非法解散总部。会议还检查了过去各级的工作，通过了

“宣言”和“政治报告”。

“宣言”的要点如下：

(一) 在目前的情况下，用谈判和合法手段实现中国的民主、和平、独立和统一，已经不可能。首先必须彻底打倒独裁、卖国和反动的国民党集团，才能建立和平与民主的新政权。

(二) 不仅要反对独裁者蒋介石，而且还要反对其社会的经济基础——地主、豪绅、买办及整个封建集团，彻底地实行“耕者有其田”。

(三) 反对美国反动派的对华政策、援蒋政策及直接或间接危害中国主权的一切行动。

(四) 与一切民主党派密切合作，结成牢固的民主统一战线^④。

在“政治报告”中，进一步详细地阐明了民盟的立场、态度、政策和斗争任务，简而言之，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应反省过去一味地开展和平斗争的政策；积极地支援人民的武装革命，与蒋介石政权的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作斗争；第二，放弃中立的第三条路线，与中共密切合作，努力实现人民民主主义；第三，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完成革命任务；第四，拥护中共的土地革命^⑤。

这些作为民主同盟的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其精神，与政协时期或在那以前的统一战线主要是与上层民主派结成的联合战线相反，此次是与革命的人民大众的下层联合，这一点是很鲜明的。于是，尚残存的一些中间路线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不言而喻，中共是举双手欢迎的。1948年3月6日的陕北新华社电，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发言人的如下评论：

民主同盟的宣言和元旦发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言及行动纲领表明，反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集团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民族

统一战线是如何广泛^⑩。

后来，民主同盟发出了为实践三中全会决议，参加基层斗争的指示，各民主党派都潜入中共势力未能渗透的蒋政权管辖地区，这对于将中间阶级占大部分的无党无派大众集中到革命中来影响极大。

当时，蒋政权管辖地区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不仅是农民，而且工人、教员、店员、公职人员和学生等广大的民众均陷入饥饿状态。仅在上海就有30余万贫民，饿死了许多人。在1946年1月至1948年8月仅两年半的时间里，物价上涨67倍，呈现出超通货膨胀的形势。贫民抢米、教师要求改善待遇，工人要求解除冻结工资等斗争相继出现，1947年5月以后，发生了数千名大学生、高中和初中学生激烈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斗争^⑪。政府匆忙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设置特别法庭，禁止罢工、罢教、罢课和请愿游行等一切民众运动，进而以投入监狱和枪杀相威胁，但是“求生斗争”在拚命地爆发性地持续进行着^⑫。

这期间，民盟成员在农村推进农民的反对三征（征实、征借、征兵）运动，特别是通过将其上层领导分子拉入革命阵营内的办法，来妨碍国民政府征用人力和物资。并打入政府军内部，进行离间工作，大力开展投奔人民解放军的秘密工作等^⑬，其功绩不小。在国民政府军崩溃的背后，显然民主派的力量是起了作用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城市部的地下工作。据说，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北平、西安等城市，与民众紧密联系，支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运动，推进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等，尽了最大努力来发展革命^⑭。

同时，值得高度评价的，是对继续进行资金募捐活动的东南亚华侨的组织和启蒙方面的贡献。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缅甸等地的华侨中间，已建立了有活动能力的民盟支部。

在马来经营橡胶园的民族资本家戴子良和战时向重庆电化工厂投资的庄明理以及在新加坡拥有化学椰子油工厂，又在印尼工商业问题的研究上著名的苏门答腊《民报》主编费振东等人，分别是各地民主同盟支部的负责人。原来，他们都是国民党党员，但反对蒋介石一伙的独裁和腐败，虽然蒙受着殖民国家的压迫，但积极地支援祖国人民的革命运动^①。华侨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显然成了民盟强有力的基础。

在这一斗争过程中，许多民盟成员遭逮捕和被监禁，还出现不少像曾伟和杜汉三等献出生命的人们，与民盟有关系的全国报纸和杂志全被查封和破坏。

经过这样激烈的斗争，民主阵营的胜利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毛泽东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不言而喻，第三势力的多数干部，响应了这一号召。他们接连不断地进入解放区，于1949年9月参与规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政府的成立工作。人民政协由各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662名代表组成，民盟本部除有16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之外，有民盟籍的人出席此次会议的超过100人。虽然这是按照以三三制为原则的中共政策办的，但可以说明民盟在这个统一战线革命中所做的贡献得到了赞扬。

注释：

①②③北平市宣慰团：《中国各党派史略与批判》，1947年。

④平心：《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1947年。

⑤中国科学院历研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1958年。

⑥《中国共产党开除谭平山》（《布尔塞维克》第六期，1927年11月28日）

⑦《陈公博先生文集》下册，1929年。

- ⑥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指导委宣传部:《机会主义的第三党》,1928年。
- ⑦⑪蔡和森:《机会主义史》(黎民魂:《谋叛党国的赤色档案》,1928年收集)。
- ⑧蔡和森:《机会主义史》。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1973年。
- 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 ⑩施存统:《目前中国革命问题》,1928年。
- ⑫龙门书店编《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分裂史料》,1968年。
- ⑬邓演达先生殉难十五周年纪念会:《邓演达的道路》,1946年。
- ⑭杨逸棠:《邓演达先生遗著》(1949年)序文。
- ⑮《陈公博先生文集》上卷。
- ⑯《纪念邓演达》(《宋庆龄选集》1967年收集)。
- ⑰许畏之:《从邓演达到闻一多》,1947年。
- ⑱⑲欧阳宗等:《中国内幕》,1941年。
- ⑲《本党概述》(上述的《邓演达的道路》)。
- ⑳木庄比佐子:《福建事变与中国共产党》(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汇报,1971年第15期)。
- ㉑陈绍禹:《新形势与新政策》(《王明选集》第四卷,1974年收集)。
- ㉒几玉谦次:《中国回忆录》,1952年。
- ㉓平野正:《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的历史意义》(《历史学研究》1975年第417期)。
- ㉔《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三一书房,1952年)。
- ㉕波多野乾一:《现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1937年。
- ㉖⑳邹韬奋:《经历》1950年。
- ㉗㉘㉙林天行:《沈钧儒与救国会》(《中国内幕》第一辑,1948年收集)。
- ㉚邹韬奋:《经历》;《息难余生记》1947年。
- ㉛《人民战线的建立与解体》(《中国内幕》1941年)。
- ㉜须田伦:《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近况》(《中国资料月报》1936年)。
- ㉝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1952年。
- ㉞⑳㉟㊱萧聪编《中国民主之路》(中国现代史料丛刊之一),1946年。
- ㊲《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群众周刊》1938年11月6日)。
- ㊳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国父全集》第三集,1957年。
- ㊴㊵㊶㊷㊸邹韬奋:《抗战以来》,1941年。
- ㊹陈绍禹论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九册,解放社,1940年收集)。

- ②③《重庆政权的政情》(东亚研究所资料乙第65号),1943年。
- ④⑤⑥⑦⑧小仓音次郎:《重庆抗战的现阶段与地方政治》,1941年。
- ⑨⑩《中央周刊》第二卷第14期(《围绕宪法问题各派的主张》1940年收集)。
- ⑪同上,第19期。
- ⑫同上,第23至第24期。
- ⑬⑭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1949年。
- ⑮李蒙政:《抗日统一战线的崩溃》,1940年。
- ⑯《今日之摩擦问题》,1940年。
- ⑰⑱邹韬奋:《患难余生记》。
- ⑲⑳世界出版《第二届参政会的花絮》,1941年。
- ㉑㉒上海杂志公司:《参政会与言论自由》,1941年。
- ㉓蔡尚思:《十年来的教育文化统制》(《时与文》第17期,1941年)。
- ㉔民宪出版:《和平民主统一建国之路——中国民主同盟重要文献——》(一),1946年。
- ㉕⑳萨空了:《民盟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光明报》新3号,1946年10月8日)。
- ㉖㉗㉘㉙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1952年。
- ㉚㉛㉜㉝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民主同盟文献》,1946年。
- ㉞㉟陈达:《战时的昆明劳工》(《时与文》第6期,1947年)。
- ㊱勉之:《闻一多》,1949年。
- ㊲吴晗著,小林·佐久间译:《新中国的人物观》,1965年。
- ㊳㊴张文实:《云南内幕》,1949年。
- ㊵《全国财政会议通过田赋改征实物》(《解放日报》1941年)。
- ㊶《民国三十年粮食库券条例》(《通讯》2~23)。
- ㊷《重庆政权的财政金融》(重庆资料之二),1943年。
- ㊸《川省征粮人员舞弊、保甲长违法失职》(《解放日报》1941年)。
- ㊹《关于重庆经济战力的报告》第四编。
- ㊺王少燕:《农村破产》(《中国民主同盟论集》时事研究社,1945年)。
- ㊻社论:《垄断统制?还是自由贸易?》(《解放日报》1941年6月24日)。
- ㊼马寅初:《战时经济论文集》,1941年。
- ㊽黄子因:《民盟批判》,1947年。
- ㊾㊿新中国文献出版编译部:《中国新民主运动中的党派》,1946年。
- ㊽㊾萧文哲:《现代中国政党与政治》,1946年。
- ㊿㊽李受天等编:《中国各党各派》,1946年。

- ⑧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三册,1971年。
- ⑨《民盟批判》,《中国各党派史略与批判》。
- ⑩⑪⑫机密《中国各小党派现况》,1946年。
- ⑬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解放日报》1944年3月14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
- ⑭斋文编译:《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1946年。
- ⑮《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8日。
- ⑯⑰新中国文献出版:《中国新民主运动中的党派》,1946年。
- ⑱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1930年。
- ⑲史敬棠论文(《孤军狗党现形记》东北书店,1946年)
- ⑳《每周文摘》(柳登主编:《周报》第17期,1945年12月29日)。
- ㉑柳亚子:《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方案》(《周报》第10期,1945年11月10日)。
- ㉒《政治协商会议片断》(《周报》第12期,1945年11月24日)。
- ㉓《评坛》(《周报》第23期,1946年2月9日)。
- ㉔社论:《中国统一的基础》(《东京朝日》1946年2月8日)。
- ㉕⑵伍丹戈:《民主路线与中间路线》(《时与文》第8期,1947年5月2日)。
- ㉖《梁漱溟发表重要谈话》(《光明报》新6号,1946年11月8日);社论:《民盟的任务更繁重了》(1947年2月8日)。
- ㉗《中国民主同盟二中全会宣言》,1947年1月。
- ㉘《评坛》,丕强:《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周报》第23期)。
- ㉙方扬:《记陪都各界庆祝国内和平大会》(《周报》第23期)。
- ㉚范蕙:《论陪都暴行》(《周报》第24期,1946年2月16日)。
- ㉛《解放日报》编:《驳蒋介石》,1946年。
- ㉜马叙伦:《政治协商会议的暗礁》(《周报》第17期)。
- ㉝马叙伦:《关于国民大会最后的饶舌》(《民主》第16期,1946年1月26日)。
- ㉞社论:《我们为什么不参加国大》(《光明报》新7号,1946年11月18日)。
- ㉟陈启天:《寄园回忆录》,1965年。
- ㊱伍宪子述:《中国民主宪政党史》,1952年。
- ㊲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1963年。
- ㊳⑵程程:《政府俨然改组了》(《时与文》第7期,1947年4月15日);余润棠等:《中国当代政党论》,1948年。
- ㊴卢毅安:《中国民主社会党分裂之经过》,1947年。
- ㊵马叙伦:《政府改组后施政方针》(《时与文》第7期,1947年4月25日)。

- ⑭俞同:《一党国大纵谈》(《正报周刊》第20期,1946年12月30日)。
- ⑮沈志远:《我对于民盟二中全会的观感》(《光明报》新14号,1947年1月28日);李伯球:《二中全会的收获》(同上)。
- ⑯《民盟二中全会剪辑》(《光明报》新13号,1947年1月18日)。
- ⑰⑱许涤新:《论国民党区经济崩溃》(《正报》第20期)。
- ⑲社论:《反对掠夺民食》(《正报》第50期,1947年8月9日)。
- ⑳费正清著,市古宙三译:《中国》下卷,1972年。
- ㉑⑳㉒㉓千家驹:《三十五年中国经济的总结》(《光明报》新11号,1946年12月31日)。
- ㉔赵元浩:《国内工商业者的烦恼》(《光明报》新6号,1946年11月8日)。
- ㉕㉖李紫翔:《中国民族工业的国内市场关系》(《时与文》第7期,1947年4月25日)。
- ㉗㉘沈志远:《谈死亡线上工业界的自救之道》(《周报》第8期,1945年10月)。
- ㉙㉚《蒋区民族工业的大危机》(《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8日)。
- ㉛许涤新著,山下译:《官僚资本论》,1953年。
- ㉜㉝张一凡:《如何才救得了民族产业》(《周报》第20期,1946年1月19日)。
- ㉞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创刊号,1947年3月14日)。
- ㉟㊱㊲㊳㊴㊵周末报社:《新中国人物志》下卷,1950年。
- ㊶同上,上卷。
- ㊷崔莛:《残年暮景话蒋家》(《正报》第20期)。
- ㊸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四卷,1957年。
- ㊹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经济》,1940年。
- ㊺中国民主建国会:《右派分子章乃器的丑恶面貌》,1957年。胡愈之:《章罗联盟的透视》(《新华半月刊》1957年16号)。
- ㊻周鲸文著,池田译:《风暴十年》,1959年。
- ㊼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时与文》第5期,1947年4月11日)。
- ㊽艾林·利麒特等著,阿部译:《解放的囚犯》上卷,1958年。
- ㊾余润棠等:《中国当代政党论》,1948年。
- ㊿李岱青:《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破产》(《正报》第72期,1948年1月17日)。
- ㉑《蒋介石解散民盟》(《正报》第63期,1947年11月15日)。
- ㉒㉓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中国民主同盟三中全会》,1948年1月。
- ㉔中共中央发言人:《评民盟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新纲领》(《正报》第80期,1948年3月13日)。

②方敏：《饥饿的喷火》（《正报》第39期，1947年5月24日）。

③《华商》报资料室：《1949年手册》，1949年；《正报》第39期等。

④光明出版：《中国民主同盟的性质与任务》，1950年。

⑤《民主同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政治报告》，1949年。

1931年中国的分裂在日军战略中的地位

〔美〕唐纳德·A·乔丹*

韩红译

日本关东军1931年的侵略行径是广为人知的。这支队伍用武力从在人数上占有极大优势的中国部队手中接管了满洲大部分地区，显示了中国防卫上的弱点，而不是人数上的劣势。在众多的中国军队中，没有一支在武器的现代化或后勤保障方面能与满洲的这支日本精锐部队相匹敌。1931年夏，中国南京政府内部明显的混乱现象对关东军中富于冒险精神的校官们也是很有诱惑力的。这些业已在中国服役多年的、有作战经验的军官们根据自己对中国、日本和西方局势的分析，决定不执行东京提出的做进一步准备的建议，而于1931年9月18日采取行动。虽然他们把自己连同上级一起带进了亚洲大陆上的冒险行动，但是上下级军官中间一致认为，日本、尤其是乡村地区的经济危机，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以便永久地把满洲至关重要的财富据为己有。

战后，研究人员在研究这一关键性冲突的时候，往往对日本方面或者是中国方面的材料加以分析研究，但很少有人把两方面的材料结合起来考虑。在有关日本人占领满洲的大量研究著作中，对当时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含糊地一带而过。因此，中国方面的因素常常仅仅被说成是“中国民族主义不断对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进行挑战”，关东军为了维护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而采取了行

* 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与东亚研究室主任。

动。还有一种说法是，1931年“正当中国国民党人准备重申中国对满洲的主权时”，关东军采取了突然行动。就连马克·波蒂的《石原莞尔和日本与西方的对抗》这样全面的研究著作都说，关东军中满洲事件的关键策划人被那些为在满洲采取军事解决办法提供了新的机会的“中国的骚乱事件”所吸引，因为国民党人“正致力于长城以南的统一而无力进行干预”。那些对1931年发生在中国的情况看来是矛盾的结论太含糊，既不能说它们是错误的，也谈不上给人以启示。此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也并未说明中国人在1931年是怎样使日本人的紧张情绪加剧的^①。本文旨在把中国1931年的分裂状况与日本人针对中国民族主义长期崛起所采取的侵略行动两个方面合起来研究。

从满洲事件爆发起，以及在继而发生的世界大战过程中，中国对外部世界把自己描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尽管1931年在东亚的西方观察家们对此并不是都加以接受。中国的中央政府及其在满洲的同盟者们在1931年的言行，表明中国人一直在试图遏制日本人在东三省的势力。后来西方国家由于与日本之间的冲突，也许认可了中国人是无受害者的历史地位。然而，1931年时中国有不少外国人，包括外交官们，最初都认为日本是在给敢于违抗既成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国人以应有的教训。位于南京的新生的国民党政府命令其外交官们谋求终止不平等条约，这一态势使日本和其他缔约大国受到了威胁。与日本的南满铁路并行修建的中国铁路就是这种威胁的证据。一些外国人赞成日本人的论点，即中国内部的分裂局面及中国中央政府无法控制局势的事实使南京政府无权要求终止这些带有压迫性质的条约。当日本人提出中国尚不能自称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时，许多西方商人和外交官都表示赞同。

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

从1930年底起，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支持蒋介石对所有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国家施加压力，要他们在1931年2月将这些权利归还给中国。1931年1月15日，中国收回了在天津的比利时租界，王正廷与西方外交官进行的积极磋商开始收效。虽然日本人当时尽力不放弃自己的权利，但是外务大臣币原是愿意和解的，日本的出口商却对中国新增的关税感到担心，这些关税已经开始影响日本的贸易。南京政府还征收了一项新的工厂税，在中国的许多日本工厂均在纳税之列。南京政府的外交攻势于1931年4月底达到高峰，币原遂表示日本准备在治外法权问题上、甚至在满洲做出让步，他承认中国对满洲享有主权。

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似乎致力于通过拟议中的机构改革来为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的权力。由于中央政府权力正在不断扩大的这些迹象对满洲意义重大，一种早已存在的要求进行防卫的偏执情绪开始在日本关东军军官中显露出来。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石原莞尔大佐，他是促使日本人武装接管的关键人物。

石原莞尔作为作战军官随关东军到达东北执行任务是在1928年10月，时逢中国国民党的北伐军已在满洲的大门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日本人也在满洲的大门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日本人在满洲轻率地刺杀了张作霖，结果使他的儿子转而成为蒋介石的盟友。1931年日本下级军官中这种要求进行防卫的主张已经有了详细的记述^②。

国民党政权的分裂

蒋介石即使在自己的执政党里也并不能得到一致的拥护。1931年2月，当蒋介石软禁反对建立蒋介石希冀的政体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时，他的政敌开始联合起来。胡汉民的同情者期望各省实

行自治，实行真正的党的统治，而不是蒋介石鼓吹的更加集中的体制。4月，国民党反蒋派领导人聚集广州，南京政府表面上的团结崩溃了。到了5月，一大批显然受到两广军阀支持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向世界宣布，他们这个国民党的广州派是国家权力合法的“中心”^③——显然，此举不但从外交上而且从军事上削弱了南京政府对日本的防御。

满洲关东军的决策人得知近来国民党内发生分裂的消息，加速了一劳永逸地解决满洲问题的行动计划的进程。3月，在东京的同僚中与他们看法一致的积极分子发动推翻日本文官政府的政变未遂；而这一情况却使关东军军官的决心更坚定了^④。国民党领导人4月间会见了满洲“少帅”张学良，象石原莞尔这样的日本军官最担心的事发生了^⑤。正是这个时候，关东军的一名代表土肥原贤二前往上海，通过他的朋友黄郛向蒋介石递书发出警告。土肥原（据黄郛日记中记载）声称关东军准备保卫日本的利益，他希望这样能够拖住蒋介石，直到能够在满洲创造适当的气候，使外界相信日本进行干涉是正当的^⑥。

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坚持认为，在满洲采取的行动如果违反了国联有关“防御战”的定义，就会使西方做出危险的反应^⑦。在沈阳，石原认为西方正自顾不暇，中国内部又处于涣散的状况，想抓住这一良机^⑧。于是，关东军于1931年5月策划了一系列挑衅事件，企图使当地的中日关系恶化，造成反华和反日浪潮，这种浪潮是内部涣散的南京政府无法控制住的。根据马克·皮蒂的研究，到5月底石原和坂垣征四郎大佐似乎已经决定使用武力来回敬向南满铁路发动的一次模拟进攻。

5月4日，代表蒋介石和南京派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公然宣布将终止有关治外法权的谈判，并宣布中央政府即将开始控制在华外国人的活动；这一情况肯定进一步加快了关东军策划使用武力的进程。与此同时，广州派宣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6月间南京

政府和亲南京的沈阳政府开始对在南满铁路沿线地区开采、经由日本人根据条约占领的大连港运至中国内地的煤炭征收新的进口关税，此时，满洲的中国农民和被关东军当成日本臣民的一贫如洗的朝鲜移民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6月5日，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宣布，他已经同英国达成终止治外法权的初步协议^⑩。但是，这位高级外交官与币原之间的谈判却由于受到满洲的混乱局势和广州派与南京政府决裂所造成的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而进展缓慢。人们风传南京政府已经同莫斯科接触，考虑请苏联提供援助来削弱日本人对满洲的控制^⑪。这使得关东军对东京参谋本部比较谨慎的方针和币原的妥协外交越来越不耐烦。从中国传来的消息说明，国内的分裂状态加重，但满洲的民族情绪在不断高涨。

东京政府和伦敦政府在坐等似乎即将爆发的中国新的内战的结局^⑫，在有关广州派集结兵力和地方势力联合起来对付南京政府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执政的国民党的分裂情况，这样分裂已经破坏了南京的外交工作^⑬。汪精卫于1931年6月9日代表广州政府发表讲话，与南京政府的谈判人员大唱反调。他向全世界宣布他的政府想与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广州政府自己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征得东京的允许前去进行谈判。这一前景使东京参谋本部中专门想利用中国叛逆分子的那些人感到欢欣鼓舞^⑭。

正是在这个时候，参谋本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并于6月12日开会讨论了解决满洲问题的方法。尽管参谋本部一致认为满洲的反日活动也许只能通过武力解决，但是，要想在满洲创造使世界舆论认为需要日本采取行动的条件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不过，对于驻扎在满洲的日本人来说，当时中国领导阶层的分裂是一次诱人的机会^⑮。

接管满洲的前奏

6月12日会议的第二天，一系列挑衅活动就开始了，这使得满洲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已经相当紧张的关系更加恶化。万宝山一带中国和朝鲜农民之间为争夺灌溉权发生的冲突，促使南满铁路的日本警察出面进行干预，但结果却使该地区的冲突升级^⑤。日本皇军在国内外的一个非军事附属机构满洲青年联盟，在大连的若干次群众集会上要求日本不要执行币原的外交政策，并要求日本在与张学良和满洲的中国人打交道时采取强硬立场^⑥。到6月底，还在关东军特务中村大尉在北满被捕并于6月27日被处决一事引起轩然大波之前，英国的情报机构就获悉了关东军占领满洲的计划^⑦。后来在8月间，关东军和他们在东京的同僚们对中村之死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使之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与此同时，万宝山事件也引起了骚乱。

1931年7月，万宝山一带经过策划的骚乱局面变成了中日臣民之间的暴力冲突。骚乱又波及了朝鲜，那里的官方报纸挑起了造成数以百计中国人伤亡的流血暴乱事件，而这又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一场新的抵制日本人运动的理由。7月4日，陆相南次郎向内阁递交了参谋本部要求向朝鲜增派一个师的报告^⑧。一切都按照关东军的预谋进行着，紧张局势日益加剧，需要进行军事干预。关东军的特工人员也企图通过进一步加深和扩大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反叛情绪来阻止中国人做出任何有力的反应。陆军特高科的特务土肥原向华北的石友三和广州派提供反对南京政府活动需要的经费^⑨。蒋介石的部队于7月间在湘粤边界一带与广州派的部队、在华中与共产党军队、在华北的河北省与石友三将军的军队发生冲突。石友三与蒋介石在满洲的同盟者张学良形成对峙局面。当时，广州派和东京却因为除掉了南京政府在北方的堡垒张大帅而受益非浅。尽管没有确凿证据，南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还是

不仅指责石友三将军，而且指责广州派接受了日本的援助^⑳。曾先后为张作霖父子担任军事顾问的土肥原贤二大佐7月间从东京参谋本部调至关东军特高科，途中曾在上海停留，又在天津执行了一次临时任务^㉑。若槻首相很快意识到，土肥原积极参与了使石友三将军反对南京政府的交易，并可能对参谋本部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调土肥原返回沈阳^㉒。可以看出，满洲关东军的高级军官们充分利用了中国的派别矛盾；还可以看出，关东军的决策人对中国的政治斗争是了如指掌的。一到沈阳，土肥原就向报界披露了中村被杀一事，进一步激化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

关东军军官中的这些同谋者以前曾一起在中国大陆执行过任务。这些职务不如在欧洲或美国任职体面^㉓。他们也是由强大的萨摩—长州圈子以外的失意军官组成的小团体的成员。作为“中国通”，他们希望通过在大陆上扩张、在军队和日本社会里进行改革，来解决日本的现实问题。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都是由陆军校官组成的积极推动改革的双叶会成员。他们在关东军的参谋部和特工部二处工作^㉔，和他们在关东军中的前任很熟悉。坂垣担任高级参谋军官，石原担任作战军官，因此，这伙人处于能够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的特殊地位^㉕。在东京，这个圈子建立了效率很高的情报网，影响很大，比如在参谋本部的中国课里就有支持他们的人。助理武官田中隆吉从国民党的腹地上海为他在陆军学院时的教官坂垣提供情报^㉖。这样，1931年时关东军中的积极分子不仅有对付中国问题的经验，对有关中国领导层内部斗争消息也很灵通。

以上海为中心的抵制日本人运动起了帮助关东军加剧中日间紧张局势的作用。这已是第9次抵制日本货和日本服务项目的运动。最初它是由上海的企业家和当地的国民党支部发起的。但是遭到广州派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对。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不仅指责南京政府惹怒了日本人，而且还完全抛弃了南京政府一直

采取的立场，在他们的区域里禁止抵制活动。

但是，蒋介石也担心抗日活动会影响平息中国严重的内乱。他在私下考虑到，万宝山事件后，与关东军摊牌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公开场合，他尽量压制只会暴露中国弱点的同日本的任何冲突^②。然而，尽管他小心谨慎，抵制运动还是在上海引起了与日本人更进一步的对抗；而与此同时，广州派的军队开始威胁包围江西中国共产党苏区的南京政府军队的后方。7月中旬，北方张学良的一些部队被调离满洲去对付支持广州的石友三。

8月间，满洲的少帅接到蒋介石发自江西的警告，要他不要采取任何会给关东军使用武力解决办法以借口的行动。这时，长江流域已遭到特大洪水的袭击，南京政府的经济基地被毁，从8月19日起由北向南调兵的工作也中断了，直到洪水于10月间逐渐退去后才恢复。水灾的救济工作使国民党的财政更加拮据，当时中央政府正在试图调整军队以对付三个地方的内部暴乱。蒋介石在他1931年9月1日的日记中概述了当时中国防御的虚弱，他写道：

在万宝山事件中，我们看到日本人时而退却，时而进攻。日本人正在更大张旗鼓地宣传中村事件。他们入侵的危险似乎更加迫在眉睫。啊，我无法驾驭国内局势——一场洪灾也使我们的人民在受苦。这样的局势困扰着我，我该怎样做：假如我的中国能早日觉醒，团结，自强，我们就不必怕日本人了。但是我的中国人尚不具备这样的觉悟。这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问题。噢！我必须竭尽全力，寻求一个解决办法^③。

整个1931年夏，日本人的威胁不断增长，但是，明争暗斗的国民党各派系只能够在口头上鼓吹团结的必要性，实际上却继续互相倾轧。这只能促使关东军的行动主义分子加速他们的阴谋活动。

广州派对东京的独立外交

5月份以后中国外交路线出现的分裂无疑使币原更难让在东

京津谤他的人相信他能够解决中日谈判的问题。南京政府听任上海新的抵制日本人的运动以加强自己在谈判中的强硬立场^②，而广州却禁止抵制活动；在7、8月间他们似乎在寻求日本人的援助^③。广州政府通过驻广州的日本领事须磨弥吉郎与东京政府的外务省取得了联系。通过这种途径，安排了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从7月23日至8月13日出访日本，旨在谋求两国间的互利。蒋介石早已断言日本是一个威胁，而当时陈友仁却在强调孙逸仙早期关于中日进行泛亚洲合作共同发展亚洲的梦想。尽管陈友仁后来一再否认他企图以接受日本在满洲的统治作为交换条件，取得日本对他那一派的承认和援助，但是他离开东京时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④。陈友仁在东京不仅在外务省而且在参谋本部与军官和日本执政党的代表举行的非正式谈话中代表的是广州派主要代言人汪精卫。南京政府和广州派不断加深的分歧只会使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中的“中国通”感到高兴。日本人怂恿陈友仁继续采取广州派禁止抵制日货，并禁止不利于改善中日关系的运动的做法。

须磨领事向国内发出了热情洋溢的报告，把广州派的所作所为与中日之间在上海发生的冲突做了鲜明的比较^⑤。陈建议广州派和日本成立一个能够就有关满洲紧张局势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的联合委员会。尽管东京外务省强烈反对这样做，但按照日本军队的传统政策利用中国的地方势力来反对中央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币原一直采取与南京政府和解的立场，但是在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批评他对中国采取软弱政策。广州派坚决声称他们有权代替南京的蒋介石派成为中国的代言人，这使得币原得以比较顺利地把治外法权归还给南京政府一事暂时搁置起来^⑥。其他大国亦不愿归还自己通过条约得到的权力，遂效法币原的做法，于是，中国在重新修订条约方面再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方面，中国“革命”外交的效力受到削弱，另一方面，中国又不具备保卫满洲和华北的能力。关东军中的那一伙人由于有在东京和搜集情报

的理想地方上海的情报来源，对这种局面看得十分清楚。到1931年9月，中国内部虚弱的局面恰巧与关东军的军官中不断增长的急不可待的心情相重合。根据皮蒂的分析，石原在时间的选择上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他断定国民党企图把满洲归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愿望的确是一种威胁；他还断定参谋本部中国课看到的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局面为关东军提供了一个机遇^④。

青年军官们的野心越来越大，他们在中国满洲的自行其是引起了若槻内阁和那些主张文人统治的人的反对。他们向天皇转达了自己的担心。天皇又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⑤。

他们制定了强制性手段，旨在防止关东军使用武力自行解决日本在满洲的地位问题，并阻止任何在东京搞军事接管的企图。然而，甚至在非军方的报刊上，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支持在满洲采取直接行动。9月间，东京和南京有关关东军在进行密谋的传闻甚嚣尘上。中国驻日内瓦国联的外交官已经开始敦促国联大会派小组去满洲进行调查^⑥。陆军利用中村上尉在满洲“被害”以及当地抵制日本人运动的消息来挑动公众舆论。此外，东京政府将对他们加以限制的前景、国际观察员到来的威胁、中日两国外交官在缓和由万宝山事件和朝鲜事件引起的紧张局势方面取得的进展，都促使关东军的“武士”们加速行动。在这个关头中国内部分裂的因素进一步促成了关东军的密谋。

张学良手下的军队人数大大超过关东军，因此，一旦日本人采取突然行动，他们有可能较好地保卫满洲。但是，张学良的主力已被调往华北去阻挡正在那里集结的广州派的支持者。少帅当时不在沈阳。他正在北京的一家疗养院里戒毒。此外，蒋介石已告诫他，不要受骗去和关东军交战。9月间，南京政府不仅在极力镇压共产党在江西重新开始的活动，而且还受到从广州发动的进攻。

国民党在南方的内战

几个星期以来，支持广州派的军队一直在广东省边界一带集结，有报道说已经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②。9月2日，广州派的宣传部门通过路透社宣布，所谓汪精卫想与蒋介石讲和的报道是不真实的。

汪精卫与国民政府的所有成员一样，要求蒋介石将军立即辞职。因此，关于如果蒋介石放弃现有的一部分职务而使自己的权力减少会使广州派的官员感到满意的说法是不真实的^③。

广州的报纸9月8日进一步报道说，唐生智将军已率湘军从广东向北开进他的家乡湖南，他希望以国民党广州派的名义收复湖南。这一举动重复了他在1926年北伐开始时的所做所为^④。于是，敌视南京的军队就在湖南一带活动，而共产党正利用这个机会从蒋介石的反共军队手中收复失地。因此，蒋介石不得不把他的将领集结于汉口，并于9月10日在汉口开始了用船把部队运到湖南的准备工作^⑤。一直与共产党作战的十九路军置南京政府要他们转而攻击他们的广东老乡的命令于不顾，只是在江西吉安附近观望^⑥。人们开始推测说北方各省的军阀会利用这个机会脱离中央政府。虽然广州派显然仅仅是越过了广东同湖南、江西、福建三省的边界作试探性攻击，但当时局势在关东军看来，却意味着妨碍他们阴谋的中国人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都不复存在了^⑦。石原相信，一年之后，国民党可能重新恢复对满洲的影响，这种分裂局面就会消失^⑧。

9月18日关东军在沈阳突然下手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强盗利用了军阀的暴乱和我们内部的分裂进攻了东北……。我们的内部仍很混乱。暴乱者尚未悔悟……。尽管我们想抗日，却没有力量^⑨。

派系斗争的双方都发现很难和解。广州的国民党人把蒋介石

与日本人打交道中的无能说成是导致满洲事件的原因。关东军最担心的是广州派与南京政府联合起来^⑤。但是广州派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在报纸上谴责蒋介石篡夺了党的权力，自作主张地处理对外关系。汪精卫和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提出这样的口号：“抗蒋即抗日——抗日即抗蒋。”^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条国民党内的口号竟与毛泽东9月25日在江西提出的相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⑦

按照广州派的代言人汪精卫的谈法，只有通过他提出的国内民主改革，才能实现保卫中国所需要的团结。然而，即便在广州他的势力范围内，他所拥护的民主也并不那么明显。国民党左派这一最新的思想，主张搞地区性自治，而不拥护蒋介石政府不断扩大中央权力。广州派聚集着形形色色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他们似乎无法使内部意见一致。他们唯一一致的观点是坚持要蒋介石一伙把国民政府交给他们^⑧。

从理论的角度进行历史分析，人们也许会注意到，执政党中各派系之间的这场斗争在出现了外国人的威胁时并没有缩小。情况并不是“当……外国人的征服有推翻某一派政权的危险时，各派就在一个称职的领袖周围团结起来”^⑨。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在沈阳沦陷之后更激烈了，并且进一步怂恿了关东军的冒险主义。

在扩大自己对整个满洲的军事控制的过程中，关东军还必须消灭所有的中国抵抗者。而苏联人却一直呆在黑龙江从哈尔滨至齐齐哈尔的中东路沿线上^⑩。10月间，关东军的冒险行动遭到了若槻内阁、天皇、外务省和西方外交界的强烈反对。假如中国人作出强烈反应来加强反对的声势的话，结果也许就不同了。

西方的批评的确对日本施加了压力，要它遵守自己参与签订的反对侵略的国际协议，但西方报刊同时指出，中国的动乱表明，中国缺少中央权威^⑪。尽管中国代表南京政府的外交官们有效地

利用了各种国际协定和国联盟约，他们还是不得不对付西方圈子里的怀疑态度。西方人怀疑中国是否的确是个真正的国家，是否能够在反对派指责南京政府有权代表中国的同时自称对满洲拥有主权。此外，英国人仍然在试图解决约翰·索尔伯恩一案；这个英国人于6月间步出上海的外国租界区，结果被逮捕，后来被中国的城防部队当作间谍处决了。索尔伯恩案件和中村案件的相似之处，的确使外国人对日本人确保其国民在满洲的安全的企图颇感同情。广州派对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攻击，助长了外国人对南京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作法的批评。

国民党内部围绕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喋喋不休的争吵，进一步缩小了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采取强硬立场的可能性。当关东军的阴谋家准备进入满洲北部省份时，广州和南京之间甚至无法就联合抵制日本人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10月中下旬，广州那些与上海的抵制委员会进行联系的人受到当地国民党人的镇压。汪精卫派担心沈阳事件会阻碍他们削弱蒋介石的努力，并阻止任何象日本人所说的那样有可能是奉南京之命组织抵制活动的人进入广州。但是，广州的学生中抗日情绪是强烈的。10月初，当地的国民党人动用了警察来禁止所有有组织的抵制活动^⑤。10月10日，一些警察出面保护了一家出售日本货的商店，结果，抗日的学生和积极分子们采取了暴力行动。广州警察在警察局中进行自卫，朝二千名示威者开了枪，打死二人，多人受伤。孙科和其他广州派领导人断定这次暴力行动是共产党组织的。他们立即调来两个营的兵力，对抗日分子实行军事管制^⑥。广州的国民党党员批评南京政府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缺乏反应的同时，汪精卫指责报界站在学生一边，并以未能刊登警方对暴乱的报道为理由查封了《大中华晚报》^⑦。

陈友仁继续通过日本总领事须磨与东京联系。陈告诉一位英国外交官，他和东京一致认为广州派必须与日本合作，共同解决使

日本和中国发生分歧的满洲问题；必须除掉张学良这样难对付的军阀^⑤。日本人和外国人觉得，广州派仍然希望与日本结成某种友好关系，这将使蒋介石成为中日关系恶化的替罪羊。陈友仁9月就已经告诫外务大臣币原，“中华民国政府将拒绝承认与蒋介石做的安排”。陈谴责蒋介石为了讨日本人的欢心而拱手出卖满洲^⑥。

10月间，这两个敌对的国民党派系花了大部分精力筹备在一个中立地区召开一次联合会议，希望能再次实现某种联合。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是在英属殖民地香港开始的。沈阳事件爆发后的一个月里谈判断断续续，速度慢得令人难堪。到10月初，采取了初步行动，主要由广东士兵组成的19路军将从江西剿共前线调至上海地区担任城防任务。19路军将在该地区举行的谋求重新联合的会议上保护广州派发言人的安全，防止蒋介石逮捕胡汉民事件重演^⑦。

在上海，以当地为中心的抵制日本人的运动制造了一个所谓的“中日事件”，关东军利用这一事件把全世界的视线从日本人在满洲巩固军事统治的活动上转移开来。西方在中国的东三省的投资虽然比较少，在上海却拥有大量的、长期的财产。数以千计的西方各家公司的代理人和在中国的大部分外交人员集聚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租界以外便是正在发展的市区。这里是外国和中国经济利益的神经中枢，有些关东军军官相信，在上海地区发生破坏性冲突，会表明相比之下满洲是不重要的。10月，坂垣大佐把举足轻重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担任陆军武官助理的田中隆吉少佐也拉进了满洲的计划。田中专门研究中国并从事间谍活动，他也是陆军中的一个“中国通”，与沈阳的密谋者们有着私人联系。他的任务是尽力使上海的中日关系更加紧张，并注意观察中国的政治风向^⑧。

沈阳事件之后，愤怒的中国老百姓采取一致行动来发泄自己的感情，联合抵制日本人的活动如火如荼。许多中国人支持进行抵制活动的纠察队与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

停泊在上海港的许多炮舰上的日本海军立刻进行报复；繁忙的上海港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连对日货和日本人经营的服务业的联合抵制活动都成了中国各派系之间相互攻击的武器。

由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断定必须避免与日军交战，因此，蒋介石集团觉得联合抵制运动非常棘手。他在广州和上海的对手们，感觉到他在这个民众关心的问题上很容易叫人抓住把柄，于是就进一步掀起了联合抵制的热潮。1931年10月第九次对日本人的联合抵制运动深得人心，取得了空前的效果。尽管南京政府在表面上对联合抵制置若罔闻，国民党的上海党部却参与了联合抵制的领导工作。与此同时，蒋介石一伙人一边力图使相互对立的国民党各派力量步调一致，一边又不得不考虑关东军的威胁。联合抵制运动也起了离间日本工商界与币原采取的调和政策之间的关系的作用。

尽管日本国内的工业能够找到新的市场来取代在中国失去的市场，但是，在中国的日本人却饱尝不安全之苦。人数众多的日本侨民转向跃跃欲试的日本军队寻求保护。代表上海众多组织的文职发言人没有告诫东京政府去约束关东军，反而开始对关东军大加褒扬，并要求日本政府在中国为他们提供军事保护。10月间，日军主要停靠的通商港口谣言四起，外国人纷纷担心会爆发一场全面战争，使美英两国站在中国一方出兵干涉。

然而，中国人的精力仍然集中在如何结束国民党内四分五裂的状况。到了10月，各派至少一致同意在上海外国租界的中立地举行重新联合的会议。19路军的一些部队开始包围该地区——为了确保乘船北上到上海的广州派领导人的安全。

南京对广州派做出的另一个让步是释放了一直软禁着的胡汉民。胡被软禁事件当年春天曾引起广州派与南京政府的决裂。胡汉民呼吁他的广东同乡来上海出席被称为“和谈”的派系之间的谈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内部的主要议题竟是和平问题，而

不是如何解决因满洲问题与日本发生的国际危机。广州派的一位代表10月21日抵达上海时向报界发表谈话说，“我们之间的分歧给了日本人入侵我国的机会；我们必须建立一条联合阵线来对付现在的局势……。就我而言，一切问题已经解决了。”^⑤虽然两派都认识到了要抗日就必须使党的领导重新团结起来，但是在1931年余下的时间里，由于张学良所属的20多万官兵尚未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关东军仍可以利用中国的分裂状态来实现自己的目的^⑥。

广州派坚持说，他们拥护建立比较民主的文官制度，因此，必须要求蒋介石辞职，因为蒋介石的军事机器对文人政府构成威胁。双方分别在广州和南京开始着手准备自己所说的“真正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使日本人看到的是比较团结的局面，南京提出至少成立一个外交事务联合委员会。但这一提议遭到广州派的拒绝^⑦。汪精卫建议在国民党内把军政职务完全分开，并免去蒋介石的总司令一职。一俟蒋介石辞去其政治职务，广州派即宣布解散它的国民政府，并参加在南京成立的联合政府^⑧。

国民党在上海举行的这些所谓的“和平”会议从10月23日一直拖拖拉拉地开到11月7日，而在这期间谁也说不准会开出什么结果来。这将仅仅是朝着重新联合达成初步协议而已，但与会者却互相谩骂、离开会场，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做出让步。参加派系辩论的代表显然不能忽视关东军在满洲的威胁；因此，在10月30日举行的会议上，与会代表试图就对日政策取得一致意见，以有利于南京和东京之间正在举行的磋商。人们的希望是所谓的抗日“统一战线”能够在上海的会议上提出来。国民党的多数代表一致同意，联合小组将支持南京政府的不抵抗和依靠国联和国际条约的政策。但是，以陈友仁为代表的少数人则反对上述立场^⑨。朝着成立抗日联合阵线迈出的这一小步也化为泡影。到了11月2日，南京政府确信，广州派通过在上海报刊上发表反对南京政府外交部的文章，正在削弱中国对日本和国联的外交地位，并且实际上企

图获得日本人的支持来反对南京。在南京举行的一次总理纪念周仪式上，蒋介石对广州派做了上述批评。一时，和平的努力似乎付之东流了^④。

关东军的土肥原正是选择了这样一个时机，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外挑起了事端。土肥原雇用了一群杂七杂八的中国退役军人，策划了后来在外人看来是对日租界的进攻，前皇帝溥仪当时正在那里居住。这场交战为出于对溥仪的“安全”考虑而把他转移至满洲提供了借口。关东军不仅把溥仪搞到手，以便日后扶植他为傀儡，日本城防部队利用租界作为基地所做的事情也给土肥原打了气。11月14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代表日本城防部队与当地张学良的部下经谈判商定停战，中国被迫从日本租界周围的大片中立地区撤兵^⑤。

1931年11月的天津事件起了考验华北的张学良，南京和广州的国民党各派会做出何种反应的作用。但是，在上海，各派仅仅同意返回各自的大本营，着手为人们翘首以待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准备。由于继续存在严重分歧，各派将推选出自己的代表以组成一个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旦蒋介石兑现了自己辞去军政要职的诺言，联合执行委员会将决定中国的政策。在11月7日结束的上海和平会议和11月20日开始分别举行的两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之间，中国的外交官员们失去了政治权力。无论是在广州还是在南京，两派领导人甚至无法使本派接受在上海达成的妥协。

在广州，尽管大家一致赞成蒋介石辞职，但所谓的广东派在拟议中的联合执委会的代表资格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广州派在意识形态上很少共同之处。当在上海达成的妥协遭到攻击的时候，孙科、陈友仁、胡汉民等人跑到香港。结果，当地的军阀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得以控制了粤派剩下的人马。孙科和其他早些时候从南京逃至广州的人开始选择参加联合执委会的代表；汪精卫和

分裂出来的另外一个小的派别也在上海选代表^⑥。报刊的报道并没有使日本人看到团结的局面。与此相反，有报道说，12月3日，广东派出席自己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大打出手，他们相互投掷椅子，直至温和派出面干涉为止^⑦。的确，广东派提出，要以举国上下真正的统一步调作为抗日的最好手段，外交政策也要以此为基础，但他们在自己内部却无法实行团结。

在中国的日本驻军发现了这种政治斗争，他们想做进一步的试探，甚至想深入华北。11月26日，日本驻天津的部队向据说是中国便衣部队的人重新开了火；与此同时，关东军特务把溥仪夫人带到满洲。关东军准备沿着海岸向天津逼近。行动的目标是要摧毁张学良的东北军剩下的锦州这块飞地，“营救”在天津的日本国民，增援天津守卫部队（这支部队已被称为华北驻屯军）^⑧。中国方面明显表现得软弱，不仅致使关东军，而且致使小小的日本驻天津守卫部队都想采取冒险行动^⑨。尽管关东军的资源已经很紧张，但是，如果南陆军大臣、民政党政府，以及来自天皇的压力这三个因素对关东军的阴谋没有遏制作用的话，他们企图占领华北沿海地区的计划是有可能成功的。关东军的计划也包括占领俄国人在满洲势力范围以内的齐齐哈尔^⑩。对关东军在1931年底的侵略性冒险行为最有效的阻遏，莫过于来自西方大国、日本文职领导人和中国人统一防御这三个方面的抵抗。但是即使若槻内阁、天皇和陆军中的高级军官反对陆军进一步试探中国的软弱，西方也没有做出强烈的反应；也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人能够团结起来一致抵抗关东军。

中国人反对政府的南京骚乱

1931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天津的日本人看到乘火车的持不同政见的中国学生前去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数以千计的青年在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政府所在地

和国民党党部外举行抗议，与此同时，他们越来越感到心灰意冷。蒋和其他官员收到并注意到他们的请愿书，但他们立即以武力光复满洲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12月上旬，南北各地的学生与中国守卫部队发生冲突；12月7日，北京的学生不顾禁令封锁了该市的铁路车场，直到他们被允许去南京。在南京，群众捣毁所有象征国民党当局的东西并高喊结束卖国的不抵抗主义的口号^②。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把学生积极分子带到南京的事情上起了作用，但蒋介石党内的对手看来已成为支持这场反蒋运动的主要力量。当时，英国、中国、特别是日本的军事情报部门都指出汪精卫及其改组派是南京和上海12月骚乱的幕后支持力量^③。

上海存在着总罢工的威胁，当学生们被阻止乘车时，他们就捣毁铁路上的设备。12月15日，当来自北京、南京和上海的数百名大学生冲击并捣毁外交部，接着又冲进国民党党部打了蔡元培并与警卫扭打时，暴力行为达到了高潮。这次破坏性行动随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印刷厂被捣毁和几千名治安部队的到达才平息^④。虽然蒋曾许诺广州派，他将在适当的时候辞职，但他就在这场破坏性暴乱的日子里引退，看起来证明了广州派拥有实力。

广东国民党联合政府

孙科领导的摇摇欲坠的新政府，最初是利用十九路军的广东人部队防御邻近的忠于前领导的军队，而不是对抗威胁要在上海登陆的日本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上海的派系斗争仍很激烈，国民党工会内意见相左的各派争斗不已。随后，当地的广东籍商人又企图从浙江人手里夺走上海商会的领导权^⑤。广东派领导的联合政府既没有以强硬的态度对抗日本军队，也没有设法弥合在南京出现的党内分裂，而是搞了一种双重的官僚政治。各部新任命的广东人头头都受到了对手们的抵制，他们原先以为这些人是会为他们工作的。由于持有敌意的上海银行家取消了贷款，重新

统一的试验在令人绝望的重压下破产了。在其他有利因素的启发下，通过其在上海的特务而消息灵通的关东军在沈阳决定，中国目前的分裂对他们来说是很幸运的，必须抓住这一时机^⑤。

蒋介石下野之时，正值民政党内阁下台和币原的对华和解政策失败。文职立宪派对关东军的制约已无民政党的支持，陆军希望出现一个在政友会领导下的更加亲军方的内阁，该党一向是亲军方且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在日本，强调中国土匪对满洲的日本国民构成威胁的宣传增加了，为调查对日本侵略的指控从日内瓦派来的联合调查团于12月10日到达满洲，日本国内对此也存在着一种忧虑情绪。通过在12月16日成功地挑选闲院皇储为参谋本部参谋长，军队则更加自信了。第二天，荒木陆军大臣就得到了内阁、枢密院和天皇的批准，允许使用应急款项，通过消灭被称作“土匪”的满洲军队残部，在西满（锦州地区）“恢复公共秩序”^⑥。在国民党两个主要派系为在南京为共同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而重新组合的同时，关东军开始从北线调动军队，逼近锦州张学良的总部。

现在，有了“东京的批准”，关东军就又重新开始了其对西满锦州的攻势，这离前一次试探被命令撤回还不到一个月。12月18日，关东军决定发动进攻。陆军省在12月22日的公告中宣称此次行动是对祸害满洲日本国民的土匪采取的一次防御性行动，这些土匪则是由张学良暗中唆使的^⑦。考虑到国民党内为建立一个新政府还正在南京争斗不已，这次进攻时机的选择可算是石原莞尔乘敌之虚的战略天才的典型表现^⑧。

正当关东军部队在锦州对面集结的时候，国民党对立的派别于12月18—22日举行会谈，试图解决新的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代表问题^⑨。中执委为解决代表各派的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问题而烦恼不堪。随着蒋介石表面上的引退和返回浙江农村的故乡，广东派在政府和党内取得了均等的领导权。但是，国民

党两派间这种脆弱的平衡充满着紧张。陈友仁在1931年曾三次因阻止不了关东军而被作为替罪羊撤销了部长职务，现在为了对付满洲问题与日本，他又当上了外交部长。前三任中，一次因丢失满洲挨了学生的揍，另一次在外交部被捣毁时受到叱责被撵走，在这次中执委任命陈之前曾成立一个临时紧急委员会。

孙科于12月28日成为行政院首脑而掌握大权，其主要目标是争取实现党内团结。他坦白地指出，由于党内没有退让精神，也不愿牺牲派别利益，总是无休止地进行论战和琐碎的争吵，党纪已荡然无存。关于目前与日本之间的危机，孙科警告说：

如果我们的同志现在再不奋起光复我们失去的领土和主权，我们就将不得不承担党和国家覆灭的巨大责任！所有的人都必须撇弃意见分歧和山头^①！

派别摩擦在满洲崩溃的责任问题上爆发了。南京继任的领导人已命令张学良及其完整无损的庞大的东北军在锦州进行抵抗。与此同时，陈友仁正在谈判，企图通过犬养首相约束关东军，广东派也在努力设法结束张学良作为蒋介石在华北的盟友的作用^②。在中执委12月25日会议上，当有些人提出把张学良作为卖国贼时，南京派的吴稚晖愤怒地反击：“用不着费劲就能找到这个国家真正的卖国贼！”这激怒了孙科、陈友仁及其同伙，他们离开会场，回上海去了^③。12月28日，孙科又被劝回南京，组成一个后来被证明是短命的、无用的联合政府。对关东军来说，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即将实现重新合作的危险促使他们加快了攻势^④。从中执委最后训令的观点看，谈及这一威胁还为时过早，训令中包括一项要求国联支持的新的呼吁，但既没有对张学良给予物质增援，也不允许张学良的人参加联合政府^⑤。华北的观察家中有相当多的人猜测，张学良在锦州的困境表明，来自南京的打击和来自关东军的同样沉重。日本一些历史学家对日本取胜因素中中国政界明争暗斗的作用估计不足，因而对张学良带着他庞大的军队撤退感到迷惑不

解^⑤。虽然张学良的部队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但还是经过策划谨慎地撤向更能防守的位置,这就使最后一支东北军主力部队撤出了他们的根据地^⑥。12月下旬,正当国民党领导层在南京自相争斗的时候,关东军打到了中国本土的边缘。1932年1月2日,对锦州的占领最后完成。此时,土肥原及其关东军同僚又转念向北方推进,包括哈尔滨在内。根据头号阴谋家坂垣大佐1932年初在奉天所作的分析,中国对(日本)接管满洲的任何真正抵抗,都会被中国“频繁的内部争斗”所破坏,“因此,中国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并发生政治动乱,可说是有利于满洲问题的解决的”^⑦。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关东军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统一与其防御能力之间的关系。1931年中国“革命外交”持强硬方针,但随后却暴露出内部如此虚弱,这就招致日本陆军采取行动,触发了长期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日本选择了武力来解决中日之间的分歧。

注释:

①阿尔伯特·克雷格和艾德温·赖肖尔:《东亚》,波士顿,休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707页。本一阿米·希洛尼:《日本的反叛》,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页。马克·皮蒂:《石原莞尔及日本与西方的冲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14—115页。

②马克·皮蒂:《石原莞尔及日本与西方的冲突》,第88—90页,96页,156—157页,160页。希洛尼:《日本的反叛》,第3页。查默斯·约翰逊:《中国和日本的相互看法》,见库克思和康罗伊编的《中国和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均势的追求》,桑塔巴巴拉,ABC—克利奥联合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9页。绪方贞子:《在满洲的挑战》,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0—89页。吉桥武彦:《奉天的阴谋》,耶鲁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③赖泽汉(Lai Tse-han音译):《1931年广东分裂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这是一份未经公开发表的手稿,提供了有关派系斗争的丰富资料。

④绪方:《在满洲的挑战》,第三、四章。原田熊夫男爵:《西园寺—原田回忆录》,华盛顿市,美国大学出版物,第一卷;城户侯爵日记,见R·约翰·普里查德和索尼娅·M·扎依德合辑的《东京的战犯审判》,纽约:加兰德联合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卷,第1927—1928页。

⑤F·C·琼斯:《1931年以来的满洲》,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5页。

⑥沈逸云(Shen Yi-yun,音译):《逸云回忆》(又译《黄夫人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1971年版,第431—432页。

⑦绪方:《在满洲的挑战》,第54页。

⑧皮蒂:《石原莞尔》,第114—115页。

⑨秋良入江:《帝国主义之后:1921—1931年在远东地区寻求新秩序》,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287—288页。

⑩《日本广告商报》,1931年7月1日头版头条。

⑪秋良入江:《帝国主义之后》,第289页。

⑫《日本广告商报》,1931年7月10日第4版社论。《每日报》,1931年6月11日第1版。《工农通信志》,上海,中国共产党,1931年7月18日,第156页。《华北论坛》,上海,1931年7月7日,第3页。

⑬《每日报》,1931年6月12日第1版。美国驻广州领事巴兰坦1931年7月27日发给国务院的报告。美国国务院793.94/1789号文件。

⑭绪方:《在满洲的挑战》,第47、49页,53—55页,援引了一份题为《有关解决满洲和蒙古问题的总方针》的陆军报告;另见谷圭二:《蒋介石的生平与时代》,纽约,圣约翰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页。

⑮《每日报》,1931年6月13日,第1版,发自长春。

⑯美国外交部:《日本:书信集F/4548/3792/23,东京与汉德森》,1931年7月16日。

⑰英国武官G·巴德姆—桑希尔致驻北京卡普森公使的信,1931年6月26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辑,第8卷,第491号。

⑱见詹森译古谷圭二著《满洲事件》,第178页。

⑲《西园寺—原田回忆录》,记述了若槻首相告知原田有关土肥原援助石友三将军的情况。《东京的战犯审判》,第1卷,第15页,第725页,土肥原的证词。古谷圭二:《满洲事变》,见詹姆斯·B·克劳利根据与日本将领会见撰写的《日本对自治的追求,1930—1938年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96页。

⑳《中央周报》(国民党在南京发行的党内周报),1931年8月3日,第29页。《中法战争》,《工农通信志》,1932年3月。

㉑《东京的战犯审判》,第5卷,人员档案第7号,第15、725页,土肥原的证词。古谷圭二:《满洲事变》。

㉒《西园寺—原田回忆录》,第42页。

㉓波多几彦:《昭和史的军人们》(26名军事人物传略),东京,文艺春秋社,1982年版,第89—101页。

⑳克劳利:《日本对自治的追求》,第114页和第11章。绪方:《在满洲的挑战》,第13—15页。列昂纳德·A·汉弗莱:《双叶会和漱里介:20年代陆军中持异见的参谋军官》,1976年3月19日在多伦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会议上宣读的论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2905号文件,第2773号证据文件。

㉑皮蒂:《石原莞尔》,第95,162—163页。

㉒波多:《昭和史的军人们》中的田中传记。逸云:《逸云回忆》,第431—434页,根据黄郛日记,田中曾与土肥原共同拜访过他。

㉓《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日,台北阳明山国民党档案馆。《国闻周报》,1931年8月3日,刊登了蒋介石告诫不要在江西的剿共中分散注意力的电报。

㉔《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日。

㉕1979年10月3日在台北与国民政府老资格的外交官乔治·叶(George Yeh,音译)的会见。

㉖《日日》报,1931年7月17日。

㉗《外交时报》,东京,1931年9月1日,第642号。

㉘《朝日新闻》,1931年7月28日,第1版。

㉙《华南晨邮》,1937年7月14日。《华北论坛》,1931年7月14日,第40页,本文报道了孙科对南京政府的抨击。《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4卷,第90号。秋良入江:《帝国主义之后》,第289页。

㉚皮蒂:《石原莞尔》,第114—115,135—136,156—157,160页。

㉛《城户侯爵日记,1931—1945年》,美国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9月10日的日记。

㉜《中央周报》,1931年9月21日,第21页。

㉝《华北论坛》,1931年9月15日,第363页;1931年9月22日。

㉞《华北论坛》,1931年9月8日,第826页。《中央周报》,1931年9月7日,第23页。

㉟《中央周报》,1931年9月15日,第363页;1931年9月22日,第400页。

㊱《日本广告商报》,1931年9月11日,第2页。

㊲《华南晨邮》,1931年9月14日,第12页。

㊳《广州邮报》,第45号通讯,这是美国驻广州领事发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记述了1931年9月16日—18日广东军队的动态。

㊴皮蒂:《石原莞尔》,第114—115页。

㊵《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

㊶希洛尼:《日本的反叛》,第3页。

㊷1931年9月22日,美国驻宁总领事有关反蒋活动的报告,美国国务院783.94/1913:

号文件。《华南晨邮》(1931年9月25日),9月24日发自广州,报道了汪精卫的讲话。这条据说是1931年提出的口号,是1980年5月12日由国民党历史委员会在台北召开的讨论1932年上海事件背景的专题讨论会上披露的,但没有文件的辅证。

④毛泽东:《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毛泽东集》第3卷,日本,1970年出版,第13—15页。

⑤《广州新闻》与《每日太阳报》,刊登了广州政府要求蒋介石辞职的官方通电。美国国务院793.94/1866号文件,美国驻穗领事发于1931年9月18日至24日间。

⑥安德鲁·J·内森:《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53卷,1973年1—3月。

⑦绪方:《在满洲的挑战》,第64页。

⑧同上,第71、72页。R.巴西特:《民主与外交政策》,伦敦,朗曼出版社,1952年版,第31、38页。

⑨《华北论坛》,1931年10月20日,第88页。

⑩美国国务院793.94—2563号文件,美国总领事J.W.巴兰坦10月15日的报告。另见英国领事1931年10月11日发给驻北平公使兰普森的报告,《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8卷,第613号。《华北论坛》,1931年9月3日,第13页,1931年10月13日,第13页。

⑪美国国务院793.94/2562号文件,载于1931年10月12日发自巴兰坦总领事的报告。

⑫陈友仁与英国外交官英格拉姆·派克的讨论纪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9卷,第90号,附件1。

⑬《华南晨邮》,1931年9月29日,第12页,援引自9月28日的《广州新闻》。

⑭《新闻报》,1931年10月7日,第8页。

⑮波多几彦:《昭和史的军人们》,第89—101页。《东京的战犯审判》,第1卷,第1900—2000、2002、2015、2095页。吉桥:《奉天的阴谋》,第48页。绪方:《在满洲的挑战》,第59页,脚注26。田中隆吉:《上海事变始末》另册治论,第5卷,1956年12月,第181—186页。岛田:《战争的漫延,1931—1932年》,《日本的爆发》,第296、307页(根据1962年版)。古谷:《蒋介石》,第349页。台北和北京的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都承认有这种联系(根据1984年在北京与李新的会见)。

⑯《华北论坛》,1931年10月27日,第119页。

⑰岛田:《战争的漫延》,第288页。

⑱同上,第120页。《华北论坛》,1931年10月27日,第119页。

⑲美国国务院793.94/2397号文件,发自上海。巴兰坦领事写的《广州邮报》第46号通报,1931年11月2日。

⑤美国国务院893.00号文件,《上海邮报》第41号通报;《广州邮报》第47号通报。《华北论坛》1931年11月3日,第153页;1932年1月26日,并载有陈友仁的辞职信。

⑥《华北论坛》,1931年11月3日,第154页。

⑦《满洲秘密日记》,1931年11月8日—16日的逐日报告,第2卷,第1、2页;在审判土肥原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材料里引用的证词,美国国家档案馆,军事档案部。日本驻天津领事桑岛给币原外相的报告,《东京的战犯审判》,第4394—4397页。岛田:《战事的漫延》,第290—291页。

⑧赖泽汉:《广东分裂主义运动的起源与发展》,第147—148页,152页。《华南晨邮》,1931年11月26日,12月2日,发自广州。美国领事发《广州邮报》第47号通报,1931年12月3日,893.00。

⑨《华北论坛》,1931年12月8日,第334页。

⑩日本驻北平外交官矢野11月26日发给币原外相的电报,收入《东京的战犯审判》,第2卷,第4401页,物证第303号。1931年11月27日,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发回华盛顿的报告,美国国务院793.94/2634号文件。

⑪绪方:《在满洲的挑战》,第114页,引用了片仓发自奉天司令部的日记,其中否定了土肥原参与策划第二次天津事件。岛田:《战事的漫延》,第290—295页,披露了天津城防司令实际上是自作主张。

⑫南次郎与当时的若槻首相关于撤退命令的证词,《东京战犯审判》,第1卷,第1568—1569页,19786—19787页,19835页。

⑬《国闻周报》,1931年12月14日。《华北论坛》,1931年12月8日,第332页。

⑭日本驻沪海军武官北陆1931年12月10日的报告,海军档案R27(F36774),“公文—外事”1931年,电报第212号;北陆1931年12月11日的第216号电报。1931年12月24日,美国驻宁副领事韦尔士的电报,题为《12月18日至24日的学生活动》,美国国务院793.94/3810号文件。英国驻北平公使兰普森1932年发回外交部的报告,《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辑,第9卷,第89号。1980年在台北对1931年上海学生运动参与者道白泉(Dao Baiquan,音译)和莫宣原(Mo Xuanyuan,音译)的采访也证实了以上情况。

⑮《日本广告商报》,1931年12月16日,第1版,发自南京;《每日报》,1931年12月12日,第1版,发自南京。《华北论坛》,1931年12月22日,第404页,详细记述了12月15日南京发生的情况。美国外交部文件,793.94/3810号文件,1931年12月24日发自南京。

⑯《华北论坛》,1931年12月29日,第441页。《中国周报》,1931年12月29日,第113页。广车派成员马超君(Ma Chao jun,音译)1966年曾在台北接受采访,马在广东派胜利后曾出任南京市市长;马又系《中国劳工运动史》一书的作者(台北,《劳工福利》,

1959年版),该书第3卷,第1056—1059页。帕克斯·柯布尔在《上海资本家和国民政府,1927—1937》一书中描述过这次斗争。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7、98页。

⑦⑧ 岛田:《战事的漫延》,第296—298页。皮蒂:《石原莞尔》,第156页,引用石原莞尔的话。

⑦⑨ 荒木贞夫的证词,《东京的战犯审判》,第12卷,第28305—28308页;第12卷,第15843页。加强满洲控制的资金获得批准,使锦州和北满的战役得到战术支援。

⑦⑩ 《华北论坛》,1931年12月29日,电文开头是12月22日发自奉天。荒木的证词,《东京的战犯审判》,第12卷,第15、843页,起诉文件2220号。岛田:《战事的漫延》,第299页。

⑦⑪ 皮蒂:《石原莞尔》,第136页。

⑦⑫ 《国闻周报》,1932年1月1日。与会者之一黄郛的记述载于他的日记《黄英白先生年谱长编》,由沈云龙编辑,台北,联京出版社,1976年版,第462页。

⑦⑬ 《华北论坛》,1931年12月29日,第348页,通过国民新闻社。

⑦⑭ 陈友仁1932年1月9日对英国驻宁领事英格拉姆和派克作的解释,《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9卷,第90—91号,1932年1月10日。《国闻周报》,1931年12月21日。《华北论坛》,1931年12月22日,第403页,12月16日发自南京。

⑦⑮ 《华南晨邮》,1931年12月28日,第14页。

⑦⑯ 岛田:《战事的漫延》,第301页,显然引用了片仓的日记。

⑦⑰ 《每日报》,1932年1月1日,第1版,发自南京的特电。日本驻北平公使M·兰普森1932年1月16日发回伦敦的报告,《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辑,第9卷,第89号。

⑦⑱ 1931年12月30日美国武官坦尼发自北平的分析报告,美国国务院793.94/3448号文件。岛田:《战事的漫延》,第302页,他对张学良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放弃了锦州提出了疑问。

⑦⑲ 美国总领事W·派克1931年12月22日在南京与政府代表和张学良的总顾问W·H·唐纳德的会晤,美国国务院文件793.94/3588号文件。

⑦⑳ 坂垣:《时局分析》,1932年初,绀方:《在满洲的挑战》,第691—170页中引用。

(译自《中国季刊》,1937年3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日中战争*

〔日〕藤原 彰

解莉莉 译 张惠才 校

我的报告想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日中战争，论述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太平洋战争与日中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连续性，是日中战争的延伸。第二，在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意识中，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依然存在着解决日中战争的重大课题。作为实例，举出1942年进攻重庆作战的设想。第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中国的战争依然在日本进行的战争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作为实例，举出1944、1945年的打通大陆作战。第四，在中国战场上的体验，是日本人的战场体验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在今天，这也是日本人对战争认识上的重要问题。

一、作为侵略中国延伸的太平洋战争

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战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41年12月以后，日本同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的战争，即太平洋战争。而且认为1931年以侵略中国东北为开端的日本同中国的战争，是与太平洋战争分开的另一场战争。日本战败的是同美国的战争，即太平洋战争，不是1931年爆发的同中国的战争。这也是严格审定历史教科书的文部省的考虑。然而，事实上太平洋战争是侵华战争的延伸，1941年后的对美战争是与侵华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系列战

* 本文是日本前一桥大学教授藤原 彰在1987年7月11日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

争的组成部分，把它看成另一场战争是没有看到日本的侵略战争本质。

按照日美战争与日中战争分开的观点，虽然反省日美战争是错误的，但是并没有对日中战争进行反省。岂止如此，不少右翼分子和旧军人还认为日本只败给了美国，没有败给中国。

曾在参谋本部和支那派遣军中身居要职的原陆军大佐堀场一雄，写了一部《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旧军人和自卫队有关人士把该书称作名著。书中有如下记述：“国策越山海关有支那事变，国策越镇南关有大东亚战争，盖于昭和10（1935）年6月以后进入北支，诱发支那事变，使满洲建设出破绽；又于昭和15（1940）年9月后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诱发大东亚战争，使支那事变出破绽。有满洲事变必招致支那事变，有支那事变则大东亚战争不可避免。此乃浅薄、徒劳反省之俗论。三者乃明显可分离者也。”^①

这种想法认为，如果只是“满洲事变”就此作罢，不搞“支那事变”就好了。那样，“满洲”理应属于日本，而“支那事变”未结束，又发动“大东亚战争”造成重大失败，使日本陷入战败的悲惨境地。这种想法里面没有对“侵略”的丝毫反省。此外，没有预料到被侵略的民族会抵抗侵略。这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出人意料的是在日本人当中认为日本如果在满洲事变后就此罢休多好的人为数甚多，审定教科书的思想也就是这一思路。不承认“侵略”也是来源于这种思想。

可是，对美开战是日中战争不可避免的结局。1937年后的4年间，日本的侵华战争成为日本近代史上空前长期、空前大规模的战争，使日本陷入根本无法预卜的泥潭。由于战争，兵力和军需品的消耗，国内经济的凋敝，国民生活的窘迫等日趋严重。因为企图通过侵略东南亚，获得资源来扭转这场战争的僵局，于是日美之间形成了对立。日美战争是日中战争的延伸和扩大。

在同中国的战争中，日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进而又同世界

上第一大美国宣战，这纯属一场“无谋的战争”。之所以如此鲁莽，是因为在日美谈判中，日本始终没有对美国的从中国撤军要求让步。1941年11月，日本面临要么从中国撤军，要么对美开战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最后日本决心对美开战，此中经纬今天无需赘述。在日中战争中未能取胜的日本，既不承认失败，又未能接受撤军，反而决心进一步扩大战争。

围绕着对美开战的最后对立，是发生在第三次近卫内阁的末期。1941年10月5日，陆军召开了部局长会议（参谋总部的部长与陆军省的主要局长出席的会议，它起着统一陆军意志的作用），取得一致意见：由于始终不能接受从中国撤军，日美谈判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因此，应当下决心对美开战。10月6日，陆海军召开部局长联席会议，可是会上，认为日美谈判没有指望达成协议的陆军同认为如果从中国撤军是有指望的海军发生了对立。10月7日，东条陆军大臣拜访了近卫首相，主张陆军原则上不接受从中国撤军。

10月13日，在近卫首相的别墅“荻外庄”举行的近卫首相、东条陆相、及川海相、丰田外相以及企划院总裁铃木参加的五人会谈，是一次最终决定“和”与“战”的重要会议。会上，东条主张：“驻军是陆军的生命，绝对不能让步。”由于这次会谈决裂，近卫内阁总辞职，东条内阁成立后，积极准备对美开战。

陆军的主张是绝对不从中国撤军，撤军等于战败。如果从中国撤军，将无法告慰在中国战场上阵亡的20万“英灵”。

在10月14日近卫内阁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东条陆相作了如下发言：“撤军是核心问题，不知诸位是如何考虑的，陆军认为这关系重大，假如屈服于美国的主张，支那事变的成果将毁于一旦，满洲国将险象环生，进而对朝鲜的统治也将岌岌可危。帝国鉴于圣战目的，不合并，不赔偿。支那事变造成数十万的战死者，以及数倍于此的遗族、数十万伤兵、数百万军队和1亿国民在战场及

内地历尽艰辛，耗费了数百亿的国家经费，如果是一般的国家自然提出割让领土的要求，然而，帝国以宽容态度处之。只有驻军才能使事变的成果得到巩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无需考虑对全世界的影响。”^②

持最强硬的开战论的陆军，主张开战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理由是从中国撤军问题。也就是说，绝对不从中国撤军，认为撤军等于承认日本在日中战争中战败，无言面对“英灵”与国民。日本不能在日中战争中取胜，就必然要发动太平洋战争。

二、进攻重庆的作战设想

由于1941年12月日本对美国、英国、荷兰开战，日中战争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但是，这对于日本来说，对中国战争的意义并没有减少。“解决”对中国的战争，结束中国的抗战，把战争引向胜利，依然是日本战争指导者的重大课题。

从御前会议的议题和次数来看，很显然，同中国的战争在日本的国策中占有最大的比重。自1937年11月20日设立大本营以后，决定最重要的国策都是在天皇御驾亲临的御前会议上作出的。1938年1月11日召开的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同年6月15日，在只有大本营人员参加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决定了武汉作战和广东作战。同年11月30日的第三次会议，决定了“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1940年11月13日的第四次会议决定了“日华基本条约”。1941年7月2日召开的第五次御前会议，决定了“不惜对美英作战”。9月6日的会议决定以10月下旬为期限，完成战争准备。11月5日的会议决定“决心于12月上旬发动武力进攻”。12月1日的会议决定开战。到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频繁地召开了第五次至第八次御前会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召开了八次御前会议，但是中国问题依然是议题的中心。这八次会议是：1942年12月21日，第九次御前

会议决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的支那处理根本方针”。1943年5月31日，第十次御前会议决定“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1943年9月30日，第十一次御前会议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此后，随着战局的日益窘迫，1944年8月19日、1945年6月8日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以及1945年8月9日、1945年8月14日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御前会议。对美开战后，共召开了八次。

其中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会议，都是关于制定解决日中战争策略的会议。即使在对美战争深化之后召开的第十一次会议的决定中，也写进了期待解决日中战争的内容。这表明解决日中战争对于战争指导者来说是何等须臾不可忽视的。

但是很显然，日本早已丧失了粉碎中国的抗战、在军事上解决日中战争的主动权。1938年武汉作战结束后，转入长期持久战。日本之所以采取“战局不扩大”的战略方针，是因为无法预测需要多大的兵力才能继续向中国的腹地进攻，而且进攻到哪里才能让中国屈服还是个未知数。武汉陷落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仍然坚持抗战，汪兆铭傀儡政权的建立也几乎没有动摇中国的抗战体制。虽然日本陆军向中国战场投入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兵力，但却未能找到武力解决战争的良策。这种情况即使通过对美作战，也没有变化。

日本的战争指导者十分重视解决日中战争，但又未能找到适当的军事手段，而且维持已经占领的地盘已属不易，这就是武汉作战后到1942年初的真实情况。因此，“战局不扩大”便成为日本的基本方针。

然而，从1942年初起，由于看到了初期的南方作战进展顺利，于是大本营和支那派遣军突然产生完全改变上述基本方针，向国民政府的首都所在地——中国腹地四川重庆大举进攻的设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陆海军兵力总动员，进一步强化国内

战时体制的情况下，南方作战将顺利结束，因此需要大举增兵和进行总动员，向中国腹地进攻的设想，骤然间具体化了。

本来，在陆军中并非根本没有进攻重庆的设想，岂止如此，天皇本身也期待着对重庆作战。1940年11月30日，天皇曾质问杉山参谋总长：“不能进入重庆吗？”^③1941年3月2日，当新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拜谒天皇时，在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天皇曾质问他：“可以对重庆采取积极的行动吗？”对此，畑答道：“对重庆采取积极的行动，在兵力方面还有困难。”^④畑本人自就任总司令官以来，反对南方作战，似乎主张对中国积极作战，他指示在派遣军总司令部内积极研究进攻重庆的作战方案。就在畑就任总司令官之后的1942年7月，积极主张进攻中国腹地的北支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指示在方面军司令部内研究渡过黄河，攻占陕西省西安，进而攻入四川省的作战。杉山参谋总长和大本营陆军部作战课长服部贞四郎大佐也同畑一样积极主张进攻重庆。实际上，从1941年初起，就有了向重庆进攻的气氛。1942年1月初，南方作战初见眉目时，杉山就指示服部作战课长研究重庆作战。

南方作战的成功，也使天皇倾向于积极主战。1942年2月9日，杉山参谋总长提呈作战的奏折时，天皇质问：“重庆政权似乎日趋衰弱，但阎锡山是否也朝这一方向发展？其后的局势将会如何？”^⑤

杉山在1942年3月19日就今后的作战指导一事上奏天皇时，表明要对中国开展积极的进攻作战：“本职认为在整个形势，特别是对苏形势许可的情况下，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当机立断地处理支那事变，图谋尽快解决之。”^⑥

此后，杉山视察南方，归途中于4月6日到达上海，与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举行了会谈。据说杉山对畑表示了个人看法，认为应当于今年冬至明年实行重庆作战，畑也强调了此事的必要性^⑦。天皇于5月29日质问杉山：“你不能想个办法解决支那事变

吗？”示意积极作战^⑧。

在这一阶段，进攻重庆作战仅限于研究阶段。可是，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的战败，成为太平洋战局的转折点。与太平洋方面的僵局不同，德国的隆美尔军在北非方面正逼近苏伊士运河，引起世人的关注。日本甚至研究了企图与德国的东进相呼应，将兵力集中到印度方面，以便打开局面的设想。但是，进攻印度需要庞大的陆军兵力，无论如何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取而代之，匆忙决定进攻重庆作战（也称四川作战）。

1942年8月25日，大本营陆军部发出“根据目前形势，陆军应准备作战”的指示。其中，关于中国方面的作战问题，首次指示准备四川作战。其理由是：“现在，应当给重庆政权抗战的原动力中央军以沉重打击，同时向拥有敌方军需生产力的二分之一，培养与补给战斗力的最大据点，引进保存美国航空战斗力的最大基地的四川发起进攻，摧毁重庆政权抗战的根据地，如能确保如此，就有极大可能使敌屈服”^⑨。其作战目的，显而易见。

1942年秋，大本营决定实施进攻四川省、攻占重庆的积极作战设想。

可以说这个进攻重庆作战计划，表现出日本对日中战争的焦急。但是，无论从兵力上看，还是从补给上看，重庆作战都是一场不现实的作战。同时表现出日本无视中国的抗战力量。

另外，可以说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也没有抓住中心。德国隆美尔军队由于给养供不上，1942年下半年开始撤退。在太平洋方面，美军于8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这对后来的战局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而大本营对美军的反攻几乎没有给予重视，就制定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

1942年9月，日本的大本营制定了这样一个空前规模的大作战计划，也就是进攻重庆的计划，足以说明对形势的认识过于肤浅。似乎可以说，该计划无论对世界战局的趋势和美军的反攻能

力，还是对中国的抗战能力和当地的兵要地志，还有自己部队的给养运输能力，都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然而即便如此勉强，以天皇为首的陆军首脑部还一定要冒险发动这场作战，这恰恰说明了对中国战争的负担沉重，日本为结束战争而焦急。也就是说，对于日本的战争指导者来说，解决日中战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打通大陆的作战计划与实施

刚刚开始准备的进攻重庆作战（密称5号作战），顷刻间遇到了障碍，因此不得不中止。这个障碍就是瓜达尔卡纳尔以后的太平洋战线告急。与此同时，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失败，美英联合军在北非登陆，使战局发生了变化。大本营于1942年10月指示作战延期，12月又命令中止作战准备。

但是，支那派遣军并没有放弃进攻作战的计划。1943年8月，又制定了打通黄河大铁桥至汉口的京汉线的作战计划。然而，限于兵力和资材不足，加之南方战局恶化，大本营没有批准打通京汉线的作战计划。进入1944年，形势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在中国的战场上，日本陆军决定实施最大规模的作战。

美国空军在中国设立了基地，1943年11月江西省遂川基地的B25空袭了台湾的新竹。1944年又配备了空中堡垒B29，于1944年6月自四川省的成都基地起飞轰炸了北九州。日本根本不具备粉碎美军航空基地轰炸活动的空军力量，因此产生了从陆地徒步进攻美国空军基地桂林、柳州、遂川、赣州等地的设想。

进入1943年，由于美国潜艇的活动，日本本土和南方各地之间的海上交通处于断绝状态，日本对此毫无办法，于是产生了靠陆上联络确保与南方沟通的设想。即打通京汉线、粤汉线、湘桂线，利用铁路将釜山至朝鲜、经满洲把法属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连结起来，这在地图上看是个宏伟的计划。1943年

12月，大本营对这一计划实施了图上演习。即便铁路器材有1/2或2/3是用掠夺来的材料，但是贯通3000公里铁路所需要的铁轨、机车、货车等也必须拆卸挪用其他方面的。

1944年1月4日，派遣军制定了“1号作战计划大纲案”（1号作战是打通大陆作战的密称），其作战目的有三：“1.消灭空军基地；2.确保与南方的陆上交通；3.打击重庆政权。”作战要领如下：“1，4月下旬，以4个师团和1个坦克师团的兵力，从黄河畔展开攻势，打通京汉线；2，6月下旬，以8个师团的兵力，从湘江东西地区展开攻势，占领长沙、衡阳一带；3，7月下旬，以5个师团的兵力从衡阳，2个师团的兵力从广东，2个师团的兵力从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展开攻势，占领桂林、柳州；4，9月下旬，以3个师团的兵力，打通南部粤汉线。”^⑩但是，由于南方战局告急，这个庞大的作战计划所需的器材和军需品的调配终于化为泡影。

同年1月24日，大本营命令支那派遣军实施1号作战计划。要求支那派遣军削除从北部法属印度支那作战的计划方案，而且作战目的定为消灭空军基地^⑩。这就是说，这次作战的第一阶段从1944年4月开始，这就是京汉作战，北支那方面军用以4个师团为基干的第12军占领并确保黄河以南、南部京汉线沿线地带，同时以部分兵力经武汉地区，转向湘桂作战方面；第二阶段是湘桂作战，从1944年6月起，以第11军的主力（7、8两个师团为基干）从武汉地区开始作战，进而用以2个师团为基干的第23军，从7、8月起在广东地区开始作战，攻占桂林及柳州一带，占领并确保粤汉线、湘桂线沿线地区。继而以部分兵力破坏江西省遂川、广东省南雄附近的机场群的作战，并攻占南宁一带，打通并确保桂林、谅山通道。

为实施此作战计划，除从关东军调来1个师团外，还增加许多兵站部队和航空部队。为弥补参加进攻作战部队的不足，又新设立了众多的警备部队。准备的军需品的数量也十分巨大，对于战

争末期的陆军来说，这是最大规模的作战。

1944年4月17日，渡过黄河开始实施京汉作战，5月9日打通了京汉线，5月25日占领了古都洛阳，至此告一段落。接着，5月29日，从武汉地区开始实施的湘桂作战，在衡阳周围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但在8月8日占领衡阳，并转入第二阶段作战，11月10日占领桂林和柳州。1945年1月19日，开始实施打通粤汉线与占领遂川、南雄等机场的作战，至2月上旬，基本上完成了计划。1944年11月12日，桂林陷落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白皮书》是这样评价的：“与此同时，东部中国全线已崩溃。认为日军虽想攻占重庆以及美军重要基地昆明，但却缺乏实力的说法是不足为信的。”^②

可是，这种判断是对日本军事力量过高的评价。日本军队不仅没有把打通大陆作战再发展为进攻四川作战的余力，而且也无法实现打通大陆作战的任何一个目的。在作战的最后阶段，日本的战斗能力已经枯竭，第一线部队的给养中断，弹药和粮食奇缺，伤病员不断增加，没有药品，人员的补充也远远跟不上。

作战目的之一的打通京汉线和粤汉线，由于中国方面对铁路和公路的彻底破坏，日本方面又缺乏机械和资材，因此即便占领了部分地区，也根本无法打通交通线。作为补给线，日军只好利用扬子江、湘江等水路来取代铁路和公路。但这也由于美国空军的袭击几乎陷入瘫痪状态。给养断绝的第一线部队，士气低落，已经丧失了实施更大规模作战的能力。

作为第二个作战目的，实际作战开始后成为唯一目的的消灭美国空军基地，也未能实现。1944年11月，日军占领了桂林、柳州，1945年2月占领了遂川、赣州的飞机场，但那时美军的踪影全无。B29代替B25成为远距离轰炸的主力后，美国空军在中国的基地已经转移到中国腹地的成都周围，随着马里亚纳基地启用后，在1944年下半年，大部分美国空军基地都撤离了中国。日军花费

一年多时间，以10万多死伤者为代价夺取的飞机场变成一个空架子，它已毫无战略意义。

作为第三个作战目的考虑的应付印度和缅甸方面联合军的攻势，也已经没有意义。继马里亚纳之后，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已经可以通过太平洋择近路向日本进攻，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支那派遣军又不得不准备阻止美军从上海和广东地区登陆。

这样，打通大陆作战虽然在15年战争期间是日本陆军的最大规模的作战，然而并没有达到其目的。太平洋战争局势告急时，打通大陆作战在战争全局中几乎丧失了任何意义。可是，为了这一作战，日本军队不仅损失惨重，而且把中国的腹地河南、湖南、江西、广西各省广大地区卷入战场，造成莫大的杀戮与破坏。在这一点上，只不过是增加了无谓的战争牺牲罢了。然而，这似乎可以证明，在大战末期的这一阶段，日军计划并实施了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对于日本的战争指导者来说，对中国战争所占的比重是何等重大。

四、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上的体验

对于日本的战争指导者们来说，“解决支那事变”，即卸掉日中战争的沉重负担，是经常关心的大问题。特别是对于大部分兵力都被中国战场牵制的日本陆军来说，最大的课题莫过于“解决”日中战争。但是，对于一般国民来讲，在珍珠港事件后，好像由关心中国的战争转移到关心太平洋上的战争了。报纸也大肆报道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战果，与此相比，对中国战场上的报道就相对少得多，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如果从日本人在战场上的体验来看，中国战场直到战争末期都是最大的战场，这确实是事实。

如上所述，可以说在对美开战后，中国战线对于日本陆军来说，仍然是投入兵力的主战场。虽说曾计划抽出兵力派往南方，逐渐减少兵力，但在中国战场上差不多常常配备近百万的大军。

1945年8月15日战败时，支那派遣军的25个师团、33个独立混成旅团、13个独立警备队、2个坦克师团、1个飞行师团以及其他部队，战后返回日本本土的总人数达105万^⑧。此外，海军方面，在支那方面舰队下有第2派遣支舰队、海南警备府及其他部队，兵力约73000人^⑨。

同中国的战争不仅时间长，而且不断反复，兵力的补充与交替频繁，因此，具有在中国战场上体验的人数也理所当然是最多的。而且，在南方战场上，大部分参战者都战死、病死、或饿死，生还者甚少，而从中国战场上归还的人，包括中途回来的，大部分都是中国战场上的从军者。也就是说，日本的大多数战争体验者，都有作为在中国的侵略军士兵的加害者的体验。

以审定教科书为契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残暴行为，以及作为加害者的责任便成了问题。但是，人们却不愿意谈论作为加害者的体验，甚至对翻出这些老帐感到厌恶。

1984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纪念日那天，《朝日新闻》刊载了我的《日中战争与现代》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是日本把8月5日作为终战日纪念，并提出战争的被害。然而，日本也应该纪念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9月18日，应该把这一天作为加深这场战争加害者的反省的一天。可是，文章发表后，也许因为《朝日新闻》发行量大的缘故，很多参加过战争的人和右翼分子给我和我们大学寄来不少恐吓信。大部分恐吓信的内容不外是：那场战争是正确的；打仗嘛，必然有损失；怎么能说日本是加害者呢？没有丝毫的反省之意。关于南京大屠杀，还有人写文章加以否定。不仅如此，对有勇气坦白加害事实的人横加威胁，这就是实际情况。

作为日本人，这决不是愉快的事情。然而，历史事实是无法消除的，应该把事实准确地告诉人们，而且需要把事情的原因研究清楚。正因为许多日本人是战争的参与者，就更应该弄清侵略

战争的史实以及在其中作为加害者的实际体验。这才是通向和平与友好之路。

注释：

①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738页，时事通信社1962年版。

②参谋本部编：《杉山笔记——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等笔记—上》第349、350页，原书房1967年版。

③⑤同上，第156页。

④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香港长沙作战》第350页，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

⑥⑦⑧⑨《战史丛书·昭和17、18年的支那派遣军》第15、33、51页，1971年版。

⑩⑪《战史丛书·1号作战（1）河南会战》第24—25、34—35页，1967年版。

⑫美国国务院：《中国白皮书》第90页，朝日新闻社1949年版。

⑬《战史丛书·昭和20年的支那派遣军（2）》第583页，1973年版。

⑭《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第469页，1975年版。

现代中国对陈独秀的研究

〔日〕横山宏章

韩凤琴 张惠才 译

译者按：本文译自日本《中国研究》杂志1981年11月号。作者横山宏章，系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副教授，他于1981年3月来华访问，并在我国进行了4个月的学术交流活动，他的研究课题是陈独秀问题。作者认为，中国自1979年以后，“对陈独秀的研究迅速高涨起来”，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形势。作者在文章中按着不同的历史时期，介绍了我国国内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发表了他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前 言

“您这次来我国访问算是赶上了好时候，若在三年前，我们之间是无法就陈独秀问题进行学术交流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还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余绳武在欢迎我的宴会上讲的话。确实如此。

我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有幸从1981年3月起，用了4个月时间，主要以上海为中心，进行了学术研究活动。我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1879年—1942年）。到中国后，首先使我感到意外的是1979年以后，对陈独秀的研究迅速高涨起来。我翻阅了上海图书馆发行的《全国报刊索引》，又在北京图书馆的邢淑贤女士协助下，调查了1979年以后发表的研究陈独

秀的论文，其数量之多，令人吃惊。仅已看到的论文，就超过100篇。解除了对陈独秀研究的禁令，真好似洪水决堤，各式各样的论文相继发表了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其特点是：不仅论文的数量多，而且研究者的人数也多；不仅是区域广大，北起黑龙江，南至广西，西至新疆地区，而且论文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对以前评价陈独秀的定论提出异议，当然也有对立的观点，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陈独秀是领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方面，有很大的功绩。然而，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对他却是完全否定的。其原因是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领导共产党进行的国民大革命（1924年至1927年），由于蒋介石的反革命而失败，其责任应归于陈独秀的错误的政治路线。

后来，陈独秀成了托派，被共产党开除了。他批判瞿秋白、李立三等党中央的政策，同时也反对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因此，陈独秀作为堕落的革命家成了反面教员。他的革命功绩完全从共产党的历史中抹煞掉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独秀被全盘否定，只强调他的错误，就连在新文化运动到建党这段时期的功绩也被否定了。

1979年以后出现的研究陈独秀的高潮，其特点在于：不仅想把文化大革命时期歪曲的解释恢复过来，而且一些文章指出了在党史解释上的错误。可以说现在才开始正式地把聚光灯照射在被从党史中抹煞掉的陈独秀的经历上。所以，这与仅在文革中被否定的瞿秋白和刘少奇等人的恢复名誉，有着本质的区别。

不过，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重新评价陈独秀，可能含有“毒素”。对陈独秀的过分评价，当然要与全面地重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与批判毛泽东革命联系起来。因此，现在进行

的对陈独秀的评价，能做到何种程度，党在何种程度上予以承认，这不能不与共产党目前推行的“百花齐放”政策和民主化的实质联系起来。迄今为止，给陈独秀“恢复名誉”仅限于学术界，党对历史的正式解释尚未公布于世。这件事孕育着一种危险，即学术界为陈独秀“恢复名誉”的要求，不知何时被否定。

三次学术讨论会

1979年，是开始正式地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年。在学术界也出现了纠正文化大革命过分歪曲历史的动向，尤其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研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作为这种动向的一部分，开始了对陈独秀的重新研究。

1979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并举办了评价陈独秀等历史人物的讨论会。关于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以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变化，即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到共产党建立时期的评价为讨论的中心。据说有三种评价^①。

第一种评价：〔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突破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旧壳，成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第二种评价：〔陈独秀〕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但世界观仍是资产阶级的，他看不见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第三种评价：陈独秀这个时期的思想虽然有所前进，但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

尽管陈独秀作为评价的对象，受到极大限制，但并没有强行统一不同见解，而是分别加以介绍，明确对立观点。这大概是一大进步吧。

同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也以评价陈独秀为课题。讨论会改变了过去那种犯了

一次错误，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应从历史的、科学的观点出发，正确地评价陈独秀的功绩。因此，首先高度地评价了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活动和思想，肯定了他的功绩。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其后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方面做出了贡献^②。

在中国确立对五四时期陈独秀的积极评价，是从这次学术讨论会之后。当然，也还有不少人认为在大革命的末期，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样，把犯有这种错误的陈独秀评价为马克思主义者，便成了问题。同上次讨论会一样，这次也出现了分歧意见。

同年12月，又在上海召开了陈独秀问题讨论会。在陈独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种说法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种说法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种说法是，应该正确地评价陈独秀，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据说大体有这么三种意见^③。

在1979年召开的三次学术讨论会上，正式地提出了重新评价陈独秀的问题，试图分清功过，对凡能作出评价的问题，作出正确的评价。只是中心议题仍然停留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到建党时期的陈独秀的评价上。尽管如此，当学术界一正式地提出了陈独秀的问题，各地便一齐开始了对陈独秀的研究，而且接连不断地发表了研究论文，研究的内容也不限于新文化运动到建党时期，而是开始了重新研究陈独秀的整个生涯。就是说，出现了全面地重新研究和重新评价陈独秀的形势。

1979年发表的论文，多数还是以五四运动前后的陈独秀为中心。当然这与那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有关系，还因为对陈独秀在五四时期作用的肯定早有定论，因此很多研究人员可以放心大胆地论述陈独秀在这个时期的历史作用。

最先明确地对陈独秀做出全面评价的，是林茂生、王树棣、

王洪模三人于1979年5月发表的《略谈陈独秀》一文^④。因为它有一定的代表性，想作一介绍。但文章仅谈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陈独秀，并没有涉及他的早期思想。

他们反对林彪、四人帮之流随意篡改历史，“把陈独秀简单地说成‘是混入党内的蒋介石的帮凶’”这类说法，整理了对陈独秀一生各个阶段的评价。内容涉及许多方面，但标题是对各个时期评价的归结，这里作一介绍。

(1)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思想界的明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2) 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建党时期）；

(3) 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取消主义者（大革命时期）；

(4) 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叛徒（托派时期）。

很显然，前面的（1）和（2）是高度评价的，而后面的（3）和（4）是否定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一个从前进到倒退，从革命到反革命，从起积极作用到起消极的和反动作用的历史人物。”

老实说，这种见解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反对了“四人帮”那种否定陈独秀全部功绩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党的见解。特别是对陈独秀在（3）和（4）时期的评价，只不过是原封不动地沿袭了以前党承认的党史上阐明的主张。

但是，到1980年，对这种正统（？）解释相继提出了不同看法，对陈独秀的研究工作也就活跃了起来。过去作为禁忌的领域、见解和资料出现了，开始看到了试图按照各个时期，更为积极地评价陈独秀的见解，甚至出现了带有批判以前被视为绝对的毛泽东的见解的论文。

100多篇论文不能全部涉及，有不少论文中的观点属于少数人的看法。对于许多正统解释的论文，这里不作过多介绍。特别

想介绍少数人的看法，因为那是向定论挑战的，可能有独到之处，这些见解，以前在中国是见不到的。我想通过对它的介绍，可以深刻地表现出现在的中国史学界的一个侧面。

这些论文涉及到了陈独秀的整个生涯，我想按不同时期进行研究。按照中国人的说法，陈独秀的生涯，是很复杂的，他的革命思想是不断变化的。是否可以看作是发展的，还是个难题，不过无疑是变化很大。他有一个时期曾与康有为共鸣，但其后变成了反对清朝的爱国主义者。辛亥革命后，作为西欧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而活动。后来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了共产党。大革命后，成了托派，反对党中央，但他在晚年支持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这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苦恼的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它确实是很珍贵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用一刀两断的方法简单地评价这个复杂的过程，只能把每个阶段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

清末时期的陈独秀

陈独秀于1879年生于安徽省安庆。在世代教书的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但幼年时期家境贫寒。在祖父的指导下，6岁开始读书，17岁在县的科举考试中，中了头榜，取得秀才资格。但是其后，他目睹了官吏的腐败，对传统的八股文的科举考试，感到厌恶，于是放弃了下一步的乡试，选择了学习西方学问之路，一个时期曾被康有为等人的改良主义所吸引。1902年留学日本，结识了许多革命活动家，在日本，与张继、邹容等人惹起了事端，被责令回国。1903年，在安庆结成爱国学社，在批判俄国侵略东北的同时，表明了反清立场。1904年，为了将自己的主张告诉大众，发行了白话文的《安徽俗话报》，围绕列强侵略中国和封建制度的罪恶，展开了攻击性辩论。

他又组织了反清革命的秘密结社——岳王会，任会长，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岳王会的柏文蔚就任安徽都督，陈独秀就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兼安徽师范学堂校长。由于二次革命的失败，陈独秀辞职，其后便开始激烈地批判袁世凯。

关于清末时期年轻的陈独秀的活动，过去几乎没有进行研究。这可能是由于资料缺乏和陈独秀的活动在全国引起注意是在《新青年》杂志创刊之后的缘故吧。以前陈独秀亲手执笔的《实庵自传》和章士钊、苏曼殊与他一起活动的记录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最近，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陈独秀编辑的《安徽俗话报》（共计22期，1904年3月至1905年9月），使对陈独秀的早期思想的解释走上了正轨。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大体上确立了他的早期思想。他不仅谴责俄国侵略中国的东三省，而且对列强开发和支配安徽省的天然资源提出了警告。就是说，为了反抗外国的侵略，避免亡国的道路，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管理资源，利用资源，振兴产业，恢复主权，建立独立富强的国家（《亡国论》）。而且也为中国社会依然受传统的习惯（稀奇古怪的恶习）所束缚感到气愤，他说，“这种恶习，实在害人不浅”，表示要与传统思想决裂（《恶俗论》）。这里仿佛可以看到他后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活动的源泉。

发现《安徽俗话报》的任建树，在他的《论陈独秀早期革命民主思想》^①中，将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思想与著名的邹容和陈天华相比，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作出了如下的结论：“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中，用‘三爱’的笔名写了大量的评论、诗歌和小说。主题广泛，形式丰富多彩。文笔流畅如流水，生动活泼且通俗有趣。他那漫谈式的语言，采用了白话文形式，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戏曲等各方面。与这多种多样的主题和形式

相统一的思想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反帝、爱国’，贯穿于二者之间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任建树还著有《陈独秀和〈安徽俗话报〉》^⑥。

陈独秀的原籍和出生地，也常作为课题进行研究。陈独秀是笔名，取于安徽省怀宁县的独秀山。原籍不在独秀山脚下，而是现在属于安庆市的原怀宁县广圩。出生地是安庆北门。目前，安徽省的有关研究机关正在就陈独秀青少年时代的活动进行调查。王开玉的《关于陈独秀生平、家世和在安徽活动的几点补证》^⑦，较为详细。幼年时代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已由沈寂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⑧一文中作了整理。该书对他的家族和亲属讲得很详尽，而且对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的记忆错误，也根据资料作了订正。

关于对陈独秀个人的回忆，他的儿子陈松年写了《回忆父亲陈独秀》^⑨，表弟濮清泉写了《我所知道的陈独秀》^⑩，包惠僧口述了《我所知道的陈独秀》^⑪。陈松年是陈独秀的第三个儿子，与哥哥陈延年、陈乔年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同，他没有参加革命。他于1932年在南京监狱第一次见到陈独秀，关于陈独秀的早期活动，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但是陈独秀死时他在场。我曾直接见到了陈松年，他向我详尽地谈了亲属关系。濮清泉与包惠僧都是托派，直到陈独秀的晚年，他们都在一起活动，因此，他们的回忆可以作为参考。包惠僧讲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况，濮清泉的文章作了全面的叙述，对托派的后期情况讲得较详细。

关于青年时期的问题，是留学日本时代的陈独秀的活动。陈独秀四次到日本，特别是1902年及1907年至1909年间，他在哪个学校，学习了多长时间，都不清楚。虽然有弘文学院、高等师范学校等说法，但了解得不够详细。不少中国人希望日本作出详细调查。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

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他对辛亥革命曾寄予很大期望，但最后期望化成了泡影。袁世凯成了独裁者，复辟了帝制，民主制徒具形式，不少人曾是辛亥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却在袁世凯手下做了官，走上了反动〔道路〕。深悟当时现状的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遭到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独夫袁世凯的反动政治，允许其存在的国民也有责任。制度即使变了，如果支持它的大众的意识不改变，革命也不会成功。于是陈独秀便着手于国民大众的意识革命了。

1915年，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按：创办时叫《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译者），集中了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当时的革新的知识分子，向统治中国思想界的封建思想，尤其是儒教统治发起了攻击。为把思想从知识分子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交给大众，开展了白话运动，倡导了文学革命。又将西欧进步的民主主义和科学的思想引进中国，提倡大众的意识变革。这一时期的陈独秀，确实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思想界的明星”。他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名气很大。当然，这个启蒙运动奠定了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

他试图以西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武器，破除中国封建的儒教思想。但是，可以实现这种民主主义思想的西欧国家，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会议上，无视中国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主张民族自决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承认了日本对中国的21条要求，背叛了期望实现民族自决的亚洲和非洲。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的思想又起了很大变化，甚至认识到了需要依靠现实力量进行变革，从而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方面。进入1920年，陈独秀迅速地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他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中心，培养马克思主

义者，同时开始从事实践活动。于是，在1921年，他与李大钊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担任第一任总书记。

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功绩是明显的。因此陈独秀在该时期的作用已很快地得到了重新认识，作出了明确的评价。围绕《新青年》和五四运动与陈独秀的关系发表的论文相当多，从各个方面论述了陈独秀的功绩，目前尚未发现很独特的论文。

侯新夷写的《试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是谁》^②一文，不仅批判了“四人帮”，而且也批判了过去的一般说法。华岗的《五四运动史》和石峻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对把鲁迅当作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代表这一点表示不满，同时也反对说《新青年》起了领导作用这种提法。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按照陈独秀的号令，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胜利展开的。”

刘孝良写的《陈独秀是反封建文学革命的先驱》^③一文，认为应该承认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的功绩，但是直到今天，反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为使“四人帮”的“封建的法西斯式的反革命专政”不再重演，必须进一步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

宁树藩写的《陈独秀与〈新青年〉》^④，对陈独秀编辑《新青年》的活动，作了详尽的介绍。文章强调在思想斗争方面很彻底的陈独秀，在政治斗争方面却完全是一个“妥协调和派”。这种评价与赵少荃写的《陈独秀的民主与独裁》^⑤一文中所说“陈独秀提倡民主，实行独裁。说的是民主，行的是独裁”的论点相同。但是不管怎么说，人们对《新青年》创刊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陈独秀在思想方面的作用和行动的评价是最高的。

如前所述，关于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意见不一致。张圻福写的《试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观》^⑥一文

认为，“陈独秀的这一转变是带根本性的，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是正确的，精辟的，他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种看法大概是对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最高评价，但多数人不同意。丁守和在《陈独秀与〈新青年〉》^④一文中指出，“陈独秀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中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不但表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肤浅和书呆子气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宣传过程中经常暴露出的改良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陈独秀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不难看出他后来堕落的某些思想根源。然而，也不能由此否认他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中的显著作用。”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在研究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问题上，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是把握陈独秀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认识的关键。然而，对这一问题很少有人从正面论述。目前只有王进的论文《陈独秀的“开明专制论”不是旧武器》^⑤。

此外，对当时陈独秀的研究，还有张影辉的《陈独秀第一次来武汉》^⑥，文中介绍了1920年4月仅四天的武汉讲演旅行。这篇论文是令人感兴趣的，它对了解当时陈独秀的思想和掌握资料，都有参考价值。

国民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任总书记，领导着共产党。

共产党初期的任务是保护仅由50名知识分子组成的小集团，免遭反革命的破坏，培育以工人为基础的战斗的先锋政党。当时，在中国已建立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这一革命政党。共产党为了壮大，必须具有在理论上和在组织上超出国民党的个性。共产党组织了国民党不关心的工人运动，在工人中间扩大了

影响，同时注意了作为阶级政党的纯洁性。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依据统一战线政策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合——国共合作向前发展了。从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这一立场出发，陈独秀反对国共合作，但共产国际的方针被强行贯彻。既然决定了国共合作，作为党的最高负责人就必须使其合法化。1923年，陈独秀发表了两篇有名的论文（《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主张对国民革命中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加强指导。在其基本点中，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的认识，即中国的无产阶级尚未发展起来，力量也弱，应该与资产阶级结为同盟，同时又要加强力量。后来，这两篇论文被当作无视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过高地估计资产阶级作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加以批判。

由于国共合作的建立，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取得了成果。国共合作下的广东国民党政府，扩大了势力，开始了北伐战争。于是国民革命高涨起来。然而，孙中山死后，蒋介石的军事统治加强了，共产党的活动开始受到了限制。陈独秀认为北伐战争的军事胜利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军事独裁的胜利，他请求共产国际取消国共合作方针。申诉恢复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但是这种要求被共产国际拒绝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在继续坚持着。在党内，陈独秀受到了支持过激的农民运动的毛泽东等的压力，处境困难。由于蒋介石的反共政变，共产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后来又把希望寄托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身上，但是失败了。1927年8月，陈独秀被指责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撤消了总书记职务。

与研究五四时期陈独秀的论文之多相比，这一时期的论文格外少。这也许与党史中对国民大革命（从前，统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近，有“大革命”这种提法）的评价有关。

作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有代表性的见解，想从上海出版的《中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②中做些摘录，书中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如下说明：“在客观上，……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在主观上，这是由于我党这时还处在幼年时期……，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懂得不多。因而，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王树棣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人之一——陈独秀生平》^③一文中指出“他的许多旧民主主义的观点逐渐显露出来，看不到蕴藏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革命力量，以致一步步地滑向了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与上述见解大致相同。这些观点与以前的党史解释没有变化。

对于这种正统的党史解释，有些论文并不是要全面地否定它，而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发表不同见解。首先介绍一下陈善学写的《评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④一文。他认为，“过去评论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往往是评功不足，论过有余，甚至有抹功加过之弊。从陈独秀连任五届党中央的总书记看，他是功大于过的。……这一时期的陈独秀是有功有过，而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过失并不是陈独秀一个人。”

他批判了以前将陈独秀在1923年发表的两篇论文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作这种定论。“我认为这两篇文章基本是好的，因为作者初步运用了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在许多问题的认识和论断上，应当说是符合实际的，因而也是正确的。”把陈独秀这两篇论文说成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这在以前是没有的。至少据我所知是这样。文章还针对他放弃了工农运动领导权的这种一般看法，断言“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后十分重视工农运动。”“他已经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那么，为什

么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呢？文章指出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造成的。人们批评陈独秀在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中与蒋介石妥协，作者认为“过去的说法……看来是颠倒了历史。”陈独秀曾主张反击蒋介石，可是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团却主张妥协。

陈善学论文的特点是，不仅对定论大胆地提出了不同看法，而且作为证实其观点的资料，利用了曾被当作托派人物的回忆和见解。关于此事，在我见到本人时，曾问过他，引用托派的材料不危险吗？他回答说，如果是事实，不管是谁讲的都没有问题。

关于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指导问题，日本和欧美各国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进展，相比之下中国是落后了。一位中国的研究人员向我们解释说，“因为对共产国际的研究牵涉到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所以以前是禁区。”可是，回避问题，总不是个办法。

对共产国际的研究取得进展后，自然要明确其指导上的错误。李淑的《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②一文从正面论述了这个问题：“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有失误，特别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对蒋介石、汪精卫估计过高，支持过多，成为导致北伐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共产国际的这种错误，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见解也反映在党史解释中。济南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③中有这样一段话：“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其本人应负主要责任外，也是与国际代表的某些错误指导与支持分不开的。”另外，关于共产国际问题，还有向青写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④。

当然，也有人反对说陈独秀的错误受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很大。许光振的《陈独秀的错误能都归之于共产国际吗？》^⑤就是一例。“他在1923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理论是不足为奇的。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这些言论是在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决议之前发表的，这也足以说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

并不是他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显然，他与陈善学的观点是对立的。

关于大革命时期，另一篇引人注目的论文是郭绪印的《重评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态度》^②，他将以前的定论扭了一百八十度。以前的定论认为，陈独秀的最大错误在于轻视农民运动，特别是在大革命后期，认为农民运动的高涨是“过火”行动而加以限制，以致造成了革命的失败。这是定论中的定论。它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的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过火”举动好得很有着密切的关系。对陈独秀路线的绝对否定，与毛泽东路线的绝对化有联系。

他认为，过去作为陈独秀轻视农民、否认农民革命性的根据，是《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的指责农民缺点的一节。但是，引用的只是陈独秀论述农民问题的前半部分，人们无视了论述农民运动重要性的后半部分，这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他说，“其实，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对农民的革命作用和农民运动的重要性，都有一系列较正确的论述。”极力主张在介绍陈独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的同时，应强调陈独秀是如何重视农民运动的。他认为被视为正统的党史解释之一的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③中阐述的“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一贯否认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农民的革命斗争”的见解，“不符合史实”。

下面是关于〔农民运动〕“过火”的问题。如何评价陈独秀把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的高涨当作“过火”行动加以限制这件事呢？过去的党史解释认为，〔陈独秀〕“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农民运动的污蔑”。郭绪印的论文否定了这种看法，他认为当时的湖南农民运动是脱离了解放农村生产力这一革命目的的极左的“过火”行动，指出在当时，对一般自耕农、小土地所有者与“土豪”之间的区分，含糊不清，处于混乱状态。由于共产党管制不周，未被管制的无秩序的农民大众走向要求平均主义

的极左方面，农村中出现了恐怖现象。而且超越了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开展了不交纳一切租税的运动。湖南农民协会的政策，又禁止大米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妨碍了正常的商品流通。结论是：“当时的农村大革命，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界限，扩大了打击面，也影响到一般小土地所有者的生产情绪，带来了经济上的某些困难。”他高度评价了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农民运动是“过火”行动而加以限制的陈独秀的政策是“尊重客观实际的”。

郭绪印的这篇论文，显然与今天评价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在大跃进之后的农村政策是平均主义的极“左”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除此之外，关于建党初期，还出版了《“一大”前后》^②这部书。书中收录了不少记录和回忆录，整理了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状况等，是一部珍贵的资料集。另外，关于总书记的职务是何时设置的这个问题，从韩泰华、牛桂云写的《陈独秀从何时称为总书记》^③一文看，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文章指出，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产生了中央局书记；在第二次及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是最高领导人；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产生了总书记。

托派时期的陈独秀

陈独秀在共产党的“八·七”会议上被免去了总书记职务，其后虽然以“撤翁”的笔名在党的机关杂志《布尔什维克》上连载短评，但已退出了政治活动，在上海从事语言学的研究。1929年，中国国民党政府企图收回苏联管理的中东铁路的主权，中苏之间围绕中东铁路问题产生了对立。中共中央提出了“拥护苏联”的口号。陈独秀反对这样做，并上书党中央，指出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不能得到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的支持，要求将口号改成“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的误国政策”。

此时，在莫斯科已成为托派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回国，陈独秀也详细地了解了托洛茨基的主张。他与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这种托洛茨基的主张相共鸣，转变成为托派。由于结成了“无产者社”这一组织，并开始了派别活动，因此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此后，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在对大革命进行总结的同时，与彭述之等人整理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正式开始了托派运动。1930年，共产国际邀请他去莫斯科，但他拒绝了，出版了机关杂志《无产者》，批判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当时，中国的托派组织分为四派，但在1931年统一了组织，以陈独秀为代表，并出版了机关杂志《火花》。

中国的托派运动是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但还没有怎样发展，陈独秀、彭述之等干部就于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了。翌年，在南京开庭，陈独秀被定为“利用文字进行叛国宣传”，判处13年徒刑。此后约5年的时间，是在狱中度过的，在那里他埋头于中国古代音韵和文字学的研究。

对托派时期的陈独秀的研究文章特别少。在苏联和中国等共产党看来，托洛茨基和从事托派运动的人是可恨的叛徒，“人民的敌人”。作为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林茂生等人将转变成托派的陈独秀评价为堕落成“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叛徒”。但是，如果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细心地研究资料，调查共产国际的错误，便不能将陈独秀转变成托派简单地归结为“堕落”。

关于中东路事件问题，郭绪印著有《评陈独秀给党中央的三封信》^⑩，文章认为陈独秀对大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的矛盾问题，在认识上有错误。但是文章强调指出，当时党中央提出的“拥护苏联”的口号是错误的。他支持陈独秀的立场，表述如下，“革命实践早已证明了陈独秀信中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宣传方法和关于发扬党内民主的意见是正确的。”郭绪印的论文，无论在谈到农民运

动问题，还是中东路事件，都认为陈独秀是正确的。可以说，这在中国是异端见解的代表。

关于托派时期的陈独秀问题，还有张巨浩写的《如何认识开除党籍后的陈独秀》^②和王易琳写的《陈独秀与托派》^③等文章。如前所述，在濮清泉的回忆录中也介绍了托派时期的活动。另外，好像还有黄纲鉴写的《中国托匪组织前期历史概况》^④、周仁生写的《中国早期托匪情况之三》^⑤以及《刘仁静谈托派问题》^⑥等文章，但至今尚未看到。

在张巨浩的论文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认为当时的托派运动不是“人民之敌”，而是“人民内部矛盾”。文章指出，“把托洛茨基集团定为敌对矛盾，那是1936年以后的事情。从时间上看，在陈独秀搞托派活动时，托洛茨基集团只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列宁主义的政治派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的托派还没有放弃反帝和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陈独秀搞托派时，那时的托派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王易琳论文的结论是，“陈独秀从开除党籍到被捕前，充当了托派的头目，进行了反共产国际和反中国共产党的托派活动；他在被捕期间和释放后，停止了托派组织的活动，但仍坚持其托派观点；过去传言他充当国民党特务，并非事实”。

晚年的陈独秀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开始全面地侵略中国，中国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8月，陈独秀等托派被释放。陈独秀从南京迁到武汉，又到重庆，最后在重庆附近的四川省江津定居。出狱后的陈独秀，与托派的组织活动断绝了关系。从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出发，支持抗日战争和共产党的通过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此时，陈独秀已丧失了政治影响力，但其名声依然很高。因此，共产党也希望陈独秀回到党内来。陈独秀方面

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反复地进行了交涉，但未能实现。共产党要求陈独秀公开发表全面否定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行动的声明，陈独秀感到为难。1938年初，康生在共产党机关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陈独秀是“日本的间谍”。因此，那种关系完全断绝了。陈独秀被攻击成从日本特务那里领取津贴的“汉奸”。

他在江津的生活十分贫困，依靠他在北京大学教过的学生们的资助，勉强地维持生活。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的同时，发表了对抗日战争的见解，但影响力很弱。而且，他对反法西斯斗争的展望充满着悲观。1942年5月，因患高血压，身体垮了，最后在江津凄惨地死去。

对于晚年的陈独秀的研究，除了张巨浩、王易琳的两篇论文外，还有孙其明写的《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的探讨》^⑦，张永通与刘传学合著的《我们对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点了解和认识》^⑧，杨荣华写的《评陈独秀在抗日时期的政治思想》^⑨以及夏立平写的《陈独秀能评定为“反革命”、“叛徒”吗？》^⑩等文章。另外，还有唐宝林著的《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问题》^⑪一文，但未能看到。

这些论文，都主张抗日战争时期的陈独秀不是“汉奸”。认为陈独秀是被日本特务收买的“汉奸”一说，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等人的造谣诬陷。按照张永通、刘传学合写的论文的说法，“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是比较倾向于同意陈独秀在承认错误的条件下回到延安。王明在1937年11月回国后，听到这个意见就火了。他说，我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斯大林正在反对托派，我们跟什么人都可以联合，就是不能同托派联合。陈独秀已是托陈取消派，他怎么能回到党内来呢？康生接着王明的调子，写文章大骂陈独秀是托匪、汉奸、间谍，还有什么领取日本津贴等造谣的话。”孙其明认为，这是王明和康生等人企图以陈独秀事件为借口，反对毛泽东同志等党中央的正确政策的“政治阴谋”。

对抗战时期的陈独秀的评价，意见是不一致的。张巨浩的论文是善意的，他认为“出狱后就脱离了托派；一贯坚持抗日立场，大体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对党还有感情。考虑所有这些因素，我们认为，陈独秀至少可算得一位民主人士。”然而，如前所述，林茂生等人却断言陈独秀是“叛徒”。张永通和刘传学合写的论文是中间态度，他们认为抗战初期比较活跃，但后期转为消极、颓废。文章指出，“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的前途和国际形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坚持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最后为人民革命的洪流所淹没。”另外，该论文是在他们去江津和安徽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会见了很多有关人员之后写的，文章相当详尽地再现了当时陈独秀的活动。

结 束 语

陈独秀的思想和实践活动是不断变化着的，很难用一句话来评价。在武汉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学者说，陈独秀的一生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即“有功、有错、有罪”。这实在令人佩服，不过，什么是功，错在何处，哪个是罪，应该讲清楚，而且这三者的轻重程度也应该有所区分。重要的不在于下结论。

如果能从意识形态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后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那么，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陈独秀的生涯，大概会连同他的功过一起得到恢复吧。我希望如此。现在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注释：

①高军、姜华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举办陈独秀等历史人物评价的讨论会》（《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张智彦：《“五四”学术讨论会上关于陈独秀评价的几种意见》（《哲学研究》

1979年6期)。

③《上海讨论如何全面评价陈独秀》(《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

④林茂生、王树棣、王洪模：《略谈陈独秀》(《历史教学》1979年5期)。

⑤任建树：《论陈独秀早期革命民主思想》(未发表)。

⑥任建树：《陈独秀和〈安徽俗话报〉》(《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1辑)。

⑦王开玉：《关于陈独秀生平、家世和在安徽活动的几点补证》(《江淮论坛》1980年1期)。

⑧沈寂：《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江淮论坛》1979年2期)。

⑨陈松年：《回忆父亲陈独秀》(《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1辑)。

⑩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云南工学院中共党史教研组，第一地面炮兵学校政教室翻印，1980年)。

⑪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⑫侯新夷：《试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是谁》(《内蒙古大学报》1980年2、3期)。

⑬刘孝良：《陈独秀是反封建文学革命的先驱》(《艺坛》1980年试刊号)。

⑭宁树藩：《陈独秀与〈新青年〉》(《复旦学报》(社科)1979年3期)。

⑮赵少荃：《陈独秀的民主与独裁》(同前)。

⑯张圻福：《试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观》(《江苏师院学报》〈哲社〉1980年3期)。

⑰丁守和：《陈独秀和〈新青年〉》(《历史研究》1979年5期)。

⑱王进：《陈独秀的“开明专制论”不是旧武器》(《求是学刊》1980年4期)。

⑲张影辉：《陈独秀第一次来武汉》(《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1期)。

⑳《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㉑王树棣：《中国共产党建党人之一——陈独秀生平》(《百科知识》1980年4期)。

㉒陈善学：《评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安徽大学学报》〈哲社〉1980年3期)。

㉓李淑：《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1期)。

㉔《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

㉕向青：《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近代史研究》1980年4期)。

㉖许光振：《陈独秀的错误能都归之于共产国际吗？》(《南京大学学报》〈哲社〉1981年1期)。

㉗郭绪印：《重评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0年4期)。

- ⑳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
- ㉑《“一大”前后》（一）（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
- ㉒韩泰华、牛桂云：《陈独秀从何时称为总书记》（《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10期）。
- ㉓郭绪印：《评陈独秀给党中央的三封信》（《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79年2期）。
- ㉔张巨浩：《如何认识开除党籍后的陈独秀》（《求是学刊》1980年4期）。
- ㉕王易琳：《陈独秀与托派》（《安徽大学学报》〈哲社〉1980年2期）。
- ㉖黄纲鉴：《中国托匪组织前期历史概况》（《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15期）。
- ㉗周仁生：《中国早期托匪情况之三》（同前）。
- ㉘《刘仁静谈托派问题》（同前）。
- ㉙孙其明：《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的探讨》（《安徽大学学报》〈哲社〉1980年2期）。
- ㉚张永通、刘传学：《我们对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点了解和认识》（《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 ㉛杨荣华：《评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安徽师大学报》〈哲社〉1980年4期）。
- ㉜夏立平：《陈独秀能论定为“反革命”、“叛徒”吗》（《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1辑）。
- ㉝唐宝林：《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16期）。

一位广西共产党人 的忧患生涯及其身后遭遇

——关于李明瑞和1949年以前广西共产党活动的几点札记

〔英〕格雷厄姆·哈钦斯

张 晓 翔 译

在很大程度上说来，1949年以前广西共产党活动的历史是一部在艰难环境下小有成功的历史。广西是国民党最为强大的军事派系之一——“桂系”的大本营，该省的头面人物，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与蒋介石勾结，在谋划和实施1927年4月的“清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此后的整个民国时期一直是共产党人的强硬对手。

不过，桂系对广西的长期统治曾有过两次大的中断，从1929年到1930年是第一次中断时期^①。由于桂系与蒋的冲突（1927年以后桂系一直是蒋的反对派系）终于酿成战争，广西的这些头面人物几乎一夜之间便被撤除了地方领袖的地位而逃亡国外；虽然他们又很快得以复职，然而广西地方政权的这种空白时期却为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一时期，爆发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并且是右江根据地、左江根据地的形成和红七军、红八军创立的时期。这些事件的许多令人感到兴趣的方面，本刊几年前已有过讨论^②。然而最近数月来，有迹象清楚地表明，中

国共产党已经发现，要想对广西共产党活动的历史意义及其领导人物的“功绩”作出终始一贯的定论，远非易事。

广西西部共产党的活动，涉及到邓小平的一段经历：这在当代中国政治的背景下看来，也许会被认为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方面，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产生上述麻烦的原因所在。1929年夏季，邓被委派去领导广西省的共产党工作；其间除了很短一段时间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外，邓在广西一直活动到翌年秋季。尽管在邓的职业革命家的全部生涯中，这只是一段较小的插曲，然而邓“与广西的联系”成了江青和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将广西地下党组织列为专案审查的主要缘由。这一做法的真正矛头则是指向邓本人以及周恩来，周曾经主持过广东省委的工作，邓建立了广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并且指导了该省的工作^③。

这种专案审查显然比通常的历史争议性质更为严重。《广西日报》无不悲哀地回忆了前党的地下活动积极分子所遭受的审查以及他们开展的运动所遭到的诋毁。专案审查认定广西地下党是“叛徒、特务、托派和国民党分子的大杂烩”^④。许多长期从事过地下斗争的人含冤蒙屈；有些人失掉了职位，有些人被开除了党籍，还有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而一些早年已经去世的人则因此而被褫夺了烈士的称号^⑤。

最近，一些此类的历史“错误”已经得到了纠正——其中广西西部起义中一位关键人物的情况尤为引人注目，这就是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邓小平的亲密战友李明瑞。毛逝世以后，李在广西的许多同志和大批领导人物都得到了平反（或死后昭雪或得以复职），而李的情况却与他们不同，他所遭到的麻烦并不是始自“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后来沉痛地承认，在十年浩劫中很多人遭到了蹂躏，而李的遭遇却更为复杂更为曲折。对李而言，“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结论实际上剥夺了他的烈士资格——即

再次推翻了已经为他做过平反的结论，结果是否定了党在1945年为李所做的（持肯定意见的）结论，并再次恢复了1931年做的原结论。使李遭受厄运的是，这个原结论中包括了一点对李致命的内容，因为，1931年秋季，李明瑞是被当作汪精卫的同党和革命事业的潜伏叛徒而遭枪杀的。

为什么李明瑞的历史地位问题至少对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人来说是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我们觉得，不管李在广西从事活动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及当时和后来一直困扰着党的有关领导和路线如何，原因是非常简单的。人们首先要弄清的是李投身于广西共产党事业的动机问题及其献身的程度，而在这点上，并未能够得出使党内某些人感到满意的结论，而李则曾被认为是一个缺乏思想觉悟的机会主义者。要不是因为李所投身于其中的广西共产党活动所造成的客观效果，那么这便有可能成为对他的一贯定论。但是，李明瑞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广西共产党所取得的短暂成功创造了一个方面的条件，并由于他的重要作用，至少保存了红七军的一个部分。这些都是清楚无疑的事实，并不是对某个个人的作用的过高估价。在对李有利的时期（如1945年和本文写作的时期），他所获得的荣誉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这些功绩的基础上的。因此，把李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处理似乎颇有几分棘手，而并不能轻易无碍地为共产党的历史所承认。我们将会看到，在对李同工农运动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几乎自始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简单地回顾一下李在广西共产党活动中的经历，将有助于证实上述观点。

1896年11月，李明瑞出生于广西东南部的北流县^⑥。1920年他从军校毕业后，即在广西军队中与广东省的革命力量一道协同作战，后来在北伐战争中崭露头角，先后在李宗仁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中任团长、旅长和师长。1927年夏季，李明瑞在击溃孙传芳的反扑保卫南京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战役使得参战

的广西军队赢得了“钢军”的称誉。此后，由于北伐的政治结局日渐拜占庭化，李的军队当时作为桂系辖下的一个多省集团的一部，一度驻扎于湖北地区。

最近的一篇共产党报道提到，李曾经强烈地反对1927年4月的“清党”，报道引述，李曾经告诉过他的上司，“清党”破坏了统一与独立的革命事业^⑦。虽然李比他在广西军队中的其他同僚们更为倾向于左翼运动，这点颇无异义，然而下面一点即便不是更为确凿无疑，也是同样清楚的事实，即李在1929年到1930年这一时期里对他自己的职位是心存不满的。广西桂系的头目们为了保持其在湖北的影响，认识到给予湖北籍的军官们以优厚的待遇是策略的做法，但这却引起了李及其同僚们的强烈怨忿。因此，当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战争爆发时，李和其他的一些人遂接受了南京方面的提议，他们的倒戈对广西桂系头目们的迅速彻底垮台起了关键的作用^⑧。此外，这一事变的结果是李在1929年5月被任命为广西省的军事指挥官。

对桂系的垮台和李明瑞的擢升，有理由感到满意的还有另一个有关的党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些事件中，共产党确实起了一份作用，该党利用已成为南京方面代理人的同一个联系人，进一步促成了李的反叛。这个联系人就是李的表兄俞作柏。俞在1927年“清党”以前曾经参加过广西的小规模的农民运动。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与香港的共产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⑨。由于同蒋介石的合作，俞所得到的奖赏是被委任为广西省的省主席，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又是一个收获，该党迅速地派遣了一些干部（包括邓小平）到该省的政治军事机关中去担任工作。

然而，广西的形势远非简单。李、俞在准备与共产党合作（重要的是李容许了在其指挥下的军队中所开展的政治工作）的同时，首先关心的显然是建立他们自己的力量。事实上，他们的

地位是极其脆弱的。广西军队的余部并不甘心于桂系的失败，他们等待着卷土重来；李俞二人虽然得到蒋的任命，但蒋对他们存有疑心；而汪精卫方面的代理人亦在广西进行活动，许愿给新任的李俞二人以报偿，并试图从他们那里寻得可以利用之处。面对这些许诺，李俞二人在与共产党合作以巩固自己地位的同时，似乎是心爽神怡^⑩。

然而情况甚至更为复杂。据信，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同志是从其有影响力的一个支部——广东省委那里获得指示的，广东省委认为，李、俞是“中间派别”的代表人物，因而是脆弱的并可能具有两面性。广东省委进一步强调指出，新的广西领导人同李、白、黄在广西的统治相比较，就其性质和结果而论，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前者的政策表面上看来可能会给工人农民带来一些利益（李、俞宣布，一旦他们执政便减租25%），但这种政策从根本上来讲带有欺骗的性质，因此应当予以揭露。至于委派干部到现政府的权力机构中去工作以及组织农会（广西省第一届农会1929年8月在南宁召开^⑪），则是错误的，是向国共合作时期倒退^⑫。虽然在广西的党的积极分子被这些观点弄得莫衷一是，不过在实际上他们并未对此给予重视。如同中国别的地方一样，一个由共产党发动领导的起义正在展开，这一起义，与其说是根据党的权威机构的命令和指导而发动的，毋宁说是置这些命令与指导于不顾的结果。

然而尽管这样，当1929年秋季李、俞突然转而反蒋并调兵向东挺进对付陈济棠的军队时，也许中共党内的两部分人都因之深为忧虑，因为这一冒险的行动将形成一种威胁，扰乱共产党在该省的发展。当时，党在南宁的高级人物极力试图劝阻李进行这种冒险，但未获成功^⑬。数日之后，李、俞撤回广西省会，他们此举由于一些背叛行为而遭内部瓦解——而这一次形势是对桂系有利了。李、俞二人看来显然是失去了选择的余地，二人与共产党

控制的军队一道向西撤退：俞旋即退隐到了香港，李则仍然留在广西西部，并且更为紧密地与共产党方面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了^④。

广西的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然而广东省委的观点却仍然保持未变。省委强调，转移到乡村地区和发动农民运动固然重要，但忽略了城市却是一个重要的错误；南宁和梧州的劳工运动特别应该（并且是毋庸置疑地）成为首要的工作中心^⑤。

在总的形势发生变化的同时，另有一种情形显然仍在继续，那就是桂系、蒋介石和汪精卫的代理人，各自为其主子的利益，都在龙州对李明瑞进行拉拢（其中汪精卫代表所进行的拉拢也许对李埋下了日后致命的祸根）。近年的论著强调指出，李严厉拒绝了卷入进一步的政治阴谋中，但至少下述说法看来是可信的，即形势的发展对李起了决定性作用^⑥。1929年12月11日，爆发了精心筹划的百色起义（这一天是广州公社二周年纪念日），从南宁撤退到这一地区的部队重新确定番号为红七军；3个月后，在龙州发生了类似的起义（尽管规模较小），并且创立了红八军。这时，共产党对李明瑞的任命，成了李生活道路上的转折点：龙州起义前夕，邓小平领导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李为新的共产党军队的总指挥，并接受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⑦。

如果说，李明瑞在1929年曾经在客观上对新的共产党军队的建立颇有贡献的话，那么他的军事才能在接下来的两年间为对付凶恶敌人，保存这支力量则起了重要的作用。1930年春季，红七军主力试图向北挺进贵州边境以扩大革命根据地。红七军对贵州的榕江城发动了长时间的进攻，结果在正月攻占了该城——在这一战役中，李显然立下了汗马功劳^⑧。后来在收复百色城的战役中，李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该城在红七军撤离时曾一度落入敌手）。近年的论著中以称赞的语言评价了李在前线的指挥才能^⑨。

另外，据一份重要的、涉及李明瑞却很少为人注意的资料来看，如果当年李明瑞和其他一些人的意见能压倒中央的意见，则右江革命根据地可能会存在更长一段时间。当时的中央指示广为分散的共产党军事力量集中起来去攻打中国的大城市，红七军的军事领导人显然反对中央的指示。参谋长龚楚（即龚鹤村，后叛党——译者）和总指挥李明瑞提出了进一步沿着广西贵州边界扩展革命势力的设想，而不主张向东转移至江西^②。近年共产党的著作中，谨慎地提到当时那些对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策（现在被认为是“李立三路线”的错误）持有疑虑的人中也包括有邓小平。据说，邓是出于对党的更高利益的忠诚而坚持主张服从中央的指示。1931年秋季，红七军撤离了广西根据地，此后不久，这块根据地便被桂系的军队所摧毁^③。

据一份资料载，在向江西转移的历尽艰辛的长途跋涉——“小长征”中，李明瑞的战术才能、领导能力，也许还包括他对当地情况的谙熟，都被证明是一份颇为宝贵的财富^④。李率领着一支不断缩小的部队，沿着贵州湖南边界运动，抵抗着桂系的军队，对付着时常遭到的伏击^⑤。在这种情况下，他从原来10000多人的部队中带出的人马仍然有大约3000人之多，并于1931年正月与共产党的主力部队会师，这点堪称卓越。

红七军到达江西时，党内的一部分人中普遍地对这支部队抱有一些相当歧异的想法^⑥。在判断评价一支工农武装及其领导方面，除了保存自己、反抗压倒优势的反革命武装所需的军事才能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标准。在这里，红七军被认为是党的领导薄弱，缺乏革命觉悟。并认为，广西的共产党人显然过于看重地方的、语言上的（大多数人说广东话）和个人的联系^⑦。后面的这一指责听来倒也确有其事，而这无疑与从广西长途跋涉而来所经受的艰苦磨难有很大关系——某些事情，中央苏区的共产党人（或确切地说是其中一部分人）在数年之后成为长征的幸存者

后，终于能够有所理解了。但不管怎样，红七军是被彻底改组了，大约20名反对这些做法的干部被当作“改组派”的成员而遭枪杀^②。

李明瑞自然为这种宗派主义所苦恼。他在给他的前参谋长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在江西的红七军的未来的担忧^③，作为部队的指挥员，他在所难逃地被牵连进对他的队伍的批评中。然而，就他自己而言，致命的问题看来是，不管在这一时期中发生过什么事情，他都仍然不能摆脱党内一部分人在广西共产党起义实施时加给他的污名。他仍然被认为与李、白、黄本质相同；他由一名旧式军队的指挥官成为红军的领导人，也被认为是不彻底的转变。因此，无论李的军事才能如何得到了证实（在以后的数年里，这种军事才能对共产党人来说可谓无价之宝），他仍然不能得到信任。而他同汪精卫集团说不清道不明的交往，自然被用来确证对他的上述看法^④。

李感到有一条牢牢缚在其脖子上的僵绳，因而当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战役接近结束时，他决定先发制人地逃离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这显然引来了杀身之祸，当他计划这一行动时，派来暗中监视他的共产党警卫员枪杀了他。当时李年仅35岁^⑤。

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共产党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无可估量的变化。党已经强烈地感到需要修订和正式编纂党的历史。前红七军的成员们成了这种气氛的受益者，李得以恢复原有的名誉和地位^⑥。有关李明瑞的结论也被推翻，人们认为红七军的这位领导人在这支部队从广西撤退的过程中以及为保存这支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点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七大”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⑦。

虽然李已经得到了平反昭雪，但对于前红七军的成员来说，要公开地评述他们总指挥的活动，显然仍有余悸。谈到广西西部共产党起义的组织时，不可能避而不谈李明瑞，然而在1959年和

1961年发表的回忆录中，却极少提到李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并指挥过红七军^②。这份小心谨慎终于得到了应验：“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再次被认定为政治上的动摇分子，他是在背叛革命之前即已被处决的^③。

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中对李的抨击，最近已被认为是对广西地下党进行全面攻击的一部分，而这种攻击意在诋毁邓小平。当然，这不仅仅只是简单地对个人进行抨击所产生的结果，而且还肇因于在对党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方面、在判断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好共产党员”方面存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在人们的动机、意图和人们活动的后果之间，这一观点更为强调前者。而只要将这一理论作为评价历史的基础，则像李明瑞这样的人便很少能有什么地位。对于他来说，处于一个争权夺利的乱世之中，要想从主要忠于个人转变为首先忠于某种意识形态，未免困难。近年来，由于邓小平掌权，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的过去和整个的历史问题，已经采取了比较宽厚和大度的观点立场。今天，甚至对军阀也进行了新的评价，使人耳目一新。1982年中国西南一次讨论民国时期的会议上，与会者被告知，必须从主观动机、客观后果两方面来对各个军阀加以分析。而且，如果某个军阀曾经对革命事业做过有意义的贡献（例如在北伐时期或抗战时期），那么，其贡献的大小应当作为对其进行历史评价的首要标准——即便他们显然抱有别的、出于个人私利的动机^④。对于共产党人一贯厌恶的军阀尚且如此，那么这种做法对于李明瑞这样的人不应该更为适用吗？因此，当1981年12月百色起义52周年时，邓小平深情地谈到了李明瑞和他在广西的其他老同志，这时，或许他是在再次澄清自己的历史，但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个人的问题的范围^⑤。

注释:

①第二次中断是由于日本的占领而造成的,时间是1944年11月—1945年6月。

②戴安娜·拉里:《共产主义和种族反抗:简论壮族农民运动》,载《中国季刊》49期(1972年1—3月),第126—135页。最近发表的报道和回忆录中有关部分有:壮族简史编写组《壮族简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8—165页;吴西《回忆龙州起义和红八军建立经过》,载《红旗飘飘》第19辑(1980年),第248—270页;吴西、黄松坚、陆秀轩:《广西革命史光辉的一页》,载《革命回忆录》第5辑(1982年),第1—13页。

③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一览》第三部分《远东》,1983年9月21日。

④同上。

⑤同上。许多广西地下工作人员,同某些前国民党人员一起,在50年代初期为巩固广西省的共产党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⑥下述传记材料出自于黄松坚、姜茂生、磨力、李治平:《一位卓越的红军指挥员——忆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载《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5—68页),和吴西、林青:《红七军、八军总指挥李明瑞烈士事迹》(载《革命回忆录》第7辑,1982年第99—100页)。

⑦黄松坚、姜茂生、磨力、李治平:《一位卓越的红军指挥员》,第69页。

⑧戴安娜·拉里:《地区与国家——中国政治中的桂系:1925—1937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26页,141页)。

⑨王保山、张世铨:《对左、右江革命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商榷》(载《学术论坛》1979年第2期第40页),俞的胞兄作豫更深地献身于革命事业。他1927年10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参与了广州起义和龙州起义。1930年9月在广东遭到枪杀。覃尚文:《俞作豫烈士和他参加领导的龙州起义》(载《革命回忆录》1982年第7辑第116—139页)。

⑩龚楚:《我与红军》(香港:南方出版社1954年第168页)。

⑪陈欣德:《中共广西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载《学术论坛》1979年第1期)。

⑫吴忠才:《白色起义的特点和意义》(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⑬吴西、黄松坚、陆秀轩:《广西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第10页。

⑭俞作柏是一位前国民党人员,1956年回到广州在市政府中任职。见《大公报》(香港)1956年12月8日第二版。

⑮吴忠才:《百色起义的特点和意义》第78页。虽然南宁是广西省府所在地,柳州是该省的商业中心,然而这两个城市的劳工运动是力量薄弱人数很少的。而且,到

1928年底，旧当局重又控制了这两个城市。

⑩吴西、林青：《李明瑞烈士事迹》第102页；黄松坚、姜茂生、磨力、李治平：《一位卓越的红军指挥员》第73页。

⑪黄松坚、姜茂生、磨力、李治平：《一位卓越的红军指挥员》第75页。

⑫龚楚的《我与红军》叙述了攻打榕江的过程(第181—188页)；吴西、林青：《李明瑞烈士事迹》(第104—105页)；和黄松坚、姜茂生、磨力、李治平的《一位卓越的红军指挥员》(第79页)特别强调了李在这次战役中的作用。

⑬吴西、林青：《李明瑞烈士事迹》(第106—107页)；黄松坚、姜茂生、磨力、李治平：《一位卓越的红军指挥员》(第80—81页)。龙州起义由于内部出现的反叛和在外部遭到的进攻，几乎刚一一开始即告瓦解。红八军中约有200人在1930年9月与红七军设法取得了联系。吴西：《回忆龙州起义》第266页。

⑭龚楚：《我与红军》第197页。

⑮广西革命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韦拔群烈士传略》(载《学术论坛》1979年第1期第128页)。

⑯黄松坚、姜茂生、磨力、李治平：《一位卓越的红军指挥员》第76页。

⑰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给外交部的电文中披露了李的军队与广西当局军队之间发生小规模冲突的详细情况。例如1931年2月12日电(伦敦档案局F·O·371 15472/F1375—69)，1931年2月26日电(F·O·371 15444/F3092)。

⑱据龚楚披露，正是毛泽东和朱德对李和红八军持有疑心(《我与红军》第243页、第262页)，最近发表的材料把对红七军的敌意，归因为1931年下半年“二明路线”的统治。吴西、林青：《李明瑞烈士事迹》第114页；黄松坚、姜茂生、磨力、李治平：《一位卓越的红军指挥员》第66页。

⑲龚楚：《我与红军》第262页。

⑳同上，第263页。

㉑同上，第243页。

㉒吴西、林青：《李明瑞烈士事迹》第114页。童克同(音译)和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博尔德，科罗拉多，西方观点出版社)第283页。

㉓龚楚：《我与红军》第244页。吴西、林青：《李明瑞烈士事迹》第114页。

㉔吴西、林青，上引文。

㉕吴西、林青，上引文。黄松坚、姜茂生、磨力、李治平：《一位卓越的红军指挥员》第66页。

㉖在广西军区政治部编写的《广西革命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和莫文骅撰写的《回忆红七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初版发表于

1961年)中,李是一位无关紧要的人物。

③黄松坚、姜茂生、磨力、李治平,上引文。

④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编:《西南军阀史研究总刊》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页。当然,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历史评价标准同当前“按成果付酬”的经济政策具有共同之点。

⑤吴西、林青:《李明瑞烈士事迹》第115页。黄松坚、姜茂生、磨力、李治平:《一位卓越的红军指挥员》第88页。

(译自《中国季刊》总104辑 1985年12月)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澳〕尼克·奈特

王应一译

译者按：此文摘译自《马克思主义在亚洲》（澳大利亚1985年出版）。作者为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现代亚洲研究学院讲师。他针对西方某些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问题上的两种模糊认识，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奈特认为，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必须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去发现社会的特殊规律，正是这种普遍（抽象）规律和特殊（具体）规律的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这种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

如何使19世纪欧洲工业化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意识形态，成为对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非工业国有实际意义的理论体系，这历来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反复加以解决的课题。两种社会条件之间相差如此悬殊，马克思主义竟对追求国家现代化的中国革命分子产生吸引力，似乎有点反常。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中国革命者是如何看待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以正统形态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作某些变通，才能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起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若能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并有助于制定一种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既充分利用革命可能性，又顾及革命局限性的战略，方能对中国革命者有现实意义，并成为“行动的指

南”。毛泽东指出，为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作用，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他仍然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经验中概括出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种理论，它包含着一系列不可移易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毛泽东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适用性，又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他是如何将二者协调起来的呢？现在让我们简要地分析一下毛泽东据以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逻辑。

在1938年10月6届6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发表了下面一段话，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6卷，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1947年版第20页。）

这里所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究竟如何理解？西方评论家的看法大体上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强调中国的传统和实际情况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例如，斯图尔特·施拉姆说，毛泽东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普遍有效的形态”，他因“醉心于中国的光荣历史”而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中自有“奥妙”（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英国1969年修订版第112—116页）。第二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的一个花招，旨在同紧跟莫斯科的留俄派进行的权力斗争中抬高自己的地位，因为留俄派支持欧洲人和

苏联人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例如，在罗伯特·诺斯看来，毛泽东“修改了俄国的共产主义政治理论，以适应中国的特殊需要，并便于他本人登上权力宝座”（诺斯：《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美国1963年版第193页）。但是，我认为，还能够作出第三种解释，即毛泽东试图制定一个公式，既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能够将这种普遍原理应用于一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

这种看法有无根据呢？必须指出，毛泽东认为，人们能够发现自然界、社会、历史和战争的特殊“规律”，这种特殊“规律”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不具有普遍适用性。1936年毛泽东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一段话颇为引人注意，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认为在特殊环境或特殊条件下，事物发展有其特殊“规律”。

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4年版第157页）

这段话明确反映出，毛泽东反对认为战争只有一般规律的观点。他认为，有可能也有必要找出反映个别战争的特点的“规律”。

毛泽东极想找到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但是，这种特殊“规律”同历史和社会的普遍规律有什么关系呢？首

先，普遍规律是从许多特殊规律中概括出来的，特殊规律所反映的是同一类事物在不同条件下的发展模式。例如，如果说在许多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存在着不同形势的阶级斗争，那么，反映这些阶级斗争的特殊“规律”就构成阶级斗争普遍规律的基础，而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反过来则证明一切社会都存在着阶级斗争。其次，普遍规律使人们具有预见性，使人们能够断定在尚未注意到的事物中也必然存在着符合规律的现象，从而引导人们去注意和分析这种现象。就毛泽东的认识而论，普遍规律并不能够决定事物将以何种具体形态出现。事物的具体形态只有通过实际考察才能揭示出来，考察的目的就在于了解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特征。换言之，只有在普遍规律的指导下经过实践才能揭示出特殊“规律”。再以阶级斗争为例，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只是抽象地断言一切社会（原始社会除外）存在着阶级斗争，人们还需要根据这种普遍规律去发现反映中国社会内部阶级斗争性质的特殊“规律”。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抽象的普遍规律，在促使人们去注意需要分析和研究的社会问题方面起重要作用。然而，这种普遍规律本身，并不就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必须应用这种普遍规律去发现社会的特殊“规律”。正是这种普遍（抽象）规律和特殊（具体）“规律”的统一，构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显然，这种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例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下才能够实现。因此，中国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去揭示反映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特殊“规律”。对于毛泽东来说，这种特殊“规律”一经发现，就成为中国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非因强调中国的实际

情况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乃是使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臻于完备。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含有这样一层意思，即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对作为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而不是只有一大堆抽象的普遍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界说。因此，虽然如怀利所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含有文化特点的用语”（雷蒙德·怀利：《毛主义的产生：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年）》，美国1980年版第52页），但它并未要求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上的特权。在另一种不同的文化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又需要同那种特定条件下的特殊“规律”相结合。由于这些特殊“规律”不同于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则另有其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也会相应地和带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但两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则是共同的。

这种马克思主义观，必然要求密切注意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论述中，一再阐述这一点，对于那些热衷于外国模式和外国历史而无视中国历史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公开表现出不满。他认为，他们醉心于外国模式，主要反映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不正确的理解，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欧洲形态的特殊“规律”，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照样搬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一文中，毛泽东列举了在中共党内产生消极影响的三种情况：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缺点都反映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正确。他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批评了这些缺点，他认为，应当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同反映中国社会特点的特殊“规律”结合起来，而只有通过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周密考察和深入了解，才能够实现这种结合。毛泽东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犯了“主观主义”，所谓“主观主义”，是指他们脱离实际，为理论而理

论：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4年版第757页）

1942—1944年整风运动期间极其强调克服主观主义，整风文件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搞清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特点（特殊“规律”），并指出按照这些特点制定方针政策的必要性。因此，应当说，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全党按照毛泽东所理解的含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提法。这个提法1938年以后已被很大一部分党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接受，但还未为广大干部所理解。

在《论新阶段》（1938年）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在整风文件中他多次谈到这一点，而且作为他那篇基调演说《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的主题：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4年版第778页）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普遍规律同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相结合。他何以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视为“行动的指南”？必须着重指出，这个思想理论体系本身并未提供什么现成的方案，可以自动地和必然正确地解决革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理论的作用，只是有助于尽可能正确地认识历史条件。认清了历史条件，革命者就可以在理论所阐述的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度内采取相宜的行动。这种行动只能说是相宜而未必正确，因为弄清历史条件，并不等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据以决定“正确”行动的公式。对历史条件有了一个清楚而且正确的认识，可以在行动上有所遵循，采取某些比较可取或显然应当采取的行动，而避免采取不适当的对策。

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实践论具有现实意义。理论体系只能作为行动的指南，就是指导人们对历史条件或历史进程作出正确的估量。政治人物的责任，就是认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规律”，作出必要的论断，并采取相应的对策。这种对策在未付诸实践以前不能认为“正确”，只能说是看来适当。要判断看来适当的行动是否正确，唯一的办法是在实践中考察其结果。若达到预期的结果，就证明该项行动和赖以采取行动的对历史条件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反之，若事与愿违，则证明要末是对形势的分析有误，要末是作出了似乎适当而实际错误的决策。只有这样依靠实践，才能够获得经验，改进行动，以便在决策上最大限度地缩小似乎正确和真正正确之间的距离。

总而言之，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由多种多样的因素构成，只有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够作出完整的界说。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并不足以代表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臻于完备，这种普遍规律必须同中国社会的特

殊“规律”结合起来。毛泽东坚信，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创造出一种真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又不背离作为历史和社会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

河上肇与中国革命

〔日〕小野信尔

张惠才译

当初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日本传到中国的，因为中国的留学生们为了寻求解放祖国的处方，不断地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河上肇的著作在质和量上都十分突出。

按照实藤惠秀的说法，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三十年代，译成中文的日本社会科学文献共374份，其中河上肇的著作占18份，居于首位。而且还有二、三份没有统计上，刊登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也没有包括在内（当时中国有影响的报纸在副刊上辟有文艺科学栏）。总之，从《贫乏物语》（译名为《救贫丛谈》）到《资本论入门》，只要他的著作一出版，立刻就被翻译过去。

河上肇的著作深受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欢迎，即使是日文版的原著，中国的需要量也很大。关于这一点，上海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造在《随感》中作了详细的记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是深受河上肇影响的人物。他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据说实际上早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期（1913—1916），他就爱读河上肇的著作。

正如在《贫乏物语》中看到的那样，当时河上肇还仅仅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企图通过改造人心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李大钊也与此产生了共鸣，作为人道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他参加了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以俄国革命为契机，河上肇迅速接近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的李大钊也从河上肇的著作

中取得了材料，作为第一个在中国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大钊比河上肇先一步成为马列主义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众所周知，河上肇也受学问上的良心和社会上的正义感所支配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走出书斋投身到革命的实践中。

李大钊始终未恭听河上肇讲课，但却一直保持弟子关系，他和河上肇，应该作为日中两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双璧来纪念。

不仅通过文章受到影响，而且不少中国青年想来京都大学留学直接得到河上肇的教导，王学文就是其中之一。已故周恩来总理也曾渴望见到河上肇先生，但始终未能实现。据说青年周恩来曾贪婪地阅读过1919年1月创刊的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实际上他也提出了入学申请，准备选修京大经济系课程。但由于发生了五四运动便急忙回国。据说他被军阀政府逮捕后在天津的监狱里向伙伴们讲解的“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就是从河上肇的著作中得到的知识。

最后可以举出郭沫若。他在1924年春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郭沫若在自传《续创造十年》中这样写道：

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他个人发表在《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上的论文集，他那简明准确的笔调曾在日本的读书界风靡一时。他驳倒了论敌福田德三博士的不正确理论，可以说他登上了日本早期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高峰。我时常购买《社会问题研究》阅读，但没有得到系统的和本质的认识，因此印象淡薄。但在得到作者自己编辑的论文集之后，加上我对社会科学的憧憬，又由于全家人在生活上的需要，我便开始了翻译工作。

郭沫若不辞辛苦翻译了这部巨作，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书。然而由于担心这本书的社会影响，不久也就绝版了。但受其影响最大的还是译者自己。郭沫若在给朋友成仿吾的信中写道：

我最初来到这里（福冈）时的生活计划是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本来你是不大赞同我翻译这本书的，对这本书中的内容我自己也不能全面满意。例如，他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的企图，我认为这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不过我痛感在译完这本书之后得到的教训不少。以前，我只不过是模模糊糊地憎恶个人资本主义，对社会革命抱有信念。但现在已经有了理性上的指导，不只停留在感情上了。

这本书的翻译，使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郭沫若说：“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翻译河上博士的书”使他“提高了对社会经济的认识，增强了对正确理论的信念”，甚至完全改变了文学上的观点。在这前后，他给河上肇写信，就《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该书只强调社会变革的经济方面的物质条件，而忽略了政治方面的问题。河上肇回了信，说他对自己写过的东西也不满意，因此在第一版发行后就让出版社停止发行了。

郭沫若写道：“原作者的治学态度实在令人钦佩”，河上肇对素不相识的中国青年的来信（中国没有加入著作权协定，即使翻译了，原作者也得不到分文版税）的诚恳答复的真挚态度，使郭沫若十分感动。这也许是促成郭沫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之一吧。

《新青年》杂志（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准机关刊物）第九卷6号（1922年7月）刊载了施存统翻译的河上肇论文《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期”》（《经济论丛》13卷6号）。译者在附记的末尾写道：

河上肇先生虽然是学者，但今天却能提出这种主张，确实令人感动。但愿中国的学者先生们发一点善心，少来些不负责任的空谈。

河上肇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普及到中国做出了贡献，值得称道的不只是他的学识和理论，还有他那永远追求真理、在真理面前总是谦虚和忠实的态度。

（译自井上清编著《不屈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现代评论社，1980年）

文献资料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 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

马贵凡 译 宋洪训 校

译者按：1986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书中收录1920~1943年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历史文件共80篇。这些文件，多数选自苏联1934年出版的《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与策略(以中国为例)》文件集，部分是苏联20~30年代的书刊和《真理报》上以及苏联60~80年代的书刊上发表的文件(以上这些文件，在我国基本上都有中文译文)，此外有20多篇是新发表的档案文件。这部分文件多为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的函电，对于研究中共党史、中国近代革命史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有重要参考价值。现将这部分文件按时间先后顺序译载于后，以供史学工作者研究和参考(文件中的注译为原编者所加)。

文件一：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致中共中央①

上海

1922年7月

敬爱的同志们！

从最近由中国归来的同志们的报告中，我们得知，你们党至

今还是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并且同工人没有多少联系。

虽然现在在印宣传材料，但是向民众的呼吁并没有同他们的情况联系起来，这个宣传材料根本没有谈到工人的疾苦。在海员大罢工的日子里，我们站在运动之外，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在广州隐蔽我们的存在。党在华北秘密进行工作，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做秘密工作并不意味着态度消极和使工人群众不了解共产党的存在。

相反，在发生每一个重大事件时，工人应能通过党的宣言、党对罢工运动的号召和支持，以及党参加示威游行的行动了解党。党应该自己组织这种示威游行。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政治行动中，党应该同革命的民族运动一起行动。

我们应该设法对迄今还与民族运动有联系的有组织的工人施加影响。

至于纯粹的工人运动，我们应该开展宣传工作，争取中国工人同工会国际联合。党只有在懂得如何建立工人组织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

党的宣传工作还应该涉及妇女，应该首先在产业女工中进行。为了今后的发展，党必须引导青年，激起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工作的兴趣。

必须引导青年工人和大多数女工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作。

共产国际执委会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二：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致中共中央

1925年7月6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的事态发展正在接近转折关头，现在还不能预言，这次转

折将以什么形式和如何具体地完成，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这次转折在不不久的将来必然要发生。对此，中国共产党应当做好准备。那么党应当做哪些准备呢？

首先，应当尽力扩大和加强革命和民族解放思想在广大中国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同时特别要从组织上做好巩固这种影响的工作。

为了巩固胜利，特别是在遭到失败而进行撤退时的随机应变中，需要有一个很坚强很灵活的集中的党组织，这个组织要有铁的纪律，要借助自己组织得很好的党团依靠广大的群众性的工农组织，并且要注意借鉴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全部经验。

我们最近没有得到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群众性无党派组织发展情况的消息。在评价中国共产党以往的整个这方面工作时，我们预先表示相信，中国共产党在执行一条正确的路线。但是考虑到时机的极端重要，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一次不厌其烦地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最近应该把以下最紧迫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即加强和扩大自己的队伍；加强和扩大工农和手工业者的广泛无党派组织（首先是工会和农民组织）；加强自己在这些组织中的组织影响（建立与相应的党的委员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坚强的党团等）；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使自己成为群众性的政党。

我们认为，建立广泛的建制完备的地方党组织网（地方省、县、区和分区委员会）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应该在短期内对地方委员会开展强有力的指导工作。为此，中央应该尽快挑选专门从事党的工作的干部同志，最好是从工人党员中挑选。尤为重要的是，使地方省、县、区和分区委员会感觉到和明白它们要做的工作，并对这些工作切实负起责任。这些工作是：安排本地区整个党的工作；同各地工农中心取得联系；利用本地区发生的各种事件（中共应当积极参与这些事件），以及中国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和国外的反应^②，加强党在广

大工农群众中的思想影响和组织影响。

中国共产党不必为成立地方委员会所需干部的不足为难：党的领导人可以在工作实践中培养，再说一遍，中央只应尽力加强自己同地方组织的直接联系，首先应通过派指导员加强人员上的联系。

应该特别认真注意支部的工作，首先是工业企业中支部的工作以及农民组织中党团的工作。中央应该设法（通过党员的积极而大胆的工作）使企业和农村地区的党组织在它的领导下真正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

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在存在大量小手工业企业和个体工人的情况下，街道支部（这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4月全会国际组织工作会议所制定的党的组织结构条例建立的）^③应起到很大作用。

党应该特别重视农民工作。在中国，农民是决定性力量，一旦他们很好地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就可以使中国革命所向披靡。因此，广东农民代表大会^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次会议仅仅是第一步，是组织中国农民的开始。这项工作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对此应给以极大的关注。应该预见到，广东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会使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惶恐不安。农民的革命组织会从根本上打破他们的一切军事计谋，同时会使革命的政治力量以至军事力量大大增强。

对文化落后^⑤、几乎清一色文盲的农民要积极做工作，以便建立一个有铁的纪律和坚定政治路线的战斗的集中的组织。大会发出的告全中国农民书，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可能会起到很大的鼓动作用。但是，继告农民书之后，必须派出受过训练的组织工作者。考虑到现有力量，应派出精力充沛、较为熟悉地方情况的同志，首先到广东和北方省份去，到运动所波及的其他省份和发生饥荒的地区去。这些同志应该逐村去宣讲如何具体地建立革命

的农民协会。同时中国共产党应该向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只有它能够对中国农民群众做适当的组织工作，而国民党右翼必然采取种种措施阻挠广东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和阻止引导农民参加革命运动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应该反复向农民说明，他们在选举自己协会的领导机关时，应该很慎重。党应该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全部影响，以便通过它的农民部^⑥立即着手为农民协会尽快培训可靠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另一方面，不管这些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进行得如何，党应该尽量利用组织手段将自己的成员，或者完全忠实于革命事业的，首先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出身的无党派人士或国民党成员，调到农民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

还应该采取措施，吸引现有的秘密农民会社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和国际农民运动，同时，作为一项很重要的特殊任务，要建立中国农民运动同邻国（印度、朝鲜等）农民组织之间的直接组织联系，尤其要建立一些省农民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

为了保证意志的统一和革命行动的统一，为了将中国革命的敌人的阴谋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必须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象一条红线贯穿于国民党农民部的全部工作和所有农民协会组织的活动，同时还必须使农民协会组织的武装队伍完全掌握在协会手中。

而为了国家的进一步革命化，特别是为了对付反动势力，中共完全有必要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暗中加强自己的各个主要机构和从事群众工作的方法，并使之合法化。首先，尤为重要的是，使党本身及其刊物合法化。对于工会和农民组织也是一样。对于工会和农民组织，我们认为，暗中实现和加强这些组织提出的在本地的县和乡村的政府机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中设自己代表的要求，具有更重大的意义。现在，围绕这些要求有步骤地开展运动，肯定会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并且会具有巨大的教育意

义。

党在为自己的工作的合法化作斗争时，应该本着这样的原则：一旦这种斗争失败了，要使党的工作尽可能不受损失。党在争取公开的合法存在时，要考虑到现时的条件，必须做好撤退到秘密工作阵地的准备。即便在党组织现在完全公开工作的地方，党的各个主要工作部门也应该考虑到有可能必须转入秘密条件下工作的这种情况。在民族革命运动高潮低落的时候，罢工工人将孤军作战，企业主、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的全部打击都将集中到他们身上，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密切注视运动所遇到的各种波折，并在适当的时候提出一些能够实现的要求，以便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组织地使工人返回工厂和保存工人组织。

最后，党的刊物（中央和地方的报纸、工厂支部的报纸、关于当前问题的传单等）应当尽量予以加强，应当想方设法改进这些刊物在群众中的发行方法。

我们再一次强调，党应该继续执行尽力扩大和加强民族革命运动的方针，把学生和其他分散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等，同工农群众一起联合在解放中国和召开国民议会的口号周围。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切民族革命力量结成联盟和支持国民党时，应在自己的整个工作中保持自己特殊的阶级面貌，把工人和先进农民联合在自己的队伍之中。

请一有机会就向我们通报事态发展情况、中共在其中的作用、党的发展情况、广大工农组织的发展情况、党的组织建设方法，等等。请专门紧急报告一下你们对运动的近期前景的看法和你们根据这种前景提出的具体的组织计划和政治计划。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三：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1927年7月8日

汉口：中共中央，抄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班基尔^⑦和乌拉尔斯基^⑧。

一、尽管我们提出忠告，但是国民政府^⑨实际上不仅不支持土地革命，而且还放开了敌人的手脚。解除工人武装、讨伐农民，进攻武汉工人组织、唐生智在长沙枪杀革命者，这些行动都是反革命的公开表演。武汉以唐生智为首的主要武装力量事实上已成为同蒋介石半结盟的、也可能是直接结盟的反革命分子的工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上层掩盖这一切，这样它们就转到工农的敌人的阵营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我们认为谭平山的离休声明是错误的，是怯懦的。表面上留在政府里，不解除党的责任，这样一来，谭不仅不能揭露正在进攻的反革命势力，而且还掩护了它们。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并要发表声明，说明国民政府对待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的上述态度是采取这一步骤的原因，同时要为共产党人参加武汉政府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如工农运动绝对自由、严厉惩罚镇压工农组织的一切罪魁、支持土地革命、实现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武装工农，等等。退出国民政府并不意味着退出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国民党的各个组织中和在拥护国民党的群众中，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和改组其领导机关进行坚决的斗争。声明中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必须要求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讨论国民政府的政策，等等。同时在会上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支持土地革命和支持工人的要求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改组国民党领导的问题。现

在就必须着手在国民党的所有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中做相应的准备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中作出决议，抗议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行径，提出进行土地革命的要求和工人的要求，以及根据这些要求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口号。

二、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紧急代表会议（最好不公开），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为此，在武汉地区还需要组织党的秘密机构和把受威胁最大的工作人员转移到秘密地点。你们要考虑到以下新情况：1.在武汉，优势在反革命势力一边；2.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上层追随军阀，掩护反革命势力；3.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应该真正成为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核心。否则，党就会毁灭自己，而不再成为革命的力量，不仅会被消灭，而且会失去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四：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 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

上海

1930年8月5日

致全体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共青团中央书记：

8月1日和3日的政治局会议进行情况使我们不得不明确声明：中国党有进行冒险的危险，它有可能卷入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李立三在犯错误，而且是在犯很危险的错误。例如，他说：“你们要么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要么忠实于中国革命！”

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就不能忠实于中国革命。请看一看

你们坚决与之作斗争的各国的右的和“左”的叛徒们吧。他们也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说什么：“我们忠实于革命，因此我们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他们在这个口号下收罗一切腐败分子反对革命。你们自己可以看到，你们给以最坚决最无情回击的陈独秀和其他中国叛徒已堕落到何等地步。你们从中国革命经验中可以了解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兄弟党如何经常地帮助处境艰难的中国共产党，并且可以知道，由于这种帮助，现在整个国际可以自豪地说，曾遭到惨重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又成了一个强大的党，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实，对待共产国际决议的问题就是能否正确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不存在李立三所臆造的这种矛盾：“要么忠实于中国革命，要么忠实于共产国际决议”。

如果说，在8月1日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在其反对共产国际电报^①的辩论中（在目前形势下，再说一遍，在目前形势下，共产国际发这份电报是为了制止在南京和武汉举行暴动），很随便地说：“共产国际不了解情况，对此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周恩来负有责任，我们将反其道而行之”，那么能允许对共产国际决议持这种轻率的态度吗？李立三很清楚，共产国际和中国代表正在密切注视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同斯特拉霍夫（瞿秋白）和周恩来一起在认真分析中国党的状况。

李立三自己并不相信他8月1日在政治局提出的根本不能令人容忍的蛊惑性论据，两天之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露骨声明证实了这一点。他说：“需要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为此同共产国际作坚决的斗争，同时要贯彻执行我们的决议，不要管共产国际的决议，共产国际的决议，正如电报所表明，是中国革命的障碍！”在这次会议上，李立三确实还稍加掩饰地向俄国党作出了指示：现在联共（布）该准备进攻战了，它不必担心，这样做它同样可以完成五年计划！这同托洛茨基主义相当惊人地相似，托洛

茨基主义也指责共产国际和俄国党，说它们由于民族局限性而放弃进行世界革命。实际上，李立三的宣传可以归结为一点，即需要提请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注意它们对革命的职责！

然而，李立三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他还非常轻率地、极不认真地作了“解释”，说明应该怎样做。在8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说：目前在中国，中心问题是组织暴动。他不分析暴动的条件和力量对比，也根本不打算争取武汉、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等地工人阶级的重要阶层，而是很随便地命令在所有城市举行暴动。他根本不打算弄清国际上的力量对比，而只是宣称：现在苏联应该向世界帝国主义发动进攻！

你们想想看，一个意识到自己责任或至少讲话认真的革命者，在目前形势下能想出李立三所想出的这种计划吗？要知道，李立三在考虑苏联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战的可能性，在考虑红军通过蒙古进行突破的必要性，等等。我们深信不疑，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不过，若是李立三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一闪念，那么他作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应该怎样做呢？他应该说：需要马上同共产国际和俄国兄弟党协商，以便协调所有计划和弄清它们的意见。只是在这以后，他才应该在政治局提出建议。他根本不应该一开始就提出建议，而后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不很了解情况，说它们在执行一条不正确的路线。他不该怂恿政治局作出关于苏军出兵和苏联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的决议，来与共产国际相对抗。难道李立三以为，现在必须在中国执行一种使共产国际面对既成事实（即开始盲目冒险）的政策吗？！

同志们，我们非常坦率地向你们声明：若是政治局中的领导同志认为，可以不同共产国际协商和不顾它的反对，作出可能造

成严重后果的决议，那么关于遵守共产国际纪律的所有正式声明则一文不值。

李立三的所作所为，不是最坏的冒险主义，就是最可耻的一派胡言。你们可知道，李立三正在命令全国举行暴动，正在作出具体的决定，正在“调动”苏区红军^①和着手发动世界战争，而且他头脑冷静地说：“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要派一位同志到国际去。”我们要问你们，同志们，难道一个真正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革命者会这样做吗？

李立三在其报告中试图对共产国际的电报和决议作出这样的解释，似乎共产国际反对在中国举行暴动。这是极其恶毒的诽谤！共产国际正在同世界各国的机会主义者作无情的斗争，它正在为创造暴动的条件而斗争。三个星期以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曾给中国党发去关于必须在我们所占据的一个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但李立三反对建立苏维埃政府。你们能够认为共产国际在三个星期以前作出这种指示，三个星期以后就反对举行暴动吗？你们以为，共产国际没有看到农民革命的高涨，没有看到我们红军的胜利、工人罢工浪潮的高涨和总的局势的急剧发展吗？难道在整个苏联有哪一个人获悉红军占领长沙而不感到欢欣鼓舞吗？难道共产国际在上面提到的指示中所执行的路线不是很明确地和毫不含糊地致力于扩大领土，夺取重要工业中心和政治中心，实行最积极最果断的政策吗？难道共产国际真的象李立三所暗示的那样要阻止中国的革命吗？不是，根本不是！共产国际之所以发电报，是因为它还没有看到武汉有暴动的条件。如果说共产国际把党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使罢工和示威游行发展成为群众性的行动与使工人、农民和红军有步骤地准备暴动等问题上，那么这就不是要阻止革命，而相反是要推进革命。共产国际督促党做这方面的工作，恰恰是因为它了解中国事

态的发展速度，并且根据大量革命经验，知道不争取工人阶级的重要阶层，就不能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和俄国同志远非李立三所说的脱离实际生活的学者。他们了解你们的革命心情，也了解党的弱点，因此共产国际在电报中告诫你们，在目前尚未创造一切必要条件的时候，不要举行暴动。你们还要记住一点：一旦武汉暴动条件具备，尽管有这份电报，共产国际也会同反对这次暴动的任何机会主义者作无情斗争的。

同志们，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毫不含糊地向你们声明：我们坚决反对在政治局8月1日作出的关于政治局势的决议与共产国际的决议之间制造矛盾的企图。关于政治局势的决议完全坚持了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而且也坚持了关于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指示精神。迄今你们对此决议并未提出任何异议。

当然，我们应当坚决反对李立三准备暴动的方法，反对他的理论。不能让党左右摇摆。举一个例子：李立三在8月2日会议上谈到南京暴动，我们问他：“你根据什么得出结论说，工人群众将站到我們方面？拿8月1日动员群众的结果来说，怎么样？其实很清楚，没有做群众动员工作，并且无视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决定，没有组织群众性示威游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8月2日，李立三声称：在南京我们随时都能发动3到5万工人的群众性示威游行（可是7月27日我们号召南京工人举行游行时，只有700人参加）

……我们问：“共产国际的决议规定8月1日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

若是你们随时都能动员3到5万工人，那么为什么8月1日你们不这样做？”李立三回答说：我们发动暴动时才能这样做。或者举另一件事：从南京派出6000名伤兵上前线……好象南京在准备暴动，但是谁也没有行动，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李立三又断言，任何大规模行动都会导致暴动。当时党正在准备暴动，但正如许多例子所证明，党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南京的工作清楚地表明，存在着怎样的右倾堕落行为^②，不动员群众，不准备群众。由于准备

过左行动，准备没有群众参加的暴动，形势变得不是更好了，而只是更坏了。

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争取政权的路线，是为胜利暴动创造条件的路线。如果说有什么需要尽快纠正的话，那这就是李立三在其报告中表现出来的错误倾向。如果说有什么需要尽快纠正的话，那这就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表演，因为这是拿中国革命当儿戏。

如果有有害的倾向将很快得到克服，所犯的错误将得到纠正，那么中央是能够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率领中国党走向胜利的。

远东局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五：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8月16日

关于南京的群众发动问题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根据同李（立三）的谈话，起草了我们的建议。

我们应该认真地在工厂，在城市贫民、农民和士兵中间广泛开展抗议白色恐怖的运动。如果我们将来很强大，就应该准备群众性的罢工运动。即使我们为表示抗议长沙、武汉、南京等地的白色恐怖而在一些重要工厂争取到10分钟工体时间，这也是很大的胜利。如果我们的力量得到加强，当然可以提出更广泛的口号。我们应该突出强调什么呢？这就是，不能满足于提出罢工口号和等待事态的发展，而要通过我们的支部、赤色工会、工厂行动委员会、米业委员会和一切群众组织认真地组织罢

工。

同样，我们还应该准备示威游行，准备用纠察队和同情我们的士兵保护这次游行。同时必须加强对士兵和警察的宣传鼓动工作（不要向你们的弟兄开枪，等等）。

是否应该号召士兵参加游行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同李有过一些争论。我们的意见是：每次群众性的行动，都应该号召士兵参加，特别是在举行游行的时候。

按照李的统计，我们在南京能够组织4到5万人的示威游行，并且能够动员5000名士兵参加这样的游行。争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这样做。

如果我们只能动员我们在军队中可以信赖的人参加这次游行，那么让他们去参加就是一个错误。因为那样做就等于我们把他们清除出军队，而他们却是我们在军队中的依靠力量。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预先争取到1.5万人的警备队中的5000名士兵参加游行，而且还能争取1万名工人、手工业者等，那么我们就应该组织这次有士兵参加的游行。这样的行动在目前形势下会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不言而喻，我们应当作发生严重冲突的准备，应当认真作好领导这种群众性示威游行的准备。我们对组织这种群众性的行动不应有丝毫的动摇。

当然，如果发现，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们在南京的力量，我们还不能组织有5000名士兵参加的4到5万人的示威游行，那么认为这还不意味着应该放弃所谓“小的发动”，这是绝对错误的。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些重要企业争取到哪怕10分钟的工休时间，如果我们能够散发较好的传单和组织较好的游行，哪怕只有1000人参加，这就是在组织群众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

步，这就证明党有能力在白色恐怖的艰难条件下组织和领导群众性的行动。

恳请你们把准备南京群众性行动的每一个步骤通报给我们。

远东局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六：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8月20日

关于工会问题

亲爱的同志们：

一个星期以前，我们给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①发去一封内容详尽的信件（附给政治局^②的抄件），就我们中国（特别是上海）工会运动的若干现实问题发表了意见。信中除了对这个时期的一些重要罢工运动（铁路工人、纺织工人、丝织工人、市政工人等的罢工运动）作出评价外；我们还就加强和扩大罢工运动和巩固我们的赤色工会的实际措施问题作出了具体指示。

法租界铁路工人的罢工被彻底挫败以后，我们收到了关于纺织工人和丝织工人运动状况的详细报告，以及关于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上海总工会的组织状况和工作情况的详细报告。在我们局仔细进行讨论之后，特别是在收到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最近的报告之后，我们认为有必要赶快告诉你们，我们最坏的担心被证实了，这就是：

1. 工会领导机关，即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上海总工会，最近已经不按独立的群众组织行事；它们已经不履行其作为独立

的、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群众革命机关的职责；特别是最近在成立无所不包的行动委员会之后，它们只不过成了它们应当成为的组织的影子；仍只起到党组织的一些部门的作用。

2. 看来，行动委员会试图取代工会，因为现在工会的全部工作和职能都在由行动委员会完成和行使。

3. 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上海总工会同群众、同企业和同基层工会机构的联系受到很大削弱。最近的战斗，特别是纺织业和丝织业的战斗，证明了这一点。据那里的工会同志证实，具有出色战斗精神并同警察作斗争的工人，曾寻找我们的领导，但未能找到（离开企业的大多数丝织业工人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罢工，也不知道罢工的重要要求，因为在他们当中未做准备工作）。

4. 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同志提出的一切批评意见以及这些负责同志就实际取消工会机构问题和不能用行动委员会取代工会问题所表示的一点点怀疑，都被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因而讨论和弄清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都无法进行。主持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工作的负责同志多次向我们声明，他不能同我们讨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不应就此发表意见，因为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问题，他要执行政治局的决议和遵守纪律，就不应同我们谈论政治问题（！）

5. 每三天出一期的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机关刊物被取消了，这正是发生在我们很需要有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刊物，以便寻求接近工厂群众的途径和动员他们参加在我们领导下进行的有组织的群众性战斗的时候。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会被推迟到一月份举行，理由是，现在必须集中全力进行斗争和准备暴动。还以同样理由取消了铁路工人和海员的全国代表会议。这正是发生在这样的的时候，即几天前在上海举行的铁路工人代表会议明确地指出你们在这些工人阶层（鉴于即将到来的战斗；这些工人阶层

对于我们来说特别重要)中的地位特别薄弱的时候(不能说上海铁路工人代表会议是成功的,据我们的同志报告说,这次会议筹备得很不好)。

* * *

这些事实,以及上海无产阶级(电车工人、纺织工人、丝织工人等)最近所进行的一些重要战斗的经验,使我们不得不提请你们注意到,现在迫切需要尽快讨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绝不是“纯组织问题”,而是具有很大政治意义的问题)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1. 工会机构,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应该重新取得组织上的独立性。当然,它们应当把赤色工会置于党的严格领导和监督之下,但是在组织方面应是独立的,并应尽量同企业和同基层工会机构建立直接联系。上海总工会和其他工会领导机构当然也是一样。只有这样,赤色工会才能行使其组织和领导群众性战斗和罢工运动的重要职能;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企业里做加强我们的地位的工作。党组织不能也不应该试图取代工会机构。这样做只会削弱党,只会使动员企业群众、准备斗争和准备在作战时领导广大群众的工作无法进行。最近的战斗清楚地表明,对工会采取的取消主义政策已造成了有害的影响。

2. 行动委员会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工会。行动委员会是非常设机构,它们是为很固定的目的在很具体的情势下建立的,因此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真正做到取消群众性组织,更不用说工会了。它们不能也不应该试图取代工会和将其职能集中在自己手里,因为它们不能象工会那样,同群众、同基层组织保持联系,不能为罢工和其他行动做充分的准备(最近的战斗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等等。

3. 党应该立刻讨论工会问题、巩固赤色工会问题、实际建立产业委员会问题、实际筹备各种产业代表会议(据同志们自

已证实，这些会议至今还筹备得很不够，如铁路工人代表会议）问题，以及罢工委员会问题、对我们最近几次作战经验的利用问题和我们应当从几次战斗中汲取教训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政治局，而且在整个党的组织、在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以及在上海总工会，都应当是认真讨论的题目。现在比以前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提出罢工和罢工的准备问题。时至今日，总罢工和武装暴动问题在群众中讲得太抽象、太草率。例如，我们从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负责同志那里得知，大多数丝织业工人甚至不知道罢工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撤离企业里的工作岗位，但不知道罢工的具体要求。罢工没有准备好，而我们的基层工会组织放任不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断定群众不要罢工，说他们只要暴动呢？如果事先连本次罢工的直接具体要求都不向工人作说明，不作广泛宣传，不做必要的组织工作，这样怎么能动员群众举行总罢工和武装暴动呢？几千名丝织业工人的罢工如此迅速被挫败并不奇怪，正如同志们自己所说，工人未能找到我们的领导，尽管他们具有出色的战斗精神和斗争意志（同警察斗争、示威游行等）。我们未能协调纺织工人的许多分散的战斗，这也不奇怪，因为正如我们的同志所承认，我们在企业里没有做必要的组织工作。同样也不奇怪的是，虽然成功地举行了市政工人代表会议（有30名代表，代表20多个企业），但是法租界电车工人的出色斗争还是被挫败了，有44名积极分子被开除，80名工人受处罚，而我们未能把国际租界电车工人和电站、电话站以及自来水公司工人动员起来（尽管有市政工人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宣布同情罢工的决定）。

4. 我们不得不极其坚决地抗议政治局和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一些负责同志扼杀一切辩论和同志式讨论问题的做法。每次我们局想同工会同志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时，他们都向我们声明，纪律不准许他们同我们谈论政治问题。若是不能谈政治问题，那么有什么可谈的呢？什么时候能够把重要的工会问题同政治问题如

此分隔开,以致不准谈论诸如行动委员会的职能问题、工会组织上独立的必要性问题呢?若是分隔不开,有人就会说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其实,我们局同政治局已经商定,政治局可以派委员参加同工会同志的每次谈话。如果政治局执意不准许同志们同我们谈论政治问题或涉及某些争论的问题,那么我们真的是无法工作了。

5.我们还坚决反对取消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机关刊物或者把它改为不定期的出版次数很少的刊物。应该把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刊物办成比以前更为广泛的群众性刊物,在目前特别需要这样做,因为党和工会正面临着巨大的任务,首先是动员企业里的群众,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战斗。

必须尽快召开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会。我们同意这样的全会应当做好准备,但是必须让党和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现在就采取必要的组织步骤。全国产业代表会议也是一样。随心所欲地取消铁路工人和海员代表会议是不对的。必须做好准备在最近的将来召开这些会议。

同志们!在准备夺权时期,赤色工会是动员和争取群众的重要工具。对这个问题的忽视,或者对赤色工会的实际取消,都是与准备革命的任务完全背道而驰的。

盼速回复,并报告你们为取消这些错误措施而采取的步骤。

远东局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七: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共产国际
执委会远东局电

1931年1月15日^⑤

我们认为继续推迟成立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文职政府是极其

危险的，这会影影响建立根据地和建立纪律严明的红军。你们要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在赣南组建有较高威信的中心局，并责成它：1. 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2. 在会上选举中央人民委员会^②；3. 成立在中心局监督下工作的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4. 成立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工农检查机构和隶属于（直至地区）党委的，由工人、雇农和贫民组成的监察委员会，以便同混入党内的分子、官僚主义、暗中破坏行为和腐蚀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行为作斗争。在确保党对苏维埃政府的绝对领导的情况下，应该避免相当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参加政府。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应当由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中最有影响的积极分子组成，其中包括一些无党派人士。你们要尽快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尽可能直接参加这次会议，你们要制定一些措施加强苏区无产阶级的领导。

你们特别要制止不选举城市工人贫民代表苏维埃和将其作用同工会的作用混为一谈的做法。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你们要提出一个声明：不承认帝国主义者向南京和军阀提供的贷款，主张中国完全独立和统一。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八：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电

1933年3月

总的来说，我们赞同中央1932年10月16日给中央苏区的指示，现作如下补充：在决定军事策略问题时，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在保卫苏维埃领土时，必须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能让红军付出重大损失固守一处，这一点对于保卫中心地区尤为重要，必须预先确定和准备可以利用的退路，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

食保障的基地，使红军可以隐蔽和等待有利时机；必须避免同敌人大股部队发生对我不利的冲突，要运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瓦解敌军和消耗敌人的战术，还要尽量利用游击斗争方法。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和加强我们的有生力量，加强（军事、政治）学习，提高作战能力，加强纪律性，加快组建红军步伐。相邻苏区联合的方针并不排除而是要求建立新的苏区和我们同时拥有几个根据地，这会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周旋。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②。我们认为，在四川、在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必须设法里应外合占领苏区内仍旧是反革命巢穴的中心城市。对于大城市，如果有足够的兵力和充分的把握，则要采取旨在瓦解敌人、诱使敌军离开苏区而我们的有生力量又不遭受很大损失的包围战术。必须建立秘密活动机构和游击小组，它们应该在我军撤退时开展工作和进行斗争。要继续加强军政领导力量。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你们应该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到苏区的经济政策上。要研究和拟定相应的指示。请考虑我们的以下初步看法：业已恶化的经济状况迫切要求进一步明确和修订我们的经济政策，以及发展、鼓励生产，活跃市场和加快商品流转方面的专门措施。必须避免发生没有正当理由的重新分田现象，在老区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分田之后，土地应永久归农民所有。只没收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富农的生产资料。要给中农和富农规定不同的雇工条件，同时要给雇农制定临时规定。保留以前给富农提供份地的规定，但不能将此理解为禁止富裕农民租用、购买苏维埃控制的土地和雇用劳力。地方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应该认真重视播种和收获问题，有可能的话，也应重视社会工作。请加强预算纪律，厉行节约，尽量防止我们的货币贬值。要鼓励从事手工业生产和经

商。这一点应在税务政策上和为手工业企业徒工和工人所制定的临时规定中有所反映。同时不要忘记，社会立法、工会工作等等都应同经济实力和红军斗争的需要相适应。一方面，要开展保护工人利益方面的工会工作，支持和组织工人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绝不禁止罢工，但也不一定要采取罢工形式；另一方面，一切直接关系到生产利益和红军斗争需要的重大纠纷，都要由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属的劳动机关同发生纠纷企业的企业主和工会代表一起解决。必须避免劳动机关官僚化，这些机关在解决纠纷时，不仅要考虑当事工人的利益，而且也要考虑红军和苏区总的形势的需要。必须比以前更加重视合作运动的建设。我们苏区的政策应当表明苏区工农的生活条件与国统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苏区的政策应当为在国统区宣传苏维埃政权思想提供素材，当农民看到苏维埃政权比国民党政权优越时，他们就会拥护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我们苏区的政策在红军经过和未驻守的地区应带有明显的演示性质。请分项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九：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

1936年7月23日

我讲几点意见：我们需要根据关于实力状况和关于党的状况的通报，针对中国党的政策，针对它的组织、它的领导、它的干部、它的工作方法，等等，作出一个象样的有充分根据的决议。我们应该在另一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越快越好。

近几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军队，拥有武装力量，率领红军完成了英勇长征的党，正在日益发展和壮大。这一点一直

在鼓舞着我们，令我们钦佩。应该坦率地说：我本人在回来之后的这两年对这种情况是表示景仰的。我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钦佩、这种爱戴的影响。但我们对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的中国同志批评不够。

现在需要更带有批评性的态度。要强调积极方面，但也要指出缺点和弱点，并且要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克服这些缺点、这些弱点、这些消极方面。

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很好很勇敢的小伙子，他们很会打仗。但是，不能说，在政治方面，在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这种复杂的情势下，他们完全成熟了和做好了准备。我认为，王明同志在书记处面前对政治局决议提出的批评性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王明同志自己，以及我们这里的许多中国同志。这些批评性意见应该在我们这里的中国同志的发言、文件和文章中有所反映。

（王明）提出的建议，当然我们基本上都可以采纳。这些建议是对的。但总还需要作些修改。部分建议需要交由中国本土的同志去采纳和研究。

在中国的任务，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和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

我们的红军作为一个武装起来的拳头需要保留和加强，我们的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需要发展和加强。但是不只是为了扩大苏区、为着中国的直接苏维埃化和为着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现在应该强调指出，成立中华全国民族共和国，成立中华全国国民议会和通过这样的议会解决土地问题，可以把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激进的知识分子（这意味着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口、中国民众）联合在反对外部敌人——日寇的共同立场上。当我们同国民党和直接同蒋介石谈判时，因为我们主张

进行这种谈判，我们应该把以前谈到的条件和王明同志在这里提出的条件作些调整，应该从政治上统帅这些条件^⑥。譬如，可以这样做：我们共产党人和我们的红军、我们的苏区声明自己准备抗日并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族民主共和国。

这样一来，在这种斗争进程中，群众有组织地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斗争的时刻就会到来。在中国革命日益发展情况下，存在着我们在苏区拥有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这种情况。现在我们应该利用这种情况。这些阵地是中国革命争取来的，应该加以利用，以便更好地完成中国革命本发展阶段的任務。

同志们，如果看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一些民族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统一起来团结起来的。在这方面资产阶级捞到了资本。蒋介石现在也想捞这种资本，他摆出一副中国统一者的面孔，打着争取民族统一、反对分割中国的旗号反对苏区。可是现在，日本人在进攻，在占领满洲、华北，并打算继续向前推进，这种情况应该是团结、统一中国抗日民众以保证自身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强大推动力。这样，这场斗争的发起人和倡导者就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即以自己的队伍为后盾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余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基本任务。

由此可见，对待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是如何之错误。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晚解决了两三年，但是晚解决总比不解决好，现在要正确加以扭转。

蒋介石本人不想搞统一战线，他害怕统一战线，因此需要在中国创造这样一种局面，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在国民党中造成这样一种运动，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建立这种抗日统一战线，使蒋介石同南京军队的其他总司令们进一步同意建立全面的抗日统一战线。结果是，蒋介石利用中国革命中的民族因素，已把全民族的四分之三组织起来了，但是他不是争取中国的统一，反对各种军阀集团，反对分裂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斗士。明天他会在统一全

中国反对地方占领者口号下投入兵力进攻我们的苏区。这种情况要加以利用。如果我们共产党人向国民党这个党，向国民党中央^⑥提出具体的政治建议，我们的总司令部向蒋介石即向南京军队的总司令提出具体的政治建议，那就对了。我们的同志还应该同救国会^⑦即同该会组织者打交道。由此可见，我们的同志应该以全面抗日战线的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这样，在进行斗争和实现这种抗日统一战线过程中，就要争取建立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中华全国民族民主共和国和中华全国国民议会。到那时，我们苏区也向这个议会派出代表，我们苏区可以提出建立苏维埃作为中华全国共和国民主机构的问题，并可以继续加强自己的地位，直至中国劳动人民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取得彻底胜利。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今天给中国同志的指示限定在这个方面。但要等一等反映实际情况的真实情报，以便更确切地知道，如何帮助中国同志。其实很清楚，王明同志，对党的批评绝不意味着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威信，这种批评必定对党有好处。对中国党，我们可以提出比对爱沙尼亚党、拉脱维亚党等更多的要求。中国的事件具有世界意义并将产生世界性影响。

我建议以王明同志的建议为基础，委托王明同志和一些中国同志同我一起修改这个简要的决议和一些指示。至于其余的一切，需要推迟到新同志到来之后再处理。

争取发展中国革命的工作，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比如中国侨民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或者满洲问题，我们的中共中央在满洲做不了什么事情。这里出现一些很大的问题，需要作专门的讨论。要研究一下如何继续组织这项工作，如何具体地对待这项工作和在这方面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做些什么。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

1936年8月15日

我们看了你们1935年12月25日的决议和你们的电报通报，基本上赞同你们所采取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②，但是我们认为，党和红军的领导应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性质有明确的认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会给中国劳动人民带来严重后果。

1.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本不要求削弱苏维埃，不要求将红军溶入抗日大军和将共产党溶入中国某种总的政治联盟。

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组织在完全保持它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的情况下，在共同的抗日立场上的协调一致。在军事方面，抗日统一战线应该是红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在组织抗日联军问题上的协调一致。这些力量当中的每一支力量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都对自己的作战地段负责，在完成共同的作战计划任务时都服从统一的指挥。国防政府应该是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党派和组织的真正代表机构。

我们特别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要求大力加强党和红军。因此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报道。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维护队伍的纯洁和党的坚强团结。在有步骤地进行党员征集工作和特别在国统区要加强这项工作的

时候，必须避免大批接收新党员的做法，而只能接收工人、农民和学生中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人加入党的队伍。

我们还认为，不加选择地接收学生和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加入红军队伍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会破坏红军的统一和团结。

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应该对自己以前的经济政策作出重大修改，即停止不必要的没收，特别要停止没收小私有者出租的土地以及积极抗日的士兵和军官的土地，实行买卖自由。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允许有产阶级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有可能从内部破坏政权机构。

2. 中国业已形成的内部和外部局势，给党提出的直接重要任务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捍卫中国领土的完整和防止中国人民遭受全面的殖民奴役。

因此，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这是在目前条件下联合中国人民一切民主力量保卫祖国抵御日寇的最好手段。

中国共产党还可以声明，一旦建立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苏区将纳入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将参加中华全国议会，并在自己的区域实行为整个中国确定的民主制度。

3. 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

鉴于以上情况，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虽然蒋介石和国民党迄今

还是害怕同任何人签订抗日协议，但是这样做是必要的。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谈判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

在这次谈判要中讨论的我们的要求大致如下：

- (1) 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武装力量真正抗日；
- (2) 成立联合司令部，制定联合对日作战计划，条件是完全保持红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对日战线的一定地段；
- (3) 向红军提供相应的根据地及必要的武器装备和补给；
- (4) 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停止迫害国统区共产党人。

如果蒋介石置谈判建议和同他签订协议的种种尝试于不顾，继续组织进攻红军的军事行动，那么红军就必须同蒋介石的军队进行迫不得已的自卫斗争，同时要继续开展运动和采取具体措施，以争取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达成协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们认为，你们号召支持西南（军阀）集团反蒋的声明是错误的。从政治上讲，更为正确的是，坚决反对进一步挑起日本帝国主义所煽动的内战，以集中主要火力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4. 我们还建议你们更改你们提出的“立即对日宣战”口号。你们的口号应该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战争的掠夺性质和中国人民斗争的防御性质。因此最好提出“日寇滚出中国去”的口号和保卫领土完整、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自由的口号。

5. 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利用这种接触来开展我们对张学良军队的工作，巩固我们在他的各个部队中的阵地，并在士兵群众和军官中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军阀集团）失败之

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我们在等待你们的代表的到来，以便详细地讨论你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和作出全面的答复。

书记处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十一：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关于和平解决西安冲突的必要性问题^②

1936年12月16日

答复你们的来电，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1.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既然这次行动已成事实和应当顾及事实，中国共产党要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①通过吸收若干反日运动的代表和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

②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③停止执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④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最后，我们建议不提同苏联结盟的口号。

书记处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十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关于中共领导在西安事变之后的方针问题

1937年1月19日

我们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具有特殊意义，但是这种解决办法可能受挫，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极力挑动内战的走狗在搞阴谋，而且也是因为你们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

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党以前的方针（即力图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虽然最近党对自己的政策作了一些修正，但是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特别是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发出的指示证明了这一点^②。实际上党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被看作是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而不是同他们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一切，助长了亲日派的气焰。

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首先是争取使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放弃消灭红军的政策，争取同南京共同抗日，即使初期没有正式协议。因此，党应该公开宣布和坚决执行这样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措施。

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军队的合作问题，应服从于完成这一主要任务的需要，并应在这方面向这些军队施加各种影响。在西安地区，不应组织共产党的公开行动；不应就蒋介石在西安的承诺大发议论；不应提出立即对日宣战要求；不宜强调同苏联结盟口号。

同时，在全国，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必须加强群众运动，争取实现全国的统一与和平，以反对外来侵略，并且必须要求制止亲日派策划的讨伐行动。一旦讨伐军派出，你们的任务则是自卫，但是你们自己无论如何不要为这种事态转折提供口实。

在任何情况下，尤为重要的是保持共产党和红军的统一，因为这是顺利克服你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的保证。

必须认真注意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他们在西安同在全国一样，试图以其挑拨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事业，他们是日寇的走狗。

我们觉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应该取消她以共产党名义或以共产党的所谓可靠人士的身份露面的机会。应该在报刊上严厉批评她的行为。

候复盼告你们本着本指示精神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书记处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十三：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1937年1月20日

鉴于中国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在日本侵略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你们不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民主的人民革命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吗？

这首先意味着：1.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2.将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3.仅在中心城市保留苏维埃，并且不作为政

权机构，而作为群众组织；4.放弃普遍没收土地的做法。

方针上的这种改变是否有助于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来保卫祖国和建立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

请认真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并将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之后我们这里也可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书记处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十四：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1937年2月5日

我们认为，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最好只是声明共产党和红军决心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各种旨在停止内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的措施；共产党和红军准备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进行协商，以便对苏区政权实行民主改组，并在承认南京政府为全国政府的基础上调整南京政府同苏区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们建议，暂时不发表关于我们苏区政策作哪些根本改变的具体声明。这个问题需要仔细讨论，并需要极其认真地使各个党派、接近我们的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我们政策的这种急剧变化作好准备。请尽快告诉我们你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

书记处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十五：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关于国民党三中全会问题

1937年3月5日

我们认为，就国民党三中全会决议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答复：中共为全体中国人民渴望国内和解，以团结一切力量抗日之意志所感动，准备以三中全会提出的条件为基础开始具体的谈判，调整两党之间的关系和两党在准备和实行联合抵抗外来侵略者方面的合作关系。在中共告国民党全会书中已经确定更改红军和苏维埃的名称，服从统一的指挥和服从中央政府。关于三民主义，中共以前也未曾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它准备为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些原则而奋斗。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共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真诚希望将中国人民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为此，中共已经不止一次地呼吁停止内战，并自动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等。

书记处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十六：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②

1937年8月10日

王明同志的报告是有点儿鼓动性，有点儿乐观的^③。他很清楚，我们也不止一次地同他谈过（因为我在较为直接地研究中国党的问题），摆在中国党面前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党内的情况是

很特殊的。

请想一想最近两年发生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红军的领导者，它正在作出根本性的转变。大家再也找不到一个共产国际支部，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状况和象中国共产党这样用几年时间在自己的政策和策略上作出这种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和苏区进行了斗争，它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创建了军队，并为苏维埃化从蒋介石那里夺得了部分军队，等等。

在苏区，党的干部、党的经费、党的力量，都是集中使用的，如果说不是集中100%，也可以说是95%。在同南京进行的武装斗争中，教育了干部。一批干部，一批很好的干部成长起来了，一批政治活动家也成长起来了。

但是，现在在党的政策和策略上需要由此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于是还是这些干部，不是另一些人，不是新的人员，而还是这些党员，这些群众，必须执行另一种政策。

这种政策对吗？对的。它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总路线是一致的，并且符合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苏维埃化了，而是保护中国人民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吞噬。必须在反日斗争中把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联合起来，以确保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因此，党应该转到（它基本上也这样做了）不是争取中国苏维埃化，而是争取民主化，争取本着民主原则把中国人民的力量联合起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上去。

因此现在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同蒋介石谈判^②。我们党对此已有准备，已着手对苏区进行实际改组和改建，要把它们改建为民主地区，那里的苏维埃政府将改组为特区政府，那里的红军将改编为不是苏维埃红军，而是全国反帝大军的一部分，等等。

对于我们中国同志和中国党来说，由此可能产生一些很大的困难和危险，我指的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他的包围。不难想

象，这里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出现在我们党面前。这个时候很需要帮助，需要人力上的帮助，需要加强中国国内干部力量。应当帮助中国共产党，以使它能够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自己的力量，加强自己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中的影响。

但是要知道，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工人所占的比例很小，就是在党内工人的比例也很小。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将中国工人群众、工人阶级置于共产党的影响之下，而不是国民党或其他政治集团的影响之下，使党不但能够依靠它所拥有的武装力量，而且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依靠国民党统治区（如上海、广州以及中国其他重要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

国外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可以帮助党。向华北输送干部尤为重要，这是应当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有可能更加仔细地研究中国党的文件，那么就可以再指出一些可能使党误入歧途的观点，这些观点含有一种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即解除其思想武装的危险性。这里需要作某些纠正，但是从我们这里作纠正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为此需要有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头脑清醒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中共本身也需要帮助，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而战争将来也不会停止。这场战争不会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即仅仅以占领华北而告终的事件。不会的。

王明同志在这里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即便在这场战争中有某种喘息，这次占领行动也意味着要加强日本军阀在中国进一步发动进攻的阵地，更不用说针对苏联的前哨阵地了（原文如此——译者注）。

问题是，将来党中央、它的全体人员、它的机构和它周围的人们，还能否进行工作，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现在中国同志倒真的需要赶快尽一切可能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积极因素，建立党中央同党员群众、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密切联系。我

想，这个问题我们将和中国同志一起在小委员会里单独讨论。要仔细研究具体建议，但不能这样乐观。情况不坏，但应看到困难，应考虑到困难，不能把希望建立在沙堆上。否则，无论对于中国同志，还是对于我们，都是不好的。

另一个问题是在日本要做什么工作？日本国内当前情况如何？难道国际无产阶级就找不到机会对国内民众情绪施加影响，对国内民众肯定存在的反战情绪加以利用吗？这也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军阀。我们从可靠的情报来源获悉，日本国内在财政上有困难，日本政府一直在设法借债，它到英国去借，因为德国虽与日本签订了反苏条约，但不给它钱……它在伦敦未能如愿以偿，现在又打算到巴黎、纽约去借。我们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难道不能掀起一场运动，阻止或谴责借钱给日本军阀使之能对中国人民宣战的行为吗？这种运动是可以掀起的。在法、英等国都有大报纸，要动员同情中国人民的舆论界著名代表人物在议会里和在报纸上提出这个问题，使当局不能轻而易举地把钱借给日本军阀。这和许多其他措施都可以作为对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

我想，所有这些具体的问题都需要提交委员会讨论，而王明的这篇很好的报告需要改写成文章，不过要加上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内容。要为《国际新闻》写这样一篇文章，使它能动员群众保卫中国人民，而不致使人得出在中国建立抗日人民战线的事业进行得百分之百的顺利的结论，为此需要进行坚持不懈的日常斗争。如果说，我们在西班牙把斗争时间拖得如此之长，以至现在还看不到尽头（有人说西班牙共和国的决定性保卫战将在春天进行），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在中国将是什么情况，这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将持续多长时间和将在什么样的范围进行……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十七：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援助
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决议

1937年10月3日

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对西班牙发动强盗式入侵之后，日本法西斯军阀紧接着对中国发动了进攻。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反侵略防御战，正在以自己的战斗行动捍卫和平事业，反对和平事业的破坏者：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国家在追求掠夺性的目的，要奴役中国和西班牙两国人民。中国和西班牙共和国正在进行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德国和意大利试图将法西斯制度强加给西班牙，日本试图将法西斯军阀统治强加给中国。西班牙人民在为自由、为捍卫自己的民主共和国而同外国干涉作斗争，中国人民在为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利、为争取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实行民主改革而斗争。如果日本在中国取得胜利，而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在西班牙取得胜利，这就会给厚颜无耻的法西斯国家开辟掠夺和侵略的新时期。在欧洲，这将意味着德国法西斯进攻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丹麦；这将意味着对法国实行法西斯包围和对它宣战；这将意味着意大利法西斯在地中海的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即意大利法西斯对非洲的进一步渗透；这将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直接威胁法属印度支那、印度、澳大利亚和菲律宾；这将意味着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武力瓜分英国殖民领地；这将意味着对和平、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宣战；这将意味着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运动的兴起和法西斯的再次进攻。因此，各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反对德意干涉西班牙的斗争，也就是他们为维护和平和反对本国法西斯而进行自卫的斗争。因此，各国人民群众应该为在中国

打败日本法西斯军阀，为在西班牙打败德意干涉竭尽全力…

…

1. 国际保卫中国运动的性质

必须使保卫中国运动具有广泛性，无论如何这种运动不应带有狭隘共产主义性质，不应主要靠共产党本身的力量来进行。必须利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后备力量，利用日寇在欧美国家各居民阶层中特别不得人心的这种情况来保卫中国。为了给保卫中国运动创造广泛的基础，必须发动人民战线委员会，和平之友协会，国联之友协会，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会和妇女、学生等组织，以及与之合作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益于援助中国人民事业的政党。在反日斗争中，必须利用那些从经济角度关心维持中国的秩序、安宁和正常经济生活条件的组织和个人。

2. 运动的形式

运动的形式应该是：组织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在议会中提出质询、在报刊上展开宣传、发表告各社会组织书、派专门代表团到各地进行巡回鼓动，等等。

为了更好地开展运动和协调保卫中国的行动，必须在欧美各国（即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建立专门的保卫中国委员会。要尽量组织更稠密的这种委员会网，同时要争取使著名的政治、社会和科学活动家，以及工人代表和其他组织代表参加这些委员会，但不要突出共产党人在这些委员会工作中的作用。

3. 运动的宗旨

运动的宗旨是争取把日寇赶出中国和全面援助中国人民抗日。为此，（1）必须使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停止从外部向日本军阀提供任何援助（如提供贷款、原料和武器装备，进行贸易等）；

（2）同时必须做到真正援助中国政府（提供武器，保证向中国运送武器自由、从财力上援助中国政府，如提供贷款、借款和进行贸易等）。

4. 运动的内容

根据自己的宗旨，国际保卫中国运动应在下述口号下开展活动：

(1) 日寇滚出中国去；(2) 一分钱也不要给日本军阀；(3) 对野蛮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和平居民的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阀实行经济制裁；(4) 抵制日货、封锁日本原料来源；(5) 各民主国家要对日本法西斯军阀这个远东和平的破坏者采取各种政治、经济措施。

在整个宣传运动中，必须揭露日本军阀及其帮凶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作辩解时所提出的种种厚颜无耻的论据的卑鄙与虚伪：

(1) 日本法西斯军阀硬说，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代理机构，这是无耻的谎言。中国全民族抗日战线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广泛民族运动的产物。

(2) 日本法西斯军阀硬说，它正设法在中国建立“秩序”，在远东建立“和平”。这是无耻的谎言。日本法西斯军阀在竭力阻止中国建立民主秩序，在维护中国的封建残余势力；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挑动中国内战，借助其奸细唆使一个军事集团反对另一个军事集团。日本政府一方面在远东制造帝国主义的混乱和劫掠，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一方面退出国联，拒绝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千方百计破坏每一个旨在巩固远东和平的步骤（例如破坏苏中互不侵犯条约），并同德国缔结进攻苏联的军事联盟。

(3) 日本法西斯军阀硬说，日本因“人口过剩”不得不靠损害中国来扩大自己的领土。这是无耻的法西斯主义谎言。中国“人口过剩”不亚于日本。日本人民的贫困是掠夺性和寄生性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而不是“人口过剩”造成的。日本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提高日本民众生活水平而不是对他们进行掠夺的途径，建立广阔的国内市场，不再去掠夺其他国家人民。

此外，还必须广泛宣传日寇空前野蛮地对待中国和平居民的种种事实。

5. 保卫中国委员会的活动方针

必须通过保卫中国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组织，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反对日本军阀对国际条约的粗暴破坏，反对日本军阀封锁中国沿海，反对日本军队利用国际租界和外国租界进行战争，反对有利于日寇的中立政策。必须要求本国政府和国联执行对日制裁政策，首先是禁止向日本出售任何用于战争目的的物资和武器，拒绝向日本提供贷款，拒绝向日本供应原料。必须要求本国政府同中国保持正常贸易关系，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允许中国民众在外国租界举行爱国运动和坚决抗议日寇对待和平居民的野蛮和惨无人道。

保卫中国委员会应该广泛开展募捐、救济难民和救济侵略受害者运动，应该号召军事专家到中国去，应该千方百计帮助把那些表示愿意积极参加中国人民的正义民族解放斗争的飞行员和其他军事专家派到中国去。委员会应该组织和派遣医疗队、难民救济站等到中国去。为了更好地向国际社会报道中国事态的发展，委员会应该组织和派遣有声望的代表团到中国去，组织和派遣记者前往中国的各个战场。

必须通过工会使海员和码头工人拒绝给日本船只和其他国家向日本运送武器装备的船只装卸货物。

6. 关于帮助南京官方代表团开展活动的问题

应该给予由中国五位著名社会活动家组成的代表团以特别的关注和全面的帮助。代表团是专为加强欧美国家保卫中国运动而启程的。应该利用代表团在欧洲国家逗留的机会，向共产国际、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和其他争取和平的国际组织，提出采取联合行动保卫中国的问题。必须借助这个代表团并在它的领导下，在旅欧华侨当中和特别是在旅居印尼、菲律宾、马来联邦和

美国的华侨当中广泛开展募捐和以各种方式援助中国的运动。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十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 中国问题的决议

1940年3月11日

一、关于对中国青年的动员问题

1. 中国人民的抗日解放战争已使绝对忠实于本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广大中国青年群众行动起来，投入了斗争。绝大多数的中国青年是帮助中国人民抗日的一支可靠的和人数众多的力量。这支力量，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已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准备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但是抗日战争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中国青年应当看到这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向敌人投降。目前中国国内外形势都很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抗日战线队伍中存在投降派和妥协派的情况下，投降已成为直接的实际危险。为了在国内给投降铺平道路，投降派和妥协派都在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边区以及中国青年运动施加的压力。解散许多群众性青年组织、禁止出版青年刊物、干预青年活动、禁止青年学生去陕北学习和前往游击区，这一切都说明，投降派和妥协派试图通过对青年运动施加压力和分裂这个运动的方法达到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之目的。因此，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最主要任务是：动员中国青年的一切力量同投降行为作斗争，坚决把抗日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2. 为了动员全中国青年反对投降和无条件地把抗日战争继续进行下去，首先必须在青年当中做认真的思想解释工作。要使广大

青年群众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投降派取胜，中国青年就会过被奴役的生活，就会失去自由、文明和对光明未来的希望，而全体中国人民就会丧失民族独立和以巨大努力及自己忠诚儿女们的鲜血为代价所取得的成果。因此，青年应该是抗日统一战线中最英勇最忘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必须使中国青年明白，中国人民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将为青年和全体人民开辟通向自由、文明生活和幸福未来的道路。要使青年明白，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为此必须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同国内投降派作坚决斗争，坚持把抗日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同时要争取政治进步，争取扩大和加强中国人民及其青年的统一战线。部分青年幻想英、法、美会以仲裁者身分出现来保证中国人民的胜利，对这部分青年，要做消除这种想法的解释工作。要向青年说明，帝国主义列强的这种行动不会有利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战胜敌人。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青年救国组织联合会和所有在它们影响之下的组织，都应该在报刊上，以及通过组织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通信、演出等方式做这种思想解释工作。

3.但是，为了同主要危险——投降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为了把抗日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必须团结全体青年，不管他们属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队伍中的哪个组织。至今，中国青年运动的弱点是，中国现有青年组织（“西北青年救国联盟”、“青年抗日先锋队”、山西的“牺盟会”、“三民主义青年团”等）不仅彼此互不往来，而且有时还互相争斗，有一些组织甚至表现出敌对情绪。这种关系给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造成了损失，而且中国人民的敌人还会利用这种关系来分裂青年队伍。由此可见，虽然青年在抗日战争中有很大的积极性，但是中国迄今尚未建立起可以把中国所有青年组织联合起来的广泛的全国青年运动。因此，

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和青年救国组织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消除青年组织之间的这种敌对的不友好的关系，建立这些组织之间的牢固的长期的合作关系，以便更有效地动员青年抗日，反对投降派和叛徒，提高中国青年的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水平。青年组织的合作关系，无论在个别地区，还是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在这些组织共同帮助中国政府和军队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青年组织的联合行动可以是：共同号召和组织青年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军；在后方组织军训；成立参加前线作战的青年队；做本地村长工作；在敌占区组织瓦解日军工作；共同号召和组织青年去参加游击队；为军队组织各种募捐和募集棉衣活动；组织支前运动；共同动员青年搞好后方生产；参加救济难民工作；在工农青年中开展文教工作，等等，等等。各种青年组织通过这些行动将向人民表明，这种联合行动的做法是继续进行抗日战争所必需的。这种做法可以打破国民党队伍中的反动派对发展青年联合行动的阻挠。另一方面，通过青年组织的这种联合行动，开始可以在一些城市和一些省份把青年团结在一起，尔后可以建立统一的全国青年运动。

4.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引导青年参加抗日民族战线和更卓有成效地为青年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而斗争，必须实行把中国现有一切主张解放中国人民的青年组织联合起来的方针。这种联合可以采取联合会形式，或者某种别的形式。加入这种联合组织的各青年组织都保持其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在抗日这个共同的立场上实行联合，并设立共同的领导中心。青年组织的这种联合会式的联合可以以下列几点为基础：1、组织中国青年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帮凶——投降派和妥协派的斗争；2、引导所有未参加组织的青年和分散的青年组织加入抗日统一战线和统一的全国青年运动；3、为改善青年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而斗争。青

年的这种联合会式联合组织的建立对于国统区（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和青年救国组织联合会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这里）以及日占区青年运动的发展将会产生影响。在这些地区，特别是在工业中心城市，青年的这种联合将有助于青年运动的发展，首先是工人中青年运动的发展，有助于引导青年运动加入反日斗争战线（瓦解日军和争取实现青年的要求）。青年救国组织联合会应当首倡建立这种可以把所有中国青年组织联合起来的组织。

5. 必须设法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参加建立这种全国性青年联合组织的工作。为此，需要在这个组织内部做有利于建立这种联合组织的工作，争取使它不致被利用去镇压其他青年组织，不致去充当分裂抗日战线分子的工具。要开展一场运动，促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彻底实行民主化，争取让进步分子担任该组织领导职务。

6. 为了更加广泛地引导边区青年参加反日运动，必须使这些地区的青年组织加强提高青年一般文化水平的工作（扫盲、组织青年学习班等），还要通过组织各种体育小组、军事小组、训练班和举行运动会等方式提高青年的军事体育素质。在游击地区，应该认真注意在没有青年组织的地方，建立新的青年组织，同时要使现有的救国同盟成为有生命力和有战斗力的组织。它们应当同那里为数不多的国民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于游击地区的青年组织来说，联合行动可以是组织抵制日货、改善青年经济生活之类工作。

7. 要做好发展中国青年运动这样一项艰巨而严肃的工作，需要培训坚定的干部，需要对青年进行认真的深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需要加强同投降派、托洛茨基分子和中国人民的其他敌人的无情斗争。必须更广泛地建立青年学习班、联共（布）党史和斯大林论《列宁主义问题》学习小组，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形式的组织网。特别需要在青年工人当中广泛开展这项工作（要从青年工人中培养从事青年工作的优秀干部），以便加强和

发展青年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联合行动。

二、关于组织问题和干部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注意到中共中央领导的团结和党内有一些久经锻炼和战斗考验的干部，同时提请党的领导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中共没有彻底执行布尔什维克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内民主原则（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共所处的极其困难的斗争条件造成的）。党有11年未召开代表大会了，这期间也未举行过一次全党代表会议，因此，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80%的委员和候补委员是自行遴选的；六大关于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参加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未得到履行（在目前的中共中央组成中工人只占11%），如此等等。

第二，中共对考察干部问题和把他们提拔到党的领导机关的问题尚未给以应有的重视。对干部工作（即对干部的登记、考察、提拔和教育）的组织还不令人满意。以前进入党的领导机关的人员中出现不少叛徒，这证明，在选择领导干部时，没有切实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审查，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性。

鉴于上述情况，中共应当提出以下几点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1. 中共领导机关应当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内民主原则，为此，可以利用现有一切手段。必须提拔经受过考验的新干部，特别是来自工人当中的新干部担任领导工作，同时要更重视对他们的培养、对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布尔什维克式的锻炼。

2. 为改进中共干部工作，中共中央最好设干部部，其任务应是挑选、考察和推荐党的领导干部，然后由中央书记处或中央政治局批准任命。干部部的领导应由一名中央书记担任。

3. 鉴于即将举行中共七大和改选党的领导机关，要认真注意

选拔经受过考验的诚实的人参加党的领导机关。

4. 中央政治局要成立一个小型委员会，审查现有有关某些中央委员活动情况的材料。

三、关于中共书面和口头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作的安排问题

1. 在莫斯科开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应派来3名精通俄语和汉语的熟练工作者。

2. 在中国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部分著作（6卷本列宁文选、两卷本列宁选集、两卷本马克思选集等）的翻译出版工作。翻译和编辑人员应由中共中央确定。

3. 在中国再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因为现版印数没有满足党员群众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需要。

4. 下个月，在莫斯科出版两万册斯大林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并按寄去的纸型在中国大量翻印；中共应该广泛开展宣传和学习这部经典著作的运动。

5. 在中国组织力量编写有关现实问题和马列主义理论问题的通俗小册子，翻译将由编辑出版部寄去的英文、德文和俄文小册子和手稿。

6. 在上海组织出版日文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7. 在中国为日本士兵和俘虏组织出版少量通俗小册子，为此，编辑出版部将寄去日文铅字。

8. 在共产党出版的杂志上转载由《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寄去的《共产国际》杂志所刊载的部分文章和资料。

9. 利用在中国组织出版的学术理论性杂志《世界科学与艺术》，刊登一些论述马列主义理论问题的文章；宣传部要给这家杂志寄去苏联杂志上刊登的资料和好文章。

10. 在原特区（边区）党组织中，建立广泛的党员和同情者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研究现行政策问题的小组网，

在国统区党组织中建立议政小组网。

11. 加强对专职宣传干部的培训，为此要在延安马列学院设宣传系。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十九：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

1941年1月4日

致毛泽东：

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该执行破裂的方针，相反，应该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尽我们共产党和军队所能作出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扩大^②。请重新考虑一下目前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并将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告诉我们。

季米特洛夫

按档案文件发表

文件二十：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信

1942年6月15日

目前的局势绝对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它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尽量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加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首领在想方设法离间共产党，其目的在于使共产党威信扫地，陷入孤立。如果我们的人接受这种离间，而不是明智地对此作出反应，那么就不能认为我们方面的政策是正确的。有消息说，周恩来在重庆未考虑到这一点，有时以自己的行动助长了离间者的气焰。周恩来同蒋介石的对手和外国记者举行过一些反蒋秘密会议。蒋介石当然知道这些会议，并且利用这些会议进一步唆使人们反共和为其离间伎俩作辩解。

请认真注意这一情况，并采取紧急措施使中共驻重庆代表处执行坚定的、始终一贯的、旨在改善共产党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政策，并从自己方面避免发生一切可能导致这种关系更加紧张的做法。必须直接同蒋介石弄清争执的问题并尽力设法解决这些问题。请将你们就此问题采取的措施和作出的决定告诉我们。

季米特洛夫
按档案文件发表

注 释：

①原文如此。在1921—1926年间的中共文件中，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称作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共产国际文件中称中央委员会。

②原文如此。

③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1925年3月21日至4月6日）。这次会议注意的中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④指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⑤原文如此。

⑥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

⑦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总政治顾问M·M·鲍罗廷（1884—1951）。1919—1923年鲍曾在共产国际工作。

⑧即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B·K·布留赫尔（1890—1938）。

⑨指武汉国民政府。

⑩指用电报转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成立中国苏维埃政府的指示（1930年7月28日）。

⑪指驻扎在苏区的中国红军部队。

⑫原文如此。

⑬即中华全国总工会。

⑭即中共中央政治局。

⑮文件日期按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时间确定。

⑯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⑰1932年秋，在敌人优势兵力逼迫下，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鄂豫皖苏区，转入四川北部，1933年初在川北建立新的苏区；红二方面军放弃湘鄂西根据地，转入湘鄂

川黔交界地区。中央苏区（赣南、闽西）领土扩大了：1932年夏，红军主力打退了从南面入侵中央苏区的粤军，秋天向福建省进军，占领许多县城。

⑳原文如此。

㉑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㉒可能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青年爱国组织，成立于1936年9月（此注不准确，似应为1936年5月31日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称中国人民救国会，简称救国会——译者）。

㉓1935年12月25日，处在陕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了解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中国代表团会议建议之后，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然而《决议》含有严重的内在矛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当时的主要敌人是日寇，因此提出了不仅吸收地方集团而且吸收蒋介石集团参加统一战线的可能性问题。

㉔这份电报是由季米特洛夫校阅签发的，部分已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杰出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一书中发表。

㉕可能指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方针的指示。

㉖此文件曾部分地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1982年第9期上。

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王稼祥、邓发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8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专门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论中国局势和中共的任务的报告。

㉘国共两党谈判结束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

㉙随着国共两党之间关系的紧张，直至1941年1月在皖南发生武装冲突，中共某些领导人实际上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问题。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考虑到国际条件以及中国国内政局（主要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力量对比），不但坚决主张维护统一战线，而且主张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

动 态

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现状*

〔日〕国分良成

王 应 一 译

中日关系自1972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一直在不断发展。1984年,两国政府建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相当于多年来为增强美日关系而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美日贤人团。这个新成立的中日委员会,由中国问题政治学家、庆应大学校长石川忠雄和45岁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共同任主任。委员会每年开会,深入探讨中日关系问题。1982年以来,中日轮流在东京和北京召开两国民间会议,百余名中日实业家、政治家和学者聚集一堂,全面研究中日关系。1980年起,两国部长在每年一度的部长级会议上,回顾当年工作。

这些接触以及中日扩大贸易,增进了两国之间的旅游和日本新闻工作者对中国的了解,使中国在日本树立起一个新的形象,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刊也增多了。以前中国难于接近,往往被视为一个奇怪而不可思议的国度。现在对中国则产生了一种“天真无邪的”浪漫主义,例如,制作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随后中日又联合拍摄影片(主要的一部片子是《一盘未下完的棋》),并

* 本文译自英国《中国季刊》1986年9月第107期。作者为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副教授。

且兴起旅游热，在中国居住过的人重返中国寻访故旧。偶尔有些观察家说中国“穷”或“脏”，尤其在发生终止宝山钢铁厂合同之类的事情之后。但是，现在许多日本人说中国是“一个带有一定传奇性的发展中国家”，并大谈中国地大物博。1983年6月政府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17%的日本人认为中国是日本“最伟大的朋友”，理由是两国地理上接近，中国具有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只有美国所得的百分比高于中国，为39%，而认为苏联是日本最伟大的朋友的人只有3%。这次民意测验还表明，对测验作出回答的人中，有72%的人说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友好”，对美国态度“友好”的人也是这个百分数，只有9%的人对苏联“友好”。

虽然中日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但日本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在西方却受到很大忽视。诚然，诸如费正清、阪野正方、镰地纪子和威廉·斯基纳等人，曾经用英文出版几本关于日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目，但是查一下近年来《中国季刊》和数量与日俱增的有关中国的英文专著，就会发现其脚注中很少引用当代日本研究中国的论著。日本学者虽然注意西方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但他们却未向西方介绍自己的著作，本文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把日本关于现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现状作一概要介绍。重点谈学术界和社会团体的研究项目以及刊物出版情况。

组织和刊物

日本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大都加入日本亚洲政经学会、日本国际关系学会或现代中国学会。日本亚洲政经学会，每年举行全国会议和地区性会议各一次；日本国际关系学会，每年举行两次全国会议；现代中国学会，每年举行一次全国会议。

日本亚洲政经学会，有会员6百人，出版《亚洲研究》杂志，偶尔也出版专著。

日本国际关系学会，现有会员千余人，其中有不少现代中国

问题学者。其会刊《国际关系》(季刊,附有英文摘要),以研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东亚新的国际环境为中心。该学会有若干分会,中国问题学者都在东亚政治史分会。近年,在这个分会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大约由40人组成的民国史研究委员会。

现代中国学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日本毛主义分子的控制而发生分裂,但后来进行了改组。学会现有会员3百余人,出版年刊,综合刊载全国会议上的论文。

除这些学术团体外,还有几个现代亚洲研究机构开始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亚洲经济研究所,隶属通产省,聘用约10余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出版《亚洲经济》(月刊)、《亚洲经济资料月报》和一份英文季刊《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所还主持中国经济问题研究项目,出书发表研究成果。近年出版的新书有《中国经济的国际化 and 贸易发展》(1981年),收入8篇有关中国70年代贸易政策方面各种问题的论文;《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980年),收入6篇经济政治专家的论文;《越南战争以后(1975~1977年)的亚洲和中苏关系》(1978年),分析了中苏在亚洲的领土争端。

日中经济协会,主要从事于促进同中国的贸易,包括中国市场调查和组织访华代表团。1972年以来,协会发表约2百份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其中有经济调查、统计数字汇编和中国官方重要文件的日译本等。协会还出版两种月刊:一为《中日经济协会会报》,刊载有关中国经济的资料与分析性文章,以及对中方官方人士的访问记;一为《日中经济资料》,每月综合报道中日经济关系现状,并附有书目、统计数字等。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1954年成立,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相当,充作中日贸易谈判的媒介,进行市场调查,并举办贸易展览会。贸促会出版《国际贸促会会报》和《国际贸易新闻》两种周刊,集中报道中国经济和中日贸易事宜;还出版以下几种年

刊：《国际贸易统计资料》、《日中贸易必携》、《日中贸易企业名簿》、《日中贸易机关便览》；半年出版一次的刊物有《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指南》和《日中贸易概况》两种。

日本贸易振兴会，设有中国调研组，出版的刊物有《中国经济》（原名《中国经济研究日报》），每期刊载论文，详尽的统计数字和有关中国经济的日文译文；英文双月刊《中国时事通讯》，主要译载日本大报刊上的文章，并报道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情况。

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接受外务省部分资助，设有中国问题调研室，组织研究一些具有特殊性的大课题。出版的书籍有：《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1~12卷，其中收有自建党至1949年党的许多重要文件，还收有中共及其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公开发表或内部印发的文件；《新中国资料集成》1~5卷，起迄时间为1949年至1958年，利用了中国的报刊公开发表的材料；《中国大跃进政策的实施》1~2卷，为1958~1960年官方主要文件汇编（以上书籍分别在1968~1975年出版）。研究成果也出书，诸如近年出版的《80年代的中国经济》，由9位经济学家对中国80年代的前景作出展望；《现代中国的政治结构》（1982年），收入10篇评论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要问题的文章；《中国外交》（1983年），汇编7篇研究中国如何制定对外政策的论文。近年这个研究所还完成了两项新课题，有待发表。一项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再考察，另一项是1978年以来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研究所出版《国际事务》月刊，常登有关中国的文章；还出版《国际年报》，每年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问题作出总的估计。《国际事务》附有非常详细的书目，其中有关于中国的资料。

中国研究所，一向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的“中国代理人”，近年来似乎随着中国改变方针而进行了改组。近年的出版物很稳健。期刊有《中国年鉴》（原名《新中国年鉴》），综合登载一年大事；《中国研究月报》刊载中国问题各方面短篇论文和书评；

《中国研究》(季刊)1985年秋创刊,发表有关现代中国的专题论文。

东洋文库,为国会图书馆的分馆,藏有丰富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资料,尤其是在历史文献方面。东洋文库东亚文化研究中心,近年用英文出版一部内容很完整的机构名录,题名《1981年日本的亚洲研究机构》。

霞山会,隶属外务省,以出版两种有关中国的重要图书而闻名。《当代中国人名辞典》大约每两年再版一次,大概是同类辞典中内容最齐全的一部。《中国总览》,也是每两年再版一次,记载当代中国和台湾的各种问题,范围很广。霞山会还出版《东亚》月刊,主要刊载论述中国当前事务的文章。

亚洲调查会,由《每日新闻》主持,在推动出版和组织会议方面特别活跃。调查会出版《亚洲时报》月刊和《亚洲季刊》。季刊常刊登关于中国的重要文章,包括非日本学者的著作。

广播出版社,每年用两种文字出版《中国组织和人名录》,此工具书为中国问题学者所广泛利用。该社还每十天出版一份《中国内外动态》,有时还在那上面发表机密文件,例如曾登载1980年11月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和“中共23号文件”(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领导人的讲话)。

日本各大学未设东亚或中国研究中心。然而某些大学有特设的研究小组或研究人员,专门研究现代中国。设专人进行研究的机构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庆应大学新设立的亚洲研究中心,索非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成蹊大学亚洲与太平洋研究中心,东京大学地区研究院,筑波大学国外研究院,爱知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大东文科大学东洋研究所,正在编纂现代中国文献汇编,拟编10卷,已出版3卷。这套丛书题名《现代中国革命重要资料集》,其中有公开发表与内部印发的重要文件,分为若干专题,诸如“赞成文化大革命”,“反对文

化大革命”，“八大路线和四个现代化政策”等。产业能率(Sang-yo Noritsu)大学曾出版《中国动态》季刊，登载有关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和报刊文摘，但已于1984年停刊。

此外，还成立了许多非正式的研究小组，如满洲研究小组，东亚研究小组，中国经济研究小组，等等。简直说不清有多少小组，大部分学者都参加两个或三个小组。

1978年签订中日长期贸易协定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日本许多大公司均设立中国调研室。大贸易公司，如三菱、三井、藤忠、丸红、住友、日商岩井、东洋棉纺、兼松江商、日商等，均在其东京营业部设立中国调研室，内有工作人员20~30人。这些部门提出了大量研究报告，但很少公开发表。

许多大公司还在中国大城市设立营业处。例如，1983年丸红公司在北京、上海、大连、广州、天津、青岛和福州的营业处，工作人员共计有日籍28人，华籍37人。许多贸易公司均招收攻读中文或与中国有关的课题的日本大学毕业生，然后派他们到中国大陸或台湾进修中文，作为公司在职训练的一部分。

1951年以来，外务省中国司出版《中国日报》，综合报道主要动态。中国司定期召开会议，征求中国问题专家们的意见。接受该公司培训的人，通常去中国学习两年中文，还到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学习第二外语一年，一般是学英语。

日本有些单位在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未必设有中国调研室。这些单位中有外务省经济合作局，通商产业省，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属政府控制的经济计划部门)，日本输出入银行、日本银行和经团联。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设有中国调研室，还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会同中国有交流活动。文部省有同中国交换培训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计划。日中人文和社会科学交流协会，是一个促进中日学术交流的组织。学术交流包括大

学一级的交流,尤其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但仍处在初级阶段,需要加强。1982年,美国有将近10,000名中国留学生,日本则只有大约1,350人。目前,在日中国留学生大约仍然只有在美中国留学生的1/10。

在友好协会中,日中议员友好协会出版《日中议联日报》,上面刊载有议员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备忘录。

以上主要谈研究现代中国的各种组织及其出版物,下面讲几种专刊。

《中国通讯》,由独立的中国通讯社每日出版,相当于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广播摘要(远东部分)》或美国国外广播新闻局的新闻综述。

中国出版几种日文杂志。例如,日文版《北京周报》,较多地报道中日关系和日本读者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日文版《人民中国》,为月刊,对象是日本公众,偶尔也登中国问题专家感兴趣的文章。

《中国研究》,这家刊物据说同日共有关系,由日中书店出版,常刊载分析性文章,但已经因日共同出版单位发生分裂而停刊。台湾出版的《问题与研究》也有日文版。

许多研究现代中国的文章登在各大学的学报上。这些文章以及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文章,通常收入《中国问题评论资料集》年刊。

报纸是另一个丰富的中国信息来源。全国性报纸有《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近年,《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似乎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了相对中立的立场。《产经新闻》被认为亲台湾。《日本经济新闻》经常报道有关中国经济的好消息。若将《朝日新闻》和《纽约时报》略加对比,撇开质量不谈,就会发现,《朝日新闻》所刊载论述中国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的文章,大约比《纽

约时报》多3倍。我的印象是，《纽约时报》似乎重分析，而日本各报刊则偏重报道事实。《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也比日本报纸上的长。

最后，应该讲一下对研究工作的综合评述性文章和书目之类的工具书。近年，中岛岭雄发表了一篇全面评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于中国的著作的文章（《现代中国实际情况的探讨》，《亚洲季刊》1982年8月）。1978年，亚洲经济研究所发表了几篇70年代地区性研究评述文章。其作者及所评述的方向：中兼胜二，中国经济；德田教文，中国政治；笹本武治，台湾问题；山田龙夫，民国时期；田中正俊，中国经济史（《70年代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第一部分《地区性研究》，《亚洲经济》第19卷第1~2期，东京，1978年1~2月）。

市古宙三是最知名的书目编纂者，以编纂日本有关近现代中国的书目为主。他已编就的书目有综合性的《近代中国问题文献目录（1945~1978年）》（1980年出版），以作者为序；《近代中国和中日关系图书目录》（1979年出版），按问题分类。这两本书目中包括有关于现代中国问题的书目。本田章次郎近年出版一本很有用的《日本现代中国外交问题研究文献目录（1949~1980年）》（1982年）。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每年出版《东洋学文献目录》（年刊），书目和文章篇目均按问题分类。《国际事务》每月都附有书目，其中包括有关中国问题的材料。《亚非资料通报》月刊，国会图书馆出版，报道日本出版的中国问题新书和西文图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国会图书馆编辑之书目有《日本文人和社会科学杂志目录索引（累积版）》，每季出一期，按照政治、经济、工业、文化、教育、文学等内容分类编排。每期均有关于中国的部分。此外《出版年鉴》（东京新闻出版社编），《每年图书》（东京日本图书馆协会编）和《东方》（图书评论）月刊（东京东方书店

编)，均为很有用的参考书，从中可以查到有关中国的新图书。

日本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英文索引有两种年刊：《东方问题论著索引》，东方学会出版；《当前日本文和社会科学学术杂志目录》，日本学术出版中心出版。

当前动向

从日本所出版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书刊中可以看出几点动向。传统的学术分野和曾经造成日本中国问题学者分裂的意识形态壁垒正在消失。几项有关日本侵华的热门课题引起相当大的兴趣，同时，采用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同西方一样，也开始出版根据长期旅居中国的见闻而写成的著作。

第一个动向。中国问题政治学家德田教文曾指出，几年以前，现代中国问题学者，依其观点和政治立场，大体上可分为四类：(1) 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亲毛主义立场，(2) 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反毛主义立场，(3) 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亲毛主义立场，(4) 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非毛主义立场(见《日本7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第一部分《地区性研究》)。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明。但是近年来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自从打倒“四人帮”、中国重新评价毛泽东、刘少奇和“文化大革命”以来，日本鼓吹毛主义的人不那么喧嚣了。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常常被认为比毛主义还毛主义的毛主义者当中，有些人因自己过去的“错误”而自责；有些人转而去研究历史，以避开评论现代中国；有些人则继续拥护毛主义，并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体系。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而亲毛主义的学者，仍然维护“文化大革命”理想主义的目标(反官僚主义和追求平等主义)，避而不谈其消极方面(暴虐和权力斗争)；其他一些人根本不表态。

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反毛主义者的那些人，现在倾向于支持日共。他们始终认为，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制度是封建制和

家长制，“文化大革命”纯粹是一场暴力斗争，不能促进有意识的社会主义发展（见川添升与犬丸义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东京1968年出版；高桥勇治与米泽秀夫：《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东京1973年出版）。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正是今天中国人的说法。引人注意的是，这些学者的结论，常常和非马克思主义和非毛主义学者的结论相似。尽管他们在方法论上不同。一般说来，这些日本学者赞同中国采取开放政策和现代化方针而稳步发展。

第二个动向，对日本侵华的研究越来越多。注意力多集中于：（1）满洲问题，（2）日本战争孤儿问题，（3）如何在中学教科书中适当论述战争期间日本在华活动问题。

满洲问题，目前在日本是一个热门课题，每月至少出版两三本关于满洲问题的著作（见《东方》（图书评论）中国问题新书栏）。其中许多是回忆录或小说，另一些是学术著作。原南满铁路公司调查部被理想化，说成是日本历史上最有权威和最渊博的思想库，战前时期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梦想在其中工作。之所以出现这种浪漫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兴起到中国的旅游热，许多曾在东北居住过的战时日本人重访他们的第二故乡。近年对所谓日本孤儿从东北返回日本一事大事宣传，也重新引起日本人对过去在满洲的经历发生兴趣。

除新闻报道外，经济学家中兼胜二，还利用有关满洲的原始资料，进行了一次有价值的研究。他分析了过去在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农业共同体和东北人民公社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异同。然后又分析中国东北在1949年前后哪些方面有变化，哪些方面没有变化。他又将满洲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东北同威廉·帕里什和马丁·怀特所研究的广州（见《现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作对比。

中兼胜二曾发表《人民公社和满洲的农业共同体》一文（收入前述《人民公社制度的研究》一书）。他还利用定量分析法撰

写出一部关于满洲农业共同体的专著《前满洲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分析》(1981年)。

中兼胜二主要根据南满铁路公司的材料来分析满洲的农业共同体。对于研究东北的人民公社，他采用日本现代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途径，即采访近年回国的日本人。他和同事们利用从黑龙江回国人员那里所采访到的材料，来研究人民公社的就业、工资和分配制度。这种访问记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很有用的，会比采访香港中国难民得来的材料少一点偏见。香港难民是这类材料的另一个主要来源。

近年，许多在中国出生的日本孤儿回到日本。这个问题受到很大注意，已出版不少书，报纸上还发表了很多文章。现在仍有千余名日本孤儿在中国。幸好其中一些人能够找到他们的亲属，并回到日本定居。但其他人则不那么幸运，即使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亲属，他们的中国养父母也舍不得让他们离去。孤儿一旦回国，对日本的情况又一无所知，尽管向他们提供了包括学日语在内的某些方便。这在中日关系上仍然是一个微妙的问题，需要经过一个长时期才能得到解决。

教科书问题在中日之间多少已得到解决。1982年，中国政府就中学教科书对日本占领中国问题所作出的修订提出抗议。自那时以来，日本已出版了几本书，还发表了不少文章，不过多属新闻报道性质。虽然其中一些只谈教科书问题本身，但大部分论著都不局限于语义问题，而是集中论述日本在战前时期的活动，究竟是促成了侵略还是进入。

第三个动向，是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方兴未艾。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是经济学家石川滋开展起来的。如前所述，关于中国经济问题已出版不少论著，但多属浅近工作。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和各公司内部的中国调研室，比较深刻地分析中国经济的论著开始增多。例如，除各公司的研究报告以外，1981年发表的关于中

国经济的论文大大超过100篇，虽然其中一些属时评性质。在近年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中，日本贸易促进会中国调研组进行了一系列的“风险”研究，考察各省的投资环境。该会已出版《中国地方经济评估》（1984年），《中国沿海11个省市的经济》（1983年）和《中国各省的经济地理》（1981年）。此外，还有乌仓民生和丸山信夫的论著《中国经济的困境》（1983年出版），分析了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问题和前景，并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作对比。

第四个动向，是从政治文化入手的研究方法日益流行，这种方法旨在将现代中国同它的文化、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日本人深感美国现代中国问题学者往往忽视历史、文化连续性的力量。森山昭夫曾专门考察过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情况，他认为，美国现代中国问题学者，对中国传统的影响，或对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均注意不够（见森山昭夫：《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分析中国政治的各种方法》，收入伊藤信吉编《现代中国的政治结构》，1982年出版）。固然费正清、卢西恩·派伊和理查德·所罗门曾把这些方面作为研究的重心，但可惜他们的观点现在并未得到系统的发挥。

伊藤信吉曾研究自古至今中国政治史的周期或振荡，并探讨“它们如何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中体现出来”。他认为，有四类周期性振荡，即“改朝换代”，南北方交替统治中国，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起伏，从激进主义走向温和的转变（见伊藤信吉：《中国政治浪潮的节奏》，收入上述《现代中国的政治结构》）。在另一篇很有意思的关于政治文化传统的文章中，猪口孝将1979年和1789年两次中越战争加以对比研究。他认为，这两次战争非常相似（见《1789年与1979年中国对越南的干涉》，载《亚洲研究》第27卷第2期，1980年7月）。

第五个动向，在美国也可以看到，即驻华本国人所写的书日

益增多。过去几年间，驻北京日本记者已写了10本书，其中一些纯属街谈巷议。诸如私下采访上海妓女之类；有些著作对中国的形势表示悲观，只强调中国的问题。但大部分著作对中国的全面发展持乐观态度，虽然也承认有许多困难。这些著作中，最有名的两本也许是船桥阳一的《内部》和比康吾的《转变中的中国》（两本均于1983年在东京出版）。此外，福克斯·巴特菲尔德的《在苦海中生活的中国》，已经译成日文（日文版书名《中国人》，1983年出版），也很受欢迎。现在还在中国和曾在中国工作而后来回国的日本人开始发表回忆录和文章。其中大部分对于探索中国的社会发展是很有用的。近藤妙子的《在北京30年》（1984年），山本一郎的两卷本《在北京35年》（1980年）和斋城觉的《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长大成人》（1978年）和《我有两个祖国》（1980年），均写得相当好。

回顾以往，几年以前，日本学者还往往把中国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论战的讲台，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时评，但学术著作相对说来却很少。新闻报道性作品重在实际调查而不是分析。现在，由于中国转变政策，日本的中国问题学者在论证问题时，不再那么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而重在分析了。现在有条件同西方中国问题学者进行更广泛的学术交流。如本文所述，日本学术界在不断提供内容越来越丰富的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参考材料，如组织人名录、年鉴和统计数字汇编之类，这些对西方学者都是用得上的。不过，我认为，应更加强调分析政治制度，更加强调进行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

日本中国革命史研究现状

〔日〕天儿慧

韩风琴译

当前，我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①似乎正处在大的转变时期。与此同时形成了两股带有特点的潮流。所谓转变，简言之，就是重新认识以前那种以毛泽东为中心，或以中国共产党史为中心描绘中国革命史的基本倾向，不管对毛泽东，还是对中国共产党，都在重新做相对的研究。不言而喻，成为这种转变契机的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及后来出现的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对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认识以至否定等中国自身的一系列政治动向。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史和毛泽东的总看法。当然，尽管这里面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他们以前惯用的按照“两条路线斗争”或“好人坏人论”解释历史的方法却大为减少。例如，《决议》写道：“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②

当然，看到《决议》对毛泽东的这种评价，就立刻断定他们已开始否定中国革命史的以毛泽东进而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理

论框架，这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翻阅一下各地的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系列《中国共产党史讲义》就会明白^③。尽管如此，凭借有根有据的研究方法和“第一手”资料解释中国共产党史的各个侧面，也是中国学术界不容否认的倾向^④。而且，这无疑给了我国的中国研究以极大的冲击。

然而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进入70年代以来我国在中国研究上开始出现了主体性变化（着重点为作者所加，下同——译者）。成为其重要契机的，似乎是以下两套资料集的出版，即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会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共12卷，劲草书房，1970—1975年出版）和竹内实主编，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的《毛泽东集》（共10卷，北望社，1970—1972年出版）。

前者除收录中共中央的正式宣传性文献之外，还收录许多珍贵的内部资料。它为接近实际地理解、有根有据地研究当时中共的政治动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后者为理解执笔当时的、未经加工的或接近于原来的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它不象中共中央编辑的著名的《毛泽东选集》那样，他的思想被修改过了。这不仅对重新验证被修改过的毛泽东思想起了作用，而且无疑造成了一种契机，那就是从根本上重新认识那种渗透了毛泽东的视角的中国革命史解说。正如下面要记述的那样，这两套资料集的出版使早在70年代初就参与这两套资料集编辑工作的学者推出了一批十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回顾当时正式开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笔者自己，似乎也迎面遇到了这种变化的浪潮。我在1972年执笔的硕士论文《试论毛泽东研究》的序言中，就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方法问题作了如下论述：“在通过研究毛泽东考察中国革命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不管你是否意识到，用于这种研究的占统治地位的典型的框架就是：毛泽东的革命运动过程=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然而

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进而又把中国革命的主流用直接等号连接起来，怎么能不出现严重缺欠呢？首先这种框架有一种倾向，只把重点放在中国革命的胜利上，而且其前提条件是把毛泽东的理论乃至行动视为在本质上一贯正确的。其结果，掩盖了中国革命中那些有生气的过程和毛泽东在曲折的现实中思想形成的过程，进而有完全舍去对一个课题进行活生生的考察的危险，而这一课题就是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展望胜利，怎样开辟夺取政权之路。同时，那就会只能用静止的观点来观察中共在路线形成过程中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以及1949年以后同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等对立而形成的党内斗争，结论是毛泽东是‘正确的’，其他人是‘错误的’……”

我想整理一下前面提到的今天的研究动向。当前中国革命史研究正如“百花齐放”的时代表现出来的那样，涉及多方面的问题。这些研究是从多种不同的分析角度对各种题目进行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⑤。如果大致上作一分类，似乎有两种研究倾向。第一，开拓中共系列以外领域里的革命史研究；第二，与此相反，开拓中共系列内的，不过是开拓非毛泽东系列或非中共中央系列领域里的革命史研究。

一、非中共系列领域里的革命史研究

属于第一种倾向的主要研究代表是对国民革命时期非中共系统的运动、组织和领导人等的各种研究。作为开拓性研究，要首推1974年青木书店出版的野泽丰编的《中国国民革命史之研究》。该书是论文集，也包括关于陈独秀和瞿秋白的研究论文。因此严格地讲，可以说是横跨上述两种倾向的研究著作。但是从整个论调看，是把重点放在第一种倾向上了。

执笔者代表野泽丰先生在文章的开头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国民革命作为问题？然后讲道：“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只能

从一张白纸上起步”，在这中间“可以说在中国研究上出现了‘两条道路’的倾向。一方面是吸取中国革命的经验，另一方面是引进美国的中国研究成果。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刮起了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的风潮。由此似乎认为中国近现代史就等于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就等于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共产党史就等于毛泽东思想史。就这样把对中国的认识一般化了。”其结果，“国民革命的研究必然处于空白的状态”。^⑥

野泽丰先生的看法与笔者对中国革命史的上述看法几乎完全一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方面被吸收到前者的研究成果中，另一方面被收入到后者的研究著作中。不能把这种一致简单地看作是70年代前期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偶然现象。因为虽然这种认识太单纯了，但是正是这种观察和认识问题的能力——是否可以这样说，姑且不论——是使其后两种倾向得以继续并使那些研究开花结果的主要背景。换言之，研究工作已摆脱了以往中国革命史研究中许多过于强烈的价值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和政治上的束缚，而且在各自不同的研究中取长补短。从整体上看，这也可以作为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共有财产和研究方法上的基础。

在第一种研究倾向中，有后来出版的山田辰雄著的《国民党左派之研究》（庆应通信，1980年）和横山宏章著的《孙中山的革命和政治领导》（研文出版，1983年）等力作。当然，研究论文不胜枚举^⑦。这些题目，如果按照从前的框架，几乎成不了主要的研究对象。一般认为国民党左派是在中共和“反革命”集团、蒋介石国民党之间左右摇摆的，它的存在是非自主的。孙文确实是早就引人注目的革命家之一，但是对他的研究有很多是放在他与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接近的框架中去研究的。同样，孙文革命往往被当作毛泽东革命的前史来对待。上述两种研究，从总体上看，都从这一框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而且，两者极力主张的，都不外是国民党左派的各种活动和思想或者孙文的活动和思想，是

在中国革命史中主体角色的一部分。

二、中共系列领域的革命史研究

以上是第一种倾向，那么第二种倾向是什么呢？这种倾向似乎可以分成以下两类来论述，即第一，把中共中央内部非毛泽东的部分作为主体的角色给予重视，并从这种动向和与毛泽东的部分的对峙及相互作用关系中描绘中共的政治动态。第二，以中共中央影响下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等所谓的地方和基层为中心，描绘革命的政治动态。

第一类问题的研究未必是进入70年代之后才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最初，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很大。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1年出版的B·I·施瓦茨的代表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是对我国最早的同时也是最大的冲击^⑧。该书对日本的中国研究影响之大，也可以从该书的译者之一石川忠雄先生的下述高度评价中间接了解到：“正如人们公认的那样，这本书在美国的中国共产主义研究中开创了新纪元。第一版发行后业已经过12年的今天，尽管也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但如果说它是空前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也并不过分。”^⑨施瓦茨提出的研究中共党史的分析框架，恐怕在今天的研究中依然具有引人注目的价值。

然而，这种研究在我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中逐渐显示出独自の宝贵成果还是在进入70年代之后。例如，宇野重昭等四位先生共同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现状》（亚洲政经学会，1973年）有概括的综述，对中共的权力抗争、路线和政策问题的研究观点，包括各个中国研究学者的立场和方法在内，都作了简要的介绍。这样的书在我国算是第一本。宇野重昭的《中国共产党史绪论》（上、下卷，日本广播协会出版会，1973年）以上述《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的成果为基础，对上述各种问题作了更为详细的和提纲挈领的说明。今井骏、姬田光义、古厩忠夫、蜂屋亮

子、石井明和横山宏章等各位先生分别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和刘少奇等毛泽东以外的政治领导人为对象进行了研究，而且相继发表了研究成果^⑩。

另外，关于毛泽东研究，从前常见的是对他的正统性和独特性要么积极评价，要么批判。而现在无论是评价还是批判，都试图作到有根有据，这种研究风气正在迅速加强。作为这种研究的先驱，应该举出今堀诚二的《毛泽东研究绪论》（劲草书房，1966年），那是60年代的著作。该书在前面提到的《毛泽东集》出版之前，就利用毛泽东论文的原著乃至与它相近的东西，描述了他在阶级观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⑪。

其后，特别令人注目的是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作为异质的因素来评价，并从二者的相互关系上描绘革命史的竹内实著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公论社，1972年），和彻底利用美国近代政治研究的手法，但又以独自の视角说明毛泽东的政治领导结构特点的德田教之著的《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力学》（庆应通信，1977年）等。

关于第二类问题的研究，对中央创立初期，日中战争时期、内战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城市和农村群众运动的研究成果特别显著。这里只就内战时期的研究动向作一概述。对这个时期的非中共中央的革命动态作先驱性研究的，是加藤祐三著的《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农村社会》（亚洲经济研究所，1972年）。该书以加藤先生等人于同年翻译出版的W·欣顿的农村革命的报告文学《翻身》（1、2卷，平凡社出版）为中心，分析了中国社会基层村落中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变动^⑫。

在中国革命史中，从中央到基层，变动最激烈的是内战时期。然而，以往对非中央一级的实证性研究等于零。不过，特别是70年代后期以来，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显著。这也许是因为在围绕上述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框架的问题意识，在加强研究的过程中，

即使是在中共系列的革命过程中，这个内战时期也是作为包括各种分歧和倾向的有生气的动态来研究的大好时期。

例如，田中恭子先生的一系列论文活用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珍贵史料，考察了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以及干部和农民群众之间在土地政策问题上的路线、政策和实践方面的各种问题^③。而且开始做一点尝试，试图描述变动的地区性特点。例如，对于晋冀鲁豫地区的土地改革，除上述加藤祐三先生的研究之外，还有川井伸一、内田知行各位先生的论文^④。研究东北地区的有姬田光义、西村成雄各位先生的论文^⑤。另外，小竹一彰的《国共内战初期土地改革中的群众运动》（亚洲政经学会，1983年）一书，对《东北日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进行了详细的数量上的分析，并对两地区作了比较考察。

但是，对这样的地区和基层的情况进行研究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而且为了把这些作为相互有机的联系进行研究，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以上对今天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主要动向作了概括性介绍，而且在总体上同以往的研究动向相比，确实使人感到有一种本质上起变化的潮流。为了使这种研究倾向进一步发展，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丰富我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当前恐怕需要设计出一种新的分析角度和框架，继续不断地对各个对象作脚踏实地的实证研究和考证^⑥。

注释：

①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史是限定在辛亥革命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段时期。

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6月30日。

③例如，参照了《中国共产党史讲义》（上、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同一书名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共党史讲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

④这里无需把每个研究成果逐一列举。作为可以窥视整个倾向的资料，可以举出

《北京大学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彭明的《现代革命史》，收入《中国历史学年鉴（简本）1981年》，人民出版社，121—128页。

⑤作为这些研究的具体成果的概观，请参照最近山川出版社出版的山根幸夫的《中国史研究入门》（下，1983年），其中的（近代之二）。

⑥野泽丰编《中国国民革命史之研究》，青木书店，1974年，3—4页。

⑦关于这点，请参照山根幸夫著的《中国史研究入门》（下），393—422页等。

⑧B·I·施瓦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石川忠雄、小田英雄译：《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庆应通信，1964年）。

⑨同上书，日译本，译者后记，第281页。

⑩例如，请参照今井骏的《陈独秀和国民革命》；姬田光义的《关于 瞿秋白》（均收在野泽丰编的《中国国民革命史之研究》）；古厩忠夫的《陈独秀的虚相和实相》（《历史评论》329号，1977年）；峰屋亮子的《红军创建时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立三路线论考》，亚洲政经学会，1978年；石井明的《关于批判刘少奇的考察——围绕〈和平民主新阶段〉论》（《东大教养学部外国语科纪要》第20卷2号，1973年）；横山宏章的《陈独秀》，朝日新闻社，1983年等。

⑪另外，关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的特点，请参照拙稿论文《关于毛泽东的社会势力分析的特点——主要依据20年代后期的资料》（《一桥研究》第30号，1975年）。

⑫威廉·欣顿《中国农村革命纪实》，每月评论出版社，1966年。另外，加藤先生在此书之前发表了《土地革命和基层政权的确立过程——围绕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历史学研究》第313号，1966年）一文，从此明确了考察基层政治变动的观点。

⑬田中恭子的《内战和中共土地政策的变化》（《亚洲研究》第24卷第4号、第25卷第1号，1978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地方会议》（《亚洲经济》第20卷第5号，1979年）、《战后中共土地改革的急进化》（《社会经济史学》第46卷第2号，1980年）、《内战时期中共土地改革“左倾偏向”的纠正过程》（《亚洲研究》第22卷第3号、第4号，1981年）等。

⑭川井伸一的《华北农村围绕内战时期的整党的政治动态》（《中国研究》第102号、103号，1979年）；内田知行的《反汉奸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历史学研究》第473号，1979年）等。

⑮姬田光义的《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中国近现代史讲座》第7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西村成雄的《中国东北的土地改革》（《东京外国语大学学报》第51号，1981年）。

⑯试图从中央、地方和基层（三层政治领导机构）中描绘中国的政治变动的拙著

《现代中国政治变动论绪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政治过程》(亚洲政治学会, 1984年)也是这种尝试之一。

译自天儿慧著《中国革命和基层干部》(研文出版社, 1984年)

日本对抗日根据地问题的研究

〔日〕井上久士

韩凤琴译

一

这篇论文是为了介绍战后日本对抗日根据地（边区）问题的研究动向。关于抗日根据地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并非自1945年8月以后才开始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作为敌情调查和研究的一环，有满铁的调查机关、东亚研究所、兴亚院（后为大东亚省）、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上海领事馆、外务省情报部、新民会、驻华日军的特务情报组织以及当时设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特务情报机关等，他们不仅对国民政府的动向，而且也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当然，他们的调查研究有一个明显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有用的参考资料。当时，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个人，如果与上述调查研究机关没有什么关系，想要得到资料，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对抗日根据地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无法自由进行的。

然而今天，当我们想要研究抗日根据地问题和当时的中共各项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执行过程时，这些战时由日本方面研究机关做出的调查研究成果有不少可以作为珍贵的参考资料，这也是事实。一方面，由于这些资料是非公开的秘密的内部文件，基本上依据中共和边区政府的文献，在这些资料中有不少至今未能弄到原文。当然，在那些作为调查研究基础的情报中，自然也包

中共和边区政府的反侦察情报。因而，自不待言，必须对资料进行充分的批判和鉴别。另一方面，在那些机关从事调查研究的人员中间，尽管表面上服从于军部和政府，但也不能忽视有些人在正视现实的同时试图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抗战的中国，譬如满铁调查部的《支那抗战力量调查报告》（1940年版的翻印，三一书房，1970年）和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的《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1941年）等文件便属这一类。

二

战后对抗日根据地问题的研究，首先是从对抗日根据地的介绍开始的。我认为，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战争期间边区和中共的实际情况，这对于日本反省对中国的侵略很有必要。从中国归国的士兵和在根据地从事反战活动的人们讲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情况，也刺激了这种关心。与此同时，这些介绍实际情况的论文有一种倾向，它们不是单纯地停留在研究抗战的中国上，而是受“吸取”有利于日本战后变革的“教训”这种意识的驱使。因此似乎可以说，站在抗战的中国这个全局来把握边区并有分析地研究边区问题的研究方法尚未产生出来。这样对抗日根据地问题纯介绍性的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便让位于以介绍新中国为主了。

可以说，把抗日根据地问题作为历史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是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而且，自那以后对边区问题研究的主要潮流，一般说来，似乎把抗日根据地视为“中国革命的模型”

（安藤正士，1965年1月，请参照研究文献目录），并试图在那里找到中国社会主义的起源或萌芽。可以看出，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涉及到司法制度（平野，1960年3月）、政权（福岛，1965年4月）、国营企业（仪我，1960年1月；安藤彦太郎，1961年2月）、通货制度（宫下，1957年1月）、军事（山下，1969年1月；突

户，1974年2月）、整风运动（新岛，1962年2月）等一切研究领域。由于这些研究，确实使抗日根据地问题的研究单方面活跃起来。但是，正如石岛先生所指出的那样（1979年3月，1983年1月），这些“探索起源式”的研究容易受中国的“抗日战争论”框框的影响，往往过高地评价抗日根据地的“先驱性”。

另外，对上述一系列研究持批判观点的，并不是一个也没有。这里可以举出村松，今堀、德田等先生的研究。村松先生的论证（1962年3月），以前在日本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在村松先生看来，延安的“民主制”与西欧的民主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与其说是共产主义的，莫如说是儒教式的，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是“出色的儒教式的统治者”；在游击地区，他们如同旧中国的“出色”造反者一样行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主张利用感化和权威的力量教育人。今堀先生（1973年2月）认为，延安政权是利用群众的民族主义取得了胜利，他具体阐明了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实施过程及其不足之处等。德田先生（1977年7月）从研究中共党史的立场出发，论述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通过整风运动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和神化毛泽东的过程。

70年代以后，在日本可以利用的资料丰富了起来，大大增加了新的有确凿证据的研究条件。虽然“探索起源式”的研究也不少（例如，可以举出作了综合论述的三浦先生〔1972年5月〕，从事农业合作化问题研究的高桥先生〔1977年1月〕和林先生〔1976年2月，1978年1月〕，强调在晋察冀边区的经济政策中有“明确的阶级观点”的田中恒次郎先生〔1981年1月〕以及强调“群众运动”的石田先生〔1980年4月，1981年3月〕等人的论证），但是已经出现了两种研究趋势：一是毫无顾虑地、实事求是地研究抗日根据地问题；二是着眼于政策研究，不仅研究政策本身，而且试图研究清楚根据地内实施政策的过程。下面，我想按照不同的研究课题，以最新的成果为中心，看一下研究动向。

三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形成问题，有今井先生对冀南根据地的研究（1971年4月）和安井先生对晋察冀边区的研究（1971年10月，1972年9月）。今井的论文分析了河北省南部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抗日武装斗争的经过，明确指出，从对日经济作战的需要出发，在根据地内贫农、雇农和中农之间结成的统一战线必然要成为核心。安井先生考察了群众组织在边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经济政策和国共关系等。关于山西省抗战体制的确立和与阎锡山的关系问题，内田先生的论文（1975年1月，1976年1月）讲得很详细。马场先生（1978年5月）研究了山东区，井上先生（1977年3月）研究了冀中地区。另外，井上（1977年5月）还深入探讨了1939年前后在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出现的“极左”倾向和根据地的危机以及摆脱这种危机的过程。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主义”问题，今堀先生（1973年2月）从边区政权与群众组织的一致性以及选举与三三制的实际情况分析，认为抗日根据地的民主主义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安井先生（1978年2月）对边区的民主主义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这个问题在如何考虑边区政权的制度及其实际情况，政治运动的性质和群众的文化水平等方面都是重要的课题。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对村松先生和今堀先生的考察作批判性的继承恐怕也是必要的。

1976年日本翻译出版的马克·塞尔登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日文书名定为《延安革命》）（加加美光行、小林弘二合译，筑摩书房）可以说是美国的“探索起源式”的研究，它给日本的研究工作以很大影响。譬如，作为最新成果可以举出石田的论文（1981年3月），他在塞尔登的延安方式中增加了毛泽东主义的自力更生和群众运动，试图由此来理解边区的经济建设。另外，还有今井的论文（1978年4月），他认为，“通过肯定地主阶级，在试

图实现由地主‘资本’向产业资本早期转化的过程中，边区政权在本质上带有‘联合专政’的性质”，他还对地主阶级在维持根据地政权时的作用给予了注意。这篇论文对那些强调根据地的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的学者持批判的态度。

关于土地政策问题，有古岛先生（1956年1月）和川村先生（1971年1月，1972年1月）的研究。论述减租运动的最新论文有石田先生（1980年4月）和田中恭子先生（1983年6月）的论文。尤其是田中的论文，从政治运动的观点出发，认为1942年以后中共通过“推”与“拉”的策略建立了农民政权，取得了近乎土地改革的成果，对于这一过程中的左倾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作了耐人寻味的分析。然而，对于这种群众运动同根据地政权的维持和稳定以及同经济发展问题之间的关系等等，尚未深入探讨。如注释所示，完全无视日本以前的研究成果，恐怕也是个问题。

关于劳动互助问题，高桥（1977年1月）、林（1976年2月，1978年1月）、内田（1980年2月，1982年1月）、井上（1983年4月）等各位先生均有研究。高桥先生强调了生产运动中的劳动力组织化问题。林先生举出了陕甘宁边区的合作农场，认为它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批判了今堀先生的富农经济说。对此，内田先生认为，陕甘宁边区的农业互助组是通过互助和剥削劳动力而结合的，它已成为有利于富农经济发展的一根支柱。与此同时，他还论述了以实现土地公有为目标的互助组所遇到的挫折。井上批判了林先生，明确指出他举出的合作农场已经解体。另外，关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有风间先生的论文（1982年3月）。

关于边区相互之间和边区同国民政府地区、日军占领区之间的贸易问题，有井上（1977年5月，1981年4月）和风间先生（1981年2月）的论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风间先生的论文讲清了苏北地区同山东区之间的物资流通问题。关于边区的通货政策，除有宫下、丰田两位先生的综合研究（1978年3月）外，作为

专题论文，还有关于陕甘宁边区（井上，1982年2月）和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岩武先生，1983年3月）的考察。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工业建设方面的研究，仅有对陕甘宁边区作了研究的仪我先生（1960年1月）、安藤彦太郎先生（1961年2月）和安藤正士先生（1962年1月）的论文，尚未见到新的研究成果。但是，作为工业合作社研究的一环，菊池先生（1980年3月）也谈及了边区情况，材料十分宝贵。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作战问题，除有藤井先生的研究（1983年7月，但主要取材于1940年以前）外，充分地使用了日军方面资料的《华北治安战》（1968年2月）一书，也是不能忽视的。石井先生详细地研究了百团大战和皖南事变（1977年2月，1973年1月），北山先生介绍了军政大学的沿革和教育内容。

作为其他重要问题，在野泽先生（1972年8月）论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当中，提出了边区对难民的政策问题。难民问题，不仅对抗日根据地的农业、产业开发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且也是同边区、日军占领地区、国民政府地区有联系的以及同整个抗日战争密切相关的重要的研究课题。

关于日本人在边区的反战活动，有安井先生的论文（1983年2月）。作为综合的研究论文，这大概是唯一的一份了。但是，从事反战活动的日本人的回忆录已经出版了一些（关于这些，请看安井论文的注释部分）。此外，介绍边区的反法西斯国际联合行动的文章有安井先生（1977年6月，1981年5月）的一系列论文。安井先生还撰写了考察边区少数民族政策的论文（1979年1月）。关于这个时期中共的民族政策，除安井先生外，今堀先生（1973年2月）也谈到一些。此外，未见战后对这一课题作过研究。作为战前比较优秀的论文，可以举出西雅雄著的《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一文（《蒙古》8—3、4，1941年）。

总起来说，日本对抗日根据地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一种有根有据地、深入细致地研究问题的倾向。可以期待今后的研究将按不同地域进一步深化，不过，也不能否认，这往往要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工作过于分散。另外，我认为，还需要通过对难民问题、工业合作运动、边区的对外贸易、国共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不是把边区放在闭锁式的小天地里，而是要努力把它的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来思考。

战后有关抗日根据地问题研究的文献目录

I 资料汇编

- (1) 政治经济研究所编译《中国解放区重要法令集》，农林省农地部，1948年。
- (2) 中国研究所编译《中国解放区土地改革资料集》，农林省农地部，1949年。
- (3) 宫坂宏编译《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条例集》1、2（《比较法学》1—1、2，1964年11月，1965年3月，167—201页，133—162页）。
- (4) 福岛正夫与宫坂宏编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国解放区婚姻法资料》（中国革命根据地法制资料第1集），社会主义法研究会与中国农村研究例会，1965年。1967年修订，1973年再修订。
- (5) 福岛正夫与宫坂宏编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国解放区选举法令资料》（中国革命根据地法制资料第2集），社会主义法研究会与中国农村研究例会，1967年。
- (6) 福岛正夫与宫坂宏编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国解放区宪法和施政纲领集》（中国革命根据地法制资料第3集），社会主义法研究会与中国农村研究例会，1974年。
- (7) 浅川谦次与川村嘉夫编译《中国土地法资料集》，亚洲经济研究所，1970年。
- (8) 岛田俊彦等编《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1—5，三铃书房，1964

—1988年。

(9)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会编《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9—12卷，劲草书房，1974—1975年。

(10) 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编《抗日军政大学动态：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一项资料》，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5年。

(11) 野间清编译《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资料：〈解放日报〉（延安版）所载有关土地政策记事》1—7（《爱知大学法经论集：经济篇》61，62，64—67，69，1969年10月—1972年9月）。

(12) 池田诚编《有关冀南抗日初期态势的若干资料》（《立命馆法学》114，1974年12月，178—223页）。

(13) 野坂参三编《为和平而战：反战同盟实战记》，晓明社，1948年。

(14) 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编《华北日本兵的反战运动》1、2（太平洋战争史研究资料5、6）1974、1975年。

II 目录与文献索引

(1) 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解放日报记事目录》1—4，平文社、东洋文库，1967、1968、1982年。

(2) 藤田正典编《中国共产党报纸杂志研究》（中国报纸杂志解题1），亚洲经济研究所，1976年。

(3) 德田教之：《延安时期的中共出版杂志目录》（《亚洲研究》13—3，1966年10月，59—81页）。

(4) 德田教之：《中共党史史料目录》1、2（《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汇报》9、10，1967年7、10月，8—20页，8—24页）。

(5) 德田教之：《〈解放〉杂志目录》（《亚洲研究》17—3、4，1971年1月，124—155页）。

(6) 林要三：《中国解放区研究文献资料目录》上、下（《帝塚山大学论文集》10、11，1975年11月与1976年2月，88—102页，159—168页）。

(7) 井上久士：《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献目录》1—8（《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会报》5—14，1974年10月～1976年11月）。

(8) 《有关华北抗日运动（1937—1940）的资料与文献目录》（《现代史季刊》6，1975年8月，342—348页）。

(9)《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现阶段》，亚洲政经学会，1974年。

(10)幼方直吉：《资料解题，为研究工业合作社》（《中国资料月报》4，1947年2月，67—74页）。

(11)德田教之：《台北的中共研究与资料的状况》（《亚洲经济》6—2，1965年2月，59—65页）。

(12)藤田正典：《抗日军政大学动态，兼介绍有关资料》（《东洋学报》49—3，1966年12月，127—133页）。

III 研究论文与著作

1946年

(1)尾崎庄太郎：《中共的各项新民主主义政策》（《中国评论》1—1，6月，23—32页）。

(2)平野义太郎：《乡村的新民主主义化：河北省定县邢邑镇》（《中国评论》1—1，6月，33—41页）。

(3)井上道人：《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展开》（《中国评论》1—2，8月，34—42页）。

(4)岩村三千夫：《中共的整顿三风运动》（《中国评论》1—2，8月，43—48页）。

(5)饭田藤次：《关于吴满有运动的意义》（《中国评论》1—3，10月，50—56页）。

(6)广谷丰：《延安政权发展沿革》（《中国评论》1—3，10月，41—49页）。

(7)朝日新闻东亚部编《中国共产党》（中国丛书1），月曜书房。

1947年

(1)渡边长雄：《中共经济与抗币》（《世界经济》2—10，11月，6—8，16页。后来，渡边又撰写了《新中国通货论：货币制度与通货膨胀的发展》一文，世界经济调查会，1948年11月，再次登载于第5章）。

1948年

(1)赤津益造：《晋察冀边区情况》上、中、下，《中国研究所所报》9—11，1—3月，1—14，30—42，36—41页）。

1949年

(1) 岩村三千夫、加岛敏雄合著《红色中国：中国解放区的实地报告》，东方书局，4月。

(2) 德田太郎、名和统一合著《中国解放区的经济政策》，东方书局，4月。

(3) 平野义太郎：《中共的司法与人民审判》（《中国研究》8，7月，1—17页）。

1955年

(1) 池田诚：《中国人民革命与土地政策》1（《立命馆法学》13，10月，54—84页）。

1956年

(1) 古岛和雄：《抗日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0，11月，499—525页。后来，古岛又撰写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一文，研文出版，1982年11月，再次登载于34—57页）。

1957年

(1) 宫下忠雄：《中共边区的经济与通货》（《神户大学经济学研究年报》4，12月，31—72页。后来，宫下又撰写了《中国的通货与金融制度》一文，亚洲经济研究所，1965年，再次登载于第2章）。

1958年

(1) 藤田正典：《第一次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历史学研究》216，2月，11—22页）。

1959年

(1) 山本秀夫：《对整风运动的基本考察：农民解放及其各种条件》（《现代中国》34，6月，1—8页）。

1960年

(1) 仪我壮一郎：《中国边区的社会主义企业的各种先驱形态，陕甘宁边区的各种工会与国营企业》（《(大阪市立大)经营研究》48,5月,87—122页。后来，仪我又撰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企业》一文，女神书房，1965年1月再次登载）。

(2) 桑野仁：《解放区的货币金融》（金融制度研究会编的《中国的金融制度》，日本评论新社，5月,88—104页）。

(3) 平野义太郎：《中国解放区政权的刑政革命：新中国的刑罚法政根本变革的基本过程》（《中国研究月报》147,7月,1—64页）。

1961年

(1) 佐藤慎一郎：《中国共产党的农业集体化政策》1,亚洲经济研究所,3月。

(2) 安藤彦太郎：《陕甘宁边区的国营经济》（《早稻田政治经济学杂志》168,4月,45—60页）。

(3) 新岛淳良：《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现代中国》36,6月,22—32页）。

(4) 仪我壮一郎：《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天野元之助编《现代中国经济论》，女神书房，11月,40—56页）。

(5) 上妻隆荣：《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东亚经济研究》35—3,11月,117—137页）。

1962年

(1) 安藤正士：《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着重于1940年以后边区独立经济的确立过程》（《现代中国》37,2月,1—6页）。

(2) 新岛淳良：《延安整风运动：其过程、理论及意义》（《东洋文化》32,5月,27—73页。后经修改，新岛又撰写了《对现代中国革命的认识》一文，御茶水书房，1964年6月，再次登载于31—148页内）。

(3) 村松祐次：《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主义与传统间的关系》（欧亚协会编译《苏联与中共：第3次共产主义阵营研究国际会议报告》上,283—305页）。

1964年

- (1) 宫坂宏：《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组织》（《早稻田法学会志》14，3月，153—169页）。
- (2) 宫坂宏：《陕甘宁边区的立法》（《现代中国》39，5月，9—16页）。

1965年

- (1) 安藤正士：《抗战时期中国的解放区》（《历史教育》137，1月，62—67页）。
- (2) 宫坂宏：《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建立》（《早稻田法学会志》15，3月，155—176页）。
- (3) 桑野仁：《战时通货工作史论：对日中通货战的分析》，法政大学出版社，10月。
- (4) 福岛正夫：《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其建设过程和理论》，东京大学出版社，10月。

1966年

- (1) 福岛正夫：《中国的法与政治：中国法的历史、现状及理论》，日本评论社，6月（第2章第2节：《抗日战争中的边区政权法》）。
- (2) 竹内实：《在解放区的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法意识的变革》（《现代亚洲的革命与法》下，《仁井田纪念讲座2》，劲草书房，10月，245—263页）。
- (3) 福岛正夫：《边区（解放区）政权的建设及其意义》（《现代亚洲的革命与法》下，285—301页）。
- (4) 平野克明：《边区的司法制度》（《现代亚洲的革命与法》下，303—320页）。
- (5) 福岛正夫、宫坂宏合著：《中华苏维埃及边区时期婚姻法的特征》（《现代亚洲的革命与法》下，321—338页）。
- (6) 向山宽夫：《边区的劳动法》（《现代亚洲的革命与法》下，339—356页）。
- (7) 宫坂宏：《中国革命根据地的选举制度》（《专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月报》33，45，6月，1967年6月，7—12，9—14页）。

(8) 山下龙三：《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战争：以抗日战争的中、后期阶段为中心》（《中国研究月报》218,4月,1—26页）。

1967年

(1) 小林弘二：《中国“通向共产主义之路”与“延安”的传统：从对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时期的研究谈起》（《亚洲经济》8—12,12月,100—114页）。

1968年

(1) 山下龙三：《百团大战与两条路线的斗争》（《亚洲经济旬报》742—3,1月,30—33页）。

(2)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森松俊夫执笔）《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8月（《华北治安战》（2），于1971年10月出版）。

1969年

(1) 山下龙三：《中国人民解放军：其策略思想》，劲草书房，11月。

1970年

(1) 德田教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威，以遵义会议至七大为中心》1、2（《亚洲经济》11—1,9,1,9月,2—18,26—39页）。

(2) 德田教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威和领袖地位的形成及确立过程：从遵义会议（1935年1月）到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10月）之前》（《法学研究》43—6,6月,62—100页）。

(3) 今堀诚二：《延安政权中的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亚洲经济》11—6,6月,2—30页）。

(4) 德田教之：《延安整风运动和对毛泽东的神化：以1941—1942年为中心》（《亚洲经济》11—12,12月,1—13页）。

1971年

(1) 川村嘉夫：《延安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展开》（《亚洲经济》12—1,1月,2—16页）。

(2) 今堀诚二:《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亚洲季刊》3—2, 4月, 136—147页)。

(3) 今堀诚二:《日中战争阶段国共两政权的民族主义》(《史学研究》110, 5月, 1—20页)。

(4) 今井骏:《对抗日根据地形成过程的一点考察:以冀南根据地为中心》(《史潮》108, 6月, 22—60页)。

(5) 今井骏:《“精兵简政”:延安“整风”运动一瞥》(《历史学研究》373, 6月, 14—31页)。

(6) 斋藤秋男:《中国解放区的儿童像, 中国革命中的儿童观与儿童像 第I部》(《专修人文论文集》7, 6月, 57—89页)。

(7) 今堀诚二:《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动向与现实:分析劳动英雄记录》(《亚洲经济》12—8, 8月, 2—27页)。

(8) 德田教之:《“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提出及其凝聚力:以1943—1945年为中心》(《亚洲经济》12—8, 8月, 28—40页)。

(9) 古岛和雄:《东亚的民族革命运动》(《岩波世界历史讲座》29, 9月, 61—103页。后来, 古岛又撰写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一文, 研文出版, 1982年11月再次登载)。

(10) 安井三吉:《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晋察冀边区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学研究》另册专集, 10月, 152—165页)。

1972年

(1) 川村嘉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共的土地政策》(山本秀夫、野间清合编《中国农村革命的展开》, 亚洲经济研究所, 2月, 105—139页)。

(2) 石井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养学科纪要》4, 3月, 163—200页)。

(3) 北山康夫:《抗日军政大学》(《东洋史研究》30—4, 3月, 93—121页。北山又撰写了《中国革命历史研究》一文, 女神书房, 同年6月再次登载)。

(4) 森松俊夫:《华北的治安战:对中共军战略战术的变迁》(《军事史学》8—1, 6月, 66—79页)。

(5) 三浦彻明:《中国解放区的历史意义》(《中国研究》29, 8月, 27—

34页)。

(6) 石井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亚洲研究》19—3, 10月, 1—28页)。

(7) 德永荣、马渊贞利、吉田光义合著《亚洲人民的斗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研究》另册专集, 11月, 183—199页)。

(8) 野泽丰:《日本战争中的难民问题》(《历史评论》269, 11月, 49—58页)。

(9) 安井三吉:《抗战初期华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围绕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问题》(《历史评论》269, 11月, 59—79页)。

1973年

(1) 石井明:《关于皖南事变问题》(《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外国语科研究纪要》20—2, 1月, 105—150页)。

(2) 今堀诚二:《中国的民众与权力: 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 劲草书房, 2月。

1974年

(1) 宍户宽:《山西新军事事件的真相》(《现代中国》48, 49, 1月, 123—133页)。

(2) 宍户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组织原理: 与日军作战的八路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现代史季刊》4, 8月, 91—105页)。

1975年

(1) 内田知行:《牺牲救国同盟会史绪论: 抗日战争初期山西省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动员》(《现代史季刊》6, 8月, 55—97页)。

(2) 小林弘二:《日中战争与文化运动的新潮流》, (藤井升三编《对三十年代中国的研究》, 亚洲经济研究所, 11月, 241—278页)。

1976年

(1) 内田知行:《新军事事件》(《一桥论丛》75—5, 5月, 63—78页)。

(2) 林要三:《关于在陕甘宁边区成立的“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农业生

产合作社”问题》(《帝塚山大学论文集》12,5月,131—149页)。

1977年

(1) 高桥满:《延安大生产运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路线的形成》1,2(《农业综合研究》31—1,2,1,4月,1—36,59—105页)。

(2) 石井明:《百团大战》(《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养学科纪要》9,3月,51—78页)。

(3) 井上久士:《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展开,以冀中地区为中心》(《中国近代史研究会通信》4,3月,1—6页)。

(4) 金丸一夫:《对人民币的形成与统一过程的研究》(《千叶商大论丛》15—1,6月,1—30页)。

(5) 井上久士:《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一点考察,围绕其危机问题》(藤原彰、野泽丰合编《日本法西斯主义与东亚》,青木书店,7月,178—195页)。

(6) 安井三吉:《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1941)》(《历史评论》327,7月,13—28页)。

(7) 德田教之:《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力学》,庆应通信,4月。

1978年

(1) 林要三:《陕甘宁边区的集体劳动,以苗店子集体农场为中心》(芝池靖夫编《中国社会主义史研究,中国解放区研究绪论》,女神书房,4月,155—185页)。

(2) 安井三吉:《华北的抗日民主政权》(同上书,131—154页)。

(3) 官下忠雄、丰田隆明合著《中国革命与通货政策》,所书店,5月。

(4) 今井骏:《边区政权与地主阶级》(《中国近现代史讲座》8,9月,127—160页)。

(5) 马场毅:《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农民,以山东区为中心》(同上书,91—126页)。

1979年

(1) 安井三吉:《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少数民族问题,以陕甘宁边区

为例》(《为新的历史学》156,8月,1—11页)。

(2) 内田知行:《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义仓经营》(《中国研究月报》381,11月,1—23页)。

(3) 石岛纪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中国战线》(《历史学研究》另册专集,10月,179—187页)。

1980年

(1) 新保教子:《中国老解放区的识字学习运动》(《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19,2月,227—235页)。

(2) 内田知行:《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大生产运动(1943—1944年)的一个侧面》(《亚洲研究》21—1,4月,36—60页)。

(3) 菊池一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历史学研究》485,10月,29—45页)。

(4) 石田米子:《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陕甘宁边区的减租斗争》(《冈山大学文学部纪要》1,12月,19—40页)。

1981年

(1) 田中恒次郎:《华北解放区的形成与抗日经济政策: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浅田乔二编《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乐游书房,1月,495—576页)。

(2) 风间秀人:《华中解放区的形成与抗日经济战:以苏北解放区为中心》(同上书,577—622页)。

(3) 石田米子:《延安时代的解放区建设与毛泽东路线:自力更生和群众运动式的经济建设》(富冈倍雄、梶村秀树合编《对发展中经济的研究》,世界书院,7月,221—256页)。

(4) 井上久士:《陕甘宁边区的财政与外贸》(《中岛敏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下,汲古书院,7月,727—749页)。

(5) 安井三吉:《现代的东亚: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朝鲜人在解放区的活动情况》(岩见宏编《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与展开》,4月,72—81页)。

1982年

(1) 内田知行:《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其摸索与挫折》(《纪

念日中学院创立三十周年论文集》，4月，93—103页）。

(2) 井上久士：《陕甘宁边区的通货、金融政策及边区经济建设：以分析1943年边区的通货膨胀为中心》（《历史学研究》505，6月，19—34页）。

(3) 风间秀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的展开，以苏北解放区为中心》（《历史评论》386，6月，45—63页）。

(4) 穴户宽：《抗日战争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研究月报》415，9月，1—21页）。

(5) 田中信行：《现代中国的人民调停制度：1940—1953年》（《东京都立大学法学会杂志》23—2，12月，147—192页）。

1983年

(1) 石岛纪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课题与方法》（《近邻》3，3月，30—36页）。

(2) 安井三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解放区的反战动向》（《近邻》3，3月，37—48页）。

(3) 岩武照彦：《抗日根据地的通货和通货政策：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实例》（《史学杂志》92—4，4月，1—34页）。

(4) 井上久士：《关于边区的农业生产组织的性质：特别以苗店子合作农场为中心》（《中国史中的社会与民众》，汲古书院，5月，265—285页）。

(5) 穴户宽：《关于百团大战的评价问题》（《中国研究月报》423，5月，1—12页）。

(6) 田中恭子：《中国的农村革命（1942—1945年）：减租、清算与土地改革》（《亚洲经济》24—9，9月，22—53页）。

(7) 藤井高见：《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绪论》，嵯峨书院，5月。

1984年

(1) 佐藤宏：《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劳动英雄与基层领导班子：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中国研究月报》432，2月，1—21，33页）。

(2) 佐藤宏：《延安时代的“吴满有模范”：现代中国表彰模范人物的模型》（《东方》36，3月，18—22页）。

译自日本《近邻》杂志1984年第5期

日本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 时期若干问题研究情况简介

〔日〕藤田正典

张惠才译

译者按：本文译自日本山川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的《中国史研究入门》（下）一书。藤田正典在这篇综述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主要在70年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著作及其观点。现摘译如下，以供参考。文中小标题是原有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个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统一战线和抗日根据地（边区）的建设问题。野泽丰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载《岩波世界历史讲座》，第28卷）一文中认为，不能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单纯地看成是一个策略问题，而应该把它当作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的过程本身来看待。文章展望了1935年至1941年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古厩忠夫在《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理论的发展——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设想为中心》（载《世界史中的三十年代至现代历史专题论文集》，青木书店1971年版）一文中，把统一战线看作是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种形式，他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独创性。这篇论文是古厩忠夫撰写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载《历史评论》第243期，1970年10月）的续篇。安井三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

国共产党路线的确立》（载《历史评论》第243期，1970年10月）一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共在1938年以后逐渐确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路线的最终结晶，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宇野重昭的《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路线与“独立自主”问题》（载《中国革命的展开与动态》，亚洲经济研究所编，1972年）一文研究了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问题。他认为这条“独立自主”路线是在1937年至1938年正式展开的，它是依靠群众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陈绍禹有所不同。他还在《毛泽东理论中的社会主义——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心》（载《中苏社会主义的政治动态》，亚洲经济研究所编，1974年）一文中，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心，研究了在毛泽东的理论结构中他是如何独特地解释社会主义概念的。另外，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还有安井三吉的《〈新民主主义论〉形成上的诸问题》（载《历史科学》第54期，1974年）。

姬田光义在《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斗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载《历史学研究》增刊《历史上的国家权力与人民斗争》，青木书店1970年版）一文中，概略地研究了中共为建立被称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外交政策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所进行的斗争（1931年至1941年）。安井三吉在《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1941年）》（载《历史评论》第327期，1977年）一文中，介绍了国际反法西斯运动，指出延安各民族东方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旨在粉碎“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池田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孙文理论的“复权”——中国共产党和孙文理论的重新评价》（载《立命馆法学》第21、22期，1974年）一文中，认为，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恢复孙文理论的历史地位。他考证了中共在对孙文、孙文理论评价的变化和重新评价的问题上，陈绍禹同毛泽东

有分歧。另外，作为前史，藤井升三写有《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与三民主义——截止1937年》（载《对三十年代中国的研究》）一文。他追溯了1927年以后对孙文思想与政策的评价乃至批评的变化过程，并研究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具有的意义。

安井三吉在《抗日初期华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载《历史评论》第269期，1972年）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晋察冀边区的形成与发展》（载《历史学研究》增刊专辑，1971年10月）两篇论文中，介绍了最早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并将它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例子。平野正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宪政问题》（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讲座》第6卷）一文中，通过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研究，分析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作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一环而开展的宪政运动的意义。矢泽康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共产党》（载《历史学研究》第287期，1964年）一文中，研究了中共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改变自己的任务。

抗日根据地

关于抗日根据地问题，藤井高美在《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考察》（载《亚洲研究》第9卷第1期，1962年6月）一文中的观点是：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后各项政策的雏型。今井骏在《考察抗日根据地的形成过程——以冀南根据地为中心》（载《史潮》第108期，1971年6月）一文中，通过分析中共的领导和社会经济状况，研究了保障抗日战争顺利发展的河北省南部根据地的形成过程。井上久士在《考察华北抗日根据地》（载《日本法西斯主义与东亚》，青木书店1977年版）一文中，试图通过对1939年至1942年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实际情况的研究，总结几条根据地的特点。马场毅的《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农民——以

山东为中心》(载《中国近现代史讲座》第6卷,1978年9月),以1937年至1939年的山东为例,着重研究了中共在农民中间如何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怎样进行根据地建设的问题。今井骏的《边区政权与地主阶级》(载《中国近代史讲座》第6卷,1978年9月),考察了各革命阶级实行联合专政的抗日根据地政权与地主阶级的关系。安井三吉的《华北的抗日民主政权》(载《中国社会主义史研究》,女神书房1978年版),以晋察冀边区为例,考证了中共与民众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今堀诚二的《中国的民众与权力——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劲草书房1973年版)一书,以不同于前人的观点和方法阐明了抗日根据地的实情。今堀诚二在《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动向与现实》(载《亚洲经济》第12卷第8期,1971年)一文中所作的论述及其他一系列考证,都已收集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从统一战线政策、政权机构、经济政策和军队等方面弄清延安政权如何利用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的统一性来激发抗战热情的。今堀诚二还以独特的方法描述农村变革,特别是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环节开展起来的延安革命运动的全貌。

经 济 政 策

古岛和雄的《中共在抗日时期的土地政策》(载《土地所有的历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8年)一文,阐明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土地政策和统一战线之间的关系。与古岛和雄同样对减租减息政策有所研究的川村嘉夫在《延安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展开》(载《亚洲经济》第12卷第1期,1971年1月)一文中,把土地政策看作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环,并研究了土地政策的意义和彻底执行土地政策时遇到的困难。另外,风间秀人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的展开,以苏北解放区为中心》(载《历史评论》第386期,1982年6月)一

文中，研究了在苏北地区执行土地政策的情况。对陕甘宁边区集体劳动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作出论证的，有仪我壮一郎的《中国边区的社会主义企业的各种先驱形态》（载《中国的社会主义企业》，女神书房1965年版）和林要三的《陕甘宁边区的集体劳动——以苗店子集体农场为中心》（载《中国社会主义史研究》）。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加以论证的，有井上久士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与外贸》（《中嶋论文集》下卷，1981年7月）和《陕甘宁边区的通货、金融政策及边区经济建设：以分析1943年边区的通货膨胀为中心》（载《历史学研究》第505期，1982年6月）。关于大生产运动，有高桥满的《延安大生产运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路线的形成》（载《农业综合研究》第31卷第1、2期，1977年1、4月）和内田知行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大生产运动（1943—1944年）的一个侧面》（载《亚洲经济》第27卷第1期，1980年4月）。后者通过对互助组的研究，分析了中共农村建设的特点（新富农路线）。

诸 事 件

对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和运动的研究论著，有内田知行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史绪论》（载《现代史季刊》第6期，1975年）。作者查证了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于1936年秋在山西省成立的，为动员民众和建立抗日县政权曾起过司令部作用的牺盟会的多层次统战活动。石井明的《关于百团大战》（载《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养学科纪要》第9期，1977年3月）一文，论证了发动这次攻势的意图、经过和由此引起的问题等。石井明在《关于皖南事变》（载《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外国语科研究纪要》第20卷第2期，1973年1月）一文中，就1941年1月在安徽省南部发生的武力镇压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追溯到新四军的成立，并围绕该军在党内外发生的事情、事变的概况和善后处理等问题

进行了研究。新岛淳良《延安整风运动》（载《现代中国的革命认识》，御茶水书房1964年版）是唯一的一篇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专论。文章具体地分析研究了需要开展整风的因素、起因、反整风和结局等问题。另外，藤田正典在《第一次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历史学研究》第216期，1958年）中，对当时需要开展整风运动的中共状况作了分析。德田教之在《向神的领导方向“挺进”的整风运动》（载《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力学》，庆应通信1977年版）一文中，把整风运动看作是神化毛泽东的一场决战。今井骏的《“精兵减政”：延安“整风”运动一瞥》（载《历史学研究》第373期，1971年）一文，着眼于研究精兵减政运动与整风运动的关系，他论证了这两个运动最终要由苏维埃路线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权力，即联合民主专政方向转化的意义。石井明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载《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教养学科纪要》第4期，1972年）一文中，概述了194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经纬，同时又从政治路线（论联合政府）、新党章和党中央的产生等方面考察了大会的意义。另外，石井明的《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载《亚洲研究》第19卷第3期，1972年10月）一文，考察了可以称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雏型的，试图实现统一解放区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从1945年着手准备到抗日战争结束后中止的全过程。

日本占领地和傀儡政权

安井三吉在《日本帝国主义与傀儡政权》（载《中国近现代史讲座》第6卷）一文中，通过考察日本在中国制造傀儡政权的过程，研究了日本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特点。利谷信义在《“东亚新秩序”与“大亚洲主义”的交错——汪政权的建立及其思想背景》（《仁井田论文集》第3卷）一文中，研究了南京傀儡政府主席汪兆铭时期的东亚新秩序与大亚洲主义之间的共存关系。

另外，关于对包括汪政权在内的傀儡政权要人的审判问题，益井康一写有《汉奸审判史（1946—1948年）》（三铃书房1977年版）一书。

研究支持日本在傀儡政权管辖区的统治的组织和运动的，有八卷佳子的《中国的东亚联盟运动》（载《传统与现代》第32期，1975年）和《中华民国新民会的成立及初期工作状况》（载《对三十年代中国的研究》）。关于日本在占领地的统治问题，有浅田乔二编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中国占领地经济的研究》（乐游书房1981年版），小林英夫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形成与崩溃》（御茶水书房1975年版）和中村隆英的《日本的华北经济工作》（载近代日本研究会编《近代日本与东亚》，山川出版社1980年版）等。另外，历史学研究会编的《现代历史学的成果与课题》（二）（青木书店1982年版）的第3卷（帝国主义与现代民主主义）对研究者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国民党政权

对国民党和国民党政权的研究，实在太少了。石岛纪之的《国民党政权的抗战力量——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载《中国近现代史讲座》第6卷）一文，以重工业为中心，分析了进入30年代以后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建设，并研究了其性质和意义。菊池一隆的《重庆政权的战时经济建设》（载《历史学研究》增刊专辑，1981年）的论文，在论述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注意到它与政治（派阀）之间的关系。菊池一隆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工业合作运动》（载《历史学研究》第485期，1980年）一文中，有根据地研究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工业合作运动的整个过程及主要作用和意义。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白区工作的研究，有井上林的《中国白区的工人运动》（载《中国研究》第43、49、52、64、65期，1973年至1975年），作者概略地叙述了抗日战争前后，以上

海为中心的工人运动的潮流。

法 制

福岛正夫在《中国的人民民主主义》和《边区（解放区）政权的建设及其意义》（载《仁井田论文集》第2卷）两篇论文中，对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法制的特点作了论述。另外，平野克明就司法制度（《边区的司法制度》，同上）、福岛正夫和官坂宏就婚姻法（《中华苏维埃和边区时期的婚姻法特点》，同上）、向山宽夫就劳动法（《边区的劳动法》，同上；《对中国劳动法的研究》，中央经济研究所，1968年），竹内实就法意识的变革（《在解放区的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法意识的变革》，载《仁井田论文集》第2卷）分别作了考察。

文 化 运 动

关于文化运动的研究，这里只提一篇，即小林弘二的《日中战争与文化运动的新潮流——围绕大众化和民族化问题》（载《对三十年代中国的研究》）。作者在文章中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文化运动，是以大众化和民族化为中心开展起来的，于是便出现了文化运动的延安方式。作者认为，中共的这种文化政策带来了抗日战争结束后文化运动的新潮流。

各国对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

〔日〕 铎木昌之

张惠才译

一、前 言

最近，日本、美国、中国、苏联和南北朝鲜已开始发表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下同——译者）后在满洲展开的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著作和史料。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各国的注意，可能是因为今年（1985年——译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但除此之外，也许还有以下几点理由吧：满洲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满洲共产主义运动与北朝鲜或中国政权的正统性问题有着微妙的联系；探求日满军队和警察扫荡共产主义游击队成功的原因等等。

在这篇论文里，我想介绍一下日本、美国、中国、南北朝鲜和苏联当前在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同时，探讨一下研究中的问题和今后的课题。

二、各国的研究动向

（一）日本

战前，日本以满洲国军事调查部编的《满洲共产匪之研究》第一篇（康德3年）为代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因为这些第一手资料至今依然具有史料价值，所以在这篇论文中就不涉及了。

作为先驱性的水平很高的研究，可以举出毛里和子的《中国

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形成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以东北抗日运动为中心》(载《国际问题研究》，1968年12月)和《满洲事变和共产国际》(载《国际政治》，有斐阁，1970)。前一篇论文是把满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放到同中共抗日政策转变的关系上去把握的，而且考察了满洲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者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论述满洲以抗日联军为中心的运动的。后一篇论文是从共产国际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共产国际的领导带来的问题这些角度来研究共产国际对满洲事变的对策的。

作为对满洲的总括性研究，可以举出西村成雄的《中国近代东北地区史研究》(法律文化社，1984年)。西村的研究是把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到1949年东北人民政府的成立这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史当作政治主体的形成，从这种观点出发所作的有根有据的精心之作。其中的一章主要依据中国最近发表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解释抗日联军的形成过程。

在最新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和田春树的《金日成和满洲的抗日运动》^①。和田依据日方警察的资料、北朝鲜的回忆录和最近中国的研究成果等，就满洲事变至1945年8月朝鲜解放前在满洲的朝鲜人抗日武装斗争和金日成的作用，作了概略性研究。

(二) 美国

当前，在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上，最概括的实证性研究，首推李庭植的《满洲的革命斗争》^②。李庭植作为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家，知名度很高。他研究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契机是从研究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史开始的^③。因为朝鲜和满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关系非常密切。尤其要想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北朝鲜掌权的金日成的政治，那就必须研究金日成等人从事的满洲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李庭植不是从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观点研究满洲共产主义运动史，而是把它放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

去研究的。

李庭植在研究满洲共产主义运动时，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共为了在满洲发动群众，高举“反日”口号。这与中共在关内试图通过社会经济革命来发动群众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满洲发动群众的契机不正是民族主义吗？第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考虑地区条件之后不能独立地制定革命战略。当中共的革命战略影响到苏联的国家利益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必须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范围内制定革命战略。中共中央不仅要在与苏联的国家利益有直接关系的满洲这样的地区，而且在制定整个中国的革命战略时也必须反映苏联的利益。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给满洲共产主义游击队的活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满洲在1933年以后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由于1935年发表了“八一”宣言，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了。在这个过程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给满洲各地的运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另外，到1941年共产主义游击队活动平息了，但是，共产主义游击队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日本在对其扫荡中为什么取得了成功？

李庭植带着这些问题在书中叙述了二十年代满洲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中共的战略，满洲事变与苏联和中共的对策，其后抗日游击活动的展开及其失败等。因篇幅关系，这里无法一一介绍，我只想指出几点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围绕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致满洲各级党的信》，即所谓的“一·二六指示信”及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对立问题。王明分析了满洲事变后的形势之后，主张从以往重视苏维埃革命，转变到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然而据说中共中央不同意战略转变，于是发出了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李庭植论述了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的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对立，并非自1935年的“八一”宣言开始，而在1933年1月的书信中就已有了萌芽。

另外，关于1935年的“八一”宣言，李庭植强调指出共产国际为了对付紧迫的满洲形势，呼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众所周知，“八一”宣言规定中共同意中国国民党的一部分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庭植认为共产国际在“八一”宣言中的首要目的，是企图让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做法适用于满洲。

关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李庭植写道，从20年代到1933年的“一·二六指示信”这段时间内，苏联极力避免向日本挑衅。苏联的这种态度也反映到满洲省委的政策中。然而结论是：在“一·二六指示信”以后，由于苏联增强了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苏联企图通过改变政策和推进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的注意力从苏联转移到中国。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恐怕是共产主义游击队失败的原因和日满军队和警察扫荡成功的原因了。作为游击队方面的原因，可以举出因为只注意军事方面，不太关心组织群众，因此造成脱离群众；又由于游击队内部干部不足，政治工作困难等等。作为日本方面的原因，可以举出日俄战争以后，因为日本对满洲非常关心，所以在满铁等机关内对满洲的综合性研究十分活跃；特别是关于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水平相当高；通过组织集体村落、保甲制和扫荡、归顺工作等，采取彻底的匪民分离政策；城市里由于健全了日本的行政组织，所以中共无法组织城市工人，等等。

李庭植的研究利用了日本、中国、苏联和北朝鲜的资料，今后的研究恐怕不能不考虑李庭植的研究成果。

（三）中国

1980年以后，中国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果。在中国发表的著述中，可以分为抗日联军成员的回忆录、传记和历史研究三类。

在回忆录中，值得瞩目的是曾任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的

周保中的《战斗在白山黑水》^④。该书是50年代末周在病榻上写的。他回忆了满洲事变到1945年8月从苏联回国这段经历，披露了许多新史实。另外，曾任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的李延禄的回忆录^⑤也是令人难忘的。

在中国，发表最多的是参加满洲省委或抗日联军的“烈士”们的传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东北抗日烈士传》(全3卷)^⑥，该书揭示了许多过去单靠日方资料无法了解的李红光、杨林等人的史实。另外，《满洲省委烈士传》^⑦也揭示了早期在满洲省委工作的陈为人、罗登贤等人的经历，十分珍贵。

在历史研究方面，有王明阁等人著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初稿)》(1980年，哈尔滨《北方论丛》编辑部)。该书概略地记述了满洲事变后从组成抗日联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共内战在满洲开始这段时间的历史。另外，李鸿文等人编的《近代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史》(1984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也概略地记述了从鸦片战争到国共内战时期的满洲革命斗争。

在中国的研究中，探讨抗日联军的建设及其活动失败的原因的朱建华的论文^⑧耐人寻味。朱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和抗日联军的力量相差悬殊；日满军队的扫荡、治安工作、集体村落的建设等日本的政策破坏了抗日联军的根据地；满洲党重视游击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由于满洲党与中共中央断绝了关系，未能得到统一的领导。

(四) 北朝鲜

关于满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关于朝鲜人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出版书籍和发表论文最多的还是北朝鲜。因为北朝鲜把权力正统性的根据放在金日成在满洲开展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上。因而北朝鲜的出版物强调由于金日成的领导，游击队的活动得到了发展，取得了成功。没有写明金日成是中共党员，是抗日联军的领导人之一。北朝鲜发表的著述也同中国一样，可以分成

回忆录、传记和历史研究三类。

具有代表性的回忆录是《抗日游击队员回忆录》^⑨，这是由现任北朝鲜人民武装部长吴振宇、国家安全部长白鹤林、副主席朴成哲等人为代表的掌握北朝鲜政权的人们执笔的。另外，现任副主席林春秋著有《回忆抗日武装斗争时期》^⑩，回忆了从反民生团的斗争到1945年8月以金日成为中心的抗日游击队的斗争。

关于金日成的传记，不用说是占压倒的多数。金日成的正式传记在1945年以后反复出版，每次出版时都作修改，增添新的事实^⑪。把金日成传的各种版本做一下比较和研究十分重要。

在历史研究方面，可以明确了解北朝鲜的见解的，是《朝鲜全史》（全33卷）^⑫。其中，第16卷至第22卷讲的是抗日武装斗争。可以说它是迄今为止北朝鲜强调的抗日游击队斗争史的集大成之作。

（五）南朝鲜

南朝鲜的研究与北朝鲜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自不待言。其代表是李命英的《在满朝鲜人共产主义运动研究》^⑬。作为研究的动机，李命英认为在于“鉴别北朝鲜主张的真伪，即抗日独立斗争的指挥塔在满洲，其司令是北朝鲜的‘主席’金日成。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他认为“为了把握现代朝鲜半岛的政治现实的本质，把握在满朝鲜人共产主义运动的真相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李命英的研究目的“不只是停留在发掘和整理历史事实上，作为把握北朝鲜政治本质的方法，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在满朝鲜人共产主义运动的萌芽和发展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上”。

该书叙述的时间是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40年代抗日联军逃往苏联为止。在这本书中，李命英似乎独特主张把金日成任抗日联军第2军第6师师长作为第一阶段，把金日成任抗日联军第1路军第2方面军军长作为第二阶段，把金日成的现在作为第三阶段。而且，李命英的结论是：除了早期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共产主义

运动之外，在满朝鲜人的共产主义运动，不管是作为抗日运动，还是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失败的。

（六）苏联

苏联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不多^④，苏联的研究主要以战后的满洲为对象。鲍里索夫的《苏联与满洲革命根据地》一书^⑤，就是其代表。该书对抗日联军的记述不多，但在考察战后的满洲共产主义运动与抗日联军的连续性，或苏联军队的作用方面有重要价值。

鲍里索夫写道，苏联军队支援了由林彪指挥的八路军和周保中等抗日联军结成的东北民主联军，援助了中国在满洲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特别是民主联军在苏联的援助下，由1945年11月的2万人增加到1947年10月末的46万5千人。这支满洲部队与以游击战为主的关内的中共部队不同，它在统一的指挥下，已成长为可以进行正规作战的部队。因而，满洲的部队在国共内战时期起了决定性作用，它使国民党军队遭到了失败。鲍里索夫强调，如果不考虑对建设和发展满洲革命根据地做出贡献的苏联的援助，也就无法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在强调满洲革命根据地的作用方面，苏联学者的见解是一致的。

三、研究中的问题和课题

如上所述，由于满洲共产主义运动与各国权力的正统性问题有联系，所以各国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现在，对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评价完全相反。据说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恶意诽谤和中伤东北抗日联军^⑥，说他们是‘土匪’，是‘反革命武装集团’”。而且“侮辱许多抗日烈士，给他们加上‘叛徒’，‘特务’等罪名”。曾担任抗日联军第3路军政委的冯仲云，在文革期间受到批判，在审问过程中死去了^⑦。在否定文革之后，根据（“实事求

是”的原则；参加过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得到了重新评价。给他们恢复了名誉，把他们当成了“抗日烈士”。

苏联的研究强调满洲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强调苏联支援其建设和发展的作用。他们企图以此向中国革命是靠毛泽东的领导取得成功的这一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共党史观提出挑战，试图以中苏对立为契机暴露中共正统性神话的虚构。

南北朝鲜的研究也如上所述。在北朝鲜，由于是把权力正统性的根据置于金日成的抗日游击活动中，所以把这种研究的目的说成是为了创造神话，也许并非过分。另一方面，南朝鲜的研究意图则在于暴露金日成神话的虚构。

因而，在利用中国、苏联、南北朝鲜的研究成果或资料时，要在研究当时的日满警察资料、共产国际及中共资料的基础上，比较和分析各国的研究成果，同时需要考虑各国研究人员的编写背景。

在今后的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搞清楚。其中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是对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的问题。

领导系统反映了满洲具有的战略重要性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因此在历史上是十分复杂的。中共进入满洲以后，在1933年前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满洲省委这种一般的领导系统。然而从1933年开始到1937年，却采取了不经过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直接领导满洲省委的形式。而且在1937年以后，变成了苏联远东军直接领导满洲党这一不合常规的领导系统。另一个不能忘记的，是对驻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领导问题。1928年朝鲜共产党因遭日本的逮捕而被破坏，其后共产国际取消了对朝鲜共产党的承认。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命令驻国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有关国共产党。1929年至1930年，驻满洲朝鲜共产主义者们参加了中共满洲省委。在明确了这种复杂的领导系统之后，恐怕还需要解释清楚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满洲省委的路线或运动。

其次，围绕“一·二六指示信”问题在学者中间存在着意见分歧。这是指围绕“一·二六指示信”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路线分歧？还有“一·二六指示信”是经过什么样的渠道传到满洲的？

李庭植依据王明的论文《东北形势和抗日统一战线战略》（1938年），认为王明考虑到满洲的情况，要求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然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因与国民党对峙，不接受这种主张，发出了强调结成下层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而且，李庭植似乎认为“一·二六指示信”的传递渠道是莫斯科——上海——满洲省委^⑧。

蜂屋亮子的论文与李庭植的见解形成了对照^⑨。蜂屋认为，王明的上述论文是他1935年发表的《东北形势和反日统一战线战略》的修改，王明修改的结果，前者变成了以结成上层统一战线为基调的抗日统一战线论。蜂屋进而认为，在研究1933年1月17日的三条件宣言之后，满洲、上海、瑞金的中央领导人痛感结成上层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可是由于王明的下层统一战线至上主义，他们无法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策略。蜂屋认为“一·二六指示信”的传递渠道是莫斯科——满洲——上海——瑞金。

中国的李鸿文的记述是，虽然中共中央在满洲执行了北方会议的“冒险主义”路线，但是共产国际通过“一·二六指示信”帮助纠正了错误^⑩。而且评论说，“一·二六指示信”虽有强调下层统一战线这一局限性，但它比北方会议的路线更适合满洲的实际情况。进而又写道，“一·二六指示信”是在听取1932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和其后召开的共产国际东方部主持的专门会议讨论的结果后拟制出来的。而且说三条件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是相继拟定出来的。李鸿文搞清了一个新事实，即“一·二六指示信”是1933年4月由工会国际太平洋秘书处传到中共吉东局的。

本论文无法充分地研究三位先生的论述。但李鸿文所阐明的“一·二六指示信”的传递渠道有日方资料可以证实^④。当时，工会国际太平洋职工部秘书处设在海参崴，大约在1933年春在哈尔滨新成立了满洲总工会筹备处。而且，工会国际太平洋职工部秘书处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海参崴派遣机关是表里如一的，共产国际是利用工会国际太平洋职工部对满洲总工会领导的形式，直接领导满洲省委员会的。

对满洲省委领导中不能忽视的，恐怕是在满苏联共产党。在满苏联共产党以哈尔滨为据点，主要组织中东北铁路的苏联职工活动。不过，关于在满苏联共产党的研究，战前大概只有日本有人研究^⑤。今后恐怕还需要研究在满苏联共产党对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关于苏联远东军和抗日游击队的关系，恐怕也需要提一提。中国的研究表明，1937年下半年以后不是共产国际，而是苏联远东军领导抗日联军^⑥，但是却没有关于苏联远东军如何领导抗日联军的研究。

实际上，苏联远东军与周保中等抗日联军之间关系的发展并非顺利。因为周保中等人要求的，不是苏联远东军而是中共中央的领导。围绕这个问题，1940年春到同年末，苏联远东军与周保中等人之间进行了协商。

在这两次会议上，苏联远东军派出一位名叫“王新林”的人出席了会议。根据中国的研究，与抗日联军相对，“王新林”是代表苏联远东军的人物^⑦。另外，日方资料认为“王新林”的真名叫瓦西林或西里琴科，是伯力苏联远东军政治部所属的大校级苏联军官^⑧。总之，“王新林”肯定隶属于苏联远东军，是领导抗日联军的人物。

王新林是1939年末以后出现的，从这时起，抗日联军的活动就已经反映苏联远东军的意图了。抗日联军从重视以往的游击战

路线，转变为使用小股部队进行侦察活动和以群众工作为中心的路线。从日方缴获的“王新林”给抗日联军的指示或寄给“王”的书信来看，抗日联军的活动目的是侦察日军的兵力情况，转移情况和群众的思想情况。抗日联军是为苏联远东军收集必要的日满军队军事情报的侦察部队。周保中也承认基本的任务首先是侦察敌人的统治情况，尤其是侦察军事设施^⑧。苏联远东军的目的是把抗日联军置于自己的指挥下；对日开战时开展游击战并利用群众起义袭扰后方；为此实施政治军事训练、收集和侦察日满军队的军事情报以及开展群众工作。

最后还应指出，有必要解释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抗日联军的情况。需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满洲的政治主体是怎样形成的？它在中国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1945年8月苏联进攻满洲时，周保中等人和苏军一起返回满洲。周保中于1945年9月将抗日联军改编成东北人民自卫军。并就任司令。1946年1月，他们和从关内来的林彪指挥的中共军一起组成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林彪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周保中就任副总司令。这样，在战后的满洲，周保中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关于周保中，特别值得注目的是，他同毛泽东或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没有建立关系，而且暂时在苏军指挥下从事活动^⑨。显然，周保中等人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不是一个系统。因此，对周保中等人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的关系，需要很好的研究。

四、结 束 语

在概括地记述各国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自然想起研究上的问题和课题了。如前所述，除了日本和美国之外，其他各国的研究均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有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苏联有中苏论争问题；南北朝鲜有政权的正统性问题，这些都与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密切相关。因而，满洲共产主

义运动的研究，尚不能完全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现代政治学，尤其是对共产党国家研究的方法论依然有效。

注释：

①和田春树著《金日成和满洲的抗日运动》（《思想》733号，1985年7月和735号，1985年9月）。

②李庭植著《满洲的革命斗争（中国的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影响，1922—194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③李庭植著《朝鲜劳动党简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78年。斯卡拉皮诺、李庭植合著《朝鲜的共产主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

④周保中遗著《战斗在白山黑水》，1983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⑤李延禄口述《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四军的回忆》，1979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东北烈士纪念馆编《东北抗日烈士传》（全3卷），1980年，1981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⑦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满洲省委烈士传》，1981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此外，还有该校编的《辽宁抗日烈士传》（1982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吉林省民政厅编《吉林革命英烈》（1982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等。

⑧朱建华著《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与丧失》（1984年6月1日，中日抗日根据地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直属党史研究所编《抗日游击队员回忆录》（全12卷），1967年至1969年，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

⑩林春秋著《回忆抗日武装斗争时期》，1960年，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此外，还有崔贤著的《越过白头山》（1964年，东京，朝鲜青年社）。

⑪在金日成传中，最早的一本是韩雪野著的《英雄金日成将军》（平壤，1964年，1947年在釜山由新生社再版）。作为金日成传的代表作是白峰著的《民族的太阳金日成》（1968年，平壤，人文科学社）。

⑫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朝鲜全史》（全13卷，1981年，平壤，科学百科辞典出版社）。此外，最近还出版了金韩一著的《现代朝鲜历史》（1983年，平壤，社会科学出版社）。

⑬李命英著《在满洲朝鲜人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975年，汉城、成均馆大学出版部）。李命英还编有《北傀魁首金日成的真面目——四位学者对金日成的研究》（1975年，汉城、民艺文化社）。另外，还有金俊、金昌顺合著的《朝鲜共产主义运

动史》第四卷（1974年和1976年，汉城、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

⑮B.M.马祖洛夫著《朝鲜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1931—1940年)》，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58年。

⑯O.鲍里索夫著《苏联与满洲革命根据地(1945—1949)》，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5年。

⑰《东北抗日烈士传》，第2页。

⑱参考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1983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第276页。

⑲李庭植著《满洲的革命斗争》，第163页至第188页。

⑳蜂屋亮子著《苏维埃革命时期在抗日问题上的王明路线》（《中国的政治和国际关系》，1984年，东京大学出版会）。

㉑李鸿文著《论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5期。

㉒参考《满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现阶段》，《特务汇报》第2号，康德6年6月，第14页。

㉓满洲国协和会著《歼灭共匪》，康德1年。

㉔李敏卿、李斌华著《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周保中同志》（下）（《求是学刊》，1981年第3期）及《近代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史》。

㉕参考《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周保中同志》（下），第28页至第29页。

㉖参考《最近满洲党及抗联匪团之概况》，《特务汇报》第4号，康德10年5月，第6页至第7页。

㉗《战斗在白山黑水》，第39页。作为其他的任务，还可以举出为应付形势变化准备大规模游击队临时活动的场所；与群众密切联系开展地下党的工作；秘密武装群众。

㉘参照平松茂树著《朝鲜战争的开战和中国》，《国际问题》1977年8月，第41页。

（译自日本《军事史学》1985年12月号）

苏联学者对中国工人运动 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研究

[苏]B·H·尼基福罗夫
马 贵 凡 译

译者按：本文译自苏联《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82年第1期。原标题为《苏联历史著作中所反映的中国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诞生》。作者尼基福罗夫系苏联历史学博士、苏联远东研究所编史学和国外中国学部主任。此人1953年至1956年曾在我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回国后一直从事中国史研究，侧重中国现代史。迄今已发表150多篇（本）著作。在本文中，作者综述了苏联史学界对我国1917至1923年期间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的研究情况，介绍了各个时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人物，发表的主要著作和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本文对全面了解苏联史学界对我工人运动和我党早期历史的研究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六十周年，她的成立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东方各国解放运动产生影响的一个显明的例证。

在当代历史编纂科学中，围绕与中共成立有关的事件展开了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力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特殊的”中国社会的特点排除了在中国历史中显现出世界普遍性规律的可能性，因而使中国人民变得难以接受西方出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社会只能产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庸

俗化的、“纯粹中国式”的理论。(下略一段)

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研究中国社会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过程，研究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具有很大的意义。本文试图将苏联历史学家对十月革命后头几年（1917至1923年）中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的研究情况作一介绍。

专门研究“中国工人运动”问题的开路先锋当推X·T·埃杜斯，此人后来成为苏联著名的日本史学家。1921至1922年，他曾任职工国际东方部主任。1921年，他根据与职工运动代表的谈话和职工国际收到的材料写出了第一篇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①。非常可贵的是，这篇文章记述了鲜为人知的1920至1921年，即较著名的1922年香港大罢工爆发之前的工人罢工和工会活动情况。

关于1922至1923年中国工人的斗争情况，后来写的人很多。早期文章的特点是，它们的作者一般都不是史学工作者，而是为评论时局而撰文的实际工作者。虽然，作者不懂中文，但这些文章所使用的材料，在今天看来也可以说是相当可靠的。在这些文章和小册子中，一般都特别重视两个事件，即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3年的铁路工人大罢工。

苏联学者正确地预见到，中国工人阶级必将起巨大的作用，尽管这个阶级在社会组成中从数量上来说占有的比重并不大。即使后来中国无产阶级在思想上长期受到农民和其他中间阶层革命巨浪的冲击，但确实也不该忘记，20年代初中国无产阶级曾表现出高度的独创精神，影响了先进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向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无不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苏联研究人员重视中国工人运动这个课题的研究是有道理的。苏联科学界是研究这个课题的先锋，而西方资产阶级中国学界则不得不跟在它的后面也逐步开展对此课题的研究。

诚然，苏联作者最初只是注意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却长期没有研究不仅保持着中国社会独特性质而且对中国工人阶级一直产生影响的广大农村。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中国的形象过于欧化，不符合实际。在20年代，夸大中国无产阶级作用的倾向有时甚至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的作用……按其人数所占的整个比重来说，可能要比俄国小……”^②这个“预言”在所引用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年时间就被农民运动的高涨形势所驳斥。

对于“1917至1923年的工人运动”这个题目，后来的命运十分清楚地表明，那些沿着事件足迹撰写文章的作者，就其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而言，并不是历史学者，他们只不过是対时局感兴趣，新的历史时期一经开始，那些描写20年代初期工人运动的文章便让位给层出不穷的描写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工人斗争情况的著作。20年代中期，T·曼达良、X·埃杜斯等人撰写的部分概括性文章很少涉及1925年以前处于初期阶段的中国工人运动。30年代的著作就只写本时期的工人运动，而对其历史几乎是只字不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中国学研究逐渐扩大了范围，提供了同时研究诸多中国历史时期的可能性，这时历史学家才得以重新着手研究1917至1923年的历史。在苏联的科学工作中，这方面工作的倡导人及其一个时期（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的领导者是Г·Н·维经斯基教授。1920至1927年，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工作，他曾积极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他是苏联撰文论述中国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早期作者之一。在50年代，苏联研究中国1917至1923年历史的主要专家是H·И·维纳格拉多夫。维纳格拉多夫是维经斯基直接教过的学生，他写过一些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1925年，维纳格拉多夫发表了两篇论述国共第一次反帝统一战线形成前夕中国工人运动情况的文章^③。同年，一本极其珍贵

的史料，中国工人运动第一位组织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人之一邓中夏所著一书出版^④。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工人运动史成为苏联中国学研究的—个中心课题。关于这个运动的早期（1917至1923年）情况，在B·B·韦特罗夫和И·И·格拉西莫娃两位作者的著作中均有反映^⑤。

韦特罗夫曾发表一系列论述五四运动的文章，1964年他在哈尔科夫答辩的论文便是这些文章成果的集成。在这些文章中，他研究了上海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时期及其后的斗争情况。作者论述了1919年6月的罢工行动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所占的地位，指出了后来上海工人发动的主要标志是1920年的“米”风潮和1921年蓬勃兴起的罢工运动新高潮。韦特罗夫试图根据中国资料为他提供的可能性，不仅要从民族方面，而且尤其要从阶级方面来研究中国的工人运动。

格拉西莫娃在其学位论文中研究了从1917到1925年的整个时期。

她查阅用俄文、中文、英文和法文出版的各种期刊、文件汇编和回忆录，论证了中国工人运动从19世纪最后几年起一步一步呈波浪形的发展过程，指出工人组织有三种形式，即互济会，这是企业主为工人建立并在他们庇护下进行活动的组织；工人自己组织的同乡会、行会；再就是辛亥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一些政党（工人党、社会党、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等）为吸引工人参加捍卫资产阶级提出的全民族性要求而成立的协会。最后的这种组织形式存在时间不长。作者认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以后出现了工人运动的高涨形势，普遍建立了工会组织。同时作者指出，这个时期也建立了一些以前的那种同乡会或范围很窄的行会。

只是共产主义小组出现之后，才在它们的帮助下，在长辛店、上海建立了第一批产业工会，而后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但是，就是在这以后发生的一次规模空前的罢工行动，即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也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中华海员联合总会领导的。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唯一一个其建立与中共活动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工人阶级组织。1923年发生的铁路工人大罢工则是共产党领导的。

格拉西莫娃的文章一直写到中共四大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共四大很重视工人和农民的阶级运动；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建立了统一的工会中心机构，即后来起巨大积极作用的中华全国总工会。

在这以后的年代，研究工作多半集中在1919至1923年中国工人运动史的一个侧面，即中国无产阶级同苏联和国际工人组织的联系上。A·И·卡尔图诺娃主要是根据档案材料论证了职工国际及其前身在建中国革命工会，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1922年）等项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她得出的结论是：国际上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帮助加快了工人阶级对革命斗争的准备^⑥。这里还可以提到B·И·格卢宁的一篇论述共产党领导的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文章^⑦。

对中国工人运动早期历史研究的不够，间接地反映了后来30至40年代工人阶级被从中国政治生活的前台排挤到后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如此，显然还应回过头来重新研究1917至1923年的工人运动问题，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专著（当然，这个空白不能用谢诺（Ж·Шено）一书的俄译本来填补）^⑧。

苏联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趣是在它着手研究中国无产阶级历史的同时产生的。共产国际和职工国际的工作人员在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曾在中国寻找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代表人物，他们在没有掌握足够材料的情况下，有时竟匆忙宣布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会儿说是孙中山（尽管列宁早在1912至1913年

间就已明确指出，孙中山的纲领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乌托邦民粹主义思想的混合物），一会儿说是向革命者暗送秋波的华南军阀陈炯明（此人不久就变成了叛徒）。

当年，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起到了令人醒悟的作用，那次会议之后，在苏联学术著作中，普遍开始承认东方各国的解放运动还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Б·З·舒米亚茨基^⑨和埃杜斯的文章都谈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然而对伴随中共成立而发生的意识形态斗争，则只是到1925至1927年的革命时期才有人开始尝试作出历史的概述。第一个作出这种尝试的人是С·Н·纳乌莫夫，此人当时在华南国民革命军培训干部的黄埔军校任政治顾问^⑩。

纳乌莫夫的中共简史问世之前，由于中共成立头两年处于秘密状态，广大读者对中共成立史一无所知。纳乌莫夫使用了他从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得到的各种书面材料和口头材料。他并未打算判断中共成功与失败的比例，而正如他自己所写的，他只是想谈谈中共的成就。但是，当时作者不可能了解党内斗争情况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主义者建党的决定性帮助。在纳乌莫夫的著作中，对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第一任书记陈独秀的作用有所夸大。

虽然如此，但纳乌莫夫文章的史料价值至今不减，因为它含有精心收集的珍贵资料。就在纳乌莫夫在中国收集材料的时候，舒米亚茨基公布了有关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及其同中国革命者联系的材料^⑪。

20年代末还出现一篇署名尤安里（译音）、试图全面论述中共早期历史的文章^⑫。与纳乌莫夫的文章相比，这篇文章的优势在于它刊登在《共产国际》杂志上（而纳乌莫夫的文章是发表在驻华顾问团创办的一个读者难以见到的油印刊物上）。文章由蔡和森

和A·Γ·克雷莫夫选材，B·H·库丘莫夫和П·B·基泰格罗斯基执笔。据我们分析，主笔当是库丘莫夫。但是这篇文章中史实材料不多，因此它在史学中并没有留下显著痕迹。

当时，苏联作者的观点过于依附于中国某些个别史料。他们在批判中共中央宗派主义错误时往往都引用瞿秋白的著作。后来出现了蔡和森于1927年9月在莫斯科所作的报告，此报告内容很广泛，到1929年才公开发表。报告是凭记忆写成的，未引用文献资料，但含有很丰富的史实材料，不过选材单一，其目的主要是为证明报告人“左”倾路线的正确。在蔡和森的这篇报告中含有对中共早期历史的分析。

在整个“左”倾思想支配下，甚至蔡和森在不指名地批驳某些反对派意见时，也坚持说：“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之日起便是机会主义的”^⑧（顺便说一下，这种反驳表明，1927年夏末在中共某些党员中存在着怎样一种认为批评过头的情绪）。

苏联后来出版的关于中共早期历史的著作还受到了对陈独秀主义的讨论的影响，这次讨论是在1930年，也就是把曾任中共中央书记的陈独秀开除出党和他转为托派之后同中国同志一起进行的。陈独秀的叛变（1929年）导致人们把他的全部活动都片面地评价为机会主义行径。

20年代中期（应为30年代中期——译者）开始有人尝试撰写关于中共的概括性著作。当时出版了一本共产国际文件汇编，其中也收录一些中共成立初期的材料^⑨。1936年，党的出版社出版了米夫的小册子《英勇斗争的十五年》，即中共从成立到1935年的简要历史。这部著作篇幅不长，但是1917至1924年这个时期就占了十五页。值得一提的章节是：“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京汉铁路大罢工”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些章节写出了1922至1923年中共形成时期的主

要特点，即这些事件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纯无产阶级（就人员组成而言）运动空前高涨的时期。作者力求客观地阐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他认为，1921至1923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为群众性的政党。这个时期在它的队伍里还混杂着“无政府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院社会主义的信徒，以及完全是萍水相逢的同路人”，而且它同工人运动的联系还很有限（象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样重要的罢工运动，在中国工人运动中是一个转折点，然而却不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对决定中国命运的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重视不够，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正如米夫根据文件所论证的那样，共产国际曾不止一次地为中国共产党指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米夫也指出了另一个方面：共产党虽然人数不多，但在1921至1923年期间已在中国实际生活中起了显著作用，它领导了有15万工人参加的几十个工会和拥有4000名成员的青年团组织。

应该特别指出，在论述1917至1924年这个时期的章节里，作者基本上是客观地评述了中共创始人之一、从1921到1927年一直担任中共主要领导职务的陈独秀教授所起的作用。在米夫的著作中，谴责陈独秀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只是就1927年发生的事件。即大革命失败时期而言。

但是在这部著作中还没有充分说明共产国际的作用和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党的帮助。

与米夫的著作同时问世的，还有一篇用俄文写成的珍贵史料文章，这就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回亿录。

伟大的卫国战争那四年困难时期以及战争前后几年，如果不算某些作者根据1936年以前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所撰写的一般性评述文章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没有出现什么关于中共早期历史的新

作。

50年代，中共成立史是同1917至1923年这个时期的其他问题合在一起研究的。但是维纳格拉多夫在他的一篇专门介绍苏联发表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历史著作的文章中，却讲不出一本详细论述中共1925年以前历史的专著（米夫的那本小册子除外），也举不出一篇直接写这个时期的文章^⑤。

Ю·М·加鲁向茨论中共一大的文章为专门研究中共成立史奠定了基础。作者占有不少材料，除舒米亚茨基和陈潭秋回忆录外，还有当时中国发表的一大代表包惠僧、李达和马克思主义小组参加者何长工、刘少奇等人的文章和讲话，苏联出版的与中共的成立有某种关系的旅俄革命运动活动家刘泽荣和A·A·莫勒的回忆录；以及中国一些史学工作者的著作。加鲁向茨的文章第一次具体而客观地概述了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过程中所起的整个突出作用，而不是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1920至1921年期间同中国联系的个别细节。

1962年，克雷莫夫通过一篇博士论文答辩（此人早在1934年就写了一篇关于中共历史的副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斗争（1918—1927）》。克雷莫夫根据大量史实材料论述了中国知识界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两次大辩论：一次是在中共成立以前（1920至1921年），一次是在中共二大以后（1923至1924年）。在辩论过程中，那些冒充“社会主义观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和无政府主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观点面前不得不步步退却，尽管专程来华讲学的西方著名哲学家杜威和罗素支持资产阶级改良派，而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支持特殊东方文化捍卫派。

在克雷莫夫的手稿中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掌握它。克雷莫夫在评价中共一大工作时，认为在大会的方针中主要是反帝思想具有

特殊意义。他得出的结论与文献中流行的所谓中共一大制定了宗派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方针的看法迥然不同。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也需要彻底弄清。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克雷莫夫的著作（加鲁向茨的著作也同样）谈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援助中共的经过和刘少奇、任弼时、张太雷以及后来的邓恩铭、王尽美等人旅居苏俄时的活动情况。1922年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对中共制定正确路线起了很大的作用。

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开始有步骤地研究中共各个历史阶段，集中了各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如研究1917至1923年问题的就有远东研究所的E·Φ·科瓦廖夫、B·И·格卢宁、K·B·舍维廖夫；东方学研究所的П·П·杰柳辛、M·A·阿斯拉诺娃；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的A·И·卡尔图诺娃；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的M·A·佩尔西茨等。其中格卢宁侧重研究统一战线问题，舍维廖夫研究共产党成立问题，阿斯拉诺娃研究有关1917至1925年历史的重要史料——《新青年》杂志。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研究工作特别注意利用档案文件，因而使研究人员有可能比以前更加全面地论证共产国际在建立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组织时以及在这些组织制定正确策略路线的过程中所起的突出作用。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B·M·乌斯季诺夫就已开始研究旅居苏俄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⑥。60年代后半期，佩尔西茨在研究东方各国革命者旅居苏俄时的活动情况这一范围很广的课题时，曾发现一些史实，说明在当时的远东共和国境内存在着中国人组织^⑦，于是他便继续了舒米亚茨基曾一度着手进行的对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历史的研究工作，因为早年该处负责同中国共产主义者进行联系。1922年召开的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产生了很大影响。此次会议的作用在Г·З·索尔金的文章中有所应映^⑧。中国共产党人逗留

苏俄时的情况在另一些著作中也有叙述^⑩。

苏联学者的著作阐明了共产国际在各个阶段对无产阶级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与策略的制定过程和列宁同当时在亚洲各国革命者那里经常见到的宗派主义和“左”倾观点所作的斗争。列宁同“左”倾宗派主义的论战是直接针对印度驻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某些观点的。当时一些中国人也支持罗易的观点。他们在1920至1922年间曾酝酿从苏俄向中国进军以推翻北京政府或占领一些省份的冒险主义计划，但遭到共产国际和苏俄共产党人（如B·K·布留赫尔）的坚决反对。

在最新的研究性著作中，维经斯基赴华使命（1920年）的突出作用写得更清楚了。它促进了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立，为在下一年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了准备。格卢宁得出的结论是：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倡议完全出自共产国际，但是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思想以及共产主义刊物、工人刊物的创办无疑是赢得了年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支持^⑪。

苏联学者的研究性著作证明，同共产国际的接触使得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在1920至1921年期间极其迅速地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但是他们所走的道路是痛苦的、艰难的，原因是年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既不高也不整齐。

世人皆知，1918至1919年，李大钊在努力理解和接受十月革命思想方面远远走在了自己同胞的前面，但据舍维廖夫判断，李大钊在1919年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并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理^⑫。李大钊开始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仅仅是在1921年他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之后。舍维廖夫试图使我们得出如下看法：李大钊向马列主义立场的彻底转变是发生在他写舍维廖夫所熟悉的那两篇文章之间的时期，一篇写于1919年，另一篇写于

1921年。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最后形成和当时中国先进思想的第二个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转变可能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1918至1919年，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大大落后于李大钊，1920年他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看来，他同维经斯基接触受到了影响。从1920年4至5月起他开始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被人誉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一面镜子。据阿斯拉诺娃考证，这个杂志从第8卷第4期（1920年12月）起才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②。

苏联历史学家指出，由一些试图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小组，在当时就已自称是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与其说反映了实际状况，倒不如说反映了倾向性”）。这些小组混进了中共需要逐步清除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杰柳辛的著作《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写的是马克思主义小组已经成立，而党尚未诞生的1920年底的情况。张东荪的文章《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发表之后，在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再次展开了对中国发展前途的辩论。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作者是同情社会主义的，但在这篇文章中他却来了个急转弯，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站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上去了。这场辩论表明，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的知识分子大分化仍在继续。

在辩论过程中，刚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较量，首次经受了实际的考验。杰柳辛认为，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非常积极参加辩论的是李大钊、李达、李季和施存统。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用俄国的经验证明，中国虽然落后，但若以俄国人为榜样，联合世界无产阶级，是可以走上社会主义轨道的。

但是杰柳辛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辩

论时，远不如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和张东荪辩论时那样坚决，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作出了一些让步。

杰柳辛指出，1920年底进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其最大意义在于，在这场辩论中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何种回答将决定中国社会积极而有觉悟的部分以后几十年政治活动的性质。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它与这个国家的民族特性有否抵触，社会主义制度能否使中国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等等。杰柳辛在该书结尾写道，这场辩论对这三个问题作出了笼统然而肯定的回答，因而为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党的一大召开前夕，具有决定意义的组织步骤是1921年举行的三月共产主义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无政府主义者被清除出马克思主义组织。加鲁向茨和佩尔西茨（特别是后者）都提到这次不应忘却的会议^⑧。他们仔细研究了一大召开时的情况，结果查明，一大召开和中共诞生的日期7月1日，是后来的说法。佩尔西茨以未署名的档案材料《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札记为依据，第一个在报刊上建议“更改”中共一大开幕日期。继他之后，科瓦廖夫和卡尔图诺娃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札记和《赤色职工国际驻赤塔全权代表Ю·П·斯穆尔基斯的信件摘录》。后一个文件指出，代表大会工作是从1921年的7月23日到8月5日。关于代表人数，开会前有多少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大会选出的临时中央局的组成情况、党成立时的党员总数等等问题的争论，肯定还要继续下去，尽管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有趋于准确的答案。

加鲁向茨曾发表两篇从中文译出的史料文章，并加了前言和注释。一篇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另一篇是1957年中国发表的栖梧老人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录。

既然连会议日期都忘记了，自然会上的争论情况和会议的决议也只能大致重新确立。不过几乎所有研究人员都认为，关于会

上存在右倾和“左”倾思想以及关于对孙中山持什么态度有争论的说法看来是有根据的。

虽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存在的初期有一些弱点，但是苏联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表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然，当时中国也存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解决中国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而接受下来的条件。中共一大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渴望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大军一部分的愿望。

现在，对“中共成立”课题的研究水平已经提供了从撰写这个问题的专题性著作过渡到概括性著作的可能性。但是，令人注目的是，对这个问题的编史学分析却大大落后于史科学分析。

B·A·克里夫佐夫和B·A·克拉斯诺娃最近发表的专著^⑧详细地分析了李大钊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对于中国社会具有历史意义。作者指出，1917年以前，李大钊的思想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混合物，从1917年起他才开始同后一种思想彻底决裂。作者认为，1918至1920年是李大钊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转变的时期。

按照这两位作者的评价，李大钊在1921至1927年期间是中国第一个能够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思想并将其国际主义思想和创造性革命精神传授给人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李大钊教导说，唯有列宁主义能够指出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克里夫佐夫和克拉斯诺娃驳斥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谓李大钊开始“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臆测。

舍维廖夫在总结有关中共一大筹备和举行情况的资料时，说这次会议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渴望在国内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并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愿望。但会议代表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处理是有严重缺点的，如关于党员资格的纲领

性一条并未要求党员必须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一条含有宗派主义思想的决议规定：“不准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苏联历史学家研究中共成立后头三年半（1922至1925年）活动情况的著作没有研究建党时期著作那么多，而且大部分是写那几年举行的第一、三、四次代表大会。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格卢宁完成的。我们认为，格卢宁著作中的积极成果突出地体现在恢复被中国史学界指责为犯有严重错误的中共二大在中共历史上的真正作用方面。格卢宁在论证这种指责毫无根据时，提出一个论点，即二大在中共历史上“具有不亚于一大（成立大会）的意义”^⑤。二大确定了一些基本的纲领性原则（“大会宣言”），多年来代替了党的纲领；二大为党制定了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了无产阶级同农民联盟的任务（虽然是笼统的）以及减租的要求，这项要求很多年（直到1946至1952年的土地革命时期）一直是中共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二大的各项决议都充满着国际主义精神。

格卢宁并未忘记指出，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前多年宣布了各项政策原则。在二大时期党实际上完全忙于领导工人运动，因此二大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直到三大时（1923年）才得以实现。

在这方面，苏联历史学家指出的下述事实是值得注意的：众所周知，1922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人员组成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1922至1923年初，工人运动的高涨使党增加了工人党员数量，到三大时工人党员已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但应注意到，三大是在1923年2月事件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党内工人成分的增长将要停顿一段时间的形势下召开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共筹建阶段和它存在的初期，同工人运动的联系比较薄弱，因此一些苏联作者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起点是在相当晚的时候。

米夫就提出一种看法，认为中共在一大、二大之后的1923至1924年期间还只处于“克服小组习气”，“从弱小、狭隘的宣传小组向群众性政党转变”的阶段^⑧，只是在1925至1927年的革命时期中共才开始转变为“群众性的政党”。这样，米夫至少把中共历史上的小组时期延长到1924至1925年。

克雷莫夫在其学位论文中评论了丁守和、殷叙彝和张伯昭合写的小册子《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1957年)。他对作者关于一大前夕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论点提出了异议。克雷莫夫认为，实际上这种结合的完成，仅仅是在建党和建立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劳动组合书记部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党才积极着手组织工会和领导罢工斗争。这以前，共产党人同工人运动的联系只是偶然性的。这个时期的罢工斗争是自发的，组织得很差的^⑨。另一些作者也提出了与克雷莫夫相同的看法。

但是卡尔图诺娃和科瓦廖夫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他们把自1920年中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中间从事的宣传、出版、组织（建立工会）等活动看作是 they 与工人阶级联系得到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并认为这种活动是“中共成立前夕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一种形式^⑩。因此用这两位作者的话说，中共一大“证明党的成立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

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920年底就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当然，专家们讨论这个问题的^⑪事实本身就说明，无论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还是他们同工人阶级的联系，终归都还是有限的。这在晚些时候不能不对刚刚诞生的共产党的社会成分和它的政治路线产生消极的影响。但是，不容置疑，1921至1923年，以至更晚时期的历史证明，“中国没有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这个合乎客观规律的进程”，从而驳斥了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

用于”中国的资产阶级观念。

然而，中国共产党形成的过程是复杂的，“客观上的困难……是中国社会经济普遍落后，中国无产阶级相当软弱，人数很少。许多革命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转向马克思主义不是通过工人运动，而是通过民族解放斗争，这就造成了民族革命思想影响的长期存在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曲解”^⑧。（以下从略）

注释：

①《中国的工人运动》，载《赤色职工国际》，1921年第11期。

②Л·Н·格列尔：《民族运动与工人阶级》，载《工人中国》专辑，莫斯科，1925年版，第87页。

③Н·П·维纳格拉多夫：《反帝统一战线形成前夕的中国工人运动》，载《历史问题》，1952年第10期；《1923年2月7日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及其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影响》，载《东方学研究所简报》，1952年第77期。

④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莫斯科，1952年。

⑤Б·В·韦特罗夫：《上海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载《高等院校学术报告》，历史科学版，1959年第4期；И·И·格拉西莫娃：《中国职工运动的形成》，应考历史学副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莫斯科，1966年。

⑥参看А·И·卡尔图诺娃：《职工国际和中国的职工运动》，载《亚非人民》，1972年第1期；《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援助（1920—1922）》，载《远东问题》，1973年第1期。

⑦В·И·格卢宁：《中国工人阶级政治斗争史料》，载《远东问题》，1973年第1期。

⑧Ж·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译自法文，莫斯科，1969年。

⑨Б·З·舒米亚茨基：《远东的共产国际》，载《共产党人》（伊尔库茨克），1921年第7期。

⑩С·卡拉切夫（С·Н·纳乌莫夫）：《中国共产党简史》，载《广州》杂志，1927年第1期（总第10期）。

⑪Б·З·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史略》，载《革命的东方》，1928年第4—5期。

⑫尤安里（音）：《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载《共产国际》，1929年第9—10期。

⑬蔡和森：《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史》，载《中国问题》，1927年第1期。

⑭参看《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以中国为例）》，莫斯科1934年版。

⑮Н·П·维纳格拉多夫：《苏联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工人运动史的研究》，载《苏共历史问题》，1961年第2期。

⑯В·М·乌斯季诺夫：《在苏俄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1918—1920年）》，载《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莫斯科，1961年；《在苏俄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1918—1920）》，载《苏共历史问题》，1961年第4期。

⑰М·А·佩尔西茨：《在远东共和国境内的中国革命组织与孙中山——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1866—1966）》，莫斯科，1966年。

⑱Г·З·索尔金：《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载《东方学问题》，1960年第5期。

⑲如А·М·马卢欣：《彭湃》，载《亚非人民》，1974年第4期；Е·Ф·科瓦廖夫：《共产党员国际主义者瞿秋白》，载《远东问题》，1974年第2期；К·В·舍维廖夫：《刘泽荣对列宁的回忆》，载《远东问题》，1980年第2期。

⑳В·И·格卢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载《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9年版。

㉑参看К·В·舍维廖夫：《李大钊的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的形成史（1918至1920年初）》。

㉒参看М·А·阿斯拉诺娃：《〈新青年〉杂志及其在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作用（1915—1921）》，应考历史学副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莫斯科，1974年版，第23页。

㉓参看Ю·М·加鲁向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第94页；М·А·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载《亚非人民》1971年第4期，第49页。

㉔В·А·克里夫佐夫、В·А·克拉斯诺娃：《李大钊——从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1978年；《李大钊——中国宣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先驱》，载《远东问题》，1977年第2期。

㉕参看В·И·格卢宁：《纪念中共二大召开五十周年》，载《远东问题》，1972年第3期，第123、118页。

㉖П·А·米夫：《英勇斗争的十五年》，第25页。

㉗А·Г·克雷莫夫：《中国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斗争》，第749页。

㉘А·И·卡尔图诺娃、Е·Ф·科瓦廖夫：《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问题（1917—1921）》，载《苏共历史问题》，1974年第8期，第68页。

㉙В·И·格卢宁：《在二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载《远东问题》，1981年第1期，第122页。

苏联学者对中国农民 土地问题研究的新阶段

[苏]A·B·梅利克谢托夫
马贵凡 译

译者按：这是一篇专题研究综述文章，原载苏联《亚非人民》杂志1987年第2期。文章反映了苏联史学界对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研究状况，披露了苏联学者对这个问题看法的转变过程。作者梅利克谢托夫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亚非国家历史文化教研室主任，历史学博士，教授。著有《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中国的官僚资本（1927—1937年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1972年）、《中国国民党的社会经济政策（1927—1949）》等专著。

最近几年，苏联中国学界对一系列与中国农民运动史和中国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有关的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对很久以前就已固定下来的一些论点（这些论点被认为是阐述中国现代史的钥匙）作出了实质性修改。

这里首先指的是农民土地革命概念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对于中国革命命运来说具有决定意义，这种看法实质上从苏联中国学起步时（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形成时间相一致）就已形成。当时在共产国际的纲领性政治文件中已经提出中国革命是农民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等论点。自20年代中期以来

的几十年间，这些论点经久不变地载入了苏联中国学界或更广泛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学界的研究性著作。中国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设计东方其他国家革命发展模式的样板，对苏联东方学界提出农民土地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

上面指出的论点，经过辩论和一定的党内斗争也为中共领导所接受。不仅如此，而且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解释中，关于土地革命的论点渐渐被绝对化，农民运动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性质，农民被看作是革命的主角。自40年代起，毛派神话开始形成，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正确”思想的提出被归到毛泽东一人名下，似乎这种“正确”思想与共产国际格格不入，它克服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苏联史学界从理论上对上面指出的论点作了论证，他们认为，从土地因素具有决定意义的角度来说，中国面临着“自己的1905年”。但是这种类比法不能成立，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一点，我认为主要是以下三点：1.把俄国和中国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等量齐观不恰当；2.认为土地问题是所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主要问题，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列宁曾指出这一点）；3.完全忽略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

实际上，事态的发展并未证实这种理论推论，中国革命从未具有农民土地革命性质，而中国农民一直是社会政治方面的消极因素，从未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但是人们往往认为，中共的胜利证明它的总的政治路线和具体的土地政策是正确的。这个事实本身使历史学家长时期未能对这一重要问题作出客观的评价。直至60年代，中国出现悲惨的事态发展，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执行毛派土地纲领，中国经济陷入死胡同，这才促使人们从新的角度考察农民土地问题的提出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我想离开本文论题范围强调指出）上述情况毕竟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产生了影响。总的说来，中国史学界所

作的探索在很多方面同苏联史学界走过的路很近似，可能不无苏联史学界的影响。中国自70年代末展开的辩论相当迅速地冲击了不很久以前似乎还坚不可摧的毛派神话，半官方的史学著作在一些问题上骤然抛弃了原有立场(乍看起来不近情理)^①。毫无疑问，这样做不仅是科学上的需要，而且也是实际上的需要(必须摒弃已破产的土地政策，制定出新的符合中国农村不断发展实际需要的政策)。

60—70年代，由于同毛派阐释历史的方法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苏联汉学家着手研究了土地问题，这场有助于史学发展的论战，粉碎了毛派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神话，弄清了中共农民土地问题纲领的形成过程和共产国际在制定这一纲领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苏联中国学界克服毛派教条之后，如释重负，这时才得以沿着独立地和创造性地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道路前进。

我认为，史学研究中的某种不合情理的现象在于，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的概念早已根深蒂固，当时苏联汉学家根本未给自己提出推翻这一概念的任务，但是对大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史实材料所进行的独立的、创造性的、摆脱了非科学目的的研究，渐渐使他们得出了可能是很出人意料的结果。

不容置疑，1970年A·C·穆格鲁津专论中国土地制度问题的著作^②的问世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苏联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很明显，作者本人认为自己著作的一个主要任务是阐明“土地革命的必然性”，但是穆格鲁津对农民土地问题的研究毕竟首先是以经济分析为基础，因而(不管他当时意图如何)给关于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习惯概念以很大打击。这部专著问世之后，穆格鲁津还发表了一些报告和论文，很有说服力地阐明了中国农民在社会政治方面表现消极和土地革命缺乏条件的原因。

根据我的理解，这些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点：1.彼此有着密切联系的地少和人口稠密现象，以及靠重新分配土地办法也不可能满足起码的土地要求（更不能靠分地主土地的办法来满足土地要求，因为据穆格鲁津计算，地主拥有的土地比研究人员根据假设作出的估计要少一半）的这种情况，对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2.既然正如穆格鲁津所强调，主要的和农民最不能接受的剥削方式是捐税剥削，既然在中国农村农民私有者还居多数，那么主要矛盾就不在“租佃”制度上，而在“官（家）农（民）”制度上；3.中国农村的分裂主要不是发生在农民和“封建势力”之间，也不是在劳动农民和农村中的剥削者之间，而是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同时大量赤贫化农民群众的存在“颠倒了所有贫富概念”。

穆格鲁津所作的社会经济分析很有说服力，历史学家可以从新的角度考察中国农村的许多社会政治进程并从根本上改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穆格鲁津在80年代发表的文章对他多年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总结。在这些文章中，他怀着满意的心情指出，苏联历史学家确实修正了他们对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原有看法，他认为我国史学界正在克服（但还没有克服掉）“这种看法的影响”。

谈到修正我们对这个问题看法的理论基础时，首先必须提到M·A·切什科夫和H·A·西蒙尼亚的著作^③。切什科夫不是汉学家，他研究了很广泛的东方学问题，同时他在1969年发表的文章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对于他的课题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学研究资料。他发现，在苏联史学著作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补充一句，这种矛盾早在20年代末就已形成，并且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土地革命口号在当时是作为对反帝民族解放革命实质的表达，作为这种革命的核心提出来的。它要求证明存在着这种革命的对象（大土地所有制），否则革命就会具有贫民造反性质，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科学的态度则要求必须事先对土地所

有制形式作出深入的研究，既要着眼于它的历史方面，又要着眼于它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切什科夫并未仅仅满足于指出这一矛盾，他试图揭示出那个时期在苏联史学界最有影响的论点。例如我认为，他指出这样一点就很重要：当年共产国际在评价农民阶级时，“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农民阶级在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系统中的地位问题，在这种社会关系系统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半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而是这种制度（补充一句，作为派生因素）与国家相联系的形式。”

西蒙尼亚于1973年发表的关于亚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著作，对于修正原有固定论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这是我国东方学界的一部重要理论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不仅说明了“在亚洲国家实际上缺少带有反封建性质的大规模农民革命起义”，而且从社会经济角度对这一在战后清楚表现出来的现象作出了深刻的论证。西蒙尼亚写道：“看来，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亚洲许多国家，社会发展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当然，在不同国家发展程度不同）：革命斗争的“封建主义对象”已经消失，或完全转化，而“资本主义对象”尚未充分显露出来，纯粹资本主义的矛盾尚未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意向尚未被群众自己充分意识到”。西蒙尼亚很熟悉中国历史资料，他多次利用这方面资料进行论证。并且他不止一次地援引穆格鲁津的专著，对其中的一些论点表示赞同，而对另一些论点提出异议。因此，西蒙尼亚的著作对于汉学家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部著作不仅指出了从理论上重新认识许多固定论点的方法，而且把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逻辑同全亚洲、全世界的发展趋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行的这些理论分析，对汉学家进行的具体历史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

苏联汉学家特别积极地根据1925—1927年民族革命的材料研

究了农民土地问题。他们在概论性著作中迈出了从根本上摆脱以前的教条主义观点和毛派史学影响的第一步。M·Φ·尤里耶夫的专著和B·И·格卢宁的著作^④虽然还没有专门探讨农民土地问题，但是记述了革命事件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很难进行农民土地革命。同时尤里耶夫作出了对于当时的苏联史学研究阶段来说非常重要的结论：“无论在1925—1926年间，即广东农民同地主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和积极参加粉粹军阀行动的时候，还是在1927年，即农民运动中心转入湖南、湖北的时候，都没有发生全国性农民革命。”格卢宁发展和深化了这些结论，使之达到了合乎逻辑的顶点——否认在所研究的这个时期存在着发展土地革命的客观可能性^⑤，但是他并未否认以后有这种可能性。例如他指出，至于中共五大“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И·И·杰柳辛的有重大价值的研究性著作（《中共政策中的农民土地问题（1921—1928）》，莫斯科1972年版）全面回答了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农民运动的客观条件和实际特点问题。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共领导曾将自己的革命思想和急进观点冒充为工农群众的思想和要求”，实际上“无论中国农民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准备”为实现急进的土地口号而斗争。但是杰柳辛（格卢宁也一样）在从根本上重新评价我国史学界20—50年代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时，并未试图将自己的结论推延到后来的中国革命阶段。并且杰柳辛表示赞同格卢宁的看法。他说，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革命纲领，在所研究的这个历史时期根本无法实现，然而“其意义一直保持到人民革命取得胜利”。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研究者很谨慎，不想就超出主要课题时限范围的问题作出结论，而且也是因为存在着一种令人懊丧的现象，即作者在对党的政治文件作出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无法直接与后来几十年没有多大变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现实作比

较。遗憾的是，在这部著作中，杰柳辛未参考穆格鲁津专著中的资料和结论，甚至也未提及这部专著。不过我深信，尽管有这种意见，也应当把杰柳辛的这部专著同穆格鲁津的经济著作一起看作是决定苏联史学界重新探讨整个一系列中国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的著作。

后来，A·C·科斯佳耶娃在较狭窄但很重要的课题上发展了杰柳辛的观点。科斯佳耶娃分析了农会在广泛开展起来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问题。她认为，“1925—1927年间的农民运动，通常指的就是农村新型组织的活动和斗争”^⑥。她的这个基本看法不无道理。科斯佳耶娃认为，农会是“组成统一战线的政党给农民提出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通过建立这种组织为农民开辟了摆脱专制和剥削的途径”。她的这个结论对于深入分析这个时期以外的农民土地问题也有很大意义。

80年代初，有一些总结性著作问世，这些著作已从评价中国现代史的崭新立场出发对1925—1927年民族革命中的农民土地问题作出分析。在我们的课题范围内，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杰柳辛和科斯佳耶娃1985年发表的专著（《中国1925—1927年革命：问题和评价》）。这部著作不是按照苏联中国学界惯用的体例撰写的，它把对第一手材料的研究同对1925—1927年民族革命问题的历史编纂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了，这部著作作用很大篇幅分析了农民土地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本书体例新颖而得到了很有意思的解释。

作者从史料研究角度比较了对如何解决1925—1927年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各种不同的和变化着的看法，他们作出总结说：“自60年代末，在史学著作中开始出现对农民运动的不同评价，开始较客观地叙述广东、湖南和湖北农民斗争的结果，强调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地区性，以及全国性农民革命行动的缺乏。后来，研究者不仅否定土地革命，而且承认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

心理上对提出将地主土地转交给他们的问题缺乏准备。”

我认为，在这部著作中，尤其重要的是对所研究时期缺乏农民土地革命条件这个事实本身所作的解释。这个解释已不认为将来会出现农民土地革命条件，因而要求对中共的政策作出相应的分析。在这方面，这部书的结束语最说明问题：“领会和总结1925—1927年革命的丰富经验，是取得这次伟大胜利（1949年）的原因之一。虽然中共在官方宣传中未改变它对那些年的错误的态度，依然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实际上，它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对各种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可见，中共在40年代放弃20年代的表面革命立场之后，才得以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并把它引导到胜利结束——推翻反人民的蒋介石政权。”^⑦

我们在强调研究1925—1927年民族革命中的农民土地问题对于确定农民土地问题的新的总的概念的重大意义时，不能不指出，这些研究性著作的结论还需要通过研究下一个十年的材料，即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土地革命是实现革命目标的主要手段的时期（史学著作常常把这十年称为“土地革命时期”不是偶然的）的材料加以验证和补充。值得注意的是，杰柳辛和科斯佳耶娃在自己的专著中，已根据中共六大之前进行的革命后卫战的材料，就当年共产党人曾试图组织的那种农民运动的性质问题提出许多对于确定总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论点：“共产党人在农业地区发动分田斗争时，以为这种斗争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以传统的反政府斗争方式进行活动，这种斗争方式的特点是，农民总的说来在政治上是消极的、怠惰的，他们没有成为能够全面认识、提出和捍卫自己利益的、独立的、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利益的代表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只要拥有以武装为后盾的政权，就能够率领本地的农民群众。共产党的武装自然是靠农村青年来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区的军

队是农民军。国民党的军队就其成分而言也是农民军，但它维护农民的阶级敌人——地主的利益。农民，特别是他们当中最贫穷的阶层，在共产党掌权时拥护共产党，而一旦以武装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的基础消失，他们就会显得无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积极阻止旧制度的复辟。”

我之所以援引这么长一段话，是因为作者的结论很重要。这些结论不仅指出了1927年底1928年初的中国农村形势，而且对现代中国农村状况作出了总的评述。我认为，作者作出这些重要结论，不可能未受到不久前问世的A·M·格里戈里耶夫的专著^③的良好影响。格里戈里耶夫的专著对20年代与30年代交替时期的革命发展进程作出了深入分析，并根据大量史实材料说明了提出直义上的土地革命问题是不恰当的。

格里戈里耶夫引用大量中共文献资料说明，党的领导曾试图“点燃”土地革命之火。这在中共武装控制的地区导致了农村贫民的极端残酷行为，他们“不仅屠杀剥削阶层代表，而且杀光整个整个（“异己的”、“敌对的”）村庄，挑起氏族内讧和“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争斗，并在撤离州府县城时放火，搞破坏”。研究者的功绩在于，他未满足于指出实际情况（这本身就很重
要），而且能够揭示迫使中共领导在农村尝试采取极端急进政策的原因。作者不无道理地认为，客观上农村未准备接受土地革命口号即是这样做的原因：农民未提出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以及平分土地的要求，而是首先要求减少捐税、地租和贷款利息。在这种情况下，急进的土地改革只能由“上面”来贯彻执行，但是把这种急进思想强加给农民，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农民对新的政权机关和对中共的敌对情绪日益增长，以致在一些苏区“发生暴动，反对红军和当地的政权机关”。土地革命政策使中共在格里戈里耶夫所研究的这个时期陷入了死胡同，因而是它遭到惨重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是这部专著使人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结

论。

与这部著作可以联系在一起的有A·A·皮萨列夫的研究性著作《国民党和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农民土地问题》(莫斯科1986年版)。皮萨列夫的著作虽然主要是分析国民党的政策,但广泛提出了现代中国的农村形势问题,因而有助于正确评价中国农村的社会政治斗争现实。

对于一些似乎与本课题无直接关系的问题的研究,也为阐述农民土地问题的新方法形成了贡献。例如,H·И·佳普京娜对中国农村社会学史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农村居民(村社、氏族、秘密会社等)的纵向社会联系对于发展中国农村社会阶级矛盾的意义,从而她实际上补充了穆格鲁津主要从经济角度阐述这个问题的方法。

对中国农村矛盾的新的理解,也反映在论述中国1949年以后历史的著作中。如B·Г·格尔布拉斯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著名著作^①,在谈到革命年代中国农村状况时写道:“几乎在20世纪整个上半叶,中国农村居民时而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政权机关的过份独断专行和官吏的滥用职权,时而四分五裂(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居民中的‘有产者’部分还是‘无产者’部分都根本未去触及封建家长制关系中最根本的东西。”格尔布拉斯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主要专家,他的这个结论很重要,它证明对农民土地问题采取新的阐述方法对于许多汉学家来说是无疑义的。同样重要的是,格尔布拉斯后来正是根据这种新的阐述方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办法进行了分析,显示了他的巨大解释才能。

我认为,上述一切说的是从不同角度探讨阐述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新方法问题和为撰写总结性著作准备条件的问题。后来这种著作就出现了。

首先我想谈谈《中国现代史(1928—1949)》这部专著的出

版。这部著作展现了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广阔场面，农民土地问题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30—40年代的各个中国革命阶段都有所述及。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对这个问题未作理论分析，而基本上满足于叙事方面，不过这方面也很重要，因为正如作者在书中各个部分所明确指出，他们还不需要使用“土地革命”这个术语，还不可能借助这个术语对那些记述革命过程的实际材料作出解释。

书中论述1945—1949年间事件的部分，对于我们的题目尤为重要。作者И·Я·维克托罗夫给这个部分起的标题《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实行急进的农民土地政策时出现的“歪曲事实的做法和过火行动”损害了中共的威信。维克托罗夫谈到由上面派到农村中的“工作组”的工作情况，他写道：“由于在‘贫雇农联盟’领导班子中，农村中最愚昧最落后的分子，如大烟鬼、军阀部队逃兵、好逸恶劳的二流子（这些人的财产自然微不足道）等占居多数，在农村中，流氓无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开始嚣张……中农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在许多地方引起自发性骚动。”所有这一切自然使人想到前面所谈到的在20和30年代“点燃”土地革命之火的企图。维克托罗夫研究了大量中国史料，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这个部分。他的这个部分似乎完成了苏联汉学家在克服过时模式之后对中国农村在革命时期的发展进程所作的记述。

格卢宁和穆格鲁津的长篇文章^①第一次作出尝试，从理论上总结苏联史学界在研究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作为重要研究性著作，这篇文章为研究这个问题提出了很多新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演变，同时明确了我国整个史学界所达到的研究水平。因此我认为，这篇文章的结论对于进一步加强研究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最有意义的几个论点是：“在始于20世纪初的整

个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与社会因素相比，民族因素居主导地位。研究中国农民阶级的真正面貌及其实际行为和它在革命中的地位，可以得出结论：它没有起到也不可能起到毛派赋予它的那种作用，谈论中国‘农民’革命或‘农民土地’革命，只能局限在很有限很狭窄的意义上。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农民阶级总体上或它的个别阶层从未以主要动力姿态出现，更谈不上先导、倡导性动力。农民阶级的基本群众是消极的……”。

在援引这些论点的同时，我想再次强调指出，这些论点是国内史学研究摆脱一切非科学要求之后取得的成果。但是以前的看法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阵地，这完全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也是因为我国史学界坚持认为土地革命是中共几十年争夺政权的主要手段所致。很明显，那些不是专门研究土地问题的研究人员最难放弃原有观点。

例如，《中国现代史(1928—1949)》这部专著的作者在结束语部分写道：“土地革命，共产党人准备了几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得以全面展开，它是中国民主力量取得胜利的基础。”这个结论与专著整个内容很不一致，但这位作者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这种独立于史实材料的现象在Г·В·阿斯塔菲耶夫新近出版的专论美国对华干涉史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如作者认为，“中国人民大众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是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占有制，将地主的土地、生产资料和住房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另一个地方，作者作出结论说：“开展农民土地斗争是民主力量转入对反动派进攻的重要表现之一，这种斗争的高涨是普遍性的。”谈论这些看法象谈论不言而喻的东西或在史学界已经“定论”的东西一样，因此，在专著作者看来，这些看法已经不需要论证，不需要引证史实或援引史料和研究性著作。这种惰性也可见于非汉学家以中国为例对农民土地问题所作的论述之中。

但是我认为，抵制承认新的看法，不仅仅是因为思想上有某

种惰性和“习惯于”老的论点，而且也与下面这种情况有关：一方面，接受对提出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新看法；势必需要重新考虑中国革命史中的许多其他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在新的看法中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为克服这些不足，还需要做大量研究工作。我完全赞同新的看法，同时我想指出要克服某些不足的条件，这些条件在苏联史学著作中已经明确提到。

首先我要指出，必须研究民族因素在中国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具体形式。苏联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承认民族因素的主导作用，这个事实本身很重要，但是在承认之后还需要弄清民族因素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所具有的具体形式，如前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清运动、20年代的统一号令、30年代的抗日救国思想、40年代下半期同国民党背叛民族行为的斗争等。研究民族因素的具体形式，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实际社会内容。民族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对比关系，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社会因素从未有过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个过程充满着矛盾。然而近几年的研究证明，40年代在保留民族解放任务情况下，社会解放任务有明显加强，但是这不是靠提高土地问题的作用。在中国民族解放革命最后阶段（一些著作认为是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社会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了革命的目标和促进革命发展的手段。官僚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主要对象。把革命力量集中在这个狭小范围的全民族剥削者（兼叛徒）集团身上，则可以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土地问题依然居于从属地位。

我认为，能够为阐述农民土地问题的新方法提供根据的第二个方面，是更详细地说明穆格鲁津提出的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关系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当时对阐述农民土地问题的新方法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具有半封建性质。承认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过渡（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就为解释农村居民在中共领导下发展革命进程

时的社会心理和政治行为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我认为，穆格鲁津在近期著作中表现出某种不彻底性：总的说来他没有放弃认为农村是半封建性质的，他在对社会发展进程作具体分析时，强调地主经营管理体制和地主本身的封建性质，以及农民的传统性质。这实质上局限了对他的概念作出解释的可能性，不能充分估计到资本主义发展对农村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

然而，对于这种影响，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注意：1. 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使各种农村剥削者变成“关心具体产品和市场行情的特殊‘经济’领导人”，同时也会使发了财的农民变成这样的人物。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不会使这些资产阶级化的阶层同传统（封建）因素对立起来，而相反会把这些因素团结起来维护使用那些适用于新的（客观上已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的传统剥削方法的特权。所有这一切，大大减少了这些新兴社会力量的资产阶级（及反封建）潜力，并使它们变成了社会政治方面的保守因素而不是革命因素。这与欧洲（和俄国）“传统”封建主义社会中发生的情况截然不同。2. 积极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省份）导致在20世纪划分“有产者与无产者”（这种做法对农村社会局势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已经不光看土地占有水平，而且还看其他财产因素。在集约化商品生产地区，土地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把较发达省份的农村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进程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根本未缓解农村的社会紧张局势，反倒使其走上了与传统（中世纪）中国农村稍许不同的发展轨道。由此可见，正是进一步研究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特点，会有助于理解中国农村所受到的（与俄国农村相比）根本不同的社会政治影响和社会心理影响（缺少土地革命内容），有助于发现，这种发展甚至破坏了20世纪农村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那些推动农民斗争的因素。

最后必须指出，我们放弃土地革命概念，但还没有弄清楚中

共在不断发展的革命进程中动员农民群众的有效机制。中共及其武装毕竟是以农民为依靠，革命根据地设在农村，“革命的路线”是从农村到城市，这些都需要作出解释，并且现在要抛开土地革命概念。我认为，根据苏联史学界材料，可以对这个重要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而不必求助于过时的概念。我看，恰恰是因为强调土地问题，才难于对中共及其武装同农民的相互作用机制作出恰当的解释。“实行土地革命”的立场居主导地位，认为放弃急进的土地改革是对地主或国民党的让步，把土地革命看作是农村的主要革命目标，所有这一切都有碍于对中共1937年以后的农村政策中的另一些方面作出客观的评价，严格地说，正是这些方面预先决定了它的历史性胜利^⑩。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用来说明中共同农民的联系机制，进而取代以前的土地问题提法，这就是共产党及其武装在农村摧毁与国民党国家机构联系在一起的原地方地主绅士政权结构，建立新的政权结构。中共的武装由各种不同社会出身的人组成，这些人已把自己的命运同新的政权联系在一起，并且他们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新的政权结构就是由进驻农村的中共武装建立起来的。农村的行政管理机构、自卫力量、税收工作、审判活动、文教卫生事业等，都由建立起来的地方党组织控制。地方党组织手中集中了庞大的政权机构，这些机构在中央领导下卓有成效地贯彻执行了中共的各种政治方针（唯急进的土地改革方针除外）。它们取代了以前的农村主宰者，是中共在各地的真正支柱。在1937—1949年间，农村争夺基层政权的斗争也就是巩固党的社会基础的斗争。建立忠实于中共的农村政权机构，日益成为农村实行各种改造的基础。

苏联研究中国现代史各个阶段的人员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村政权问题上，集中在新政权与中共政策的联系上和领导农民的方式方法上。他们一直特别重视农会的作用，这是很自然的。在这

个问题上，苏联史学界积累了大量史实材料和分析性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可以从相应的角度对这里提出的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我认为，进一步分析上述各个方面（当然以及其他方面），可以最终确立对提出和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新的看法。在结束概述这种新看法的形成过程时，我想强调指出，接受新的看法并不意味着是对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某种贬低或低估（某些人至今还这样认为），这样做只不过是為了正确理解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的客观地位（和很重要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决定性的地位）。

注释：

①例如，在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叙述和分析中国革命胜利史时并未提到“土地革命”或“农民革命”概念，而谈到革命进程性质时则说：“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这些论点与毛泽东的纲领性观点（不久前还是中国历史科学的基本观点）根本不同。毛泽东认为，中共只能通过“农民革命”夺取政权，“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②A·C·穆格鲁津著：《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土地关系》，莫斯科1970年版。

③M·A·切什科夫著：《共产国际文件对殖民地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分析（1920—1927）》，载《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9年版；H·A·西蒙尼亚著：《亚洲的商业高利贷资本》，莫斯科1973年版。

④M·Φ·尤里耶夫著：《中国1925—1927年革命》，莫斯科1968年版；B·И·格卢宁著：《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载《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9年版；《1925—1927年的国民革命》，载《中国现代史（1917—1970）》，莫斯科1972年版。

⑤B·И·格卢宁对M·Φ·尤里耶夫的专著作了全面的评述，他写道：“在1925—1927年的革命时期，我们确信，大多数农民还没有提出土地要求，即使某个地方提出了土地问题，那也是领导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人提出的。”（见B·И·格卢宁著：《中国革命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载《亚非人民》杂志1969年第3期。）

⑥见A·C·科斯佳耶娃著：《中国的农会（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1978年版。

⑦至于土地问题，从实际政策上修正它的决议中的急进主义思想只是在1948年，

而从理论上修正，只是在80年代初。

⑧A·M·格里戈里耶夫著：《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1927—1931）》，莫斯科1980年版。

⑨B·Г·格尔布拉斯著：《中华人民共和国50—60年代的社会政治结构》，莫斯科1980年版。

⑩B·И·格卢宁、A·С·穆格鲁津著：《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阶级》，载《东方革命进程的历史和现时》，莫斯科1982年版。

⑪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援引A·С·穆格鲁津的一段很重要的论述：“那个时期（这里指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进行了调整征税制度的工作（指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译者）（其规模和意义尚未给以应有的评价），建立了有效的农村行政管理机构，采取了减轻地主剥削和规定租佃关系的措施，从而满足了‘劳动农民’的实际要求。正是通过这种途径中共在农村真正扎下了根，逐渐扩大了地盘，最终战胜了国民党，尔后实行了土地改革。”（见A·С·穆格鲁津著：《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传统的和过渡的阶层及其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载《旧中国的生产力和社会问题》，莫斯科1984年版。）

西德现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简介

〔日〕中嶋岭雄

韩凤琴译

现代中国的动向，对当今世界影响很大。今天，现代中国学在国际上是非常活跃的。

1982年8月23日至27日，在西德的萨尔布吕肯召开了一次现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可以通过这次会议窥知现代中国学在国际上的地位。

作为日本的代表，我应邀出席了这次学术讨论会，而且还指定我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我国的筑波大学德田教之教授也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毛泽东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这一很有价值的学术报告。我想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情况。

众所周知，萨尔地区地处德法边界地带，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围绕领土的归属问题都引起过争议。州府萨尔布吕肯是一座美丽的田园式城市。如果乘飞机自法兰克福起飞，大约一小时便可以抵达这里，从空中俯瞰这座城市，森林、大学及工业区截然分明。

这里有萨尔大学。前几年，西德的现代中国学权威尤尔根·多梅斯教授从柏林自由大学转到萨尔大学的中国东亚政治研究部。多梅斯教授是一位精力极为充沛的学术研究组织者，他与海德堡大学的U·魏斯教授（研究中国经济）、汉堡亚洲研究所的奥斯卡·魏格尔（研究中国政治）和慕尼黑政治研究所的U·G·法布里奇（研究中国政治与外交）两位研究员，还有奥地利现代中国研究所（现在的博尔茨曼研究所〈维也纳〉）的G·卡明

斯基所长等人，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在众多的“亲中国”的学者中间，他不是片面地倾向中国，而是在研究中作冷静的分析。

以多梅斯教授为首的萨尔大学中国东亚政治研究部，是这次会议的东道主。英国的肯特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台湾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这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研究机关，同台北的亚洲·世界研究所一起联合举办了这次国际会议。

会议的正式名称为“分析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与政策国际会议”。会议的组织者除多梅斯教授之外，还有英国肯特大学的丹尼斯·丹坎桑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巴特·斯卡拉皮诺教授和台北的亚洲·世界研究所的杭立武所长。

会议是在流经市中心的萨尔河畔上的州议会宾馆里召开的。虽然在会议的主持人中有台湾方面的代表，但是这次会议确实是一次不带政治色彩，充满学术讨论气氛的会议。

来自世界各国（西方十国）的具有代表性的四十多位中国问题专家们汇集在这座西德小城市，这是史无前例的。正因为如此，萨尔兰特州政府和当地的报纸都给予了协助。这次会议的特点是：全体与会者聚集一堂，按七个阶段的议题开展讨论，会议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着带方向性的问题进行研讨。我认为这次会议是成功的。下面介绍一下各阶段会议的研究题目和会议主持人。

第一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史与毛泽东的作用”（尤尔根·多梅斯教授主持）。

第二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与统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查尔默斯·约翰逊教授主持）。

第三次会议：“对外政策与国防”（英国肯特大学丹尼斯·丹坎桑教授主持）。

第四次会议：“经济与法制”（日本国立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嶋岭雄教授主持）。

第五次会议：“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吕西安·比昂科教授主持）。

第六次会议：“知识分子、反体制派和文化”（台北亚洲·世界研究所杭立武所长主持）。

第七次会议：“方法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卢西恩·派伊教授主持）。

这次会议就连研究现代中国的方法论也作了安排，说明会议确有其特点。可以认为，这次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担任第七次会议主持人的派伊教授，在他的近作《中国政治的动态》一书中，是依据对社会科学和地域研究的综合分析方法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派伊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编著的《社会科学与地域研究》（1975年）一书，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重视。

在第七次会议上，主报告是在台湾以最有能力的年轻学者而著称的政治大学魏镛教授所作的《现代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批判地评价》和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戴维·古德曼先生的《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政治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们，最近不仅在现代中国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而且在日本问题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成就，如查尔默茨·约翰逊教授和多梅斯教授的近作《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1982年）一书，刚刚被译成日文。

在这次会议上，以《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一书而闻名的中国共产党史和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世界权威，哈佛大学教授施瓦茨，回忆了战后美国的中国学界，由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影响，造成了重大牺牲。他认为虽说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需要科学的方法论，可是带有一定的先入之见也是重要的。他说“我自己就是根据毛泽东主义不同于苏联的共产主义这种先入之见从事研究的。”

在中国研究方面预料到的问题，自然成了会议的讨论内容。关于这一点，我以前曾谈过分析研究中国的体会。中国的动向虽然莫

测，但如果掌握了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认真分析所得资料 and 情报，努力研究问题，就可以把握住中国的政治动向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梗概。否则，那就会在现代中国的研究上，发表一些无价值的意见，反而引起争论。

我与各位会议主持人都有过交往。对丹尼斯·丹坎桑教授，是从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讲话中得知他是肯特大学东南亚中心所长的。吕西安·比昂科教授是法国现代中国学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前不久他兼任巴黎现代中国资料研究中心所长。出席这次会议的法国人还有，中国社会经济史专家，巴黎第三大学教授玛丽-克莱尔·贝热尔和全法政治学财团国际关系研究调查中心的让-吕克·多梅纳克。

美国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很多，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托马斯·班斯顿教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帕利斯·张和简·普里比拉两位教授，波士顿大学教授梅尔·戈德曼女士，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莱蒙·迈耶先生，密执安大学的马丁·怀特教授等。东道国西德增加了墨尼黑大学的金达曼教授和约伊希姆·格劳比奇教授，鲁尔大学的维利·克劳斯教授。以色列派了希伯莱大学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伊利斯·乔菲教授出席了会议。此外，台湾、南朝鲜和香港，主要派出年轻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台湾代表中资格最深的杭立武先生，原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所长。

在这些人当中，我曾于两年前在巴黎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时同法国的三位学者见过面。帕利斯·张教授曾多次访问日本，他是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梅尔·戈德曼女士，去年春天在芝加哥召开的全美亚洲研究学会第34次年会上，同我一起参加了“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学术讨论会。胡佛研究所的迈耶先生，对中国的经济很熟悉，我和他一起参加了1981年夏在苏联纳霍得卡召开的第六次和平讨论会。我与伊利斯·乔菲教授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现代中国中心曾一起工作过一年时间。约伊希姆·格劳比奇教授曾多次访问过日本，他是亚洲问题、安全保障问题和外交问题的专家。

能同这些老相识重逢，这也是国际会议的一大乐趣。

最近，围绕“教科书问题”，中国对日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件事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各国学者都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西德地方报纸和电视台对这个问题的报道，他们十分注意日本的态度。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十分明确。我认为中国方面之所以采取强硬态度，其背景在于：中国从原先重视向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接近这一世界战略转向再次重视“第三世界”，进而向中苏接近——中苏和解——中苏同盟这一世界战略进行根本性转变。

于是，我无论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还是在会议期间的座谈会中，都陈述了自己的这种看法，但是同意我的看法的人是极少数。特别是美国学者，他们对中苏和解的可能性，抱着极端否定的态度，如施瓦茨教授就是这样。罗巴特·斯卡拉皮诺教授也认为，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对于美国人来说，中苏和解简直是一场最大的恶梦。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总是对中苏和解持怀疑态度。似乎美国学者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随着中国内政的彻底非毛化，中国现在正在向着中苏和解的方向积极迈进。

提交会议的大量论文，都是十分有价值的。通过这次会议，我进一步认识到，只要没有语言上的障碍，日本学术界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然而遗憾的是，日本还没有举办过象这种综合性地研究现代中国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痛感日本不是也应该主办这样的会议吗？

（摘自中嶋岭雄著《中国在重建文明》，1984年6月筑摩书房出版）

中国近年来在毛泽东研究上 的成就与问题

〔日〕村田忠禧

韩凤琴译

译者按：本文是村田忠禧在中国研究所1984年度研究大会历史分科会上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党史研究（包括毛泽东研究）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他认为，中国的毛泽东研究已走上科学的轨道，这表现在“各种出版物已由革命事迹的介绍和宣传开始逐步走上革命史的研究这一科学轨道”；“史料的公开进展迅速”；“出版了许许多种回忆录”；“周恩来研究取得飞跃进展”。同时，他指出了中国在毛泽东研究上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对作为研究基础的史料缺乏严肃态度”，他认为“这是左右研究质量的重要问题”。就总体而言，村田忠禧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论述是有根有据的，不过，有些意见不尽正确。现将全文译出，以供参考。

前 言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研究实际上被划为“禁区”，研究毛泽东这类担风险的事情无人去做，只是“学习”罢了。而且这种“学习”也仅仅限于为着当时的“阶级斗争”服务。于是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便横行起来，人们把毛泽东视为一贯正确的救世主，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看作是从建党一开始就存在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以“左”、右倾形式表现出来的错误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清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动员庞大的宣传机器对毛泽东进行大张旗鼓的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个人崇拜宣传和林彪、“四人帮”之流对“毛泽东思想”解释的恶劣影响，重新树立并坚持已失去威信党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

本文在回顾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在党史研究，尤其在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1927—1931年）毛泽东的研究上的变迁过程中，探索在对毛泽东进行科学评价（实事求是的评价）上取得了多大的进展。

向科学的研究迈进

正如1981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其他文献已经指出的那样，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的伟大转折点。可以说，在毛泽东研究上也反映了这种转变，从出版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1927—1931年）的著作变化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出版过可以称得上是研究著作的东西，要了解中国革命史，不外乎是学习《毛泽东选集》。1971年7月发表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这篇文章的特点是，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名义下，把中国革命的功劳全部归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了。

与此相比，1977年11月出版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1978年10月出版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以毛泽东为中心的色彩依旧很浓，但是可以看出一个变化，书中谈到了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贡献，这在粉碎“四人

帮”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11、12月出版的《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上、中册，笔者未见下册）对朱、毛红军下井冈山（1929年1月）以后的足迹作了大量的现场调查。过去，除了史沫特莱和斯诺记述的朱德和毛泽东所谈到的之外，几乎是个空白。不过，这个时期依然带有浓厚的革命事迹介绍的色彩，还没有自觉地克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缺陷，可以说这个时期属于过渡性阶段。

新的倾向可以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的《井冈烽火》、《闽赣路千里》（1982年8月）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井冈山的武装斗争》（1980年5月）、《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1981年3月）中看出。在这些书中，史料和回忆录比过去丰富得多了，已经突破了片断的事迹介绍的框框，从中可以系统地掌握革命斗争情况。特别值得瞩目的是，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井冈山的武装割据》、《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中，第一次公开了过去从未公开的史料。虽然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中有误排多的致命缺陷，但第一次公开史料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是一个大贡献。尤其是《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一书，收集了1980年5月江西现代史学会举办的“彭德怀同志在江西革命活动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及有关史料，因此似乎可以说为彭德怀恢复名誉（1978年12月）是给党史研究的发展带来影响的一种表现。

倘若把以上所述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成果，那么可以说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是指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湘鄂赣苏区史稿》（1982年10月）一书，它已具备了科学的研究著作的必要条件。与中国过去出版的书相比，该书在引用史料时注明了出处，卷尾又附有年表和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具备了研究著作的形式。在1982年8月出版的《川陕革命根据

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和1982年7月出版的《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等书中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变化。

上述情况只不过表明了出版物由革命事迹的介绍和宣传开始逐步地走上革命史的研究这一科学轨道。虽然尚未触及到内容上的变化,但形式的变化必定会影响到内容。从这种意义上讲,198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4卷本)的第一卷《伟大的开端(1919—1923)》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该丛书定会成为大量引用原著和回忆录的历史著作,我最关心的是1927年至1931年这个时期该丛书要讲些什么。

史料公开取得迅速进展

可以说,史料公开是近年来的一大成果,尽管缺点也很明显,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肯定成绩。

众所周知,自1980年12月出版《周恩来选集》上卷以来,相继出版了刘少奇、朱德和陈云等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著作,又出版了毛泽东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毛泽东书信选集》。在这些文献中,我觉得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有极为重要意义的新史料,是收在《周恩来选集》中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和《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

1979年以后中国积极出版史料汇编。与本文有关的,有《南昌起义资料》(1979年7月,人民出版社);《井冈山的武装割据》(1980年5月,江西人民出版社);《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1979年12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只有影印本);《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1981年3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在这本书的下编里收集了1929年至1933年的红三军团即与彭德怀有关的历史文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1982年5月,江西人民出版社。上卷收集了《综合报告》、《组

织问题》；中卷收集了《政治问题》、《军事问题》；下卷收集了《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经济与文化建设》、《肃反运动》、《群众运动》等史料〔1927年至1934年共计260篇〕；《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1979年12月，复旦学报丛书，内部发行，只有影印本）。作为这个时期的共产国际的文献，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于1981年3月出版，第二辑于1982年6月出版。除上述史料汇编外，还出版了象《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均由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和《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这些都是通史性的史料汇编。近年来公开的史料数量很大，尤其重要的是《中央根据地史料选编》。过去一提起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原始资料，“陈诚文库”便占有重要位置。这个文库是以国民党没收的资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个文库未能收集到许多党内报告和会议决议等文献，这本《中央根据地史料汇编》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将是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的一大贡献（但是该书的致命弱点是误排太多，使用时需加注意）。

此外，还有一些在海外收集不到的内部发行的史料汇编。可以说，整理史料的工作，作为研究的基础，近年来取得了迅速进展。

但成问题的是“内部发行”这一中国独特的制度，革命史资料为什么一定要采用内部发行制度呢？很显然，是担心人们滥用。我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如红三军团占领长沙时发行的报纸《红军日报（1930年7月29日至8月4日）》，1980年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香港出了它的影印本。当时红军利用军阀混战的空隙占领了长沙，而以人民大众为对象的报纸，为什么在革命取得成功五十年后的今天却要采用内部发行的形式呢？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果真只能由具有特殊资格的人才能进行吗？说明“内部发

行”不合理性的事例太多了，这里无需赘言。一种解释是，因为可能有错误，所以内部发行。的确，我们发现内部发行的出版物错误很多，如在《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资料选编》第287页写明“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役计划”是1933年10月14日第五次反围剿时提出的。可是从内容上看，显然是针对第四次反围剿制定的，应该是1932年10月14日提出的。象这类错误不正是在划定内部与公开之前未交付印刷时出的问题吗？那么是不是说公开发行的出版物错误就少了呢？这也不尽然。于是，这类出版物就采取了禁止运出海外的措施，这种让外面糊涂的做法果真能有利于研究的发展吗？

史料的生命在于准确。不准确的史料汇编不管其所收集的史料如何珍贵，其价值将减少一半。1979年以后经过严格把关的史料公开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我对198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毛泽东书信选集》的严格程度抱有一线希望，因为那终究是中央首长的文献，但地方出版物却做不到这样，恐怕这种恶习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吧。

出版多种回忆录

回忆录的大量出版，也是近年来的一大特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81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关于该书的重要价值，由于我已在《鄂其山》杂志第2号上发表了一篇书评，所以这里就从略了。作为与本文有关的回忆录，可以举出何长工的《难忘的岁月》（1982年6月，人民出版社）；张鼎丞的《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1982年6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人民出版社第二次印刷。据说该书的依据是张鼎丞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就闽西党史所作的总结报告）；郭化若的《远谋自有深韬略》（1980年3月，人民出版社）；聂荣臻的《聂荣臻回忆录（上）》（1983年8月，战士出版社）等。可以说，以上都是领

导人的回忆录。在1982年12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中央苏区》中收集了不少红军战士的珍贵回忆。作为较新的回忆录，有肖锋的《十年百战亲历记》（1983年5月，福建人民出版社）。肖锋是参加过1927年秋收起义的老战士，他以在长征中坚持写日记而闻名，1979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在长征时写的日记——《长征日记》。不过，《长征日记》似乎作了不少修改，因此有些部分已失去了作为史料的价值。《十年百战亲历记》虽然有不少地方值得参考，所同时也可以零散地见到一些错记之处。人们的记忆不会是很准确的，由于时间太长，会有一些遗忘。如果在事实不清楚和记忆不准确的基础上，再加进他人的回忆和研究者的补充，那可能会错上加错。肖锋的《十年百战亲历记》，由于为保证回忆的准确而作的辅助性工作（查找当时的文献和进行现场调查）不充分，所以有不少错误。在这一点上，恐怕《聂荣臻回忆录》的条件比较好，可以认为那是一本信得过的回忆录。

另外，定期和不定期刊物，再加上内部发行的渠道，回忆录的出版数量已相当庞大。坦率地说，那是永远也回忆不完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幸好，经历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人还有不少健在，我希望他们的回忆能成为珍贵的记录。

周恩来研究取得飞跃进展

众所周知，1978年夏开始的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以破除把毛泽东绝对化和教条化的“凡是派”观点而告结束的。认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应该同毛泽东本人的言行有所区分，虽然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但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为证明给毛泽东思想所下的这个新定义的正确性，曾展开了极为激烈的讨论。其中包括就“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和“古田会议决议”形成过程中毛泽东以外的领导人，尤其是周恩

来的贡献进行了研究。

实际上，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周恩来，以正面提出还是在最近。在周恩来逝世后将近两年的1977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这本书在当时是具有权威的出版物，书中介绍周恩来的革命活动从南昌起义一下子转到长征时期，对那中间曾在上海党中央和进入江西苏维埃地区以后的活动尚未提及。在该书出版三年后的1980年12月，出版了《周恩来选集》上卷，书中写道，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是陈毅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写的，该书还发表了他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时拍发的电报。书中强调周恩来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最好理解者，他对“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周恩来选集》出版之后，又发表了不少介绍他的革命活动的论文。当然，那总是带有一种学习运动的因素，不过对于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起的作用作了具体的说明，这些成果是值得高度评价的。如果说近年来中国在研究这个时期的党史上取得了最大成果，那么举出周恩来研究的进展不正是最为合适的吗？

总而言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党史研究（包括毛泽东研究）上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从《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上、中、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下册为1984年3月）中看出。

但另一方面，一个重要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对作为研究基础的史料缺乏严肃态度，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多大改进，我们深感遗憾。这是左右研究质量的重要问题，所以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大问题。

对文献缺乏严肃态度

（1）校对未作到万无一失

出版了很多史料汇编和回忆录，这是值得高兴的，但由于在内容上有不少地方搞得不够准确，往往让人大为扫兴。并非因为是内部出版物错误就多，公开出版物也有不少错误，尤其是地方出版物就更为严重了。如《近代史研究》这类中央的专门学术杂志，其误排之多大大降低了它的价值。

这里可以举一例来说明不准确的史料是如何妨碍研究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这篇文章的脚注上写道，这是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这篇文章的执笔时期是1928年10月5日。但是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中的《井冈山的斗争》）却说边界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10月14日起开会三天”。既然是大会的决议文件，那就应该采用决议被通过的日期。可是《毛泽东选集》中怎么写的是10月5日呢？实际上，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写道，边界党代会是“10月4日起开会三天”，而《毛泽东选集》中却改成10月14日起。

边界党代会究竟是从10月4日起还是从14日起？对这个问题有确切的史料。那就是当时被湖南省委派往井冈山的杨克敏（即杨开明）1929年2月25日写的《关于湘赣边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这篇文章收录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本文献中。被收入《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中的杨开明的报告清楚地写道，“10月14日又召集第二次代表会议改选特委委员……”，这样看来，似乎《毛泽东选集》中的“10月14日起开会三天”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关于这一部分是这样写的，“10月4日回边界，又召集……”，未见10月14日字样（在《井冈山的武装割据》中，这个部分已省略）。那

么这个问题是否无法解决了呢？

杨开明和毛泽东都向中央报告了军事斗争的情况。他们均未提及10月4日前后进行了战斗，而是写道，10月14日前后进军遂川（见《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和文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和《毛泽东选集》）。另外，在《毛泽东选集》中，“遂于10月13日再占领遂川，……”这段及前后都被省略。因此，10月14日起用三天时间在宁岗的步云山召开党代会的可能性消失了，而10月1日占领宁岗之后，10月4日起开三天会的说法是正确的。《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和文献》没有发现《毛泽东选集》的错误，相反却迎合了它，把杨开明的文章改写了。也就是说，在《毛泽东选集》中，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定在10月5日是正确的，那是指在边界党代会上决议被通过的日期，但《毛泽东选集》中关于该大会是以10月14日起召开的记述是错误的。

杨开明的《关于湘赣边界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是记述井冈山斗争的珍贵史料。尤其是他作为特委书记被湖南省委派遣，他和杜修经是造成所谓“八月失败”的直接负责人，杨开明写给中央的报告和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井冈山的斗争》〕）略有不同，这一点值得深入研究。同一出版社在几年之内出版的三本教科书差别很大，在不知依据哪本好的情况下，很难作细致的考证。只有进行严密的校订工作，才会产生准确的文献汇编。依据准确的文献，才会有周密的论证。没有周密的论证，即使盛赞“伟大的思想”，也如同讲空话。

（2）编者随意删改

一般来讲，根据现实需要，编者对过去的文章可以作必要的部分删改，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我对于下面这种删改却感到很难理解（当然，我未见到被删去部分的全文，自然不十分理解删

掉的意图)。

这是指被收入《周恩来选集》中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脚注中写明：“收入本书时个别段落没有选入”。看了中国的研究者发表的论文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指示信共九段，《周恩来选集》选入八段，有一段被删去。从《闽赣路千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的插图照片看，可以知道那是第八段。第八段的最后部分，从插图照片和从中国的研究中引用的部分判明是“经过前委会议，朱毛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们了解和接受”这一内容。现简单地说明一下经过，毛泽东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的红四军，由于在1929年6月的红四军内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出现了方针的对立，因此撤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的职务。其后，失去领导中心的红四军历尽千辛万苦。另一方面，陈毅赴上海，将红四军内方针的对立情况向中央报告，以周恩来为中心的中央作出指示，依然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红四军应该团结在他的周围。这是对于体现了人民军队建军思想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即所谓“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的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诞生起着决定作用的“中央九月来信”，也是现在成为问题的中央指示。就是说，在《周恩来选集》中收入该指示时，选集编者将作为中央指示的最重要部分删去了。中国的党史工作者可以利用这份中央指示的原件，我于去年夏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亲眼看到了展出的这份原件(遗憾的是只展出了第一页)。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作为机密文件。然而难办的是，象这种经过删改的文献在中国一旦被收入《选集》，那它就会成为唯一正统的“文献”，公开原件的可能性反而会更小了，这种事例屡见不鲜。被删去的部分大概涉及到红四军的党的组织问题吧。中共中央

文献编辑委员会为什么考虑采取这种措施，至今我未能理解。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后人的这种“考虑”很容易使复杂而深奥的现实变得简单化了，对于这一点，不正是需要经常注意吗？

封 锁 史 料

从上面提到的1929年9月的中央指示信一例可以看出，在中国确实存在着有一部分研究人员可以利用的历史文献一般人（更不用说海外学者）不能利用的现象。如果那是因为史料保存上的技术问题所造成的，也就没有办法了（我还是想等待有机会解决）。然而根本不是那个问题，另一部分人却可以利用。

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毛泽东是否执行了立三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然而与争论问题有关的文献却没有公开，我们只能了解到中国学者引用的片断。象这样垄断文献、垄断文献的解释权（引用也是一种解释）的研究，按道理说不能算是科学的研究。如果是科学，它应该经得起他人的查证，但我们现在却无法查证史料的引用是否妥当。

从片面了解到的这一时期有关毛泽东的文献来推测，可以认为他的思想大部分还是“左”的，至少在立三路线提出的当初，很难说他看透了立三路线的本质，更不要说加以反对了。恐怕那些文献未公开，也与这一点有关吧。然而我们一定要在对他所处的地位和他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加以考虑之后再来分析他所写的文献（不单是引人注目的字句，而是全文的意思）。尤其是当时的毛泽东，处于率领地方武装势力的领导人地位，在当时的情况下，倘若在红军内部主张与中央的方针针锋相对，并企图在行动上有所表现的话，恐怕需要考虑势必给红军带来分裂和“内讧”的危险。（关于这一点，如果联想一下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言行，不是可以理解几分吗？）总之，如果史料不公开，要想

判断中国学者围绕毛泽东与立三路线关系的争论哪个是正确的，我看很难作出公正的判断。另一方面也存在这种情况，虽然有条件利用史料，但却没能活用。对于处在我们外国人来说，那是令人十分气愤的。下面举个具体例子。

朱、毛红军开始创建时期不是叫“工农红军第四军”，而是用的“工农革命第四军”这个名称。最近中国也开始强调这一事实。这正如被收入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集补卷》第二卷中的新史料所证明的那样，当初称“工农革命第四军”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末是何时起改称的呢？中国的论文说是“不久”，时间是以1928年5月25日的《中央通告第51号》和6月4日中央发给朱德、毛泽东等前敌委员会的书简（其中，中央对朱、毛四军说：“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为红军”）为限，中共中央的指示尽管如此，但实际上这个指示是何时到了井冈山的毛泽东之手呢？看了毛泽东在11月25日写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选集》已将这部分删去）后，方知是11月2日（原文是“12月2日”，但显然应该是11月2日）经江西省委吉安县委才到了毛泽东之手。

问题不仅仅限于军队的名称是何时变的，而是与1927年11月中央否定所谓瞿秋白的第一次极“左”冒险主义路线的新方针何时到的井冈山，毛泽东对此有什么反应有关。我曾就这一点作过论述，但由于得不到论证所需要的1928年6月4日的中央指示信，因此不得不作出各种各样的推测。另一方面，虽然中国有这个中央指示信，研究人员也可利用，但我没有看到将6月4日的中央指示信和带有回信意思的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加以比较的论文，也没有见到论述1928年10月和11月的毛泽东的两份文献（《湘赣边界各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和《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之间略有不同的论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是中国的学者在论述毛泽东

时，似乎通用一个原则，即如果有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献时，则优先使用。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否存在，我不清楚，但读了他们的论文之后便会知道，凡与《毛泽东选集》适合的部分就从《毛泽东选集》上引用，不适合的部分才引用原史料，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作法。不用说，这种作法不符合“实事求是”的方针。而且只要采取这种敷衍的研究方法，那就不可能对具体情况下的毛泽东的具体行动作出确切的分析。

把《毛泽东选集》绝对化所带来的弊病

(1) 改写史料

将史料任意删去，这在前面已经提到，然而不仅如此，还对史料进行任意的修改。

具体例子就是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写的《前委致中央的信》。为什么说可以看出是改写了呢？这个4月5日的毛泽东的书简，其大部分被引用在1930年1月5日毛泽东致林彪的信中。但是当把《给林彪同志的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又作了相当大的删改。那时，就连引用的4月5日的书简也作了修改。我从《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资料文献》（1979年12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1982年5月，江西人民出版社）中第一次看到4月5日的书简全文。仔细阅读后便知，在《给林彪同志的信》中所引用的地方，依据于在《毛泽东选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已被修改的部分。相反，4月5日的书简本身也作了修改（并不是说要百分之百的相同，但有些地方确实经过了修改。反过来说，假如在《给林彪同志的信》中引用的部分采用未经修改稿〔设想〕的话，那么《前委致中央的信》基本上就可以还原了）。显然，这种修改是由把《毛泽东选集》绝对化这一错误想法产生的。

把1929年4月5日的《前委致中央的信》同1928年11月25日的

《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对比来看，可以认为4月5日的书简是了解下井冈山之后的毛泽东如何成长的极为重要的文献。修改这么重要的文献，据说是要忠实于《毛泽东选集》。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尊重毛泽东，但实际上不是不理解毛泽东的生气勃勃革命精神的教条主义行为吗？

(2) 不让公开《毛泽东选集》上的文献原著

象《前委致中央的信》的这种修改，可以说是个特例。但是在中国的史料选编中，这种令人难办的史料处理方法极为普遍。

这是指，当要把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献收入史料选编时，尽管知道载于《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献是经毛泽东后来修改过的，但仍以参照《毛泽东选集》的某卷某页为依据，使《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在史料选编中通用，而对本来应该收入的原著不再作介绍。

例如：《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被收入《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中，但其中的第一部分以“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3至93页）”的形式而被省略，只介绍了“二、党的组织问题”等以下部分。然而，《古田会议决议》象该书编者这样任意的取舍还是没有前例的。本来，《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是以“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非正确倾向问题”为题的，它与《毛泽东选集》中收入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只是在标题上不同，在内容上也有相当大的区别。众所周知，《古田会议决议》在延安时期，曾作为整风文献在全党进行学习，它是毛泽东的重要文献之一。而作为学习文献的该决议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它反映了中央党内围绕着军队内政治和军事关系所作的解释的变化，最后采取了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形式。《古田会议决议》的变迁过程本身，提供了了解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史料。我觉得，认为参照《毛泽东选集》就足

够了的这种态度，是很难了解《毛泽东选集》产生的过程的。

(3) 忽视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对于中国革命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论述。这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论者都以《毛泽东选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素材进行论述，不能不说这是非常奇怪的。本来是给林彪的信，但是在把包括批判未认识到根据地革命理论必然性的林彪的右倾思想的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却把与他有关的部分都删去了，变成了一般性的论述。而且，不仅是那种形式上的变化，在内容上也看出有重要的变更。内容上的变化本身，并非是不可思议的。从1930年给林彪写信的时候起，经过其后20年的革命实践，认为毛泽东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变化和发展，那是不恰当的。《毛泽东选集》是在经受中国革命的实践检验之后，毛泽东又加进了新的思索的成果，所以它是了解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和发展的珍贵史料。奇怪的是对待《毛泽东选集》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采取非历史性的处理方法的历史研究者的态度。论述1930年的思想，却偏偏拿出20年后的文献，那怎么能不混乱呢？

应该贯彻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如上所述，最近中国在毛泽东研究以及可以称得上是为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基础的史料和回忆录等的公开出版上，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文革时期所造成的混乱已迅速得到了纠正。然而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指出还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很可能将那种成果丧失掉。这是指对史料不想取严格的态度，明显地看出以史料和情报的占有为资本的研究在横行。特别成问题的一点是，绝对地看待《毛泽东选集》这一历史的产物，把本来应该重视的毛泽东的原著划为禁区，这种倾向至今仍在继续。这样一来，毛泽东在历史

上的真正形象就不鲜明了,《毛泽东选集》本身的意义就得不到正确的评价。

据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被否定,他已从神回到了人间。但是只要对《毛泽东选集》继续按“经典”处理,毛泽东就不可能回到人间,他始终会被奉为凌驾于人民头上的“圣人”。人们会敬爱那样的毛泽东吗?自然那是敬而远之。在原著被划为禁区,受到作为正统文献的《毛泽东选集》所束缚的状态下,毛泽东的研究能促使人们的思想解放吗?相反,不是有可能陷入对“经典”的“教条式”的解释吗?

邓小平指出,在毛泽东所倡导的作风当中,“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这种作风对于毛泽东研究来说,不也是应该坚决提倡的吗?

(译自《中国研究月报》1984年8月号)